

中国作家人生档案

金蔷薇 编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燕英

封面设计 李 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作家人生档案/金蔷薇编. -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01. 1

ISBN 7 - 80100 - 767 - 0

I. 作... II. 金... III. 作家 - 生平事迹 - 中国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21 号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城区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 100027 电话 64153909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24 426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00 - 767 - 0/Z · 173

定价 53.60 元(上、下)

出版说明

什么是人生？由于人们的经历不同，自然就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不同，生和死都是一样的，真正的不同就在于过程。我们说生活有无滋味，其实就是说过程的喜忧。有的人活得顺畅，有的人活得艰难，有的人活得快乐，有的人活得痛苦，都是一种生命历程。

然而，不管是什么样的过程，都有值得回味的地方，更有启迪后人的价值。特别是那些历经磨难的人，他们身处逆境并不气馁，这样的人生过程更可贵。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出版这套丛书，目的就是帮助读者，在思考人生真谛时，提供一点真实的事例。相信喜欢思考人生的读者，能够从中得到一定的裨益。

这套丛书名为“人生”档案，意思就是强调

它的真实性。有的人喜欢或习惯读小说,觉得小说故事性强好看,其实真实的生活更精采。只要认真地清理和总结,几乎每个人的独特经历,都是一本好读有益的大书。

徐光耀

徐光耀简历

徐光耀，1925 年生于河北雄县一贫农家庭。1938 年参加八路军，曾亲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在部队中自学成材。出版过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中篇及电影剧本《小兵张嘎》，另有中、短篇《少小灾星》、《望日莲》、《我的喜剧系列》等。曾任河北省文联主席。现已离休。

昨夜西风凋碧树

——忆一段头朝下脚朝上的历史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13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因为有太多的英雄故事感动着我，我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所以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真确。

一、祸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逃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逃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的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人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22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拼命读书，8个月毕业后，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入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10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

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是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的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戒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作了三区区委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津才听到这个消息，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也是

13岁入的党，那时已有17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丁、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儿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

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一个，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其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缭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

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意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吗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入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嘀咕，我是个吝啬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究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防将来

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指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下台阶，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糖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占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上盖有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进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

大事实的辩证》；三，《辩证材料的补充》。总计约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真确计，也顾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在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

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是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证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

“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心头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从信中的问题反观，丁玲被打成“反党小集团”，罪行大体是这些：把持文研所，不要党的领导，学员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宣传“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培养个人崇拜，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言论，等等。问题都与文研所紧密相关，是否还有其他，可就知道了。这是谁“发现”和“揭发”了这些罪状的呢？我怎么就不觉得？——咳，管他！还是写回信要紧。

由于来信严肃认真，我也给自己定个规矩：一定要用党性顶住心上的欢喜，只当丁玲仍是反党小集团头目，所述事实，必须客观公正，不偏不倚，严防把偏私情绪带进去。决心既下，立马停下长篇，查日记，翻笔记，忆交往，对事实，两天准备，一天起草，快速把复信写成。自己读了两遍，犹恐不够完备，便悄悄拿给住在北屋的党小组长胡可，请他挑挑纰漏。胡可一向谨慎正派，活泼温文，很容易亲近。他读完，说：“看不出有什么不妥。”却又握住双拳做个“对撞”手势：“只是还缺点儿这个。”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嫌不够有力和尖锐，应该更带劲些才好。回到我屋，便又

在信末的“意见”部分加了第5条——胡可若看到这里，或许会苦笑吧？他怎能想到，那个挺俏皮的“对撞”手势，竟是在给我的“反党”加油呢。

第二天，誉正抄清，恭谨封严，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他也要取收条回来。

在此，我对读者提个小小的请求，求你无妨带着“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从中找一找“反党”成分或因素。如此，则益莫大焉。下面便是这封回信：

作家协会党组：

我本月8号晚上才收到你们的来信，所以这份材料没有办法在7号以前送给你们了。

接信后，我用了两天时间翻查了我从1950~1953年的全部日记，也翻读了我在文研所时的听课记录，联系它们，又把我和丁玲的接触作了一番回忆。现在，我便根据这些来回答你们的问题。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1. 有过这样一个事实，1950年9月30日，我初由天津来北京，遇到陈淼同志，他告诉我文研所的创办原由，大意说：（1）解放不久，毛主席找了丁玲去谈话，问她愿意做官呢，还是愿意继续当一个作家。丁回答说“愿意为培养新的文艺青年尽些力量。”毛主席听了连说“很好，很好”，

很鼓励了她一番。所以，丁玲对这次文研所的创办，是有很大的决心和热情的；（2）文研所的创办，与苏联友人的重视也有关系。苏联的一位青年作家（可能即龚察尔，记不大清了），一到北京便找文学学校，听说没有，表示很失望；（3）少奇同志去苏联时，斯大林曾问过他，中国有没有培养诗人的学校。以上两项，也对文研所的创办，起了促进作用。

这就是我听到的关于文研所创办的传说，以后，我再没有机会听到谈这个问题了。

我当时的看法是：文研所是党办的，这没有疑问。（当时也流传这样的说法：“文研所是文艺党校。”）丁玲在里面起了很大的甚至是主要的作用，也觉得没有疑问，因为是党委托了她来办文研所。文研所的创办，体现了党对青年写作者的关怀，这关怀又具体表现在丁玲对这事的热情和积极性上。

2. 以我看来，说当时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大威望，这威望的形成有很多原因，原因之一，便是她是党员作家，而一部分人由于她是党员而寄予很大信任，是很自然的事情。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具体领导，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同志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停止过，很多次思想斗争，政治运动，以致最后的整党，都是支部直接领导的，这些工作都进

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党员对文研所的指责和意见，也大都 是经过支部提上去的，党的活动经常影响着学员们的学习、生活和思想。怎么说不知有党呢？就我知道的，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且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也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3. 至于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而且，她还给我以热爱党和热爱新社会的印象。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 据我所知，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们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未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曾造成我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所以，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的印象之一。这一点，恐怕文研所的学员都可以作证的。

2. “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现在认为是不妥当的。她说过恍惚可以这样联系的一类的话，如她说：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读了有所收获，长久不忘，

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自己的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这话至今看来，也没有什么错。

至于来信中提到的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在动身的前一天，即1952年2月26日，丁玲叫了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在她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值不得骄傲。

3. 也有过这样一事实：1950年11月9日，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的学习计划，丁玲在会上的确讲过这样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红楼梦》，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

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的，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而就在这同一次讲话里，她就说过：“我们是个长途竞赛，我们才从起点上跑起，以后的路子还长，有成就的就不能骄傲，大家也不要害怕他，应该有什么就说什么。书出来了，是人民的，不是你的。人民是应该批评也能够批评的，不让人家批评，就是守财奴，那你当打字员去好了……”

以上便是她说的话的真相。它是有可能被误解的。我在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上的发言，也曾指责过“一本书主义”，然而那是在一种空气，一种压力下未经认真思考说出来的，它只是说明了我思想上的一种错误，我为那样的话感到惭愧。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中宣传和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我觉得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是在我自己。还应该说一句，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张凤珠散布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我和她没有接触过。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

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是没有的。康濯、田间和其他很多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我倒是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的。当然，如果康、田等人都给丁玲把持住了，她是通过他们不要党的领导，我便不清楚了。但我细细想来，觉得并不是那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

（六）丁玲给我的不好影响，我想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的。但，在我心中更多的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我想说一说丁、陈事件以来我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意见，请作参考。

1. 我觉得，丁玲假如没有其它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她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她在宣传、坚持和保卫工农兵文艺方向上是有功绩的，对培养文艺青年也做过很多工作（在这次丁、陈事件的揭发过程中，这一点也反映得突出），她对党、对新中国有着真实的感情，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但有一线希望，我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本着“八大”精神，用珍惜的态度，澄清她的问题，并采取措施消除这件事所引起的消

极影响，这对党是会有利的。

2. 假如在丁、陈事件的揭发处理过程中，有着过火或失当的地方，我希望作协党组能记取这样一个教训：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防止造成那么一种空气，即没有人敢讲反对的意见。因为，无论怎么说，这是对事情的解决没有好处的。有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压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来。我自己在中宣部那次大会上的发言，便有过这种情形。这很可能只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而不能充分反映事件的真相。这对党不利是不待说的了，即对这些年轻的同志说来，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心情会容易轻松得下来的吗？这些同志自应进行他自己的检讨，而党组也应预先便考虑到那可能是痛心的后果的。当然，假定有人故意说谎，向党骗取信任，则应给予必要的谴责。

3. 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错了，我以为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我们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一切党的作家，都应该像她那样跟青年写作者们有那么密切的联系，从党同群众的联系的观点来看，也应该是这样的。

4. 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的估价。自丁、陈事件揭发以来，在许多会上的报告、讲话和发言中，有把文研所全部否定的倾向，好像文研所只是培养了“一本书主义”，提倡了骄傲，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它是

否有成功的或对了的地方，一字不提。这不但是不合乎事实和不公平的，而且使几十个在那儿学习过的青年们，也无形中一齐给背上了包袱，使他们常常感到困惑，甚至羞于承认在文研所学习过；也影响到一些组织上对他们的看法。我以为，这也是个不能轻视的问题，那一些过于片面的说法，应当加以纠正。

5. 我对你们这次给我的来信，有一种在态度上不够全面和不够客观的感觉，上面只是问我受了“一本书主义”什么影响，某件事是否即鼓励我的骄傲，丁玲给过我“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却没有向我要对这些问题的反证，也没有问我受过她一些什么好的影响。这使我有些担心，这样的调查问题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意见是否有错了的，望给我以批评教正。

此致

敬礼！

徐光耀

1956年12月12日京

我的“规矩”形成了这信的特点：一、所有事实，都有时间、地点、场合，极便查证；二、对丁玲有利的话说了，对丁玲不利的话也说了，没有回避，没有“耍心眼”；三、用事实回答问题，用党心提出意见，至于怎么给丁玲定性，全然听凭组织。如果说到倾向，也只“但有一线希

望”，“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而已。最大的尖锐，则是担心这样的调查“会不会得到完全公平的结果”。

信发出之后，心里踏实，丝毫没有大祸临头的预感，谁知“罪行”却由此铸成了。

三、“兴高采烈”

平心静气地想，自建国直到1957年上半年，那日子实在是美好的，供应充足，物价稳定，社会治安良好，各条战线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大有提高，各级干部清正廉洁，党群关系鱼水情深，旧社会的恶霸、土豪、官僚、黑帮，一扫而光，小小一阵风，就吹掉了千年痼疾——吸毒和娼妓，党的任何号令，无不四海风从。朝鲜战场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头号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个个吐气扬眉。东欧虽然闹起了波匈事件，可我们安定如常。相形之下，在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是最自豪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党、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正确啊！

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报纸，仍是一片连一片的大好消息。国家所有举措，大都得民心，顺民意。知识分子们，每天都在用他们的如花妙笔，大力歌颂形势大好，海晏河清。像我这个从一当兵就被教导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人，还

有什么不放心的吗？没有！很高兴，很放心。我若想跟上形势，有所作为，只有更深地埋头于我的长篇，我的人物。

突然，毛主席提出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单这充满诗情画意的两句话本身，便很让人喜欢，“百家争鸣”，何等动听，“百花齐放”，何等灿烂。粗按一下它的内容，无非是给人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把政治空气，文化环境，包括创作思想、学术气氛，搞得更宽松，更活跃罢了。建国七八年了，干部更加成熟，人民更加觉悟，党的绝对权威极为巩固，把民主自由予以扩大，岂非顺理成章的事吗？抗日和打老蒋时期，我们天天高喊民主自由，《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也一再呼唤民主自由，现在要把承诺兑现，看来民主自由之花，就要在眼前开放了。谁个——尤其是知识分子，哪能不欢天喜地呢？

随着“双百”方针的发布，党又提出了“整风”。党已经够伟大，但还存在缺陷，还有阴暗面，不适应执政环境，也不符合人民利益。怎么办？号召“鸣放”，给党提出批评，帮党改进，使党更完美。为了解除人们的顾虑，凡开会就提倡“畅所欲言”，再三再四地宣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抓辫子，不打棍子”，“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说，马列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如果一批就倒，马列主义也就没有用了。还画出一幅美妙的前景来：“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

一种政治局面。”说得如此动听，如此恳切，不知别人，我一听就喜欢到骨髓里面去了。倒不是我有意见不敢吐露，而是感到这么一来，党就真的会使我们的国家超越历史上的任何太平盛世，达到空前的繁荣富强。这怎么不激动人心！我甚至想到了当年的“整风参考文件”苏联话剧《前线》，这是个揭露苏联自己阴暗面的戏，它批判前线某些高级指挥员顽固守旧，压制新生力量，致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当时新华社发表文章说，苏联在正遭德国法西斯重创的时候，公开上演这样的戏，是她自信有力量，不怕批评的表现。当前，我们迎面没有希特勒，全国人心齐向党，党还要发动批评，以疗救党的疾患，可不比当时的苏联更伟大吗？

有一天，胡可从外面开会回来，神情特别兴奋。我问怎么了。他说，刚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哎呀讲得真好，毛主席水平就是高！”胡可是全国人大代表，有资格亲听毛主席讲话，他的兴奋，他的幸遇，都使我啧啧艳羨。没过几天，我也接到通知，去听毛主席这个讲话的录音。我高高兴兴地跑了去，发现会场里很多人都把本子铺在膝盖上，一面听，一面与自己的记录对照，他们早听了非止一次了。他们在追求一份更完备的记录。我的手一向较慢，又是录音，又是湖南话，记得很糟糕，很生了一场自己的气。

毛主席亲自出马，亲自动员，苦口婆心，竭尽热诚，必是想到了1945年在延安回答黄炎培的那段话：我们已经找

到新路，我们能跳出那个“其兴也濛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这条新路，就是民主。现在，正是毛主席为此而大展宏图的时候了，他要为中华民族种一棵常青不朽、开历史先河的大树！所以才如此热情地鼓励大家多提意见，以便发动全国人民，发扬民主，倾心吐胆，帮助党把风整好。毛主席尚且如此，我辈小子，有何德能，逢此开明盛世，眼望光明前景，真是觉得太幸福了！

恰在此时，部队上却出了个“四人文章”事件。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下子被毛主席指为：跟中央“双百”方针唱反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甚至说，解放军开来了四个团，要对“鸣放”进行阻止云云。瞧，反对“鸣放”的左派们，遭到痛击，不是给“鸣放”政策上了双保险吗？凡对“鸣放”心存疑虑的人们，还有什么可犹疑观望的呢？

在这么火热的气氛中，创作室全体开会，宣布“鸣放”开始。会场上人人笑容满面，一派祥和轻松。然而，发言虽说踊跃，“火力”实在不猛，且多数与本单位无太大关系。即使扯到国家大事，也多有言不及义的。直到“反右”了，才有人总结说，创作室一周左右的“鸣放”，“攻击方向”主要集中在三大主题：一曰“肃反”，二曰统购统销，三曰反苏反共。其一是指，有人在总政文化部“莲花池肃反”中挨过整，心存委屈，“鸣放”时有所抱怨，如公刘。其

二，有的家属从农村来信说，“卖余粮”卖过了头，挤了农民的口粮，有的地区不得不又吃“返销”。其三，新来的秘书吴占一，东北人，很年轻，给陈沂部长当过秘书，大概从上层风闻到中苏关系有变化，便来“鸣放”说：苏联红军45年进入东北时，到处强奸妇女，乱拿老百姓的东西，还拆走了我们好多机器。这些话，其实只能算作“闲篇”，没有谁把它当真的。

惟一“火力”较猛的是樊斌。樊斌不是创作室的正式成员，他从小要饭，要饭要到八路军那里，同志们说，别要饭了，当兵吧，共产党就是为穷人翻身求解放的。他就丢了讨饭棍，成了红小鬼，从卫生员一步步熬到军医，也提高了文化。在进军西藏途中，眼见无数战友艰苦卓绝，大受感动，写了个中篇《雪山英雄》，出版后颇受欢迎。他再接再厉，又结构了一个新中篇。创作室发现他是个好苗子，为成全他的作品，便暂时“借调”了来。他也跟我一样，是个“一根肠子通到底”的家伙，自恃根正苗红，便放胆“鸣放”说：我见过一些坏干部，吃着国家的饭，整天闹自私自利，就像枣树上的尺蠖，一屈一屈地到处啃吃人民的财产。有些更可恶的，简直张着血盆大口，公开吸食民脂民膏。说起这些蛀虫来，我真恨不得拿机关枪嘟嘟了他们！

“反右”时，樊斌成了创作室当头第一名，说他对党“怀有刻骨仇恨”，证据就在“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

若论我在“鸣放”中的表现，倒是个十足的“左派”，

不但没有一句错话，还把三大“攻击方向”批驳了两个。从“左”的立场上说，真称得起是我的一份“荣耀”。我说，“肃反”确乎伤了一些人，可也把一些人的问题弄清了，譬如我们华北军区整张志民，整得他几次哇哇大哭，连书信、日记都翻查了，最后结论是没事儿。既没事儿，他就用不着背个不清不白的“包袱”了。这不也挺好吗？我这话的内涵是：我做过除奸工作，深知有些“嫌疑分子”的档案中，存有长久弄不清楚的“问题”，本人也许全然不觉，但在知底人看来，其“包袱”是极为沉重的。诗人张志民被肃，是由于公安部的两条检举：一曰在逮捕胡风时，他在门口“探头探脑”；二曰，从胡风家中抄出了他的书信一封。假如没有把他“整”一通，想落个清白档案，是不大可能的，何况检举者是公安部呢。

至于“攻击统购统销”，创作室最大的反驳“权威”就是我。我刚刚亲自办了三年的农业合作化。三年中，按照党的文件仔细观察，确乎发现不少“新富农”苗头，就是说，这些“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多数还留恋新民主主义，不愿、也不满农业合作化的，因而成了合作化的绊脚石。党之所以发动“卖余粮”运动（即统购统销），就为给“新富农”们一个沉重打击，绝了他们拿粮食去“投机倒把”剥削别人的路。我甚至拉扯上我的父亲，说他解放以后，小日子蒸蒸日上，就忘了旧日苦楚，正顺着“老富农”的发家路线，兴致勃勃地寻求发财呢。若不把他的“路线”掘断，

怎么会规规矩矩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呢。——我这话，说得叮叮当当，被驳的人只好哑口无言。

为此，当反右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创作室有个同志在惊愕之余，指着我说：“徐光耀，你小子这回又闹对了！”我听了，还真觉得又经住了一次严峻考验呢。

大家已经“兴高采烈”得差不多了，在宣布“鸣放”结束的那次会上，主任虞棘突又加给大家一个任务，他说：“‘鸣放’是结束了，可每人还得交一篇‘鸣放’文章，把你们已经说过，或没有说完的意见，再用文字表达出来。这不是要求，而是死命令。诸位都是作家，各自去找题目。”我急不可待地说：“我怎么写？大家都见了，我根本没有意见呀……”不等我说完，虞棘就连忙又摆手又摇头：“不管不管！不是说了吗，死命令，有没有意见，都必须交文章，谁都一样。”老实说，自打参军以来，这还真是第一次听到“死命令”。好吧，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自己去想办法吧。

在家里绞了两天脑汁，从陈、陈、马、鲁“四人文章”，忽然想到部长陈沂。陈的领导，我素来觉得有点家长作风，而社会上时露苗头的文艺教条主义，也导致一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公害”，都有使文艺脱离群众的危险……就这样，脑子里一步步生发开去，一条凑一条，终于把文章凑成了，题目叫个《海阔凭鱼跃》，副题是《向部队文艺领导献上我的几点浅见》。为给写长篇挤时间，匆匆抄

正发出。

过了不几天——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敲响了“反右”的战鼓，又过8天，《海阔凭鱼跃》在《文艺报》登出，白纸黑字，斧头也砍不掉了。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说着，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了，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警钟，也未放在心上。

但事后我常常想，虞棘其人，一向较为谨厚，有山东汉子之风。我们虽无深交，也绝无私怨，他从哪里找来“死命令”这一招数的？若说是“恶作剧”吧，虞棘似不是这种人；若说是支部故意设计，而同时上当的还有魏巍和胡可，他们都有“鸣放”文章出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

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原来如此，“死命令”，乃整个战略部署下的战术发明，你还往哪里逃呢？

四、插 曲

忽想起一件与“鸣放”小有关系，可互相“照应”，最后留下一个“谜”的事来，也无妨记在下面：

约在创作室“鸣放”后期吧，虞棘通知我及另外一二同志，去旃檀寺总政大院，参加给陈沂部长提意见的会。并说，此会是文化部与宣传部联合召开的，目的是整风，陈部长也希望听听各方面的意见。这使我有兴奋：有机会当面给部长提批评，不是随意可得的。况且平时总认为他说话生硬，办事武断，文艺观点偏“左”，创作室许多人对有些畏惧。把这些话说给他听听，总是件好事。当然我也知道他是老革命，有不少功劳，文艺界惟一的一名少将，挑了我去“捋虎须”，不是好玩的。但还是做好了发言的准备。

会场设在一个中等会议室，约五六十人之多，清一色都是军官，绝大多数我不认识，主持会议的是总政宣传部领

导。与一般“鸣放”不同，气氛相当严肃。会议预定八点半开始，人早到齐了，时间已过，独不见陈沂露面。主持人一面派人去催，一面频频看表。催的人回来说，还有一点什么没有办完，得再等一会儿。主持人颇不耐烦地宣布：“再等五分钟。”五分钟过了，仍不见来。便有人提议，“开吧，开吧，说着等他。”于是有位首长指指我说：“徐光耀，听说你有些意见，你先说吧。”可我却站起来摇头说：“我不，我要等着陈部长来了当面讲。”这句话居然引起了一阵轰笑。但我刚刚坐下，陈沂就大步匆匆地闯进来了，连连说着“对不起”。

主持人便再次指我：“陈部长来了，你讲吧。”

可惜“文革”期间，我忍着剜眼剖心之痛，把日记毁掉了，不然，我会把意见复述个大概的。如今记忆力衰退，实在想不起说了什么了。但由此也可证明，我那些话都属于“鸡毛蒜皮”，没有可以上“性质”的。不然，总会记住一两点。但有个细节还留在印象中，即，我谈到了一件事实，刚说了半截，陈沂突然插断说：“事情不是这样的，那是……”我也立即插断他，说：“陈部长，请你让我把话说完。我说错了，你有的是时间反驳。”接下去，一口气把话说完，没有再碰到阻拦。

几年之后，才奇怪我哪里来的那么大“贼胆”，“猖狂”到如此程度，可不就是明目张胆地向党进攻吗？有趣的是，此后不久，陈沂和我都被当成“右派”来打了。据传，斗

陈的会场上贴有大幅漫画：满脸青绿的陈沂，正抱了马寒冰的尸体做投枪，凶恶地向党进攻！而这次我对陈沂的“攻击”，即无“向党进攻”之罪，也不给“反击右派”的嘉奖，大会小会毫不提起，悄悄的“功过相抵”了。

此后的四五天，忽接到一封很奇怪的信。信封上标明来自“克拉玛依第495勘探队”，打有三个邮戳，日期分别是“5.23”，“5.24”，“5.25”，都盖自北京。8分邮票的图案是红军长征“过雪山”。“克拉玛依”那时正声名大噪，因为据说发现了大油田。可我与克拉玛依素无来往，谁给我写信呢？

打开看，是半页竖行红格稿纸，字迹秀美流利，信很短，抄之如下：

徐兄：

偶读高中文学课本，见曹植《野田黄雀行》，甚感古风犹可贵，抄寄共赏。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致
敬礼！

友人自远方寄

（课文中注解尤有味道，不赘）

我的文化水平很低，看了，不懂。愣了半晌，想到正有一套高中文学课本在架子上，找着曹植这首诗看注解，说此诗乃告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意，才恍然觉得可能是个警告。然而又拿不准，我并没有“捕蝉”，惟一想捕的只是长篇。我身上也没有什么油水，怎会招得“黄雀在后”呢？虽给陈部长提过意见，可那是在会上，当面讲，毫无伏在背后偷袭谁的意思。到底怎么了？

下午，创作室仍开会“鸣放”，我把信带到会上去给大家传阅。人们有的摇头微笑，有的说是匿名信，是开玩笑，也有的说，写信人怕有阴暗心理，最激烈的说是，“这是破坏运动，应当查一查！”……当宣布正式开会之后，我就把它收回兜里，一直保存至今。

忽忽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此信，猛觉写信人实在是一位贤明，在那网罗四张，钓饵垂遍的年月，他能一展大慈大悲之心，给我这位盲人瞎马一个提示，该有怎样一副济世救人的古道热肠啊！可惜的是，还从哪里去寻这位恩人呢？他是不是仍活在世上？他还记得这件事吗？天可怜见，信主虽然难找，信却成了我最堪珍藏的一件文物，若把它视之为抵制“阳谋”的义举，那价值就更高了。

五、“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反右运动兴起之后普遍流行于大小报刊的一句话。它所形容的是：形形色色的“右派分子”都落入“大海”里了，正遭着“人民”的“聚歼”。这“大海”之深、之广、之沸腾如烈火烹油，都够得上是“史无前例”。过去小说中常用的“鱼落网中，鸟已入笼”，绝对不够劲。一旦入“海”，你即使以头抢地，哀告求饶，都不管用了，必要扫尽你的斯文，剥尽你的尊严，辱尽你的人格，骂你个狗血喷头不可。其实，泛过这个“大海”，用不着再劳动改造，已尽够使人“脱胎换骨”了。

但后来有人评价创作室的整个“运动”说，“鸣放”阶段，基本上冷冷清清，“反右”阶段，也没有太大“火候”。意思是，从全局衡量，算不上“典型”。现在想来，倒也不无道理。若与军外相比，真可能是很文明的。拿敲起“反右”锣鼓的6月8日社论之后说，创作室竟还安排人去度“创作假”呢，使我们几个——史超、周洁夫、柳其辉、黎白夫妇、徐孔和我，优哉游哉地上了北戴河海滨，轻松地写开了东西，并大游其泳。已在风起云涌地“反右派”，仿佛与我们全不相干。可是，有一日在阅报栏前，忽听周洁夫

“哎呀”了一声，吃惊说：“怎么，刘宾雁也成右派了？他要成了右派，我们都是右派！”我立即凑上去看，果然，刘宾雁已在报上“点名”，同章伯钧、罗隆基等划归一类了。

周洁夫一向沉默寡言，性格内向，我跟他不甚熟，亦不知他与刘宾雁是啥关系。但他的惊叫也惊了我的心：什么叫“我们都得是右派”？“右派”跟我们沾得上边儿吗？

然而，当天即接到创作室的长途电话，叫我们立即赶回单位，以参加对“右派们”的反击！我除了遗憾游泳尚未过瘾之外，倒庆幸长篇恰好杀青了。第二日一早，几个人骑了自行车往车站赶，路上，我绑扎得很紧的长篇底稿包袱，忽从后架上颠落，丢在地上。我心上猛感一震，觉得这是个凶兆。

创作室的第一次会议，给人印象还算平和。虞棘主任讲话，主要是要求大家放置手上工作，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右派”斗争，该揭发的揭发，该检举的检举；如果在“鸣放”中说了“出界”“出圈”的话，要进行检讨，早日“卸包袱”。谁跟社会上“右派”有联系的，更须及早交待，划清界限，以便轻装上阵。

气氛不算紧张，但是开始了。

“要拿机关枪嘟嘟共产党”的樊斌，自然首当其冲。可怜这个小要饭的，大概在旧社会也没有被三十来人围着臭骂过。“尺蠖”、“血盆大口”、“吸食民膏”、拿枪“嘟嘟党”，开头还算是“出界”，经过三批两批，很快都变成了“对党

怀有刻骨仇恨”，“疯狂向党进攻”！按理说，谁个心中都明白：樊斌所想“嘟嘟”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坏干部。这个“个别”与“一般”的常用概念，不知怎的一调换，坏干部都成了“共产党”。与会的多数人在战争中锻炼多年，原则性原本很强，竟无一人（包括我）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悲剧就这样“顺利”而反复地循环。在这种局面下，朴实而又木讷的樊斌，全无一言可辩，只能认罪低头，不几天便“斗熟”了。最后，党籍军籍双开除，戴上“右派”帽子，发往云南麻疯病院“改造”去了。《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的批判文章，题目就叫《反党逆子——樊斌》。

在斗樊斌的时候，创作室插空发了个打印文件，人手一份。题目毫无感情色彩：《公刘在“肃反”以后写的几首诗》，录有《怀古》二首，寓言诗四首，新诗两首。分别发表在《背后观察》、《文汇报》、《诗刊》等处。只有最后一首长诗，不知何故，注有写作日月，而无发表处所。文件很干净，无一字说明。

公刘在“鸣放”中，对“肃反”表示过不满，但意见唔唔啾啾，说不上有多少“上纲”的东西，而这八首诗，却把他“扣”住了。我向来不懂诗，公刘兄这八首，我是第一次欣赏，读得也最认真。但当时还是不大懂，只觉得很好玩。且抄一首《刺猬的哲学》，大家共赏：

冬天来了，到处飘着雪花；

两位刺猬哲学家，
为了寻找食物，
抖抖索索的在野地里爬。

它们在路上偶然相遇，
彼此像绅士一样行礼如仪，
相互问过夫人公子的康健，
然后咒骂了一阵天气。

可恶的北风越吹越紧，
两位哲学家都觉得很冷；
不靠拢吧四面招风，
靠拢吧又实在蜇人。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
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
既不要过分的疏远，
也不宜过分的亲密。

可是天啊！这样怎能取暖？
如果各人只顾自己缩成一团！
丢掉这种刺猬的哲学吧，
应该掏出赤诚的心来交换……

怎么说呢？这首诗的用意并不隐晦，最后一段已经喊出来了。可按斗樊斌时专挑毛病的习惯，据我分析，还确有“反党”成分：同志间靠一靠，就会“蜇”着吗？这种现象如果有，也是个别的。党从来不主张人与人“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非要这么说，就是诬蔑！这么一想，自然奋勇起来，积极参与了对公刘的声讨。凡人如我者的毛病就在：自己挨骂的话记得清楚，自己骂人的话，大都不记得了。幸而公刘仍然健在，我都骂过他些什么，他是完全有权力随时揭发的——写到这里，忽觉有个疑难：骂了公刘，泼了不少“诬蔑不实”的污水，道歉是当然应该的。可是，迁延至今，我既没有向公刘说过半句赔情的话，他也丝毫没有要别人道歉的意思，大家都认了！整人的，挨整的，都认了！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码事！今天，倘若有谁说了一句伤人的话，是要打官司的，道歉不说，还要索赔。可几十万或上百万的“右派”，至今无一人提过“道歉”要求。岂但道歉，即使“内部控制使用”，人不人，鬼不鬼，甚至家破人亡，“曳尾涂中”二十余年，等等，除了一纸“改正”，和一个“扩大化”之外，也就万事大吉了。宽容固然是美德，可尽是一味宽容，老是认了就认了，认了就罢了，陈陈相因下去，会不会又弄出个什么“文化大革命”来呢？公刘只善于思辩，不知他又有怎样的看法？

公刘在创作室名较著，文化素质较高，“知识越多越反

动”，斗起来自然升温加码，格外带劲。所费时日也大大超过了樊斌。在“背靠背”会议上，支部几次布置要“加温”。随着斗争的深入，报上“点名”的“右派”越来越多。突然，四川冒出个“反动透顶”的诗人流沙河来，喊得最响，批得最凶的是他的《草木篇》，说是一株恶毒攻击党的大毒草。创作室顺风顺水，把公刘的寓言诗与《草木篇》排行，称之为《禽兽篇》。这样一搭配，“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在反党上便有了“异曲同工之妙”！哪怕公刘浑身是嘴，也辩不清楚了。

“人民战争”越打越火，地方上的反右烈焰，很快延烧到部队来。一日，创作室的党员干部奉命去参加全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议”。我那时真是闭塞得该死，竟而全然不知这个“扩大会议”是干什么的，直到卡车开到王府大街文联大楼门口，有人说：“丁玲来了！”我忙问：“在哪里？”有人指：“那不是！”果然，陈明搀着戴墨镜的丁玲，徒步蹒跚而来。我急忙跳下车厢，跑过去把手伸给丁玲，说：“你好！”丁玲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而陈明的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我这才恍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急忙翻身跑回创作室的队伍，傻呵呵地一同进了大楼。

六、军外大舞台

原在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现已归了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甚觉可惜。这地方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五十年代后期，特别在“反右派”运动中，它实在是个极有意思的风暴中心。我相信，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将很难把它忘怀。

“党组扩大会议”的会场，设在二楼圆柱大厅，不大规则的摆着些桌椅，说不上哪是主席台，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就风格论，很有点自由散漫的民间意趣。主持人中最活跃的，自然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诗人郭小川等等。不知为什么，周扬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后来他偶然插话，我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其他与会者大多是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和知名人士，散乱地挤在“池座”里。宣布开会前，满大厅只听见“嚓嚓”的脚步着地声，有交谈也是嘘气样的“窃窃私语”，整个气息都屏住了似的。

我绝对不是描述这场风暴的“权威”，也谈不上合适人

选，充其量是个半陪绑性的“小萝卜头”。因“内幕”不明，又事隔42年，我只能从个人角度，就耳目所及，略述些“表面现象”。若睹全貌，只能俟诸真正权威大家了。

会议开始，周扬和主席们都没有讲话，这也不奇怪，“扩大会”已开过多次了，我们是被再次“扩大”来，半途插入的，没有见到开场一幕，也就很自然。今天抢占发言先机的是方纪，他那时在天津作协负责，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他说：天津文艺界的反右派，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柳溪，已低头认罪，并揭发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接着，他先历数陈企霞“伪造信件”，组织“翻案”，“到处点火，向党进攻”等等恶行，然后才把这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揭开盖子，说：丁玲计划在即将召开的文代会大会上“公开退出作家协会！”这是令人“全身发冷，毛骨悚然”的“分裂全国文艺界的”狠毒阴谋！在最后，方纪又掏出一本《南唐二主词校订》，摔在桌上，说，它就是陈、柳之间联络暗号的物证。

我惊愕，我痴呆，我脑袋里轰轰乱响，但还不到魂飞天外的程度。停了一阵，在新奇感和震颤感递减递消之后，忽而敏感了起来，在方纪列举事实过程中，牵连人数之多，最叫我惊心。依稀记得“被点名”的有：艾青、冯雪峰、李又然、聂绀弩、胡考、唐达成、钟惦猷、孙毓春、浦熙修、

梅朵、姚芳藻……还提到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等等。至于丁玲和陈明，更是案中主犯，不言而喻，这个发言的威慑力实非寻常，特别是一提到大阴谋“分裂文艺界”，界限一划，“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些人不就都归到一块去了吗？

“反右”进展到当前阶段，“点名”，已成为一种“请君入瓮”的手段，甚至就是“罪行”的证明。方纪的发言，很明显把会上的“火候”提升了一个高度，如他自己所说，是“突破性的”。此后不久，郭小川有个发言，更把“点名”带上新高。

郭小川同志是个好人，口碑至今不坏。但他在批判冯雪峰时，一开口就吓人一跳。他说他怀疑冯雪峰到底是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如果不是，骨子里又是什么？为证明这一“立论”，他念了一个为冯所接近所信任者的索引表，上名单的一共17人，他们是：

胡风，姚蓬子，韩侍珩，冯达，黎烈文，孟十还，彭柏山，刘雪苇，吴奚如，潘汉年，肖军，尹庚，丁玲，陈企霞，顾学颀，舒芜，张友鸾。

郭小川解释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务，叛徒，右派，反党分子，政治面目不清，思想反动的人。说冯从“左联”时代就与这些人“像影子一样离不开”，一起发泄对党的不满，与党闹对立，或是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郭小川还引申说，“如果雪峰也像普通干部那样，拿着这张社会

关系表去谈工作，我看哪个机关也不敢收容的。”这话自然很不错，然而，若按此“标准”也套一下周恩来，给他也列这么一张社会关系表，又将如何呢？——真不敢想下去了。

我认为，还应在此赘上一笔的是：郭小川同志在批冯与胡风的关系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冯（雪峰）胡（风）利用了鲁迅的生病的身体，那几篇重要文章，都是在鲁迅病重甚至连话都说不出来的情况下通过发出的。”我觉得实在太过分了，不但不讲道理，也不通。我真想为郭小川同志一哭！

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曾几何时，她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从延安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左联”时期的领导骨干，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前主编，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转眼之间，变成了“反党阴谋家”、“野心家”、“极端卑鄙的个人主义者”，当面被斥之为“落水狗”、“杨荫榆”、“莎菲”，乃至“凤姐儿”、“奸臣”……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为了把丁陈彻底地“批深批透，批倒批臭”，会议还邀请来党外的茅盾、郑振铎、老舍、曹禺、臧克家、许广平等

这些民主人士和文学巨匠，借助他们的声望、威信、影响和才干，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批判和侮辱这些人。在一次会上，我亲见许广平指着冯雪峰的脸，骂他“心怀鬼胎”，“不知羞耻”，几乎声泪俱下地指斥他说：“那时鲁迅正病得厉害，你还去絮絮叨叨，烦他累他，说到半夜，还在纠缠不休，你都想干什么？……”仿佛冯去找鲁迅，真个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冯雪峰放在案上的左手抖得簌簌的，一张惨青的老脸，憋涨着怎样的痛苦啊！这位 55 岁的驼背老人，领导过“左联”，参加过长征，蹲过上饶集中营，奉党命去做鲁迅工作，为革命赴汤蹈火大半辈子，他怎么会想到，忽然之间就成为如此为人唾骂的“右派”呢？

人们绝对会相信，从许广平的一生看，无论怎么说，她都是革命阵营中一位志士。岂但她，其他被邀请来的党外文学巨擘，也都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地发过言。他们往日在旧社会、与国民党作斗争的时候，都是品德高尚，注重名节，从不胡说八道的，如今却顺着大势，做些连自己也未必清明的所谓“批判”，捕风捉影，胡乱扣人“帽子”。他们都是资格名垂后世的，此后，当他们面对后人，要出全集的时候，再重翻这些“发言稿”，还能找到法子安放这份尴尬吗？有人说，中国文人自古就有个毛病，一碰上“黑手高悬霸王鞭”的逆境，很容易堕入下作不文之流，以至出现人格分裂，神志昏崩，理性和良知陷入混乱的情况。特别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整人的也挨整，挨整的也整人，

大家互相丑诋，互相撕咬，最无可奈何时，甚至互相欺诈，互相葬送。作家唐瑜说得好：“整个国家像中世纪的罗马竞技场，奴隶扑杀奴隶，以供奴隶主取乐；奴隶扑杀奴隶，为求自己得以苟延残喘。”话虽苛薄，情形确是这样啊。

当然，动机是有差别的：有的为洁身自保，有的为“立功自赎”，有的为证己无罪，也有的是奉命“打冲锋”，强作积极，自然也不排除有用人血染红顶子的。但从绝大多数看，却只有一条，那就是吓坏了，吓昏了！许广平倘不吓昏，怎会对鲁迅的战友说出那种话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巴金，若想反思或痛悔，能“思”得了，“痛”得成么？

但也有一个人与众不同，这便是老舍。老舍先生的发言最具个人特色，依然保持他幽默、冷峻、直白的一贯风格。听内容、名为批丁陈，实则颇多弦外之音。他说：“我早知道有人不大敬重我，说我当作协副主席，是把我抬得过高了。我说，并不高。”接着，他就说了几件在重庆从国民党手里救作家帮作家的事情。然后自问自答：“我不是在这里表功，更要紧的是解放后我可曾拿这些当作资本，争取当作协副主席没有？没有！我在重庆团结过作家，我有资格当作协副主席。我不是向上爬的人。我不会向首长们吹嘘自己，让我作副主席。”下面又谈到，外宾在他家吃饭，他送外宾小礼物，都没向作协要过钱。组织上请他去北戴河、颐和园休假，他也不去，“我有自己一个小院子，为什么要上颐和园把别人休息的机会挤掉呢？”他说，作协的庶务科说他是

“最省事的副主席”。他号召，“我们的国家还不富，我们应当勒紧裤腰去搞建设。”

他还谈到要尊重民间艺人，要帮助戏剧曲艺的发展，要重视侯宝林。最后落到“要团结”，做到“人人能够不猜忌，不虚假，不狭隘”，“大家都说真话，不背后嘀嘀咕咕。”

他的话，说不上石破天惊，确乎是格格不入，不记得有什么掌声，不过，人人都听得很提神。老舍毕竟是老舍，在这样的会上这么说话，也就难怪他后来要跳太平湖了。可若把他的话说细一“咂摸”，也有令人生疑之处，有些话，是颇涉党的“秘密”的。会上常批冯雪峰等人向党外“泄露秘密”，那么，是谁向老舍“泄露”过呢？可当时谁也想不到要去追究，这就更使人觉得耐人寻味了。

七、“花絮”（一）

人生大舞台毕竟是丰富多彩的。在压抑紧张气氛中让人破颜一笑的“花絮”，也曾出现过。我首先要说的是艾青。艾青虽然很早就同丁陈一样坐在了“被告”席上，可态度一直很悠闲，似已超脱红尘之外了。每听见逗乐及滑稽话头，他绝不掩饰、也绝不控制自己的笑容。为此，常有人骂

他“不老实”，“不严肃”。但他仍照笑不误。有一次，主持人拿他开刀，选了他一段“自我检查”稿，念给大家听，其中有一句话说：“那时我正生孩子呢……”引起爆炸性的哄堂。主持人气愤已极地说：“这个所谓的‘检查’，明显的是他老婆代写的，他看也不看，就这么原封交上来了。这对党是什么态度？”大家也自然跟着气愤，乱哄哄喊抗议。可你瞧艾青，脸上意气洋洋，照旧浮着一层微笑，意思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有位诗人说过，真正的笑，是“穿越了地狱的琼瑶”，大概就是这样的了。

第二件事纯粹是场意外，说不准是第多少次的会上了，批判正在高潮中。那天会场的布置也有所创新：桌子摆成一个大圆圈，人在内外分坐，坐在内层的脸朝外，坐在外层的脸朝内。谁发言就站到圈子中心去，可以很自由地转着圈子选择“听众”交流。事情就出在我联大的师母碾斐身上。她一面发言一面转，恰恰转到坐在外层的我的对面，突然说：“有人还恶毒攻击揭发问题的同志，比如——这话好像是徐光耀说的，说康濯同志是个‘汤裱裱’！……”这句话刚一落地，坐在我对面的康濯就“腾”地跳了起来，高举拳头，大呼口号：“我抗议！我抗议！这是对我的最大侮辱！……”他满脸紫涨，目眦欲裂，先是狠狠地瞪着我，见我也正瞪着他，便转过身去，又嘶声高呼：“我抗议！我抗议！……”大家都被这奇峰突起的事件闹愣了，像在静观，又像变成嘴爪麻醉的一群呆鸟，静悄悄全无反应。康濯

只好喘着咻咻大气，又复坐下。场上一冷，砾斐又接着发言，气氛乃渐次归于平静。

我已无心再听砾斐，一面观察康濯，一面想：“到底怎么了？干吗发那么大的火？”康濯是文研所副秘书长，我入所学习时认识，是个很会办事，颇讲上进的人。郭沫若曾说他的短篇比丁玲的写得好。约一年前，曾风闻说他是“起义将领”，至于起了什么“义”，我连打听也没有打听过。这次是戳着哪根肺管子了呢？直到砾斐下去，又换个新人发言，众人都不再注意我俩时，我才悄悄问与我并肩坐着的胡可：“什么叫‘康裱裱’？”

胡可一听就睁大了双眼，反问：“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我懂都不懂，怎么会是我说的！”

胡可叫我马上写条子给主席，声明不是我说的。我还满不在乎，说忘了带纸笔，反正跟我无关，慢慢再说吧。胡可就掏出本子，撕下一页纸，又把笔给我，促我立即写了这个条子：

主席：

砾斐同志刚才说的那句话，不是我说的。请调查。

徐光耀

把条子交给刘白羽，回到座位又问胡可：“什么叫‘康裱裱’？”胡可颇烦躁，只低声一句：“回家再说。”

散会回到家，我又追着胡可问，他才说：“你不是看过京戏《一捧雪》吗，那里头有个汤勤，会裱画，人称‘汤裱褙’，这出戏的后头两折，就是《审头·刺汤》……”我想了一想，才恍然似有所悟，原来“康裱褙”是我听错了。

即使如此，康濯那么激动，似也大可不必，个别行事不妥，人人在所难免。日后孙犁说他，有时有“进退失据”的地方，为人还是很不错的，话说得很是公允。

还有一次“洋相”，也出在我身上，好像出于爱护，支部劝我说：“徐光耀，你是丁玲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个更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话虽客气，刺是硬的，我敢说“不”吗？于是又嘱咐我，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看看。我道“好”。

这是个不小的难题：一、我手中没有丁陈的犯罪事实，在如此激剧的“发言比赛”中，怎么能争取得上“名次”呢？二、在给作协党组的复信中，已郑重“惭愧”过了，承认在1955年中宣部党员大会上的发言，是“不够认真的”。这一回难道自己拉屎自己吃，再去“不认真”么？

然而，不发言是绝对不行的。憋了将近一个通宵，把致作协党组的信中单单不利于丁玲的“事实”抄上一些，而把重点放在“批判”上，只当是臭骂自己，拣着解气的词句狠批一通，大约也就够了。稿子写成，第二天一进会场，就呈交给主席刘白羽。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的跟前，右手忽地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伸手抓住，到听清“你还在‘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向圆柱后面去了。

展开发言稿重读，才发现“错误”是出在最后一句上。话是冲着丁玲说的：“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当初倒也有点预感，写这“吁请”一词时，心中曾嘀咕是否太软了？可又一想，是希望她“回到党的怀抱”，不“吁请”，难道强迫不成？何况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学生，娃娃辈，谁在乎我用词的软硬呢！哪知这一含糊，不但稿子通不过，恐怕就此定了我的命运，也说不定的。

然而也有好处，自此再无人找我发言，也就免于重犯“不认真”的错误了。

我所经见的最后一件“花絮”，不太轻松，反而构成会上的一个大浪，也是给我的第二次“点名”。陈企霞未能“顽抗到底”，终被“突破”，作了“坦白交待”。他这个“坦白交待”，正像有些人说的，标志着“丁陈集团”的“全面崩溃”。他开口就说，他想死，他已经买好白酒和毒药，准备了遗书。因为他预计，在柳溪发言之后，他会被绑上台，由大家臭骂。然而，没有绑他，于是被感动，决心彻

底繳械。他所交待的“比柳溪所谈更可怕”的第一件事，是与一个女人姘居十年，二人合伙写过三封匿名信，向党中央告状。他当场交出一把钥匙，说就是他与那女人在“密室”的门上的。接下来，谈他受处分后怎么不服，怎么与丁玲密谋翻案……后来，又揭发冯雪峰，说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胡风看法一样；说苏联的日丹诺夫，是有学问的大教条主义，最难反……等等。他说得很激昂，很直率，听来十分“过瘾”，我也听得如傻如痴。

其中也有关于我的一段话，是这么讲的：徐光耀一向把我看成道貌岸然的老师。我要人向徐说：“你悄悄送给陈企霞三四百块钱，但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用徐光耀的钱不止一次，还曾托李兴华向徐要过钱，徐送来二百元。对这些事，同志们可以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确乎很赤裸，把自己剥得“精光”。

用了我的钱，还预先策划“不要让陈企霞知道是谁送的”，使我这缺心眼的人，乍一听，很感悲凉。而关于那两笔钱（有一笔是三百元，他说成二百，记错了），以陈企霞向来的高傲和自尊，能说出“同志们可用最恶劣的字眼加给我”这样的话来，就事实论，也就很清楚了。岂但如此，便是他的“坦白”，除了些私丑，又有多少事称得上是“反党”的呢？然而，整个会场已经沸沸扬扬，一些人掩不住自己的高兴，大敌攻破，一面准备上报，一面预备庆祝胜利了。

总之，在这王府大街的文联大楼里，“党组扩大会议”是富有“成果”的。我有幸目击了丁玲、陈企霞、艾青、冯雪峰诸人的被批斗，他们很快都成了大新闻的主角——登报了。可惜的是，以后怎么又网住了舒群、罗烽、白朗等一千人，因我已落入“大海”，取消了与会资格，就全不知情了。而十几次会议锻炼出来的这个“右派集团”，究竟有多大，恐怕是更难说清的。在方纪发言中点到的如李又然、胡考、聂绀弩、钟惦獠、唐达成，甚或梅朵、姚芳藻，以及后来的公木等等，算不算入了伙的？古立高曾在我们大耳胡同说过：在丁、陈、冯、艾之下，另有“八大金刚”、“十二门徒”之说。创作室在批斗我和黎白的时候，又说联大文学系有个“一百单八将”，还郑重命令黎白把这“一百单八将”的名单开列清楚，呈交上去。若按方纪说的“陈企霞有二百多学生”，那这数目还须加倍。此外，文研所已办两个班，属于丁玲“门下”，又有多少人呢？若再加上冯、艾等人的亲朋好友、从来过往诸人，就愈发数不清了。可见，“汪洋大海”之说毫不夸张，“人民战争”很有得打呢。

近日读到雷达一篇文章，说他前不久曾去一趟王府大街64号，在二楼大厅，忽听到“咕咚”的一声，不禁毛骨悚然。这是“文革”时，戏剧家田汉被“红卫兵”逼得无奈，在此处猛然跪地的声音，雷达以为，这是他平生所见的惨事之一。其实，这样的惨事还有很多，都不过是1957年“党组扩大会议”的顺延罢了。所不同的，是后来“运动”得

更为壮观、热闹和惨烈，因为已不止是“知识分子成堆”，又掺和上“红卫兵”和“造反派”了。所以雷达也说，这地方确有成为纪念馆的资格。

八、挨 斗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还是让我们回到创作室来。

文联大楼的斗争热浪，催得创作室亦连续升温。先是命令与丁陈有关的人赶快交待，“再被动就危险了”，我于是写了个文字材料，恭恭敬敬地交待了三件事：

一、去年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过一封有关丁玲的信。

二、经李兴华手，送给过陈企霞三百元钱。

三、到丁玲家去过四次：一次帮她买出国礼品；一次是丁玲宴请《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让我去陪吃；一次是丁玲宴请聂鲁达、爱伦堡两夫妇，又让我去陪吃；最后一次是与同学孟冰，找丁玲要求去朝鲜战场体验生活。

这个交待写在陈企霞的大“坦白”之前，由于一时的人情味发作，心一软，把给陈企霞的第二笔钱隐瞒了，于是铸成我的第四行大罪。隐瞒的原因，主要是怕把那位女同学扯出来：她三十左右了，一直未婚，一个人孤苦伶仃过日

子。

联大时她是我的学习小组长，很文静，也勤奋，十分爱惜“羽毛”。丁陈的案子如此火爆，一旦扯进去，必被穷追，那她的日子还怎么过呢？何况，不是说过钱算她借的，与陈企霞无关吗？就算隐瞒了，拿党性、良心一比，也说不上有多大过不去……

冷不防陈企霞在大会上自己揭出来了。而且说他们已姘居十年。我大惊之余，赶忙给支部写补充交待，但已来不及了，铁的事实证明我“对党不忠”，而我自己也很服罪，对党隐瞒，这当然是很不对的。

为什么每逢交待，我总把给作协党组的信列为头条呢？它本来在党的生活中很正常：党组织给党员写信调查事情，党员按要求提供回复。其中无诬陷，无造谣，不虚假，也不故意制造混乱，凡事实都有根据，日月地点场合齐全，极其便于查对，按理说，这么用心的写信，应该受表扬才是，怎么倒成了犯罪嫌疑呢？这不滑稽吗？若说这就叫反党，那么，党员再接到党组织来信，应该怎么办？难道不回答，不理睬，什么全不提供，一切都去你娘的呱呱哒哒，才能做到不反党吗？何年何月，有过这样的党章呢？

但又为什么交待呢？这主要是凭感觉，环境给的暗示。尽管作协党组是党，支部也是党，但你的信与丁玲有关，那就得“交待”！同时我也感到，仿佛有人正等着这封信，好早日见识一下它的内容。

“交待”了，也果然马上见效，不出三天，这信被复印三十份，在斗争公刘的会上分发，创作室成员人手一册。也给了我一册。复印技术在当时很先进，原件上被人划了黑线的地方，也都清晰可见。

尽管凶兆越来越多，我仍很自信，就让大家拿最挑剔的眼光，把这信好好儿看看吧。创作室那么多老党员、老干部，大多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过，有着多年的党性锻炼，我不信会凭着这个定罪，除非他们都疯了。然而，事实却证明，恰恰是我疯了！

就在斗公刘的会宣布“告一段落”那天，我被正式点名。主任虞棘说：“明天上午的会，徐光耀同志检查交待，希望做好准备。”尽管我已有预感，还是大吃一惊。虞棘看到了我的惊愕，解释说：“第一，你给作协党组的信，性质很严重；第二，你也有‘言论’，《文艺报》上发表了文章；第三，文联大楼会上，‘点’了你两次名……”

谢谢他，一下子使我明白了很多……

又一下子使我糊涂了很多……

这一夜，我几乎没有睡觉，明白和糊涂捉对儿厮杀，两个我：你杀死我，我杀死你……

可恨的“文革”，吓得我把当时的日记毁掉了，记不清这个日子了。这一日，真是我生命史上下地狱的一天啊！

第二天上午，我作了详细的“交待”，交待了与丁玲、陈企霞来往的全部历史，全部过程，全部内容。所谓“全

部”，其实不准，我所交待只是丁、陈“错误言行。”的全部。至于他们那么多革命的正确言论，那是绝对不能提及的。提了，就会招致“又搞翻案”，甚至“继续向党进攻”的训斥。这在樊斌和公刘的身上，已屡屡体现过了。

大凡一个人挨斗，总须经过这么一些阶段：坦白交待，批判揭发，深挖根源，“梳辫子”定案。而交待，揭发，批判，大都错综交叉，贯彻全程的，一般的规律是：凡初期的交待，总被批为“不坦白”，“不老实”，“避重就轻”，“继续隐瞒欺骗”。眼见的樊斌、公刘、丁玲，无不如此。我，当然也逃不掉。后来，从别处推广来了“经验”，在“坦白交待”之后，必须来一个“打态度”阶段。据说，有些被批斗的人，顽强抵抗，放肆狡辩，气焰嚣张，全无认罪之意。若不先把他们的“威风”煞下去，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因而，必须先“打态度”，待其老实低头之后，才能有所“交待”。而方法，则不外乎臭骂加温，拍桌打凳，大呼小叫，“狗血喷头”，必要使你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屁滚尿流，筋骨瘫痪而后已。斗公刘的时候，“背靠背”会议还只布置“加温”，到我这里，“打态度”经验恰恰传到，于是，什么丁陈的“走狗”，“马前卒”，“吹鼓手”，什么“忘本”，“叛党”，“资敌”，“卖身投靠”等等等等，都成了司空见惯，题中应有之词。“温度”之高，要人保持不发昏，那是万难的。

其实，我与丁、陈的交往，就那么几次，活人当时都

在，哪里需要下大功夫呢。1947年，我成了陈企霞系里的学生，除听课外，没有其他接触。开国那年，他给我的长篇《平原烈火》提过修改意见，并介绍发表和出版，是对我的最大“恩惠”。可《平原烈火》是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我也没吹捧过陈企霞，这都没法子“上纲”。此后，他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我们就没有再见面了。我的“错误”就是两次给钱，又全是别人主动、别人经手，陈企霞自己已证得很清楚了。至于丁玲，我交待中有个精确的统计；听她讲课、讲话（包括开学典礼、学期总结、“三八”节座谈、毕业曲礼等），共八次；通信两回；去过她家四次。就这些，全可找得出人证物证。凭这点接触，她就能把我培养成“反党分子”，岂非太神了吗？

细心的读者会问，“去过她家四次”，有无实在内容呢？问得好，本来这也是斗争会上的重点，且让我把“坦白交待”底稿上的有关部分，原文照抄如下：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她（即丁玲）打电话叫我和李纳（文研的女学员）到她家去玩，我们去了。原来是陪《桑干河上》的俄译者刘芭夫妇吃饭。这是第一次到丁玲家去。这次，她把我向冯雪峰介绍时说：‘他的《平原烈火》我觉得比《新儿女英雄传》写得好，《新儿女英雄传》没什么人物，是凭故事取胜……’又说我是陈企霞的学生。然后又向我说：‘你那篇《我怎样写 平原烈火》写得不好，

以后不论谁再叫你写这类文章，都不要写了。你怎么写的那本书，脑子里朦朦胧胧还不大懂呢。我本来想给你抽掉的，又怕打击你的情绪，还是发了’。当时，她是《文艺报》的主编。

“第二次到她家去，是五一年十月二日（还有十来个青年作家），是去陪爱伦堡夫妇和聂鲁达夫妇吃饭，坐约三小时。她把我向这二位大作家介绍时，曾说：‘这个青年出过一本小说，写得很有才能。’

“第三次到她家去，是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我和学员孟冰向她要求到朝鲜去体验生活。这次她跟我们谈了很多话，大致有：

“谈到了读书，从而谈到果戈理，普希金，巴尔扎克……等等，向我们推荐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也谈到了中国古典文学。

“谈到了生活。她说：她‘就是一个作家，气质也是作家的气质。’她说，‘我就近不得生活，一接近生活便有创作冲动。’她说，她想写的东西太多了。目前最吸引她的有这几个方面：第一，想到新疆王震的部队去看看生产和打小仗（剿匪）；第二，想到东北的大森森中去看看伐木；第三，或者到湖南故乡，看看伐木者们的‘顺流而下’；第四，去黄河，看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她说，‘我喜欢有色彩的地方，喜欢一般人不大注意或不爱去的地方，我是不跟人赶浪头的……’

“还谈到《桑干河上》的写作情形，她说，这书是她的一种试验，试验怎样用许多小事把人物刻画出来，尽量避免单纯的叙述。

“第四次到丁玲家去是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丁玲和曹禺将去莫斯科参加果戈理逝世百周年纪念。因我曾在去苏联前帮代表团采办过出国礼品，说我有经验，也帮她买些出国礼品。这一天，除上街两次买东西外，还管了些记记账，打电话，催商号送货等事。丁玲跟我说过这样一些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此段话在复给作协党组的信中已引用过，见前，不再重复——笔者）……’

“她还拿出几本装订得很考究的果戈理的书，对我说：‘一个人写出书来，值得这样装订就好了。’

“她问过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没有在北京的，对继母叫不叫‘妈’，杀过人没有，过去有没很大的烦恼，等等，但我不明白她问这些的目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九日，丁玲去找马烽，在（文研所）院子里碰到我。因我马上就要回部队了，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最后说：‘你应该想法搞创作，不要搞编辑，蹲办公室不好。心里要经常有打算，有个写长东西的打算，不要乱抓；乱抓在没事可干的时候来一下，磨一磨笔，不能总是乱抓。

“又，一九五四年（忘记了月日），不记得在一个什么

公共场合碰上了丁玲。我当时是从农村回京办事。她见面问我去看陈企霞了没有（正是《文艺报》犯错误，陈企霞挨批评，反胡风斗争刚进入批判思想阶段的时候），我说没有。她说：“你去看看他吧。他现在情绪很不好，就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他这个人是没有朋友的，难得有人去看他。你是他的学生，他见了你会感到安慰。你去劝他写写文章，批批胡风。文章写好了，发表了，他的精神情绪，都会好些，就不会光集中在受批评的事上了。而且文章一发表，人家也就不会以为他是被打倒了。”隔了两天，我去看了陈企霞，并把这段话的意思向他说了。当一说到“人家就不会以为你是被打倒了”时，陈企霞跳了起来，连问：“谁说我是被打倒啦？谁说我是被打倒了？”我没有说是丁玲说的，只说是怕人误会成这样。”

大家看，这儿所录的话，从用词、语气、风格，到情感表达方式，都绝对是丁玲的。那时的“反右”运动，正“遍地开花”，所有与丁、陈有关的人，都在忙于“坦白”，各单位互通信息，互转“材料”，共同“破案”，“气温”一升再升，“牙膏”挤了再挤，哪容你有半字虚假。我这人向来“无事不可对党言”，从第一次交待，到最后定案，基本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参与斗我的十几、二十人，至今大多健在，他们没有一个指出过，说我第一次的“坦白”，后来又作过修改。惟一的一次“补充”，就是给陈的第二笔钱，我

连忙申请了处分，当时还有人疑我故意小题大做，是想掩盖重大阴谋呢。那时我可真的怨恨起丁玲来了：你暗地里搞了那么多反党勾当，就一句知心话也不跟我说。如果说了一句，我今天也好坦白呀！

无可“坦白”，就把上面所录丁玲的言行拿来抵偿。凡能上“纲”的，都被录进去。所以，这些就都成了“宣扬一本书主义”，“鼓励骄傲”，“宗派小集团活动”，“向党猖狂进攻”等等罪行的佐证。至于丁玲说过的更多的话，那是不能、也不敢录进去的。可悲的是，这些“坏话”被保留下来，而好话却永远消弭在大气里了。

九、也让丁玲亮个相

在这篇长文中，我一直没给丁玲一句申辩的机会。从开头到眼下，她一直是个罪犯形象。这是有失偏颇的。现在借个机缘，请她自己来点“独白”。不只为公正，也调剂一下氛围。

在我挨斗不久，支部又下过一道命令：凡与丁、陈及相关人员的通信，要尽数上交，不得隐匿或销毁。这是把“反胡风”的经验移植过来了。胡风只“三批材料”（主要是通信），就打出一大群“反革命”来，效果非常显著，创

作室跟我要信，自是理由充足。于是连忙检点丁、陈及联大同学们的来信，即行清理上交。

上交之前，禁不住要把它们看一看，也是加小心的意思。其中属于丁玲的有两封，不看则已，一看，不觉悲从中来，翻来覆去硬是难以割舍。幸已夜深人静，大家都休息了，便冒了加倍遭怨的危险，把稿纸铺于灯下，一字套一字地把它们偷抄了下来。为了保真，我甚至仿临了丁玲的签名。所谓“叛逆精神”，我身上向来稀有，这一回，要算是最大的例外了。

私人通信，不为宣传，最能见人肺肝，我们无妨用吹毛求疵的方法，潜心静意，仔细看看这个“大右派”是怎么说话的。前一封，写于1952年8月4日，我正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因碰到一些困难，写信向她诉说。不久，就在火线的山洞子里，收到了这封信（为保存原貌起见，行文有误之处，亦一仍其旧。下同）：

光耀同志：

今天读了你的信，忍不住要同你谈谈。

你走后，我才读到你的文艺整风思想检查的发言。从那个发言中，我才知道在你的思想中存在着颇大的问题，就是你关心你的写作问题比关心政治生活（即生活的政治意义）多。因此你心中是空空洞洞的，并没有使你非写不可的东西，所以你就怎么也写不出，写不好，而且觉得无什么可

写。看到发言后觉得你去朝鲜是对的，但觉得没有好好同你谈谈，很可惜。我就怕你去朝鲜也收获不了什么。许多人去了也是这样的。不过现在同你谈也不迟。当然会因为是写信的关系就谈的简单些。

第一，我劝你忘记你是一个作家。你曾写过一本不坏的书，你是一个文艺工作者，你忘记了，你就轻松得多。因为这就会使你觉得与人不同。这意思不是指骄傲，而是指负担太重。因为你发表过一本书，你就有读者，你的读者和朋友就要求你跟着写第二本更好的书。自然，他们的意思是不坏的，可是你却苦了，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你焦急也没有用。我可以告诉你，读者又在慢慢忘记你，朋友的心也在冷了，这并不可怕，这就是说你可以不着急了，你可以慢慢来，你也可以把的你读者朋友忘掉，把那些好心思忘记掉，你专心去生活吧。当你在冀中的时候，你一点也没有想到要写小说，但当你写小说的时候，你的人物全出来了。那就是因为在那一段生活中你对生活是老实的。你与生活是一致的，你是在生活里边，在斗争里边，你不是观察生活，你不是旁观者，斗争的生活使你需要发表意见，所以你现在完全可以忘记你去生活是为了写作的，是为了你的读者朋友等等的想法。

第二，你不要着急任务。我们并没有加给你什么任务，你的任务是去生活，去好好改造自己，学习生活，学习做人，学习做一个好党员，一个有知识，有学问，有见解的好

党员，一个有修养的党的文艺工作者。你曾经写过一本很好的书，这是非常可喜的事，但离一个作家，一个成熟作家还很差，现在还是首先从做人做党员着手，写是第二。你不要忘记，暂时写不出不要紧，怕的是永远写不好。

第三，暂时可以不回。中国文学史这一季，你已经没有学了；没有学就留在以后学。下一季是苏联文学，你如在朝鲜无法生活下去，就回来学，如有法生活下去，就暂时不回来，苏联文学也留在以后学。不过，如果的确生活不能深入下去，我以为就要回，免得在那里虚度光阴，以后再下去也是一样。生活中的方式、运动、变化是很多的，但也不是非死捏着不放，死捏着也不一定就懂得了。你可以按情况机动，也要有决断，不要从小处顾虑。

多理解人吧，不是为写作和人做朋友，是尊敬人、帮助人，是向党负责的去爱人、帮助人。努力克服思想中的个人意识。应该有热情，有雄心（做一个最好党员的雄心），能艰苦，能坚持。我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愿你从细小的地方做起。你可以和那边的部队的负责同志去商量，要设法取得他们对你有切实的帮助。

祝你坚强努力！

丁玲 8月4日

第二封信写于1953年春。当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学员正在结业，同学们即将各奔西东。丁玲当时在大连休

养，写信回来向大家征求意见，希望就怎样才能把文研所办好，直言不讳地把意见提给她。我当时正面临工作去向的选择，对所里也有一些意见，顺势趁风，给她写了一封信。于是，便获得了这封回复：

光耀同志：

先祝贺你的结婚之喜。

你提的几点关于“所”的意见很对。我始终觉得我们搞了两年多，还没有造成一种蓬勃的、热情的、对生活、对艺术有无限倾心的气氛。因此也就是有斗争、有批评、又能爱人、又有很大愉快的情绪。一个搞文学事业的人，首先应该要求这个人活的，而又是活得充实而又高尚的。苏联的作品很在这方面用功夫，马特洛索夫就是写这个英雄是怎样成为英雄的：是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有那么多好人来养成了马特洛索夫有一颗高尚的心，他在那里都是最好的，他在战场上去牺牲个人就来得一点也不突然。我们文学研究所始终还不能成为一个熔炉，现在情况是：大家都很好，相安无事最好，对个别调皮的人就束手无策了。为什么呢？我们整个的社会，“所”的社会气氛不够，一两个人去谈话批评是不行的，这些人不是怕谈话怕批评的人！只有把大部分团结好了，大部分人都活得严肃、认真、有意义，那么，少数人就同化了。为什么没有做到呢？因为有许多原因，我们缺乏完全献身于“所”的创造的人太少了！我个

人就受到很大的限制！我还不是指现在的几个负责人而说，这是包括了全所的人，特别是学员而说的。但我是相信可以搞好的，天下事都是这样，只要有人就行，有共产党员就行。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这些经验我们要接受的。

其次是关于你的去留问题，我个人对你有这种看法：你有些好处，就是有些条件，可是也有些缺点，缺点是经历太少，文学底子不够。按我的看法，你最好留在“所”内，我已把这意见告诉田间、马烽他们。原因我觉得再打几年底子，生活底子，知识底子，再回部队去。可是，可能他们要求你回去。我以为你是否可以提出来，因为你去年没有学习，最好留下来补学（我也把这个意见说了的），田间他们再把你的意见转到部队去，再学一期后回去。田间他们有你的意见也许好同部队商量些。但如果不能的话，我建议你回冀中部队去工作。不做文艺工作，不属文化部。你可以写两部作品，为这两部作品作准备，第一部，写冀中的抗日历史小说，收集这方面的材料，像肖洛霍夫写静静的顿河一样。如果你有这个计划，将来文研所还可以支持你、帮助你的。第二部，写回家的军人在地方工作上，在农村里，在工业的开展上，如何起作用。战争不是永远的，建设才是我们的目的。像《幸福》、《金星英雄》、《收获》、《库页岛的早晨》，都是写退伍军人如何从事建设工作。你回到冀中可以找到这种材料的。你看怎样？你到朝鲜只一年，看的方面少，给自己一些印象，一些启发，准备在你将来的作品中用的，写点

短的散文是可以的，想从一些零碎的感受中写出著作来，有血有肉的人物来，那是不够的。你也不必为写不出着急。

总之，要努力！要夜以继日，贪心的去爱生活，爱人，爱文学，从各方面加强自己，提高自己的修养。做一个诚实的人，像马特洛索夫式的青年！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如有需要我的时候，我会乐意的帮助你！

四月初我不能回来了！

敬礼！

丁玲 3. 19

这就是丁玲！这就是罪该万死的“反党右派”丁玲！据揭发，写这二信的时间，正是丁玲闹“反党”最活跃、最疯狂的时期。可我们许多自称响当当的铁杆“左派”们，写得出这样对党有深情的信来么？尤为费解的是，把信没收了去，为什么搁置不用？为什么不汇报，不交流，不转达？当事人心中明白：方针已定，就是要把人打倒。凡不能打倒，不利于打倒的，概予不闻不问，不查不证，不理不睬，为什么？就为“按既定方针办”啊！“人民战争”就是这样的打法，欺谁乎？欺天乎？

最令人不解的是：在我“改正”之后，这两封信的原件仍不发还，我屡次申请、讨要，就是不给。答复是：“已入文书档案，取出不便”云云。这使我愈发糊涂，“改正”时给我说过，有关定罪材料已经由组织上销毁了，怎么又出

个“文书档案”呢？它是干什么的？没有解释。既是档案，取出应该很便，怎么倒“不便”了呢？还有，丁玲的信放在那里，究竟要它起何种作用？倘有人要查对研究点什么——包括她或我的什么“不轨”之类，还许把它拿出来见见天日吗？

十、“花絮”（二）

尽管我性子严谨拘束，挨斗日子一长，也就发“皮”，若把那些发言都记在心上，不仅太累、太烦，亦非做人之道。但要都略过去，又嫌粗率。还是让我们去粗取精，把些能起消闲醒脾、“以点带面”之用的花絮，记一些在下面。

头一个想到的是白桦。他当时风华正茂，倜傥风流，因出差没在创作室“鸣放”，自觉无“辫子”可揪；也由于“打态度”的经验尚未到达，他的发言颇富超脱而轻松的兴趣。他说了个故事，说在云南有个傍河而居的少数民族，家家靠水为生，人人水性出众，能在风波激流中日夜出没。怎么练就的这份水性呢？是孩子一生下来，当娘的就把他（或她）绑在木板上，放在河里，任其游荡漂流。日日年年，高强水性自然练成：以至长大以后，人问他（或她）的母亲是谁，他就说“是木板”。借此，白桦转向我说：你

自小参军，党把你培养成作家，如今你却把木板当成了亲娘！

这故事，他说得动听而有文采，我虽并不认为自己是把木板当成了亲娘，故事的美丽，却使我至今不忘。

另一位是张桂，上校，年纪较大，品性憨厚，有大好人之称。他在会上发言不多，斗樊斌和公刘的时候，都记不得他说过什么。这一次，不知是否要求“加温”之故，他一开口就很激动，整张脸都红通通的：“你，徐光耀！一个穷人的孩子，十三岁当小鬼，在党培养下，你，你怎么，就，就——”，“哇”的一声，突然大哭起来，眼泪鼻涕齐出，抽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这使我极为震惊。这么一个大老实人，竟气成这样，我可真真罪孽深重啊！当时，我很想像个老鼠一样钻到地下去。主持人见他久久说不出话，便劝他冷静冷静，由别人先说。然而，直到会终，他也没有再发言。此后的多年，也一直未再见他。我总在想，成年人的眼泪可不是很现成的，他哭得那么恸，必有个道理吧？在他深心中，到底有什么块垒梗着呢？

再一位就要说到寒风。他是老二野，参战甚多，爱开玩笑，有点顽皮，也有点猛愣，是条生于易水的汉子。他的短篇《尹青春》，写长途行军中的艰苦，警句联珠，堪称一绝，很令我折服。可有一次他把我骂得很苦。那是斗我的后期，斗了一整天，临散会，虞棘忽给我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明天上午，要交出一份完整的文字检查材料，就是

说，把犯“错误”的全过程、所有事实、关系、思想根源和认识，完全写清上缴。我以前已交过几次这种材料，字数都在一万五至两万之间，现在时间只剩一夜，如何写得出，这分明是有意刁难和施压。我于是央求说：自被审查以来，一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连日开会反省，体力消耗太大，要一夜写这么长的材料，我就是不睡觉，也做不到的。希望多宽限一两天。谁知话刚说完，寒风便往起一站说：“你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体力消耗太大，谁叫你犯错误，谁叫你反党，活该！”

尽管斗“皮”了，这“活该”二字，还是“滋”地钻入鼻孔，狠酸了一下。战场上抓住了国民党汉奸，也不曾用这种字眼对待他们。如今的我，真就糟到这种程度了吗？日后有许久，脑子里总被这两个字缠着。缠来缠去，竟想起一个传说，据传在疯人院里，所有疯子都绝不承认是疯子。若有谁被指为疯子，其他疯子就会扑上去一齐把他痛打，打得越凶，越证明自己不是疯子。寒风许久抓不到发言题目了，“同情右派”的帽子或许已悬在头上。他正心急火燎，来了机会，此时不发，还待何时？本质上也还是吓坏了啊。

为无言可发而发愁的，还有许多人，如胡可、杜烽，我们一块从华北军区调来，住同院，食同桌，上下班一起走，说不了解情况，当然推不过。但细听其发言，也真为他们痛苦，那真是嚅嚅唔啞，字斟句酌，又想词锋峻利，又要气势凶狠，又须不背良心，又须批判深透，“架势”之难拿，无

以形容，只能说是令人哭笑不得了。

在这方面处理得较为“妥善”的，大约数黄宗江。他来自华东，正追求入党，他也追求阮若珊。他平日本来爱说话，一向滔滔不绝。在斗我的时候，却是个“结巴”了。他发言的特色，往往是从自我挖苦开始，把自己批判够了，再转向目标。印象最深的是后来批斗沈默君。他先相当赤裸地批自己一通，然后才转口说：“我不怎么样，我坏，你比我还坏！我小资产阶级思想，我自私自利，你呢，你还不配，这样的帽子给你戴，还是太小了……”这是黄宗江的聪明，即使在斗别人的时候，他的“疯子意识”也是清醒着的。

还有一位也许更加清醒，但他大智若愚，不大为人注意。这便是画家黄胄。他那时在创作室美术组，军衔最低——少尉。每当开会，他都拣最不碍手脚的角落坐着，眼本来有些“眯”，胖胖的在那儿一闷，一副与世无争、自甘卑微的样子。但他知道，反右派，不发言是不得了的。于是在逢有较大空隙的时候，用他十足的蠡县口音批判我说：“凭你徐光耀，打小当八路，受党的教育不能算短，党把你拉拔这么大，也不容易。可你往丁玲那儿跑个什么劲儿呢？要说不恨你，你反开党了；要说恨你吧，心里又丝丝拉拉的……”这个发言，在当时看，大不成体统，明显是“心慈手软”，“右倾情绪”。但他军阶低，参军未久，似也“笨嘴拙腮”，大家便不予深究，包涵过去了。他很透亮的心，似

也乐于利用这一“误差”。

然而，真正使我认识了黄胄的，还在几天之后。那是又被长枪短剑狠斗了三小时，散下会来，正耳鸣眼晕地独自往家走，不提防黄胄从背后拉住了我，拍拍肩膀说：“光耀，上琉璃厂转转去呀？”

这太出我意外了，鄙人正烈火烧身，“过关”之不暇，去那种雅人消闲的地方，不是开玩笑吗，别人看见，岂不更增加了我的罪恶？便说“不去。”但他拉住我不放：“嗨，你一个人回家有什么事儿？走走，跟我看看去，懂点美术，对你写作也有好处。”我仍是辗转挣扎，连说：“不去。”他却硬不松手，一劲儿再劝再说。我这才明白，哪是什么“看画儿”，分明是见我淹进脏水沟，日渐沉溺，要拉我上岸罢了。他这样做，是要冒“同情反党分子”的大风险的。不由得心上一翻，也燃起“丝丝拉拉”的火热，便任他拉进了琉璃厂。

那时的琉璃厂，除了荣宝斋，还有多家公私合营画店，四壁所悬，尽是名家，尚有不少明清佳作。但我于画一窍不通，看不出门道。黄胄便指指点点，给我解说，还一力撺掇我：“买一张，买一张！搁着稿费又不下崽儿，画是陶冶性情的……”我很理解，这“陶冶性情”四字，正是他拉我来此的隐隐深心啊。

也算是盛情难却吧，我终于买了一幅齐白石的《群虾》，当夹着画轴回到家时，心中确已有了云开雨霁的幻

觉。再看那水藻丛中，一群小生命活泼泼的自在游动，心神也就暂时飞离了风暴中心……

日后，在“生活像泥河一样流”的悠长岁月中，赏画，竟成了我的“业余兴趣”，也是让我活下来的未可小瞧的支柱。革命20年，我按照党的教导，一贯只讲公心和忠心，不肯讲私情。这一回，却是黄胄的“私情”，使我懂得了：绘画，原来还有济世救人的一项功能，可使人脱离苦海。黄胄与我同庚，都生在1925年，他竟先我归西，这又是老天的不公了。

最后，要点到黎白。他是我的联大同学，生于中国最显赫的知识分子家庭，参加过地下斗争。他眼界开阔，年轻气盛，有识有胆，勇于任事。可也爱“多事”，敢在斗争会上跟“左派”拍桌子。曾坚持说，沈默君其人，宁可叫“坏分子”，也不应定成“右派”。1956年底，他忽发奇想，要参加有关王林《腹地》的那场“战争”，为文反驳侯金镜在《文艺报》上对陈企霞的批评。文章相当长，警句有：“金镜同志拿着企图刺穿教条主义的长矛，却没有找准真正的对手。”我和另一同学李兴华都看过，并表示基本同意。然而，文章未及出笼，“反右派”来了，创作室赶忙把文章抓住，将我和李兴华的短简附在后面，复印成册，发给大家。在斗黎白时，就有了这么个说法：黎白我们三个，互相勾结，自动发难，形成配合陈企霞向党进攻的一翼。其实，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无论是态度的认真，作品分析的仔细，学

术探讨的严谨，都很值得某些十分“潇洒”，专为卖钱，或“过把瘾”的“评论家们”仿效的。可是，斗到最后，给黎白弄了个“留察两年”，之所以没有戴“帽”，或许是沾了敢拍桌子的光。可见“天道”也有出格的时候，难于一概而论的。

现在让我们扳正面孔，再回到战场中心来。

十一、定 命

忝列为“重点”的我，从8月斗到10月，仍未结束。当然，在我之后，还“花插”着斗了黎白，沈默君，白桦，吴占一等人。美术组因为发现了艾灸、何孔德等人也在反党，分出去单独斗去了。艾灸当时我不熟，后来在农场一块“改造”，接触渐多，才知道他的冤案“纯粹”得奇怪。但是，竟无人敢一伸手指为他“翻案”。致使这位文天祥的嫡传子孙，在左权将军牺牲的战争中纵身跳崖的壮士，也跟着我们苦海翻腾22年。为此，我曾写过一篇纪实文学《跳崖壮士》，发表在《人民文学》，此处就不再交待了。

一次次“坦白交待”，一次次“深挖狠批”，所得结果，总是“不坦白”，“不老实”，“继续对抗”，“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党彻底投降”……祖宗三代，亲戚朋友，社

会关系，历史表现（当然专找坏的），都翻得底儿朝天了，还不行，怎么办呢？真是心急如焚啊。有一天，实感无路可走，便鼓鼓勇气，找到胡可，请求给我个好好的帮助，指示我“怎样才能把自己挖深挖透”？谁知胡可把手一摔，悄悄着急说：“我帮你？我还有八条！”

这不但使我大感意外，也大感诧异，忙问：“你？你怎么会有八条？”

胡可伸着指头，一项项数给我听。果然，若真把这八条一亮，按当时“标准”，胡可也真就没逃儿了。譬如，八条之一，“鸣放”时，有人说，《解放军文艺》没有什么人爱看，不如交给地方去办。胡可曾表示，这意见并非不可以考虑；之二，虞棘下过“死命令”之后，胡可也写了“鸣放”文章，投给《解放军文艺》。但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一出，他同魏巍一起把稿撤回了。但创作室仍将该二稿的校样翻印，创作室每人发一份，其中当然有“反党言论”；之三，“鸣放”时有人提到，什么地方有人正议论“同仁刊物”，我们是否也探讨探讨。胡可也说，这倒不失为一条思路；之四，又是在“鸣放”会上，胡可曾说，何直（即秦兆阳）的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认真下过功夫的，这样的文章不多见。不几天，秦兆阳在报上“点名”了，同意他，自然是呼应“右派”，大罪一桩……可惜事隔40多年，“八条”仅记得这么多了。但就是这么多，不告便罢，若有人一“捅”，则反对党办军队报刊，主张“同仁刊

物”，攻击党的文艺政策，与地方“右派”内外呼应等等罪名一加，也就难逃“法网”。

胡可正然心神不定，自身难保，我还怎能死死缠他，只得快快而回。回屋细想，胡可的天性不能与艾青相比，艾青洒脱灵通，可以满不在乎；胡可却是精谨慎细的，有这八条压着，必然日日夜夜翻肠绞肚，陷入巨大煎熬之中。如此下去，他会熬个什么结果出来呢？这种感染来的担忧，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忽想到一个传说，不禁另有所悟。据说，某些领导人有一套带干部的“绝活”，方法是：先把干部当根大葱叶子狠命揉搓，直到揉去所有筋骨，变成“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滩”，柔若鼻涕，然后再往葱管里吹口气，使他满精神的“支棱”起来，那么，这个干部就很好使唤了。在挨斗初期，我也曾想到过这一“绝活”，但在饱尝被“围歼”的滋味之后，才又有了新的觉悟。我固然被揉搓得差不多了，可揉搓我的人们，又何尝不也在“被揉搓”；我自自然然没了筋骨，而别人的筋骨，还在正常的保持着吗？所以，整人必须用“运动”的法子，“运动”来，“运动”去，那相关效应就自然翻番，真正是“让全国人民都受到教育”！也许你日后仍能“满精神的支棱着”，可脊椎骨呢？还在原处直着吗？

在斗争会上始终严肃认真，很是敬业的，印象中有个陈亚丁。他是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大校，分工在创作室“蹲点”，绝大部分会都参加的。他讲起话来也很严肃，但因身

份关系，轻易不开口。开口也只出题目让你答，他不作结论。如：你的问题是不是很严重？为什么很严重？是否把背后的活动都揭露出来了？还有哪些不敢见阳光的？与党的关系怎样？只某些问题有矛盾，还是经常有矛盾？文艺上你要求绝对自由，不要党干涉，那要谁干涉？……等等。明眼人一看就懂，这些问题都有答案的，所以还提，若不是猫对耗子的“逗弄”，就是心存“城府”，以防言多有失、失足落水了。此人曾列名“四人文章”事件，刚挨过批，可能还心有余悸。但后来在“文革”中不知怎么“很来劲”，在军队中附和“放火烧荒”，颇走红了一阵子，却又不明不暗的隐没，至今不见踪影。

陈亚丁提的问题虽叫人难受，毕竟还有回旋余地。相形之下，魏巍便要直截而正面得多了。魏巍那时是我们创作室副主任。发表《谁是最可爱的人》已三四年，在室里声名显赫，很为大家敬重。在文联大楼会议上，曾代表17位部队作家“讨伐”丁、陈。他在多次发言中，有两次给我震动最大：一是批判我的《海阔凭鱼跃》。我原文中有一句话，任何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可以用他认为最好的任何创作方法去进行创作。魏巍在发言时针对这一句说：“你把党像破鞋子一样扔掉了。”我听了真吓了一跳，心想，如果中宣部长陆定一在座，也会发毛吧？因为我这句话，原本抄自陆定一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是为了强调一下，加一括弧并其中六字而已。我以为，共产党员是不应排除在

“任何人”之外的。所以，比较起来，《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的二位作者，就慎重多了，她们批前批后，批左批右，扣我“绝对自由化”的“帽子”，就是不把这句话拉出来示众。

魏巍批我的另一件，是说我在杨成武兵团时，提倡“鸡抡太主义”，并解释说：“这是一种极为反动，极为腐朽，极为可耻的主义！”这简直是掀天揭地之文，我当时就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罪该万死了！不得不进行垂死挣扎式的剖白。大约终是靠了真实，侥幸没有再被追究。

到了1957年11月2日，当是“梳辫子”阶段了，魏巍又有一次发言，分量甚重，系统性、权威性、结论性十分明显，是经过充分研究、准备的。原话较长，只能提纲撮要，录其大概，以见一斑。

他开头就说，要彻底弄清你的两个问题：一、“是不是反党？吞吞吐吐的承认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二、“与丁、陈反党集团的关系，是不是偶然的？”他逐条分析，说我在“检查”中只一味侧重与丁、陈的关系，虽然重要，但很不全面，应该联系历史上的问题全面检查。丁、陈问题“只是你的问题的总爆发”。又说，“畏惧”反党帽子是没有用的，结论不会按你的愿望去作，越不觉悟，越需要搞透。不搞透，便会觉得冤枉。冤枉，会成为一个消极因素存在你脑子里，这不利于改造。丁、陈集团如果在55年搞透，他们就不会又在今年犯错误了。又说，你至今还想保持自尊心。

吴祖光的小家庭内部是没有自尊心的，你的自尊心，只说明你和党还有很大距离，反骨还没有彻底击碎。

下面，进入“反党是否偶然”的正题。

在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上你当然是反党的：“四大件”（即给作协党组的信，《海阔凭鱼跃》，给陈企霞七百元，把第二笔钱隐瞒——徐注）只是表现形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的实质是你内心的情感，从情感上早已是丁陈的走卒了。反党不反党，有一个明显的比较，比较一下党和丁、陈之间，你是站在哪一边的，心中有党还是无党，是丁、陈近还是党近？事情就很清楚了。比如给陈企霞送钱，为什么不征求一下同志们的意见？支部问你，还隐瞒一笔，这还不是心中无党？给党组的辩正书最严重，你真有党的观念，为什么不反复思考？为什么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这不是张狂的向党进攻吗？！

你心中无党，是否有丁、陈呢？给丁玲的母亲送花圈（我没有给丁玲的母亲送过花圈，此话不知从何而来——徐注），那情感之深，观念之深，不得了！你把对丁、陈的忠心来对党，可就要打80分了。可惜，你心目中的丁、陈就是党，是你具体的党，你的上帝，你希望的寄托。卖身投靠是最可耻的！所以，你做个党员就很成问题了。

联系当时的背景，今天重温这个发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它都是严肃认真的，深刻的，严正的，也是最革命的。就内容，就逻辑，就其哲学高度和整体意义看，都折射着那

个具体时代的特有风貌，很值得后世子孙受用和借鉴。若视为“胡乱骂人”，那就太轻率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这句话，措词相当谨慎，透着欲说服旁人的商量语气。但含意明确，就是要开除我的党籍。我的命运，大概此时已然注定了。

概括我全部罪行的“四大件”，赫然居其首的仍是给作协党组的那封信（魏巍称之为“辨正书”，大约是跟丁玲向中央告状时附的“辩正材料”归到一堆去）。为这信，我曾屡屡奇怪，斗了几个月，发言如此之火，却没有一个人拿它进行条分缕析地批判，但凡提起，只当成“张狂向党进攻”的证据，一句带过，从不说它错在哪儿了。连魏巍也只说“不反复思考”，“没有充分把握的东西就否定”，更无其他。相比之下，倒是《海阔凭鱼跃》屡遭鞭挞，颠来倒去从中找我的立场、观点、世界观。最后在报刊“点名”了，它仍是惟一的靶子，其余“三大件”，竟不涉及。老实说，我私心对此很觉不公，为什么不把我的全部罪状都拿出来？把它们统统“亮在阳光下”有什么不好？干什么把本来的“四件”藏起“三件”？特别令人费解的是：定我“右派”的主要罪名，是“给丁玲翻案”，而拿到社会上批判搞臭时（报刊点名），又说我是“修正主义思想”——当然，这只是一时的闪念，从8月斗到11月，连我练就的“皮”也已瘫软，哪还能想个究竟啊。

事情终于到了“头”，在我又交出一大本子“自我检查

与交待”之后，会上宣布：从即日起徐光耀还要继续检查，继续反省，想起新的问题，随时向党交待。无事不要出门，需出门时要向党小组长请假。阿弥陀佛！这就是说，我已被“斗熟”，“挂起来”了。

回到家里，一头栽在枕上，只感到一阵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疲乏，浑身上下，像是一滩烂泥。我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是如此的脆弱！

十二、意外的“苦果”

“挂起来”的滋味，原先想，总比挨斗轻松一点吧。开头两天，倒还可以这么说，但时间一长，那份入骨钻心的煎熬，是常人绝难领略的。我32岁，正血气方刚，参军入党，都已20年。20年中，无一日一时是没有任务可干的。哪怕站在生死交接线上，都在为肩上的任务而追求；精神和思想，就在这追求中保持平衡和奋进，从不知什么叫做“失落感”。这次可不同了。所谓“继续检查”，只是把你“闲”起来的托词。“扫穴犁庭”几个月，底儿早朝天了，哪还有什么“检查”要“继续”？不给任务，不准出门，无会可开，无话可谈，不能交往，更不能去娱乐场所，就这么“闲”啊，“闲”啊，“闲”你个百无聊赖。

为免涉嫌其他，最好的法子就是读书。于是读啊读，读过今天是明天，读过旧年是新年，到1958年新春了，妻子大学毕业，被分去河北保定。大女儿由她带走，交岳母去抚养。二女儿不满周岁，由保姆王阿姨代管，这个小孽障很“闹”，虽也能造出些乐趣，却无论如何不能替我分心。书，读了一大堆，字，数了万亿行，却把脾气读得越来越躁，越来越坏。屋里的东西全成了“仇敌”看见椅子也想踹它一脚。忽听说，一起挨斗的人已有“处理”了的，便去问党小组长胡可，我怎么样了？胡可特别沉得住气，说，别着急，安心学习吧，有了准信儿，一定告诉你。

受心里一串又一串疙瘩的缠磨，脑子里的“战斗”越来越激烈：我反党？可真要把党反倒了。我往哪儿去呢？蒋介石回来了，不就是专拣我这号儿的杀吗？……丁玲本事大，把党反倒了，她能当主席？她能指挥全国？……渐渐的，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一度小有恢复的体力，又加速度的消损下去。再也憋不住了，又去问胡可，可胡可仍是那两句话。我想到了抗战初期的锄奸科，那时对付狡猾的犯人，曾用过“熬鹰”的法子：让犯人坐在一根棍子上，也管吃，也管喝，就是不让睡觉。48小时过去，犯人会从棍子上掉下来。当重往棍子上架他的时候，他在你手上就睡着了，那情景，历历在目。现在，要把我熬到几时呢？在焦躁到顶点时，曾小声对自己喊：“枪毙我算了，省得慢慢熬死！”后来《小兵张嘎》上有句台词：“在这儿，都快把我

憋炸了！”来源就在此时。

终于熬出两件很可怕的事。一是，当我把 12 大本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全部读完，想回忆一下书的内容，总结几条收获的时候，发生了大怪事：12 大本，几十出戏，我竟一个字也忆不出！连人们常说的莎翁最高成就“四大悲剧”，也是一片茫然。这一骇真是非同小可！我的脑子呢？脑子哪儿去了？我到底怎么了？

正自焦虑狐疑，叉手在门后望着院子发痴的时候，我的小女儿蹒跚着走来了。她刚学会走路，想是要来找我玩玩儿的。但我隔着玻璃却恨恨地想：我正不知死活，你还来添乱！岂不真是个催命鬼吗？正当她伸手抓门，就听我一声大吼：“滚！”她抬头见我那张狰狞的脸，唬得回身就逃。她，两只小手扬着，跌跌撞撞，失魂落魄，最后扑在对面的台阶上……

我盯着这一切，忽地热泪盈眶。我想，我必是疯了，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来呢？

“疯了”？使我又一骇。我跌回椅了，第一个念头就是：如果疯了，就不如死掉，死掉，妻子儿女彻底解放，可自去谋生；而疯了，就会粘连牵累她们一辈子，即失去劳动能力，又要给家人、朋友、街坊，甚至派出所，增加没完没了的麻烦和负担。受人民白白供养，却到处惹是生非，那实在太可怕了！

昏茫茫，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

忽又想，能不能找个解脱呢？死，简单得很，方法有的是，真心寻死，没有人能阻止得住。剩下的问题是能否治疯？绝不能去疯人院，那等于已经死了。还有别的法子吗？突然，我想到了前年读过的译自苏联的《普通心理学》，上面曾提到，人在经历巨大打击和挫折的时候，神经不能承受超负荷的压力，有可能发生精神分裂症。在这关键时刻，人要控制自己，不然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当时读到这里，觉得好玩儿，就特别留心了一下控制的法子，于是记住了八个字：“集中精力，转移方向”。

就是这个“八字方法”，使我看到了曙光：如果心里老为“把党反倒，我往哪儿去”打仗，就会越陷越深，无法拔救。只有把全部思虑投放到一个新的焦点上，才能从火坑里逃离出来。可这个新焦点在哪儿呢？读书？已证明全无用处，看戏看电影如何？以待罪之身去溺于娱乐，岂非更是“跟党对抗”？逗孩子？找朋友？……都不能拴住我的心，也不现实。其实我很清楚，最有效的“集中精力”便是创作。但这个念头刚一冒就被否决了，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年月，怎能写文章？

又熬了三两天，再三搜索枯肠，依然毫无结果。晚上，盯着灯光又想：自杀，不也是死吗？写文章，一口血喷在桌子上，也是死。过去搞创作，总嫌时间不够，总嫌开会，学习，干扰太多。现在，大块时间摆在面前，你不写，是没有出息，自甘堕落，谁又干涉你来呢？这样一想，眼前灯光忽

然变大，心里喊：干！

决心既下，第一步是先找题材，给自己定个规矩：不管写啥，一定要轻松愉快，能逗自己乐的，至少能使眼下的沉重暂时放松。这就很自然地想到了《平原烈火》，其中有个小鬼“瞪眼虎”，出场时，曾是挺活跃的。可后来被主角挤到一边去了，没啥事可干，最后只得蔫而不啾的结束。一位老战友看了批评说：“你怎么把个挺可爱的孩子写丢了呢？”

那好吧，现在就把他抓回来吧，能逗我笑的就是他。

于是我大敞心扉，把平生所见所闻、所知所得的“嘎人嘎事”，广撒大网，尽力搜寻，桌上放张纸，想起一点记一点，忆起一条记一条，大嘎子，小嘎子，新嘎子，老嘎子，尽都蹦蹦跳跳，奔涌而至。由于我不喜欢自己的老实刻板，从幼年便把嘎子当作楷模，注意多，观察多，交往多，“嘎相”储藏也相对较多，尤其抗日时那些嘎不溜丢的小八路们，竟伴着硝烟炮火，笑咪咪地争先赶来。不多几天，那具有情节功能的嘎人嘎事，竟拉成一个长长的单子。我把单子从头细看，加以去粗取精，编排调整，一个嘎眉嘎眼的嘎子形象，便站在眼前了。啊，我的孩子，啊，我的救命恩人！在紧关节要的时刻，你真的来了呀！

再没什么可迟疑的了。稿纸铺开，收拢心神，开始描画。为怕组织上怪我又不“老实”，连胡可杜烽也一律保密。但我写的是电影，而非小说，原因很简单，写小说必须细抠语言，一字不妥，心下生腻，多处不妥，读者会半途把

你甩了。而细抠则须下细功夫，太累人，当时的体力已经担不动。而写电影呢，语言粗糙些关系不大，导演能看懂就成。对话虽要求精彩，却又越少越好，这就省劲多了。总之，写作目的是“集中精力，转移方向”能把我拉入写作就好。

感谢苍天，感谢捷普洛夫的“八字方法”，写作一开始，情绪就变了。各路英雄纷至沓来，抗日烽火燃遍大地，化装袭击，狭路埋伏，端楼打点，越墙掏窝，一派神出鬼没，灵动壮美的活跃景象，布满眼前，它们所引起的激情，是可以压倒一切灾难的。老实说，在敌占绝对优势的环境下，我们坚持武装抗战的整个斗争，就是一场嘎子式的游戏，斗心机，斗智慧，斗谋略，斗谁的“鬼点子”多，正是我们“小米加步枪”克敌制胜的法宝。写嘎子，无须发愁生活的枯竭，抗战史实，永远是取之不尽的源泉。所以，一开始写就相当顺利。由于思想和情感的激扬和专注，情绪也似又上了当年的战场，连睡中梦中，也枪炮轰鸣，杀声震耳。什么“反党”啊，早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食量于是增加，睡眠于是安稳，眼里消灭了“金花”，红润又回到脸上。写到高兴处，甚至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在屋里飘飘然旋转起来，简直忽然之间又变成另一个“疯子”了。

若深究一下，是什么力量使我顺利地“转移方向”了呢？简单说，就是战争中的党和战争中的老乡啊。抗日战争长达八年，日寇不但握有特别巨大的优势，也格外残暴凶

狠，对剿灭共产党是始终竭尽全力的，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那种局面下坚持斗争，真是苦极了，险极了，残酷极了，千千万万的先烈，把尸骨铺在大地上，血流成河；可活着的人，照旧“把脑袋掖在腰里”，迎着雷暴，拼死冲杀，没有一个为升官，为发财的。老乡们看在眼里，感在心里，他们才肯、也才敢不怕烧房砸锅，不怕妻离子散，亲你，爱你，破生忘死地支持你，保护你。如果不是这样的好党，老百姓只要向你一闭眼，日本鬼子的铁扫帚马上就会把你扫个精光，连芽儿也冒不出来。而处在那等恶劣的环境中，战士们仍能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活得理直气壮，就凭着那点忠心，那点信仰，那点正义感，那一派浩然正气啊！

当然，那时偶尔也有老百姓骂骂共产党的。可这些骂，能极快地地上达高层领导。当时的决策者们，不是忙于抓人惩办，而是先检讨自己，探询根源，找出群众之所以不满的所在，坚决下令纠正错误。被人传为美谈的“精兵简政”，“大生产运动”，不就是这么骂出来的么？而真正打动群众之心，换得他们亲爱的，就在这些地方啊。历史推移，千百沧桑，真理只有一条：只有真正的军民鱼水情，才有人民的更无私，战士的更英勇。两者映照激发，才形成如虹正气，遍地英雄。

说到英雄，我在朝鲜战场碰到一位营教导员，抗日时认识，他问我：“你干什么来了？”我答：“采访英雄来了。”他听了，长叹一声说：“真正的英雄全死光了，剩些半英雄

不英雄的，成了英雄！”是的，这话我很理解，冲在最前头的，总是最先中弹啊。可那最英雄的千万先烈的骨殖，早已化为泥土，除个别幸运者外，谁还记得他们呢？但他们的精神还活着，他们创下的业绩和优良传统还活着，这个传统，可使一个党在危难中起死回生，是伟大中华民族的真正的精魂！

我又“回到了”抗日战场，精神和情绪一下子都“拔”起来了。于是就“忘”掉了眼前的一切。尽管断言我80分的忠心已奉送给了丁、陈，可七八万字的《小兵张嘎》，能从其中找出“反党”的影子、或者挨整“右派”的影子来么？这不是葱管里吹了气，是先烈们的英灵在敲震着我的良心和神经啊！

顺利的写作，忽在中途碰上技术性的“拦路虎”：在“嘎子”坐了禁闭之后，怎么出来的问题上卡了壳。按常规，这地方必有一套思想政治工作，道理不仅要让“嘎子”服，思想上还得有新提高。而“嘎子”是不轻易服人的，话不入耳就会辩论，如在电影上开起辩论会来，这戏就没法看了。我是个急性子，仅仅憋了两天，便灰心了：电影这东西咱没搞过，又不曾受过训练，“行行不是力巴干”，何苦来呢？还是回过头写我的小说吧。

这时体力已有相当恢复，觉得可以在语言上下功夫了，于是搁下电影写小说，毕竟有点底子，居然一鼓作气，一月之间把小说拿下来了。起初题名《小侦察员》，总感不顺，

最后定名为《小兵张嘎》。

小说写完，再拿起“电影”看看，觉得就按小说的路数往下“誊”，也可勉强成戏。于是电影剧本也在以后的十多天中完成。“撒斜”一点说，也可叫做一箭双雕了。

关于创作方法，似也值得说几句：过来人当记得，当时文坛，到处是禁忌，凡执笔为文的，无不战战兢兢，何况“反右”一来，文网大张，人人动辄得咎，胆战魂飞。但我反正已经“头朝下”了，写作只为自救，不为应时，还管那些禁忌干什么。惟有联大老师肖殷的一段话，始终是我注意追求的。他说，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写人，写人的性格。性格，由个性和共性两者组成，而共性是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的。因他说的是“最终目的”，脑子里曾连转几弯，所以印象较深。现在写“嘎子”，抓个性成了方法上的头等大事，即：凡符合“嘎子”个性的，就拼命强化、突出；凡与“嘎”个性无关的，戏再好，也予割弃，即或“冲犯”了什么，亦在所不惜。这一条，看似简单，但从效果衡量，恐怕还算说得通的。

十三、不是结束

把两个“嘎子”抄清，装订成册，已是1958年的五六

月间。心中颇有点高兴。便又问胡可有无消息。胡可依然说，别急，别急，耐心等着吧。其实我内心已经不急了，既然能写东西，拖就拖吧，拖得越长才越好。我回到屋子，开始谋划酝酿已久的大长篇。实在说，写这个长篇是我此生最大野心，最后的梦想。我想写一个农民，从抗战当兵开始，经历三场残酷激烈的战争，最后成长为一名将军的故事。题目老早就定下来了：《将军向我们走来》。

我以为，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主要是靠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而在几十年的奋斗中，武装起来的农民起了中坚作用，尽管牺牲了千千万万，风波险恶，道路曲折，但确乎锻炼出一大批人才。而这些人才，即使在建国之后，依然是国家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和“拳头”。就是说，写一个从农民到将军的成长过程，也就大体概括了当代历史的主要风貌。我自己亲历了抗日、解放、抗美援朝三场战争，时代背景是熟悉的，对连、营、团、师、军各级指战员，有相当程度的接触与了解。心中藏着不少英雄的动人形象。把他们用心组织，精雕细刻，自信可以塑出典型。是的，也许我承担不起这样的重大题材，但每一想及它的史诗性，丰富性，和它含有的重大意义，总不免雄心勃勃，激动不已，觉得，果真此生能把它拿下来，是可以死而瞑目的了。现在，《张嘎》已完成，锋芒小试，感觉尚好；胡可又叫“耐心”，大块时间似乎还有，此时不干，更待何时呢？

用三天时间拉了个粗疏的提纲，为尽速投入，决定先开

始，后细磨。开笔之初，依然保持着《张嘎》的势头。然而，雄心也就“勃勃”了十来天，小休时翻看《人民日报》，忽见《解放军文艺》第六期广告上，赫然一条标题：《徐光耀的修正主义思想》。头上轰的一个炸雷：啊，报刊“点名”了！

那么，我已经是“右派”了？已经成了“敌人”了？

急急推开案上的一切，跑上街去找这份刊物。一面昏昏然想，“修正主义”？这不是内定扣给赫鲁晓夫的帽子么？斗我的时候，没有谁这么扣过我呀！怎么又跟赫鲁晓夫弄到一块去了呢？跑遍了大小报摊和邮局，都说该刊尚未到。又等了好几天，刊物来了，却又怪，从头翻到底，没有这篇文章，撤掉了！为什么撤掉？一时又坠入五里雾中。“将军”不但不向我“走来”，趁此机会，他也逃之夭夭了。

正自神不守舍，文书夏信荣送来六月份的工资，打开纸袋点数，削去一大半，从原来的210元变成了99元。

把两件事加起来去问胡可。胡可显得很尴尬，嚅囁着说：他也不知道怎么了，“可能是行政科他们，弄错了吧——你别急，等我去问问看”。

等了一星期，不见消息，再等一星期，毫无动静。一日三餐，都与胡可、杜烽同桌而食，他们一个支书，一个党小组长，消息竟打听不来，我也就知道：不能再问了，他们是没办法解释的。

心中大乱，“八字方法”也失灵，我必须面对全新的

“现实”了。人往哪儿去？家庭怎么办？孩子往哪儿安插！……特别糟心的是那则广告，它覆盖全国，我父亲，我姐姐，我妹妹，都可能看见，而他们都是追随党多年的铁杆红人，都曾为有我这么个亲人自豪过。尤其是我姐姐，自4岁失去母亲之后，是她把我拉扯大的，一向把我的荣辱看成她的荣辱。这可好，霎时之间，我变成了一个可耻的“右派”，一个“反革命”，一个“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她将怎么“迎接”这个消息呢（后来正式消息到达，她果然一下昏厥4个小时，落一身大病）？

大约因为“疯”过一次了，有了免疫力，尽管心乱如麻，倒还能够稳住。人在无可奈何之时，也就“死猪不怕开水烫”了。又等了三四个星期，依然没有动静。为招惹点什么以欺骗自己，消磨岁月，便把电影剧本拿给黄宗江看，请他提提意见。黄看了，带着满脸怜悯，说：“写得不错，提不出意见。”因见我十分狐疑，又补充说：“真的，不骗你，可以说在水平线之上。”其实即使是“真的”，我也没有心思去丈量他含意的轻重了。

不断去转转琉璃厂，打算让齐白石徐悲鸿们帮我打发那无尽的岁月。《将军向我们走来》已收进抽屉，喊杀连天的腾腾烈火，早告熄灭，谁知日后还有机会“拾”起它来吗？——唉，在此后的年月里，我还真有两次机会重新写它：一次是在1963年，好不容易请了半年假，刚写了两万字，保定发了特大洪水，过后，被市委书记点名调出，命令

写“抗洪救灾”的大型剧本。这一写，就写到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一来，一切“砸烂”。第二次是1973年，“造反”进入武斗高潮，我无资格参与武斗，刚刚趁“逍遥”时期再次动笔，谁知“红色政权”诞生了，又命令我去写“本市的革命样板戏”，大块时间又被剥夺。在进入新时期的前二年，也是个机会，但文坛上“新潮”涌起，花样翻新，令人眼花缭乱。某出版社编辑当面对我说：“写战争？现在谁看那个！”心下犹疑，蹉跎两年，忽地当起官来，于是加速度地跌入老年，只剩下徒唤奈何的力气了。命运啊命运，你是多么的无情与暴虐！

等到1958年的9月25日，“结果”终于来了。支部书记杜烽和支委周洁夫，进了我的屋子，很严肃，有点想笑，也有点惶恐，没有寒暄，代表组织出示两份文件，说：“你的问题，党委已经作了决定，都在文件上。你要同意呢，就在上头签个字；不同意呢，也可以提出上告。”我拿起第一份文件，是总政机关党委的“决定”，文曰：“由于徐光耀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军籍，剥夺军衔，降职降薪（降为行政十七级），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干净利落，无其他说明。第二份文件是军事法庭的军法“判决书”，除没有“开除党籍”一句外，其余完全相同。

心上“蹦蹦”一阵乱跳，只觉大地忽然开裂，我像块石头一样往下沉坠，听得见“刷刷”的声音。还没有沉

到底，忽有了第一个反应：啊，“判决书”！在六年锄奸工作中，我写过不少“判决书”，那都是给别人定罪的，想不到当兵入党20年，自己也上了“判决书”了……

我还是向杜、周提了一个问题：“文件上只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没有具体事实（我过去写‘判决书’是要把全部犯罪事实都写上去的），定我右派，到底是根据什么呢？”回答是意外的巧妙，一句话就把我堵死了：“就是根据你的‘自我检查’啊。”是的，千真万确，是我自己写上了“反党”的，是自己把脖子伸进了绳套，白纸黑字，还有何说？他二位见我愣在茫然中，又补充一句：“主要的，是你给丁玲翻案，是那封信——”幸亏有这个补充，使我知道了犯罪由头。

后来在保定，大街上碰到一位已经很熟的业余工人作者，劈头问：“老徐，听说你是自个儿花了八百块钱买了顶右派帽子戴，是真的么？”我笑笑，想纠正他“八百”是七百之误，又一想不对，忙说：“恐怕是瞎传。我戴‘帽子’，是因为给丁玲翻案。”这个回答，就是根据于官方的解释。

他二人又重复提醒：“你不同意，可以上告。”我立即坚决回答：“不，我不上告，我同意。”党章不顾，宪法不顾，事实不顾，根本不讲道理，我上告，找着再抹我三级么？

两眼一阵发黑，我拉过文件，往上签名。又听到一个朦朦胧胧的声音，像是劝告：“你不要抱幻想，这次运动有规

定：一律不准搞复查、甄别，定了就是定了，不许动！这是真的。”即使在朦胧中，我也认为这不可能。我当共产党20年，向来“有错必纠”，怎么会兴出这么反常情的规定呢？于是根本不予理睬。

然而，这竟是铁的事实。22年确乎无人敢动，便是见证。也可见他二人的话是有文件根据的。事情既已开头，有其一必有其二，刚刚翻过年来，这一招就又用在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身上。后来的刘少奇，是“永远开除出党”的。我当年多么天真啊！

我又问：“需要上缴什么东西？”我预计会没收校官礼服和“独立自由”及“解放”两枚勋章。那礼服的领口袖口，都绣有华丽的金边。灿然耀眼，“右派”是绝不可以上身的。然而只收了肩章领章和武装带，其他给留下了。至于去向，他们说，我会被“分配”去保定，这使我很感安慰，不去北大荒或团泊洼，却发往保定，我妻子、岳母、大女儿，都在那里，可以互为依傍。对一个“发配”的人来说，很算得上是优厚的了。

但是，接着又一个晴天霹雳：叫我国庆节前，把家整个儿搬到保定去。原因是上级有指示：“凡戴了‘帽子’的，一律不准在北京过国庆”！我的天！距国庆只有5天了，我一个“双开除”的“右派”，两手空空，保定还不知情，这样一个倒霉透了的散乱摊子，我怎么“飞”得动呢？只好要命有一条了！

杜、周也很为难。踌躇再三，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吧，他二人提议：我自己先去保定报到，抓紧把家事也安排一下，待过了国庆，再向组织说明情况，请假回京搬家。

不错，这是走得通的，得救了。向二人表示了感谢。

隔了一天，即1958年9月27日，正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佳节，我由一名大尉监护着，上了南下的火车。大尉谨慎而温和，使我感到是“监护”而非“监押”，更打消了“董超薛霸”的影子。开车不久，播放了一首儿歌，动听而嘹亮：“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我向来喜欢这首歌，今日听了，却差点掉下泪来。可是，渐暗的天色，又使我想到中秋圆月，心想，人虽已从北京“起”出来，今晚却可以同妻子过个团圆节了。谁知车到保定，大尉很神速地从忙于过节的市人委那里开个条子出来：“直送保定农场”。我一愣，忙问，“‘决定’上说的是‘转地方另行分配工作’，怎么送农场？”回答是：“市人委同志说了，你们都是先送农场。”

格外大格外圆的中秋月跳上屋顶时，我已进入保定农场。这儿拥有四百个“右派”劳动大军，我立即被编入一连一排。副连长指着一份锄、镐、锹、钯说：“这是你的。”

故事告了一个段落，可并没有结束。这时我33岁，到1979年“改正”还有22年。中间经过“劳动改造”，“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四清”以至“文化大革命”，

还有一长串“故事”。“改正”时，我已54岁，如今又过20年，垂垂老矣，天知道还能写得出来吗？

仍有些小疑惑在心头逗留不去。其一是，虽说我写过一本书，但农村小学四年，自幼当兵打仗，实在说不上是知识分子。何苦必欲“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而后快呢？就说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个儒，还不过瘾，非要再“坑”个样儿出来不可，也应分分敌我友吧？到1979年，胡可才告诉我：本来1958年6月就定了给我戴“帽”的（所以才发生了《人民日报》的广告和扣工资的事），因支部大多数人不同意，打报告上顶，顶了三次，还是得戴。为什么对自己人下此狠手？让中国人普遍的聪明一点不好吗？凭什么断定“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什么非要跟“知识”势不两立呢？

其二，戴了“帽子”是“右派”，1959年保定农场给我摘了“帽子”，又称为“摘帽右派”，因此一条，“文革”中把我归入“黑五类”，“遣返回乡”，打回老家务农去了。1979年“改正”（不是平反）后，却又有“改正右派”一说：保定有位安姓文化局长，打报告申请住房，一位贾姓宣传部长批道：“安伟，14级，副局长，改正右派。请帮助解决住房困难。”据说这并非个别例子。此项“名目”一立，人们就会把不管什么脏事烂事，都往我们身上乱贴，因为已是轻车熟路，成了“惯性”。冤了这么多年，所扣工资不补，株连妻儿活该，不准重新参军，没收信件不还，犹有说也，难道这“右派”阴魂，必要追随我们直到入土吗？

当然，这只能算是个人琐事，非常渺小，说起来也很没有意思。但若回顾整个“反右派”运动，可就不能采取这种轻薄态度了。众多冤案，还在其次，看看它的效能和后果，才是最为值得的。

凡敢提意见、讲真话的，一律头朝下了；说假话之风，随着“大跃进”的兴起，满天飞舞，横扫了一切。各色“卫星”纷纷上天：小麦亩产5500斤，红薯亩产60万斤，稻穗上站着人的照片发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小土群”胜过大洋炉，“钢铁元帅升帐”，到处“热火朝天，形势大好”。可是，老百姓砍了一人高的玉米栽红薯，砸了饭锅“炼钢铁”，拆了民居建食堂，抽出柁檩去烧火……这些疯狂的胡作非为，非只一时一地，都是大小干部带头、或逼人干出来的。为什么？难道都失去理性、丧尽天良了吗？我的故乡，在一些非常好的干部中流传这么个口号：“要命不要脸，要脸不要命！把良心夹在胳肢窝里，往缺德里干吧！”彭德怀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在庐山会议上提了个很温和的意见，立即被定性“反党”，使他也很快懂得了必须“要什么，给什么”。自此之后，“一人之下”的所有高干嘴巴也一律被封。于是，除了培养出林彪这个“马屁精”之外，各种形式的“鸣放”就彻底根绝了。

所以，才来了“三年自然灾害”，才吃了“四大两”，才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沿”，才使数千万冤魂梦断旷

野！……报应来得多么神速啊！

物质的损失，较易补回。至于高尚道德沦丧，精神长城不存，人人成了“违心”的行家，最吃香的是溜须拍马，这诸种大弊，则是极难救治的。一般群众也养成逆来顺受，奴颜媚骨，“阿 Q 精神”变作安慰剂，“顺时听天”成了保命符，如此等等的“窝囊废”现象，不是比毫无筋骨的“葱叶”更可怕么？在这种情况下，连旧社会都有的“文死谏，武死战”，怎能再现？灵魂大幅度扭曲，信仰危机大面积扩散，还怎么挡得住霉变和腐败？！封建主义可以凭借“绝对权威”随意“计白当黑”、“指鹿为马”，而吃苦受罪、水火遭殃的，却是亿万人民。损失如此巨大，性质如此恶劣，在全世界面前大丢其脸，整个民族大滑坡！千古教训，核心只在“说假话”之一端啊！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我们还“有暇自哀”的时候，应赶快把事情办好，以免“为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就是，对封建主义流毒再也不能容忍了，奴化教育，愚民政策，必须废止。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最为紧迫的任务。封建主义扫清之日，才是中华民族大放光芒之时！鄙人写此一文的目的，仅仅在此，岂有他哉！

1999年7月11日。今之凌晨，中国女足与美国队争夺世界冠军，偶尔失利，大痛于心，草草结束。

1999年8月7日，改一遍

1999年9月11日，改讫于石家庄市

昨夜
西风
凋碧
树

昨夜西
风凋碧
树

白桦简历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信阳市，属于生于忧患的一代。因战乱辍学，在信阳师范艺术科肄业。1947年参军，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二野、昆明军区、西南军区及总政治部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文学创作工作。1958年被划为右派，搁笔多年。1964年重新入伍，在武汉军区任创作员。文革后，中断多年的创作活动得以继续。但作品多有争议，以1981年全国性批评电影剧本《苦恋》为最。1985年转业到上海。1988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并在美国哈佛、哥伦比亚、明尼苏达、加利福尼亚……等二十余所大学做巡回演讲。1986年以后应邀出访过美、苏、法、德、日、澳、韩……等十几个国家。诗歌、小说、电影、戏剧、散文、演讲等均曾多次结集出版，另有《白桦文集》（四卷）问世。有些作品曾以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在国外发表和出版。现在上海从事专业著述。

暴风中的芦苇

人只是芦苇，自然界最柔弱的生命，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

——帕斯卡尔《随想录》

“人只是芦苇，自然界最柔弱的生命。”人们的生命过程有多么的艰辛啊！更何况它们从生到死都处于暴风骤雨之中，普通的中国人就是如此。可以这样说：能从二十世纪活到二十一世纪的普通的中国人，都是幸存者。正因为人们会思想，才有痛苦。也正因为人们有痛苦，人们才比神们伟大。也正因为普通中国人的痛苦特别沉重，才尤其伟大。

我在童稚时期就开始经历各种苦难，苦难的生活促使我思想，思想促使我早熟，早熟的孩子在身心两方面承受的痛苦更多、更深。那时一个生存于专制的弱国而又勤于思考的年轻人，对于左倾思潮就像铁对于磁那样。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腐败和对美国人的依赖，促使有思想的青少年地迅速向左倾思潮靠拢。一旦接触了左倾思想，就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对独裁政权的学生运动。我以为所有的年轻学生都像

我们一样，一点即燃。的确是这样，有许多年轻人都自愿冒着生命的危险走到我们中间来，就如饥如渴、生吞活剥地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就以天下为己任，激昂慷慨，奔走呼号。但是，即使在当时，也有许多年轻人对于我们煽动性极强的说教反映冷淡。包括我当时最倾心爱慕的一位女同学在内。为此我激愤并难以理解。极端的热情和极端的幼稚，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我立即成为特务追逐的对象。

1947年夏秋之交，我——一个17岁的男孩，每天都在特务的视野之内等待一个“家里人”（中共地下组织的向导）的到来，向我悄悄地说：“走！回家去！”那将是一道严峻的命令：立即奔赴如火如荼的解放战场！可“家里人”什么时候才能来呢？一方面是焦急的等待，一方面又担心“家里人”会突然走到我的面前，使我措手不及。我喜欢生命在死亡威胁中的刺激，精神在神秘使命重负下的矜持，自以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豪，大睁着双眼在暗夜里惴惴不安的等待……为了向一个我最不愿意离别的人告别，我走进那条熟悉的小巷，小巷里一半是金色的阳光、一半蓝色的阴影。小巷中间有一口小井，青石砌成的井沿儿被柔软的井绳磨出一道道深沟，说明这口小井很有些年头了。小井蜷缩在小巷的北侧，正对着一扇经常在我梦中出现的小门，门框上的春联是杜甫的两行诗句：“桃花细逐扬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横幅是：“春意融融”。作为一个激进少年，我立即想到：内战的炮火已经隐约可闻了，为什么小巷深处的人家

在希冀中会还有这样不切实际的图画呢？那时候我是多么的幼稚啊！以为中国人除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有的人都要造反，都要革命，安于现状不仅可笑，也不可思议，甚至是卑鄙的。

我扣响了那扇小门，开门的是她！她微微一笑，没有说话，她是一个习惯用微笑传达信息的姑娘，只有我才能把她的微笑破解为丰富而深情的语言。院子是长方形的，砖地上因为常年的阴湿铺满了青苔，小小的花坛里好大一丛嫣红的月季花！

她母亲在堂屋里迎着我，请我坐下，给我倒了一杯茶。然后她们母女俩并肩坐在床边上，准备听我滔滔不绝的演讲。因为我只要有机会走进她们的小屋，我就会激昂慷慨地向她们高谈阔论，讲内战和学生运动的形势，讲专制政府的黑暗和民众与知识分子的情绪。完全出乎我的意外的是：她们听到的好像是一些与她们无关的闲话，从未表示过可否。她们微笑地看着我，从她母亲的笑容里甚至可以看到一丝讥讽……但这一次我守口如瓶，因为我即将离去的行动是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在她家吃了一餐朴素的午饭就告辞了。她把我借给她几本“赤色禁书”还给了我，默默地送我走到门外。我期待她说点什么，对我、对我借给她的书，哪怕说上一句话，但，她一如既往，没有吐露一个字。门缝在我们的相向凝视中渐渐合拢了，我被丢在一半阳光、一半阴影的小巷里。后来，我在小井边又留了很久，这是她天天汲水的小

井，她用这口井里的水洗衣、淘米、洗菜，她就是吃这口小井的水长大的。我曾经多次在这口小井边等她，希望她出来汲水，十次有九次是空等。如果她真的出来了，我会满面绯红、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偶然经过这里的……记得我们是在张骏祥先生写的话剧《万世师表》的排练和演出中相识的，那时我只有十五岁。我们扮演的是一对小情人，按剧本里的规定，在第二幕应该手拉手出场，每一次我都不好意思伸出手来。我对她念过台词里的“我爱你”，在台下我却从始至终都没敢启齿。两年来，我一直在企图影响她，看来，让她和我一起走向革命，走向战场的希望落空了。所幸我还懂得人各有志，不能相强。那天，我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或必须投身汹涌澎湃的大潮。宁静、平凡的生活更加吸引绝大多数人，包括她。也许她宁意和妈妈相依为命，像妈妈一样，做一辈子清苦的教师。1952年冬天，我曾经回到那口小井边去找过她，给我开门的却是一个中年人，自称是她的舅父，他告诉我：她们在战乱中失踪了！半个世纪以来，我都相信她们真的是在战乱中失踪了，甚至想到过死亡。90年代我重回故里参加母校信阳师范建校90周年纪念大会，发现那条一半阳光、一半阴影的小巷已经被极其难看的、新建的简易楼覆盖了。可那口小井，那座单门独户的小院、对联、青苔、嫣红的月季花……都还在我的记忆里如昨日般鲜明。1999年7月，突然，我从一位同学的回忆母校生活的文章里得到她在台湾的消息，我大吃一惊，立即写信拜托那

位同学转给她一封信。一个月之后，收到一封来自海峡彼岸的信，信封上写着我往日的名字。就像一只从早年的梦中飞来的燕子，径直落在我的手掌上，默默地辨认着我。我怕它会受惊飞去，久久地没敢拆看……早已成为死灰了的热望，在一声怦然心动之后，又飘起袅袅光焰。她还活着！半个世纪的连天波涛，半个世纪的不测风云，半个世纪的恒常潮汐，半个世纪的连绵战火。我也会得到一个奇迹！一张纸的飘然而至，使我的时光顿时倒流了51年。我也像她在信里说的那样：“惊喜万分”！正如当年我的推测，她在信中告诉我：她和她的妈妈一样，流亡到台湾，做了几十年教师。在虽然艰辛、却相对平静的岁月里结婚、生儿育女、退休……眼前看到的是一行行老练、工整的字迹，耳边听到的却是一个妙龄少女的声音。她在信中问到：你呢？是呀！我呢？——我黯然而……唉！怎么说呢？人生最难话得失！

我在1947年逃离蒋管区，走向为争取建立一个新中国而战的战场。我多次问过自己：你设想的新中国新在哪里？我回答说：新在没有皇帝和变相的皇帝；新在她是一个独立而充满自信的国家；新在她能轻易地给予人民平等与自由；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猜疑和忌恨。1949年当五星红旗在北京升起的时候，我正随军转战在南海沿岸，那时的心情正像我在一首长诗里描写的那样：甘愿为了这巨大的欢乐去赴死。那首诗的题目是：《海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梦》，足以印证当时的心情。转录如下：

海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梦

一场酣畅淋漓的夜战！紧接着
就是披着星光对穷寇的趁胜追击。
每一次夜战我都要掉队，这一次
却是我把团队远远地抛在了背后。

那是1949年十月的第一个破晓，
作为一个大进军中的士兵，我当然知道：
今天将在北京一座宫门外的广场上，
升起了一面让世界震惊的、崭新的国旗……

当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单兵的时候，
一眨眼，夜已经裹着紫色的披风悄然隐去，
一个从天上垂向地面的大幕骤然升起，
啊！新世界的色彩原来是一望无际的湛蓝！

陌生而又熟悉，意外而又亲切！
这是大海吗？是大海！是的……！
儿时我有过多少次海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梦啊！
今天才得以面对梦一样瑰丽而深邃的海！

而且是南中国海，南中国海意味着什么？
对于一个在破碎、贫瘠、荒芜的国土上，
背负着沉重的失望还在不断栽种希望的孩子，
慷慨的南中国海给了我一万倍的补偿。

浸在泪水中的我扑倒在柔软的沙滩上，
尽情地接受着温暖的南国之风的抚摸；
明丽的南中国海披着雪白的婚纱，
风情万种地向我一跃而起，那样轻柔！

她为我捧起一轮硕大无比的太阳，
我庄严地低下头去接受她授予我的金冠。
大海之上是一座火海，桔红色，
波涛在蓝与红之间唱起深情的颂歌，慢板。

这天、这海、这太阳、这整体的辉煌，
使我恍然不知此身今在何处……
我希望这炽烈的天火把我点燃，
而后在空中轻盈地随风而逝。

一无所有，但那是在献身之后的一无所有，
灰飞烟灭，但那是在永生之前的灰飞烟灭；

心甘情愿地埋在五彩缤纷的虹彩里，
心甘情愿地葬身于海的永无休止的欢歌中。

当枪弹呼啸着擦过我的耳轮的时候，
一艘登陆舰像是刚刚从海底浮现出来，
无数惊恐的眼睛和黑黝黝的枪口瞄准着我，
一时我竟然忘了自己是在追击穷寇的士兵。

登陆舰不就是一个缩小了一万倍的王朝吗？
它装走了中国大陆的全部罪恶和黑暗，
装走了一个专制的政府，一个独裁的皇帝，
装走了腐败透顶的官吏和阴险毒辣的特务。

装走了压榨、凌辱百姓的庞大机器，
装走了所有公开和秘密监视人民的眼睛，
装走了所有公开和秘密瞄准人民的枪口，
装走了我们民族无穷的灾难和最后的悲哀。

滚吧！越快越好！请看！我不是在填压
而是在一颗颗地退出我枪膛里的子弹。
你们却误解了我的行动而加深了对我的敌意，
一个多么有趣、多么不成比例的对峙啊！

恼羞成怒的敌军把惊恐、仇恨，
和全部剩余的炮火，向我一个人喷射过来。
而我的眼前却只有舒心的蓝和纯净的白，
以及使我心醉神迷的、温情的阳光。

我想唱，我想喊，我想拥抱大地、拥抱海，
甚至包括那些向我军疯狂反扑的敌人。
“卧倒！”战友们在我背后厉声提醒我，
团队已经赶到了，可“卧倒”是什么意思？

我挥舞着双手迎向和海浪一起扑来的弹雨，
喃喃地说：这可是最后一场腥风血雨呀！
面对如此密集、如此猛烈的炮火，
我突然敞开雪原月色似的胸膛。

我只拥抱过我可怜的父亲，
那是在他被日本宪兵拖走活埋前的那一瞬；
我还拥抱过我坚强的母亲，
那是在我奔赴战场的前夕，她还在梦中。

我没有更高的奢望，没有……
我只期待着属于我的那一颗滚烫的子弹，
如果能准确无误地命中心脏，

一颗，即使是一颗流弹也就足够了！

“卧倒！”战友们一定以为我已经疯了。
可我为什么要卧倒呢？你们应该明白，
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白骨盈野，
为之眼泪淌干的不就是今天的到来吗！

今天，在今天，只有在今天，
我的死亡才和痛苦、和悲哀无关。
在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时刻！
在金沙灘上洒一小片鲜红的热血，多好！

当海风吟唱着在岸边寻寻觅觅的时候，
一棵坚韧的芦苇匍匐在地亲吻着沙丘；
灵魂升空，俯瞰着自由人漫步在自由的大地，
躯体入地，和绿遍天涯的芳草一起重生。

唉！雨点一般的子弹，却没有一颗击中我，
作为士兵，我为惊慌失措的对手感到羞愧。
多么遗憾啊！一个自动向枪手走近的靶子！
一个欢呼雀跃着赴死的士兵竟然没有倒下。

从而没能如愿以偿地在十九岁的时候死去，

没能把祖国留在我幼稚、但十分虔诚的祝福中，
没能把亲人的笑容定格在我冷却了的角膜上，
那将是一幅永远属于我的、无比美丽的图画。

而我……

……

……

却活着，耳聪目明地、清醒地活着……

——那是一种真诚而高尚的激情。这样的心情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上半叶，我记得 1950 年元月随先遣营从广西南宁出发，十余天日夜兼程的追击，国民党军李弥兵团的残部被压在红河河谷，困兽犹斗，他们把剩余下来的炮弹全部都倾泻在我们的头上了。可以说，那是我遇到过的、空前激烈的战斗，有时候被炮火压得十分钟抬不起头来。我军伤亡惨重，战役结束以后，团长把一百多个重伤员交给我，他明明知道我并不是他所属团队的士兵，而是师部的一个宣传干事。我立即在当地游击队的帮助下，动员了二百多个民工，就地用竹竿扎成担架，抬起来，跟着我就出发了。我第一次不是跟着别人，而是别人跟着我，而且有几百人。在陌生的哀劳山上寻找医院，听当地的彝族山民说，撵旧附近有个矿区医院。我带着这些民工和伤员跟着向导找到了那所医院，但那些医生护士向我提出种种借口，拒绝接收这些濒临死亡

的伤员。一个刚刚进入二十岁的士兵，我第一次大发雷霆，质问他们：你们是医务人员，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救死扶伤，何况这些躺在担架上的伤员都是创立新中国的功臣，你们能心安理得地看着他们不停地流血而不予理睬吗？你们反动，没有人性！我的愤怒不仅使来劳军的中学学生们十分惊恐，我自己也很意外。那些医生无可奈何，才勉强把伤员接受下来。所幸时间很短就被接回到自己的野战医院里来了。后来听师卫生处的战友讲，矿区医院的医生们对待那些伤员很冷漠，伤员接回来的时候，许多伤员的伤口都没有经过消毒处理。这是一件使我终生引以为歉疚的事。

1952年初夏的一天下午，作为一个22岁的边防军基层军官，我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西南军区调我去贺龙司令员身边工作，即日启程，到重庆西南军区报到。这项命令不仅使我感到不安，连师和军、以及军区的领导人都感到诧异。既然是命令就必须执行，于是我很快就从红河边境出发，乘汽车取道以险恶著称的滇黔公路先到贵阳，再从贵阳入川，蜀道真难！沿途住的都是“鸡鸣早看天”的旅店。一个星期才到达重庆。到了西南军区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任务是生活在贺龙元帅的身边，在他空闲的时候，倾听他讲述前半生的战斗经历，作为写作素材。因为很多他的部下觉得他年事已高，而且血压偏高。当时，我既兴奋而又感到负担沉重。无疑，对于我，这是一个艰难的美差。贺龙元帅目前正在成都，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为四川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

的合并而召开的高层会议。我必须去成都贺龙元帅的寓所报到。那时成渝铁路刚刚通车才几天，我可以不用搭汽车了，第二天我就乘上了去成都的快车。我在火车上彻夜失眠，一直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当我跨进四川成都东二巷贺龙元帅临时寓所的大门以后，就被侍卫引向花园右方的一间中式大厅。在秘书看介绍信的时候，贺龙元帅突然笑容满面地从里间走出来。只一瞬，我就不紧张了。贺龙元帅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军人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总！”他走到我的面前，先向我伸出他的手。他比我想象中的贺龙年轻得多，温和得多，儒雅得多，亲切得多。好像我不是第一次谒见他，似乎和他见过多次面。他幽默、自信、快活、幸福而特别富于人情味。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他最终和悲剧会有什么联系。他先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河南信阳。”他立即大声说：“啊！我晓得！在武胜关以北，驻马店以南。”他看出了我脸上的惊奇，笑得更欢快了。我想，他一定在某一个时期，率领部队行军打仗，到过我们那一带。“住下！住下再讲。吃饭了没有？没吃饭先吃饭。”我被安排在一座西式楼房的楼上一间房子里，后来我发现，那间房子正好在贺龙元帅和夫人薛明卧室的顶上。此后，每当他下午不开会的时候，就和我面对面坐在他卧室窗外的走廊上，他讲，我记。湘西方言比较好懂，既接近四川话，又像鄂西话，还有些黔东话的尾音。有时在讲到激愤的时候，也会加上很强烈的手势。他用了好多个下午，向我讲述了他自己许

多质朴而传奇的经历……我在他的身边见过许多赫赫有名的军政首脑，那时中共的高级干部平易近人，一点都不让下级紧张，回想起来，心里涌出一阵阵辛酸来，让人既怀念而又难以置信。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跟贺龙元帅去灌县钓鱼。他的座车是那种比较笨重的苏制“吉姆”，我坐在前座，不小心把司机老朱的茶杯踢翻了，老朱小声跟我开玩笑：“你也是首长，就别坐在前头，应该往后坐。”他的耳朵很尖，听见了，笑着说：“后头很宽的嘛！可以坐五个人。”我和老朱就都不敢响了。那时候从成都西北郊去灌县的公路还是土路，汽车很少，车速一快就卷起很大一片灰沙来，那天上午公路上全是进省城来的“鸡公车”，那是一种古老的独轮木结构小车，据说就是诸葛孔明发明的“木牛流马”。推车人还是十分辛苦，车轴“吱吱扭扭”的声音很响。他一再要老朱慢些，老朱一减再减，车速减低了很多，灰沙仍然很大。他不忍心了，用手拍着前座的靠背说：“算了，今天不钓了，回去！回去！”我既感到遗憾，又觉得高兴。遗憾的是错过了一次在都江堰上垂钓的机会，高兴的是他今天又可以和我谈话了。惟有在钓鱼的时候他是一个宁静的人，非常专注，一语不发，顶不喜欢别人伸根杆子挤在他身边说话了。

一天，我随贺龙元帅出门，（这一次我坐在他身边）车过杜甫草堂。他忽然吟起诗来：

“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
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

这着实使我大吃了一惊，说实话，我都记不全杜甫这首诗。而且他的读音准确，“赊”字和“斜”字都入的是“花”韵。

“说明唐代这里的人很少嘛，‘此地两三家’。当初杜甫的草堂也就是几间茅草房，逃难的人，流离失所，哪有钱起这么大的瓦屋呢，就是有钱，也没得心思。他又不想在成都安家，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后人修起的……他做梦都想回中原嘛！”

接着贺龙元帅又吟诵起来：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他用手肘碰碰我：“你来念下头两句……”

幸好这首诗我还记得。于是，我接着读：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我在贺龙元帅身边工作的那一时期，每逢周末或假日，他都要参加舞会。有时就在他的临时寓所里，那时胡耀邦、陈赓、李达、宋任穷、李井泉、阎红彦、张际春……等等都正当壮年。邓小平有时也会来，但他并不跳舞，只打桥牌。

他如果外出参加舞会，随行的总有我。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他本来完全不会跳舞，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才学跳舞的。那是1949年中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晚会上，孙夫人宋庆龄走向他，请他跳舞。他站起来红着脸说：“孙夫人！我不会。”恰巧毛泽东听到了他的回答，大声说：“贺龙！这是文明啊！不会，学嘛！”他所以对这件小事津津乐道，正因为这件小事和毛泽东有关，在这样的时刻，他的笑容就像孩子似的天真烂漫……

在五十年代初，无论什么人都想不到这样一个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到了愚忠地步的人，会落到如此悲惨的结果，贺龙元帅自己尤其想不到。那时贺龙的罪名虽然全都莫须有，问题既然已经由中共中央提出，肯定经过毛泽东的首肯，那就连贺龙本人都得严肃对待、认真思考了。如果按林彪们罗织的罪状，贺龙简直是一无是处。一出生就是“土匪、军阀”。南昌起义“投机革命”。在危急关头“向蒋介石乞降”。“杀害段德昌”。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北，伙同彭德怀卖命地搞“百团大战”（那时贺龙在对日作战中的勇猛和取得的胜利，连蒋介石都不得不承认，并一再传令嘉奖。），向敌、伪、顽暴露八路军的实力。（多么荒诞啊！）主持军委工作时搞全军大比武，弄虚作假。多年的体育工作全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单纯技术观点冲击政治”。“二月兵变，篡党夺权”……等等。所有这一切，对于贺龙来说，都百思而不可解，但贺龙完全可以说清楚。可贺龙向谁说

呢？1966年9月5日一个炎热的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党主要干将吴法宪等人对贺龙的诬告信，交给贺龙本人。毛泽东说，他的态度一如既往，他告诉贺龙：“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的评价还是在延安时说的那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回忆了许多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斗争的一些往事……等到贺龙被隔离在西山的时候，贺龙和毛泽东的地理距离稍稍远了一点，但顶多不过20公里。而这20公里终于成了一个历史上的无限远！从此，他们至死都没能再次谋面。贺龙应该相信，9月5日，毛泽东对他讲的话是温情而又诚恳的。只不过，后来，他在林彪和贺龙之间作了理性的权衡，最后选择了林彪。相对于政治来说，情感、道义等等就极其次要了！

1952年底，我第一次从西南进京，在火车上我作为一个边防战士，请求列车广播员让我向同车的旅伴们讲话，我惟一的目的是想要让他们都像我一样感受到新时代、新中国的幸福心情。我们的新中国得到了独立，独立，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强之路就在我们的脚下。我们的人民正在走向繁荣富强，我们解放军战士愿意献出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来保卫欣欣向荣的祖国。回到故乡的第一个夜晚，我就在母校的广场上，给我的老师和同学们做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

1953年我有十个月在北京创作电影剧本，从而开始接触文学界，一开始就和许多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相识了，我把

他们引以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很幸运，但与幸运同行的就是不幸。我很想把五十年代中叶以后的日子忘掉，事实上当然做不到，可是，年岁不饶人，记忆的衰退使得往事如烟，越来越浅淡了。今天再来追忆，就像修补敦煌壁画那样艰难了。但修补是必要的。知识分子——即使是所谓党的知识分子，主观臆造出来的春天也是极为短暂的。那年夏天我被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送到北戴河，为他们修改根据我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改编的电影剧本，也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实际上我在边疆初期经历的生活比我在小说和电影里表现得丰富得多，如果忠于生活，作品要好看得多，也深刻得多。但当时中国的党和政府像苏联的党和政府一样，特别重视电影的作用，所以拍片很少，1953年全年只摄制了七部影片。一部电影剧本的投拍要经过层层审查才能通过，最后一个审稿人就是周扬，周扬不点头就不能投拍。所以在写作中费力、费时最大的劳作，就是如何才能符合党的每一个条条框框，以及堵好自己没发现、而审稿人可能发现的、属于意识形态的纰漏。从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起，文艺工作者已经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党对文艺作品里的人物的最高要求，主要不是典型不典型或生动不生动，而是正确不正确了。等作品中的情节、细节，人物和人物关系都正确之后，距离党的要求越来越近，距离生活也就越来越远了。由于党对文艺功能的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以党的精神对人民进行教育，电影好看

不好看就相当的次要了。

在北戴河期间，一个偶然的机，碰见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捷生，搭上接副总理邓小平的汽车，只好坐在邓的身边。回忆起来，我第一次见到邓是1948年夏天，在河南襄城的大街上。那是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会师后，两个野战军领导人在襄城举行了一次重要的会议，我恰好去襄城采买纸张，偶然碰见二野和三野的领导人，他们是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毅、唐亮、粟裕……等等。那时碰到他们很容易，他们像我们一样，没有避弹车，没有警车开道，没有卫队。只有一匹马或骡子，每一个人只有一个背着驳壳枪的警卫员。那次战地高层会议以后的半年间，两支野战军联合对蒋军进行了一连串毁灭性的打击，包括年末的淮海战役。解放后，在成都贺龙元帅家里多次见过邓，但他都都不记得了。在车上问到我，他才知道我是二野的部下。汽车开到一个森林茂密的所在，我才知道这里有一个中央领导人避暑的特区。那天正好是苏联贝利亚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在一座别墅的阳台上，邓小平和另外一些中央领导人在一起交谈贝利亚其人其事，他们个个神情严肃，深感意外，我就悄悄离去了。在北戴河，中国作家协会和电影局以及中央各部都在北戴河建立了自己的疗养所，虽然都在特区之外。相对全国而言，五十年代，整个北戴河海滨就是一个特权阶层的避暑区。和我住在一幢别墅里的还有小说家萧乾、杨沫，剧作家林杉、沈默君等人。前辈女作家丁玲和方令儒住在另外一座

别墅里，她们经常在傍晚来我们这里串门。当时我才感觉到文学界也并非亲密无间，党和非党，历史上的左翼与非左翼，在他们的观念里十分森严。我和沈默君来自军队，他就住在我隔壁的房间。在我眼睛里的萧乾，是一个既谦躬又和蔼的中年人，他极力想改变自己，把自己改变为在新中国的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响应党的号召来参加刚刚开始起步的新中国的电影创作，大家都知道，列宁认为电影是最有效的宣传工具。我第一次见到萧乾是在北京的羊市大街的中央电影局，他也来参加一个关于电影创作的会议。我只知道他曾经是二战时期驻欧洲的中国名记者。他在会上的发言中特别提到我，说是从我的身上感染到一股革命的朝气。完全是“一副苏联电影里的‘金星英雄’形象”。虽然我很不理解，却毫不怀疑他的诚恳。他对我不可能有很多了解，因为在此之前，我只发表过有限的几篇小说，大概他觉得我最年轻，又来自边防军。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已经做了大官的文学界权威郭沫若曾经公开把他划在“洋奴、买办文人”之列，成为改造的对象。他很少参加傍晚在旁海的走廊上和大家一起闲话，虽然我也知道他不是不乐意参加。我很好奇，曾经两次到他房间里和他交谈。我注意到他在起草一部电影剧本的提纲，一张纸上零乱地写了许多英文。据说写的是二战时期的故事，我相信那一定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那时候，我和他都不知道即使是他真的写出来也不会拍摄。中央电影局所以邀请萧乾到北戴河写剧本，是主管电影剧本的副局长陈

荒煤个人的意思，为了提倡大家都来写电影，当然也不好拂了萧乾的热情。后来的结果说明萧乾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对于他的提纲，在审查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提出一大堆“不正确”来，后来，他自己识趣地主动放弃了。当别的作家知道我曾经两次访问过萧乾的时候，都很担心。有一天，杨沫以老大姐的身份，很爱护的态度对我说：你不要多到他那里去，不好！他和我们不是一样的人。（没想到，四年以后，我和萧乾成了一样的人，都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你看嘛！他一天到晚穿着绣花睡衣，写剧本提纲还要用英文，不仅是洋派，完全是根深蒂固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她的语气使我觉得还有一句话没说出口，那就是：你很年轻，不要受他的影响，他会向你散布资产阶级细菌。杨沫无疑是个善良正直的老大姐，而且是“一二·九”运动时期的老革命。那年，她身为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的专业编剧，却没有进行电影剧本的创作，她认为电影剧本专业技术性太强，很难写。她打算先酝酿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在1958年出版并引起轰动的《青春之歌》。她在北戴河的时候，经常找林杉和我讲述她过去的生活动，也就是未来小说的背景。林杉也是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的编剧，他正在结构一部战争影片，那就是后来由沙蒙执导的《上甘岭》，影片描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的一个战役。林杉是上海人，抗战初期加入中共，在地下活动中被捕，关押在苏州军人反省院403室。出狱后改名为施林杉

(施林杉谐音 403)，奔赴延安。在发表作品时署名林杉。林杉羸弱矮小，高度近视，瘦骨嶙峋。但极为善良，内向，言语不多。显示出的是一副深沉而且“党性很强”的外貌，很为各级领导人所赏识。杨沫讲的故事中有许多她们家庭的趣闻，特别是她和她的胞妹——电影明星白杨的经历。我记得她讲到幼小的姐妹俩曾经随父亲到热河收租的情形，长期的干旱，使得农民无租可交。地主们动用军警镇压，私设公堂，严刑拷打，甚至打死勿论。后来她们的父亲求财乏术，在北京经营了一所大学，由于课堂简陋，师资缺乏必要的学养，报考的学生很少而关闭。一个夏日的中午，他从街上回来，妻子女儿发现他的头上不住往下流黑水，感到非常奇怪。揭开他的帽子一看，原来他在两鬓飞雪的头上涂了黑墨，正在和着汗水往下流。在妻子追问之下，他才啼笑皆非地承认办学亏空，捉襟见肘，存款已经所剩无几。正当穷极无聊之际，在报上看见一则富孀的征婚启示。于是他就研墨抹黑了自己的头发前去应征，结果遭到那位富孀的好一顿耻笑和羞辱。在“12·9”学生运动的大潮涌动下，杨沫带着幼小的白杨参加了戏剧演出。不想，父亲坚决制止，杨沫和白杨却大胆抗命。父亲以拐骗罪向法院控告了杨沫和白杨的同仁。杨沫和白杨与父亲对簿公堂，最后被告胜诉。从此杨氏二姐妹遂与乃父断绝关系。姐姐在华北投身共产党的军队，妹妹在上海进入电影界，一举成名。杨沫在向我和林杉谈到，她在以自己的经历结构小说的时候，曾经有很多顾

虑。比如：如何处理党和个人的关系？如何描写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作用？能不能以知识分子作为书中的主要人物？如何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因为毛泽东把知识分子定为终生被改造的对象（当然不包括他自己），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妥当就难以出版，甚至要挨批判。林杉给她提了很多建议，而且鼓励她先写出来再说。我认为林杉的支持，对于没有处理过这样一段生活的杨沫来说，至为关键。杨沫刻苦劳作了四年，一经发表，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五十年代的读者比现在的少男少女还要天真烂漫，对杨沫那一代人经历过的战斗生活艳羡不已，个个都后悔没有在那个时代投身革命。林道静成了中国女青年的偶像，扮演林道静的女演员谢芳也成熠熠生辉的明星。杰出的话剧演员于是之扮演的余永泽，成为可憎可耻的右翼知识分子的典型。1958年，我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时候，杨沫还给我寄了一本《青春之歌》，而且在扉页上写了充满友情的话。大概她对于我居然成了右派也有不能理解之处吧！以至于在给我赠书这件细微末节上和党稍稍有了一点点距离。

沈默君是一个很聪明的茶商的儿子，小时候经常跟随父亲的茶叶船从故乡皖南到南京、上海，是一个见过市面的孩子，没有读过多少书。抗战时期在故乡参加新四军，那时会吹口琴就算是个文艺人才了。他比别的乡下人看的戏多，照猫画虎，为新四军的剧团写宣传抗战的剧本。后来在战斗中被伪军俘虏，伪军也让他为伪军剧团写剿共的剧本。他除了

因为恐惧而屈从之外，也为了省事，把在新四军写过的剧本加以改造，把抗战的内容改为皇协军剿共的内容，只需把正反两派人物掉个个儿就可以交卷了。这说明他在当时就懂得“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这条许多艺术家一生坎坷都没能弄明白的“原则”。不久新四军打过来，他又回到新四军，继续革命，这一切他没有隐瞒。全国解放以后，解放军进驻上海，他被分配在接管电影院的工作组里。上海的电影院滞留了很多美国好莱坞影片和国产影片，他正好利用职权日日夜夜地“审片”，有些影片还反反复复地“审”。别人的目的是机会难得，趁机偷窥西方人五彩缤纷的生活；他的目的则是为了搞懂电影的秘密。他有一个很正确的想法，就是：一旦学会了电影的艺术技巧，不是也可把革命的内容装进去吗？资产阶级的东西不是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吗！地方政府成立以后，接管工作就移交给政府的职能机构了。沈默君又自报奋勇，以演员的身份，主动参加了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个摄制组，那部关于海军的影片很不成功，他的表演也很拙劣。但他是为了编写电影剧本而进入摄制组的第一人，他的目的达到了，实践使他完全弄懂了“西洋镜”的奥秘。很快编写了一部反映毛泽东在运动战中的伟大战略思想的电影剧本《南征北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开创了以电影的形式完美歌颂伟大领袖战略思想的先河。在剧本修改过程中，得到过陈毅元帅的指示；影片完成之后，果然获得党的高度

赞扬。他被请到北戴河来，是电影局请他再创作一部军事斗争的影片。这部电影是表现1949年春天渡江战役前，一小队侦察兵潜入江南，和江南游击队秘密接触，为大军渡江提供情报。沈默君为了简便，把当初率领侦察兵小分队潜入江南的那位侦察参谋也请到北戴河。除了让他提供事实经过之外，还要对编剧虚构的情节和细节逐一进行探讨，以求真实。剧本写成以后，由汤晓丹执导、孙道临主演拍成电影，颇受赞扬。文革结束，沈默君曾经屡试不爽的创作方法终于失效了，只好放弃了写作。即使是邓小平到了1979年也认识到“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从属于政治的文艺只能是一时一地的宣传品。他在全中国第四次文代大会上提出了这个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新奇的观点。这个讲稿虽然是由胡乔木起草，邓小平在会上讲了，至少说明邓小平是首肯了的。尽管后来全国在文艺审查中从未实行过，但是，这是一个很正确的观点。

一座夏日别墅，住了几个作家，各人写各人的作品，而且有很可口的膳食。这显然是从苏联学来的，斯大林对待某些有用和驯服的作家十分慷慨。他赐给高尔基的住宅是莫斯科无人不知的著名的豪邸，苏维埃政权没收的贵族产业，扶梯是用整块大理石雕刻成的波浪。回忆在北戴河别墅那段生活，我不能不提到我们的厨师老张头，他虽然已经年届七旬，幼年、青年和中年时期的岁月都消耗在法国人的洋船上了，晚年精力仍然十分旺盛。每天晚上，每一位作家都要写

出次日早、中、晚餐的菜单，由老张头去准备。早上，他骑车带来蔬菜、肉类和禽蛋（那是即将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前夕）。七点半，所有人的早餐都有条不紊地摆在餐桌上。在他清洗餐具的时候，他十岁的小孙子骑着自行车来了，问爷爷还需不需要再采购什么东西。孙子走后，老张头就靠在厨房门口的靠椅上打盹儿。一直到十一点，他才开始工作。你从刀在砧板上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的刀工有多么高明！仅仅一个小时，饭、菜、汤就都齐了！而且色、香、味俱佳。我不止一次地听林杉、杨沫和萧乾商议，想把老张头请到北京，做他们的厨师。言语间似乎也有顾虑，怕党组织有意见。听说，当时北京已经有几个买房子、请厨子的作家艺术家了，不过，大都是党外人氏。夏天过去，秋天到来，作家们一个个先后离去，也没有一个人斗胆把老张头带到北京。

1955年春天，虽然中共高层出现了一个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文艺工作者依然感觉不到气候有什么异样。到了5月3日——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泽东给这些材料写了序言和编者按语。在全国范围之内声讨并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至此，毛泽东把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的思想当做资产阶级思想——亦即敌对思想看待之后，又把知识分子直截了当地当做了敌人。于改造知识分子的同时，在党内外确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结果，不折不扣地做

到了。胡风就是那只被杀掉用以警诫猴群的鸡。许多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暂时被“压服”了，更多的知识分子自愿改造成没有知识、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思考、盲目的“驯服工具”。当然，毛泽东曾经多次庄重地提出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在他的领导下终其一生都严格地执行的是“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只要你稍稍相信毛泽东的许诺和倡导，放一下，鸣一声；你就会落入万劫不复的陷阱。

事情要从后来往前倒叙。1979年11月中旬，我在北京参加第四次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解放军文艺》编辑部转给了我一封从成都寄来的信。信比较厚，信封却很小。字迹流利，但很陌生。地址下面写着“张寄”，在“张寄”之后又加了一个括弧，括弧里是“即胡寄”三个字。我在记忆里搜索了很久都不得要领，我在成都生活过，可从来都没有姓张或姓胡的熟人。也许是一位读者的来信？我从左侧小心翼翼地拆信。第一页开头出现的是：“白桦老弟”四个字，落款是“胡风11月，14日，1979年。在成都。”啊！原来是他！一时间，百感交集。他怎么会在成都呢？这四分之一世纪，他是怎么挨过来的呢？一切都恍若隔世！这么多年，只听说他在押，除此之外，几乎没听到过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在我们这个国度，一个人的消失或死亡真的会那么容易吗！今天，这封信用一行行整齐的钢笔行书小字回答了我：胡风还活着，而且他对往事的记忆依然清晰，甚至还不乏锋利和幽默感。提到一些在文化领域里担任过领导职务的

作家们，丝毫不掩饰他的挖苦和讥讽。他在信上告诉我，文革结束以后的短短两年间一直都在“不停地写”，已经写了“百来万字”。信只有一页，注释比正文长出了一倍。看来，胡风是在1979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我在文代大会上的发言《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次日给我写的。他在信中说“你为你的、也是我（们）的母亲做了一件……庄严而真诚的事”。其实，《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只是一篇肺腑之言。我在发言中说：“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文艺创作才能出现今天这样正视现实的局面，第四届文代大会才能召开，许多老同志才能活着在这里团聚。正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在醒悟，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才有希望，文学才有希望。”“作家、艺术家的使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何违反历史前进规律的人给文艺施加压力，使之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最终是要失败的。我们不要忽视人类历史上这个极罕见的现象，研究它们的发生与发展，以及他们毛骨悚然的成功和悲惨的失败。人类历史中没有任何职业像艺术家这样注定要接受历史的荣誉审判。林彪、‘四人帮’和他们那个‘顾问’都曾经凌驾于中国艺术家之上作恶多端。还有一些‘四人帮’的御用理论家和爪牙们不是不论大小都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了吗！新中国短短三十年的文艺史，沧海桑田，沉浮变幻，可资接受的教训很多。中国的艺术家还是有几根硬骨头的，一大批艺术家被一些‘左’派理论棍子打倒在地，埋葬在泥土里二十多年不是又复活了嘛！又

开始发芽、开花并准备结果了嘛！……历史不会埋没李白、杜甫、司马迁，但历史最终埋没了和李白、杜甫、司马迁同时代的显赫一时、逆潮流而动的权贵！今天许多不能拿笔写作的作家不是没有被消灭掉吗？那些‘金棍子’不是一根一根都变成了麻杆儿了吗？三十年的文艺评论有几篇不加修改今天还能印发给我们一读的呢？”我还在讲话里严厉抨击了长期以来的造神运动。我说：“今年年初，我在全国诗歌座谈会上讲过：‘诗人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要再去歌颂救世主！’今天我重申，我仍然这样看。理由很简单：‘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这句《国际歌》里的歌词是无数先烈临刑前唱的，先烈们告诫我们‘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就没有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去歌颂呢？有些装着虔诚之极的信徒们，非要说世界上有救世主这种东西不可，并且把救世主和革命领袖的概念联系起来。甚至等同起来，用以吓人。当张志新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者已经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心灵中复活了的时候，那种造神杀人的残酷游戏可以收场了！”我所以再一次强调不要歌唱救世主，是因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黄克诚将军不止一次的在大庭广众的场合批评我，甚至理直气壮地反诘说：“如果毛主席不能算救世主，那么，共产党可不可以算是救世主呢！”这显然也是错误的，从他这个错误认识里可以看到，许多“老革命”就是这样把领袖和党潜移默化地尊奉为神和宗教的。黄克诚大将在战争中，立下过功勋。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毛

泽东朱笔一挥划到彭德怀元帅的“军事俱乐部”里，遭受很多的冷遇、误解和惩罚。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彭德怀元帅置于死地，送了性命。文革后，当无神论者黄克诚将军听到有人非神的时候还是非常愤怒。他愤怒，因为他和他们那一代人，都自以为他们长期以来是借助神的光环才有如此的显赫与辉煌的。而且在他的观念里，非神和非毛之间是一个等号。我在讲话里还谈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那就是“安全问题”。我说：“当我十几岁的时候，从特务暗探横行的白区走出来，参了军，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我觉得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里，安全极了。行军打仗我天天记日记，剖析自己的思想，记载我所感兴趣的一切。到了五十年代后期，一切文字都变成解释不清的罪状，最天真无邪的话都变成最阴险的反党言论。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了。”特别是我为今后忧虑。我说：“现在仍然不能说文艺家已经到了比较安全的时候了，不是还有人著文、投书、讲话，要把某人关起来，给某人戴上帽子吗？”这次讲话发表后，胡耀邦让人转告我，他对我的大部分观点都表示认可，只是觉得其中第三部分谈到知识分子的安全问题是多余的担心，“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嘛”！我当然理解他的善良用心，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并非多虑，而是他过于大意了。仅仅一年，《苦恋》（即《太阳和人》）摄制完成，在文化部送审期间，引起轩然大波。1981年1月10日晚，我登门求见胡耀邦，惟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他可能考虑到方方面

面的情况，拒绝了我的请求。他告诉我：“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我们家里人看过这部电影的就是两派。我的儿子是赞同你们的，我的秘书就不赞同。”这次见面还是在那间小客厅里，比上次多了一个电视机和一张藤椅。他说：“希望你们的电影能够通过，然后也能在电视上放，我会坐在这张藤椅上看。”后来，这部电影一直没有通过。真的很遗憾，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都卷入了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事件，和共和国的主人——所有的普通人民一样，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主席也没看过这部影片。春节后一个日本有影响的报纸发出一则消息，题目是：“批《苦恋》意在阻挠胡耀邦出任党主席。”是海外传媒经常把中国的文艺和政治扯在一起呢？还是中国的文艺本来就和政治分不开呢？《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把这个简单的外电编发为《内参》，仅仅印了一份，送呈胡耀邦，显而易见，是为了提醒他注意，这件事的实质是什么。据另一份外电报道：中国不少有地位的人氏愤怒要求严惩剧本作者，重新戴上右派的帽子，押送还乡，劳动改造。个别人的主张尤为极端。一位掌握重兵的将军表示：如果有上方宝剑，我可以把作者枪毙。有些人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把胡耀邦说成“炮制反动电影《苦恋》的黑后台。”这样一来，一部再现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电影的问题就上升为政治问题了，中国人立即敏感地联想到《清宫秘史》、

《海瑞罢官》。许许多多的工人、农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地给我来信、来电表示声援。中国知识分子凭借历史的经验，完全能嗅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了。拍案而起者有之，投书抗辩者有之，从此躺倒者有之……已故的中央高级党校秘书长宋振庭，在当时打电话告诉我：尽管沸沸扬扬，耀邦在你这个问题上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了那些左派同志，重申他一贯的主张：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加罪予知识分子了！更不能发动一次政治运动。胡耀邦阻止了一场落在知识分子头上的巨大灾难。但他自己又将如何呢？众所周知，1987年元旦刚过，胡耀邦就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让人感到既突然而又意外，为什么？他的过错里就有：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1989年4月15日，众所周知，胡耀邦再次“突发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与世长辞。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认为他是一位从打土豪、分田地愤而冲出土屋草舍，走向漫漫两万五千里烽火长征路的那一代先驱者中、最不墨守成规的一位杰出人物。他的杰出还表现在他在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比较少，中国的农民运动，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始终都没有彻底摆脱对知识分子的偏见，让人困惑不解的是：中共大多数领导人都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在长征前自己的困厄时期，对中共中央执行的“左”倾政策，十分清晰。抗战时期有一段从实用的角度，的确注意到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建国以后又重蹈覆辙，任意践踏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

识和尊严，乃至生命。从后果来看，比王明、张国焘等有过之而无不及。胡耀邦却不同，文革以后，他对历史的教训有过深沉的思考，和知识分子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友谊交往。他不仅了解知识分子的苦难，也了解知识分子的心迹。冰心老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还是那句话：他是伟人，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我是说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才七十三岁，却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为我们说了不少好话，干了不少实事，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静地去了，虽说早了些，毕竟摆脱了痛苦。”她的话我很有同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同感。传说，在文革后期，当一位老知识分子坦率地问胡耀邦：您能够举出1949年以后针对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政治运动，有哪一次不需要平反改正的吗？面对这一难题，胡耀邦理所当然地很难接受，他首先是惊愕，然后是愤怒，甚至自然而然地对提问者的动机产生怀疑；但经过一番理性的思考以后，又不得不接受，并冷静下来，代替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共产党，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刻反省。所以，当他在中国失望的荒原上播种着希望的时候，首先向知识分子伸出了坦率、热诚的手。在我们需要从他那里得到更多希望的时候，他精疲力竭地躺倒了！他在去世前不久，向一些电影工作人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的困难很多，许多事在近期、甚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都不能如愿以偿。谁让你我生活在这个时代呢！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承担这个时代的苦难和使命，责无旁贷。”他没

有虚伪的承诺，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坦白地说出实情。那时的胡耀邦可以算得上是身居高位的人了吧！身居高位而能实实在在地思考、诚诚恳恳地说话并踏踏实实地行动，的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以上是一段和主要内容相关的插话。请允许我再把话题回到胡风的来信上，胡风随信给我寄来1961年他“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写给我的九首五言旧体诗。注释的最后一条是：“不必想到不回信不合常情。辞不达意，不如完全省事。如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一天，咱们也乘机重见罢，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以看得出，他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完全的获得自由，心灵已经自我解放了。——我以为，这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作家和理论家特别可贵。胡风的信使我既意外、又感动，虽然胡风暗示我不必复信，我还是想给他回一封信。当即向冯牧讲了（因为我和冯牧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在一个部队工作，多年来，许多重大问题我都要问问他。）。冯牧心有余悸地劝说我：“胡风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翻不了案。现在给他回信不仅给你找麻烦，也会给他找麻烦。何必呢？再说你的信他未必能够收得到。”历经坎坷的我完全能够体会得到：胡风此时的心情既敏感而又复杂，尽管他说不要回信，而他在心底里未尝不是热切地盼着我的复信。我如果真的不回信，他会很失望。但我还是被“何必”和“未必”四个字说服了。说明我是很软弱的，因为软弱和前车之鉴，我从不保留信件，但他的这封信和九首

诗，却一直珍藏至今。

他竟能在冷酷、寂寞的单身牢房里写出诗来，真让我佩服不已，我在这几十年的岁月里，曾经有十余年失去自由的隔离生活，但我面对看守和关闭的门窗写不了诗，一行也写不了。因此我想到他在狱中，一定有很多时间是沉浸在过往事的美好回忆之中，回顾美好的往事当然比痴痴地面对铁窗要好受得多。从信上看，和26年前初次见到的胡风相比较，他的年龄似乎并没有增长。好像比当年的胡风还要热情、天真些。大约他以为：今天思想界、文艺界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进程中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看法和他一样。看来，一个人——一个有思想的人的肉体或精神的死灭，特别是精神的死灭，并不那么容易！当我忽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甚至为多年运交“华盖”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自豪。

我和胡风的相识，是在1953年5月。一天，我接到通知，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和傅钟召见。那时的总政治部办公楼设在北京前门，我赶到主任办公室的时候，看见有几位地方和军队的作家已经到了，其中老作家有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中年作家有菡子、海默、胡奇、刘大为……等。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前辈，我当时刚刚进入23岁，在他们面前简直就是一个顽童。两位副主任讲话以后我才知道，我们到会的人就是一个由中国作家协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到东北和朝鲜访问从38°线那一面交换回来的中国战俘，然后写文章向全世界揭露美

帝国主义、南韩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相勾结，残酷迫害战俘的罪行。”可能是我太年轻的缘故，第一眼就觉得胡风是一个老人，一个三分沉闷、三分无奈、三分忧郁的老人，不可捉摸的那一分当然装不下城府，好像是愤懑。

出发以后，只在沈阳稍事停留就到了濒临黑龙江边的大赉县，到大赉的时候，田野里的积雪还没有融化。那里原有的一个野战医院改为一个战俘集中营地，被交换回来的战俘将在这个营地里接受政审和体检。当时的大赉城像是一座寂寞的大村庄。全城最大的工业是一座罐头厂，入夜的大赉闪烁着点点微弱的电石灯，一朵灯光下是一个买猪杂碎的小贩，那些猪杂碎都是从罐头厂批发出来的边角料。当地人很少有闲钱来享用这些美食，所以非常便宜。作家访问团的到来，使得这一行业的营业额大增。每晚，我都要和这些老前辈们在一起，咬着猪尾巴饮酒。在作家访问团里，年龄最大的是胡风先生，我隐隐约约地觉察到他头脑里装着许许多多说不出的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反而特别喜欢拉着海默、刘大为和胡风在一起喝一杯。我发现胡风也有鲜为人知的一面，例如，我们曾给一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偷偷起了一个绰号，叫鹭鸶。胡风先生微微笑着说：“在鹭鸶中间加了一个‘依’字，鹭依鸶，这么一改，不是很像一个外国女士的名字了吗？”事后想起来，我才意识到，他和我们在一起除了说笑，什么正经话（譬如文学）都没有交谈过。而那一短暂相处，对于他，几乎是最后的轻松而快乐时光了。当时，

我无论如何也不知道他内心的痛苦有多么深重！一个刚刚进入文学界的新兵，来自还在进行局部战争的云南边境。在边境上，能读到一个月前的报刊，算是很快的了，而且经常读不到报刊。那时候可以携带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没出世。不仅对历史上文艺论争中的是是非非和人际关系一概不知。也不知道1952年5月25日《长江日报》发表过一篇舒芜的文章《从头学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检讨他自己1944年写的《论主观》一文的错误。至于《论主观》的内容和它的前因后果，我更不清楚，后来经《人民日报》转载并加编者按也没读过。甚至半年前（1952年12月）全国文协召开“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样的大事我都不知道。1953年的《文艺报》在第二和第三号分别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批判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我既没读过，也不知道其中埋藏的杀机，可见当时顶着一团“边防战士”光环的我，实实在在是一个懵懂人。我因为要给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修改剧本，在大费的时间很短，提前就匆匆返京了。到了夏天，听说胡风终于在北京地安门有了一个住处，平房，单门独院。我约了空军的刘大为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一次，在他家吃了一餐简单的午饭。正如他在诗中提到的，吃的是红米饭。同席的还有他的得意门生路翎。为此，在1955年夏天的“肃反运动”中，交待了几十次都没法交待清楚。加上1954年春天，我访问滇西北，途经大理，给胡风、罗烽

等几位老作家每人寄了一块天然大理石砚台，大理石砚台没有实用价值，只是一个纪念品而已。没想到这块砚台在“反胡风运动”中成了压在我身心上的一座大山。1997年春天，在四川见到梅志大姐，才知道：那块砚台居然还完整无缺的留在他们的家里。它从纪念品变成阴谋勾结的可疑物证以后，走过漫长岁月的黑暗隧道，终于又恢复了它本来的属性。胡风在1979年的信里写道：“相处太短，我感觉迟钝，吟时竟然觉得是真在怀念了你。第九首也就等于委屈了你。你当记得鲁迅说过：听到我认识的人去革命，我是高兴的；但听到我熟识的人去革命，我是有点耽心的。真的，我没想到过是你。但也请你原谅我，我在想到你的时候写下了‘梅放三冬后，菊开十月前’的。现在我只希望我应的‘景’是前一句而不是后一句。”我读到他引用的鲁迅先生的话，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寒颤。他说的“梅放”、“菊开”是第八首的最后两句。第九首里有“路有前车迹，怀君善入时。”的担心和劝告。在单身牢房里，胡风当然不可能知道，早在1957年，白桦就因为未曾顾及前车之鉴，不“善入时”，被胡风不幸而言中，头顶上被扣上了其重千钧的右派帽子。1961年胡风在单身牢房里给我写诗的时候，我已经在工厂里劳动改造了三年。在1979年看到这组诗，有点隐隐的后怕，不知道胡风在狱中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些诗保存下来的？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发现，仅仅为了这组诗（即使是无标题），也能把我当做漏网的胡风份子打死勿论。

也许是当时连狱警们都没想到胡风能活着重见天日，写的东西再多、再“恶毒”，也毫无意义而没有搜查。为了叙事的方便，将他寄给我的诗抄录如下：

怀白桦胡风

——原为《怀春曲》中“协奏曲”（后集）第九曲，无标题。吟成于1961年间，在公安部独身房（看守所），时已独“乐”天年矣。

1

惯惜初青果，难忘战士衣。
倦鸿归故泽，伤马返边陲；
同业如同道，共行不共归；
年青能善感，握别意依依。

2

善感方多感，从文更重情。
乡园能变化，道路应清明；
为爱旌旗美，当求铁火诚；
伸腰张笑眼，含语进兵营。

3

求诚求入众，边地见山民。
土吐荆榛色，衣沾血火痕；
善颜流汗泪，疑眼看风云；
见义胸如醉，惊尝手足情。

4

千年承迫害，边地久凄凉。
石草荒山瘦，刀锄热汗忙。
辛劳虽智短，朴实又情长；
信义心无隔，声诚意不藏。

5

情苏催意得，新笔发新声。
路醒门窗醒，人亲口眼亲；
欢舞群脚转，铃响马蹄奔；
苦也终春到，花红叶叶青。

6

花红人更好，合步结同心。
待测高天阔，休疑广土深；
门窗憎黑夜，口眼乐青春；

举首朝阳下，光明色色新。

7

文市如花市，花开手定忙。
柳枝辞沃土，入室别温阳；
水涸莲难赤，尘蒙菊不黄；
色香三日尽，懒眼竟如忘。

8

南疆游子路，北国故人颜。
白石方方整，红粮粒粒圆；^①
怀诚能有笑，解惑竟无言。
梅放三冬后，菊开十月前。

9

年青心向上，夜里脚朝低。
见伪心难服，逢诚意不疑；
求诚定合掌，嫉伪枉疑眉。
路有前车迹，怀君善入时。

回想 1955 年，别人看到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

① 白石指的就是那块砚台。

团 三批材料的编者按》的感觉如何，我不知道；但它对我的震撼，空前强烈。我对照那些“材料”，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泽东的按语，不知不觉周身冷汗淋漓。明眼人一看便知，那些信件和日记都是指令胡风和他的朋友们交出来，或是从他们的家里查抄出来的。“编者按”里的文字，是按照对假想敌的怀疑、猜测和仇恨，虚构了一个遍及党内外、军内外、各行各业的、庞大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同时也虚构了它的纲领、组织、计划、信号、行动、情节……等等。再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加以肯定。接着动用全国的舆论工具，掀起排山倒海式的大批判。这些出自许多著名大作家之手的批判文章，只有武断的谴责，没有理性的思辩。而且似乎个个都和胡风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使我百思而不可解。从那时起，中国的人文环境就被彻底的破坏了。把本来应该有的、必要的、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立案、调查、取证、起诉、法庭辩论、宣判、上诉、复查、再次法庭辩论、再审判等等……全部省略。成百上千人的生死、荣辱，只凭一个人一时的“浮想联翩”就一锤定音了。各地的监狱和劳改队只凭“胡风份子”四个字就照单全受。今天，我坦白交待：在当时我就对事实的真实性，处理这一事件的方式的合法性（虽然无法可依），以及在道义上能否站得住脚？等等……都产生过怀疑。但对我自己的怀疑，即使在梦中我都会咬紧牙关，守口如瓶，没向任何人透露过，所以怀疑得十分痛苦。因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谁怀疑毛泽东就等于怀

疑自己和宇宙的存在。我暗暗庆幸自己只给胡风写过一封信，而且没有涉及任何人与事，仅仅是问候而已。如果我在信中把“鹭依鹭”的戏言再重复一遍，纵然浑身是口，也无法说得情楚。弄不好，那位身材修长的女记者和我都成了胡风份子。于是，我不仅下狠心毁掉了从战争年代就开始记的日记本和所有采访记录本。而且再也不记日记、不记笔记、不保留信件了。非写不可的信件也都像电报一样简练。一个作家，不记笔记，不记日记……意味着什么？但，文字太危险了！自己的一只笔，比任何自杀工具和剧毒药物都要危险。非常不幸！后来几十年的生活证实，我的决定是正确的。试想，几十年的日记，给审查你的人能提供多少个人物关系，多少个可疑的线索，晦涩的词句和连自己也记不清的“反动隐语”啊！仅一本记录贺龙口述材料的笔记本，在文革中，就能够置我于死地了！多年以后，我还在庆幸：我的一生竟然还有过一次先见之明。

就在1955年春季、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总政治部电影处的放映室看到贺龙元帅。他带着儿女来看美国旧电影《翠堤春晓》，电影处长虞棘坐在他的旁边。

（在这里允许我说明一下我和贺龙的关系。1952年一个初夏的下午，我作为一个22岁的边防军基层军官，在红河营房里，接到组织部门的通知：西南军区调我去贺龙司令员身边工作，即日启程，到重庆西南军区报到。这项命令不仅使我感到不安，连师和军、以及军区的领导人都感到诧异。

既然是命令就必须执行，于是我很快就从红河边境出发，乘汽车取道以险恶著称的滇黔公路先到贵阳，再从贵阳入川，蜀道真难！沿途住的都是“鸡鸣早看天”的旅店。一个星期才到达重庆。到了西南军区以后我才知道：我的任务是生活在贺老总的身边，在他空闲的时候，倾听他讲述前半生的战斗经历，作为写作素材。因为很多他的部下觉得他年事已高，而且血压偏高。当时，我既兴奋而又感到负担沉重。无疑，对于我，这是一个艰难的美差。贺龙司令员目前正在成都，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为四川东、南、西、北四个行政区的合并而召开的高层会议。我必须去成都贺龙司令员的寓所报到。那时成渝铁路刚刚通车才几天，我可以不用搭汽车了，第二天我就乘上了去成都的快车。我在火车上彻夜失眠，一直都处于忐忑不安之中。当我跨进四川成都东二巷贺龙元帅临时寓所的大门以后，就被侍卫引向花园右方的一间中式大厅。在秘书看介绍信的时候，他笑容满面地突然从里间走出来。只一瞬，我就不紧张了。他看见一个很年轻的军人向他敬了一个军礼，叫了一声：“老总！”他走到我的面前，先向我伸出手。他比我想象中的贺龙年轻得多，温和得多，儒雅得多，亲切得多。好像我不是第一次谒见他，似乎和他见过多次面。您幽默、自信、快活、幸福而特别富于人情味。说实话，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和悲剧会有什么联系。他先问我：“你是哪里人啊？”“河南信阳。”他立即大声说：“啊！我晓得！在武胜关以北，驻马店以南。”他看出了我

脸上的惊奇，笑得更欢快了。我想，他一定在某一个时期，率领部队行军打仗，到过我们那一带。“住下！住下再讲。吃饭了没有？没吃饭先吃饭。”我被安排在一座西式楼房的楼上一间房子里，后来我发现，那间房子正好在他和夫人薛明卧室的顶上。此后，每当他下午不开会的时候，就和我面对面坐在他卧室窗外的走廊上，他讲，我记。湘西方言比较好懂，既接近四川话，又象鄂西话，还有些黔东话的尾音。有时在讲到激愤的时候，也会加上很强烈的手势。他用了好多个下午，向我讲述了他自己许多质朴而传奇的经历……这是一个在农民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典型的英雄人物，最后在文革中死于非命。他的悲剧充分说明：一旦从思想上交了械，不管你交给什么人，就是一个白痴，即使你曾经是百战百胜的元帅也要丧命。)

电影放完以后，我送贺龙元帅和他的儿女们出门的时候，贺龙小声以严峻的语气问我：“你是什么时候认识胡风的？”我大吃一惊。他这一问，非同小可！说明中共高层已经在内部公布了一个相当大的可疑份子名单，我的大名赫然在焉。否则，一个元帅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呢！我回答说：“前年在一起参加过一个总政和作家协会联合组织的访问团。”“啊！这么说……是工作关系？”“是的。”“啊！”他脸上的紧张表情有了缓解。“来玩啊！”“好的，老总！”从那时起，我再也没有机会和他见过面了。因为不久在京的军内作家、画家和一部分编辑就被集中在广安门外六里桥莲

花池，开始了“反胡风”运动。若干年后，我们这些过来人都把莲花池戏称为“莲大”。当时集中在那里的作家、艺术家很多，有那沙、寒风、黄宗江、林子、公刘、黄胄、魏钢焰、王宗元、李瑛、沈默君、胡奇、柯岗……等等。军队诗人胡征因为一开始就被铁定为胡风份子，已经无须“审查”，而被关进另外的地方去了。开始的时候，一些年青作家还不知厉害，自以为少小投军、纯洁无瑕而有恃无恐。参加过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中年作家，已经预感到山洪即将暴发的恐怖了，显得忧心忡忡，食欲不振。担任“学习班”领导的虞棘在做动员报告的时候，首先要求“所有人的日记、信件和武器都要主动上交。”我当时还不知厉害，甚至有些得意地回答说：“我已经不记日记，也不保留信件了。武器，只有一挺‘水机关枪’。”为此，虞棘找我非常严肃地批评了我一顿，他说：“如果组织上一定要你交出一挺水机关枪来，你怎么办？”这个“学习班”雇佣了一个相当高明的厨师，姓郎。就是这位郎师傅，给“学习班”的初期带来了不少轻松，每一个人都可以预先点自己喜欢的菜肴。他的麻辣肚块、鸡丝拉皮、东坡肉、摊黄菜、酸辣汤……都很精彩。日复一日，郎师傅发现，点菜的人渐渐少了，到了秋天，就没人点菜了。给啥吃啥，有人甚至啥都吃不进了。据我知道，有人只见过胡风一面，或写过一封信就定为胡风份子。我何止见过胡风一面，还千里迢迢寄给胡风一方砚台！实在是有一口难辩。诸如：为什么要送给胡风砚

台？砚台暗示什么？为什么去看胡风，在他家里见过什么人？有什么密谋？吃过饭没有？吃过，为什么？没吃，为什么？见到过路翎吗？见到过。路翎对你说了什么话？就像在集体创作一部《一千零一夜》那样的书一样，一个故事引发出十个故事，一个悬念引发出十个悬念，一个问题引发出十个问题……后来莲花池的运动从“反胡风”渐渐过渡为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运动”。试想：把一群知识分子集中在一个人人自危的空间，不同的阶段，给予不同人以不同程度的信任和充分的时间，让你们大胆怀疑，相互揭发，立功自保。大部分人，既是审判员、看守，同时不知道哪一天又会变成囚犯。今天是审判员、看守，明天可能就是囚犯。于是，就有了互相撕咬，轮番逼供。众人在被审查者主动上交的日记里，按照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所加按语的方法，挖空心思去寻找破绽，罗织罪名。每天除了吃饭，就是“围猎”。有一位年轻编辑，东北人，记有大量的日记。从日军占领的满洲国时期到光复，从光复到解放战争，从解放战争至今，洋洋大观。而且他精通日文，他所阅读的《托尔斯泰全集》就是日文版。这么一个人，他自己昨天的一言一行都成了他自己今天难以逾越的关隘。好像他就是满洲国惟一的继承人，满洲国的一切罪孽都要由他来承担似的，被整得死去活来。诗人公刘因为童年时期流亡赣南，被当时的国民党赣南行署专员蒋经国的一位部下视为神童，带他到新兵团作过演讲。随着“围猎”者丰富的想象，

他就成了这一官员的干儿子，进而又“提升”为蒋经国的干儿子。日夜轮番突审，逼得他两次自杀未遂。当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时候，只好顺应某些人急切的立功愿望，编造了一个以他自己为主角的美蒋特工从香港潜入大陆的故事。无独有偶，一位“围猎”的参加者（小说家）很快根据公刘的“原作”写了一篇小说，迅速在刊物上发表了。黄胄在抗战时期师从画家赵望云，赵望云为了一份粮饷，依附国军，挂了个校官的头衔。也给为自己抱孩子、洗尿片的弟子黄胄补了个勤务兵的“空名子”。通过黄胄的“交代”，我才知道黄胄走向大师之路的起点是“勤务兵”。所幸他只挂了个“勤务兵”的名字，“审查”的时间不长。到了秋天，在我们被严密禁闭的时日里，他已经被允许租赁一头毛驴，拴在我们的窗外，进行水墨毛驴的基础练习了。而宿命的结局是：几年后，从黄胄笔下奔出数千头生动活泼的水墨毛驴，遍及全国、乃至全世界。又过了几年，在文革中，黄胄戴着一顶“驴贩子”的帽子，被送往他熟悉的大西北，迫令他跪在流放地的水泥操场上画驴——那是悲剧的下集。和我关在一间房子里的有诗人李瑛，小说家林予等。李瑛的罪状是：四十年代下半页，在从事学生运动时，与胡风集团中的诗人绿原“关系密切”。由于严禁被审查对象交谈，不知道李瑛在想什么，只看见他每天花很多时间默默注视着一株盆花。我猜想他总也没法想通的一个问题一定是：盆花的叶、茎、花的轮廓、色彩都是那么清晰，为什么自己高唱着

革命的赞歌走过的画卷一般美好的风景，会从本来的正片变成了负片——也就是黑白颠倒了呢？林予的罪状仅仅是：他曾经在日记里写过这样八个字：“难忘的1952年！”因为在1952年，他那出任过国民党县长的父亲死于狱中，小时候在生活中和他用英语会话的母亲也死于癌症。林予极为善良，也极为怯弱，日记是他自己上交的，从进入莲花池的第一天开始，他就像一只被火烧光了羽毛的小鸟那样，只知道颤栗。我相信他在日记里写的那句话，仅仅是出于亲情。因为他从不讳言父母对他的挚爱。即使是招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有仇恨心理”，也还是被隔离了十个月之久。近年，林予与黄胄已先后去世。我们这一代人，本来就没有青春，童年紧接着暮年；所以对死神的不期而至，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由于鼓励大胆怀疑，一位革命了不少年头的作家竟然会神秘地提出：南京金陵女大在解放前就是一个为国民党代训女特务的学校，许多金陵女大的学生都在五十年代初下嫁解放军，打入解放军。而且列了一个长长的嫌疑人名单，名单中还有不少战功显赫的将军。由于这个检举涉及的大人物太多，逐级上报以后没有下文。这位大胆怀疑者的收获就是自己不再被怀疑，而且一直作为有权怀疑和审查别人的积极份子。

开始审查我是从我和胡风的关系入手的，渐渐转入对我短暂而有过多“进步”活动的历史的审查，对我开始了

长达八个月的“隔离”。那时的所谓“隔离”，比起今天刑法意义上的监禁要严酷得多，不许往外写信，不许往外打电话，甚至没有放风的时间。外地有人写材料揭发：在我的家乡，当年和我发生关系的中共地下支部是“红旗支部”，所谓“红旗支部”就是敌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假共产党支部。我当时就想到：全国各地肯定到处都有和莲花池同样的地方，同样的逼供信……这是我第一次“怀质抱情，独无匹兮”^①的体验，感到特别委屈而难以接受。这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热烈追求革命得到的回报么？那年夏天，每一个夜晚我都面对着扑灯的飞蛾发呆。莲花池近在咫尺的一片芦苇荡，时时刻刻都在诱惑着我，我设计过一个一了百了的归宿：打算在去饭厅或上厕所的路上，突然逃脱，溜进茫茫苇荡，切开手腕上的动脉，让鲜血静静地还给泥土，结束25岁的生命。每当想到我已经有了这一块永远回避人寰、了结此身的乐土的时候，就欣喜不已。这个想法我只悄悄告诉过林予……。谁知道，我写好的遗书被胡奇发现，一场更加无情的羞辱和残酷的批斗之后，“业余看守”们对我的看管更加严厉了。一转眼，苇丛茂密的夏天就匆匆过去了，万木凋零的秋天接踵而至，苇荡里一览无余，使得我因错过机会而惆怅不已。1956年春节到来之前才宣布对我的“审查”告一段落，终于离开大雪纷飞的莲花池。在和平门内的未英胡同

^① 屈原：《怀沙》。

总政电影处楼上一间房子里，孤独地度过了1956年的春节。买了很多爆竹，和邻居们的孩子在胡同口的雪地上燃放。那是经过一场角斗士式的血腥格斗之后的困倦，我时时会想起一个粤南人招待蓟北人吃猴的故事：

一个来自蓟北的燕赵男儿在岭南想尝试着吃一次猴脑。历代居住岭南的主人说：“吃猴需要胆量，特别在选猴的时候。”蓟北好汉哈哈大笑：“你没听说过燕赵多壮士吗？虎豹豺狼都不在话下，猴儿算什么？放心，在猴儿面前，我绝不亚于您。”“但愿如此！”于是，他们走进猴脑专卖店，匾额上写着“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似乎在暗示：猴儿在此一游就玩完儿了。店老板循常例把他们带到猴笼前，请贵客自选一只中意的猴儿。蓟北好汉向猴笼看去，只见群猴鸦雀无声，一双双乞怜、恐惧的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蓟北好汉向前走了两步，那些猴儿们整齐地合起掌来，开始不停地向来人作揖。蓟北好汉忽然怯阵了，往后倒退了两步。岭南主人连忙跟过来，伸出一根手指顶住蓟北好汉的脊梁骨，并用力向前推，店主人说：“请客馆自选！肥瘦随意。”笼中的猴儿们实在是可怜之至，但最可怜的还是蓟北好汉。他连眼睛都不敢睁开，伸出一只手指，胡乱一指。猴儿们立即一起吱哇乱叫着抓住一只被指定的猴儿，拼命往笼门外推。那只不幸被选定的猴儿流着眼泪，像叩头似的用头撞着铁笼子。店主人开了锁，把它抓住，所有的猴儿争先恐后地向后退，惟恐把自己暴露在前面。蓟北好汉再也不敢夸口了，当

店小二把剃光了的猴头卡在特制的桌子当中，用小铁锤敲破了天灵盖的时候，猴儿尖声大叫。主人微笑着给蓟北好汉斟酒，而蓟北好汉面对不停蠕动的脑浆突然昏倒，倒地不省人事。根据我自己在猴群中的经验，平时和你最要好的猴儿，在把你推向屠刀的时候最使劲儿。

两年后的反右运动就是以“反胡风”运动为样板进行的，只要一句话，一行文字，（在上海按柯庆施的标准：只要一个眼神，一声冷笑……）就够了。而且，定案的权力从“反胡风运动时期”的毛泽东，下放到每一个基层的党委书记。1957年6月6日至9月16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马拉松式的党组扩大会议，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我记得我的座位在蓝翎的旁边，我们这些年轻作家只是看着、听着这场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的“围猎”。一批又一批大师级的作家争先恐后地上台声讨“丁、陈”和被指定的同党（其中包括冯雪峰、艾青等……），态度之粗暴，言辞之激烈，实在是出人意料。有人甚至语无伦次，摩拳擦掌，几至动武。他们是出于“义愤”？“私愤”？还是在恐惧威胁下神经质地“表演”？他们曾经是读者心中的偶像，社会的良心，此时竟然会扭曲变形得不敢相认！为此，我感到深深的羞愧。在那个热闹而恐怖的会上，脑海中时时会闪现岭南人吃猴的故事。再对照生活，常常使我混淆了人和猴的界线。是人性中有猴性？还是猴性中有人性呢？怪不得科学家咬定人是猴子变的。从这个故事演化过去，胡风又

是猴笼里第一只被指定要吃掉的猴。胡风被指定为第一只该吃掉的猴，在文艺界并不感到特别奇怪，因为早在鲁迅先生还健在的时候，胡风就被左翼文化界目为异己分子，甚至是“奸细”了。胡风自己也在意料之中，因为他经常以比甘和屈原自勉。去过根据地，特别是去过延安、听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艺术家们，在1957年以前，做梦都想不到他们也会步胡风的后尘。所以，丁玲、陈企霞、冯雪峰、艾青……在批斗会上都很不服贴。丁玲总想在“坦白交代”的时候，向众人说说她在延安时受到过毛泽东如何如何的重视和信任。每当她说到“那天傍晚，毛主席和我在延河边散步的时候……”立即遭到会议主持人的呵斥，斥责她亵渎领袖，斥责她混淆视听。那时的丁玲显得非常可怜，为了表白自己，她一次又一次地泪流满面，每一次都被斥之为“鳄鱼的眼泪”。其实，她想说是实情，毛泽东对她真可谓宠命优渥。1936年丁玲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中共高层领导人全部出迎。欢迎会上毛泽东填词《临江仙》相赠，每一次分配工作都要征求她本人的意见。但，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她应该明白，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北京此时此刻正在开一个批斗丁玲的大会。我们这些暂时还在充当“积极份子”的人，经常都能通过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的传达。知道他们随时都要向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汇报会议战况，毛泽东的指示是什么，邓小平的指示是什么，包括他们说话时的语气，都惟妙惟肖。例

如，在高层听取汇报的会上，当吉林省汇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主要创作人员沙蒙、吕班、郭维均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有人担心今后的电影任务很难完成。领导小组主要领导人立即批驳说：“八年抗战没有电影看，照样打败日本鬼子。”当时，很多作家艺术家都觉得这条指示很有力量、很豪迈、很坚决、很革命，而且符合实际。大会要丁玲反复交代的问题有：被捕入狱，人物关系，“反党”言行（听来听去都是对周扬等人的不满），个人情感上的隐私，以及“一本书主义”。关于“一本书主义”，我特别难以理解，丁玲只不过要青年作家写一本有影响的书，怎么成了一桩滔天大罪了呢？我曾经和丁玲有过接触，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没进过文学讲习所，还不算是她的学生。我觉得她比周扬等文艺界的领导人好接近些，也多了一些人情味。见面除了谈党性以外，还谈文学。她的确问过我们这些当过兵、打过仗的年轻作家：“你手里的枪打死过人吗”这一类的问题。作为一个作家，我完全理解她的意思，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在会上被一位作家揭发出来，竟然成了“她在教唆年轻作家杀人”！为了自保，我也写过一首批判丁玲的诗，把她形容为一棵有毒的菌子，这颗菌子荫护着一些被她招募来的年轻人。但我在心灵深处仍然同情她、喜欢她。在不能免于恐怖的日子里，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愚昧的懦夫，毫无例外地戴着面具，尽可能严密地关闭着心扉。如果说我在肃清反革命运动中，先是有恃无恐，而后是含冤负

屈，结局是“党还是英明伟大的党”。到了反右运动时，才觉得没有汲取胡风案件的沉重教训，毛泽东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所加的按语早已被我忘记得干干净净，1955年曾经使我不寒而栗。知识分子，无论你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只要对你有怀疑，你就是异己！

冯雪峰每一次的交代都是简短的，看得出他始终都不服气。对他的揭发，却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知道了他的传奇经历，他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从陕北到上海联络鲁迅和茅盾，建立上海文艺界统一战线。鲁迅先生病重之际，有些重要文章都是由他笔录的。1941年皖南事变，被捕囚于上饶集中营里……这样一位历经浩劫而幸存的老共产党员，即使会上揭发出来的事实都是真的，也只不过是：由于他对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的了解比较多，说过一些伤感、悲凉和愤懑的话。三十年代在地下和丁玲的短暂恋情，以及建国后某一天对周扬座驾扬起的烟尘吐过唾沫。这一切和他经历的艰险和功绩对照起来看，算得上是在“疯狂地反党”么？

陈企霞的态度开始的时候最为强硬，每次让他坦白交代，他都大声抗议在此之前中国作家协会对他的非法拘禁。一天，陈企霞正在声色俱厉地反驳对他的批判，突然一辆连夜从天津开来的警车将一位女作家押送到会场上，出现了一个戏极具剧性的变化。这位女作家在会上作了彻底的交代，让人大感意外的是：她交代的并非政治阴谋，而是她和陈企

霞的婚外情。歪打正着，使得陈企霞的心理防线全面崩溃，不得不“低头认罪”。虽然从方法到性质都有点荒诞，却实实在在地“轰垮了丁、陈反党集团顽固堡垒的一半”！

而艾青却采取了另一种“对抗”形式，这位大诗人，习惯了诗的思维方式，时间、地点、数字的观念极为薄弱，一遍又一遍地写检讨，都因为连自己都念不顺溜而难以通过。有一次正在照本宣科，竟然念出这样的话来：“在我生孩子的那年……”使得全场哗然，几几乎哄堂大笑。很显然，这是夫人为他捉刀而没来得及改变人称的结果。艾青后来戴着右派的“桂冠”，先后下放北大荒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长期劳动改造，由于受到农垦部长王震的特别关照，没有挨饿，也很少参加强体力劳动，文革后回到北京。重返文坛的艾青很可爱，又有了诗。我不会忘记，1979年在北京诗歌座谈会上，当我发言以后，他走过来递给我几只桔子，表示了他对我的愤慨的赞同。我不会忘记1981年春天，全国报纸、电视台、电台都在批判我写的一个电影剧本，艾青邀我到他临时居住的旅店，把海外作家们支持我而发表的一些文章（剪报）交给我。他问到我的处境，我为了简练，只向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位华中工学院的大学生执意要到我在武汉的住处来看我，我怕连累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一再婉言谢绝。但他在电话上保证：“只求一见，保证一语不发。”我只好答应他。那位青年，热泪盈眶地走进我的屋子，信守诺言，只握了握我的手，默默地在我的桌子上留下

一块用红绸裹着的東西，轉身就走。我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塊白色的岩石……說到這裡，詩人艾青情不自禁地老淚橫流。不幾天，在一個有高层领导人参加的批判大会上，同一个诗人艾青，对我的那部电影进行了义愤填膺地声讨。不久，同一个艾青，见到我，用一个小学生对小学生的语气小声说：“我骂了你，在大会上……”我笑笑说：“我听说了。”我打心眼儿里没有怪他，只是觉得他的喜、怒、哀、乐，包括他的激动、恐惧都像孩子一样随意。舒婷却把一切都归结为“艾青老了！他真的老了！”这大概就是返老还童吧！据我所知，也并非所有的老人遇事都那么随意，已故的陈寅恪和健在的巴金没有这种“返老还童”现象。

丁玲发配北大荒以后就没有联系了，大约是1979年，她在文革后回北京，举家临时栖身在北京平安里文化部招待所一个大房间里的第三天，我和冯牧去看望她，她和她的家人从神情到打扮，完全像是一户逃荒的农民。1980年在庐山开会，她的观点都还是可以接受的。到了1982年，在云南锡城个旧，我对她的观点就不能理解了。当沈从文题写的“文学林”碑石揭幕的时候，她避开了。她向文学爱好者演讲说：“你们应该知道，沈从文是不革命的，我们是革命的……”依然套用毛泽东在抗战时划定的“延安、西安”的政治界线来界定文学。轮到我演讲的时候，她一定要坐下来听。她说：“我倒要听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你。”我一再请她回去休息，她坚持要留下来。听完以后，她对我

说：“你讲得也没有什么特别嘛！”她大约以为我会放出什么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来，显得有些失望。1984年，丁玲和舒群要创办一个文学刊物《中国》，为此，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写道：“白桦同志：你现在在哪里？我们还是云南别后就没有见到了。现寄上不久前出版的一本小书，^①请批评。在云南我以为我们很可以交交心深谈的。但你没找我。我相信我们之间是没有隔阂的，但都由于种种传言，可能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将来总会消释的。希望你能寄一篇文章、小说、诗、散文、剧本、通信给我们刊物，我一定发表，你会慢慢理解这个必要。我对真正的作家，都是敞开胸怀，都是当着姊妹兄弟的。希望中国的作家们真正地团结在一起。为建设祖国而努力。祝你好！丁玲9、9日”我认为，她是诚恳的，我给《中国》寄了一篇小说。我对她的确没有“误会”，这显然是她的误会。所以我从来没有和她深谈过，是因为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人各有志，我对她很理解，但不能苟同。人，砸碎别人强加的精神桎梏，比较容易；砸碎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桎梏，却很难，因为自认为那是闪光的项链，而不觉得沉重。罗曼·罗兰曾经说过：“我恨那怯懦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应当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甜言蜜语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

^① 《丁玲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作为后辈对前辈，我和她没有任何隔阂，一如五十年代，我同情她，喜欢她。但我没有向她表达过，因为我不善于表达。她很好强，也的确是一位强者。她很强，所以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委屈。对于她，委屈比苦难对她的伤害要大得多。在晚年很想办好《中国》，团结老、中、青年作家。可惜，由于时代和她自身的局限，在她还没有把中国人的劫难以及文学的劫难的深层原因梳理清楚之前，就与世长辞了。

我的悲剧在于：每一次都在劫难逃。1957年9月中，我就不能继续参加反丁陈的那个大会了。一个让我去昆明的通知，让人意识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桂冠已经将要坠落在我的头顶上了！在我收拾行装离开创作室的时候，小说家陆柱国对正在开会的诸同仁悄声说：白桦准是重任在身，——外调。恰恰被我听见，心里一阵酸痛。事情还得从春天说起，春天，我为了写一部关于清代傜人起义的长诗，去了高黎贡山。很不巧，到了高黎贡山不久，滇西和藏东的康巴人大暴动，澜沧江迤西的县、区政府决定转移内地，我是现役军人，留在当地是极其危险的，也只好和政府一起转移回昆明。一到昆明，有些好心的朋友就把我没有看见的报纸拿给我看，报上连篇累牍地披露着全国各地的鸣放消息，有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大胆设想，但大量的鸣放内容是具体而微的工作作风，以及如何纠正党员领导干部的缺点错误等等，更多的是善良的请求。激烈的抨击很少很少。我作为一个来

自北京、曾经在云南生活过的作家，被邀请参加过省委宣传部的一次作家鸣放会议，我讲过一次话，一次人话。我只是说应该允许文艺工作者有个性，应该给予文艺工作者起码的创作条件，应该让作家协会成为作家自己的组织，而不应该是一个一般的衙门。我的发言十分温和，无论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意思。我万万没想到的是云南的反右运动开展以后，竟会缺席把我指定了一个重要的反派角色。云南省委书记、军区司令兼政委谢富志是云南名副其实的第一把手，他指令我立即到昆明接受批判。虽然我已经是总政治部的创作员而不是他的部下了，但由于他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且压倒一切的政治运动的需要，谁也不能阻拦。任何一次运动在开始的时候，一个单位的领导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取运动的旗帜，最高的领导最具有抓取旗帜的条件。也有少数例外的，那就是第二把手或第三把手抓住了第一把手的弱点（特别当第一把手在上级领导心中已经失宠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把旗帜抓了去，反手一巴掌，不仅得以自保，而且凭借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得到提升。当时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出于对自己部下的关爱，试图保护我，不让我去昆明，也不同意把我划为右派。但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却坚决支持谢富志的要求，并坚持要把我划为右派。我只是一个小上尉，当然和谭政大将没有任何个人纠葛，只是因为分工领导军队文化工作的副主任是萧华上将，总政创作室揪出的右派愈多，愈说明萧华上将的

不称职（最后，总政创作室被划为右派或中右的人几近一半）。我在景山背后萧华上将的寓所求见他，他答应为我说话，但没有结果。我不得不在深秋季节，千里迢迢，远赴昆明，接受批斗。途经武汉的那天，武汉全城都是游行的队伍，我才意识到今天是国庆节，我的情绪和那些欢欣鼓舞的人们恰恰相反。我想在中途休息两天，从车站提着皮箱徒步去投奔多年未见的大姐。这位大姐和我同父异母，极为善良，幼年时，为了孝心，听从父亲的命令，嫁给了一个富裕乡绅的继子，这个姐夫在我父亲的提携下，进入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地方军事机构中担任一名小小的参谋。抗战时期，我流亡在外，很多时间都由大姐照顾。解放后，姐夫随国民党将领张轸起义，仍然以反革命罪系狱。作为反革命家属，我的大姐先为别人当保姆，后来连当保姆的资格都没有了，只好住在她的大女儿家，为大女儿带孩子。她见到我在这样的时候来武汉，很疑惑，问我：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我没有回答她，她自己就否定了。她说：不会，你自小参加革命，也这么多年了，不会。你看我想到哪儿了！在经过南宁的时候，碰见昆明军区的一位画家，他显然提前把我当做了敌人，那陌生而敌视的目光使我不寒而栗。到昆明的第二天，就参加了全省的反右斗争大会。在这种大会上，历来不缺乏积极份子。面带幸灾乐祸的笑容积极份子们不到三分钟就吼叫起来：黄铁右派集团的急先锋白桦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我站起来了，面对着形形色色的目光。我意识到我

在他们的眼睛里，已经进入他们事先给我派定的角色，我想笑。积极份子们立即大声叫道：你还笑！什么态度！低下你的狗头。虽然1955年我曾经在北京莲花池被隔离批判了八个月，最大的场面也只是七八个人。像这样的大阵仗，还是第一次。但我已经不会想到自杀了，也已不觉得丢脸了。为什么我会在这样严峻的场合想笑呢？因为实在太可笑了。我春天在昆明的发言所批评的人也包括黄铁，因为她是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我和她没有共同语言。怎么忽然会成为她的干将和急先锋呢？宣传部长袁勃所以要整她，是他们之间的权利之争。在会上所有的发言者都十分踊跃，有的是落井下石，有的是表现对党的忠诚，更多的人是借以掩饰自己的惊恐。小会是在军区俱乐部召开的，全是军区宣传、文化部门的成员。无论亲疏，火力都很凶猛。揭发的问题没有一条实质性问题，既没有反党，又没有反社会主义的事实，但每一句闲话，和每一个人物的交往，其结论全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反驳，不能申辩，认定你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连你自己都产生怀疑：大概我真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一天，一位在战争中共过事的老战友突然来看我，向我透露说：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谢富志上将到军区政治部做了指示，他对白桦问题的看法是，问题严重，但他是我们四纵队培养出来的年轻人，最大的问题是骄傲自满。批判可以从严，在处理的时候可以考虑不划为右派，留在部队下到边疆连队去当兵。我立即联想

到沙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遭遇，又想笑，又没笑出来，可谓啼笑皆非。（谢富志上将是二十年代后期从大别山参军的红军战士，而后排长、连长、特派员、保卫科长、教导员、团政委、保卫部长、师长、师政委、纵队政委。解放战争中，他是我们二野四纵队的政治委员，陈赓大将一生中最不喜欢的搭档。1947年冬天党在部队内部进行“三查三整”的时候，谢富志以自己的出身农民为优越条件，发动警卫员、饲养员和炊事员向出身剥削阶级的陈赓司令员展开斗争，企图瓜分陈赓的浮财。陈赓将军从北伐战争前就在国共两党的军中历任要职，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他的马褡子，马褡子里除了一床毯子、一只枕头、一床被单和几件换洗衣服以外，就是一本日记。结果，这些勇士听见陈赓的一声哼就作鸟兽散了。谢富志是革别人的命得以步步高升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和江青一拍即合，做了一番极为精彩的表演。由于患癌症去世，没有善始善终地和他的亲密战友江青演好最后一幕——法庭受审。）那位老战友向我传达这一消息的时候，告诉我：这是最好的结局了，保留军籍、党籍，以后就好办了。在昆明挨批斗以后，就放我回北京。我当时很悲观，昆明是再也难以再来了，为此，我带走了一盆鲜红的茶花。

总政创作室，在我之前，已经有公刘、徐光耀、樊斌、何孔德……等定为右派。我的问题由于上层意见的不统一，拖到1958年的春天还没定案。创作室主任虞棘在创作室的

会议上，吞吞吐吐地希望不要把白桦划为右派，并透露了萧华的态度，同时，也把周扬在某次讲话中的意见说了出来。进入深秋以后，连周扬都感到在全国打成右派的作家太多了，有过“是不是可以宽大一些，少打几个”的表示。虞棘的发言，立即遭到创作室副主任魏巍等人的义愤填膺的反对，他们反驳虞棘说：“让萧华、周扬到我们会上来，听听我们的意见。”“徐光耀已经划成了右派，白桦也应当划成右派。”可见在政治运动中，无论多么左都不会错。而且，即使像萧华、周扬那样的高级干部，如果在飞速左转的战车背后助一臂之力，他们的确力大无穷；如果试图去阻挡一下，不仅无能为力，一不当心，自己也会被卷入车轮之下。因为向左转的战车，从来都不会装上刹车装置。创作室的积极分子们突然把矛头指向虞棘，指责他“一贯右倾，姑息养奸，使创作室的年轻作家都堕落为右派。”天啊！总政创作室刚刚成立一年多，虞棘哪有那样大的能量呢！他的革命资历很长，抗战时期在胶东地区是一位权威的剧作家，几乎当地所有的秧歌剧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六十年后的今天，胶东农村的耄耋老人还能哼出一两句他写的秧歌剧唱段。但在政治斗争面前，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因为他太了解其中的利害了。虞棘当场昏倒，并立即送进北京医院，才没有继续对他施加压力。这些关于我的会议，我都没有资格参加。好心的秘书小夏经常向我透露过一些内情，所以，我一直都在惴惴不安地等待着角色的转换。1958年春天，由军事法庭

宣判开除军籍，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此被逐出文学界，逐出公开的社会生活。

1957年以后，作为右派分子，我常常想到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一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当你一旦被一个有权威的人指称为“琵琶”（鬼）的时候，你的亲朋好友和近邻就信以为真，对你群起而攻之，把你当成祸害一切活人的鬼。焚烧你的房屋，有理。打你，杀你，也有理。把你驱逐到“琵琶”（鬼）寨，所有的亲人都和你断绝关系，你立即成为一个行动在阳光下的幽灵。那年我出版的长诗《孔雀》，是根据傣族爱情传说写成的，实际上也是一个借驱鬼来杀人的故事。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傣族这种愚昧而古老的陋习多么地相似啊！我再也没有莲花池时期那种对客观世界的过高希望和自尊了，所以也就没有在莲花池时期那样深重的痛苦和困惑。

逝去的岁月和逝去岁月中的故事，像焚毁了的花朵，很难再拾起来，那些变成黑色或灰色的碎片都散落在哪儿了呢？

1958年春天，我被逐出军队，逐出共产党，逐出北京。具体地说，是不得不告别北京的一个小胡同——未英胡同。五十年代，我在北京断断续续住了三年多，大部分时间住在西单未英胡同四号，那是一条很僻静的胡同。四号是个三进大院，当时是总政治部电影处和创作室。第二进的北房改建为一个小型放映间，来看电影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元帅和将

军，经常可以在那个简陋的放映间里看到罗荣桓、贺龙、萧华……等高级将领。至于军内外的作家，在未英胡同出入的更是数不胜数，有些已经作古，如宋之的、马寒冰、杜鹏程等。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就是与我为邻的时候完成的。我在那里经常有一个铺位，有时在东厢一间小屋里，有时在资料室的书架中间。我至今都很怀念未英胡同，它靠着高大的和平门，曾经是条很安静的小胡同，我在那里写过许多作品。国庆节的夜里，在小放映间看完电影以后欢舞到天明。未英胡同虽然僻静，却很方便，右一拐是西单，左一拐是和平门。去湖南馆子“曲园”吃汤粉，经常可以遇见齐白石；去山东馆子“丰泽园”吃烤馒头，遇到过裘盛戎；去“全聚德”吃烤鸭，遇到过程砚秋。去“长安大戏院”听杨宝森压根就不需要坐车，遛个弯儿就到了。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熟悉我，总是喜眉笑脸地看着我走来走去。我不想去回忆在未英胡同经历过的欢乐和痛苦，那将是一本很厚的书。我只想把我最后离开未英胡同之前一件与一个生命相关的小故事记在这里，我曾为了那个生命多年都不能平静。经过一九五七年漫长的夏天、短暂的秋天和严酷的冬天，经过军队中、上层领导人的讨论、僵持、争辩，我在一九五八年春天被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亦即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热烈的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的痛苦绝不亚于临刑前的死刑犯。我躺在第二进东厢一间小屋里不吃不喝、没日没夜，等待着迟到的流放。这时，整个北京城锣鼓喧天，为响应毛主席消

灭四害的号召，连小脚老太婆都上了房顶，敲着铜脸盆，以疲劳战术消灭麻雀。我很羡慕那些有资格参战的人。我知道，我已经被划到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一边了。当一只失魂落魄的麻雀从窗外落进我的房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开始，它以为我是一个有权对它采取革命行动的人，吓得蹲在桌子上颤栗不已地看着我。可能它渐渐看出我的目光和它的目光非常相似：惶恐，迷惑，对这个残忍的世界深为不解。它稍稍安定了一些，对着我乞怜地叫着，此时，我所考虑的是：一、把它抓住，上交。看着它的脖子被拧断，往山丘一般的麻雀尸体堆上一丢？不！把它交上去不就是一种出卖吗？而且谁也不会承认这是我的一个小小的革命行动，得到的只能是一个白眼和轻蔑的一声哼。二、把它赶到窗外，让它被追杀得心碎胆裂而死？不！虽然这样我看不见它的死活，但和这个念头同时出现的是：不知道哪一个时辰，我就会像它一样被赶出这间屋。我实在不能在自己被放逐之前做一次角色颠倒的演习，它不就是我么！三、把它收养起来，等这场浩劫过去之后再放它逃命？不！一个连自己也庇护不了的生命，怎么可能去庇护另一个濒危的生命呢？如若被发现，我还要承担窝藏反革命的罪责。这个惊魂未定的麻雀，和无计可施的我四目相对了两个多小时。忽然“砰”地一声，门被人踢开了，那个来宣布我去向的人走了进来。小麻雀立即扑翅飞起、夺门而出。我从卧式变为坐式，第一个感觉是得到了解脱，至少不是我赶它走的，它在

我眼前消逝的时候是一个活泼泼的生命……我离开未英胡同的时候，没有小麻雀的仓皇，像具活尸那样木然。未英胡同的每一扇宅门都变得陌生而冷酷，对我视而不见。从此我再也没敢回顾过那条胡同，因为我的过于短暂的青春和那只亡命的小麻雀，同时从那里惊飞而夭折了。

北京军队的右派一般都要发配北大荒垦荒，或是晋西北山区修水库。我却让人艳羡不已地发配上海郊区一个军工厂当钳工，这不能不感谢萧华上将的眷顾。他的这一决定，在当时实在是一件冒险的事情，它的恶果一直到文革时才显现出来，炮击萧华的大字报贴满了总政治部大楼，其中有很多是揭发他一贯“招降纳叛”包庇牛鬼蛇神的所谓罪行。他考虑到我的家在上海，而且我的妻子得了癌症。我的家为什么会在上海呢？那得从1955年的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后说起。1955年在莲花池的八个月隔离审查，平生第一次感到身心倦怠，特别想有个安定的家室。1956年冬天到上海，和电影演员王蓓结婚。乔奇和孙景璐这对贤伉俪，把他们为朋友代管的两间位于绍兴路的房子借给了我当新房。结婚时，按照当时我所属的领导机关——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再叮咛：不可招摇。只在锦江饭店请了一桌客，主要是新娘结婚前在电影制片厂同宿舍的女伴。因而慢待了许多朋友，过了很多年以后，赵丹还嚷嚷着要补请他一桌喜酒。借住在别人的房子里总是不塌实，而上海的房子已经全都收归国有，私人租赁和买卖活动刚刚停止，托了很多人，求了很多机

关，甚至还找过十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显赫过一段时间的风云人物张春桥，五十年代下半页，他只是中共上海市委文委书记。一切努力全无结果之后，1957年初春，我冒昧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的齐燕铭写了一封求援信，很幸运，他应我的请求，给上海写了一张便条，上海市房管局才来找我看房子。开始，他们给我看的当然都是条件极差的房子，甚至是地下室。一次、两次，我实在是难以接受。第三次看的房子地处徐汇区一条幽静的小路上，那里没有店铺，只有住宅，在三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街心花园，街心花园里矗立着一尊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当时的上海，在街上矗立着外国诗人的头像，这是绝无仅有的了。指定要我看的房子按上海人的习惯说法，属于弄堂花园洋房一类。一进弄堂我就被它的清洁、安静和藤萝爬满墙壁的绿荫所强烈吸引。全弄只有24座连体花园洋房，一排四座。分配给我们的两间房子是弄堂最后一家的楼下，原是一户人家的饭厅和客厅，属于我们的还有落地窗外的一座80平方米的小花园。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我，在火车上和凌子风擦身而过，他却断然把脸转向窗外的时候，他我才感觉到这顶帽子的沉重。凌子风在北京舍饭寺，和我是忘年交，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他都要把我当做了“琵琶”鬼。我就是带着这样的心绪回到上海的。而迎接我的是几个孩子在我上海住宅的篱笆墙外对着我高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反动派，要打倒，右派分子逃也逃不

了！”

在这里我要特别说一说我的邻居陆先生，他是我数十年大起大落的见证人。看房子那天，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楼上的住户就是老早的房主人路先生。”我立即听出了“先生”意味着什么，但他还是补充了四个多余的字：“资产阶级。”看房子的时候没有看见路先生，在厨房里看到路太太，她正在做饭，放下手里的锅铲，很客气回答我的各种提问，告诉我们：“今后我们是邻舍了，你们来了以后，两家将要共用这个厨房，大门内玄关的墙上有一部电话，你们就不要另外安装了，两家共用，节省些。”据路太太说，路先生在工厂上班。在出来的路上，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上班的工厂，就是解放前他自己的私产，现在已经公私合营了，他在厂里留用，担任工程师。我对这个弄堂的总印象很不错，对这路姓的邻舍也说不出什么不好，而且怕房管局的工作人员说我挑剔，当时就决定了：行！就住在这儿了！那时的上海十分方便，搬来之前，给家具店打了一个电话，马上就来了一个技工，按照我的想法，很快就在原客厅和原饭厅之间做了一堵可以兼做书橱的墙，原饭厅就成为我们的一间卧室兼书房，原客厅就成了我们的客厅和饭厅。

搬好了家已经是 1957 年的初春时节了。有一天夜晚，雨很大，我去兰馨看演出回来已是深夜了。上海人进进出出都走后门，在进门的时候看见一个高高的中年男人，披着湿

淋淋的雨披从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下来。等到他在门廊里脱下雨披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穿着一身藏青帆布工作服，袖子上还戴着袖套，每一个裤脚管都夹着一个晒衣服用的木夹子，半高腰的橡胶套鞋上补了好几个补丁。他笑着小声对我说：

“对不起，您就是白同志吧？”

我说：

“是的，您……？”

“我姓路……”

“啊！您就是路先生。”

“是的，”他当然知道我嘴里的先生并非尊称，而是为了显示各自的立场。他窘迫地干笑了一声说：“白同志！我们是近邻，以后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原则的地方，请多多批评！多多指正！”

他这句多余而生硬的话使得我十分尴尬，怎么会把什么“革命原则”扯到邻里关系中来了呢？可在我们之间首先矗立起森严的阶级壁垒的是我呀！

“晚安！白同志！”他在门廊里把自行车摆好，很客气地道了晚安以后就上楼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和路先生的不期而遇。

路家有一位寄食的远亲，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妇人，据说，她的夫家在早年曾有恩于路家，路家为此将终身收养这位老妇人。她寄住在原来用来停放小汽车的车间里，全家三

代都称呼他为“继娘”。这位半主半奴的“继娘”，经常由于自己的尴尬身份炫耀或忿忿不平的时候，嘴里总会漏出一言半语闲话，邻居们从这些零星的信息拼凑起来就能够知道路家的许多往事。

路先生并不是路家的户主，户主是路先生的母亲。这位路老太太已经是年逾古稀的人了，仍然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夫人，而乐意让人称她为小姐。听说这位老“小姐”很少下楼，更不大出门。为数极少的几次出门，是到“红房子”西菜馆进晚餐，行前总是要打电话把“祥生”汽车叫到门前来，弄堂狭窄，进出都很艰难。每逢这种时候，她的大孙子都要说一句俏皮话：“又要考斯基（司机）了！”那时，对考斯基的揶揄，是没有禁忌的。因为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领导人、列宁钦定的“马克思主义叛徒”。

我第一次见到“小姐”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丁香花的清香从窗外被微风送进室内，我正在看书。先是听见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楼梯上用上海话喊叫：

“人呢？人都到啥地方去了？我的下午茶呢？”继而听见有人叩我的房门。我开门一看，是一位老夫人，脸上涂满了脂粉，手里捧着一只描金的小茶壶，领口缀着花边的白色丝绸衬衣上，披着一件黑底暗红花的外套，纯黑色的曳地长裙。使我立即想起狄更斯笔下沉溺于旧梦的尘封美人。她说的是一口带有江南口音的国语：

“对不起！先生！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在，我不知道煤气

是怎么点燃的，想请您帮帮忙，给我点燃煤气灶……可以吗？”

“当然，”我从她的话里听出了她是谁。“夫人！”

“不，小姐。”她神速地纠正了我。

“小姐！跟我来。”我带她走进厨房，我划着了火柴，打开了煤气，点着。然后把火焰放大、缩小，关上，再打开。“很简单的，夫……小姐！”

“我从来都不敢动煤气和电器一类的开关，以往，也不需要我动。您可以等水煮开了再离开吗？”

“当然。”

“……听说您是位作家？懂外语吗？”

“不懂……因为参加战争，不得已只好放弃学业……”

“我对这种牺牲的得失，不敢置评……我想，一个作家不懂一门外国语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教您英语，您有时间吗？”

“谢谢您，我怕很难抽出时间来，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

“很可惜……”这时壶里的水沸腾了。“这样是不是算是开了？”

“是。”我帮她沏好茶，关上煤气，把她送到楼梯口。我想扶她一把。她说：

“谢谢！不用，我还能跳 waltz 哩！”她说着把裙裾摆了一个半圆，踏着与她的年龄不相适应的、轻快的步子走上了

楼梯。

有一天，我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为了赶火车，我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怕惊扰了楼上邻居的清梦，去煮牛奶的时候脚步很轻。一出房门就觉得有乐曲声隐隐从楼上飘下来，虽然声音很微弱，我还是能听出那是舒曼的《梦幻曲》。进厨房，就闻见一股咖啡香，厨房里立着一个陌生人，我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头上戴着一顶十分鲜艳的花线帽，顶上那团红色的绒球耷拉在右耳边，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丝绒睡袍。煤气灶上正煮着一壶咖啡……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他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猛地转过身来，我这才认出他是路先生。我叫了一声：“路先生！”如果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出他的一双眼睛里闪烁过一瞬绝望的悲哀，只一瞬，他就镇定了。他从容地面对我：

“白同志！您起来得这么早？”

“我要出差到外地，赶火车。”

“啊！您真辛苦！”

“没什么，您……？”

“我还没睡呢！利用周末，为厂里搞一项技术革新……您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马戏团小丑？”他的自嘲使我很意外，没等我答话他就继续说了：“这是从前当剥削阶级时候的行头，我觉得不穿是个浪费，浪费就是犯罪。都是些很结实的料子，白天把这种行头穿戴出来，别人当然很难理解，以为是我在做白日梦，梦想失去的天堂。所以我只能晚

上穿戴，勤俭节约，废物利用嘛！还有这存放了好些年的咖啡，巴西产的，已经有点儿霉味了……一切供人享用的物质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巴西是个热带国家，种咖啡豆、摘咖啡豆都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有人说，一颗咖啡豆是用一千颗农场苦工的汗珠换来的……您看，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不经意地回答说：

“利用废物，当然是对的喽……”

“谢谢白同志……”他连连点头，匆匆地端着沸腾的咖啡壶上楼去了。本来就很微弱的《梦幻曲》嘎然而止。

那次一去就是一年，回到上海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春天了。一年间，一个屋顶下的两家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从一个革命军人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上海一个军工厂当钳工，接受监督劳动。我的妻子跟着成了右派家属，我们这个二人之家也成了反动家庭。

在工厂里劳动改造的生活非常枯燥，开始的时候，从现役军人厂长到工人对我这个人很难理解，不明白，一个年轻军官，年青作家，一转眼变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不可以和这个人接近、交谈？如何对待？职工们的目光陌生、新奇而恐惧，像是对待一只有毒但很漂亮的花朵。很快，工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因为对我态度和蔼而遭到批评，和我接近的工人都被目为落后分子。特别是一位副厂长的夫人，下放劳动，和我同一个车间、一个班组，她为了争取入党，处处找

我的毛病。虽然我进车间的第一天就会识图，一个礼拜就成为一个够格的钳工，月月都有技术革新，如果我不是一个劳动改造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第一个季度就能评为劳动模范。共产党的会多，我是个阶级敌人，除了批斗会以外，不能参加任何会议，所以下班以后的时间比较多，有时会到理发室坐坐，理发师傅的阶级观点不是十分严格，所以很愿意和我交谈。1959年初理发师告诉我：他的故乡苏北饿死了很多人，他的亲戚跑到上海来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头力的莖糠（也就是稻谷的壳）倒出来给他们带回乡下充饥。许多故乡人生了怪病，浮肿而死。医生都不敢诊断，因为那些人的疾病是饥饿。我不相信他说的是真实的事情，是谣言。1958年全国大跃进，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报的报道历历在目，亩产万斤、数万斤、十余万斤……那些粮食都到了那了呢？后来，和我同宿舍的一个退伍军人是我的老乡，党员。他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我注意到他回来以后变得沉默寡言起来。他的铺位在我的铺位上面，平时从来不敢和我说话。有一天晚上，宿舍里只有我和他，他躺在上铺，我躺在下铺。他开始慢慢地向着屋顶叙述着他返乡的故事：

“俺家乡的人差不多饿死光了，我几乎没见到什么亲人。那么多人饿死，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是饿死的。我只见到一个姑姑，她还活着。连她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为什么她还会活着呢？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有一天夜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俺姑听见一头牲畜把大门撞开了，她推开窗

户一看，是一头饿疯了了的猪。她马上跑出去关上大门，那头猪在院子里飞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门杠迎上去把猪击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拿来的这股劲。她趁着小儿子没醒来，挖了坑把死猪埋在地里。她不敢告诉儿子，也不敢给他吃猪肉，因为他太小，不懂事，会露出口风。别人要是知道了，为了抢猪肉能把她娘儿俩活吞了。她总是在深夜里挖开泥土，割一小块肉烧熟咽下去。她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肿，最后死掉……”我没有搭话，我装聋作哑。他当然也希望我是聋子。在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期，散播这样的故事得到的惩罚将是最严重的。我心里明白，他实在是痛苦之极，又无人诉说。说给任何一个职工听，都有可能被告密。只好说给一个阶级敌人听，这个阶级敌人是他的家乡人。他知道这个阶级敌人不会揭发他，也不敢揭发他，即使揭发了，他也可以不承认，同时反打一耙，说是阶级敌人对党员的诬陷。不久前厂里有一个非常熟练的电焊工失踪了，我很喜欢他，因为他爱说俏皮话。后来听说他未经审判，关进了劳改农场。罪名是思想反动，开地下工厂。什么是地下工厂？有人对我说，他只是夜间在家里用电弧焊帮别人焊接过几根钢筋。

上海历来是一个阶级界限最为森严的城市，1949年以前，人的贵贱和自由度是以拥有金钱的多少而定的；1949年以后，人的贵贱和自由度则以政府给你划定的政治身份而定了。我在1958年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回来以后，听说我

的邻居路先生在反右运动中立场坚定，在鸣放的时候不仅没有说一句有反党情绪的话，连眉头都没有皱一皱，和共产党同心同德，坚决背叛自己的阶级，拒绝并抵制一些资产阶级右派（都是他的亲朋故旧）的“反党”串联，而且拒绝在某人的一份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上签名，勤勤恳恳地劳动改造，自觉自愿提出减免保留工资和定息。反右运动开始后，积极张贴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得到厂工会的嘉奖。春节期间，厂工会把大红花送到他家里，使得左邻右舍羡慕不已。据说像他这样表现极好的的资产阶级份子，在上海只有千分之五。另一件大事是路先生的妹妹居然从海外写信回来了，这位大小姐在这个家庭里早已死灭，从来都无人提及。她在没出走的时候，由于追求自由、自主，与母亲反目失和，互相怨恨。女儿一怒之下铤而走险，跟着一个一文不名的烂海员远嫁南洋。这一行动使得举家蒙辱，母亲发下毒誓：永生永世、永远断绝母女关系。不想，斗转星移，这个被岳家看不起的烂海员发奋图强，奇迹般成了亿万富翁。母亲和女儿，兄长和妹妹的怨恨自然而然地就冰释了，而且倍显亲切，一封封催人泪下的家书飞往海外，虽然只能在信中表达思念之情，在海外生活的女儿一眼就能看出：在上海生活的家人食物匮乏、生活艰辛。当时上海的很多所谓“资产阶级”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在1949年春天之前远走高飞。如果幸而还有一个、半个亲属留在海外，你就有了所谓“海外

关系”了。这种关系有利，也有弊。本来，“海外关系”只是个拖累，甚至是个祸害，能隐瞒的尽量隐瞒。随着五十年代末大陆的经济日渐困难，“海外关系”忽然变得有利可图起来。有了“海外关系”，你就可以享受到华侨家属的待遇了。当时，对于一个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的联系由于交恶而几乎中断的中国来说，有限的外汇太珍贵了！当时按照外汇的多少，你可以配给到大米、白面、食油、猪肉和进入华侨商店的购物卡。当然，最好这种关系不是台湾，如果谁有一个亲人在台湾，他一定会矢口否认，报称：失踪。“小姐”的那位不肖的女儿恰好侨居南洋，所以不仅可以定期汇钱来，而且还能在大饥荒的1960年回到上海来探亲。百闻不如一见，大陆人的生活果然窘迫，上海在全国人的眼里算得上是幸福的天堂了，天堂尚且如此。百货商店货架上的空缺，居然用排成队的《毛泽东选集》来补充。样样都要配给，包括火柴、针线……像锦江、国际那样的著名饭店，都实行了高价销售的政策，它们的菜肴比配给价至少要高五倍以上。这些饭店从天一亮就排成了长龙，大部分是过去的美食家、今日拿定息的老年人，他们有钱，也有闲。老男人高高竖起曾经豪华过的大衣的领口，老女人把厚厚的羊毛围巾围得只露着迎风落泪的眼睛，大声交换着各自排队逐食的经验，他们几乎吃遍了上海一切特许供应高价菜肴的餐馆。“乔家栅的‘猫耳朵’还是好的！”

“王家沙的肉汤团不减当年！”

“洁而精居然还有地地道道的回锅肉！不过要赶早。”

“老饭店的狮子头满壮，很解馋。”

说到瑞金宾馆、东湖宾馆、上海大厦、兴国宾馆、衡山宾馆这些地方，个个忿忿不平。因为人所共知：那些地方永远都有美味佳肴供应，但就是不对外，只接待中央、上海和各省市的高级首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贵族，旧时代的贵族，有钱也不行，只能在秋风落叶中耐心排队买高价食品。

“小姐”远方归来的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的亲人很可怜，本来熄灭了的亲情似乎又死灰复燃了。当她一回到南洋，看见任何一个城镇大街小巷都是卖吃食的大排档，就迫不及待地写信了，她写道：“上帝啊！您为什么在您抛撒福祉的时候，偏偏把集聚着您最多儿女的中国遗忘了呢？”据“继娘”用压得最低的嗓音透露，这封信吓得路先生面无人色，立即点火把信烧成灰烬，再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乎噜一声就冲到下水道里了。从此她就不断地往上海家里寄钱，不仅寄钱，而且大包小包给他们寄食物和一应用品，从泰国香米、加拿大精白面，到各种各样的罐头、克宁奶粉、瑞士白脱、比利时巧克力、日本针线盒和新加坡的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于是，我们两家共用的厨房经常在子夜以后会突然飘出咖喱的香味来。据说那位不肖的女儿每天开着劳斯·劳依斯轿车寄包裹当做乐善好施的体现。过了一个阶段，寄包裹已经不能满足她的心愿了，又花

了很多钱，为母亲办理了移民香港的手续，而且在香港为母亲买了一套面向大海的公寓。对于她的动机，有三种说法。一说：这是女儿对母亲当年蔑视自己的报复。一说：这是女儿的以德报怨。还有一说是：她回到上海的时候惊奇地发现：母亲和哥哥满口“革命化”，对于现状一句抱怨也没有。好！你们越是革命化，我就越是要你们腐化。她当然不知道，留在上海的家人是迫于无奈才如此“革命”的，即使对海外回来的亲人，也不敢发一句牢骚，恐惧已经成了她的亲人们的习惯。从“继娘”有意无意传出的信息：“小姐”被当局迅速批准移居香港，是考虑到路家和张家的政治表现一贯积极，信任就是奖励的一种形式。

我接受改造的军工厂远在闸北以北的郊外，正赶上全国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每两个星期才回来一次，每一次都是很晚才到家。有一次和路先生在门口巧遇，他首先向我点了点头，虽然门廊里的灯很暗，我还是看见了他的眼神的变化，在最初一瞬闪现出的是一丝同情，那同情很快就熄灭了。我听见他在向我说话，但声音好像很遥远、很陌生，以往他是那样的谦躬自卑，现在却迥然不同了。他用酷似我们车间党委书记的口气对我说：“白……”他不知道对我称呼什么为好，犹疑了一下以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叫了我一声“先生”，虽然他没有以牙还牙的意思，我当时却受到了深重的伤害。他说：“白先生！即使对地、富、反、坏、右，党还是给出路的嘛！”虽然他对我说话的时候，目光的焦点

并不在我的身上，但对我的打击却是致命的。他本来是资产阶级呀！他有什么资格居高临下地以委婉的口气教训我呢？而且称我为先生！在同一个地方，我称他为先生，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今天他把球儿囫圇个儿的给扔回来了，我感觉他掷回来的球比我掷给他的那个球儿要重得多。可事到如今，我有什么话好说呢？他还是资产阶级分子，但他是和共产党站在同一立场的资产阶级分子，属于团结对象；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属于打击对象。我心里好一阵难受，说了一句话，即使是说了一句错话，一句反动的話，就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了么？多么难以理解，我没有资本，甚至和资产阶级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能够剥夺的什么呢？当然是本来就有限的人身自由了。何况我并不认为我说的那是一句错话？角色的转换怎么会这么容易，这么绝对，这么迅速，其反差又是这么大！？

我的儿子出生于1959年冬天，那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儿子一剪断脐带就要吃奶，他的母亲因病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惟一一条路就是找奶妈，奶妈很容易找，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野菜汤。为了保住大人的性命，就不得不忍痛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孩子能否存活？实在很难设想！我们通过居民委员会找了个扬州奶妈，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很消瘦。她放下包袱正

赶上吃中饭，第一顿她不好意思，只吃了个半饱就是两大碗。这顿饭之后，我和妻马上举行了一个秘密的紧急会议。儿子还不会说话，无从表态。奶妈的一顿饭足足吃了我们两个人的定量，打破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原以为每人每顿少吃半碗就够她吃的了，谁知道……？我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妻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5斤，一共53斤粮。我当时在工厂当钳工，我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的25斤定量。从奶妈的饭量看，即使25斤全给她，她每天也只能吃一顿饭。奶妈不吃饱，就没有奶水，没有奶水，儿子就长不大。怎么办？即使有钱，没粮票，连一根油条也买不来，粮票更不能买卖，买卖粮票是违法行为，实在是没办法。这时候，我才体会到家无余粮的难处。每顿饭妻子的眼睛都注视着奶妈的嘴，那张嘴实在是可怕！开始的时候，奶妈还有些不好意思，三天过去，她就放开肚皮吃饭了！根本不把你们忧愁的目光和日渐消瘦的脸看在眼里。到了1960年，粮食更加紧俏了，多亏妻的同事们——当时活跃在银幕上的电影演员们，经常把他们节约下来的粮票凑起来送给妻子。有一天路家的“继娘”给我们刚刚出生的儿子送来一听克宁奶粉，这无异于大旱时节从天上落下一滴甘露，沁人心脾，又无济于事。当妻向“继娘”道谢的时候，“继娘”吓得两只手摇个不停，小声在妻的耳边说：“可千万别让楼上知道！这是他们给我的。他们以为你们不知道海外有人给他们运东西……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夜里往楼上搬东西总要

经过楼下的呀！”在这时，他好像和我们更近些，因为我和她都住在楼下。她说的也的确是实话，就是“继娘”不告诉我们，我们凭感觉也会知道，用上海话来说：我们和路家到底是“贴隔壁邻舍”，什么事能瞒得住“贴隔壁邻舍”呢？我们无需故意刺探，什么都一目了然。他们所顾忌的并不是政府，因为这恰恰是由于他们吸引外汇多，而且从来没有暴露出任何不满，才得到的优待。他们怕的是左邻右舍的嫉妒心，饭都吃不饱的人如果看见身边有人享用大鱼大肉，妒火必然上升，尽人皆知，强烈的嫉妒心能驱使人们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来。路家的整体形象就像我第一次看见的路先生那样，在风风雨雨中披着一件湿淋淋的雨披，至于他的面容，他的目光，他的皮肤，他的内心，你全都看不清。但作为他们的贴隔壁邻居，可以想象得出：他们拥有螺壳里的自由、温馨和幸福——如果在螺壳里也可以称之为自由、温馨和幸福的话……

这种脆弱的稳定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螺壳终于被击碎，出现了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事情出在孩子们身上，路先生的长子达明在弄堂里有一个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法朗索瓦，这位法朗索瓦曾在北京某名牌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所以自己给自己起了个法兰西名字。据说当初考进大学的时候政审就不合格，由于一位副校长“分数挂帅”的思想作祟，把他招收了进来，成为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极坏的例证和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毕业前的一个月，

学校以“思想反动”为由，将他除名。无所事事的法朗索瓦和达华的出身相通，不同的是：法朗索瓦不仅失去了父辈留下来的工厂，也失去了面子。他的档案跟着他也回到上海，档案里给他定性为“反动分子”，交给里弄委员会的婆婆妈妈们监督劳动。挨批判是他的新功课，那些婆婆妈妈嘴里尽是一知半解的报纸语言，驴唇不对马嘴，唾沫星子喷在脸上，越发引起他的不满。而他的不满——甚至仇恨都一览无余地挂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他和达明从小就是一起在狗尾巴上点爆竹，翻墙头捉蟋蟀的玩伴儿，一拍即合。两个人每天夜里在后门的门廊里“诌诌诌，诌诌诌……”谈“美国之音”和台湾电台广播的消息，说里弄委员会领导的坏话，发造反派的牢骚，诉被歧视的怨恨……不知道被哪个小赤佬听见了，到街道造反派那里一检举揭发，当天就把法朗索瓦专了政，一番武斗，打得他鼻青脸肿，不到半个钟点就“竹筒倒豆子”，卖了自己，也卖了朋友，达明随即被隔离。对于路先生来说，可以说是大祸临头。儿子的思想不就是他的思想吗！不同的是老子守口如瓶，十余年如一日，儿子则认为法朗索瓦完全可以信赖，万无一失，所以对他则信口开河。路先生随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首先向自己所属工厂造反派请罪认罪：痛悔自己革命警惕不高，教子不严，在坚决和儿子划清界限的同时，保证动员儿子反戈一击，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然后又向街道造反派请罪认罪……请求准许让他见儿子一面，做儿子的思想工作。由于态度诚恳而且

卑微，打动了街道造反派的一号勤务员，慷慨特许他和达明见面，让他做分化瓦解工作。在造反派头头的监督下，路先生和儿子见了面，那是一间阴湿的地下室，儿子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再来一次刑讯就有可能将自己以及全家的反党言行和盘托出了。路先生语重心长地规劝儿子无论如何要态度端正，实事求是地交待问题，沉痛深刻地认识错误……并且充分指出问题性质的严重性。并且反复述说共产党毛主席对路家天高地厚的恩情……一席话说得路先生自己泪如涌泉，达明跟着也涕泪交流，造反派头头大受感动，认为他们的激动完全出于忏悔。而实际上路先生是出于紧迫，达明是出于恐惧。路先生对儿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语双关。他用眼神、用语气、用手势把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交待得清清楚楚。最后他一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道理，但这句话达明完全明白是一句反话，因为，路先生在家里有几条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秘密家训”中的第一条就是：“牢记：坦白从严，牢底坐穿；抗拒从宽，无罪赦免。”第二条是：“牢记：一人招祸，一人承担；咬紧牙关，严防株连。”所以达明在隔离中把自己摆在受了蒙蔽、受了欺骗、受了拉拢的地位，承认自己已经滑到反革命一边。幸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的指引下，悬崖勒马，有了回头是岸的机会，今后，一定要努力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如此这般地检讨一番……空洞的内容在痛心疾首的外表装饰下顺利得到造反派的首肯。由于路先生一系列的力挽狂

澜的措施，达明被定为盲从犯罪，态度端正，作为“争取对象”解除了隔离。法朗索瓦自然而然就成了主犯，一直到文革后才结束囹圄之苦。

文革期间我在外地被隔离审查，七年和妻儿不能相见，当我第一次回到上海，和妻儿团聚的第二天深夜，路先生突然来访。这是二十余年从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使我既诧异而又不安。他这次对我既不称先生，也不称同志，而是叫我老弟。他和我进行了一次语重心长地促膝长谈，他对我说：

“老弟！我们贴隔壁邻居二十余年，你对我们的情况、我对你们的情况应该是有些了解的。今天我们是一对一，没有旁证。如果万一你出了事，我可以矢口否认；如果万一我出了事，你可以矢口否认。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谁也瞒不了谁，不用细说。远亲不如近邻，我实在按奈不住了，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如果觉得毫无可取之处，就当是一阵风，左耳朵进，让它右耳朵出。我早就想劝劝你了，总觉得很不合适。你是老资格的少年革命家，我是什么？一个资本被没收的资本家。惟一的长处是痴长你几岁，我痴长的那几岁，恰恰是你所没有的。那时候你正在为革命散传单，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中国文化中有许多足以求生自卫的东西，极其宝贵。也有很多高尚的东西，像暗夜的星光那样诱惑你，让你义无反顾地向它走去，在永远没法走近它的路上，遍布陷阱，当然，你会万死不辞。你不知道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不懂得人

际关系中的奥秘，不管是什么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奥秘都是近似的。特别是利害，不管是权力还是金钱驱动下的复杂形态，你都很无知。譬如：忠言逆耳，这句话不但是对凡夫俗子，对至圣贤哲一样适用。‘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界上，许多无言的动物比人聪明得多。田螺给我的启发最大，它们无疑是一种最弱小的软体动物，你注意到没有？它们从出生那天起，个个都不怕劳累的背着一个坚硬的壳。这二十多年来我也背着一个壳，很沉重，很不舒服，可没有这个壳，我已经早就不存在了！老弟！我知道，你在渐渐了解了我的时候，很鄙视我，认为我是可耻的两面派。我知道，可我不以为意。因为我的的确确是两面派，而且是刻意为之的两面派。虽然你鄙视我，我仍然非常感激你，因为你只是鄙视而已，没有加害于我，你尽管处境很不佳，加害我还是很容易的。你很高尚，老弟！我很敬重你。可你为了人们对你的敬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由于你的高尚追求，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岳母就必须年年月月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整整七年，一年三百六十天，乘七，两千五百多天，天天以泪洗面，每天傍晚，我都能看见你的岳母和你的小儿子站在弄堂口等最后一班邮差，颤兢兢地问一声：有我们家的信吗？即使有，你在信里能说什么呢？每一封信都经过严格审查，也许他们所奢望的仅仅是你还活着……这一方面，你可能没有我们知道得深切。那时候，你看不见他们，而我却能天天看见他们。老弟！一得必有一失，我生下来就是生意

人，很重视得失。得失相等，可以考虑。得太少、失太多就不能考虑了！你失去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这是曹操在讨伐孙权时的感叹，他在全盛时期尚且如此，可见人生是很短的。我刚刚见到你时候，你是一脸稚气，一脸英气，一脸傲气。现在呢？苍老了！当然，我更加苍老。‘人定胜天’是古人的一句狂言。人，即使是秦始皇麾下的庞大军团也是无力回天的，他就是在疯狂求长生的时候一命呜呼的！‘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竟，这是自然界恒常的一个方面，有阴才有阳，有死才有生，有圆才有缺，有始才有终。我们可以有曹操的浪漫，不必有曹操的野心……今天我可以对你坦白交待，数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要啜饮一杯，只一杯，最上等的法国白兰地，XO，一天都没间断过。即使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只有你有可能隐隐约约地知道，我依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虽然是缩在小小的螺壳里，在上海四周就有人以树皮草根充饥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在悠闲地啜饮 XO，如果被饥民发现并且知道它的价格和来路，我一定会被乱棍打死。1966年那个上海血腥的冬天，每一夜都有老朋友自杀身亡，其中有所谓资产阶级，也有知识界的反动权威。我照样喝！虽然很苦，苦酒也要喝！苦酒能让我冷静，冷静能让我清醒，清醒的人才能有效地自卫。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出生，都有人在死灭。那一刻也许刚好某一位伟人、圣人，也许是一个恶人出生或是断气，我依然是一杯好酒，不增，也不减。既可以

庆祝死，又可以悼念亡。老弟！我并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畅所欲言，已经可以揭去假面了！不！永远不！今夜我是不是喝醉了呢？不！我永远不会醉。我严格遵守着一个戒律：决不和除自我以外的另一个人谈心。今天对你却有了例外。因为：首先，我找的是历经坎坷的你，而且你即使以任何高尚或卑劣的理由也不能伤害我了（我所说的伤害与老弟的品质无关，老弟的一生只会在所谓理想的追求中迷乱。）。请别误会，我指的并不是我们的生存空间已经有了改变，不！人类生存空间的改变并不是像激进的革命家想象的那样容易，很难很难！因为它不是客体所能决定的，关键在于人性的改变，我们民族有一句名言：‘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了……老弟！正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在你面前大无畏一回。你们革命者是在生命全盛的时候显示人的大无畏精神，如我等懦夫，只能在濒临死亡的时候……请原谅！今天我斗胆在你面前打开我这个密封了多年的瓶子。比起你来，你说成功者是你？还是我？”路先生没等我回答，起身就走。“再见！”

等我想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上了楼。我咀嚼着他那番话，慢慢度到门外的小花园里。小花园的钢栅栏在大跃进时被拆除炼了“钢”，后来重砌的砖围墙在文革中再次被拆除，任何人都可以直达窗下，对我们这个反动家庭进行监督。现在又修起了新的围墙，丁香的枝叶渐渐又茂盛起来。我在窗下新种了一簇青竹和一丛蔷薇，青竹已经可以伴着贝

多芬的《月光》缓缓摆动了，蔷薇也开始扶着墙伸向窗台。此时此刻我反复想到的却是：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这高高的围墙还会再次被拆除吗？当我抬起头仰望苍穹的时候，看见上海的夜空中竟然会奇迹般闪烁着一颗蓝色的星星，我已经不记得在什么时候曾经见到过这样诱人的星光了。

所有的政治思想迫害运动，可以说，无一不是“反胡风运动”的翻版和继续。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非史无前例，从内容到形式，和“反胡风”、“反右派”一脉相承。都是在极端权力的控制之下，以文艺批判为先声，先行定罪，挑动群众，施行残酷批斗，抄家封门，私刑逼供；叛卖自保，告密有功，腹诽立案，任意株连。污蔑、羞辱、囚禁、甚至处决人，都不需要任何程序。不同的只是：这种任意践踏公民的行为，在神州大地上无所不在地肆虐，受害人从知识分子扩大到党政干部和普通居民罢了。历次迫害运动严重挫伤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与独创精神，思想的翅膀被残酷地剪断了。到了这种时候，我已经不单单是逆来顺受、也不单单是委屈和激愤了。而是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枝叶茂密的渲泻要有力量得多！

在1979年收到胡风的来信和赠诗之前，我一直都以为胡风不可能活着从双重牢狱（一重是客观上造成的冤狱，一重是自己的心狱）里走出来，因为有许多许多优秀知识

份子没能活着走出来。结果胡风活着走出来了，除了极少的几个人，绝大多数人都热情地迎接了他。他的复出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却雄辩地说明：中华民族良知未泯！一直到1984年，我才在北京他的寓所和他见了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特别奇怪并为之黯然的是：他在1979年11月14日给我写信时的自由心态和热情竟会荡然无存！他在信里不是曾经答应过我吗？“也许还不止一笑而已咧！”可当我和他见面时，他不仅没能一笑，可以说是一言未发。是因为他对和我同去的那位风派“朋友”有戒心？还是因为醒来时反而失去了梦中的天真？他复出以后写的那几篇短文能说明他么？他不是有了人身自由吗？看来，人身的自由和人心的自由并不是一回事……总之，很费了我一番猜测。

“人只是芦苇，自然界最柔弱的生命；但却是会思想的芦苇。”

1998年7月16日于上海

张凤珠

张凤珠简历

1929 年生于沈阳，祖籍辽阳。在沈阳读小学，中学时因太平洋战争，随家流亡至四川三台，在三台读中学，东北大学先修班，1946 年升入东北大学历史系。

1948 年到冀察热辽解放区联大鲁迅文学院学习，后并入东北文工团回沈阳。1950 年调东北文联，后在《东北文艺》杂志任编辑。1953 年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1954 所边学习边任丁玲秘书。1955 年调《新观察》杂志社当编辑，任文学组长。1957 年受丁玲冤案株连，遭批判。1959 年调宁夏文联，任《宁夏文艺》编辑。1965 年调中国科学院 156 工程处，后划归国防科委 1970 年迁陕西临潼为兰字 826 部队，直至 1979 年重回中国作家协会。1980 年筹备恢复《新观察》杂志任编辑。1983 年调作家出版社。任副总编辑。1985 年筹办《中国作家》杂志任副主编至 1991 年离休。一生中，除掉文革几年外，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编辑工作。很尽职，也很平庸。

我看丁玲和舒群

丁玲的故事

没有哪个作家像丁玲这样，一生中在荣辱毁誉间，经历过如此巨大的落差。我曾目睹过当年她在人群中、在作家协会机关院内，被前后簇拥着，被爱戴的目光包围着的盛况。曾几何时，天地似乎转了个儿，到1957年夏季，在王府大街文联大楼的会议室内，作家协会连续召开了十几次扩大会议，批判以丁玲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文艺界的头面人物全参加了。会上那些发言，会议主持者为会议所营造的气氛，真够得上一场“文革”的预演，虽然还没有像红卫兵那样，对肉体施予各种残暴；但是那种对人的灵魂的肆意羞辱，对丁玲这样人，承受起来恐怕比皮鞭更惨烈吧，那真是千夫所指啊！丁玲坐在一张小桌子的后面，旁边是陈明，我毫不怀

疑她的心在颤动，但脸上还能平静地承受各种指责，真难为她的修炼功夫。

丁玲生前，和她有两次见面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的印象。

第一次是1952年。我十分向往到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因为它的所长是丁玲。冰心、卢隐、丁玲，这是我中学时代热烈崇拜的作家。只是那时感到她们距离我十分遥远。现在革命胜利了，丁玲是从延安来的大作家，是老革命，在我眼中她身上的光彩就更加灿烂夺目。到她作所长的地方去学习，成为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能因为我的申请太热切，感动了领导。我工作所在的东北文联，同意我去学习。舒群并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丁玲。丁玲正在大连养病。于是我带着这封信登上去大连的火车。即将见到丁玲了，只感到又兴奋，又忐忑不安，甚至有些胆怯了。

在此之前，我曾见过丁玲一次，那是1949年10月，她作为团长率领一个代表团去苏联，在沈阳作短暂停留，我作为工作人员也随同到车站去迎接。1949年，几乎是节日连着节日，迎接这个代表团，对我也是个节日。代表团里还有诗人肖三、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曹禺、电影演员白杨等。列车停稳后，丁玲先下来，东北文联的领导们都拥上前去握手、问候。丁玲似乎身体有什么不适，立刻由舒群陪同去医院了。她留给我们的只是惊鸿一瞥。在我的印象中，最突出的是她那张微黑的圆脸上，有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

我是在一个落雪的清晨从大连车站下火车的。漫天飞舞的雪花，把城市装扮成一片素白，空气中有一种凛冽的清新。我顾不上观赏市容雪景，直奔丁玲休养的疗养院。当我被让进屋内时，感到这里和窗外的冰雪严寒相比，真是温暖如春啊！丁玲、陈明，还有电影界著名导演袁牧之，他们正在用早餐。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面对丁玲，只见她身着一件室内穿的长袍，神态雍容，一看就感到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大作家，很有气魄。那时她刚刚获得斯大林文学奖不久，声望正如日中天。但我没感到她摆名人的架子，对一个前来求见的年轻人，她的一些随意的问讯，很快消除了我内心的紧张，倒有些亲切的感觉了。

再一次印象深刻的会面，则是斗转星移廿多年之后的1979年。世事几经翻转，丁玲终于穿过炼狱般的折磨又回到北京。对她来说，此时也仅是曙光在望，强加到她身上的条条锁练并没有松开。

我和徐光耀听到丁玲回来的消息后，立刻相约去看她。一路上，我也是心里忐忑不安。睽别廿多年了，她走过很长一段风霜雨雪的崎岖路程，如今已过古稀之年，她会是一种什么面目？白发萧疏，老态龙钟，很可能是伤痕累累吧。出乎意外，当我站到她面前时，我不胜惊讶了！她完全不是我想象的样子。她当然老多了，岁月和苦难是不会不留痕迹的。但是她的精气神儿却让人宽慰，还有那双眼睛，虽然不再波光闪烁，却仍有神采。她没有佝肩驼背之像，腿脚利

索，说话也还是那样爽朗，笑容依旧，而且那笑声，使我为自己因重逢而流露的凄伤感到惭愧。

我们极想了解她这些年的经历，但是她不诉说自己，却关心文坛，一再讯问我们所熟悉的人和事。她勉励徐光耀，认为这一批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作家，是文学上宝贵的力量，应该起脊梁作用。她仍然是那样谆谆善诱，恍然间我们好像又回到 50 年代的文学研究所。我和徐光耀都很感动，也觉得不可思议。经过这么多年的磨难，有时承受的几乎是非人的遭遇以后，她何以还能保持住这样的豪情和勇气？对生活还是充满热爱！我感到面对的几乎还是 50 年代的那个热情爽朗的丁玲。我不胜惊奇，却没有很深理解。

后来在逐渐地接触当中，了解一些 20 多年中她所遭遇的各种磨难。她讲述这些遭遇时的语气，她对这些遭遇所持的态度，使我多了一些感受。她真不容易啊！在面对苦难时的坚忍毅力，即使身处绝境，仍不放弃希望的乐观精神，在这方面老太太是无与伦比的。

丁玲回到北京初期，没有秘书。但人们已知她又回北京，重新出现在文坛，因此有很多读者来信，她无力都来亲自作答，有时把我找去帮忙处理一下，这一阶段和丁玲接触多些。老太太是个喜欢聊天的人，也善于聊天。记得在 50 年代，我就听她说过：和几个谈得来的朋友在一起聊天，是一种享受，往往比一些娱乐更使人愉快。许多娱乐时间长了，不免令人生厌，而和朋友聊天，却可以永远有新鲜话

题。

现在我又有机会听老太太聊天了，那确实是一种享受，不仅有趣，而且能启迪你从不同角度去认识人生。

记得有一天晚间，我去她那里，她的一位老战友也去看她。当时她还住在友谊宾馆。食堂不在楼里，老战友注意到她的走路，就劝她：“你走路太快了，这不好。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要紧妨摔跤。走那么快做什么，还有什么可赶的？”

丁玲笑说：“我不是赶什么，是习惯。可能是当年在西战团每天行军练出来的。更主要的是‘文化大革命’时，为了躲避挨打，更得急行军。那时每天去劳动，路上小孩子们，追着喊着：打大右派，砖头、瓦块、土疙瘩，什么都往身上丢。逼的我只能健步如飞……”说着她竟哈哈大笑起来。没有感伤，仿佛倒像在讲一件挺有趣味的事。

那位老战友看着她，默默地摇了摇头。

另一次听她聊天，是在她家里。这时她已经搬到木樨地一幢高层公寓楼里。她曾很兴奋地在一次大会上讲话时说：“我现在是住在九重天上了！”实际这个家不如她当初住在多福巷的那个四合院。四合院没有了，它的上面竖起了壮丽的华侨大厦。

那一晚，吃过饭后，她在室内来回散步。话题讲到她在秦城监狱的生活。她讲到为了保住活力，把报纸和旧衣服团成一团，当作球来扔；为了不丧失说话的能力，她吟诗、唱歌、朗读。当说到在牢里后来允许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了，她的面容、声音都有了变化。似在回忆最亲密的人，最神往的事情。她说：我读过的所有小说中描写的人物，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那么好，有那么高尚的情操。他们之间的友谊是神圣的，几乎前无古人。马克思最心爱的儿子死了，十分伤心，马克思说：他只是因为恩格斯才活下去。马克思著作中有许多数学演算，恩格斯都要为他复核一遍。恩格斯自己手头也正有著作，但当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恩格斯立刻停止自己的著作，去帮助马克思。恩格斯整整花了十年时间，为马克思整理遗稿。在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这么伟大的友谊吗？

她沉默下来，在座的只有陈明和我。我被她的叙述感染了，只是无言地望着她。今晚她的脸颊好像很丰满，她每当沉思时，眼睛总是微眯着，心神似已飞驰到她所向往的遥远的时空里。她的眉宇间蕴含着太丰厚的人生内涵。

忽然地她又粲然一笑，略带自嘲地说：我看马克思、恩格斯的书真看的入迷了、竟希望最好能等我看完以后再放出去。

这位非常的老太太啊！！

那一晚她兴致好，谈锋很健。后来又谈到安徒生的创作。她深深赞叹艺术大师的造诣。说着、说着她自己好像也沉醉在无边无际、翻动着波涛的大海的奇异景象之中了。她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的灯火，动情地说：“每当我读这些用诗的语言，去歌颂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去追求高尚理想的伟大作品时，我就感到自己的灵魂都受到一次清洗。我虽

然不能和这样大师相比，但是我内心里在还是有许许多多的东西，要表达。我今年 75 岁，如果只给我五年时间，那就太少了，无论如何我还得写十年。”

我说：你的经历本身，已经构成一部绝好作品。

她立刻说：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不要总存在着要表白自己的念头。你可以写多种多样的人，多种多样的事，心灵、感情、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无论写壮烈的，还是哀婉的，只要能动人心弦，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各种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可絮絮叨叨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尤其不要哭哭啼啼用眼泪去赚取读者的同情。

我想这就是她一贯坚持的文学观吧。她写的《牛棚小品》，虽然很受读者欢迎，但她认为她还是应该写《杜晚香》这样的作品。她说：建设四个现代化需要有更多杜晚香这样人物。

我不是理论家，也不是研究丁玲的人，无法评论她这种坚持妥当与否。记得她刚刚写完《牛棚小品》后拿给我看，我一边看，一边心里又惊异又赞叹：丁玲又写这样作品了，就像过去她写的《不算情书》，人世间能有这样真挚的情感，是多么感动人啊！丁玲和陈明之间的亲昵我看过很多，我曾说，他们的爱情是书本上才有的古典爱情。现在《牛棚小品》里把这种爱情细腻的、棉棉如絮地描绘出来了，

这就是丁玲。这就是写出《莎菲女士日记》的丁玲，才能在过了古稀之年，仍保有青春少女的情怀，实在可圈可点。

我看过后，丁玲问我如何？我不敢提这篇东西是属于《不算情书》、《莎菲女士日记》等，这一传统的。只对她笑笑，就把稿子还给她。后来我看她发表的日记里记着：张凤珠看过《牛棚小品》后，一言未发。

丁玲在北大荒生活十二年。用她的话说，她是脸上刺着金印去北大荒的。那一年她 53 岁，还不能从零作起，而是要从负数作起。在北大荒她受尽了冷遇和屈辱，当然也有暗中的同情，纯朴友好的帮助。不幸的是漏屋又逢连夜雨，由于王震的关照，她的处境本已经有了改善，并给她创造写作条件。想不到“文化大革命”来了，那样的革命，在丁玲这样人的身上，会实行什么样的专政，是可想而知的。她把这十二年的经历写了一部书，叫《风雪人间》，对照另一本，写国民党软禁她的那个《魑魅世界》，北大荒经受再大苦难，她认为这里还是人间。就是离开以后，对北大荒她仍然充满感情，有时谈起养鸡场的饲养经，她总是津津有味，谈收获季节的壮观场面，常兴奋起来，说话节奏都成跳跃式。

1979 年末，第四次文代会期间，高莽为她画一幅像，约我一起送去给她看，她很高兴，认为画得像。高莽请她题辞，她不假思索写了“依然故我”四个大字。我想她这是

在宣告：这就是丁玲，她的心，她的感情，她的灵魂是没有
什么力量能够改变的！

后来美术学院教授侯玉民要为她画像，她接受了，提出
希望：以北大荒原野为背景，在春天的早晨，她在出工的路
上看见日出，风吹拂在脸上还带有寒意，树枝上还残留积雪，
但土地在苏醒。

离开北大荒八年多了，苦难被筛选掉，留在记忆里的：
是充满希望的劳动欢快的北大荒。

有一次旅美华裔作家於梨华来拜访丁玲，丁玲那时还住
在友谊宾馆。丁玲谈起她在北大荒的生活，讲述她在那里养
了八年鸡，几乎成为饲养能手。她有很多饲养方面的趣事，
讲的很有兴头。但是於梨华听的难过，甚至流了眼泪。於梨
华说：“丁玲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怎么竟会让你去养鸡
呢？这不是对天才的糟蹋吗？你怎么忍受得了呢？”

对於梨华这一连串地问，丁玲沉默有顷才回答：“我爱
我的文学事业，但我首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可以在任何
处境下，去做任何事情。在延安时我们参加过大生产运动，
劳动对我不是负担，也不是耻辱。我是作家，下到基层去，
更接近了人民。这对作家，从另一个角度看，还是难得的收
益。”

对丁玲这些话，有一段时间我总在心里琢磨，犯疑惑。
在蒙受廿多年沉冤，吃尽千辛万苦，忍受了非人的折磨以
后，她怎么竟会是这样心理状态？矫情吗？故作姿态？又不

像。这类话，她不仅对外说，写文章说，私下朋友间谈话，也是这个态度。有一次七·一纪念党的生日，在党员座谈会上，她十分动情地说：“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是经过多少挫折和徘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在任何处境下，我都不会有丝毫动摇。我何必诉苦，也不必去埋怨，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帐，更不能讲等价交换。”

我听了她这个发言很感动，她讲的真诚。我年轻时就在她身边工作过，不敢狂妄地说对她了解，但她绝不是个虚伪的人，不是好作戏的人。这些话我相信是从她心底发出的。我曾和人说过，湖南人性格大约是这样的，认定的东西就执著到底，至死不渝。由丁玲我也想到冯雪峰。冯雪峰在病榻上已别无所想，别无所求，惟一的希望就是在他一息尚存时，能回到党内。对这样一个生命垂危的人的愿望，我们能忍心提出任何质疑吗？

关于丁玲“左”还是不“左”的话题，议论很多，从80年代说到90年代，各有说法。要把这些说法弄个清楚明白，似乎不是容易事。因为在表面文章的背后，有文坛太多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现实总会有历史的沉淀。看丁玲也只能从她整个儿一生去看。她的一生太传奇。她的经历、所承受的苦难，在作家中找不出第二人。20年代的丁玲，用今天的语言描述，她应该算最前卫的女性。所以她才能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作品。她也曾不无得意地说过：

“我一出台就是挂头牌。”事实如此。在文学创作上她出手不凡。她寄给叶圣陶主编的《小说月报》第一篇小说《梦珂》，就很得叶圣陶赞赏，亲笔写信给她，让她继续寄稿。她又寄去《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月报》以头条刊出，丁玲名声大震，文坛争相讯问：丁玲是何许人？至此，她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位置。

50年代在她身边工作时，曾听她谈起在北平时想做电影演员的故事。她去找戏剧家洪深，洪深看着眼前这位年轻姑娘，一身朴素，以为她想当演员是为了寻求生路，便劝她不要轻易去干这一行，要想找份工作可以另想办法。丁玲对洪深说：我想演电影是为了实现对艺术的追求，我把它看作一种事业。洪深被她语气的热切打动了，介绍她到上海去找田汉。丁玲还真的在明星公司的水银灯下试过一些镜头。但她不能适应电影圈里那种生活方式，男男女女整天演戏似地打情骂俏，搂搂抱抱，这种行为令她厌恶，无法接受。她谢绝田汉的再三挽留，逃离似的又回到北平。明星梦破产了。讲完这些经历后，她哈哈大笑说：当初若是留下演电影，今天很可能就是吴茵了。

丁玲在文坛出现以后，连续发表作品，盛名一直不衰，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个高峰吧。孙犁曾这样形容过她：“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不只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

几乎每一次都是，在她人生得意之后，噩运也就在不远处等待她了。

1931年胡也频被捕牺牲。她是在胡也频牺牲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情况下参加党的。她说过：人们都以为我是受了胡也频的影响才革命的，实际不是。我18岁就到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校读书，接触过像瞿秋白这样共产党领导人。在北平时，胡也频对革命没有什么接触。那时他和沈从文相好，他写的东西，沈从文给拿去在京报的副刊上发表。我从来没在北平的报纸上发表过东西，我恨透了京派文人。在这种心境下，写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宣伏自己的孤寂和愤世嫉俗。胡也频是受了我的影响，接触左翼文学，参加革命的。胡也频是一旦接受了，参加了，就奋不顾身，在这点上我不如胡也频。胡也频的牺牲激励了我，我不能再让自己在党的外边徘徊，当我决定参加了，我也就再不会回头。

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被禁3年。这3年的经历，构成她一生心灵上沉重的阴影。

丁玲1936年到保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热烈欢迎她的到来。丁玲说她去见毛主席，毛主席第一句话就是：“你是杨开慧的同学噢！”丁玲到保安后住外交部招待所，她说毛主席常在晚饭后，到她的窑洞里聊天，这最是丁玲的所好。毛主席一条腿支在炕沿上，背靠墙壁，海阔天空什么都谈。周小舟是毛主席的秘书，也常随着一起来聊天。丁玲

一心想当红军，要求到前方去，毛主席很赞成她这种愿望。总之，丁玲来到陕北，是位很受欢迎的人。这从毛泽东赠丁玲的那首词《临江仙》可以得到印证。当时丁玲已到前方，刚刚发生了“西安事变”，她在前方正准备迎接新年。忽然聂荣臻司令员交给她一封电报，打开一看，是毛主席发来的一首词：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欢迎出牢人。
 纤笔一支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读过电报后，丁玲又惊又喜的心情是可以想像的。一首词竟用电报发到前方，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丁玲到来的高兴程度。

丁玲回到延安后，去见毛主席，向毛主席道谢，并表示

遗憾，没有手迹。毛主席立刻找张纸，把原词抄了下来送她。丁玲非常珍贵这一不寻常的礼物。抗战开始后，她担心战乱的环境，怕不保险会丢失，便把这幅字仔细包好寄到重庆，请胡风代为保存。胡风知道这份托付和信任的分量。四十年间，他自己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几经迁徙、流放，这幅字仍妥为保存，在1981年完璧归赵。这种对朋友的信义，是十分难得了。

丁玲对胡风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当年丁玲在延安，凡有作品寄胡风，胡风总是想方设法把稿费寄给丁玲在湖南的母亲。丁玲把这份情谊看的很重。但在后来批判，声讨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时，丁玲不管她内心如何想，她都只能一个调子去批判了。这在她心里会有一份歉意吧。那个年代，这类违心的表态太多。巴金晚年在他的《随想录》里，把一笔笔心债都逐一清算了。可惜时间没留给老太太做这件事。

还有一段小插曲，我想就插在这里吧。当我在丁玲家看到梅志送还的，毛泽东手书《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的条幅以后，立刻就感到这是《新观察》杂志应登的文章。我抄下这首词，加了几句按语，在《新观察》上发表了。刊物出来后，《解放军报》立刻就转载。想不到时过不久副主编杨犁告诉我：作家协会一位领导，对《新观察》登这篇文章不大满意，并问：这篇东西是不是张凤珠拿来的？杨犁和我说：“我只能如实相告。”

这就奇怪了！文章《解放军报》已经转载了，可见没有政治问题。毛主席的诗词嘛！有什么可不高兴的？难道就因为这首词是写给丁玲的？这和谁拿来的又有什么关系？文艺界真是内幕重重，而丁老太太的处境微妙得很哪！

丁玲到陕北最初几年，可以算做她人生旅程上第二个高峰，是她生命最昂扬的时期。当红军，到前方去，结识了许多领袖人物，开国后的元帅，像彭德怀、贺龙、聂荣臻等。她那篇《彭德怀速写》直到今天仍是脍炙人口的好文章。

抗战起后，丁玲组成“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团长，开赴晋察冀，1939年又回延安。逐渐地，生活似乎不再像初到陕北时那样单纯了。丁玲常说她处事太天真，因为考虑不周全，常搞不好人际关系。有两件事她得罪了江青。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丁玲收到请柬，那是周末。恰好延安保育院捎来信，女儿蒋祖慧病了，让她去接。她已和党校借好马，如退掉再去借，很麻烦。她没有出席这个宴请，不料被认为是对婚事的态度。另外一件事，便是她那篇获罪文章，到1957年还要拿出来“再批判”的“奇文”《三八节有感》里面有一句：“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被认为这是讽刺江青的。

我想那时的丁玲确实没“改造”好，一片天真，有所感便有所发，全不懂世故和利害，她哪里会想到，为一篇小文章，要背几十年的沉重包袱。

《三八节有感》虽然在延安引起轩然大波，但在整风中

毛主席保了丁玲，毛主席说：《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不同，丁玲的文章有批评也有建议，而王实味是“托派”。有此话，两人的处境当然有极大不同。丁玲是十分感念毛主席的。50年代她常说：毛主席是真正懂文艺的。也说毛主席了解她。当她从山西回北京后，我曾问过她：知不知道1957年“再批判”的编者按，是毛主席修改的？她说：当然知道。对毛主席的文笔我们是熟悉的，一看就明白了。她没有说她明白以后，是什么样的心态。

《三八节有感》对丁玲的打击虽不是致命的，但造成心理上的影响却很深远。几十年后在她的日记中还记得有：“文章要写得深刻点，生活化些，就将得罪一批人，中国实在还未能有此自由。《三八节有感》使我受几十年的苦楚。旧的伤痕还在，岂能又自找麻烦，遗祸后代。”

这是沉痛的自白。几十年的苦楚，如不是身受者，如何能有这份切肤的体味呢！读过她这样自白，对解读她晚年的心境，可能多一点了解。

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有几年短暂的辉煌。《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52年荣获斯大林文艺奖，更使丁玲如子夜高悬的灿烂明星，我想这是她人生的顶峰了。正如老子所说：“福兮祸之所伏”，从1955年开始，她就逐步走向深渊，而且几乎是灭顶之灾。

丁玲一生的遭遇都是死去活来的。两度坐牢，所以有人

讽刺说她：30年代坐牢，因为文章是红色的；70年代坐牢，文章成为白色的了。

按理说，丁玲不应该对别人构成威胁。她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有创作的雄心，名作家意识。抗美援朝时，她送巴金等一批作家去朝鲜前线，自己因为职务在身走不开，难过得流眼泪。50年代，我看过她写给胡乔木的一封信，也是希望能卸掉职务，让她搞创作去。我记得她信里有一句话说：50岁对女同志是一个痛苦的年龄。我那时年轻，不懂得为什么50岁对女同志痛苦，因此印象深刻，记住了。

1955年，她本来一身轻松躲到无锡写长篇去了，却仍然没有躲过灾难。我曾想过，这是否和她性格有关呢？解放初期她主编《文艺报》，处于当时的大环境，《文艺报》在开展文艺批评上，气势凶猛，得罪了一些人。直到90年代还有人在说：一篇文章“消灭”了肖也牧。康濯晚年在丁玲面前也提过肖也牧这件事，老太太很气愤，认为她写那篇文章，是善意帮助，有分析，不是打棍子。可能是这个意图。但以《文艺报》的地位，又不止一篇文章，在当时的气氛下，等于给一个人定了性。肖也牧后来再没有作品，而且遭遇凄惨。我又想过，她在《文艺报》的合作者，如果不是陈企霞，又会怎样？我不熟悉陈企霞，只感到他太锋芒毕露，使不很尖锐的矛盾，也尖锐起来了。

对党内斗争，丁玲心里有清醒意识。一开始批判胡风，她就敏感到可能对她也要下手了。1955年春，有一天我遇

到马烽，马烽和我说：你给丁玲写封信，告诉她，如果作协通知她回来，立刻就回，不要推拖。我不大明白马烽的意思。后来才清楚原来马烽已看出批判的潮头推向丁玲去了。

1955年末，中宣部向文艺界传达中央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批示。在此之前虽然风闻作协正开会批判丁玲，但没想到竟达到反党高度。而所加给她的罪名，却不免使我犯疑惑。说她提倡“一本书主义”，这是新词儿。只听丁玲常鼓励文讲所的学员，要拿出好作品，写出好书，不只一本。现在加上个“主义”怎么就把原义全变了呢！还有制造个人崇拜，具体例子就是文讲所挂像的事。这件事从头到尾我都清楚。文讲所在1953年接待德国作家，在会议室里挂了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几个作家的照片。丁玲并不知道此事。文讲所的砾斐有一天来看丁玲，谈起此事，丁玲立刻把我叫了过去，问我是否看见了这些挂像，我说看见了。她一边批评我不向她报告此事，一边让我立刻给田间打电话，把她的照片拿掉。我不明白她的用意，先去把电话打了。第二天她又嘱咐我，去文讲所看看照片是否已拿下来。这一回她才说了理由：怎么能这样挂像呢？还有几个副主席嘛，为什么不挂巴金、老舍的？他们这样作事太欠考虑。

挂像的事与丁玲无关，而且她纠正了这种作法，这怎能算她的错误呢？那时我太没有政治经验，正如有人批判我不知天高地厚。在党的小组会上，我把挂像的前后经过说了一

遍，意在澄清一下事实。小组会上没人反驳我。但这件事一到作协领导那里，我就成为大逆不道了！在开作协会体党员会时，此位领导在讲话中，忽然把手指向我，声色俱厉地训斥，说我斗胆妄为，在听过中央文件传达后，还敢替丁玲辩护，要查查这样的人是怎么入的党。我想如果没有党章管着，他会立刻开除我的党籍。

我没经历过这种阵势，完全吓傻了，低着头，不敢抬眼看他，但可以想像得出，他那张本就白皙的脸，加上一幅蔑视的神情，是多么令人发怵了！一位诗人形容过他：哪怕摔个跟头，也要摆个姿势。

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误，我说的是我亲自经历的事实。丁玲不管犯了多大错误，但这件事责任不在她身上。为什么如此凶恶地不许人说出事实真相呢？当时我云里雾里，内幕是多少年后才有所闻。已经有多少人付出青春的代价。从此我懂得了有人可以用组织的名义颠倒黑白。

文件传达后，周扬在讲话中，讲到丁玲在上海被捕问题，说组织上将进行审查。

被国民党在南京软禁三年这件事，一直是丁玲心灵上的阴影。50年代她在同别人谈论周扬时，曾说：那是个幸运的人，历史上没经过什么，从上海就到延安了。对她这样含义不清的话，我当时没什么联想。现在看来丁玲也不了解周扬，他们是各有心腹事。前两年读龚育之文章，谈到周扬在作肺癌手术前，曾和人说：他有两个癌，一个是肺，一个就

是30年代。那已是“文革”前夕了。假如当年他们之间，能坦诚勾通一下，又会如何呢？

南京这段历史缠绕丁玲半个世纪。一个人这样长期地处于要为自己辨白的心态，这是一个沉重的压力。1984年，中央组织部下发了为她彻底恢复名誉的文件，称赞她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看到文件后，丁玲和陈明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实际仍有异议。无非两个问题：冯达的事；还有就是写过一个小纸条；表示出去后，回家养母，不参与社会活动。

丁玲说，在延安时，她曾和周恩来总理说过冯达这件事。周总理说：你们原来就是夫妻，在当时那种具体困难处境下，可以理解。

李之珪50年代是中宣部党委书记，是丁玲历史审查小组成员，组长是张际春。李之珪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到：他们听取丁玲“陈述她被捕后怎样应付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于无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难料后果，处在悲愤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她禁不住时断时续地泪流不止。”“谈话结束，丁玲走后，张际春对同志们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表现了无限的感慨。”

不是说看人不要看一时一事吗？看丁玲一生的历史，难道还不能证明她对革命的态度？她是在丈夫牺牲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参加党的，这个行动可以称得上悲壮。国民

党逮捕她后，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审讯关押她，改用软禁政策。她始终没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拒绝敌人一切威胁利诱，不给敌人作一点事，国民党宣传方面的头子张道藩亲自邀请她也不答应。只一心地千方百计找党的关系。一旦接上关系，就一心奔陕北苏区去。她到西安了，潘汉年还找到她，希望她用自己的影响到法国去工作。她仍不为所动，一心只想去陕北。谁都知道那时革命很艰苦。

1979年，她又回到北京，虽然已是“右派”改正高潮，但她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纠缠的仍是这段“历史问题”。这压在身上的沉重石块，不能不影响到她晚年的心境和处事。

1979年7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重印前言》，当时她还住在友谊宾馆。我去看她时，她问我读到这篇文章没有？听我回答读到了以后，她又问：有什么反响吗？我说：这是你亮相文章，怎么会没有反响？都很注意。她问：都有些什么议论？我迟疑一下，回答她：有两种看法，一是不相信，她立刻问：不相信什么？我说：不相信你说的是真话。还有一种就是不理解。她问：你是哪一种啊？我说：第二种。我不能理解你经过廿多年致命的打击以后，怎么还能像苏联小说中，红军战士喊着为斯大林去冲锋那样，说自己是为毛主席而写作。她说：我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时就是这种感情。我说：可是你这篇文章是现在写的啊！她沉默有顷，笑笑说：看来这廿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我倒是认可这种说法。但是老太太说的政治的具体含义，我并不清楚。

在1979年，那时老太太很想让我再到她身边工作，但我力不从心了。我和她说：我现在不是20年前，单身一个人。如今携家带口，负担很重。你最好找个年轻些的。你要个秘书还不容易吗，想来的人多着呢。老太太回了我一句：我能随便请个坐探到身边来吗？这话当时让我吃了一惊，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我比较迟钝。我不大会体会丁玲回京后，所承受的如她所说的，文艺界宗派势力的压力。另一方面，我对周扬在文艺和政治思想方面所进行的反思，他的忏悔，得到一些中青年作家的谅解和拥戴，却感受突出。我认为丁玲常在讲话中，敲打周扬几句，不明智，效果适得其反。丁玲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语气影射周扬。就有学员在下边议论，怎么只反大臣，不敢碰皇上呀！我自以为比老太太懂行情，便经常在她面前讲：周扬如何反思，如何检讨自己，如何受到欢迎等事。我的用意无非想提醒丁玲不要再在讲话时讽刺周扬，弄不好，反而损坏自己形象。老太太不爱听我这些话。有一次在一个人面前说：张凤珠什么意思？总在我面前给周扬唱赞歌。这个人劝告我：别说了，没有用。

后来我又听说丁玲写了一篇《也频与革命》，是指责沈从文的。丁玲认为在30年代，沈从文写的《记丁玲》是对革命者的污蔑，据说有一百多条不实之处。说沈从文以为她

死了，就任意编造。

我没读过《记丁玲》，是非曲直无法判断。

但是有一点感觉很明确，何必去批沈从文。我不敢向丁玲表达此意，便和陈明说：沈从文自解放后，被迫停笔，终止文学创作，十年前在故宫当讲解员。人们都非常同情他，对他过去在文学上的成就，也重新评价。在这样时候去批评他，会引起人们反感。

陈明说：他的书里失实之处太多。丁玲也不能让这种以好友自居的胡说，任其谬种流传啊！

我无话可说。

丁玲可能从来就不喜欢沈从文，包括他的作品。有一次古华来她家作客，古华的《芙蓉镇》刚刚得了茅盾文学奖。谈话间，老太太忽然说：古华，你们不要学沈从文那一套。

听到这样一些话，我只能感到老太太对这一代人的所喜所恶，不够了解。

丁玲曾说：作家的生命在于作品。后世人会记得那些古往今来的大作家在他们书中所写的人物，却不一定去研究作家的生平。

非常可惜，丁玲的晚年，却因为太多的干扰，影响了她有更多种作品问世。

丁玲真是“极左”吗？

凡是听过丁玲谈文学、谈艺术的人，都认为那绝对是一个作家的见解和体验。去年苗得雨把当年丁玲在文学讲习所

谈读书的笔记，整理出来发表。邓友梅又补充一些谈话背景。邓友梅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话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有人对此表示守同感，就因为了解她。”

最近又读朱健国文章，讲到丁玲在短篇小说评奖中主张“首先要保证艺术性，没有艺术性怎么有思想性。”朱健国说：“曾经流传丁玲晚年‘完全极左’的传说，并不尽然。”丁玲始终保留了一个一流小说家应有的基本追求。

50年代，有一件事我至今印象深刻。那时我住在丁玲家里。有一天我在院子里，忽然听见上房传来哭声，当时陈明不在家。我非常惊异，忙跑到窗前往里一望，见丁玲坐在一个凳子上，掩面大哭。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忙推门进屋，丁玲止住哭声，把手拿开，看见是我，擦了擦眼泪才说：我正看胡伏的一本小说。这个胡伏真会写东西，写的好，看着看着我不由地就哭起来了！

听到有这样的书，能把丁玲感动的大哭，我恨不立刻就抓到手看。后来我看了，写新四军行军途中一人。由于引起联想不同，我没像丁玲那样大哭。

后来这部作品传给作协一些领导看。完全是另一种声音：怎么写行军竟写一些瓶瓶罐罐、婆婆妈妈的事，看不见一点英雄行为。

丁玲还能说些什么呢？

大约是在1980年，刘宾雁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好像叫《警告》。丁玲不喜欢这篇小说，说：他怎么把环境和色彩都写的那样阴森呢？

我向老太太说：你可别去写文章批他。老太太说：我怎么会去批他，他现在写的很艰苦，又总被点名，我不会去批他。不过我也想写个类似的故事，题目叫《公墓》。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北大荒，有一个老场长，是个老红军，艾青当年就在他的场里。这个老场长在军垦战线上，是功勋卓著的人。他是第一批带人到完达山脉进行勘察的人，建立起农场。“文化大革命”中挨斗，被专政。后来死去了，造反派说：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不能葬在公墓里边。看公墓的老头心里说：好吧，不让葬在公墓里边，就不葬在里边。他另寻一块风水好的地方，把老场长安葬了。不久，又一个老军垦战士死去了，死前遗言，不进公墓就埋在老场长的旁边。陆续好几个故去的人，都留下这样嘱咐。于是在老场长的坟墓周围，一圈新坟起来了，形成一个新的公墓。

丁玲讲的比我所记的生动多了。她确实满腹文章，只可惜没来得及变成作品。

可庆幸的是她留下了《魍魉世界》和《风雪人间》两部作品，这是向历史作的交代。丁玲的经历，反映出中国半个世纪的曲折和苦难。她是历史人物。

以丁玲这样经历丰富，对人生体验宽广，加上她所具备

的艺术素质，如果天假以年，或者没有别的干扰，她一定能写出更为传世的作品。这是文学的遗憾啊！这里有时代的悲剧，是否也有个人的悲剧呢？

丁玲本来是把人，把社会，把历史都看得透的人，但是她没超脱。这也是时代的烙印吧。我常深深为之惋惜。我感到当代文学评论对她不够公正，但是丁玲的作品会存在下去，而一切非文学的恩怨纷争，将会退隐到历史深处。后人只能以丁玲的作品来论述丁玲的成与不足吧！

舒群的故事

在少年时代我就知道舒群的名字。不记得是什么机缘，我居然读到一本当时是“非法”的书，书名叫《没有祖国的孩子》。

实际上那时我还不能深刻理解这本书的蕴涵，首先是那书名震撼了我，因为在沦陷的东北，我也是个失去祖国的孩子！

多少年以后，我竟真正见到舒群了，而且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是我的“首长”。那种惊喜，也只有青少年时才会拥有的感情。

舒群没有我想象中作家的仪表。他过于严肃。黧黑的方

脸，五官像用刀刻似的有棱有角，缺少柔软线条。鼻子笔挺，眼睛很大很亮，只有当他笑时，一下子满脸挥洒着灿烂的阳光。这很矛盾，就像他的性格。

1949年，虽然他已是“首长”了，如果用现在衡量年龄的标准，他还很年轻，36岁。

四十多年过去了，“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是在外地听到舒群的死讯的。手里捏着报纸，我无法说出内心的感受，有很深的痛苦，太多的遗憾！但回想到他生前的种种，又不免为他的解脱而轻嘘一口气。对于一个太疲倦的生命，死也是一种休息，现在他获得最后安息了。

人们说“盖棺论定”。舒群可算一生坎坷。他在自己文集的序言里有这样一段话：“当今之世，大致如此：在生时，作品多以作家的命运为命运，而死后的若干年，作家却以作品的命运为命运，或各有各的命运。后人铁面，历史无私。”在舒群这一生里，尽管有过多少难言的苦难、折磨、愤懑，一旦“盖棺”之后，这些全都成为“俱往矣！”在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段，萦绕在他心怀的，大约只有他的创作。他给我们留下二百五十万字作品，他遗憾的是留的太少了！

还会有“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的慨叹吗？

1

舒群说过：“是历史给我的幸运，工作使我和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

因此要把毛泽东这位当代伟人艺术地再现出来，已变成他梦寐以求的夙愿，他认为这是他的“历史使命”。为完成这一夙愿，他酝酿了近半个世纪。

记得还是50年代初，我曾在他家里见过他保存的一些毛主席写给他的信。那些信都是用铅笔写的（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在看到信时心里想过：啊，毛主席竟用铅笔！）字迹龙飞凤舞，我记忆犹新，内容却模糊了。当时他也没让我们仔细去看，只记得舒群抚弄那些信的神情，就像捧着一些稀世珍宝，无比尊贵。在青年时代毛主席是我心目中的神，而舒群和毛主席有过交往，毛主席给他写过这样多封信，我很惊叹，舒群在我心目中也高大起来了！

后来我们都在1957年那场惊涛骇浪中没了顶。有二十年的时间我不再关心文艺界的事，关于舒群更是音讯渺渺了。偶尔想到他，不禁思量着：这样倔强的人，他将怎样去度过这劫后余生呢？

1978年，中国的地平线初露霞光，我们在北京又见面了。他住在和平宾馆一个小房间里。他当然老了，脸上的皱

纹记录着多年的风霜。但是那眼光，那方方正正的下颌上的倔强神情还没有变。他淡淡地叙述了二十年间的遭遇，包括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要了他父子三条命的噩运时，他的声调都是平静的。只有讲到那些抄家，抄去了他无比宝贵的一些信函，还有近百万字的手稿：一部写抗美援朝的长篇《第三战役》，还有就是《毛泽东故事》，已写就三十万字了！这时他才痛心疾首了。皮肉之苦无所谓，经济上的损失更是身外之物，而他的作品，却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我惊问：“连毛主席的信也找不回了么？”他摇摇头。“找不回了！”那种绝望的悲哀，使听者无法不为之动容。他说：那些信件如果毁掉了，是历史的损失。

也是50年代初，我曾看过他的一个笔记本，上面记了很多毛主席的谈话，一些零散的句子，有些是很幽默很风趣的。舒群说这都是他搜集来的。他说：这些谈话有伟大哲学思想的光辉。

他一直在为写《毛泽东故事》而做准备。

《毛泽东故事》出版后，舒群抚摸书的光滑封面，轻轻说：“这样一本小小的书，耗去了我半生心血。”

实际上，写《毛泽东故事》舒群是给自己出难题。这不是一般题材，如何去表现毛主席这样一位当代伟人，正确地反映历史，难。在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有很多事件还是禁区，不好碰，也鲜有人敢碰。舒群的遭遇，已经有过沉重的教训，付出了生命四分之一的代价，他还去闯这份风险

干什么？

我想这是因为爱。否则就不会有这份执著，这份勇气，这样呕心沥血非把这本书写出不可！

八十年代中期，在和他一次闲谈中，我偶然问及：“在你经历过这样多不幸遭遇以后，你对毛主席的感情有没有变化？”

他愕然。沉默地看了我一会儿，那眼神有些诧异，可能还有对自己感情的掂量。他明确回答我：“没有。你们没接触过毛主席，不理解。他对中国革命真是挽狂澜于既倒，功不可没啊！毛主席的魅力，他的领袖风度、才情、幽默感，凡接触过他的人，无法不为他倾倒。在晚年他犯有错误，但那时我距离他远了，感受不同。而且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想他的这种感情、体会已经写进《枣园之宴》里去了。

在《毛泽东故事》里，我比较喜欢《胜似春光》一篇。因为对这里的人物和故事我稍有接触。

1949年在沈阳，东北文联招待全国文代会代表赴东北参观，召开欢迎会。舒群陪着一个人来到会上为大家介绍：“这是朱光同志。”朱光是去广州赴任，途经沈阳。我很惊奇地观察朱光。我读过威尔斯的《续西行漫记》，她说：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在我眼前的朱光确有才子风度，不愧是南国社一员。会上的人欢迎朱光讲话，我只记得朱光为大家朗诵一首他自己的诗。不知

那诗是他即席吟成的呢，还是早有腹稿。他用铿锵有致的声调慢吟：“四载风云塞北行，肩巨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

到80年代，我见到舒群家中墙上挂着一幅朱光写的条幅，就是这首诗。字写得极好，画轴经过离乱岁月，有些残旧了，但是能够保存下来，已经多么不容易了。这个条幅朱光是在毛主席家中写成，毛主席还给改过下款：“朱光一九四九年秋于南下之日”。

这就是《胜似春光》的部分背景材料。

朱光的夫人和女儿很赞赏这篇作品。朱光的女儿朱嫩莘和舒群说：“看了《胜似春光》我们一家人都很激动，很感激。爸爸的老战友写过一些回忆文章，没有一篇能像《胜似春光》这样生动传神。”

舒群说：“朱光的女儿是从国外回来的，很有气魄，我想这就是新一代的女强人吧。她一定要请我们一家人去长城饭店吃饭，我不习惯，又情不可却。她用的是国际信用卡，我是第一次见识到这么一个小铜牌牌。和朱光女儿的接触，我深刻地感受到两代人生活经历的差距。”

朱光夫人对我说：“你别不安，就让她请，她喜欢你写朱光的文章，心里高兴。”

得到这样理解和称赞，舒群当然是高兴的。

也许有些人宁愿读毛泽东同志的正史而不愿读作家的这种创作。但我觉得像《毛泽东故事》这样的作品，至少可

以使后来的人获得一种宝贵的心灵资料。那就是在这一代人中，虽因领袖人物的失误而饱经苦难，但仍不改初衷，虽九死而不悔，努力去向伟人认同，这种魅力的来处不值得人深思吗？它积淀着多少历史的、社会的，个人性格气质等多方面的复杂因素呢！

2

舒群是有些怪脾气的。尤其到了晚年更容易激动。自己也叹息：“年纪大了，愈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心理上本没有任何准备，只要什么事触发一下，一连串激烈的话就会冲口而出。”为这脾气我想他不仅伤了别人，更伤了他自己。这脾气和他一生坎坷遭遇也有关联吧。

其实舒群是一个很善良很重感情的人。50年代初期我在他领导下工作时，听说北京有个中央文学研究所，不禁心向往之。我向领导要求去学习，获得同意。当时文学研究所所长丁玲正在大连养病。舒群同志为我写封推荐信并派我去大连面见丁玲。

这是我第一次很近的见到了丁玲。在我心目中，丁玲这样作家太大了，我很拘束。但是丁玲当时给我的印象却十分爽朗。当然她很有气派，是个见过世面的大作家。她看了舒群的信后，简单地问了我的情况。在座的除了陈明以外，还有

电影界名人袁牧之。他们谈起舒群，从这些谈话中，我感到丁玲和舒群有很好的友谊。

舒群后来曾谈起过他和丁玲的一段轶事。抗战初期，舒群做战地记者在敌后采访。有一次天色晚了，他恰好赶到丁玲带领的“西战团”驻地，舒群留宿在“西战团”。但是男团员宿舍已无空位，无奈，丁玲笑说：“今晚你只好住女生宿舍了。”

舒群说：“女生宿舍是一铺大炕，我看到女团员们已经挨盘地睡了一炕。我只好在丁玲铺盖旁囫圇着睡了一夜。那是战争年代，在那个年代里，生活和人们的关系是多么单纯啊！丁玲待我如兄弟，她大我九岁。”

可能就因为推荐人和所长的友谊，我终于到文讲所学习去了。当年我为这一机遇十分兴奋，感到幸运极了！怎能料到几年后的噩运呢？“株连”这个词，我只在历史书上读过，历史，那是遥远的过去，而五十年代，我们头上是万里晴空，对生活所出现的曲折，我完全没有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准备。

命运的安排。不知是它找上了我，还是我找的它，反正到了1957年，因为丁玲，因为文学讲习所，我被卷进了风浪。听说舒群也未能幸免。我听当时和舒群同一个支部的李纳说过：舒群已身处逆境，站在悬崖边上，但他还要为别人说话，这是很难得的。

1978年，我在北京再见到舒群时，他竟对我说出这样

一篇话：“后来我辗转听到别人说你结婚了，才算放下心来。我怕你受不了政治和生活两方面的打击。我一直感到对你的遭遇我有些责任，如果不送你去文学讲习所……”

如果，唉，世界上的事怎么能这样如果呢！舒群同志，你以长者之心爱护青年，却又过分为别人着想，连对与你毫不相干的事，你都要这样自责，这种品格和那种文过饰非的人相比不是相差太悬殊了吗？

舒群一生历尽忧患，但是他很少自哀自怨。他说：“痛苦使人思索，思索使人明智。”

他参加过抗日义勇军，在黑龙江当过第三国际的交通站长，和肖军、肖红、罗烽、塞克这些人从事左翼抗日文艺活动。舒群讲过他和肖军、肖红的一段故事：当他在洮南县担任第三国际代表时，大约有八个月时间，每天发给一元钱津贴，实际四角钱就可以过得去了。因此，节余下了一笔钱，曾上交，组织不收，让自己留用。1928年哈尔滨发大水，他听说母亲在讨饭，正准备把钱给母亲带去，恰好肖军、肖红出版《跋涉》急需钱，舒群就把这笔钱给了肖军。

听这段故事已几十年了，那种艰难时刻的革命友谊永远让人感动，所以一直记在心里。

80年代初，肖红在沉寂了四十年以后，忽然重新在文坛上煊赫起来，这是历史在给予补偿吗？我曾问过舒群为什么不写有关肖红的文章？舒群说：现在是争相研究肖红，我不必赶浪潮吧。但他谈论起肖红，却满怀感情：“肖红实在

是多才的人，太多才了！她写文章、做饭、缝衣服，干活，都是巧手。而且无论她做什么，都是哼着，唱着，像玩儿似的做的，手脚麻利又灵巧。肖红是很含蓄、有内秀的人，很活泼但绝不张狂，她太单纯了，在那样社会，这是致命伤！

“肖红可算是红颜薄命，她一生不断上当，受欺骗，而且总也逃不脱感情上的纠缠。

“肖红曾把她的《生死场》原稿交我保存，可惜都丢失了。这部原稿有很珍贵的文学史料价值。我看过肖红那份原稿后，十分真切地感受到鲁迅对青年的爱护。那情谊太深厚，那份耐心也是少见的。《生死场》几乎每页都有鲁迅的亲笔修改，蝇头小楷，用塼砂圈点，空当处写不下时，就划一道引到额上去添加，就是那一道，都画得笔直，字迹更是工整有体。当时我想过，就凭鲁迅为青年改稿的细致耐心，他就是不朽的伟人。”

“鲁迅在《生死场》这部书里，替肖红抹去一百多个‘了’字，当时我数过。我很奇怪，曾问过肖军：肖红怎么会在书里写那么多无用的‘了’字呢？肖军说：每当她写不下去时，不管该不该，她就写个‘了’字，先做一结束。”

舒群笑说：“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肖红性格上的天真。”

舒群心里装有很多文坛轶事，很可惜他全带走了。他曾和丰子恺有过亲密交往，保存许多丰子恺写给他的信，哪怕在战乱中都没舍得丢掉。这些最宝贵的东西全在“文化大

革命”中毁于一旦。他无数次叹息：“丰子恺的每封信都是书法珍品，一篇优美的散文。可以说是艺术瑰宝。”

我曾建议他把这些写下来，他的经历这样丰富传奇，只要记录下来就很有价值了。

他摇摇头说：“我还是要写小说，我还没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写回忆录不是创作。”

不必在这里评判这种见解是否妥当，但这就是舒群。在创作上他有自己的追求。他写小说，十分注意结构的完整，讲究文体，用字用词都精雕细刻，有时不免过于雕饰了，但他要有自己的风格，不愿落入别人巢臼。他的手稿也反映了他的创作态度，每篇都是极小的隶书，干干净净，工工整整，一丝不苟。甚至改过的地方都要涂抹成一个个小黑方块。我曾感叹：这过于认真，也消耗了他所余无多的精力。

他做事从不取巧，不去追求一鸣惊人。赴时髦也是一种庸俗。

1988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了，他常硬撑着走出家门，蹲在虎坊桥展览馆那高高的石阶上，望着街上车水马龙在他眼前浪涛般涌过，生活是喧闹而有生命力的，一切都充满了生机，而他自己却在走向衰亡。在这样时刻他会感到苍凉和寂寞吧，他心里都想些什么呢？回顾自己的一生？在他历尽沧桑的生活里，文学创作始终是他心灵上一块浓密的绿荫。他还有许多东西想写，只是命运不给他时间了！

他有什么追悔吗？谁也不知道。我想他一定已经超越了

自得或懊悔的境界。在中国二十世纪的人文年轮中，他属于其中无法抹掉或移动的一环。对这一环，后人应该是应该超越出感情用事的水平线，给予尊重与珍惜的。

舒群同志已去。他留给我们的，将不仅仅是追怀与思念，对以他为例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应该做为一个科学课题，予以研究。

我看
丁玲
和舒群

胡 健

胡健简历

胡健 女，满族（正蓝旗），生于北京。祖籍山东青州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工人日报》文艺部主任。此前做过军队卫生员、工人、记者。从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写作，出版过长篇小说《恋神》及中篇小说集《心里有事》。其中《恋神》获全国满族文学创作三等奖，中篇小说《后顾之忧》获“十月”文学奖，北京市建国四十五周年优秀作品奖。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

1986年，参与中央电视台节目制作；1993年至1996年，出任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特邀主持人。曾先后主持过“东方之子”和“实话实说”节目。主持风格稳健成熟，具有冲击力。先后采访过我国政界、文化界、科技界、教育界、艺术界及工、农、兵、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百多人，其中包括对吴仪、萧克、李沛瑶、程思远、李政道、丁肇中、陈章良、王洛宾、张贤亮、陈香梅、靳羽西、姜文、巩俐等的采

访。

命运的选择和选择的命运

命运的选择和选择的命运

引言

命运所能给人的启示是不分长幼的。老年人喜欢回顾，青年人喜欢憧憬；而老年人能够从青年人的憧憬中找到的，与青年人能够在老年人的回顾中发现的，实际上是同一种东西，那就是选择。

命运的选择，机会的选择，有的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有的海角天涯，却殊途同归。——人生的不同，只是选择的不同，不在于谁经历了什么，谁没有经历什么，而在于每个人在命运的挑战面前是怎样经历的。……并且，每个人的命运中都包含着一代人的命运。

赵荣声出身于安徽省安庆地区一户四代翰林之家，抗战前就读于北平燕京大学，是“一二·九”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是国内第一个用中文公开报道延安情况的人，并写过

一本书《活跃的肤施》（肤施，延安别称），1937年出版，当时影响很大。后来由于偶然机会他被八路军派往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司令部做秘密工作，孤军奋战。刘少奇、朱德、林伯渠、滕代远等领导同志都亲自指导过他的工作。他在反动阵营中曾与形形色色的人物接触和斗争，富有传奇经历。解放后他遭遇不公，命运坎坷，或沉或浮，也颇有意味。

一、选择的命运

失意的安庆青年

在滚滚长江下游的安徽境内，有一座沿江古城——安庆。此城风景秀丽充满诗情画意，名胜古迹颇多。每当皓月当空，渔歌唱晚，此地渔火点点，光波粼粼，着实令人陶醉。人们常说，这里的江水与岸柳相映衬，春宜晨，夏宜风，秋宜月，冬宜雪，一年四季都有看不尽的美景。

1915年的北京城里，有个颇有名气的安庆人，他创办并主编《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介绍马克思主义，抨

击封建的伦理道德，倡导新文化运动，这位后来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安庆人叫陈独秀。

这一年，正值陈独秀在京城闹腾得红火热闹的时候，在他的家乡安庆城里的名门望族赵家，出生了一个男孩，排行“荣”字辈，取名赵荣声。

赵家的高祖赵文楷（字介山）是清朝嘉庆丙辰科状元，家有数千亩良田，五世同堂，聚族而居。和赵荣声同属“荣”字辈的还有后来成为著名社会活动家的赵朴初（幼名荣续）和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

赵荣声的祖父这一支，在赵家大族中属于家道中落、生活拮据的。祖父辈兄弟十二人各有高官肥田，族人大小百口住在一片大宅子里。赵荣声的祖父因考举未中而精神受了刺激，终日疯疯癫癫，不久便死去了。因此赵荣声一家在“状元府”中受尽白眼，荣声父亲赵纶士终于熬不住，跑到了南京去教书。

小荣声就在这样一个大家族中渐渐长大了。他虽不愁吃穿，却过早地明白了人情世故，饱受了阔亲戚的冷落，在他幼小心灵里埋下了反叛的种子。高小毕业后，荣声随父亲到南京一所安徽中学就读，离开了家乡安庆。

未名湖畔的洗礼

1935年，21岁的赵荣声终于以优异成绩考取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他抱着研究社会、改造社会的雄心，在当时于上海申新纱厂作总工程师的叔父的资助下来到了北平。

燕京大学，位于北平西郊清华大学西南，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一所贵族化大学，它在北京诸高校中有着类似“租界”的地位。

赵荣声虽然出身于安庆有名的四代翰林之家，是书香门第之子，且又有着深厚的国文根底，但和学校的那些洋学生比起来，却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不过同学们很快就发现这位表面文静的安徽同学对各种社会活动充满了热情，无论干什么事都有着一股坚定、执著的精神。

当时燕大在校学生有800多名，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其中相当部分是海外华侨子弟，这些学生大多信仰基督教，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安分守己，对学业也不大关心，他们所真正感兴趣的是学校隔几日便举办一次的舞会、或某位好莱坞明星的传闻轶事，以及几所大学校际足球比赛等等。而他们的理想也只是将来能有个较高的学衔、较好的职业、美满的家庭而已。

然而，在燕大校园里，却一直有思想进步的学生在活

动，那校园西南角处的青冢，便是于1926年“3·18”惨案中英勇牺牲在北洋军阀枪口下的燕大女学生魏士毅烈士墓；那紧锁眉头、悲愤哀伤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家乡沦陷的东北籍同学……

如今，当华北也即将沦陷为日寇占领区的前夕，当越来越多的学生表现出高涨的爱国情绪之时，燕京大学校园中也秘密地出现了进步的知识分子社团组织。

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成立了！

左翼戏剧家联盟（剧联）成立了！

左翼语言学家联盟（语联）成立了！

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也成立了！

在左翼文化总同盟的旗帜下，爱国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逐步团结起来了。

赵荣声中学时代即已接近进步学生，到燕京大学之后，他常与同班同学讨论时事，针砭时弊，因而很快被吸收为“社联”盟员。一个年轻人，思想活跃，有正义感，社会活动能力强，在当时的氛围之中是不可能不卷入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这就是赵荣声所处的时代给予他的环境。

当时他在“社联”写标语、撒传单。夜间，他和同伴们走上街道，其中一人迅速用白灰浆在墙上写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等内容的标语，另有两人一前一后放风，以咳嗽为暗号；有时，他们把领导同志带来的油印传单塞到居民住宅的门缝里。

作为共产党的外围群众组织中的普通一员，赵荣声当时并未意识到，他所做的这一切，正是为党所组织的另一次重大行动奠定着基础。

这便是震撼世界的1935年12月9日的“一二·九”运动。

赵荣声作为燕大一年级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从始至终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中的历次活动。是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熏陶、锻炼了他，使他迅速跻身于少数进步学生行列。

“一二·九”运动除了对实现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全民抗战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还为我党迎接抗日战争培养准备了一大批干部。经历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学生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成为各个抗日根据地的一批十分重要的力量。

不久，赵荣声与进步学生们一起在燕京大学的贝公楼集会，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后来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画在纸上的镰刀斧头

一个人青年时代的活动和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今后一生命运的抉择。

1936年4月的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一位个子不高、30岁左右的男青年找到赵荣声。当时赵荣声已当选为燕大学生会执行委员兼出版委员会主席，并任《燕大周刊》主编。那人就是在《燕大周刊》的编辑室里找到他的。

来者自我介绍，名叫虞悦，说是经一位朋友介绍来找赵荣声的。

赵荣声看他很神秘，索性邀他去宿舍谈。一路上，虞悦谈起学校的学生运动，谈“一二·九”，谈南下扩大宣传团，似乎对学校以及赵荣声的活动十分清楚，并且还对他的为人和一贯表现做了评价。

赵荣声好奇奇怪，问他：“你是怎么知道的？”

虞悦微微一笑，低声说：“党一直在关注着你。”

赵荣声心跳加速了。

此时，他们已坐在四层楼上他的宿舍里。窗外就是未名湖，湖畔翠柳摇曳，湖光潋滟，春色正浓。

“你，是共产党？”赵荣声热切地问道。

来人点点头，说他是中共西郊区委派来的。这是第一位对赵荣声公开承认共产党员身份的人！

赵荣声急切地问道：“你看我能不能入党？”

虞悦笑了，说：“我来找你，正是为了这件事。你的表现我们都清楚。目前，我们的一些党员被捕了，许多工作需要有人去做。我看，你来做吧。”

“好！”

赵荣声的入党仪式十分简单。他神情肃穆地望着虞悦，后者用红笔在一张白纸上画了一面带镰刀斧头的红旗。

这就是党旗了！中国共产党，这神圣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光荣的称呼！每一个不辜负这称号的人都将以毕生的精力为正义、平等、民主和科学而奋斗！为民族解放、为祖国强盛而奋斗！

虞悦左手高举起那面画出的红旗，同时庄严地举起了右拳。赵荣声也随他举起右拳，低声复诵了他领读的誓言。

此时，他想了很多，很多。

宣誓完毕，虞悦点燃一支火柴，将那张画着红旗的纸烧掉了。纸带着火苗掉在地上，瞬间便化为灰烬。

赵荣声明白，从今以后，他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了。他已经宣誓，把一生献给党。他个人的一切利益都得服从党的利益祖国和民族的利益。

然而在那种秘密的环境里，尽管他是一个勇敢而忠诚的共产党员，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关于党的领导人以及有关党的其他知识，他都缺乏了解。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党员的遗憾。

斯 诺 指 路

当然，赵荣声根本没有料到，一个更具体地了解党和党

的历史以及党的领导人的机会，竟在他入党一年之后到来了。

1937年3月的一个春日的下午，他被通知前往燕京大学校园内美籍教授夏仁德（Ranoloiph Salev）家中聚会。

夏宅坐落在燕京大学著名的未名湖畔，是一所独立的中式双扇木门小院。夏仁德先生当时担任燕京大学心理学教授。“一二·九”运动前后他勇敢地庇护过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领袖，后来他又索性腾出一个房间，把钥匙交给进步学生，任他们使用。于是不少有关学生运动的重要问题在这里商议，马列主义书籍和秘密文件在这里隐藏，地下的中共西郊区委和燕京大学党支部都曾在这里开会。当时的进步学生们便称这一间房间为燕京大学校园中的“苏区”。

1937年3月的那个下午，二十多名燕大进步学生聚集在夏仁德教授的客厅里，与新近从陕北苏区访问归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行了一次激动人心的谈话。在此之前，赵荣声只是在报道中国学生运动的英文报刊上见到过斯诺的名字，只知道斯诺是新闻系的教师，并未听过他的课，此回是第一次见面。他没想到斯诺显得这么年轻，看来比这些中国学生大不了几岁，而他夫人的美丽而能干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斯诺于1936年访问了陕北苏区。他带来了一部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二百多张照片以及他用两个多月时间撰写的

《红星照耀着中国》（又译《两行漫记》）的初稿。

赵荣声与同学们争相传看着手稿和照片，充满新鲜气息的、令人振奋和激动万分的画面中，有神采奕奕的红军指战员，有朝气蓬勃的苏区妇女和儿童，还有带着神秘微笑的斯诺本人与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将领们的合影……这时，龚澎用英文低声朗读起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的手稿，并向斯诺提出借走原稿的要求，斯诺答应了。直到十多年后赵荣声才意识到，他和他的这二十几位同学竟荣幸地成了这部轰动世界的名著的第一批读者。

后来斯诺先生还在夫人的协助下，为大家放映了他自己拍摄的小电影。当时放映机还是手摇的，斯诺边摇着手柄边亲自用英语解说着，时而也夹杂着说几句半生不熟的汉语，引起大家阵阵的笑声。

打在白布上的颤动不定的黑白画面中出现了毛泽东主席检阅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兵强马壮。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以及其他革命领袖个个神采奕奕，陕北土地上生气勃勃和新气象感人肺腑，赵荣声和同学们禁不住热烈鼓掌，觉得自己的心都快从胸膛里跳出来了。然而斯诺先生当时并不十分清楚，在身边这些情绪激昂、热泪涌流的男女学生中，竟有许多是秘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如今他们在美国记者拍摄影片中第一次见到了自己为之献身的党的缔造者和领袖们，他们能不为之低声的欢呼和鼓掌吗？

当影片的最后镜头中出现了“美髯公”周恩来副

主席与另一个虬髯满脸的男子握手时，斯诺解说道：“这另一个大胡子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帝国主义’！”

学生们吃惊之余定睛看去，才发现那不正是因采访繁忙索性留起胡子的斯诺先生本人吗？大家哄堂大笑，继之又热烈地鼓掌。

为这个终生难忘的下午，赵荣声始终感激斯诺。是斯诺开拓了他的眼界，不仅使他第一次看到了苏区，而且使他看到了一个真正的记者为了表达自己的信念所应该而且能够做到的事情。

斯诺接着又对他们讲了自己在红军中生活了三个月的见闻，他与毛主席的谈话以及听来的许多“红小鬼”身经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神奇故事。他注意到，斯诺夫人显然已不是第一次听斯诺讲这一切了，然而她在一旁仍然是兴趣盎然地用清澈的目光望着斯诺，并且与学生们一起笑，一起鼓掌。赵荣声不禁想起了另一双明亮的眼睛，那是靳明的黑色的瞳仁，它同样充满了热情和信任，勇敢与智慧。此时，他决心像斯诺夫妇一样与靳明互相支持，相敬如宾，共同度过战斗的一生。

最后，斯诺拿出一页纸来，上面是用中文抄录的一首七律《长征》，作者是毛泽东。

作为地下党员，赵荣声还未曾读过毛主席著作，而今日一读《长征》，顿觉其气魄宏大，境界不凡，忙掏出本子抄录下来，当作一件珍宝。

然后斯诺说：“我对他们的了解还是很有限制的。如果你们要知道更多的东西，最好是亲自到那里去看看。”

说者有意，听者更有心。一个外国记者尚有如此的勇气和力量前往不为众人所熟悉的谜一般的陕北苏区去采访，而作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中共秘密党员，为什么就不能踏上那片光明的土地去看一看呢？

众人散后，赵荣声独自留下来凑到斯诺面前，向这位并不比自己年长多少的年轻教师仔细询问起来。斯诺热情地望着眼前这个肤色白净、睁着一双圆眼睛的青年学生，尽量把自己走过的路线讲得具体，细致，还特地将需要注意的事情详尽地指出来。

摩 登 小 队

那时的燕大还放春假，和西方的多数学校相同，为时一周。

1937年的春假，赵荣声早已做了周密的安排。4月1日那天，他和其他九名志同道合的同学，打着一面蓝呢子三角旗，上面用黄丝线绣有“燕京大学”四个字，匆匆出了校门。

十人小队是个精心安排的数字。当时的铁路局有个规定，满十人的团体便可半价买票。他们这些学生既不愿目标

太大，又想省些路费，于是联络了十位同学。这十名同学中，有柯华、朱劭天、欧阳方、张非垢……当然还有靳明。

他们到达西安的时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过去四个月。虽然事变是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的战事暂时平息，但是，笼罩在八百里秦川上空的仍然是阴暗不定的政治气候。

进入苏区仍很困难。

记得在学校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赵荣声和一位叫天蓝的同学合写了一副对联，偷偷贴在燕大法学院穆楼的门厅里，对联上联是：一代枭雄引君入瓮。下联是：十年天下杀人如麻。

一时间，人们争相传看。

后来一“放蒋”，校园内右翼学生又猖狂起来，把对联撕了，还扬言如果查到写对联的人，要处死他。

右翼学生们组织庆祝“放蒋”大会，在冰冻的未名湖上速滑狂舞，这一幕就在眼前。

赵荣声一行十人都意识到了危险。往延安去，中途会有国民党特务和军队的关卡，随时会被逮捕、被抢劫以至挨冷枪。

怎么办？热情让位于理性。他们商量了，结果是：冒着风险前进。

他们先在西安逗留了两日，招摇过市，参观了大雁塔和碑林。第三天黎明，三辆预先雇好的铁皮木轮马车准时开始

向陕北进发了。

前边就是斯诺特意强调的国民党的第一道关，渡口，它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关卡。

此处没有桥，因此一切车辆和行人都要下来乘木船摆渡。这十位燕京大学的“少爷小姐”等在渡口，自然十分显眼。“少爷”们身穿皮夹克，“小姐们”一身摩登旗袍，肩挎五六架照相机，还打着呢料三角旗。一见他们这种样子，国民党军官和特务们也懒得盘问，竟然轻而易举就放他们过去了。

三天之后，他们终于搭上了红军的运粮车前往延安。他们攀上车顶，在粮袋上铺开毛毯，亦坐亦躺，高声谈笑唱歌。春日已来到黄土高原，坐在车顶，尽情享受当空丽日，拂面和风；放眼望去，古老的高原丘陵起伏，千沟万壑，苍凉豪放。春天来到高原，也进入了他们的心间。

巧 遇 黄 华

第四天中午，他们终于到达古城延安。这是北宋时抵抗西夏入侵的历史名城，海拔一千多公尺：民国初年才将延安府改称肤施县。

延安城墙倚山而建，雉蝶严整，环城一条蜿蜒河流，即是著名的延水。沿河是翠绿的柳堤，其中竟有几株桃花盛

开，十分好看。城门西边墙上是“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八个大字，用白粉刷写，还有不少红绿纸标语。走到城前，他们顿觉自由舒畅！好了，不必再象在白区那样压抑和秘密地行动了，拍起手来，跳起来，喊起来吧！

他们下榻在外交部招待所。这里虽是土炕，但很清洁。几位“红小鬼”为他们送来洗脸水和热茶。

赵荣声因为听过斯诺的介绍，见过斯诺为“红小鬼”拍的照片，顿时感到很亲切，仿佛旧友重逢，端起相机就要为他们照相，同学们也纷纷上来，与他们合影。

这时，只听身后门开了，有个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外交部派来接待你们的，我叫王友平。”

赵荣声回头一看，立刻兴奋地喊起来，同学们也一拥而上，把王友平团团抱住。

原来这个王友平正是燕大老同学、老朋友、“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黄华！

旧友故交，情绪更高涨，气氛更融洽。黄华也向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是在十个月前，陪同斯诺访问延安后留下来的。

“一二·九”运动后，黄华从中外报刊上得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想到手无寸铁的学生如果不与武装斗争相结合，作用是很有局限的，因而萌生了去陕北参加红军的想法。恰在此时，斯诺去找他，问他是否愿意陪他去采访陕北苏区，帮助做翻译，黄华立即答应了。虽然当时毕业

在即，但那一纸文凭已对他丧失了吸引力。黄华请示过市委之后，先行一步，辗转到达西安，又化装成东北军士兵搭乘东北军运货卡车进入陕北苏区，与斯诺会合。当斯诺采访告一段落将返回北平之时，黄华受到红军和苏区斗争生活的强烈吸引，便一个人留下来，在党中央直属机关工作。

此后几天，他们都是在黄华的陪同下度过的。

初识女八路丁玲

到达延安的当天下午，黄华就领着他们上街去转。

当他们一行人从一个青年团会议的会场出来时，远远的，迎面来了一位女八路。她剪短发，圆圆的脸，身穿灰布军服，军帽上红星闪闪，很是英俊。黄华为双方作了介绍，学生们都睁大了眼睛，原来她就是 1933 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囚禁了三年的女作家丁玲！

她竟然在延安。

丁玲也同样惊喜。她刚刚听说北平来了十个学生，十分想见到他们，立即跑上街来找。她想从他们那里听一点白区的消息，白区救亡运动、白区文化界的近况，她与学生们一见如故，转身就领学生们来到她的寓所。

她住在一所古老的大宅院里，有两间平房，这在延安是很高的待遇了；同院还住着陈赓等不少知名人士。丁玲寓所

的内部陈设比较简陋，在土墙上贴着几张木刻、字画，还有鲁迅先生的遗容画片：书架上有不少中外名著，如《高尔基传》、《海上述林》等等。

在书架顶端，赵荣声看到一本薄薄的《朱德的故事》（莫休著）和一部厚厚的书稿《二万五千里长征记》。他眼急手快先抢到那部《长征记》。书稿全部是在白色的一面光的土纸上用毛笔小楷横行抄写的。外面是绿色纸做封面。翻开书看，其中记述的是红军从江西到陕转战二万五千里的全部历程，包括大大小小几百次战斗和克服的无数自然障碍，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渡金沙江，越大渡河……这一切过程的细节。书稿都是红军将士们的亲身经历，有的是根据日记改写，有的是几个人几十个人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想起来的，有血有泪，可歌可泣。

见赵荣声紧抱书稿不放，丁玲主动介绍说，书稿是从几千篇稿子中选出的，先选出几百篇，然后再精选成一百多篇，按时间顺序编辑出来。后来才找人抄出三十四份，分别请丁玲、成仿吾等文学家加工润色。

赵荣声由于白区环境所限，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十分生疏，对红军用经历的艰苦卓绝的长征也知之甚少，因此他抱着这部手抄的《长征记》如饥似渴地看，生怕漏掉了什么。

“语惊四座”的毛泽东

会见毛主席的时间被安排在一天下午，黄华领他们来到了毛主席的窑洞前。

毛泽东主席走出来迎接他们。

这位被国民党的报纸描绘成“头发数尺，手指甲数寸”而且被“击毙”了若干次的毛泽东站在窑洞门前，身穿一套黑色粗布制服，身材高大，面容瘦削，神色和平，眼睛奕奕有神。

赵荣声代表访问团先送上从北平带来的两铁罐大前门香烟后，同学们才纷纷落座。

美国女作家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已先一步来到这里，手中拿着一个大笔记本子。他们已听丁玲说过，史沫特莱已在延安住了三个多月，每天和朱总司令谈话，记录朱总司令所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由于他们事先已把访问的题目送到毛主席那里，因此毛主席与他们简单地寒暄了两句之后，就径直回答了他们的问题。

那一时期北平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的疑问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能否实现？能否长久？抗日战争能否打起来？如果打起来，中国能否取胜？

对于毛主席的谈话，赵荣声后来在他的纪实性小册子《活跃的肤施》中写道：“中国古代人对于善于言谈的人常用‘语惊四座’来形容，当我们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觉得他的话不只让在座的我们震惊和开窍，而且还能够鼓舞亿万中国人，增加大家的信心和勇气。他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根据和最科学的分析，他对于中国人民和人民的潜力了解得那么清楚。他的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竟是那么渊博，他讲了许多战略和战术问题，都是我们这些大学生闻所未闻的。”

会见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钟。

其后的几天，他们又随陈赓师长春郊试马，还访问了内政部，参加了联欢晚会，参观抗大并与抗大同学举行了篮球比赛等等。

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们利用如此便利的条件采访到了丰富的材料。赵荣声记满了整整一个笔记本，对于他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精神财产和人生财富。

他们循原路返回北平，像当初斯诺一样，他们向“民先”的同志们汇报了去延安的经过和见闻，展示了他们从延安带回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书刊和纪念品，其中还有苏区的财政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同志送给他们每人一份的一张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和两个铜板。于是第二个“燕大学生延安访问团”也组织起来，又沿着斯诺的足迹奔延安而去。

《活跃的肤施》

1937年7月7日的夜里，露营在北平西山温泉大觉寺的赵荣声突然被猛烈枪炮声惊醒了。与他一同参加北平学联组织的游击训练班的同学们也都被惊醒了。他们翻身坐起，屏息静听，来自西南方向的枪炮声一直响到天明。

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回学校打听消息，才知在芦沟桥畔，中国军民终于向日军的悍然挑衅勇敢地还击了。

早已被毛泽东主席预料到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

7月28日，北平失守。

党组织通知他们，尽快向南方转移。

10月间，他辗转来到武汉大学借读，凭同乡的介绍，免费住进了大智门饭店。这家饭店的小老板名叫曾昭正，他曾经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歌咏队队长，后因积极响应“一二·九”运动被学校开除。

曾昭正还有一位朋友名叫冼星海，是位青年音乐家。他被曾昭正请来为当时正在武汉开展的《大家唱》活动做指挥。

他和赵荣声同被安排在大智门饭店四层楼上的一个高级房间里。房间内铺着地毯，有两张钢丝床。

有空的时候，两位青年人经常闲谈，竟是一拍即合，很

快无话不说了。冼星海和他谈音乐，谈抗日，谈统一战线，谈音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作用……赵荣声则对冼星海谈燕大、谈“一二·九”谈他的延安之行，谈党中央的领导人，一直回溯到在夏仁德教授家里看斯诺拍的电影和照片，以及斯诺的手稿……

两位青年人越谈越投机，几乎每天都要在一起谈很久。谈得饿了，他们就一起去武汉有名的老通诚饭店吃物美价廉的风味小吃豆皮，或者去汉阳吃牛肉；一路上还是滔滔不绝地谈，常常是回到大智门饭店还要谈，一直到深夜。

有一次谈兴正浓时，冼星海突然问道：“你讲得这么好，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呢？”

问得赵荣声一怔。

访延安归来，赵荣声立刻动手写文章。他学的是美国社会学，但他想当的是中国的红色新闻记者，一年来主编《燕大周刊》的经历，使他的能力得到了更高的发挥和增强。他除了在赵承信教授的“社会调查”课上写了一篇《延安调查》的论文，引用了大量林伯渠等同志提供的关于延安财政经济、生活状况的材料之外，还在上海洪深、沈起予主编的《光明》杂志上发表了《延安的戏剧活动》一文。

然而，面对着冼星海那半是热望半是责怪的目光，他惭愧地答道：“我去延安访问时并没有要写书的准备，因此搜集的材料太少了，还没有斯诺的百分之一……”

冼星海也不无遗憾，说：“可惜呀，我们目前是看不到

斯诺先生的著作了。我看，不如你就动手写一本！”

“可是，我去延安时用的笔记本，也没带在身边，仅凭一点记忆，恐怕……”赵荣声还是有些信心不足。

冼星海继续不松劲地鼓励他，说：“就写你给我讲的那些，我听了都非常感兴趣。只要把你见到的听到的这些写出来。能告诉大后方一直被关在铁桶里的青年，你就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赵荣声心里终于被冼星海鼓动得燃烧起了熊熊烈火。冼星海又和他一起对当前的局势做了认真的分析。抗日战争刚刚爆发，形势不仅迫切需要宣传延安的抗日纲领，宣传统一战线，宣传红军并且也确实存在着宣传延安和红军的可能性；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刚刚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由郭沫若先生出面主持，说明国民党政府还想做出一副放宽舆论尺度的姿态。如果能及时利用这个机会，尽早出书，倒也应该做一次努力。

第二天，赵荣声便去找了一位进步出版商，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先生。张先生的态度很积极，表示即使印出来被查抄，赔本，这本书也要出。

此后的两个星期，赵荣声每天钻进珞珈山武大图书馆里，日出而进，日没而出，仅凭记忆终于写出一部四万字左右的书稿，取名为《活跃的肤施》，署名任天马。

不久，还未能等到此书出版，赵荣声便奔赴抗日前线了。后来他听说，当国民党宣传部的老爷们察觉到这本书的

真实内容时，此书已重印了第二版，早已发行到各省去了。

1938年4月，赵荣声第二次访问延安的时候，偶然在延安城内一家合作社里看到自己的这本书：《活跃的肤施》，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它。但是，因为当时他的身分已不同从前，他不能把书买回去保存，只好让店家拿过书来，他翻翻看看，把书摸了又摸，又还给店家。

解放后，当年与他同访延安的老同学朱劭天来信告诉他，在武汉大学图书馆里还存有一本《活跃的肤施》。后来，朱劭天把书借出来，帮他抄了一本。

至于《活跃的肤施》一书当时在爱国青年中发生的作用，也可以从贺敬之同志的诗中得以一窥。

现将贺敬之的诗摘抄如下：

……

我，

和我的小伙伴们，

躲过

三青团的

狗眼。

在传递着

传递着

我们的

“火炬”——

啊！我的

《新华日报》

我的

《大众哲学》

我的

《解放周刊》

我的

《活跃的肤施》！……

——“决定吧？！”

——“决定了！！”

“我们

到‘那边’去！

到

我——们——的

延——安——去！”

而我的

真正的生命

就从

这里

开始——

……

（贺敬之：《放歌集》74 - 75 页）

二、命运的选择

卫立煌拜年

1937年10月，身在武汉的赵荣声接到由家中转来的信，是靳明写的。信中说，她已于两个月前到达太原，参加了著名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

赵荣声当即就决定去山西！

很快，赵荣声在山西临汾郊区的一所小学校里找到了“西北战地服务团”。那天，他在村人指引下进了那所小学的院门。这时，一阵嘹亮的歌声传来，他循声而去，只见在一间教室中，几十名身穿八路军军装的青年男女正列队排练合唱。

在队前指导合唱的正是丁玲！与丁玲重见，她仍如半年前一样，穿着八路军军装，束着腰带，短发，双目炯炯有神。

丁玲尊重赵荣声的意愿，分配他去通讯股当了记者。

1937年11月，太原失守。

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总部由五台山地区转到山西洪洞县，驻扎在县城东二十里的马牧村。‘西战团’就驻在距总部不到十里的万安镇上。

1938年1月31日，是农历正月初一、

赵荣声和他的同伴袁勃一早便被告知，有一个重要的活动要去采访。他们即刻上路，急步向十里外的总部所在地马牧村赶去。

当他们赶到马牧村时，只见村外一所学校门前正在布置会场。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同志告诉他们，那位蒋介石任命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要来！来拜年！

上午，三辆黑色的高级小轿车开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门前。从里面走出一位面色红润蓄着一撮黑胡须的国民党将军。他就是卫立煌。跟他同来的还有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郭寄峤和李默庵。十八集团军为他们准备了盛大的欢迎会。

在雄壮的军乐声和激昂的口号声中，朱总司令和卫立煌都做了演说，表示了坚决抗日绝不妥协的共同决心。

演讲完毕，文艺演出便开始了。这台文艺节目都是“西战团”表演的。节目生动活泼，风格别致，充满生活气息。活报剧《八百壮士》再现了上海抗战中国国民党将士的英勇事迹，活报剧《沂口之战》直接歌颂了卫立煌的指挥，以及战斗在山西的中央军、晋绥军和八路军合作抗击日本侵

略军的事迹；还有秧歌舞剧《全民总动员》，身着各式服装、代表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的人们跳起欢快热情的秧歌舞，展现了抗日战争最终必将获得最后胜利的前景。此外还有不少小调弹唱、快板、大鼓书等节目。

卫立煌对这些节目非常赞赏，而更令他赞赏的则是“战地服务团”这样一种军队政治工作形式，通过演出文艺节目来激发士气，鼓舞斗志，效果这么好，令他羡慕不已。

演出间隙，卫立煌就迫不及待地向朱总司令打听起“战地服务团”的事情来。朱总司令告诉他，抗战爆发后，在延安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主动提出组织一个“西北战地服务团”，运用新闻、美术、文艺多种艺术形式为前线将士，为抗日战争服务。参加“西战团”的青年多数是来自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大中学生，他们通过在抗大的学习，懂得了更多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工作非常积极，吃苦耐劳，生活标准同八路军普通战士一样，每人一个月只有一块钱津贴，但没有一个人叫苦。

卫立煌对朱总司令说：“早就听说八路军打不垮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政治工作做得好，如今看了‘西战团’的表演，我也想组织这么一个战地服务团，你说好么？”

朱总司令赞成他这样做。

卫立煌请朱总司令给他介绍一些人去，朱总司令慨然应诺。

欢迎会上，赵荣声作为记者始终在场。他穿着半新的灰

色棉军装，腰扎皮带，英姿勃发。

当天晚上，赵荣声伏案疾书，一篇详细报道卫立煌春节访问八路军总部经过的通讯完成了。2月5日，由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公开发行的最新一期《群众》杂志刊登了这篇名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文章，署名任天马、袁勃。

告别“西战团”

话说当这期《群众》（第一卷第九期）杂志到了卫立煌手里时，卫立煌已回到他设在临汾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他一边翻着杂志，一边感慨地对其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

这时，一位站在他身后的青年秘书说：“这个任天马我认识，也是我们安徽同乡……”

青年秘书叫刘毓珩，是“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的进步学生领袖之一，后来由同乡介绍到了第九军军部当秘书。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兼任第九军军长，十分赏识刘毓珩，因而常带他到总部来。

卫立煌一听刘毓珩认识任天马，立刻说：“我就需要这样的人嘛，你去把他找来，到我这里来。……他们为什么都不来我这里呢？”

刘毓珩当即给驻在洪洞县的“西战团”写了信去，然

而却迟迟不见回音。

原来，此时赵荣声恰在临汾采访。一日，赵荣声和袁勃一起去临汾邮局寄稿件，正巧在邮局门口碰到了刘毓珩，他不禁一惊。

刘毓珩倒是毫无察觉，竟喜出望外地一把拦住赵荣声问：“收到我的信没有？到底来不来？”

赵荣声被问懵了，反问道：“什么来不来？你怎么去了中央军？”

“七七”事变以后，党组织为了保存进步力量，通知各校进步学生和党员尽早撤出平津，并约定到济南、太原、武汉等城市组织平津流亡同学会，再接关系。刘毓珩到武汉担任了平津流亡同学会主席，并准备参加全国学联的工作。他很有组织能力，也有威信，但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后来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对一些进步学生说，青年骨干不要都集中在大城市，应当到前线去，到友军中去，宣传抗日，撒播进步火种，才能保证统一战线有广泛基础，实现全面抗战。后来刘毓珩在郭寄峤的弟弟郭陆峤的介绍下到了第九军军部。

刘毓珩十分明确地把卫立煌希望赵荣声能到他的部队来工作的想法说了。赵荣声毫不犹豫地答道：“我不愿意去。”

后来赵荣声回忆道：“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到卫立煌那边去。此时虽已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是我对国民党的反感还很大，并肩作战是可以，如果也叫我穿戴上那么一套草黄色的衣帽，挂上那么一个‘青天白日’的帽徽，替一个剿共

最有名的国民党大官儿当仆从，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还有一个明显原因，赵荣声是一个共产党员，怎能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去服务呢？

回到“西战团”，虽然赵荣声没有再提及此事，但还是被同行的袁勃当作马路新闻传开了，后来传到了丁玲那里。丁玲是“西战团”的主任兼支部书记，她从中看到了不寻常的问题，便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

不久，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便把赵荣声找到马牧村。傅钟认真地听了赵荣声的汇报之后，果断他说：“你应该去那里。”傅钟又说：“八路军里能写报告文学的人很多，不缺你一个；而去卫立煌那里，若不是他主动要，谁也进不去。再说，八路军在名义上还是受卫立煌的指挥，你去搞好卫立煌的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时近正午，赵荣声仍在僵持，他虽生性温和，但还真有一点韧性。傅钟副主任终于不得不把话谈得更严重些了，他说：“卫立煌已经提名要你，如果你不去，他会以为我们八路军故意不放，那就要引起误会，甚至会损害统一战线。”

那时全党全军都在进行有关统一战线的教育，统一战线关系到我国抗日前途以及共产党八路军生死存亡的大事。

赵荣声见话已说到此处，只好松了口，答道：“好吧，我去。”

次日，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通知丁玲同志，叫她放赵荣声去卫立煌那里，别的不用多问。

犹如婴儿离开了母亲的怀抱，赵荣声将去过另一种生活了。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嫡系邻队高级将领之一。北伐时期他就在蒋介石的“老本钱”——第一军中任团长，与蒋介石的关系很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卫立煌跟随蒋介石积极反共，向苏区大肆围剿，任“剿总”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曾在湖北黄安以西十里的冯寿二高地之战中险些被红军俘虏。后来他又在攻打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时为蒋立功，蒋将金家寨命名为“立煌县”，是继“中山县”之后成为当时以人名作县名的第二个县。卫立煌立时在蒋介石嫡系中声名大振。

之后，红军长征时，卫立煌是在后面追剿的东路军指挥，西安事变之前，他被任命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西安事变时，卫也与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被扣，蒋介石被释放后，一到洛阳就冒用张学良的名义打电报到西安，要求杨虎城首先放出四个人，卫立煌就是其中之一，其余三人是：陈诚，蒋鼎文，陈调元。

1938年2月下旬，赵荣声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个与同志们一起红火热闹地战斗了四个月的集体，离开曾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的党的怀抱，心中自有几分怆然。

为了尽量地缩小影响，丁玲同志指示“不宜宣扬”。因此当赵荣声上路时，只有女友靳明依依相送。走到一个路口，赵荣声脱下身上的日本黄呢军大衣交给靳明带回去。这

军大衣是缴获日军的战利品，部队送给了“西战团”，半数团员都有一件。他再次与靳明握别，然后转身大步走向远方……

初晤卫立煌

赵荣声赶到临汾才得知，卫立煌的司令部已向韩信岭阵地靠近，进驻霍县县城了。

韩信岭是从晋中到晋南的一处天险，在灵石县境内太岳山脉，上山70里下山80里，地势险峻。赵荣声乘不定时火车赶到霍县，下车的那一瞬，他听到了隆隆的炮声，声音沉闷而有力，说明战场已不远了。

他在城外一个小学校里找到了卫立煌的司令部。

司令部里的桌子上，几部电话机都在响，战况紧急。赵荣声被刘毓珩带到卫立煌身旁，匆匆问答了几句，卫立煌便叫刘毓珩带赵荣声去休息。当天晚上，赵荣声在秘书室看到总部发布的油印的《每日命令》，通告正式委任赵荣声为总司令部同少校秘书。

当时国民党军队中的所有文职人员都没有军籍，不是正式军官，但因符号、领章及生活待遇与同级军官等同，因此委任时在级别前面冠以“同”字。

最初的两三天，正是韩信岭战役紧张的日子，赵荣声亲

眼目睹了卫立煌指挥战斗时的繁忙和辛苦。卫立煌总是在夜间工作，下级的电报电话常在夜间到来，他的指示、命令也常在夜间发出。

一天半夜，赵荣声被人从梦中叫醒，睁眼一看，是一位着装整齐，挂着盒子枪的卫士，那卫士声音洪亮地说道：“赵秘书，总司令有请。”然后他打起五节电池的长电筒为赵荣声引路，一直送到卫立煌的住处。

卫立煌的住室内壁上挂着许多张五万分之一的地图，高及屋顶，虽是用蜡烛照明，但桌上燃着的四根蜡烛使屋里很明亮。赵荣声联想到八路军的节俭风气，无论多少人在一间屋子开会，也只点一根蜡烛，对比之下，心里觉得卫立煌到底是个国民党将领，自然如此浪费。

赵荣声向卫立煌敬礼后刚刚坐下，卫士就送上来一杯刚泡好的碧绿清香的六安瓜片茶。六安瓜片茶是安徽名茶，也是卫立煌最喜爱的茶；此种茶产于皖西大别山区的六安等县，由单片叶制成，不含芽头和茶梗，因其外形直顺完整，叶也背卷，如颗颗瓜子而得名；该茶以色泽银绿，滋味鲜爽形成特色。

在此后的几年里，赵荣声发觉，只要条件允许，卫立煌打仗无论打到哪儿都要带着这种茶。以至他的部下们也都追随他养成了喝六安瓜片茶的习惯。赵荣声每次去卫立煌那里坐，卫士都会为他泡上一杯六安瓜片茶；渐渐地他也喜爱上了这种茶。

烛光下，卫立煌先是详细询问了有关“西战团”的情况，比如多少人，做什么工作，怎样做这些工作，有什么特点等等。然后他决心已定地说：“那么你们就动手也给我组织一个这样的团体吧，就叫‘战地工作团’好不好？”

赵荣声有些吃惊，没想到卫立煌找他来是为了这个目的。

卫立煌又说：“你能够也找一些象‘西战团’那样吃苦耐劳的大学生来吗？”

赵荣声此时已成竹在胸，他说：“可以。我们能找到不少决心抗日的进步青年来为军队服务。目前西安成了华北战场的大后方，有很多平津流亡学生在那里，找几十个这样的人不成问题。”

卫立煌坦率地向赵荣声谈了他的打算，使赵荣声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看到让他做的事，是有利于抗战的，而并非是违反自己意愿的，他的心情也逐渐开朗了。对于卫立煌关于他的家世、经历的询问，他都直言不讳地做了回答，只保留了一点秘密，那就是他的共产党员的身份。他充满激情地向卫立煌讲起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讲起大学生抗日救国团体“民族解放先锋队”……

赵荣声说：“我们‘民先’都是不怕艰难困苦、坚决抗日的青年，因为看到共产党抗日最坚决，所以大多数‘民先’都参加了八路军。”

卫立煌说：“这样的青年很好，我们也欢迎。我们成立

工作团，可以多找几个‘民先’来。”

这是卫立煌与赵荣声的第一次长谈，从深夜两点直谈到东方发亮。

虽然是第一次交谈也同样给卫立煌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因此，有时夜间战况沉寂，电话电报不多，卫立煌就叫卫士来请赵荣声去谈话。卫立煌还主动向赵荣声谈了自己的身世，以及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做过孙先生卫士的经历。

卫立煌说：“上回你说你们积极要求抗日，谈得很好。你可知道，我决心反对日本，比你们更早 20 多年，是个老抗日派呢！当初我们为什么反对袁世凯呢？因为他想做皇帝，因为他和日本订了‘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我们不承认那个‘二十一条’，我们要打倒卖国贼袁世凯，后来就投奔广东去了。”

卫立煌告诉赵荣声，他在陆军大学学习的时候，主修课就是对日作战。他之所以把日本当做假想敌，研究了日本战略战术，做了应战计划，就是因为他早就看到日本对于中国的威胁实在太严重了。陆军大学规定，每个学员都要选修一种外国语，他选修的就是日语，也是为了将来好研究日文资料，便于对日作战。

卫立煌还有一种独特见解。他认为，如果中国亡在白种人手里，要不了一代，中国人就能翻过身来；而若被日本亡了，就可能多少代都翻不过来。因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

种”，吸收了大量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民情民俗了解最深。如今，日本开来了几十个师团，占领了那么多城市，中国死了那么多人，倘若我们不拼个你死我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那么子子孙孙都要当亡国奴。

卫立煌发自肺腑的一番话，使得赵荣声了解了非常坚决的抗日态度；而卫立煌本人则是心地坦荡，胸怀宽大的。

在多次谈话中，卫立煌还毫不掩饰地在赵荣声面前流露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好感，多次谈到他与朱德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的几次见面，虽事隔数月，但彼此讲的什么话，是怎样讲的，他仍能琅琅地复述出来。

早在北伐之前，卫立煌就在广州听到过周恩来同志的演说，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东征军政治部总主任，亲自到前线督战；1926年北伐开始，周恩来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的党代表，卫立煌是第一军的一个团长。当时的国民党军政人员私下谈来，都不能不承认周恩来是个了不起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当时在广东参加国民革命的很多人都以能一识周恩来为荣。卫立煌便是其中之一。

几个月前，卫立煌在忻口战役前后三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于卫立煌的抗日决心及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做法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两人还对发动民众、反对投降、全面抗战，坚持华北抗战的前途交换了意见。

因此，卫立煌一直很怀念他和周恩来的友谊。直到新中

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托人写信给寓居香港的卫立煌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一见到这句话，立刻就打消顾虑启程回国了。这是后话。

对于朱德总司令，卫立煌也颇为赞美。朱总司令的谦虚朴素曾使初次见面的卫立煌暗暗吃惊。他对赵荣声说，厕身军旅多年，也见过不少各式各样的“总司令”却从未想到大名鼎鼎的朱总司令是这般平易近人。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高级军官会议，卫立煌与朱总司令同乘一节车厢赴洛阳，朝夕相对，便谈得很多。朱总司令虽不喜多谈自己，但还是以自己的经历为线索，联系过去几十年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中国革命前途的看法。

当卫立煌听到朱总司令的经历中有许多与自己相同，同是出身贫寒，同是为追求真理找到孙中山先生，内心顿时发生共鸣；及至朱总司令讲到他是如何放弃川军师长的高官厚禄，苦苦追求共产党，被陈独秀拒绝后，便飘洋过海，从法国到德国，最终在柏林找到周恩来，终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后，卫立煌更加敬佩不已。

对于卫立煌的了解，赵荣声到此才算有了个完整的认识。他没想到，原来周恩来副主席和朱总司令早就亲自对卫立煌做了那么深入的工作，花费了那么多心血，并且效果又这么好。这样一来，赵荣声心里对于卫立煌如何从一个剿共干将到一个与共产党八路军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友军将领的

转变过程有了一定的理解。

摸 清 脉 络

赵荣声一开始便有意识地在卫立煌的司令部里广结朋友。首先，他是安徽籍，这是个有利条件；当初卫立煌点名要他，他的安徽籍也是重要因素。第二个有利条件便是他出生于安徽世家，是“四代翰林”之后，不仅家学渊源，更有老辈少辈的朋友、同学关系。因此赵荣声没几天就在司令部里混熟了。

秘书们都归少将机要室主任戴允孙领导，赵荣声初次见戴允孙便认出了他。原来十几年前这位戴允孙曾在安徽省第四中学当过校长，而赵荣声的父亲当时于安徽省教育厅当省督学，两人是好朋友，戴允孙过去常到安庆赵家逗留，他们在一起打麻将的时候，八九岁的赵荣声也曾在一旁观看过。

第一天进机要室，赵荣声便冲着戴叫了一声“老叔”。戴允孙不解地一怔。待赵荣声随即报上家父姓名，他方顿时现出笑容，说道：“啊，想不到是你啊！都这么大了，真是‘雏凤清于老凤声’啊！”

接着，他以长辈的身份询问了赵荣声家里的近况，又问及他的经历。赵荣声一一作答。从此，在总部里，戴允孙也对赵荣声多有照顾。

赵荣声中学时代替在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南京安徽中学（原安徽公学）读书，这一段经历也出乎意料地成了他极有利的条件。那时有钱有势的安徽人家都时兴送子弟去南京的安徽中学读书。这样一来，在总部里，赵荣声因而又扯上了许多的关系。

赵荣声从这些同事的口中断断续续地听了不少卫立煌的历史情况及轶事；也看得出来，卫立煌的部下们在卫身旁工作多年，对卫是十分敬佩，一片忠诚的。他们为卫立煌的勇猛善战而自豪，又为卫不能得到应有的提引和奖励而抱屈。

在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中有五名上将，刘峙、顾祝同、蒋鼎文、卫立煌和陈诚。除卫之外，其余四名都是黄埔军校的教官或区队长，因而他们虽然打仗不如卫立煌，但全是平步青云，只有卫立煌年年为蒋介石拼命打硬仗，却没有得到一点好处，连半个省主席都捞不上；而顾祝同早在1930年就当上江苏省主席了，部下们也都当了县长、局长的。

蒋介石曾说：“卫俊如（立煌）能打仗，但是没有政治头脑，不能独挡一面。”因而总是把卫立煌派在第一线打仗。30年代前期，让他当了一段鄂东清剿总指挥，又调去当赣江清剿总指挥，并且还在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之下，卫立煌曾一气之下甩手不干了，据说蒋介石已准备好撤他的职，后来经人出面劝阻才算作罢。

赵荣声从星星点点的情况中知道了国民党中央军内部争权夺利派系斗争的激烈，明白这也是为什么卫立煌要渐渐地

在部队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专找同乡来当干部的原因。赵荣声还意识到，在国民党各派系的勾心斗角中，卫立煌实际上是被排斥在嫡系之外的，因之卫立煌只能以任用同乡这种封建地方主义关系来寻求支持。赵荣声想，既然蒋介石到今天全面抗战之时还在玩弄纵横捭阖的手段来拉拢同党，排斥异己，那么我又为什么不能利用同乡的关系帮助卫立煌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呢？

西 安 建 团

这年三月中旬，在西安的几家报纸上同时出现了一则招考启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招收工作团员。”前往十四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名的人还真不少。

考官便是赵荣声、刘毓珩等五名青年秘书。

临行前，卫立煌对他们说，“你们放开手来干，不要怕这怕那。在外面，秘书就是总司令的代表。”

考场里摆着一张长条桌，上面铺着雪白的桌布。考官们一字排开坐在桌后，正中坐的是他们特意请来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驻西安办事处处长罗迈伦。

前来报名的人中有不少是流亡学生，他们有的是在失业情况下暂时找个吃饭的地方，也有的是经过同学、朋友动员来帮助国民党抗日的，还有人是听说工作团回总部时要路过

延安，借机会去找共产党的，作家雷加就是如此。

招募小组为了摸清投考者的思想状况以及对抗日前途的看法，举行了考试。考试分笔试和口试两种办法。笔试的题目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对于在笔试中没写清楚的人，他们在口试中还要重点了解。

这天上午，口试进行了一半，进来一位男青年。他留着学生分头，中等个子。赵荣声担任主考。问了几个问题，他答得都不错，显得很机灵。

这时，赵荣声又问道：“你参加过何种党派和社团组织——”其实，这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询问。

不料，那青年一听，立刻扬起脖子说：“我参加了共产党。”说完，眼睛就骨碌碌盯着赵荣声他们。

赵荣声一下子就明白了此人的身份，立刻拒绝道：“共产党？那不行，我们是国民党的军队。”

那人讨了个没趣儿，走了。

实际上，卫立煌公开招募战地工作团是没有经过蒋介石的“政工”机构许可的，因此蒋介石的特务们就动起来了。像刚刚发生过的那种公开自己共产党身份的事情还出过几起。

最终选定的战地工作团人员中，既有经过“一二·九”斗争锻炼的平津进步学生，也有刚从抗大毕业、途经西安时被林伯渠同志挽留下来支援战地工作团的干部，还有最重要的一批，就是直接从丁玲领导的八路军的“西战团”输送

来的富有经验、富有战斗精神和吃苦精神的部分团员。

工作团成立以后，按照卫立煌的命令，第九军同少校秘书刘毓珩兼任工作团主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同少校秘书陈元、丁致中、赵荣声和孙鼎禾兼任工作团委员。其中除孙鼎禾是思想顽固的国民党员外，其余四人都都是抗战爆发以后进入卫立煌总部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进步学生。陈元和丁致中也是刘毓珩介绍来的，先赵荣声半个月进入总部担任秘书。陈元还是“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是运动后期被清华开除学籍的四名学生之一，抗战前期表现一直不错，可惜后来投靠了蒋经国。这是后话。

献 计 成 功

当赵荣声等五名秘书离开霍县前往西安招募工作团人员之日，却正是韩信岭战况紧急之时。

一个多月之后，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来到了黄河边上的延水关。赵荣声与刘毓珩两人决定先渡黄河，到设在对岸的永和县城里的前指总部向卫立煌汇报。

永和县城一片瓦砾，残垣断壁，情形甚为凄惨。卫立煌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几孔极简陋的窑洞里。总部的同事们月余未见，全部形容枯槁，面目黛黑，神情疲惫。

原来韩信岭战役共进行了十来天。在这十来天中，由于

第一战区防守平汉路的刘峙部队一退再退，从河北省的邯郸、武安直退到河南漳河以南的安阳；因此日军长驱直入，直下山西最南端的风陵渡。这样一来，不仅晋南二三十个县城将一一丧失，而且集结在韩信岭一带的军队也将陷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卫立煌在韩信岭战况如此危急的时刻，仍留在霍县前线坚持指挥，他运用朱德、彭德怀亲授的八路军游击战的方法，指挥在韩信岭的军队，十几个师分成数路，纷纷从日军的包围圈里拉出来，全部安全摆脱了日军的包围而没有溃败。卫立煌在当时能够使大兵团完整地摆脱包围，仍然留在山西，这在国民党军队中是很了不起的功劳。

后来卫立煌退到永和县时，被汉奸告密，日军派了几十架飞机轰炸，使这个极小的山城几乎夷为平地，其中一颗炸弹正落在卫立煌所住房屋的前面，把房屋震塌了，卫立煌身边一个传令排长中弹身亡，卫立煌本人被颓砖乱瓦埋在下面，侥幸脱险。

赵荣声在与刘毓珩一同进入卫立煌的窑洞后，首先注意到的是，桌子上只立着一根蜡烛了。这天，正是永和县被轰炸后的第三天。

卫立煌急于与集结在汾河以东中条山区的主力部队汇合。参谋处拟订了几项方案。

卫立煌倾向于冒险的方案。他宁愿顶着日军飞机的跟踪轰炸，强行冲过汾河。而他的参谋长郭寄峤则倾向于较为稳

当的方案，即由晋西渡黄河，借道陕北南下西安，再由西安乘火车到河南滏池，再渡黄河到达山西垣曲县，即中条山区。

计划一时没有定下来。卫立煌几天来一直在和那些佩带金板领章的将军们商议此事。一天，待那些将军们离去以后，赵荣声留下来向卫立煌谨慎地进上一言，他说：“我看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百闻不如一见，实际去看一看，比看报纸或听别人讲要强得多。”

事有凑巧，恰好这时蒋介石来了电报，通知卫立煌赶到洛阳开会。因此，为了争取时间，取道陕北就成为正常合理的行动了。否则，那个时期，如果蒋介石的部下不与他打招呼就与延安的八路军交往是会受到蒋介石的嫉恨的。

插在晋北永和关与陕西延水县之间的黄河从北向南奔腾而下，两岸悬崖绝壁，激流湍湍。4月16日这一天，总指挥部在准备数天之后，从下午开始渡河，仅凭几只木船，靠船工摇橹往返。幸而没有敌机骚扰，整个指挥部于次日凌晨之前全部渡过黄河。

卫立煌访延安

卫立煌访问延安受到了隆重欢迎。

当满载着前敌总指挥部人员的十几辆汽车开到距延安二三十里的地方时，沿街就已能看到写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团结抗日”、“加强国共合作”等内容的红绿纸标语了。在延安城门口，延安方面的滕代远参谋长、十八集团军陕北留守处主任肖劲光、交际处处长金诚已迎候多时。

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城内一座不大的院落里会见了卫立煌。当他们亲切握手之时，卫立煌的敬仰之情已溢于言表。

在毛主席的会客厅里，毛主席除了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谈到反对投降主义，谈到日军的动向之外，还特别强调地提出了八路军长期深入敌后困难很多，尤以弹药和医药卫生器材的缺乏为严重，最后还提到了八路军夏季服装尚未发放的问题。

卫立煌一再诚恳地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

中午，毛主席设宴招待。客人方面是卫立煌及其正副参谋长，一个参谋、一个秘书即赵荣声，主人方面还有滕代远和肖劲光。筵席非常丰盛。由于客人方面已在山沟里转了一两个月，早已是有什么吃什么了，因此这顿午宴真是让他们大饱口福，对每一道菜都非常满意，也顾不得客气，足足地吃了一顿。席间，毛主席谈笑风生，主客十分融洽。

直至40年后的八十年代，当时的交际处长、后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金诚同志见到赵荣声，谈起卫立煌访延安这一段往事，他告诉赵荣声说，当时招待卫立煌的那一桌午宴总共花去50块银元，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当天下午，卫立煌如期去抗大参观并演讲。

当他们一行人最终来到抗大操场时，学生们早已列队静候多时了。卫立煌走上讲台。台下立刻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国共两党紧密团结起来！”——卫立煌的情绪受到感染，非常激动，把预先准备好的演说词忘得一干二净，做起即兴演说来。他用自身的作战经历说明了一个真理，只有和八路军紧密合作，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卫立煌的讲话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迎，他每讲一段，学生们就呼一阵口号，鼓一阵掌，卫立煌也愈发讲得激昂，学生们的口号就呼得愈响，整个欢迎会在热烈高昂的气氛中开得十分成功。

当晚，他们又出席了欢迎晚会。卫立煌与毛主席同排座，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只顾与毛主席说话了。散会后毛主席又随卫立煌一同走回下榻处——城里的一座耶稣堂，又进行了长时间的夜谈。

百万发弹药

第二天天刚亮，卫立煌一行便出发了。滕代远、肖劲光 and 金城早早赶来送行，并且按照最高礼遇送到了三十里外。

一路上，赵荣声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即毛主席向卫立煌

郑重提出的八路军武器弹药、医药用品、换季服装等。此次到延安，他虽然没有从领导同志那里得到什么直接命令，但是毛主席提出的困难，就是给他的任务。

中午，他们一行人在路边一家小饭铺吃饭时，卫立煌与郭寄峤谈起，在延安时，因为临时得知受了伤的115师师长林彪在二十里堡养病，所以去看望时没有送点礼，太寒伧了。卫立煌说：“要不要到了西安再补送？有没有这个规矩？”

赵荣声一听，这正是一个好机会，忙在一旁进言道：“我看，这份礼送不送并不要紧，他们不是说八路军急需枪弹、医药和夏服吗？只要在这上面帮点忙，比给林彪送礼有用多了。”

卫立煌当即摸着胡子沉吟不语。

第二天上午，卫立煌即来到西安北大街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的身份批发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发。”

卫立煌直接把手谕交给第十四兵站分监臧海澜少将。臧海澜跟随卫立煌办后勤多年，是卫立煌得力部下，然而他一接入手谕便面露难色。

卫立煌说：“第二战区的军队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视同仁。十八集团军打得很好嘛，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然后他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臬海澜据实以告，卫又吩咐他发给十八集团军 180 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是当天晚上他见到卫立煌时，卫立煌亲自告诉他的。

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利。当时，国民党军委会专门派了一个后勤部副部长卢佐长期驻在西安，直接领导北方几省的后勤业务。臬海澜就去请示卢佐。

卢佐与卫立煌交谊甚好，最终他还和卫立煌结为儿女亲家。但是使他和臬海澜左右为难的是，他们既不愿违抗卫老总的命令，又怕蒋介石怪罪下来。因为按照蒋介石的一贯做法，发给十八集团军的弹药通常是两三万，最多也就十万八万，从来没发过更多的东西。臬海澜犹豫不决，只好又打电报到汉口军委会后勤部请示。

赵荣声得知后，便悄悄来到集贤庄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把情况向林伯渠同志直接做了汇报。林老指示道：“照这个样子，卫立煌发的命令能否兑现还不知道，夜长梦多，难免有变。你必须紧紧盯着这件事。一定要让他办成。”

林老又把这一消息通知了在西安的十八集团军兵站部长杨立三，叫他做好准备。

臬海澜拖了几天不见汉口回电，加之卫立煌又亲自打电话询问，不敢再拖，只好通知十八集团军派人来领取弹药。早已准备好运输力量的杨立三拿到领单之后，立即带来十八

集团军汽车队的几部卡车直奔西安新城附近的后勤部仓库，先运子弹、手榴弹，最后运牛肉罐头，汽车不够用，还另外租了几辆商车。

46年之后，武汉军区副政委、当年任十八集团军后勤部第二科科长 的谢胜坤同志亲口说，他对当时领取弹药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还记得，子弹是汉阳造的，用木箱包装，大多是五百发一箱，每箱二十公斤重；也有部分一千发一箱的。手榴弹大箱每箱五十枚，小箱每箱二十枚，一个人能挑两箱。罐头是红烧牛肉加黄豆，是当时很稀罕的东西，在国民党后勤仓库里也只有几百箱，此次卫立煌一下子批出180箱，已相当多了。

领取弹药几天之后，汉口的军委会回电了，不同意发给十八集团军一百万发子弹。惜乎晚矣。

朱总司令的预言

1938年8月，卫立煌接到朱总司令即将前来垣曲辛庄拜访的电报，立即通知工作团做好欢迎的准备。

大家都很高兴。赵荣声向同志们介绍了春节时“西战团”在八路军总部欢迎卫立煌的情形，说是要把这次欢迎会开得也像那次一样的水平。卫立煌和郭寄峤都亲自过问了欢迎会的筹备工作。

朱总司令预定到达辛庄村的那一天，郭寄峤带了一批总部负责官员以及一同去过延安的交际副官罗香山和秘书赵荣声，一齐到垣曲县城远迎。一会儿，只见朱总司令精神饱满地骑着高头大马穿过垣曲破旧的街道走来，他身后跟随着几位干部和一个警卫排。当郭寄峤陪同朱总司令渡河来到辛庄村时，卫立煌早已等候在村口，见面之下双方真挚诚恳之情尽皆表露。

晚上，便是工作团筹备的欢迎大会。麦场上，临时搭起来的戏台上悬挂着好几盏汽灯。汽灯的明亮程度大大高于一百瓦的电灯泡。赵荣声在偏僻乡村中呆久了，点惯了油灯和蜡烛，如今往台上一站，顿时觉得明亮如昼。

卫立煌总部全体官员以及邻村的一部分军队黑压压地坐满了会场。戏台周围贴着许多“团结抗日”内容的标语，戏台正面树立着大标语牌，上面写着，“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这时，随着一阵威武的军号声，朱总司令由卫立煌陪同进入会场。工作团的团员立即起身一遍又一遍地带领全场高呼口号。

奏乐之后，由一名工作团团员宣读了前敌总指挥部的欢迎词，然后朱总司令便开始了讲话。

赵荣声站在幕侧默默地深情地望着朱老总。记得在“西战团”的时候，朱总司令常常带着夫人康克清到“西战团”来看望大家，他态度和蔼慈祥，待团员们如同自己的孩子。如今，朱总司令仍是一身灰色粗布军服，紧束皮带，

态度从容。他讲了抗战一年来十八集团军取得的相当大的成绩，也讲了不少经验教训，尤其强调了抗战力量之间的不必要的摩擦会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接下来的两日，朱总司令都是在与卫立煌的交谈中度过的。直至第三天的晚上，赵荣声才找到了单独见朱总司令的机会。由于此次接待任务是由副官处和工作团办的，因而赵荣声也有从旁照顾客人的责任。这天晚上，他看朱总司令房间里没有外人，便进去主动和朱总司令讲起话来，并汇报了他们党支部以及工作团在卫立煌总部做的工作。

不料，一向温和的朱总司令竟显出了怒容。赵荣声心里一惊。

朱总司令口吻严厉地责备道：“你们这样搞怎么能行呢？”

赵荣声无言以对，想不出是哪里做错了。

朱总司令接着说：“你们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得跟八路军没有两样，让人一下子就看得出来你们是什么人，这样只能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很可能马上就把你们连根刨掉，换一些与八路军敌对的人来。”

朱总司令以会场正面的大标语为例说：“‘一切服从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是八路军的标语，虽然在理论上无可指摘，但要考虑到国民党嫡系军队的习惯，他们流行的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以及‘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朱老总又说，“卫立煌的地位不同于阎锡山。阎锡

山在山西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王国，军事政治都自搞一套，只要他不投到日本那面去，提什么新鲜口号蒋介石都莫奈他何，卫立煌就不同了，他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本身并不独立，完全听命于蒋。你们因此就应当注意环境的特点，不要把工作一天就做完了。”

朱总司令最后还提醒赵荣声，工作团办的“中山堂”里陈列的书籍多是生活书店或延安出版的，不妥，将来也要闯祸。

果然不久，即1938年11月左右，蒋介石接二连三地来电报给卫立煌，要求清除工作团中的共产党，后来蒋还不放心，又派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就近彻查，卫立煌无奈，只好让刘毓珩回第九军军部，由丁致中担任了工作团主任。

紧接着，12月20日左右，蒋介石在陕西武功召开了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卫立煌和郭寄峤都出席了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命令：立即解散国民党军队中一切自行成立的、不属于国民党政工系统的工作团、服务团、宣传队，清除一切思想可疑份子。

显然，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也在“立即解散”之列。当时处理得很急，郭寄峤从武功打来电话，工作团来不及等卫立煌回来，便一人一份旅费遣散了。而赵荣声、陈元、丁致中等人因原职在总部而不在遣散之列。

工作团解散数日之后，武功又来电话传达了新的命令，总部即日行动，移驻河南洛阳。原来卫立煌升了官，被任命

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仍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总部的命令特地补充一点：赵荣声秘书暂不去洛阳，留在垣曲辛庄村待命。

剪 烛 夜 谈

刘毓珩调走了，工作团解散了，赵荣声被不尴不尬地“待命”起来。这一特殊的“待命”，即使在这次大变动中也仍然很醒目。它似乎已明白无误地把赵荣声的身份标示出来。

继续等待下去还有意义吗？

每天，他和靳明一起与另一位留守的军官烤火闲聊，回忆着来到卫立煌总部一年多的时光。

又一次与战斗的集体分别，又一次孑然一身孤军奋战，其感觉比第一次离开“西战团”时更强烈，因为战地工作团毕竟是他和同志们亲手创立的呀。说心里话，他实在想跟着其他团员一起奔赴延安去。当大家被“遣散”时高唱着“我们相见在前线”的歌子挥手告别，他的心里是多么恋恋不舍啊。然而他又想起了组织上的重托，卫立煌对他的信任和重用，他与卫立煌多少次的深夜交谈，以及好几位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这一切都使他坚定了等下去的决心。

早在赵荣声初到卫立煌总部时，卫立煌就常常请他到屋

里夜谈，直至工作团成立以后，卫立煌如遇有什么新鲜的政治问题或者和八路军共产党有关的事情也总是找赵荣声去谈。尤其是赵荣声又陪他去了一次延安，回来以后卫立煌更是谈个没完，长此下来，似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特别是到达垣曲辛庄村之后，他与赵荣声夜谈的次数要远远地多于总部里其他任何人。

在工作团党支部里，若论工于应对，擅长辞令，刘毓珩要比赵荣声强得多。然而赵荣声虽然口齿并不那么灵活，但他稳当、纯朴，对于卫立煌那样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来说，交谈对象善于全神贯注地倾听，轻言慢语而又直言不讳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又何尝不是难得的呢？

有一回，有人从蒋介石的侍从室听来消息，说蒋打算让卫立煌当一个统一领导晋东南党政军的首领，晋东南十八个县的县长都由卫立煌委派。卫立煌十分高兴地把消息告诉了赵荣声，并说，要把工作团的团员们放出去当县长。

赵荣声一听就意识到，这是国民党顽固势力想借卫立煌的枪杆子进占山西，抵制共产党和牺盟会的发展。他想了一会儿才慢慢说：“这个官职连半个省主席都不到。按照你的资历和战功，早该当个省主席了。实际是明升暗降。何况，在抗战的紧急时期割阎锡山一块肉，不仅不利于团结，还可能引出很多麻烦，不能这样做。”

听了这番话，卫立煌也没什么兴趣了。后来他接到某些要员介绍其亲戚到山西当县长的信，更明白不能给他们当傀

僵了，从此不再提及此事。

有时赵荣声还经常在卫立煌面前直接批评国民党的一些政策，卫立煌从没表现出不愿听的意思。有一次，赵荣声批评的矛头直接向指蒋介石，不免有些犹豫，卫立煌察觉到这一点，竟然说：“你在我这里是‘童言妇语，百无禁忌’，说什么都不要紧。”卫立煌那时年已45岁，赵荣声刚刚23岁，难怪卫立煌要那么说。

赵荣声陪卫立煌在一起夜谈，除了交换一些对时事政治的看法，还有一项主要内容，即是宣传讲解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卫立煌幼年从《三字经》启蒙，接着读《四书》，在私塾学了15年；后来寄身军旅，虽也熟读了孙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等，但对于近代社会科学却接触很少。因此对一些抽象的理论文章，他就常常要赵荣声为他讲述了。

赵荣声还为卫立煌开了一门课，讲苏联列昂吉也夫（又译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每晚讲一段。这本书还是赵荣声在燕大学习时，“民先”队里的政治学习教材，因此他讲来也还算熟悉，并且还能联系到当时社会的许多问题和现象，卫立煌倒也听得十分认真。

卫立煌如此用功地读书，对他的部下也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副参谋长文朝籍听说卫立煌在学《政治经济学》，以为是介绍资产阶级如何发财的经济学，便也请赵荣声给他

讲，每天吃早饭时，边吃边听。赵荣声也不计较，每天不辞劳苦，不论晚上睡得多晚，早晨也按时去讲课，只是给文朝籍讲得比较通俗，只挑选着讲了一些商品生产、资本主义总危机等等章节。

此时，在赵荣声心目中的卫立煌已经不仅仅是一位与八路军友好的国民党将领，而且还是一名积极靠近共产党的进步军人。

卫立煌想参加共产党

记得1938年8月朱总司令来垣曲辛庄村后的一天晚上，卫立煌找出一本很厚的书递给赵荣声说：“这是朱玉阶（朱德）带给我的，他说这本书很重要。”

赵荣声接过一看，是一本精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当年刚刚出版带到中国的几十本书中之一，赵荣声过去从来没见过。第二天，他还书时，说：“这本书太厚，我一时啃不下去，过去也没读过。”

他拒绝讲这本书也是有所考虑的，一是对苏联党史确实陌生，二是这部书的书名上就标明是苏联共产党的党史，目标太大，时间一长难免不引人注意，不适宜在这种环境下学习。第二天他选了一本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不久，卫立煌又专门请赵荣声去他屋里。那也是个晚上，一进门，赵荣声便觉得气氛大不一样，满室氤氲，烛光昏黄，卫立煌一个劲儿地吸雪茄。赵荣声知道卫立煌平时并没有吸香烟的习惯，只是有时别人从国外带来雪茄烟送他，他才偶尔一吸。这时，卫立煌突然问他：“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才能参加呢？”

这出人意料的问題使赵荣声心里一惊，却又马上转惊为喜。他抑止住内心的激动，沉吟一会儿才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只是个‘民先’队员，还不是共产党。我在八路军只待了3个月，时间太短了。共产党的组织是很保密的，怎么参加我也说不上来。”

卫立煌沉默了，大口大口地吸着雪茄。

一会儿，赵荣声说：“朱总司令常来，你跟朱总司令谈谈不好么？”

卫立煌说：“从垣曲到武乡八路军总部的路不通，朱王阶一时来不了。怎么办呢？……这样吧，你到延安去问问。”

赵说：“去延安路太远了。不如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问问林伯渠老先生。”

卫立煌同意了，当下就从自己的行军床底下拉出一个小皮箱，数出100元钱交给赵荣声当作旅费，说：“不要去军需处领旅费了，以我的秘书的身份代表我去找共产党。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去哪里，不要耽搁，天亮就走。”

赵荣声领命去西安，直接找了林伯渠同志汇报了此事。林老听后并不表态，只是认真盯着赵荣声看了好一阵问道：“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怎么样呢？据你分析，他的思想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赵荣声以为，卫立煌想参加中国共产党有四种可能。

一是卫立煌一年来与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的来往，与八路军的接近以及对延安的访问等等，使他真心信任八路军共产党是想战胜日本救中国的。他曾经按照八路军的办法成立了工作团，而且从八路军、抗大要人，这样一个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人，现在想参加共产党，可能是真心实意的。

第二种可能，他与蒋介石集团有矛盾，尤其在抗日问题上，他怕蒋介石一旦向日本投降，他就没有了归宿，因此先和共产党联系好，好继续抗日。

第三种可能，就像中国过去许多军阀一样，想左右逢源，这里拜个把兄弟，那里派个代表，自己总立于不败之地。

第四种，无非是想试探一下共产党的态度，或是执行国民党的秘密任务，至少也试探一下赵荣声是否共产党派进来的探子。这种可能也不是没有。

林老听了他的分析后说：“你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要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临走林老又叮嘱赵，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绝对不许乱讲。

回到辛庄村后，赵荣声如实地把林老的话报告给卫立煌。卫听后闷声不语。这年冬季，朱总司令从延安开会返回前方时再一次经过垣曲，他与卫立煌单独密谈了二天。究竟卫立煌是否又提到过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赵荣声也不得而知了。

渑池受命

在卫立煌总部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赵荣声总共受过两次来自党中央领导人的批评。第一次是朱老总；第二次却是在与刘少奇同志初次见面的时候。

那还是赵荣声为了卫立煌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去西安回来一个多月后，大约11月中旬左右，朱劭天同志带给赵荣声一封信，是一位名叫“胡服”的人写的，称他为“荣声兄”，并约他去河南渑池晤谈。

“胡服是谁？”赵问。

朱劭天神秘他说：“就是刘少奇同志。”

第二天一早，赵荣声匆匆上路，黄昏时分终于到了渑池县。设在此地的十八集团军渑池兵站是北方的八路军和南方的新四军与延安的重要联络点。赵荣声一进兵站就跑起来，

一下子冲进刘向三同志的屋里。

“刘主任，少奇同志在哪儿？”他急慌慌地问道。

暮色中，房间里还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他主动伸出手来，赵荣声立刻跑过去兴奋地握住他的手。啊！这就是少奇同志！原来他们见过面！

1937年12月，赵荣声还在“西战团”的时候，他曾到八路军总部采访，曾见过这位斯文儒雅的领导干部。他穿一身与众不同的蓝色棉军服（当时八路军都穿灰色棉罩服），身后带着四个警卫员。两个月后，赵荣声去临汾采访，又在临汾办事处见到过这位首长，并且经彭雪枫同志介绍还在这位首长的具体指导下修改过稿子，只是由于时间紧迫，他未曾请教过首长的大名……

吃过晚饭，赵荣声和刘少奇同志回到屋里，关上门。少奇同志点上了一支香烟后说：“中央最近刚刚开过会，讨论了统战问题，有些事情和你们这里有关系，怕你们搞出毛病，特地找你来说一说。”

当晚，赵荣声汇报到晚上十点多钟，由于一天旅途劳顿，他禁不住说着说着就打起呵欠来。少奇同志索性让他和自己并排睡在了他的床上。

第二天，天气阴冷有雾，渑池兵站不大的院子里很安静。吃过早饭，他们继续谈。少奇同志关好房门，直接了当地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但这样不仅对党没好处，反而很危险。”

“我们党和国民党讲好了，彼此都不在对方的党、政、军里面搞党的活动，不建立秘密的党支部。我们就要言必信，行必果。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台柱子，现在又带这么多军队，要是你把他挖过来，蒋介石怎么会甘心？他就会把力量用来对付我们，这样就会影响抗日战争的大局。”

赵荣声听了这番话，受到很大震动。连忙解释道：“参加共产党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不是我们有意引导的。”

少奇同志说：“昨天你还说，你们陪着他看延安出版的刊物和小册子，对他的思想有影响，这不是引导吗？”

赵荣声无言以对，自知是搞过了头。

接着少奇同志又宽容地说，“好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成为过去，以后无论在哪里，无论对什么人都绝对不许再提这一件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总会懂得这两句语的意思吧。”

这时，刘少奇同志话锋一转，说了一件让他惶惑的事。“这次中央开会，做了一项决议：要撤退在国民党军队中所有的我党秘密组织。从现在起，你们改为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军队，停止组织生活，停止和党从组织上的联系；保留党籍，长期隐蔽下去。你们几个人在这里是绝密的，只有中央几个负责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记录。将来回去，我给你证明。

“卫立煌、陈诚这些人掌握兵权，我们和这样的人搞好

关系将来大有用处。卫立煌虽然待你们不错，毕竟关系还浅，要真正成为他的心腹，使他能够对你们放心，能采纳你们的意见，还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你们要做长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钻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你们只要能在卫立煌手下呆下去就是成绩。‘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今后，你们不许找各处地方上的党组织，不许去八路军的办事处、兵站，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不要再去。……至于要想知道党的政策，现在党有公开的报纸，一看就知道了。”

赵荣声听完怔在那里。就是说，以后和党的联系要断绝了，一切行动全由自己来决定来负责了，十年八年地隐蔽下去，再不能及时地听到党的声音了！他摇摇头，执拗地说：“少奇同志，我希望一定要有一个人和我保持联系，有情况可以报告，有问题可以请示，如果完全断了线，我不干。”

少奇同志考虑了一下说：“那也可以。”说完走出门去。一会儿，他带进一个人来。这人面貌朴实，毫无特殊之处，穿着上更是普通，风尘仆仆的，还满口山东话。少奇同志说，“你们见个面，以后如有事，他会去找你。”

赵荣声原以为这人只是个通讯员，却没想到他就是当时的豫西特委书记，数月之后的河南省委书记，12年后的全国总工会的主要负责人刘子久同志。这是后话了。

落 脚 洛 阳

芦沟桥事变后，原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刘峙从保定一退数百里，一时成为全国唾骂的“长跑将军”。而卫立煌在北平北西山区与敌周旋，未受损失；忻口一战也打得漂亮，后来在韩信岭战役中居然把十几个师的兵力都安全转移出了日军的包围，此乃国民党嫡系将领中的上等战绩，因而蒋介石就把华北这份家业，第一战区和第二战区的一半交给了卫立煌。长官部移驻洛阳。

1939年1月之后，归卫立煌指挥的部队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八、第十九、第三十、第三十九、第四十一集团军（其中第十八集团军虽然受他指挥，但他从未指挥过）。

不久，赵荣声到达洛阳后，便在距长官部较远的和平路公园附近一家木匠铺后面租了两间民房，把家安顿下来。刚安顿好，卫立煌就派卫士把他找了去。

卫立煌委任赵荣声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机要室同中校秘书。后来他对赵荣声说，以后恐怕不能像在山西时那样常常在一起了。他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在外面听见什么，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你看见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听见什么新鲜事情，都来跟我讲讲，八路的书报我们还可以关着门研

究。”

他又叮嘱道：“你还要注意，洛阳情况复杂，有十三个特务系统，你在外边交游要小心，不要乱说话。在西工（司令长官部所在地）谁也不敢来惹你，要是你在城里出了事情，我也没有办法。”

看来，卫立煌在赵荣声去留问题上是经过反复推敲的。一方面，蒋介石新近表示出来的对卫立煌的极大信任使卫立煌的官瘾得到暂时满足，起到了笼络作用：况且华北历来是我国争战的战略要地，蒋介石把华北交给卫立煌，使之成为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卫是领情的，因而不愿在留用八路军人员的问题上惹恼蒋介石；另一方面，卫立煌从内心里又不愿失去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持和友谊。

不安心的“太太”

1939年2月至1941年10月这近两年时间里，赵荣声依照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在卫立煌的长官司令部里“沉”了下来，他个人的境况一直还算比较稳定。

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制造了两次反共高潮。在华北战场，即卫立煌的防区内，虽然摩擦频仍，但毕竟未能酿成大祸，而转战在江南的新四军却终于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毒手

……

赵荣声在总部里，日常便在长官部机要室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同时还着手写了一本宣传卫立煌抗日功绩的小册子《卫将军》，署名明明，1939年10月由重庆的上海杂志公司出版。

然而，赵荣声的妻子靳明却感到度日如年。她也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与赵荣声一起参加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又一起作为燕大十人访问团首次访问延安；1936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她在1937年10月先于赵荣声参加了八路军的“西战团”。然而，当赵荣声被卫立煌留下来后，她的身份遂由工作团团员一变而为赵秘书的夫人，国民党军官的太太。这是她从心里所不能接受的。

赵荣声曾向她传达少奇同志的指示说，她的任务就是掩护赵荣声，并且要与卫立煌总部的军官太太们多打交道。后来她真的去和那太太们“泡”了几次。那些俗不可耐的军官太太们只要在一起，不是吵嘴打架，就是暗地互相揭老底；有的打麻将甚至两天两夜不下桌。在这些太太们的头脑里，什么抗日，什么救国，全然没有，只知道发财、升官。她们中间有一些是临时的“战时夫人”，所以有的就被称为“行军床”……

靳明本是思想单纯、性情直爽的女学生，和这些太太们无论在思想上还是生活趣味上距离都太远了，实在感到格格不入，后来便借口家离得远而不再来往了。

白天赵荣声去长官部上班，靳明就呆在家里，等到傍晚赵荣声回家，她就总要在言谈话语中流露出想念“西战团”，想念战友们，向往亲身参加抗日战争的情绪。

一天晚上，她突然说：“我要走了啊。”

“去哪里？”赵荣声望着她。

“去延安。”

“你不要自由行动。”赵荣声放下手里的书说。

“不，我就要走，这种日子不能过了。”

“又怎么了？”他问。

“我是来抗日的，不是来当官太太的，我要去延安。”

“可是，我们的任务就是……”

“你有你的任务，可是我不能只当你的附属品！我有我的独立人格。”

当晚谁也没有说服谁。第二天，赵荣声中午回到家里，发现靳明真的不在了。桌上用碗扣着为他准备的午饭。赵荣声一下子就明白了，不禁为靳明担起心来。

靳明当天坐火车到西安，先去找老同学辛志超。辛志超原在燕大宗教学院学习，后来一直搞民盟工作。他当时在西安一个基督教军人服务处。见到靳明，便想到赵荣声一定很着急。他对靳明说，国民党对出入延安的人盯得很严，目前从西安走很不安全；劝她还是先回洛阳等待风声稍松一松再说。恰好赵荣声的中学同学张本源在两安火车站当站长，辛志超把靳明交给张本源，嘱他快送她回洛阳，别让赵荣声担

心。

第三天靳明又回到洛阳。赵荣声见她神情已很沮丧，也没敢多责备，只安慰了几句了事。

两个月以后的一天，赵荣声夫妇去陈元家里坐，恰遇陈元的清华同学牛荫冠在座。牛荫冠是原北平市西郊区委组织部部长，听说过赵荣声。此次他来洛阳是作为山西牺盟会的代表找卫立煌交涉与国民党顽固派摩擦的事情的。此时事已办妥，准备取道晋南回晋西去，临行前来老同学陈元家告别。

靳明在旁边一听，便说：“哎，你等等我，我和你一起走吧。我要去延安。”

牛荫冠一愣，觉得与靳明不熟悉，况且还是个女的，便劝阻道：“目前去延安很不容易。”

靳明说：“去不了延安我就到晋东南找八路军总部去。”

说完，她也不顾赵荣声的劝阻，掉头就跑回家去。一个小时以后，她背着一个背包和牛荫冠一起上路了。赵荣声在别人面前又不好言语，真是有苦说不出。

40多年后，赵荣声在人民大会堂开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紀念会又遇到了牛荫冠，谈起当时情景，牛荫冠笑着告诉他说：“当初我带了靳明到山西，那里牺盟会的同志还以为她是国民党特务呢！”

靳明到山西的第三天便赶上了日军的五路“扫荡”。她又和牛荫冠跑散，在路上碰到燕大同学龚喻，他正从八路军总部前往洛阳，结果又被带回洛阳。此时她因在晋南逃避日

军时，一天淌过七条河，受了寒，关节炎发作，一瘸一拐地回到洛阳的家里，倒在床上就哭了。赵荣声为她烧了热水敷腿，问她：“还走不走？”

她坚决地说：“还要走！腿好了就走！”

赵荣声看看实在说服不了她，就把情况向少奇同志汇报了，并把靳明带到洛阳东关外的贴廓巷（俗称铁锅巷）八路军洛阳办事处，由少奇同志亲自找她谈话。

靳明说：“我愿意去延安，愿意上前线，什么苦都能吃，就是不愿意呆在家里当太太。我有独立的人格，不做别人的附属品。”

少奇同志严肃地说：“如果你去了延安，别人会不知道？赵荣声就不能在这里工作了。你还知道党有组织纪律吗？轰轰烈烈固然痛快，当太太也同样能有大的作用。你留在这里，遇到事情两个人还可以商量商量，不是很好吗？党就是派你当太太，你就要一直做下去！这个话是我说的。”

当初，刘少奇同志为了保住赵荣声在卫立煌总部里的位置曾费了很多脑筋。为此他曾要求工作团党支部里的人都不要去延安，以免延安人多嘴杂暴露秘密，而且要求党员们绝对不许再谈这一段事情。连刘毓珩、王若兰离开卫立煌总部南下去新四军的时候，少奇同志都要求他们更改了姓名，刘毓珩自己改名陈其。少奇同志说，这个名字太像共产党了，于是给他加了一个“五”，改叫陈其五；王若兰则改名康英。如今，靳明再坚持擅自行动，那么过去这一切努力岂不

都白费了？

靳明终于留了下来。卫立煌给她推荐了一份在省政府图书馆的工作，每日理理书，晒晒书；闲时还教教长官部里的一些子弟学学英语，便也安下心来。

告别少奇同志

在这段时间里，尽管赵荣声的主要任务是“沉”下来，但是由于少奇同志常来洛阳，因而他与少奇同志的接触就比较多。

少奇同志每到洛阳，刘子久同志便会亲自去通知赵荣声，他总是脚步匆匆地在木匠铺后边赵家门口说一句：“老胡来了，叫你去。”说完就走，以免被人看见。到了晚间，赵荣声就会去办事处。

当时洛阳每晚戒严，从晚间九时到次日天明，白天则有不少特务泡在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门外监视出入的人。赵荣声尽管知道夜行口令，但为了不引人注意也尽量避免夜行。他利用岗哨交接和特务们上下班时的空隙，也就是每晚将近九点，办事处门口的特务“早退”了，而办事处所在的东关外大街两头的岗哨尚未上班的时候，他悄悄进入办事处，然后在次日天明，大街两头岗哨刚刚撤去而大门口的特务尚未上班之时，再悄悄溜出来。因此，他每到办事处便总

要住上一夜，因而也有了与少奇同志谈话的充裕时间。

夜间，他总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向少奇同志汇报，然后再听少奇同志讲党的政策和理论，讲历史、古今中外。赵荣声如饥似渴地听，常常是不知不觉中已是东方发白。几十年之后，当赵荣声读到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时，他感到特别的亲切，因为其中的很多思想都是少奇同志在1939年7月前后与他在洛阳夜谈的内容。他心里认为自己也是这个报告的第一批听众之一。

1939年秋末，少奇同志准备南下。临行前又找赵荣声去谈话，提醒赵荣声的处境很危险，因为卫的部下有些人知道赵是从“西战团”来的，这是个很大的弱点。但他要求赵荣声既做长期打算，等待时机，沉下去就是成绩，还要充分做好一些风吹草动就会发生突然事变的准备。

赵荣声表示，一定能守住秘密，一定承担下这个危险任务。任何情况下也不会乱说。

随着形势越来越险恶，国民党管辖区内白色恐怖也愈来愈严重。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开始在军队中“整肃军风纪”，九十三军参谋长魏巍（后改名白田）投奔了八路军，军长刘勘大怒，便下令逮捕了一些思想进步，平时与魏巍接近的人。当时，一位名叫余贻泽的秘书返回四川省亲，幸免于难。余贻泽原是燕大政治系研究生，比赵荣声高几个年级；抗战之后进入九十三军作秘书，因他常来洛阳办事，接触一多，便与赵荣声熟悉起来。

余贻泽归队途中在西安遇见军长刘戡，刘叫他先到洛阳一战区长官部文副参谋长那里办事。余贻泽来了，先找到赵荣声家。那天中午，赵荣声正在家里休息。余对赵说起此行目的。赵荣声一听便觉不妙，当即劝他，刘戡是个顽固的反动分子，你们的几个同事都被抓了，你不如躲避一下；赵荣声还提醒他，文朝籍副参谋长同时又是洛阳警备司令，你去找他，恐怕凶多吉少。

余贻泽尚不是共产党员，因而并不在乎，后来他去见了文朝籍，果然当晚便被文朝籍派人捕走了。

这个余贻泽即是十多年后，先后出任我国驻巴基斯坦、越南、希腊等国家的大使杨公素。

第二天赵荣声听说时已经晚了。按照纪律，按照刘少奇同志的嘱咐，赵荣声绝对不应再继续卷入这种事情里去了。然而赵荣声再三思量，平日里余秘书与他过从甚密，这是长官部的人们有目共睹的，事情出来，他若不闻不问，倒反而不入情理了。左右一权衡，他索性假戏真作，公开为余贻泽疏通起来。

此时卫立煌去了重庆。后来他辗转托了关系找到警备司令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副司令高增级。高虽无权释放余贻泽，但能够使余贻泽在“拘留”期间得到相对的“自由”，可以看书看报，可以通信，甚至可以在看守的陪伴下外出吃饭，洗澡等等。余贻泽的哥哥是重庆千厮门一家商行的老板，得知此事后寄了很多钱给赵荣声，意思是要赵荣声用钱买通一

些关系救他弟弟。赵荣声只好给余贻泽送去。余贻泽有了钱就出去大吃大喝，请客送礼，搞得陪伴的看守也渐渐放松了警惕。终于有一天，他趁外出洗澡的机会逃跑了。

余贻泽这一跑，一切责任全部落在赵荣声头上。他的四处疏通，他的探监，他的送款，全部被看成是预谋。无论外面的特务机关还是长官部内部都对他更加注意了。

侥幸脱险

当赵荣声正为余贻泽的事情去找卫立煌而未遇之时，卫立煌已被蒋介石召到重庆开会。卫立煌和蒋介石之间，在对待八路军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蒋提出，卫立煌暂住重庆待命，并趁此机会派何应钦到第一战区“巡视”。

何应钦到达第一战区之后，不仅任意改动了卫立煌原来的兵力部署状况，调走了卫立煌的主力部队，而且还在洛阳大肆举行阅兵式，在卫立煌缺席的情况下分别召见全战区的高级将领，吸引了各战斗部队的主要精力，而忽视了对日军的防御。结果，5月9日晨，日军突然以秘密集结的十一个师团，十五万兵马发动了进攻中条山的战役。

这时，一战区长官部只有参谋长郭寄峤在主持工作，他不知卫立煌在何处，只好急电何应钦。何应钦再次来到洛阳，仍不通知在重庆的卫立煌。此时卫立煌因在重庆“待

命”无聊而上了峨嵋山。当他从峨嵋山返回重庆途中得悉前线吃紧，立即日夜兼程赶回洛阳。其时，中条山战役已打了好几天，一战区的军队正在极恶劣的条件下在中条山各山隘苦战，但因日军发动此战役是精心策划、长期准备的，不仅空中力量雄厚，而且还施用了毒气；因此中国军队仓促应战，败势已不可收。

在此之前，卫立煌曾指挥军队打败了日军对中条山的八次进攻，日军始终过不了黄河，因而卫立煌在社会上威信很高，由此才有“黄河保卫中华，先生保卫黄河”之誉（林伯渠语）。

中条山战役失败，蒋介石为了推卸他自己反共分裂政策招来祸乱的责任，并解脱他的嫡系何应钦的主要责任，便强令卫立煌“承认错误”，并趁机撤除了卫立煌兼任河南省主席的职务。

当赵荣声正因余贻泽的逃跑而备受猜疑、焦头烂额时，中条山战役打响了。洛阳连日遭敌机轰炸，许多机关都纷纷逃离洛阳。赵荣声便也以护送刚刚生下一个男孩的妻子以及机要室的家属转移为借口，躲到豫西伏牛山区的卢化县，一去数月。

八月间，卫立煌让戴允孙打电话，叫赵荣声回洛阳。当晚，赵荣声去长官部见卫立煌。这时卫立煌的省主席职务已被撤除，他精神不振，情绪消沉。赵荣声进屋后，见卫立煌正坐在藤椅中沉思。

赵荣声轻声问道：“长官近日身体可好？”

卫立煌抬头见是他，招呼道：“你来了？坐。”

赵荣声慢慢坐下，默默地望着卫立煌。四个月不见，卫立煌明显地消瘦了，肤色也黑了不少，眼神中带着一股虎落平阳、无以诉说的落寞神色。

卫士沏上一杯六安瓜片茶来，赵荣声呷了一口，以一种久违了的歉疚心情，缓言慢语地谈起了这四个月来在伏牛山区的生活情况和见闻：卫立煌也问了靳明和孩子的情况，谈了谈自己的身体。似乎是有默契，两个人谁也不谈时局，不谈政治，不谈任何敏感的话题，但彼此的关怀之情又充溢其间，真有些“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味道。

此时，长官部的警卫虽然仍由独立第五旅担任，但是汤恩伯的十二军已经开进洛阳，事实上卫立煌已处于十三军的“保护”之下了。鉴于此种形势，赵荣声向卫立煌提出，燕京大学已准备在成都重新开学，他想回校继续读书去完成学业。卫立煌很痛快地答应了，并主动提出为他提供学费。

此时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主任也已易人，新主任是原八路军总部情报科长袁晓轩。赵荣声早在“西战团”时就认识袁晓轩，他本是东北军旧军官，“西安事变”后投奔了延安。他的妻子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百货商人秋林公司老板的千金。他到洛阳办事处上任后，也经常到长官部卫立煌那里去，有时赵荣声看到他骑着一匹又高又大的白马招摇过市，却从没有打过招呼。

由于要严格执行我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的规定，自从刘子久同志调离后，赵荣声便不再去洛阳办事处，只和刘子久同志所介绍的戴日三同志作单线联系。戴日三比赵荣声年长10多岁，是老资格的党员。后来赵荣声又把戴日三介绍给文朝籍，当了洛阳警备司令部的秘书。

赵荣声把暂避一时的打算告诉戴日三，戴日三也同意他的想法。十月份，赵荣声借口送孩子回老家，请了三个月的假期。

此时前线战况不妙，日军已兵分三路渡过黄河，攻陷郑州，洛阳天天听得见枪声。卫立煌带领随行人员离开洛阳亲临前线指挥。

至于赵荣声当时没有坚持与卫在一起而外出暂避的选择是否正确，这只能由历史来判定了，尽管这在解放后复查时引起了不同意见。处在当时的条件，在没有党组织的具体指导的情况下，保存实力、首先保证党员个人安全的选择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

赵荣声携妻将雏离开洛阳，经颖河、淮河、淝河，走了一个多月，回到了安徽西部大别山南麓的太湖县老家，准备过了春节再回洛阳办理请长假的手续。不料春节刚过，他们就在报上看到撤换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消息。而新的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一到洛阳便封闭了十八集团军驻洛阳的办事处，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当了特务，洛阳城里捉了很多共产党。

赵荣声听后不禁大吃一惊。倘若他当初不是及时地做出暂避一时的选择，那么如今也难免遭到袁晓轩的毒手了。

袁晓轩对赵荣声的底细究竟知道多少，连赵荣声自己也没有把握。只是赵荣声到卫立煌总部几次与朱总司令的接触，袁晓轩都在座；卫立煌总部在山西垣曲时，赵荣声还多次请袁晓轩到街上的熟肉铺里吃烧饼夹肉；袁调到洛阳后，还经常借着去见卫立煌的机会带着老婆去卫的高秘温广汉家吃吃喝喝……

他这么贪吃贪喝看起来是小事，但在那种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又总令人看了心里不舒服。

袁晓轩把办事处的几十名人员分成两批，分途撤回西安前往延安，自己则和老婆留下来，终于公开投敌叛变了。不久后，他还在洛阳报纸上公开登出“脱党启事”并供出了他知道的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姓名住址。

袁晓轩变成军统特务之后，又继续犯下了捕杀共产党员的罪行。解放后，他被人民政府缉捕归案。

三、等待时机

聚散苦匆匆

赵荣声夫妇在安徽老家又住了大半年，直到1942年秋天，他们才收到一位老同学的来信，得知卫立煌已丢官，赋闲在成都。他们历经艰辛于1943年春天赶到成都，投奔卫立煌，并在其资助下重新进入燕大社会学系深造。

不久，蒋介石又恢复了卫立煌的上将军衔，终于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此次登台，卫立煌对于随从人员做了仔细的选择。他对赵荣声说：“你刚回到大学，就把大学课程读完再说吧。你还年轻，我们一起干一番事业的日子长着咧。远征军都是陈诚的人，你去也不会合适。”赵荣声自然也十分体谅卫立煌的难处。

两日前，赵荣声刚刚在戴日三的家中听张友渔同志讲西南地方势力的问题，说是象龙云、刘文辉等人都有反对中国法西斯的一面，应当团结他们。抗战初期，龙云在昆明保护了许多民主进步人士。于是，赵荣声便把张友渔谈话的精神向卫立煌讲了，建议卫立煌到云南后和龙云搞好团结。

后来，卫立煌到昆明后，果然对龙云以诚相待，和龙云结成好友，至死不渝。直到抗战胜利后，在蒋介石吞并龙云的行动中，卫立煌还出人出车把龙云的次子和大女儿秘密送

往安全地带，惹得蒋介石十分恼火，却又抓不到证据。

赵荣声在成都燕大读了两年书，表面上是个老实的学生。当时燕大的学生有两类，绝大多数都是年轻的高中毕业生，少数就是赵荣声这样的重回学校读书的“老”大学生，他自嘲道：“从1935年到1945年，一个大学上了10年。”这颇有些象30年后，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大校园里的状况。

当时，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争取民主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赵荣声作为“老大哥”并不出面参加，但暗中他也向年轻的同学们介绍些斗争经验，出些主意。1946年春季，他们前往重庆范庄看望卫立煌，准备继续在他那里谋个职，这才听说他已复员回了上海。他们夫妇二人在重庆等船票数月之久。赵荣声夫妇只好等在重庆，顺便访朋探友。

直到1946年秋季，赵荣声夫妇才到达上海，找到卫立煌，是时，卫立煌已在做出洋的准备。

卫立煌率领中国远征军在九个月的时间里消灭了盘踞滇西、滇缅边境两年之久的五万日军，取得辉煌胜利，使得被日军封锁三年多的滇缅公路正式通车，盟军的援助物资得以从国外运进中国大后方。盟军总部为此向蒋介石举荐卫立煌为中国陆军总司令。

但是不久，蒋介石却委任了何应钦为中国陆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卫立煌不愿与亲日派何应钦共事，拒绝

到任。

1946年6月，蒋介石派兵大举围攻共产党的中原解放区。9月，在陈诚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蒋介石亲口通知卫立煌去美国考察。卫立煌虽时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一是他看得出，蒋介石在近期是不准备起用他的；二是他自己内心又十分厌恶内战，出国考察可以使他躲得远远的，因而又有几分求之不得的喜悦。

此时，卫立煌即将远行，思想已对以往的事情做了反复的总结，仍有不少的牢骚郁结心头无处发泄。见了赵荣声，他总有许多话要讲。他们谈了许多，有时谈话因客人来访被打断，卫立煌即使到了半夜也要打电话叫赵荣声去接着谈。有时，卫立煌叫赵荣声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赵荣声便开诚布公地指出他的前途，说他八年抗战搞得非常好，应保持荣誉，万万不可把这段历史糟蹋了，万万不可参加反共的战争，否则就会失去民心。

关于共产党，赵荣声说：“抗战初期，共产党三个师，现在已有一百万军队了，一个解放区连着一个解放区，日本军队都扫荡不了，别人更扫荡不了。而国民党内部更是一团糟，还在自己骗自己。

“孙山先生讲的，耕者有其田，在解放区都真正实现了。农民们自己组织起来，手中有了枪，保卫自己的土地，还能让谁重新骑在他们头上去吗？”

长期以来，赵荣声和靳明单独在白区工作，两人一直有

自行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的习惯。他给卫立煌讲的那些事实和判断，都是他和靳明从各种报纸上分析得来的。赵荣声每次和卫立煌谈完话都与靳明一起分析。此时，他们对卫立煌的思想状况基本上是乐观的。

卫立煌出国考察行期逼近。临走前他反复叮嘱赵荣声说：“你就在上海等我，不要远去，我不久就要回来，多则一年。将来有许多事要做。”他还嘱咐赵，在他回来之前多搜集资料，好好研究当前的政治形势。

走西口

1947年元旦刚过，一男一女来到兰州西北行辕副主任、甘肃省主席郭寄峤的办公室。

郭寄峤抬头一看，吃惊得两眼圆睁，不敢相信他说：“哟！是你们？”

赵荣声身穿上海名牌西装，头发按时尚打得油光，一副花花公子的潇洒派头。他彬彬有礼地一鞠躬，说道：“我去年大学毕业，听说兰州需要人，早就应当来效劳的。”

靳明穿一袭花缎棉旗袍，领口、袖口和袍边都镶着狐皮。

郭寄峤这个人一向能干，在卫立煌手下时曾被蒋介石称为“标准的参谋长”。他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还是很积极

的，也很器重思想进步、有才干的青年人。战地工作团解散后，他在洛阳还常对赵荣声说：“刘毓珩走了很可惜，人才啊！”他向赵说：“工作团的人还能找回来几个吗？我们第九军军部里要。”

后来卫立煌在洛阳失势，郭寄峤离开卫投靠陈诚，官职也越做越大。

赵荣声原来是想在上海找个职业，等待卫立煌归国。12月间，他从家乡返回上海途中，经过南京去看望大表兄张友鸾，恰遇张友鸾在办一个《南京人报》，请他留下来做主笔，于是赵荣声便留在了南京。

上班十多天后，赵荣声在花牌楼的《南京人报》社附近，与一个人迎面而过，及至他猛然警觉之时，那人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走远了。赵荣声出了一身冷汗。那人是谁？——原来是叛徒袁晓轩。

几天以后，赵荣声从美国大使馆参加完司徒雷登的酒会，又到梅园新村中共和谈代表团驻地去过，天黑才出来，走到《南京人报》社不远处，又一次看到了袁晓轩。此次，袁晓轩贼眼直往他身上溜，似乎也想起了什么。赵荣声见势不妙，过报社大门而不入，径直往前走，绕了几道街，来到甘肃省银行的南京办事处，见身后没人，才忙闪进门去。

这段时期，郭寄峤已当上西北行辕副主任并兼任甘肃省主席了。卫立煌一出洋，原来那些老班底的人都纷纷去投靠郭寄峤，郭也要依靠当年的那些人建立自己的摊子。前些日

子，郭寄峤还曾托人来信找过赵荣声。如今，赵荣声看到已无法在宁、沪一带待下去了，便想暂且到兰州去躲避一下。

从1947年1月到1949年兰州解放，赵荣声是在西北度过的。在他印象里，虽然这段时间中国大地正进行着天翻地覆的解放战争，但在他个人来说，他的生活是相对稳定的。

赵荣声去了西北之后，郭寄峤安排他去《西北日报》社当社长。《西北日报》是甘肃省政府的机关报，赵荣声有些踌躇。一方面这是国民党的官方报纸，性质反动，当社长责任重大；可是另一方面，他又想，若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在社会上活动，显然会比较方便，不妨做做看。

于是，当《西北日报》编辑主任金建生等前来旅社迎接赵荣声时，他便痛快地把家安在了报社。当晚，他去编辑部与上夜班的人员见面。金建生早已得知赵荣声是郭寄峤的“亲信”，便谄媚地告诉他，自从郭主席到任后，他已在《西北日报》上多次发表过“赞颂”郭主席的文章。赵荣声冲他点点头以示鼓励，然后对在场的人员发表了他的办报方针。他说：“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我赞成美国的民主风度和自由主义。本报嘛，什么样的见解都可发表，文章谁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诸位愿意把报纸办成什么样就办成什么样，你们自己搞，是功是过，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不管，文责自负。”

一番话，听得在场的人都有些发懵。赵荣声的态度与历任社长都绝对不同。《西北日报》历任社长不是中统特务就

是军统特务，专横跋扈，控制很严；如今他非但不严加管制，而且还以标榜美国的“自由民主”为由放手不管。编辑主任金建生带头鼓起掌来。

赵荣声在兰州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交游。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的侄子张立钧是赵荣声在南京安徽中学时的同学，他正给张治中当随从参谋。凭着这一层关系，赵荣声又以新闻界人士的身份成了张治中将军的座上客。他还和张立钧一起经常出入上层舞会和沙龙，结识了不少将军和太太们，虽然没什么军事机密可言，但也保证了他自己的耳目灵通。

在这两年时间里，赵荣声有个显而易见的功劳，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那就是报纸的发行。他曾借口纸张昂贵示意职员发行得越少越好。结果两年下来，《西北日报》从日印三千份逐渐减至一千份，使得这个“省府办的报纸”确实变成了只有“省政府看的报纸”了。

当兰州解放时，地方党组织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兰州调查》，供党政干部参考，书中关于赵荣声的一段，根本没有提及他的政治倾向，只说他是个“纨绔子弟”。

四、再叩命运之门

故园重归

1949年秋，赵荣声、靳明夫妇重新回到北京，找到坐落在中南海新华门对面的全国总工会。刘子久同志就在全总当文教部部长。他们没有任何介绍信或证件可以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因此，他们到北京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老上级做个证明，接上组织关系。

刘子久同志十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见面就说：“不错，活着回来就是好的。”并且介绍赵荣声到全国总工会负责新闻发布组工作。靳明因学的是社会学系儿童福利专业，则被介绍到全总机关幼儿园当了主任。

全总机关党总支组织部门请他们写下了自己的简历。

提起笔的时候，赵荣声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党派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做统战工作，从1938年初到1949年已是十一年了，自己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呢？不但没有带回几个军几个师的起义部队，而且那个卫立煌还在辽沈战役中充当了“东北剿共总司令”，被我军宣布为战犯，解放前夕逃往海外。当赵荣声在西北得知卫立煌接替陈诚出任了东北剿共总司令时，十分惊异，但他还是给卫立煌去了一封信，一方面“祝贺”他荣任要职；另一方面，是告诉卫立煌他本人的行踪，随时等待卫的召唤。结果不久之后，他收到了东北来

信，却是一封简单的公文式复信，丝毫没有要他去的意思。他便轻易作罢了。

如今，赵荣声从内心深处感到辜负了党的嘱托，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那段时期，赵荣声在新闻组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向首都各新闻单位发布全国总工会的各项活动的新闻。新的工作给了他新的活力，他觉得自己又年轻了，似乎又成了“一二·九”年代里那个干劲十足的《燕大周刊》主编。

一天，他刚刚组织完一场新闻发布会，机关党总支的一位负责同志派人把他找去。赵荣声兴冲冲地来到机关党总支办公室。那位负责同志坐在办公桌后，镇静中透露着威严。等赵荣声坐稳，他劈头一句话就说道：“关于你的组织问题，我们不能承认。”

“什么？！子久同志可以证明。”赵荣声惊慌地睁圆了眼睛。

“子久同志只能证明你过去是党员，不能证明现在。”

“那么戴日三……”他的头开始发胀，耳朵嗡嗡地响成一片。

“据我们调查，戴日三自己的党籍也没有弄清楚，他怎么能证明你呢？”谈话人依然那么镇静，无关痛痒，然而坐在他对面的赵荣声却像落进万丈深渊，几乎失掉了对外界的一切感觉。

他想到十一年前春节过后，他背着简单的行装离开了新

婚妻子的那一天，离开“西战团”领导和同志们的那一天；想起中条山里，烛光下，他与卫立煌的一次次的夜谈；想起在洛阳办事处躺在少奇同志的床上，少奇同志眯起眼吸着烟的情景；还想起年轻的妻子多次吵闹和她去延安的两次出走；啊，那时若跟她一走了之……

“难道，难道我十八年为党工作全部不算数了吗？”赵荣声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呢？”

“少奇同志也不能证明。”

“这不可能！”赵荣声委屈地叫喊道，直到三十年后他才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敢去问刘少奇同志。

那位书记依然振振有辞：“我还问你一句，你的党费交到哪一天？”

“有十年没交党费了。”

“好，我问你，我们党有几个党章？”

“一个。”

“对，只有一个党章。”党章上写得很清楚，“半年不交党费，就算自动脱党。你十年不交党费，怎么还能算党员？”

“……”赵荣声无言以对。

这次谈话之后，赵荣声从全国总工会新闻组调到全总机关报《工人日报》工作。但他仍然没有放弃澄清自己历史、接上组织关系的努力，他不断地向党组织申诉着自己的意见。

1951年5月，中央组织部对于他的党籍问题下了一个文件：不恢复过去的党籍。“但依赵脱党期间并无反党行为，一般表现尚称进步，如经工作考验，重新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时，可以考虑吸收其重新入党。”

“脱党”、“并无反党行为”、“可以考虑吸收其重新入党”……上级的意见无疑是任何个人都无法更改的，它对赵荣声的打击是极沉重的。但是赵荣声还是在一个月之后即1951年6月，正式向《工人日报》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又是一个月后，《工人日报》编辑部全体党员大会通过决议，接受赵荣声重新入党。

赵荣声破涕而笑。新生活等待着。不料，当年冬季整风之后，全国总工会机关党委下来通知，吸收赵荣声重新入党的决议被否决了。原因是，在他申请入党的材料上，对于上级党组织说他是“脱党”这一提法“有保留意见”。

无 以 诉 说

赵荣声有不少过去的老同学、老朋友、老战友，尤其是那些与他同时入党、参加革命的人，他们大多数都受到党的重视和培养，尤其在解放后，新中国急需人材的时候，他们都得到了国家的双重用。

赵荣声自从分到《工人日报》社之后，一直离群索居，

不去与老同学老战友来往。但是朋友们的消息还是不断地传来。刘毓珩改名陈其五，他从洛阳到了新四军后，很得陈毅同志赏识，在新四军和后来的第三野战军里一直担任宣传部长，解放后又在陈毅市长手下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充分发挥着作为党的鼓动家、宣传家的作用。还有黄华，他一直担任着中央外事方面的工作，1953年他又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政治谈判代表，在朝鲜的板门店与美军面对面地谈判，那段时期，黄华的名字天天出现在报纸上。1954年他又随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了日内瓦会议……还有龚澎、王若兰（后改名康英）她们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甚至还有那位从洛阳借洗澡之机逃出警备司令部监狱的余贻泽，他跑到延安去改名为杨公素，在五十年代初期就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大使，先后出使巴基斯坦、越南、希腊等国……

每当赵荣声在报纸上看到老朋友们熟悉的名字，看到他们的活动，更是感慨万分，有苦难言。别人都在发挥自己的才能，为党，为新中国工作，而自己还在为澄清个人的清白而消耗着大量的精力。

他感到惶惑，更觉得抬不起头来。他一天天变得沮丧，变得消沉，充满悲哀和无望。尤其在报社的工作中，赵荣声的心灵受到了比其他任何非党人士都要严重的伤害。建国初期，“同志”的称呼刚刚兴为时尚，报社的工作人员中彼此都称同志，但赵荣声却对何场合称他“同志”，何场合不称他为“同志”十分敏感，以至常常被刺痛；党的活动不让

参加，党的文件不让看，这对其他非党人士是天经地义的事，赵荣声却会为此动感情；到报社资料室借阅书刊也有党内、党外之分；到外边采访更是要区别党员记者与非党员记者的活动范围……

一天傍晚，同办公室的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编辑对赵荣声说：“老赵，你整天看稿子，也该休息休息了，你出去散散步吧……我们要在办公室开团的小组会，你在这儿不大合适。”

赵荣声仓惶地走出门来，一时不知所措，茫然四顾，终于，他落泪了。他独自走向东单的那片空场，让委屈的泪水尽情的流淌。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赵荣声又写了几本书，其中最著名的是人物传记，《把一切献给党》。

1952年，一个偶然的时机，赵荣声替别的同志去向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吴运铎了解情况。两人在北海岸边长谈，吴运铎便从枪榴弹的形状谈到自己的经历。一谈到晚上九点多钟。赵荣声听了十分感动。使他立刻萌发了要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出来的念头。于是他们又一连六七个周六的下午都在北海五龙亭见面。而每个星期天便成为赵荣声全力写作的日子。

1953年4月3日，《工人日报》开始发副刊，连载赵荣声撰写的长篇传记体通讯《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他得了680元稿酬。这时他想起了吴运铎身上那件半旧的棉衣，便

给会计写了条子，将稿酬转寄给了吴运铎。

1953年7月，此文被改名为《把一切献给党》以单行本的第一人称形式出版了，署名吴运铎。头版便发行二百多万册，一年之后，此书已被重印十五次。

别人不知道写书的是赵荣声，连他的十二岁的儿子也不知道。他不愿张扬。把一切都献给党了，又何必去计较个人名利呢。

1955年3月，卫立煌终于从香港返回大陆。他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和高度赞扬，随后卫立煌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他任“剿总”的真实情况也披露了一些。

1947年底，蒋介石急电把卫立煌从国外召回，要他去东北战场接替陈诚。当时即遭到家人和亲朋的竭力反对，但卫立煌考虑再三还是上任去了。他上任之后只是强调让军队休整，并未下达过任何一个战斗命令。蒋介石看卫在东北按兵不动，只好气急败坏地亲临指挥，卫立煌由此更有理由，“既然你亲自插手，那就管到底好了”，直到东北战场全盘皆输之时，卫立煌才向他的心腹道出了他的秘密：他在这场战役中没有下达过任何一个战斗命令，没有调动过一支军队。他采取了“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对策，使蒋介石自己丢掉了东北的大片土地。

卫立煌的归国，使赵荣声的处境稍有好转。1956年4月，《工人日报》社选举全总直属机关和中直机关的先进工

作者，赵荣声被群众自由提名当选；1956年7月，编辑部党组织接纳他为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

此时，赵荣声心中阴霾尽扫，真觉得天下阳光普照，前程大好。

卫立煌回国之后定居北京，赵荣声一直未去看望过他，尽管他始终在报纸上关心着卫立煌的消息。一天，当时已任北京文史馆员的符昭骞来找赵荣声。符是卫立煌在洛阳时第一战区长官部的参谋处长，后在郭寄峤手下任甘肃军管区中将司令，起义将领。他对赵荣声说：“卫老总回国后很想念大家，想请你和其他战地工作团的同志们去吃饭。”

赵荣声一口答应下来。卫立煌从香港返回内地，在海内外，尤其在台湾军政界引起很大震动，为我党的统战工作，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了不少的贡献。再说，三四十年代时赵荣声与他接触密切，相交很深；虽说赵与卫最初的接近是因为党给的任务，但长时期来双方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推心置腹，都有很深的感情。去看望卫立煌既是统战的需要，也是人之常情。

然而，当赵荣声去请示当时的党委书记时，书记答复说：“你现在没有统战任务了。卫立煌的工作是统战部的事，你不用管。”

几十年后讲起这些往事，赵荣声说：“如果那时我去看望了卫立煌，还能通过他与刘少奇和朱总司令接通，那么我的党籍问题那时候就能解决了……”

生活里那么多的“如果”和“也许”，那么多的偶然，而任何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可能根本地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然而谁又能料得到哪些偶然是“吉”，哪些偶然是“凶”呢？

一年之后，1957年夏天，该是赵荣声由预备党员转正的时间。但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反右派斗争骤然开始了，在赵荣声负责编辑的文艺副刊《百花》上发表文章的几个人相继被打成“右派”。赵荣声幸免于难。

然而在1958年4月，编辑部党支部决定讨论赵荣声的转正问题时，第一天的党小组会就发出了不祥之音。会上，党员们给赵荣声提意见时，气氛逐渐由平淡变得激烈起来，而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最终竟开成了一场斗争会。小组会一连开了六次，一次比一次人多，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一次相当于编辑部党支部大会，而且气氛越来越紧张，尤以一位人事科长的发言最为激愤。

他说：“赵荣声是一个最虚伪、最阴险、对党怀恨最深的反党分子。可是他平常隐蔽得很深，装得很象。他常常吹嘘他怎么怎么爱党，又吹嘘过去他为党干过什么什么工作，曾经欺骗过不少人，其实完全是假的，都是他编造出来的。今天大家戳穿了他的画皮，让他的原形显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真是一件大好事。”他还说赵荣声曾经为卫立煌歌功颂德，国难当头又临阵逃脱。解放后当了处长级编辑仍不满足，与党长期对立，等等。

大会开到尾声进入高潮，当场宣布赵荣声为“反党分

子”，开除出党。

这时，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这辈子完了！

赵荣声离开编辑部以后，当过校对，资料员、勤杂工，还参加过“大跃进”时期的“大炼钢铁”活动；1961年被补划为“右派”，同年5月，他与全总系统的若干名“右派分子”一齐下放山东。

在靳明的忠实陪伴下，赵荣声一家三口来到济宁市，一落脚就是十八年。

他是属于他那一代人，带着那个时代的局限，抱着那个时代的信念，也分担着那个时代的灾难。

再叩命运之门

十年动乱，宦海沧桑：干部们一会儿被打倒，一会儿又被解放；一会儿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一会儿又被结合进领导班子……而在这一切变化的后面，则是一支支外调队伍的游动在起着作用。党的系统、政府系统、军队系统、还有民间的、群众组织的千百支外调大军撒遍全国。

文革动乱初期，一天，赵荣声正和几个“国民党残渣余孽”在仓库里干活。这时，一个“造反派”进来叫住他：“赵老右，到办公室来！”赵荣声来到造反总部，见有陌生的一男一女在等他。“造反派”说：“他们是来外调的，问

你什么就说什么，不许隐瞒。”

于是，来人问道：“你是赵荣声吗？”

“是。”

“认识陈其五吗？”

“认识。”

“你是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从此以后，几乎每隔十天半月就有外边的人来找赵荣声外调。

沉睡了多年的记忆又重新活跃起来，本打算永远忘掉的事情和淡忘了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又都重新回到脑海中来。正是上百次的外调帮助他调动了记忆，有时想起往事，思潮如涌，由此人此事联想到彼人彼事，又想到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有时调查一个人会来好几派的人，为了不出差错，每拨外调的人走后，赵荣声就把问答的内容详细记录下来，渐渐的他已记满了一个本子。

运动后期，大约是1974年，靳明患病，济宁医院怀疑是癌症，但又没有诊断设备，赵荣声决定带她上北京检查；同时，他也怀着一份希望带上了重新写的更加详细的个人历史材料。

回到北京，他便找了过去的《工人日报》副社长。此时尚未“解放”的章容同志，把材料交给他。章容一夜未眠，一口气看完了材料，后来他用责备的口吻惋惜地说：“脱党问题为什么以前不讲清楚？”

当赵荣声在北京积极活动的同时，全总“复查办”也已开始了对错划右派的问题和历史材料的调查。1978年12月10日，全总党组《关于赵荣声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下发。1958年定他为右派分子的结论应予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原工资待遇，承认赵荣声1957年8月17日起为中共党员。

从“1957年8月17日起……”还有一条尾巴。

1979年10月22日，全总党委“关于赵荣声党籍问题的复查结论”指出：“赵荣声同志从1936年到1956年的党籍应该恢复。”

那深绿色铁皮档案柜柜门的开启声是太沉重了，就像是赵荣声一回回的叹息，那摞比两块砖头还要厚的发黄的材料也太沉重了，它们是赵荣声一次次忠诚的倾诉，就像他悄洒偷抛的千行泪。

可是，作为一个老年人，他没有能躲过疾病的袭击。就在他看到这份结论的前9个月，赵荣声在一次艰苦的采访之后，因脑血栓形成，“中风”倒下。治愈之后，他的腰真的弯了，步履沉缓，口齿也不够清楚了。直至此时，他才在心中大喊：“我完了！！惨啊！！”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是他在“中风”倒下之后想到的两句古诗。当时已64岁的赵荣声仍怀着一颗少年将军的雄心，还想去叩命运的大门哪。

奋 笔 著 书

也许，最初的冲动始于那上百次的外调之中，也许始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之时故旧新知的相逢：也许是因为大病初愈，手脚尚欠灵活而头脑则变得愈发活跃；也许是因为1982年离休之后有了充足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是的，他要写书，写回忆录，写这一生曲曲折折，坎坎坷坷。

他曾动手写《一二·九运动亲历记》，中途却因当年自己编写的《燕大周刊》被北大图书馆列为珍品，不让借阅而辍笔。随后他只得化整为零，凭着记忆给全国好几家报刊撰写了关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回忆文章。

1981年，赵荣声还担任着工人出版社副社长的职务时，全国政协文史办公室的尚传道来找赵荣声，他来请赵荣声写一段关于卫立煌的历史，即卫立煌访问延安的一段，说是卫夫人韩权华推荐的，文章要求万字左右。他们坐下来谈卫立煌，越谈越热烈，尚传道就说：“你知道这么多事，那就多写点吧。”

赵荣声先是写了卫立煌访问延安的一段，尚传道来取稿，两人又继续谈，赵荣声就继续写，由一万字而二万，而七八万，越写越多。此时他充分地利用了他的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的是他在解放后不同时期历次政治运动中记

录下的关于人物、地点、时间、事实的证明材料。

他开始搜集关于卫立煌的一切资料。赵荣声在卫立煌那里当秘书仅四年时间，但他要写出卫立煌的一生，把他的思想脉络写清楚，必须做大量的调查工作。他查阅了大量报刊资料，拜访卫夫人韩权华、卫的幼子卫道然，陪同卫从法国回国的著名声学家汪德昭等六七次，并且细心的录下音来。他还与卫立煌的高秘温广汉多次通信，商议卫立煌的前期历史……与赵荣声同在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工作过的陈其五、朱劭天也把自己所记得的事情全部告诉了他。可惜陈其五、温广汉都未能等到这本书的出版便与世长辞了。

1981年12月，乘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在京召开之便，赵荣声拜访了来京开会的民革中央委员、贵州省副省长陈铁。陈铁自抗日战争时期在卫立煌手下任营长，以后一直跟着卫立煌，抗战时继卫立煌之后担任第十四集团军军长，直至卫在东北剿总当总司令，陈铁就任副总司令，对卫立煌十分熟悉和了解，握有大量第一手资料。1981年，陈铁已83岁高龄，多种疾病缠身，他是躺在房间里与赵荣声谈话的。临走，陈铁还把他自己写的《卫立煌先生史料的参考资料》的底稿交给赵荣声。几个月后，赵荣声收到了来自贵州的陈铁先生的讣告。

赵荣声开始动笔写《回忆卫立煌先生》，历时三年。

1985年1月，二十八万字的《回忆卫立煌先生》一书由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书名由赵荣声的堂兄赵朴初题

写。第一版就发行十一万册。《中国文学》、《人物》、《纵横》、《人民政协报》、《深圳特区报》等二十多家报刊争相转载，几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报都作了介绍和评论。

人生之浮沉，恐难有规律可循，何况在不同的人眼中，浮沉又各有不同的含义呢。更有人说，对于功名，老年和青年人相比要淡漠得多，少年人追求功名，其急切，其热切，都是与生命同等价值的，待到进入中年，生命与功名便要分出距离来，那时的成功已无鼓盈之气，而只是瓜熟蒂落之感了。如果说少年成功象打水漂，成功会一个连一个地掠过水面，那么老年人的成功恐怕只有运动场上长跑到终点时的感觉了。

1988年春节前夕，赵荣声与他忠实的战友和伴侣靳明平静地度过了他们结婚五十周年的“金婚”纪念日。

赵荣声已于1995年2月17日逝世。他还有一部通讯文集等待出版，一部写了一半的《一二·九运动亲历记》有待完成。

谢文秀简历

谢文秀，女，江苏人，1934 年生于上海，1953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编辑。从毕业分配直至 1989 年退休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小人物的工作与国家大气候密切相连。政治气氛稍许宽松时，让我当记者；阶级斗争弦一抓紧，我只能当内勤了。曾任中央台综合部副主任（1989 年 7 月被免职）。

从事的是广播工作，稍纵即逝，基本无文字留下。偶尔写小文，只是习作而已。

碎 片

——一个右派妻子的回忆

回想起来真是幼稚，少年时总以为当双鬓飞霜、皱纹爬上鬓角的时候，一个秋日的黄昏，自己会翻看书里夹着的枯萎的花朵，感叹如梦如烟的人生，思念往昔的时光，玩味淡淡的哀愁。

青年、中年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仿佛使我清醒一些，代替玫瑰色梦幻的是实实在在右派妻子的处境。比起那些随丈夫流放到边疆的妻子，我的不幸自然也只是“淡淡的”，甚至还算是“幸运”的。从没离开原先工作的新闻单位，下放过几次，也是名正言顺的下放干部，不算劳改。

幸耶？不幸，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没有挨饿受冻，更没受过批斗，只是那些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竟然也像强烈地震时甩出的揉着惊悸、辛酸、无奈也还带着一丝温馨的碎片，深深地嵌在脑海里，化不开，忘不了。

罗 网

即使在邵燕祥蒙受种种耻辱打入另册，我处境不佳的年代里，我也不能把一切不顺心乃至倒楣的命运全算在他的账上。在一些人看来，我并不是无辜的。

有人说：瞧，这才是一对呢，都是右派言论。

这句话，我是1958年夏天在沧县整风时听说的。

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也要被划为右派了。

为什么？

很简单，是我又一次自投罗网。

1958年初，刚进窦店村不久，住在一户贫下中农家里，这家日子过得很艰难，几乎很少吃到纯粮食，我和他们六口人一起除了没吃过观音土以外，各种代食品都尝遍了，黄菜盘子（一种野菜籽儿）、棉籽饼、萝卜条、糠，还有我叫不上名儿的能填肚子的各种野菜、野草。户主叫韩崇悌，生产队长，生活的重担压得他除了下地干活，一言不发。瘦得皮包骨的大娘看着三个正长身体的孙儿孙女缺乏营养，忍不住数落了高级社的种种弊病，说还不如初级社。在一次团支部会上，我转述了房东大娘的看法，自己以为是如实反映了贫下中农的呼声。

没几天团支部又一次开会，是对我的批判会，记得有一位党员干部列席，团支部书记定调，指责我下放以来不好好改造思想，还否定农业合作化，说什么高级社不如初级社，还有句话在心里没说出来，就是初级社不如单干。

尽管我在一年前刚在解放军胸科医院开过刀：因先天性动脉导管未闭动了结扎手术，从小体质又较弱，可在窦店干活毫不惜力，从未嫌苦怕累；我没下过农村，更没尝过饥饿的滋味，看着农民吃糠咽菜，自己咬着牙也挺过来了，没有任何怨言。但是没用，谁让你说不合时宜的真话了。这又一次埋下了祸根。

这到底算是第几次，我也说不清。

参加工作以后，我这个经历简单（从没参加任何“反动党团”包括其外围组织，也没接触过国民党和三青团）、头脑更简单的学生，因为直言，一度居然成为肃反的审查对象。

我在学校并不用功，可是少年时代学的知识多少在脑子里沉淀下一些印象。我记得中学的外国地理课本明明白白说：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原先不是苏联的领土，二次大战爆发后才并入苏联。不知什么鬼使神差，我在某一次会上阐述了这一观点。我又喜欢跟一些同学打桥牌、听音乐会，偶尔还去喝咖啡。这在一些人眼里，无疑是坚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甚至还有反革命小集团至少是落后小集团之嫌。

肃反运动，我不是明确的审查对象，但开了几次会

碎 “帮助”我，找我谈话，让我揭发。我揭发了别人，如巴金
片 所说“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为的是保护自己过关。

肃反的罗网，我算是擦边而过，因为我真的跟反革命没有任何瓜葛。当然也因为当时主持电台对内部（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顾文华是位大事从不糊涂的领导，他对我被支部列为肃反审查对象大概也觉得荒唐，在他的领导下，对我的审查也就真成了走过场。

1957年鸣放时，我因忙于业务，没在任何所谓煽风点火的大字报上签名，而邵燕祥，起初也没被卷入。后来风向一变，我这个后知后觉的人对大祸临头没丝毫预感，非但不感到忐忑不安，甚至还要对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说三道四。同时表示不理解甚至愤慨的还有比我大几岁、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李宜。

邵被划为右派，我做梦也没想到，国庆节前开了多次党支部扩大会议，扩大到团支部，当然不包括我这个团员。我知道党支部在“帮助”他，他不告诉我开会的内容，我也不问。那会儿的人，包括我这个被视为典型资产阶级小姐的青年，实际上组织纪律性极强，从不打听任何所谓党内机密。我大概太懵懵懂懂了，不知道他已陷入天罗地网，国庆假日，他留在宿舍写材料，我却还有兴致和同学一起去听傅聪的音乐会。

没多久，对邵燕祥的斗争不再保密，党支部书记何光在一个局党组成员支持下导演的，一批又一批揭露他“罪行”的大字报出笼了，一次又一次批判他“罪行”的会议召开

了，何光还专门找我谈话，让我揭发邵的问题。我虽然心情矛盾、痛苦，但是经历过政治运动的我，知道自己辫子不少，也担心被揪出来，只能表态要划清界限，还列举了我知道的他寄出而尚未发表的诗文。

1957年我没被划为右派，和李宜都被定为中右。几十年后才知道，我这是沾了李宜的光。本来我和李宜的“右派材料”已经在部分人中传阅了，只因李的姑母、姑父是李伯钊（中央戏剧学院院长）、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投鼠忌器，不看僧面看佛面，支部对李宜要网开一面，我也跟着从网边闪过去了。

1958年在沧县整风补课课时，让每个人写大字报交心，我竟然贴大字报说想不通邵是右派，还引经据典：苏联的杜金采夫虽然写了《不单为了面包》受到批判，但并未因此成为敌人云云，还说如果邵是右派，那么，我更是右派。急得一位下放在同村的好心人、电台工业组的同事，比我要明白几千倍、几万倍的夏佛生恨铁不成钢地批评我：你根本不懂思想改造。是的，我真不懂，都到这个时候了，什么阳谋、阴谋早已公之于众，哪个知识分子不是噤若寒蝉，我好不容易逃出反右这一关，到补课了，还要自投罗网。

没料到的是我又一次幸免于难。当时不明就里。后来得知，下放工作团的领导核心中，有三位老同志：重庆新华日报来的陈竞寰、胶东来的王治本和山西老区来的马映泉（前二位已去世），力保我过了关。理由是：已经有一个被

碎 划为右派了，别让一家子都成右派。真是菩萨心肠。以后的
片 日子里，他们多次见过我，从不提这事；燕祥和我从侧面了
解到当年的实情，也没当面感谢过他们。

我不是教徒，但我真诚地祈求上帝保佑：去世的二位上天堂，在人间的马老健康长寿。

门 槛

从那以后，不论是邵燕祥，还是我，都曾多次虔诚地检讨、认错，他总算在 1959 年秋被摘了“帽子”，回电台不宜留在编辑部，后调广播文工团；而我，虽不适合当记者，尤其不能搞工业报道（是怕我里通外国泄密，还是担心我到重点工程搞破坏？），从沧县回电台调离工业组，到新闻组当编辑。六十年代初期，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为知识分子包括“右派”说了点好话，我的处境也有微妙的变化，一度居然把我调到记者组。没过多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了，我自然也调离记者组。我常说，别看我这个小人物，我的工作调动还总是和大气候紧紧关连着呢。

尽管对我的工作时有调整，我也绝对没有什么怨言。看着那么多右派家属随着丈夫到宁夏、内蒙落户，我除了感激，还有什么可说的。

那些年，我真诚地感谢组织对他的挽救，感谢组织对我的帮助。几乎每次运动，每次年终小结，都像祥林嫂说她的小毛被狼叼走一样，痛骂资产阶级家庭，检讨阶级立场，又针对多年不驯服的毛病，表示决心当驯服工具。记得，我打心眼里烦“驯服工具”四个字，但是又难以回避，就自以为聪明加了几个字，“作党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

就像祥林嫂因为两次嫁人怕到地狱被两任丈夫扯成两半捐了门槛赎罪一样，燕祥和我在那些年里，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悔过、认错、改造，甚至紧跟。1959年反右倾运动，他刚从黄骠农场调回北京，根本闹不清运动的背景，更不知道庐山会议批的是彭老总，反正《红旗》杂志上批同路人，也就跟着批。记得他写的批判文章还被机关的内部小报刊登了，发表时没有他的名字，只说是会议纪要。六十年代初期，他又主动配合反修斗争，把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维护斯大林的小说《叶尔绍夫兄弟》改编成话剧，经过孙维世等人指点修改后演出。“摘帽右派”参与的剧本，居然成了党团员内部观摩的话剧，尽管他本人已被开除党籍。真是极大的讽刺！

1963年生的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起名叫甜甜。我们两人已经改造得绝没有自己的意志，以为从此可以四平八稳地过平常日子，我们希望生活像蜜一样甜，哪还会去反党、反对伟大领袖呢！再说他也劳改过了，我也没少劳动，应该说已经赎了罪。可是“七八年再来一次”！捐了门槛还是有罪！

他那么样的夹起尾巴做人，从文艺界小整风开始，又成

碎了批判斗争对象。只能说在劫难逃啊！

片 门槛啊，门槛，如果是屠格涅夫笔下的《门槛》，那是他心甘情愿的。他从解放前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起，就是抱着那样的信念：

——呵，你想跨进这门槛，你知道等待你的是什么呢？

——知道，——姑娘回答说。

——知道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吗？

——知道。

——知道你会跟人世隔绝，完全孤零零一个人吗？

——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知道不仅要躲开敌人，而且要抛弃亲人，离开朋友吗？

——是的，……都可以离开他们。

——好吧。你情愿去牺牲吗？

——是的。

……

如今，门槛怎么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的了。
而我，理所当然要受株连。
更大的风浪终于来了。

冬 日

三十二年前的冬天——1966年的冬天格外冷。

我住一间朝北的12平米小屋，暖气似有若无，隔夜烤在暖气上的袜子没干。我又给孩子们找出两双袜，一双有个小洞，赶紧找针线缝上。

每星期一早上都是这么紧张。不到五点半就起床，自己收拾停当，给两个孩子准备好干净衣服，轻轻地叫醒儿子、女儿。

闹闹、甜甜，乖，起床，该上幼儿园了。

儿子多少知道钟点，老大不情愿地问，妈妈，几点？

六点都过了，起来吧！

不，幼儿园班车七点半才来呢，我再睡一会会儿。

儿子说得不错，班车离宿舍很近，七点起床也不晚，可是……

闹闹，乖起，妈妈还要送妹妹上报国寺托儿所呢，晚来不及。听妈妈话。

甜甜似醒未醒，使劲揉眼睛。

“妹妹都醒了，闹闹懂事，自个儿穿衣服。我帮妹妹穿。”

全利索了，又给孩子穿上大衣，戴上口罩，到宿舍院儿

碎 里，天还没亮。

片 六点四十五分，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地点——小马路的南边，那里挨着北京电台的大门，门前有一片空地，比较宽敞，即使有来往车辆也不至于碰着孩子。他照例是第一个，也是半小时内惟一的一个。马路上静悄悄的，我替他把大衣领的扣子扣紧，围巾围紧，一再叮咛：“千万别走远，实在冷得不行，就跺跺脚。闹闹勇敢、能干，不用妈妈送上班车，自个儿能行，是吧！”儿子痛快地答应了，分手时还说了声“妈妈，再见！”

甜甜走得慢，我只好抱着她往汽车站赶。本来19路车直达报国寺，可那年修广安门桥，当中要下来走一截。广安门下车，我实在抱不动了，拉着她的手过临时搭的便桥。桥周围一片空旷，扑面的大风刮得我衣服仿佛被吹透了。低头看女儿，穿的是哥哥的小大衣，有点短，更挡不住凛冽的寒风。我眼圈儿一红，责怪自己真不是好妈妈，怎么就没想到给孩子准备件厚大衣呢，虽说幼儿园、托儿所都备早饭，大冷天，我怎么就不让孩子吃一口再出门呢！“甜甜，这儿冷，咱们快走，过了桥上车就好了。”她紧紧拉着我的手，依偎着我的身子，尽可能赶上我的脚步。一边走一边又怯怯地重复了多次的要求，“妈妈，星期六早点儿接我，每次你来，小朋友都走光了。”女儿的要求不高，可是我没法答应，又不忍心拒绝，只好拐了一个弯，“你看，每星期六，妈妈总是顾着接你；哥哥坐班车回宿舍，都是邻居阿姨、叔

叔帮着接，妈妈对你好吗？”“好！”“对，甜甜也好。好孩子，妈妈晚接也不闹，是吗？”她点点头。

从托儿所回来的路上，才又想起儿子。我安慰自己，班车会按时来的，他不会老在冷风里独自站着，也许还能遇上熟悉的叔叔阿姨，跟他说说话，把他送上车。再说他也习惯了，将近半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有个经常送孩子上班车的好心人告诉我，每次车一起动，人家小孩儿总是挤在靠窗口的地方吱吱喳喳向爸爸、妈妈招手再见，而他，一个孱弱白皙的小男孩儿，安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是的，小时候有名的闹闹，现在仿佛变得特别乖。我不也是么，都说我个性强，如今不也得比谁都知趣。

八点差五分，我准时到办公室。

离 婚

没人硬性规定我每天必须按时上班，是我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倒也不仅仅因为文革的风暴，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遵时，守信用。工作以后也习惯了按时上下班。更何况如今！

别人家里有事能晚会儿来，早点走，我不能，谁让我丈夫是专政对象，进了政训队呢。据说已内定开除公职，到湖

南洞庭湖边的农场劳动改造。我无法改变命运，但是我要靠自己加倍的努力，表明我对革命事业忠诚，对革命工作绝对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许这样能稍稍改善一下处境。我一再表明，准备跟丈夫离婚，给儿子邵小哨改姓名，叫谢立新。女儿 1963 年生下来就跟我姓，理由自然是男女平等，不过下意识里也想过，万一再有风浪，非离婚不可，一双儿女一人一个也好。没想到，不幸而言中。

几天前，我已把母亲留给我作纪念的几样首饰交到部门的文革领导小组；前不久父亲在上海病故，我只发了一个电报给顶门立户的哥哥：请酌情办丧事，我不返沪。

我还能干些什么呢？惟一可表白我心迹的只有拼命工作。记得 1958 年下放结束时，不少右派妻子调到宁夏，我却如期回到电台。一位被认为原则性极强的女上级沅华善意地透露了缘由：“像你这样努力的业务干部，中央电台还是需要的。”其实这只是一种说法，要不是广播局的梅益等领导有意让邵以后（当时他还在黄骅农场劳改）调回机关，我再努力也徒然。不过，听了这话倒让我多少明白一点：我没有任何优越条件，出身不好，爱人是右派，只有业务是我惟一的救命稻草。

受或多或少的株连，我算是过来人。可这回来势不善。儿子五岁多，女儿才三岁，还有头几年刚寡居的婆母。怎么办？

早在他被隔离前，我们就商议好：孩子由我一个人管，住机关宿舍。根据以往的经历，我存有侥幸心理，也许还能

留在电台工作；他回家跟老母亲住，周末假日孩子也不去，最好让孩子慢慢忘了他这个爸爸。

联想起 1957 年那个让人揪心的日子，我们结婚才半年多，大难临头，我还傻得全然不明事理，表示即使他没工作我也要养活他。这回，可真应了那句人们熟悉的话，“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两分飞”。选择“分飞”无非是觉得可以暂时保住自己和孩子不受冲击，至于能不能飞出去，能不能飞到一片安稳的树林，谁能预料？“两分飞”对我来说最大的代价是要忍受人们心里的非议。那些年不管人们口头上如何革命，可善良的人心中总有是非。我把他撵回家，还不让孩子跟奶奶见面，我还是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吗，简直是无情无义的势利小人。可想想两个年幼纯真的孩子，我别无选择。宿舍院儿里，电台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少儿部主任郑佳，除被抄家外，连宿舍的房门口也贴满了勒令低头认罪的大字报。那末，用不了几天，家里也会遭到劫难，孩子脆弱的心灵怎能经住这样残酷的折磨！我并不期望领导表扬我立场坚定，只是怕惊吓着孩子。

分别时，我忍不住哭了，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没流泪，一再说让我多保重，“要想开点，一个人一辈子什么日子都要过的。”八月的一个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衣物离开了广播局宿舍。

那几个月，我跟他没有一点点联系。

没人相信我会真离婚。从延安来的老播音员齐越对他

碎 说，你们是假离婚吧！

片 是真是假，我也说不清。形势一紧张，我就觉得怕早晚得办正式手续，甚至考虑得十分具体：离婚大概得上居委会或是法院办手续，在那种场合，我能昧着良心严词厉语指责他如何如何反动，表明坚决离婚的决心么？恐怕不能，我担心自己终究控制不住感情，会流泪，甚至泣不成声。那样的离婚徒然落话柄，挨批判，倒不如先拖延些时日再说，也许时间长了，疏远了，感情也就淡薄了。

我真是这么想的，从没告诉过任何人，燕祥也不清楚，直到今天。

后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从政训队出来，我也没敢让他公然回家，都说右派要到运动后期处理，谁知道会落个什么下场。1967年春节前，邻居两夫妻带着孩子回老家探亲，孩子们平时在托儿所，一个单元里日常就我一个人，他偶尔晚上悄悄地来，深夜或凌晨待院儿里基本没人时再离开，合法夫妻的“非法”活动隐秘而短暂，连孩子都不知道爸爸来过。没过多久，邻居回来了，我们又恢复两不相干的生活。

1968年春，大概预计到新一轮冲击将会波及，他给我带来过两封信，原信早就销毁，大意是让我放心，再大的委屈、折磨，他都不会自杀。他永远记住鲁迅先生的话：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果然，这年一过“五一”，他又一次被揪出来，说是妄图翻案的右派。

离婚分手的事又在我心头翻腾开了。

我找谁商量呢，想来想去，有一位老同事，早在五十年代后期就与右派丈夫离了婚，之后一直带着女儿过。我登门拜访，她不感意外，只是告诉我，如果不再结婚，离婚后处境也改善不了多少，怎么说也是孩子的生父，自己的前夫；这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不可能甩掉。本来我天真地以为离了婚孩子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些，少遭些白眼，少受些歧视，从未想到还要再找个什么人结婚。既然如此，我也只好还是老主意，拖，拖，拖……

后来，受冲击的人越来越多，那么多反革命、黑帮、5·16、叛徒、特务，有时简直像走马灯，今天还是一派头头，明天成了黑手；这会儿是革命干部，过一阵又成了叛徒，他们或她们的家人大都照样过日子，我责怪自己：干嘛那么惊慌失措，自寻烦恼，还是得过且过吧。

尽管我下过几次决心，一刀两断，划清界限，最终还是齐越说得对：是一场假离婚。

我从少年时就耳濡目染了那么些良心、情义等等价值观念，遇到思想不通强迫自己采取某一项行动时，好像心灵无时无刻不受熬煎，有时也想学着硬硬心肠，快刀斩乱麻，不行，心里发虚。我大概命里注定，一辈子也成不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识时务的聪明人。作为妻子，只能是划不清界限的女人；作为编辑，我则是个只认死理而不会“转弯子”的迂者。

要 强

我自以为是个要强的人。

那一阵工作、开会、学习，哪头也不敢耽误。文革开始刚兴背“老三篇”时，我和同办公室同年龄的张赫玲很快就把“老三篇”和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背得滚瓜烂熟，一半虔诚一半逞强，还夹着几分不得已。反正，我这个注定每次运动都“落后”（不说你反动就是十分客气的了）的人其实是从来不甘也不敢“落后”的。

不管心情如何，在公开场合我不愿失态。1957年我跟他同一个部门，批他的大会、小会，凡是让我参加的，我都坐在一旁不动声色，听着各种上纲上线的批判，瞥一眼各种人投来的目光：幸灾乐祸，冷淡，更多的却是同情。这次运动来势更猛，下跪、剃阴阳头这些至少在电台前所未闻的侮辱人格的种种，他无一幸免。

那天早上，我一进广播局大门，就感到异样，几个年青人恶狠狠的嚷嚷，把黑帮梅益揪出来，接着中央电台有人呼应，把郑佳揪出来，又有人喊，把……我赶紧快步走到办公室坐在桌前，不管走廊里有什么动静，我总是一声不吭，低头编稿，尽力掩饰自己的不安。我认出门口的年青人中有一

位是广播学院刚毕业不久的女学生，是对外部（国际电台）的文艺编辑，总还会有对内部（中央电台）的人参加，都是些谁呢？事后听说把黑帮头发剃成阴阳头的是六十年代初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曾跟我在一个部门工作过；那个特地找来剪刀的我还比较熟悉，是个极为幼稚的小录音员。应该说在广播局当时的一帮风云人物中，他们绝对不算最坏，可是偏偏我认为人品尚过得去的人会有这样的“革命行动”，真是不可思议。事后想起来，觉得运动一来，那种疯狂，那种“斗、斗、斗”的氛围，还有历次运动过后积极分子被提拔的实惠，真是把人性中最最丑恶、最最残酷的那一部分充分调动出来了。这几十年，我还多次遇到那位复旦的低我好几班的学友和那位录音员，我们相处很好，有时还能说些真心话。谁也不提当年那些个事。

那些年在公众场合，不管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我总是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委屈、眼泪只能往肚里咽。每天上班，特地穿得整整齐齐，个别极熟的朋友半真半假地说，你啊，越是日子不好过越穿得毕挺。毕挺显然是夸张，不过确实不愿给人以可怜兮兮的印象。

1967年女儿转进广播局幼儿园，周末、周一早上不用兵分两路，疲于奔命，我感到轻松多了。运动一开始那种焦急、畏惧的情绪也稍有减轻。

两个孩子诞生时，我们的经济情况可以，高兴时给孩子缝点衣服，偶尔回到上海，亲人送、自己买，孩子穿得不算

碎 片 差。文革后，孩子长高了，原先的衣服嫌短嫌小，到商店看看，不管大人孩子都是四个兜的中山装，价钱又不便宜。我想想，还是自己动手吧。平时开夜车怕影响第二天工作，万一犯困出了差错，可担当不起。星期六晚上孩子们睡下后就是我作针线活的时间，缝纫机经常踩到半夜两三点。就这么着，儿子从小到成年没穿过一件千篇一律的中山装。我还记得，女儿有一件浅蓝色灯芯绒外套，又短又小，我把它改成一件后边开的背心，还镶了深蓝的边，她穿了好几年。可能是1969年，形势稍许缓和一些，上海的哥哥出差来京特地给女儿带来了当时最时兴的小军装，女儿挺喜欢，我始终没让她穿，转送出去了。铺天盖地的草绿色，我不只是看烦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得意洋洋自以为天生高人一头的红卫兵，抄家时用皮带抽人的红卫兵，成天绷着脸训斥人的军宣队，哪个都穿着一身绿。

以往节假日孩子都上奶奶家，现在，我就设法带他们上公园，让他们也跟健全家庭的小朋友一样，感受一点童年无忧的欢乐。

文革开始一两年，我还参加节日报道或重大报道的最后复制合成工作，外出采访自然就免了。复制合成时间性强，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好在这些活我干了多年，并不怵，麻烦的是晚上播出后还不算完，必须等姚文元审定的新华社稿来以后，以钦定稿为准来修改。这样，白天干了一天，晚上休息片刻又要接着工作。改完还不能走，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个更正呢，

得到第二天清晨拿到《人民日报》大样,我才算完成任务。

在机房时,我尽可能镇静、细心,动作敏捷,除了眼前的录音带,文字稿,什么都不想。出了机房,有点空闲,就要想这想那,想起那一对没人接的儿女,该在幼儿园园长老安伯伯家安睡了吧。老安伯伯是位老红军,文化水平不高,心眼儿好。每逢节假日谁家孩子没人接,他理所当然地把孩子安顿在自家。我那一儿一女是老安家节假日的常客。直到今天,我还清晰地回想起他微微弯曲的身躯,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每次我从他家接回孩子一再表示谢意,他和老伴只是轻轻地说,孩子挺好,快走吧,带孩子好好玩玩。

是的,那天我上幼儿园接孩子已经是五月二日早上快八点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又该回幼儿园过集体生活,这仅有的一天,不能委屈孩子。“走,咱们上北海公园去!”两个孩子一边跳着蹦着,一边抢着告诉我头天夜晚怎样在老安伯伯家的房顶上看天安门放花。虽说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看孩子们这么兴奋,倒也不觉得困乏。“真好看,妈妈,轰一下,半边天全亮了,紫的、黄的、银色的,比在奶奶家都看得清楚。”“你们怎么上的房?可要小心啊!”“老安伯伯家的大哥哥、大姐姐把我们弄上去的。没事的。”

国庆节夜晚看放花,北京人得天独厚的享受、乐趣,对我仿佛已经陌生了。1956年的国庆,燕祥要写一篇节日夜晚的特写,我陪他走在西长安街上,望着星空一簇又一簇的焰火,我们随便谈着,他说起火树银花,我忽然联想到在上海看过的

碎 美国歌舞片《火树银花》,不过没好意思说出口,当时他正真
片 诚地帮助单纯得近乎幼稚的我,多读苏联的革命题材的文艺
作品,我怎能念念不忘少年时看的美国电影呢!我一直觉得
他比我革命得多,甚至认为过于刻板,不会跳舞、不会打桥牌、
不会……我做梦也没想到,才一年时间,这个温文尔雅的共产
党员被批成青面獠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唉,越想越远,想哪儿了。

忘了哪一年,可能是1967年,六一儿童节正赶上星期日,我们三人起了个早儿,到颐和园门口才七点。清晨的公园空气分外新鲜,我带着他们登万寿山,游昆明湖,照了几张相。兄妹俩有两张单人相片后来放大了:在十七孔桥上,哥哥的那张笑容有点尴尬,是硬逗出来的,妹妹倒是抱紧了斜挎的军用水壶,乐开了花。谁能猜到这是一对享受不到父爱的孩子!

第二天上班,说起头天的活动,同事说我真是好兴致,精气神儿足。我也不知道那几年哪来用不完的劲,过三十的人,又不是多好的身体,不说是身心交瘁也是勉为其难,居然顶下来了。人,大概就靠绷着一股劲儿,松不得,软不得。

闹 钟

1968年初,儿子回家到附近的育民小学上学。

一直到临开学我才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他所在班的孩子春节前就走空了，老师知道我家没人照应，就把他安排在小班，帮着小弟弟、小妹妹系鞋带，叠被子，就这样凑了一个多月。

学校开学了。好在学校离得近，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后也没什么功课，他总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会儿，等我下班。发愁的是晚上不好办，除了星期四、周末、星期日，机关里每晚有活动：开会或者学习。

我跟闹闹规定好：晚上妈妈不在家，不去院儿里玩，要按时睡觉。我特地买了个白色的小闹钟。每天下班后，我匆匆忙忙胡乱做点晚餐，母子俩吃完，替他洗脸洗脚，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壶灌点儿开水（不敢让孩子动热水瓶，怕不小心烫伤，两个孩子直到十来岁，都不习惯喝热开水），然后把闹钟铃拨到八点，要求他闹铃一响，就脱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关灯。”

几天下来，同一单元的邻居直夸闹闹乖，说闹铃一响，他准忙着睡觉。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里灯亮着，人却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没能回家吃饭，也就不可能给他上闹钟。邻居高阿姨两口子是广播学院老师，学校不上课，经常在宿舍，一看六点多了，我还没回家，就让闹闹跟着她家吃了晚饭。

到八点我还没回家，高阿姨提醒说，闹闹，该睡了。

“不，我等妈妈。”

“八点了，到睡觉时间了。”

“不，我妈的闹铃还没响呢？”

“你妈今晚没回来吃饭，没拨闹铃，闹铃不会响，别等了。”

“不，我等。”

就这么大概等到快十点实在睁不开眼了，才在邻居的督促下胡乱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还问呢，妈妈，你昨天怎么没给我上闹铃？

我心痛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后别老等闹铃响，妈妈工作忙回不来就听阿姨的话。”

到秋天，“一号通令”下来，让各家老小尽可能疏散，我想一家三口决不能再分开，再说我也没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邻居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走了；对门，还有中间两个单元里的几户有的请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开会学习。到晚上整个四楼经常只有闹闹一个人。再不用什么闹钟，吃完晚饭，洗完，就让他钻被窝，还一再嘱咐，谁叫门也不开。开始孩子不愿意，说太早睡不着，可想想一个人玩也没意思，也还有几分害怕，最后终于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见都说闹闹又白又胖，其实没别的法宝，就是睡得更多。

白闹钟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按时擦闹钟也就成了他的专

职，很长时间钟的外表显得白净、明亮，可是机芯慢慢衰老了，开始拿到钟表店，加点油，又嘀答嘀答走起来，再后来钟表店师傅说你这钟该淘汰了，加油也白搭。毕竟艰难时期跟我们作过伴，我把闹钟放在五屉柜的玻璃门里，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可家里破旧东西实在太多，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它扔了。那个五屉柜最终也处理了，我还记得柜门上留着的印痕。那会儿浴室两家合用，零七八碎的都放屋里，他们个子矮，五屉柜抽屉圆把手上挂两条小毛巾，天长日久，水渍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渍。

师 傅

我始终相信好人任何时候不会泯灭良知，即使在疯狂年代。

做梦也没想到，工宣队的范师傅毅然决然做出决定，不让我上郊区短期劳动。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是单位里理所当然最需要改造的。1958 年下放劳动、1964 “四清”，还有每年半个月的劳动，我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1968 年秋天，我所在的部门要派一人到郊区劳动半个

碎片 月，支部书记邹大昌通知我去。决定自然不是随便做出的，部门十几个人，年青的单身汉就四五个，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单亲家庭，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清楚：这是有意出难题。以往，我跟这位农民出身的支部书记没有任何龃龉，文革开始从他揭露走资派的大字报中，才揣摸出他的思路：领导没让他当官，就是打击工农干部，可是我这么多年连个小组长也不是，碍他什么事；也许因为我是所谓业务骨干，客观上得罪了他。对了，运动开始作为部门文革领导小组的他整过张赫玲——一位少年参军，后来调干上大学的女党员，只因为她当《阅读与欣赏》节目编辑的时十分尽责，落下的罪名是散布封资修大毒草，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张赫玲成了挨批的重点，我为张打抱不平，当然又得罪了他。第一重“得罪”实非故意，第二重“得罪”，是咎由自取，我怎么又忘乎所以仗义执言了呢，真是“改也难”。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吞下苦果。

我筹划了一下：在机关幼儿园全托的甜甜周末不接，请老安伯伯老两口再辛苦一两次；上学的闹闹怎么办，三顿饭、早晚全靠我一人照应。作为爸爸的他，一个专政对象，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当然也帮不上忙。我对支部书记说：“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门内奶奶家。”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车上学，还得过两条马路，我想，他要是还有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会犹豫的。他不也有儿女吗，他难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哪知，他还是执意叫我去。我有

什么办法,只好给孩子买月票,准备第二天开始“试运转”。

刚来几天的工宣队那位稍胖的范师傅听说这事,果断制止了。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来临,我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以为他们对我这个敌对阶级的子女、妻子不会有好脸色,没想到范师傅不仅长得慈眉善眼,说话也很温和,全然不是想象中横眉冷对的形象。他对我说了一句,让这么小的孩子乘车来回过马路,太不安全,你别去了。

简单一句话,拂去了我心头的愁云。师傅多好啊。

我从学校毕业后,下乡当过农民,但从来没进工厂当过工人,也从没有过师傅,而范师傅,是我惟一的也是毕生难忘的师傅。

我记得进驻电台的工宣队是北京内燃机厂派出的。近年来听说这个大厂很不景气,比我长十几岁的范师傅该早退休了,不知老范师傅生活、身体怎样,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我可是永远记住了他的音容笑貌:穿着一件浅灰布的棉大衣,一口北京话,和颜悦色的,多咱也没听他恶声恶气训人。

姥 姥

也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班上有位工人师傅挡着不时飘来的凄风冷雨,邻居姥姥的爱心又使我一进单元门感到人间

碎片的温情。

姥姥姓高，1969年来京随着女儿女婿住。我们共住两居室的单元房。姥姥来后就住厨房，小夫妻带着孩子住朝阳稍大的屋，我住朝北的小屋。做饭的两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窄窄的过道里。

姥姥是徐州人，勤快，大脚，有把力气。一次我提着二三十斤白薯上四楼，正一步一步往上挪，她见了一把拿去扛上了肩，瞪瞪一气儿到四楼，弄得我惭愧不已。她认字不多，可明白事理，热诚，好学，擅长做面食：擀饺子皮、馄饨皮，蒸馒头包子都是能手。用鏊子烙又香又脆的薄饼，那明快、麻利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烙薄饼不用蜂窝煤炉，走廊里临时用柴禾架起鏊子，右边放着面板，她边擀面，边添柴，掌握火候，烙完一张，用擀面棍轻轻一挑，白白的饼就飞到了另一旁的筐箩里。她看我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双儿女，勉强会焖饭炒菜，什么面食都不会做，想换换口味，只能上食堂买，这太浪费。她教我干这干那。我跟她学会花两毛钱买肉馅包馄饨，秋天大白菜便宜，稍稍放点肉末或油渣蒸大馅包子。连闹闹都学会了擀饺子皮、馄饨皮。高姥姥戴着花镜，跟我学会用缝纫机。

可能是1969年的夏天，一个晚上，天还没全黑，我正在班上开会，忽然天气骤变，一场大冰雹从天而降。办公室有孩子的无不惦念着，尤其是汪玉芝和我。不久前汪爱人所在的地质学院外迁，她跟我一样，一人带着孩子。随着一阵

阵雹子劈啪落地，楼里的玻璃窗被土豆大的冰雹砸得哗啦啦散落到院子里。这么大响动丝毫改变不了会议的进程，真是雷打不动。我们虽然坐立不安揪着心也不敢请假。好不容易熬到散会，一出门就觉得像深秋季节，凉嗖嗖，地面上铺满了没化开的大大小小的冰雹。汪和我匆匆返回宿舍，才进大院儿，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踩着冰茬站那儿，穿得极单薄，脚上是塑料凉鞋。走近一看是汪玉芝的女儿，小姑娘看见亲人委屈得都快哭了：“妈妈，妈妈，我害怕。”顾不得安慰这母女俩，赶紧回去。往常这时候孩子们该睡了，这天他们和邻居的小男孩儿在暖融融的屋里玩得正高兴。闹闹毕竟大些，有条有理地告诉我朝南的大房间有块玻璃碎了，已经用硬板纸挡上，咱家朝北的屋玻璃好好的。下冰雹的时候，高姥姥担心我和妹妹害怕，让我们先别睡，先到大屋呆着。孩子们说：“人多不害怕。”一场冰雹。我的一儿一女安然度过，而汪玉芝的女儿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不记得在这之前还是之后，部门安排人参加“拉练”。当时工宣队已经撤了，仍然是那个支部书记邹大昌说了算。他先后决定派两人去，偏偏是汪与我。如果说我因言行不慎应付出些代价，汪除了出身不好外可从没敢得罪他，可谁让她的父亲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呢，明明是抗日战争中因飞机失事去世，却以讹传讹说成是与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戴笠同一架飞机失事，而这些所谓档案材料又不跟她本人见面。她的困难比我更多，我毕竟有高姥姥可依靠。我知道姥姥挺辛苦，

碎 除了淘气的外孙，又添了个小外孙女，我把食堂饭票、零用钱都交给闹闹，让他带着妹妹到食堂吃饭，按时睡觉，尽可能自力更生。

片 “拉练”回机关那一天我疲惫不堪，想不到还没进机关大门，远远就看见高姥姥领着兄妹俩笑盈盈在路口等我。“怎么知道我今天准回来？”孩子们回答：姥姥打听来的。一泓暖情，不，是亲情，涌上我的心头。

著名的单弦演员马增蕙也是我的患难之交。文革时她们夫妇俩受到不小冲击，政治处境比我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差，但是风暴稍一平静，她们没少帮我。她们也是两个孩子，大女儿谢艺是五十年代生的，比我儿女大些，儿子谢东年岁跟甜甜差不多。闹闹上学后，甜甜还在广播局幼儿园，班车一到，我经常不能准时去，马增蕙骑车，前边一个后边一个，把我女儿一起接到她们家，谢艺先陪着玩。多少年了，孩子们还记得马增蕙阿姨，谢凌霄伯伯，还有谢艺姐姐。当年的小顽皮谢东，从小就是一副好嗓子，他成为歌星也是意料中的。

数不清多少好人关心过我们。广播局共事多年的朋友大都不认为燕祥会是什么敌人，由于种种可以理解的原因，干部不好公然表示同情，而工人倒可以毫不含糊表明自己的态度。

那几年，他不少日子被隔离或挨批斗，但是锅炉房的工人、清洁工、司机经常转告他和孩子的情况。女儿猩红热后疖子长到耳朵眼儿里他知道，儿子上学功课不错他也知道。

我和孩子的一动一静无不在这些好心人的洞察之中。直到现在偶尔在机关见面,他们还惦着他:有的叫他诗人,有的管他叫“干部”,有的仍然称他小邵。

大约是在干校的时候,我在电台收到多年没联系的老同学来信,是位女同学,但笔迹刚劲,全然不像出自女子之手。我很奇怪,这封信被拆过。广播局收发室的同志我大都熟悉,他们从不干这类事,偶尔信件错转到听众来信组被拆,退回时必须注明。想来想去,可能是收发室有人出于对他的关怀,惟恐我有“外心”。时过境迁之后,提起这事,他也这么看,开玩笑说:“他们替我监视你哪!”

孩 子

朋友都知道,我从来不是爱读诗的人。1987年,复旦新闻系比我低一年的女同学孙惠群到我家来,提起1953年欢送我们毕业时,她朗诵的正是燕祥的诗《到远方去》,而我,真的,好像没一点印象。

我很少为诗所感动,大概缺少这方面的艺术细胞。但是,有一次,我却为他的一首不算出色的诗《童年》而动情。

原谅我占一些篇幅,稍稍引用这首诗:

太阳藏在大楼背后，
妈妈还没回来，
冷风刮得小树摇晃，
妈妈还没回来。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电线杆上路灯都亮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
地上的树叶都哗啦啦跑光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鼻子在玻璃窗上贴扁了。
妈妈，你快回来吧，
妹妹的肚子早就咕噜咕噜响了。

…… ……

妈妈，自从爸爸不再回家，
我和妹妹多听你的话；
妈妈，你可别也不回家，
那让我跟妹妹怎么办哪！

妈妈，回家来吧，

我的肚子也饿得慌啦。
妈妈，回家来吧，
我把棉衣给妹妹披上啦。

碎
片

.....

妈妈，妈妈，妹妹老是哭，
不是妹妹不听话；
妈妈，不怪妹妹，不怪她，
我也是又饿又害怕。

.....

其实，我从未告诉他我一个人带领两个孩子时的处境。他大约也是凭想象，猜测哥哥和妹妹盼望妈妈回家的心情。

读着读着，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

想起那些日子，孩子上小学以后，每次我回到那间 12 平米的宿舍，孩子们都亲热的围着我说这说那。而我，有时心情不好，加上工作太忙，只是像机器人一样忙不迭的催他们快吃饭，快洗脸，快做功课。只有快，才能让我按时到班上开会或学习；只有快，才能让军宣队或支部书记找不出岔子（当然，即使你开会再准时，工作再努力，也挡不住他们在别的地方挑你的错）。

碎 等我晚上回到宿舍，他们都已经安睡，第二天一早，还是一个股劲催，快，快，快。

片 有一天晚上，开完会就听说要下达最新指示。那正是战备的年代，邻居奉命疏散回江苏，单元里没人，我急忙回家照看一下。回到宿舍，轻轻叫醒儿子，告诉我我得半夜才能回家，这一折腾，女儿醒了，问我上哪儿，我说去游行。

“那么晚了，妈妈别走，我害怕！”女儿不让我去。一个单元里，只剩他们兄妹俩。

儿子毕竟大两岁，没吭声。

“不怕，妈妈不一会儿就回来。”

我明白自己是说谎，谁知道什么时候能回？

我匆匆走出宿舍。

等游行结束，已经是下半夜了。我轻轻推开房门，兄妹俩睡着了。妹妹紧紧拉着哥哥的手。

第二天一早，闹闹像小大人一样告诉我，妈妈，你走了后妹妹老说，害怕，害怕，我就让她拉着我的手，她就不闹了。

当时我的心即使不是铁石心肠，也已经磨砺得粗糙而麻木了。我只是淡淡的表扬了一下闹闹，又忙着张罗他们加快动作，赶紧上学。

相依为命的日子是悠长而平凡的，一日三餐，上班下班，开会学习。

最让我揪心的是孩子有病。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甜甜直喊难受，试试体温，有点发烧，我把闹闹送到候班车的地点

后，急忙带甜甜去儿童医院。经验丰富的大夫很快诊断出是猩红热，还指给我看她身上的小红点点，嘱咐要隔离，要多吃水果。怎么办？只能送甜甜上幼儿园，是的，这是惟一的选择，那时的气氛怎么可能请一个星期事假在家看孩子呢！到广播局幼儿园，我倾诉了自己的困难，请求老师们帮助，他们一口承担了看护孩子的责任，极为负责的把闹闹也从班里叫出来，因为他跟甜甜接触多，怕已受感染。我给老安的爱人也就是幼儿园的会计留下点钱，请她为孩子买点水果和营养品又匆匆上班去了。第二天，我抽中午时间去了幼儿园，兄妹俩住着两间紧挨的平房，里边住着妹妹，外边住着哥哥。两个孩子跟小朋友完全隔离，相互之间也不直接接触，但是两人可以说说话，倒也不很寂寞。我真是感谢石碑幼儿园的老安和众多的老师想得这么周到，安排得这么好。我也“感谢”两个孩子懂事、听话，直到甜甜的腥红热好利索了才回家。

文革初期的狂风暴雨过去了。他已经上了“五七干校”，机关里漫长的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整党、一打三反，还有战备等等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风浪，我日复一日的等着，等着，等着孩子长大，等着他回来，等着自己一天一天憔悴、衰老。

有一阵，邻居家的姥爷来了，小小的单元里住着老少九口，连过道里也老有人。

一个冬日，我白天参加战备劳动，出了一身汗，晚上回

碎片 | 到宿舍，草草吃完饭就把走廊里做饭的小炉子搬到浴室洗澡。那会儿，宿舍的暖气不热，我们两家洗澡都把烧旺了的炉子搬进去，微微打开浴室的门。大家都默契，谁也不在过道走动。可刚到北京探亲的姥爷不知晓这些，我也就紧紧关上浴室的门。洗到一半，觉得胸闷、呼吸急促，我知道让煤气熏了，想往外跑，可是听到老人仍在过道，只好挣扎着穿衣服，勉强穿上我就冲出浴室往屋里跑，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朦胧感到儿子叫我，妈妈，妈妈怎么了？原来我已经躺在地上，才意识到自己中了煤气，还好脑子没糊涂，赶紧喊，闹闹，开窗！开窗！闹闹开了窗，一股冰冷的北风刮了进来，我这才慢慢爬起来，让闹闹扶着拽着上了床。

多少年过去。随着时光的流逝，孩子们对童年的记忆越来越模糊，我也从没向孩子们复述过当年的情景，是我太理智，太冷漠了，还是往事不堪回首？我不知道。

负 疚

心理学家认为，对孩子期望越高孩子越可能成材。

听到或看到类似的报道，我就有一种负疚之感。

望子成龙是中国人比较普遍的心态，而我们，从孩子一生下两人就有一种共识：别让他们立大志向，太拔尖。一辈

子过平安乃至平庸的日子就好。平安就是福。

过来人会理解我们。他那些年如果不是太拔尖（反右派时的批判还大致围绕所谓“罪行”上纲，当右派后行政级别被降四级，可文革批判时仍有人念念不忘他十九岁定为行政十四级，可见十四级真是害苦了他），也许会幸免于当右派的厄运。而我，也吃亏在于除了日常上班、过日子，太喜欢想这想那，不安分，不驯服，该装糊涂的时候过于“清醒”，该随大流表态转弯子时又太执着。1957年、1958年没当成右派，那是侥幸。我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们陷到罗网里。

我们的一儿一女生于六十年代初，那是物质生活虽然匮乏政治气氛还不那么逼人的年代。我们大约过了两三年平安日子，也没敢忘乎所以想培养孩子成名成家。没多久，文艺界开始小整风，他就陷入越织越密的罗网，直到又一次灭顶之灾。我更加牢记“历史的经验”，千万不要出人头地，千万不要有不切合实际的梦想。

文革前，孩子由婆母照料，我不知怎样感谢善良的婆母给孩子的温暖和教育的，她对任何人都和颜悦色，不功利，对心疼的孙子孙女从不打骂，可孩子真听她的。跟她一样，两个孩子从小就不虚荣，对人真诚、热心。孩子们永远怀念慈祥的奶奶，她去世已十余年，没预先约定，孙儿孙女几乎每年都去八宝山公墓看望她老人家。

那几年，我好像工作忙得头都抬不起来，基本不管孩

片子 子，记得婆母健在又心情好时，半真半假的说我简直像后妈。我笑笑，反正是亲的，只不过顾不上就是了。

文革中，我无言地承担起一切，承受了，不等于能很好地担起。

我很矛盾，鸿鹄之志实现不了固然痛苦，完全让孩子当个随遇而安的庸人又心不甘。

他们的学习，我几乎不用操心，我担心的是他们对渺茫的未来缺少足够的准备，尽管七十年代初就有了工农兵大学生，而在我家，直到1977年，上大学是我们绝对不敢提及的敏感话题。七十年代中期，“走后门”这一名词家喻户晓时，我再三对孩子说，“别人家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后门’，走后门上学，走后门参军，我们家只能靠自己。”是靠自己学习深造，还是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我都没法说，我总不能说自己只为过上平安日子吧！反正我的所谓“教育”是含含糊糊、躲躲闪闪的。

从1966年夏天到1973年底他从干校回京，将近八年时间，我在辛劳、不安、无望又有所期盼的等待中度过。我本是温室长大的任性女子，对他，对孩子，从没耐心，以往我对孩子发火时，婆母或他可以缓冲一下，如今，全靠我一个人。当我情绪比较平稳或理智时，格外心疼孩子，耐心告诫他们学习要认真，做人要诚实。当无法抵御的厄运来临时，在众人面前，我不得不冷静、从容；回到家里，不能也无法跟孩子说清自己的心境，充塞在心头的郁闷、委屈越积越

多，越积越浓，终于有一天，爆发了。

大约是1968年冬天，闹闹刚上一年级，有一天中午放学忘了戴帽子，我坚持让他返回学校取，他说丢不了，下午还要上学。半年前，孩子的父亲被军管小组宣布为专政对象，这无疑相当于最后定案，那一阵我的心绪坏到极点，终于控制不住了。我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不全是跟孩子撒气，是的，那一阵我确实想得很多：谁知道以后会把我们一家发落到哪儿，儿子将来会面临什么样的命运？从现在开始全家就要格外节俭……先是板着脸教训，他很拗，不肯到学校取，两人相持不下，我动了手，他还是不去，气愤之下抽了他一个耳光，他躺在地上嚎啕大哭。邻居高姥姥过来相劝，他终于委委屈屈的回学校取来了帽子。他走以后，我也暗暗哭泣，我是怎么了，难道孩子不去学校找帽子就犯下了弥天大罪，我委屈，心里苦，怎能迁怒于一个才七八岁的孩子。闹闹从小最受爷爷奶奶疼爱，爷爷去世后，奶奶更是爱这个孙子，燕祥也是好脾气，说话从来都是细声软语，只有我偶尔给过他“厉害”，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两年，我只含糊其词地说爸爸不住这儿，奶奶家也不让去，他不多问，更没有为不上奶奶家哭闹过。多懂事的孩子。我委屈，孩子难道不委屈？

事后，我有点后悔，可过于要强的个性又不允许我向年幼的儿子道歉。后来他长大了，“再怎么说明，你不该打我”，我终于为不止一次的粗暴作了检讨。

如今，闹闹、甜甜都已长大成人。他们的童年、少年虽说没吃过苦，但也确实成长在一个没有父爱的家庭，我对孩子又没有足够的温存和耐心。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情商发展终究有不利影响。当然，我一直注意培养他们正直、诚实的好品德。我很自信，他们不会为虚荣所惑，为钱财所害，但是我又很迷茫，过于执着、正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他们大概不会像我们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阶级斗争的罗网，但是他们能逃脱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其他罗网吗？但愿他们能做个无愧于良知又不至于受到太多挫折的知识分子，我也只能这么企盼。

记得八十年代，我读过高红十的一篇散文，说起她们那一代知青在农村足足锻炼了八年还多，她说，有些人因为有了八年（大约是指抗日战争）而受人尊敬，并且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我们最好的八年献给了农村，却连工龄都不算……从1966年初夏到1973年底燕祥从干校回京，是我难忘的八年。作为受冲击的右派家属，我不能说受过多少折磨，我遇见了很多好心人，我所在的部门，甚至没人贴我一张大字报。但是这八年，在我确实是难熬的，朋友们赞许我为工作，更为维护这个家尽了力，我，只有我，心头永远感到不安，歉然，内疚。

我自认为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尽责的编辑，一个多少经历过坎坷的妻子，但我并不是一个好母亲。

1998 年末改定

碎

片

碎

片

邓友梅

邓友梅简历

邓友梅，男，1931年出生于天津。1942年参加抗战，在精兵简政中因年纪过小奉命复员。在天津流浪时，被招工者“强制连行”送到日本作华工。45年春日本工厂被美军炸毁，遣返归国，重新参加新四军，历任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

1950年邓调北京市文联，从事创作同时作“说说唱唱”编辑工作。1953年进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二期学习，1955年毕业后，为深入生活到建筑公司作基层工作。这期间写出小说“在悬崖上”，因此在1957年错划右派。从此停笔二十余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邓得以落实政策，重新执笔。著有“我们的军长”，“说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们”，“烟壶”，“那五”。曾连续五年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

1997年第五次全国作协代表会议，邓当选为是全国作协副主席。

邓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会长，中国鼻烟壶学会顾问。

总是难忘

阿姐志鹃

—

这不是一篇悼念文章，我此时此刻的心情不是悼念两字能形容的。

志鹃去世对我来说不只是走了一个战友，一个亲人，随她而去的是我经历的一个时代。那是个光彩夺目、青春焕发的时代。物质上很艰苦，精神上很多彩，我们在枪林弹雨中夺取明天，相信明天更美好。

半个世纪过去了，中国人的生活有了根本改变，不管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比那个时代好了上百倍上千倍。

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点什么宝贵的东西呢？比如说那种亲密、无私，甚至可以说圣洁的人际关系……

二

我知道阿姐会生气，因为遗体告别那天我哭了，当着一屋人我出声痛哭。她警告过我：“小邓，你记住，你要是再当众哭鼻子，我永远再不理你，我是说话算话的！”

说话时间是1947年一个夏夜，在鲁南突围的路上，在茹志鹃写过的“澄河边上”。

华东野战军文工团一个队正在叶飞将军率领下，摆脱九倍于我的敌人追击与拦截，越过津浦线，越过澄河，向西疾进。

那是华东战场最残酷、最激烈的一年。我们刚在孟良崮消灭敌军七十四师，增援敌军就沿陇海路、胶济线、津浦路从南、北、西三面合围扑来，只在东边留一出口，口外是大海。老蒋先生给“徐州剿总”的命令就是“把陈、粟共军赶进大海！”我们跟蒋先生斗了斗心眼：白天在敌机侦察下红旗招展地摆庆功宴，演戏祝捷；夜幕一落分头转移，悄无声地从敌军夹缝中钻出口袋。南、北、西三面并进，只留下大海一面供蒋先生凭眺。野战军文工团分作几队深入部队。我和志鹃姐到一纵部队演戏庆功。天黑戏散就随部队插往鲁南敌后，先向南疾进，天亮后有敌机侦察时转向东行，来到沂可岸边，接到命令停止前进，埋锅造饭，指战员抓紧时间

休息。大家以为吃饱肚子后要东渡沂河。不料一觉醒来，接到紧急命令做 180 度转弯，沿白天走来的路退回去。越过白天来时的路口，继续往西，往西，往西！越过铁路之后，接到的命令仍是：“一直往西，没有命令不准宿营，不准转向。临时情况各部相机处理，大方向要坚持不变！”

就这样，我们远离了根据地沂蒙山，向豫、皖、苏、鄂一带走了下去。正逢雨季，走山道山洪暴发，走平原遍地成河，最难走时拼搏一夜才移动四公里！脚上的鞋被泥水沤烂山石磨穿只好丢掉，军装淋湿了烤干烤干了淋湿仍贴在身上。多少个日夜没正经开饭没进村宿营，饿了抓一把雨水沤烂的煎饼渣填到嘴里，困了边走边打瞌睡。因为不定什么时候就碰到敌人伏击，我两个脚掌溃烂，背部生起核桃大的脓疮，仍旧咬紧牙关前进，不敢掉队一步。

这天夜里走在一片泥泞的小道上，后边赶来一支炮兵，带着几头驮炮弹的骡马，一会儿插到我们左侧，一会儿蹿到我们右侧，把队伍搅得挺乱。走到一个岔路口，我站住脚想看清前边同志往哪边走，一匹骡子从我身后蹿过来，炮弹箱铁角正撞在我背上疮口，钻心巨痛使我顿失控制，尖叫了一声中带出了哭音。立即招来一阵责备与嘲笑：“嘿，碰一下就大声叫痛，像个丘八吗？”“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你算轻伤还是重伤！”“这动静像个男人吗！”……

我那一点哭音本是在失控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发现后已极力忍住，他们这一说，委屈超过了痛感，也惹起逆反心

理，能忍我也不忍了，索性痛痛快快地放声哭起来。火上浇油，又引出来怒吼声：“要哭到路边哭去，别叫我们陪着丢人好不好！”“这么大了，理智点！”

一片男人声中，冒出个女中音的话声了：“你们公平吗？炮弹箱把他背上的疮都撞破了，怎么不说炮兵反倒说他呀！”她提高声音严厉地喊道：“炮兵同志，骡子撞我们人了，为什么还不来人牵着！”这两句话，把责骂声压了下去。有人跟着说：“可不是，小邓背上血都渗出来了。”炮兵那边本来看着我笑的，这时不笑了，有人默默走过来拉住缰绳，把骡子牵到一边去了。

我想收住泪水却收不住，只是刚才带有苦味这时变得甘甜。我站到路边等说话的女同志上来，轻轻叫了声：“志鹃姐……”还没等我说出感谢话，她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说：“小邓，你记住，要再看见你哭鼻子，我永远不理你。我是说话算数的！”

这话我记住了。此后几十年我几乎没再哭过。1957年定为“右派”，我没哭。“文化大革命”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眼都没眨。甚至母亲去世也只是默默地擦了擦眼泪。这次为志鹃送别，在去殡仪馆的路上我告诫自己：“快七十岁的人，不要失态。”可是一进灵堂就失去了理智。

三

五十多年来，我的小说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的女性形象，就是位大姐型的女兵。

我第一篇小说写于1952年。那年夏天我参加“赴朝慰问团创作组”，住在大连写作。我写了篇小说《咱们都是同志》，写的是朝鲜女兵救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伤员的故事。写好后交给团长田汉同志审阅。田老读完高兴地说：“小小年纪写女人还写得不错么！女兵金大姐形象生动，毫不概念化。八成你心里有个人作蓝本。”

这篇小说处女作发在北京文联的《说说唱唱》上。发表后主编赵树理同志对我说：“看来你能写兵，下个月正逢‘八一’，刊物要发篇纪念性作品，你再写篇好不好？”

我就写出了第二篇小说《成长》，是抗日战争故事，主要人物又有个女兵！老赵同志看了后说：“女兵写得不错，就是认不出她姓甚。别的字你写不清楚，我根据上下文能猜，这姓名没法猜。到底是个啥大姐？”我拿过纸写了个“茹”字。老赵同志看看说：“茹大姐？你咋想出这么个姓来，这叫我上哪儿猜去？”

那时我二十多岁。后来被划入另册停笔二十二年。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政策再给我写作机会时，我已年近半百。第

一部中篇小说就是《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写了一群女兵。我对其带头人、班长周忆严描述是——

“周忆严今年十九岁，但看起来要大些，即使在比她大三两岁的人中间，她也像个大姐。她很少发火儿，至多脸红一阵，话语带点颤音。碰上叫人们狂喜的事，她也不会大笑大喊，多半把两个好看的嘴角弯上去，轻轻地在嗓子里格格两声……”

周忆严班里还有个比她小六岁的小兵，既不懂事又老气横秋外带调皮捣蛋。在艰苦战斗中周忆严以班长的严谨和母爱温暖竟把她调理成了合格的革命战士。

这几篇作品似乎只有最后一篇志鹃看过。这篇小说发表不久，她来北京开会，一见面就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女兵》我看了，写得不好。开头虚张声势，好像周忆严身上要发生多惊心动魄的情况，结果什么大事也没有，毫无精彩之处。”

过了一阵她忽然问我：“我只比你大六岁吗？不止吧。”

我说：“宿迁战役时我十五，你满二十一。”

她说：“我一直觉得比你大得多……”

过了一会儿又说：“你现在大了。《军长》、《那五》都写得蛮好嘛。写那些才显出你的特色来，不要再写什么女兵了。”

大概她没看过我另外几篇女兵的小说，因而提也没提起。

我直到最近才发觉这个女兵形象，在我作品中出现最早而又重复最多。我从没意识到这是志鹃姐的影子。把人物命名为“茹大姐”完全是下意识的。

我庆幸以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没请志鹃看这些作品。看了她肯定不喜欢。我写得不像，连她十分之一的面貌也没描述下来。我写她永远不会赶上安忆。

但是这篇文章我不能不写。不写我的心安不下来。我只能写我心中的茹志鹃，和别人眼中的她未必一模一样。我只想把自己心目中的茹志鹃记录下来，为怀念她的人增加点话题，给研究她的人留下点资料。

四

战争时期，革命军队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密、坦诚、透明、平等。也争吵，也愠气，但说开就完，不搞你死我活的斗争。见不到敌意攻击、恶意诽谤、穿小鞋、放暗箭、脸上赔笑脚下使绊等丑行。我十五六时常受几个大同志数落、气恼、冷落，原因在我。他们无坏心也无恶意，充其量是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孩子的言行，恨铁不成钢。这是我成年后回首往事悟到的。在当时我却是很不服气，很愤慨。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还故意干惹他们生气的事，当然他们也有误解我的时候，我真的在做好事也被看成是逞能干、出

风头。

平心而论，当年同志们对我还是够容忍的。假如今天有这样的孩子在我面前，我也不会喜欢他，我的态度也许要比当年人家对我强烈得多。瞧么，年纪不大，毛病不少，任事不懂，老气横秋，鹰嘴鸭子爪，能吃不能拿！叫他点汽灯烧坏纱罩；叫他敲锣敲断锣锤；唱歌跑调；演戏竟犯“舞台自由主义”。秧歌戏本就以唱为主，派他个主要角色，上台去没唱两句觉得嗓子不好，竟大声向乐队宣布：“别拉了，不唱了，改成快板。”弄得后台乐队无法伴奏，前台演员不会接词儿。团里开会批评这一错误，竟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定语。这叫什么？个人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都欠准确。只好现创造个名词“舞台自由主义”！有时他也不想干点好事，结果把好事干坏。部队住在老乡家，帮群众干活儿是好事。扫院子、打柴禾都行，可他偏要给房东到井上挑水。沂蒙山区挑水用瓦罐，水没挑来罐子打了好几个，只好大家凑钱替他赔！战争环境中人们难免有些暴躁，责骂他几句无可厚非。

却也有人不恼怒，不发火儿，以更深的爱心来感化他。

这样的同志有：马旋，鲁萍……不止一个，总代表就是茹志鹃。

被骡子撞后有一天白天行军，碰到敌机轰炸，她跟我趴在一个坟头后边，敌机俯冲扫射时我们埋下头，敌机扫过后我们就聊天。她好像不经意地问我：“那天你为什么故意放

声哭？”

我说：“疼的，骡子把我背上疮撞破了，我忍不住疼。”

她说：“头一声是没准备，忍不住，可一发现你就忍住了。正好这时有人出来批评你，一听批评你又故意放声哭的，对不？”

我冲她笑笑：“你看出来了！”

“这点鬼把戏还骗我？你跟他们故意赌气，是不是？”

我说：“我忍住疼不再哭，他们还骂我丢人！反正是丢人，那就哭个痛快。”

“我正要替你说话，可你这一哭我没法说了。”

我摇头说：“说也没用，反正我在他们眼里一无是处！”

“不，许多同志还是公平的。丁队长，马旋，顾绛，连小梁背后也说你有优点。”

“我还有优点？”

“从突围以来，你没掉过队。”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事多了，并不是人人都做到呀。还有，在澄河边上，你跟小耿两人在河岸上放哨，前有洪水后有追兵，你毫无惧色，设法联络上胶东民夫，把我们大家都架过河来了，这应当算坚强勇敢吧？给你俩记一功也不算过分吧？”

我暗中得意，但仍用不在乎的口吻说：“嗨，照这么说我还不错呢！”

“你打锣用心时打得很好，汽灯也点得不错，演戏也入

戏，既不忘词也不怵台。你还能编快板，填唱词，按你的年纪这也不容易。”

“可除去你谁也不承认我也有长处。”

“那是因为你尾巴翘得太高，引人反感，其实大家心理也承认你有优点。”

我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就算人家不承认，自己总还得承认吧？首先要自己看重自己！自己把成绩不当事，当着全队一哭鼻子，人们当然就只记着你的眼泪鼻涕，谁还记得你放哨值勤的样子？划得来吗？”

我不再嘻皮笑脸，有点难堪地把头枕在胳膊上了。

她眼睛盯着我继续说：“你的优点，要培养出来并不容易。你的缺点都是些屁事，注意一点就可以克服。叫小缺点掩住了大优点，不上算，好冤枉！”

我已养成条件反射，听到教训从心底反感。可是志鹃教训我，我却没有反感。听别人一说我就浑身发冷；志鹃说我却能从心底生出暖意。嘴上不说，心里把她的劝告接受了。

不久调整序列，男女分别编班。惟独把我从男同志抽出来，编进茹志鹃当班长的女兵班。后来又改回来男女混合，我仍留在她的手下（有人说是羽翼下）度过了解放战争的大半段时光。我一人调进她组时，队长一宣布就有人发出了笑声。队长特意做了解释：“这是茹志鹃同志建议的。她说女同志组确实需要有个男同志帮助做事，大家想想前天夜里

行军的事，那就是个例子……”

连续雨季行军，同志们的大腿都被磨破沤烂，夜行军时男同志都“解放前进”。前晚走到半路要换向导，前边传下口令：“往后传，有穿着裤子的上来一个。”传遍男兵队伍没人应，传到女兵处才有人回话：“请男同志先穿上裤子，我们好上去。”传到一半，有人醒悟似地说：“男同志穿上裤子直接去找向导好了，还用女同志上来干什么。”

队长这样一说，没人做嘲笑状了。会后，丁队长把我叫到一边说：“今天你表现很好，有人笑你也没吵，这就是进步。”我说：“我服从命令。”我没讲茹志鹃已经给我透过信。头一天她对我说：“男女同志要分开编组，可我想把你调到我班里来。”我说：“我愿意。”她说：“你要想好，这班可就一个男同志啊，有人会说笑话的，你不要跟人吵！能做到吗？”我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她才去队部提的建议。

自到她手下我的日子就好过了。没有人对我再说刺话，我也就不再赌气斗嘴。怕给组里添烦，我也少惹是非。在男同志组时，别人都比我年纪大，我干活儿少点心里无愧。一夜行军走得腰酸腿疼，到目的地号房子抱铺草我就偷点懒。如今我是惟一的男子汉，不能女同志干活儿我反赖着不动。有一天我在泥泞中挣扎着打起摆子来，浑身发抖两腿伴蒜。茹志鹃过来要背着我走，遭到我强烈抗议。我赌气离开她跟马旋一块儿去走，虽然是由马旋拖拉着走完全程，但没叫人

总是难忘 背。这样，在小组会上我就受到了表扬。我以前净受批评，一表扬浑身紧张，从此事事小心，不敢放任。我这摆子是隔一日一发，发烧时我决不声张。有一天我参加抱铺草，动作慢了点，并且喘粗气，茹志鹃马上伸手摸我的脸，摸完立刻说：“放下，你在发烧，为什么不说话？”我说：“我能干！”她瞪眼说：“我命令你坐在这里给大家看背包。”我站着不动，她两手按住我的脖子硬把我按在背包上，又打我一拳头，说：“气死人！”扭头就走了。我坐在背包上禁不住眼泪直流。我自小离家，几乎不知道什么是母爱，这一拳打出了我对她的信赖与敬畏。是一种小辈对长辈的依恋之情。

六位女兵带一个男兵，有些预料不到的麻烦。冬天地上铺个长草铺，既不脱衣又要盖被，我睡紧靠墙一头，茹志鹃睡我身边做隔离带，别人全在她的另一侧。夏天不大方便，有时把我寄存在别的班去。茹志鹃向人家声明：“表现不好你们就批评，别留情面。”又要对我嘱咐；“烧洗脚水，打扫卫生，上门板还铺草这些要抢着干啊，不要跟人家犯贫吵嘴……”

我嫌麻烦，就找个磨房、草屋或门洞等处，自己单独住。住草屋点油灯，茹志鹃不放心，就来跟我做伴。她有记日记的习惯，我一人占着一盏灯比跟大家挤在一个灯下方便。她记日记时要抽烟，我就坐在旁边给她卷大炮。

志鹃二十一岁已是成熟的大姐模样，我十五岁个儿又矮人又浑。她写日记我坐在一边替她卷烟，看上去大概挺奇

怪。有天房东大嫂到我们住的地方抱柴烧，笑着问志鹃：“参军还带着你弟？”茹志鹃一本正经的说：“不，还有我哥呢，我们弟兄都在部队。”

大嫂点头说：“这也好，有个照顾。一来我就看出来，他跟你是一家人。”

我没跟她商量，当着房东面叫了声“阿姐”。

她开心地笑了。房东走后她说：“老百姓不理解革命同志关系，说是姐弟她才懂。”

从此我有时就叫她“阿姐”，不久就有人反映给队里了：“这小邓旧意识还挺强，他管茹志鹃叫阿姐，多庸俗多肉麻！世界上是最高尚、最革命的称呼就是‘同志’二字呀！”

队长丁世贤笑笑，未置可否。

我把这反映告诉志鹃姐，她说：“别理他们。”

五

在我小说中反复出现“女兵大姐”是下意识行为。我从未有意写过茹志鹃（《女兵》除外）。很早我就发现自己眼里心里的茹志鹃跟别人看到的茹志鹃不完全一样。

有一次，几个男人背地里对女同志评头论足。有一人说：“茹志鹃最有女人味。”我听了立刻反驳：“不，她没有

总是难忘 女人味，她好就好在最没有女人味。”那人跟我关系不错，就解释说：“我说的女人味没有坏意，你别瞎生气。”我摇摇头不想再和他争论。

我没觉得茹志鹃跟男人有何不同。她当班长发口令跟男班长一样雄壮。她不修饰，不打扮，不婆婆妈妈，不嗲声嗲气。她肩宽腰直昂头挺胸。鼻高口宽浓眉亮目，英俊豪爽。小事不拘小节，大事从容大度，为别人事争得脸红耳赤，却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甚至她的缺点都与男人相似。男文工团员夏天嫌长裤太热，把裤脚剪去签个边作短裤。她也照样，而且连边也不签，腿上挂一圈流苏。女文工团员比男团员勤洗衣服，领子袖口要做个假的当装饰；茹志鹃洗衣周期和随便程度与男同志保持一致，领子袖口也无装饰。别的女同志领了津贴费要买鸡蛋洗发买头绳扎辫；她买纸买墨水或买烟买吃食与大家共享，洗头却用锅底灰滤水。有一天白天行军，女同志的头发都梳得又齐又亮，就是她头发乱糟糟，连耳旁的一缕都没扎一下。男同志们就指手画脚哧哧发笑。休息时我对她说：“把头发梳一梳扎起来，乱死了！”她用手梳了两下，把挎包翻了翻，两手一摊说：“没有毛线了。”我说“我找小梁要去。”她说：“不用去，我有了。”低下头把她的短裤撕开条缝，然后围着大腿撕下一条边来，抬手系在了头上。本来小声笑的人反倒变成大声笑了。我赶紧替她解释：“昨天刚洗过短裤，干净的。”

这是小事，在大事上她更不亚于男子汉。我小时对共产

党员崇敬，都是从熟识同志处受到身教而得来的。除丁峤给我较深的教育外，我最多受益于茹志鹃、马旋、鲁萍几位同组女党员。朝夕相处，谁也作不得假，我看到她们的品质和本色。

鲁南突围路远山遥，同志们结成伴互助前进。茹志鹃看见马旋背起发烧的小梁她也要背着我，遭到我严词拒绝，只好拉着我的手前进。一连几夜没停脚，我困到了极点，一边走着我就睡着了。她把我叫醒说：“打起精神来，你这样比叫我背着还累！”我见她累得那样心中有愧，就甩开她的手说：“你叫我自己走，我就睡不着了。”刚放下我的手，看到一位外单位女同志走不动，她又把人家背起来了！

她关心人并不限于本单位。有天中午吃饭时，我们正坐在路边从粮袋中抠煎饼渣，走过来一个伤员，左手用绑腿吊着，右手拄着棍，站住脚看了我们一阵，叹口气又继续往前走。茹志鹃立刻追了上去问那位伤员：“你是不是想吃点东西？”伤员说：“是啊。可我看你们袋里粮食也不多...”茹志鹃立刻把袋里煎饼渣全倒出来捧给了伤员。这工夫马旋也赶了上去，问了几句话，听说他是挂彩后从敌军包围中冲出来，已和自己部队失去联络，连伤口都没来得及处理，赶忙找出红药水和自己带的绷带，给他上药包扎。此后几天，这伤员一直尾随我们左右走路。休息时茹志鹃和马旋就给他送食物，为他整理绷带，但因没有药物，无法治疗，伤员的胳膊一天天变黑，渐渐委顿，直到一天歪倒在一棵树下再没起

来，我们无力带着他前进，只好低下头从他身边走过，可是茹志鹃和马旋却走到他身边，一个把一包干粮放在他身旁，一个替他拉了拉衣服，擦擦汗水，又把绷带整理好才说了声：“再见。”那伤员用低得听不清的声音一直在说：“不用管我了，好同志，快点走吧。”

越过津浦路后，天气转晴。我们遭到敌机轰炸，被拦在马坡村四个多小时。黄昏后敌机返航我们上路，出了村就是湖边，在没胸深的湖水中又摸索着走了几个小时，我们天亮赶到澄河边上，部队早已过河西去了。连日大雨引起山洪暴发，澄河水陡涨，我们已经无法过河了。这时前有洪水，后有追兵，面对河水中漂荡着人体和马尸，同志们脸上不由得露出惶恐。

丁队长率大家撤到堤岸下小村，先开党员会，后开全队会，说明目前情况的危险性。敌军追兵离我们不到二十里，洪水挡路无法渡河，我们只有当机立断，做最后一次轻装，准备留在这个地区打游击，等我大军反攻回来再返建制。但是我们只有两枝手枪一枝马枪，还有几位女同志小同志，打游击是不容乐观的，因此会游泳的同志尽可以自行过河去追赶主力部队，不必跟大家一起冒险。他只希望会游泳的同志发挥阶级友爱，能带几个女同志和病号过去……

有人就说：“丁队长你患肺结核，要带人过河就先带你。”

丁世贤掏出手枪说：“大家看，我这枪里有三发子弹，

两发是打敌人的，最后一发留给我自己。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没过河，我决不过河。还是带女同志先过。”

茹志鹃和马旋说：“别的女同志先过，我们跟全队战斗在一起牺牲在一起！”

所有会游泳的同志都拒绝过河，最后决定全队同生共死。老丁接受大家意见，下令马上做饭吃饭，派我和小耿立即到河岸上值勤观望，尽量寻找、发现友邻部队共渡澄河。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我俩居然发现一支掉队的胶东民工还没过去，他们把扁担扎成架子，叫我们用手攀着架子，他们游水，硬把我们架过去了。

我们离开部队太远了，过河不久就遭到了青纱帐中还乡团的狙击。丁世贤一边虚张声势高喊：“一排向左，二排向右进行包剿！机枪赶紧架起来……”一边小声催：“快跑，快跑！”马旋拉起我的手就跑。茹志鹃却掏出她的那枝从没响过的小手枪，闪身出队在一旁催促别人前进。我说：“你快走呀。”她说：“我有枪，应当做掩护……”

在战场上她哪有什么女人气呢？

她的大度和宽容更令我永志难忘。

我们突围到鲁西南杀了个回马枪，在沙土集消灭了段霖茂的五十一师。情况好转了，主力部队到黄河北休整，我们却接受又一项艰难的任务：暂时脱离建制，留在“豫皖苏边区”做开辟工作，武装土改。

这个地区情况，茹志鹃在她的《三走严庄》中有过

“客气”的描述——

严庄不算是个新区，这个地区武装力量不够强，还残留了一部分政治土匪，他们勾结地主，经常有活动，甚至半夜抬了铡刀进村找村干部。因此，这地区的土改工作就有点特殊，农民一方面迫切要求土地，一言面又有顾虑，不敢要土地……

我说“客气”，是指她重话轻说了。这里是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交界。我们去的县叫“沈太鹿”，就是沈丘、太和、鹿邑三县交界处，黄泛区苦地方。熟土已被黄水冲光，留下来瓷板样的僵土，寸草不生，连蝗虫也难以存活。历史上以出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军出名，近代则成了土匪老窝。我们去时绝非只有“残留的土匪”抬着铡刀找村干部，而是成股土匪跟我们打游击战。我们平日只靠仅有的二三枝手枪和一支马枪自己保卫自己。男女同志搭配为伍，日夜站岗放哨，所以茹志鹃小说中有“这天晚上轮到我上半夜放哨……”的话。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每人承包一个村，从发动群众起到分田分地止全部任务一包到底，在二十天里完成。

我承包的村距全队驻地三里路，怕遭土匪袭击，太阳出来后进村，太阳偏西就回队。秋末冬初白昼最短，每天做七八个小时工作。二十天要改变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土地制度谈何容易！开始阶段访贫问苦，培养积极分子，讲解“土地法大纲”。茹志鹃抽空来现场为我助阵，这一段也还算顺

利。进入到分浮财、斗地主时就吃力了。有的农民到外村分地主浮财争先恐后，在本村分地主土地时就往后退缩；有的农民背后诉苦声泪俱下，叫他跟地主面对面算剥削账又不肯出头。恰好进入评定成分，自报公议，三榜定案，平分土地时，传来不幸的消息：率领我们来的民运部长带着警卫员去界首集的路上遭土匪伏击壮烈牺牲，被截手断肢，脑袋挂在道边树上！听到这消息农民就打起退堂鼓来。这个说他要给亲戚帮工盖房去，那个说要赶着编点筐子卖钱，连开会都召集不齐人了。积极分子告诉我：土匪给村里传话，谁跟着共产党屁股转，工作队一走他们就回来算帐！我就开会给大家讲大局形势：“我们连国民党的正规军都整军整师的歼灭，这点毛毛土匪能翻天？”我说时群众也就应和着点头。我说完要大家自报人口地亩，准备造册分地了，转眼间人溜走了一半，剩下一半还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心头火气直往上冲。心想：“我们共产党拼命流血解放了这块地方，帮你们打倒地主土地还家，地是分给你们又不是我们带走。怎么倒像我在求你们办事？我讲得口干舌燥，你们连句话也不说？我着急的是，别的同志所包的村都到了划界立标阶段了，我连分配方案还没定下来，相形之下不更显得我鹰嘴鸭子爪了吗？”一气一急逼得我想出个坏点子，要将他们一军，我装作大度地说：“总这么愣着不是办法呀？时间有限，别耽误工夫了，这样，凡是觉得没地也过得去，不想分地的可以退场。谁愿意要地谁留下，留下的人咱们再仔细商量分配办

法。”

这话一说，会场震动了一下，就静得连掉个针也听得见了。全屋人沉默了有四五分钟，忽然那个要给亲戚盖房的人咳了一声站起身来，向我赔了个笑脸，低头出门走了。随后编筐织席的跟着也走了，于是三三两两，接连不断站起来走，没多久一屋人全都走出去了。

剩下三两个积极分子看看我，互相咬咬耳朵，叹了口气，不知说什么好，居然也一声不响地走出了屋子。偌大一间空房子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一下傻眼了。想叫人再把大家召集回来，回来又能怎样？只好回去向茹志鹃如实汇报，承认自己真没本事，叫别人来吧。

我由衷地承认做错了事，垂头丧气做好挨批评被嘲笑准备。

茹志鹃听我说完，先问我：“情况还有谁知道？”

我说：“别人我还没见着呢。”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去跟魏峨商量一下，你在这儿等我，先不要跟别人谈这件事。”

过了一会儿，她背着挎包回来急急地说：“走，我跟你一块回村去。”

刚走出村口，我村两个积极分子迎面而来，对我们说：“我俩正要找你们去，你们来了，太好了。”

他俩说我走后农民又聚在一块儿谈了起来，地谁不想要

呀？就怕新四军一撤走，中央军来了脑袋要搬家。一听邓同志说不要地的可以走，有人想：走也好，要是土匪回来，退出了会场就没责任；要是新四军坐稳天下，该分地走了也会分。这样他们就走了。别人看他们一走，又怕留下的人越少分担责任越大，土匪报复也越狠，不如跟着走出去，因而大家都离开了会场。邓同志走后大家又聚在一块儿谈起来，听说别的村正嚷嚷地不够分，要是听邓同志一说这村人不要地，上边把俺村的地给外村分了，可后悔不及了……

我们赶回村时，会场里早坐满了人，连刚才没参加会的人这时也来了。

宣布开会后，茹志鹃抽着烟跟大家聊天似地谈起来，她的口音有人听不懂，我替她翻译。她说：夏天，刘邓大军从这里开往大别山，敌军想拦，叫咱在羊山集一下消灭了几万人，这是你们亲眼见的吧。刘邓大军走后我们华东部队过来，他们又想追，沙土集一仗我们消灭段霖茂一个整编师，这也是你们看见的吧。蒋介石的美械部队我们说消灭就消灭，几个毛毛土匪我们治不了？朱部长遭他们暗算不证明他们有力量，只说明他们在垂死挣扎。我们工作队就驻秋渠集，他们怎么不敢明着来？因为我们有大军在背后撑腰！耕者有其田是党中央的政策，早晚全国都要实行。如今你们周围村子都要土地还家，还组织起民兵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别的村老少爷们敢分地不是少个心眼儿，是对时局看得清楚，敢跟地主土匪斗争……

她说完大家议论了一会儿，几个积极分子一带头，人们都表示愿意要地了。茹志鹃叫他们马上自报公议，农民们竟早有准备，谁家有几口人，现在有几亩地，按全村地亩数平均还少几亩地，都说得头头是道。个别糊涂的也有，大家替他合计。没费多大时间就拿出个草案来，有了这个基础，改日再仔细平衡就容易多了。

散会时已明月当头。农民们扛着铁锹、镢头为武器，把我们送回队里。队长章焯、丁峤问：“什么事弄到这么晚？正要派人去接你俩呢。”我正要回答，志鹃抢先说：“制订分地方案正在兴头上，大家情绪甚高，我们不好半途休会……”

回到住处只剩我俩时，我对她说：“我真丢人，我愿意写检讨。”

她说：“要写检讨应该我先写，这任务对你过重了，我没及时了解情况，给你帮助，出漏子责任在我。”

我说：“你这么说我更惭愧。”

她说：“接受教训就好，外边工作不同于在团里，要想到自己是代表新四军说话，不能凭情绪干事，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农民正有顾虑呢，你叫不要地的人退出会场，那还不就把你一人晾在那儿了？”

我说：“我先写个检讨给你看看。”

她说：“先忙工作，这件事不必再嚷嚷，写不写听我的话。”

土改结束时我还受了表扬，没有人再提这件事。但我自己并没忘记，为了不叫志鹃姐操心，我做事谨慎些了。而真正体会到她包揽过失对我的重要性，是过了几个月之后。

陈毅司令员发现文工团老一队不知落在何方了。入冬以后他派骑兵到豫、皖、苏各县寻找我们，赶在过年之前叫我们归还了建制，领到棉军装，补充发装备。

不久部队开展了“三查三整”运动。对这次运动的整个情况我无权也无意评说。我只说在我们某些部队里是出现过极左情绪的。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中居然要有“贫雇农小组”参加领导。有的“贫雇农小组”还要把地富家庭出身的同志当革命对象来“分浮财”。指战士们要开会检查“地富思想残余”。那时没有“上纲上线”一词，却有其作风。某女同志恋爱过一两次，非认识到这是“非贫雇农思想腐蚀革命军队”才能过关！

试想一下，在这种政治气氛下，如果有人提出我把贫雇农赶出会场，破坏土地改革，该是个什么后果？幸亏有姐姐袒护（我只能用这两字），没人追究这件事，只要我检查把唱歌改成快板的严重错误。承认“这个错误造成一部分指战员军心涣散，我在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就放我过关了。

数月后上边下了“纠偏”指示，把过左观点全部推翻。从纠偏情形看，我们班是问题最少的。茹志鹃主持整风，尽力宽容大度，避免伤害同志，有人说点过头言论，她会上不

予反驳，会后也不给汇报。官不究民不举，造成误伤最少。

“纠偏”时我问志鹃姐：“我客观上帮助蒋介石那话也应该纠吧！”

她说：“屁，你以为我会拿你那话当回事呀？你帮助蒋介石，还能叫你完成特殊任务吗？”

当时人人检查过关，个个愁容满面，想抽烟又没钱买。茹志鹃见我检查完没事干，开会总打哈欠，就跟大家商量，是不是可以叫我替大家到田里捡碎烟叶去。当地家家种烟，收完烟掉的碎叶随风乱飘，满地都是。大家正没烟抽，全体赞成，于是他们愁眉苦脸做检查，我在外边自由捡烟，回来后就坐在一边给大家卷高射炮。有关领导问茹志鹃：“有的班反映，小邓不开会光捡烟，有这事吗？”茹志鹃说：“有的同志检查的内容，他这年纪听了不好，怕有副作用，我故意把他支出去的。”

其实捡烟也有副作用，有烟没火，他们抽烟还要到灶膛里把烟点燃，我借此机会堂而皇之学会了抽烟。

六

老战友郭卓在《哭志鹃》一文中写道：“越是受气的娃子你越要护着，邓友梅就是一个。你总算把他帮带出来了。”

确实是她帮我走上了读写之路。

我只读过四年小学,没养成读书的习惯。在文工团我担当过“提词”重任。提一次词念一遍剧本,连提几场就背下来了。背多了就能照葫芦画瓢“搞创作”。1946年蒋先生撕毁“双十协定”召开所谓“国民代表大会”,引起解放区军民愤怒。我编了个化妆相声《国大代表》,演出后张拓同志觉得不错,给我在新四军内部刊物《歌与剧》上印了出来,还发给我一斤花生几个柿子作稿费,成为我首次印成铅字的“处女作”。此后我就常写个快板唱词供即兴演出,但既没读书也没想写文章,只想当个好演员。不料十六七岁到了变声期,唱歌高不成低不就,戏里小孩角色本来也不多,我只能点汽灯打锣管小道具,很有点苦闷。这时我到了茹志鹃班里。

不论行军多累,茹志鹃都要写完日记再睡觉。女同志集中住,她点着灯影响别人休息。我一个人住磨道里单独有盏灯,凑到我这儿写正好。嘴上也说:“我写我的你睡你的好了。”她抽烟写日记我没法睡,就坐在一旁给她卷烟,于是她又说:“你少睡点也可以,越睡越懒,利用这时间读点书吧。”便找出本书扔给我。由半强制渐渐变成自愿,终于有一天没书可读我感到手足无措了。茹志鹃总背着书。突围前下令轻装,她把军装被单都扔了,就没扔日记本和书。她总是得到新书再扔旧书。所谓“新书”是指没读过的书,不是新版书。这些书来路不一。有和平时期从上海、济南带进来的,有开战后从敌军手中缴获的,也有打扫战场时捡的。不成系统,五花八门,好在队里对读书也没定什么规矩。革命的、进步的、不革

命的、不进步的全可以看。大家立场倒极坚定，没发现有人受到精神污染！

我读完一本书，茹志鹃会向我提问或跟我讨论。我读完鲁迅的《野草》，她就问：“什么地方给你印象最深？”

我就背书中一段话：“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外一株也是枣树……”

她笑道：“不错，背下来了，明白意思吗？”

我说：“没别的意思，就是有两棵枣树。”

“那为什么不说‘两棵枣树’，而要说‘一棵是枣树，另外一棵也是枣树’？”

这一下把我问傻了，原来只觉得很有趣，没想到为什么。

“这叫强调。”她讲解说，“‘有两棵枣树’这么写给人印象不深。记着，这就叫强调……”

这是我平生第一堂文学课。

《红萝卜须》是一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写的是一个受人歧视的小孩的故事。我看过后她叫我说说感想。我说：“大人对小孩不公正，看来全世界都一样，这书把受歧视的孩子的心理写得很真实。”

茹志鹃说：“可是有地方写过头了！红萝卜须为不被人爱而苦恼这可以理解，可是他看老师喜欢脸色红润的孩子，就抓破自己的脸，把血抹一脸，对老师说‘我也有个红脸蛋！’这就过分了。把小孩子写世故了，不值得同情了。写文章要讲求分寸……”

本来我对这一段还蛮欣赏,她这一说我也跟着改变自己的看法,并且记住了写文章要讲求分寸。

不管我后来又形成了什么观点。但读书除直觉感受还要做理性思考,做技术分析,是从阿姐志鹃处受到的启蒙。

那时候,我觉得茹志鹃讲话句句是真理。她的某些观点,不管对不对我都接受,有的甚至影响我一生,哪怕后来从理性上我已发现不妥,感情已难改变。我读半本《红楼梦》时,她说她不喜欢林黛玉,又娇气又是非,小性子,群众关系极差。倒是薛宝钗说话有分寸,做事顾大体。要说性格坦诚直爽,黛玉也比不上晴雯。解放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正赶上研讨《红楼梦》高潮。认真学习后我当然接受作者曹雪芹对薛、林二人的定位,但感性上仍摆脱不了志鹃给我的影响。我不知志鹃自己是否一直保持她原来的看法。我未见她公开谈过这个题目。

学着写日记,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时我们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词。上前线,下部队,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问她:“你每天记日记,都记些什么呀?是不是下部队收集的材料?”她说:“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事,有些以后创作会用上,不记下来怕忘了,用不上练笔也好。你也应当学着记。”

我说:“天天行军,我没看到什么材料。”

她说:“天天记,你就会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我听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东战役”，我们缴获一些白报纸，她缝了个小本给我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我说：“我不知道要记什么。”她说：“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在她督促下，我终于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在文讲所时我曾把部分日记送给导师张天翼看过，在他指导下又演化成“生活手册”。部分内容也曾在《文艺学习》上发表。因“文学讲习所”被看做跟丁玲有密切关系，“文化大革命”中这笔记本就成了“文艺黑线孝子贤孙”的“罪证”，才知道日记还有帮助定罪的功能。听说“文化大革命”每过七八年要来一次，这毛病还是改了的好，从此把这个“坏习惯”改掉了。不仅不记新的，抄走的日记退还回来也把它都烧掉了。

事情难免挂一漏万，近日翻寻旧物，意外发现一个漏网的旧的小破本子，上边竟残留着几页日记。其中一天记事如下：

八月五日

真是该到我的末日了。一、二团不久要合编，茹志鹃要走了！

我的惟一的亲人，惟一的了解我的人走了，此后我要成为孤儿了。

以后(路)好坏只有自己去走，再没有人扶持你、帮助你、爱护你了……

这些话今天读来我也害臊脸红。哪里像个军人！哪里像个十几岁的男子汉？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在那艰苦的岁月中，志鹃给我的保护与关怀带有极深的母爱性质。以前我们都没意识到也决不会承认，今天我发现对她的依赖感和崇敬心正是一种亲情表现。

日记没有年份，从纸张看是1948年夏我们打开封得到的道林纸。事实上茹志鹃并没有调走。我们一直打过淮海战役，强渡长江，解放上海，进驻南京。建国之后，还是我先离开了华东野战军文工团。

七

残留的1948年日记,使我想起那个战斗频繁、工作多彩的年头。年初我们被骑兵从豫、皖、苏边区打回部队,不久就打响豫东战役,一口气解放了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市。陈、粟首长为防骄傲情绪,命令文工团排演话剧《李闯王》。在本部队演完,又带着此戏去慰问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开始和刘邓大军并肩作战,打洛阳,取开封,战睢杞。济南战役时排演苏联话剧《前线》。济南一解放,陈、粟首长在曲阜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我们为会议演出《前线》。会议一结束我们立即投身淮海战役。

解放战争中,茹志鹃只在这一年上台演过戏,《李闯王》中扮演“长屏公主”。我认为演得蛮好。别的不说,用一口浙江腔的“国语”把不太口语化的台词念下来就很不容易。可显然别人有不同看法,此后排戏就没她的角色了。数年后我从一本书中看到对茹志鹃演戏的评论:“演公主的女演员高举着两只手走上台来,好像缴枪投降……”我才知道为什么再没见她上台演戏。此书作者就是茹志鹃的丈夫,我们的业务教员、导演兼作家王啸平!

演技好坏并不影响茹志鹃的威望。越是革命紧要关头人们越是重视人品。她一身正气,不骄不娇,既没有搔首弄姿、

扭扭捏捏的做派,更没有鼠肚鸡肠、嘴尖舌巧等恶习。她的精力全倾注在写作和工作上。鲁南突围中她一边拉着我行军一边顺口编出个歌词:“跑得凶打得好”,突围成功后得了奖。淮海战役中,她不避艰险,炮声一停就冲到战壕去“收集材料”。拿下徐州,她带郭卓等到铁路上熟悉生活,写出《800列车出动了》,成为前线剧团第一部写工人的剧本。刚从铁路回来,大军奉命南下。过黄桥,下扬州,占六合,渡长江,打守江顽匪,庆江阴起义……一路上茹志鹃赶写宣传材料,做街头宣传,忙得不亦乐乎。但一进上海,就又忙着到刚接收的被服厂去“收集材料”。她告诉我说:“我们要从头学起,到赶快熟悉城市工人的生活,不然就要无用武之地了!”

她成为我前进的坐标。我虽然学不到家,但尽量在做人和作文两方面按她的模式学。本来想做演员,她分析了我的长处与不足,认为还是往写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学习写作。通讯,散文,鼓词,故事,什么都写。写得多了发表的也多些,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刚庆祝完开国大典,就给了我到首都北京接受培养的机会。

初到北京时,我每星期都给志鹃写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了一种笔记本,每一页都有一幅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语录,我拿出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寄给她。她来信夸奖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还想给她买个铜狮子式的图章,但

因为没钱没买成 ,特别记在日记本上 ,以防有钱后忘记。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 ,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 ,尽一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部队时打下点生活底儿 ,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学熏陶 ,在“文学讲习所”又受到较正规的文学教育 ,此后几年我连续发了点作品 ,多少引起注意。茹志鹃非常高兴 ,不断写信夸我赞我 ,甚至说看到我一步步追她 ,超过她 ,她由衷的高兴 ,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高兴 ! 其实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 ,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拿进城头几年说 :1949 年《南京文艺》一创刊就发表了她的剧本《800 列车出动了》 ;1950 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她的小说《保栋梁与金凤》 ;过了两年她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得了军区的二等奖。她就是这期间结的婚。解放战争中她就和王啸平要好 ,所以那时我就认为王啸平是我们团最有修养的艺术家 ,最有风度的学者 ,最出色的男人 ! 进城不久王啸平就出版一本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的书 ,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荐。于是之笑着问 :“作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吧 ?”我说 :“ 按理我应叫他姐夫。”于是之还真在团小组会上向人推荐说 :“ 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 ,是邓友梅的姐夫写的。”啸平和志鹃的感情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当然也闹过矛盾 ,还在他们“ 搞对象”时期 ,有一次茹志鹃生气地说要断绝关系。我很担心 ,又不敢劝阻 ,我一张嘴她就说 :“ 大人的事你不要发言 !”茹志鹃也有最信任的人 ,就是老大姐魏峨 ,我就找魏峨告急 ,要她劝志鹃不要跟啸平告吹。魏

娥听了笑道：“你还挺操心呢，放心好了，他们不会断的。”作品得了奖，跟恋人结了婚，好事连连，刚进城这两年应该说是志鹃最顺当的日子。

以前我总认为茹志鹃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1、1952年她给我的信上，谈家务谈孩子的内容就多了。大女儿安诺满月时，她寄来一张小孩照片和一封长信，照片后边还写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

1955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门到南京看望她。在“马标”他们家里没见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却见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来，志鹃说：“小心她会尿你一身。她叫安忆！”

志鹃虽然很爱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会儿就和啸平两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相约以后每年见一次，没想到从此一别二十多年。

我被划入另册后，看到志鹃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见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尽管我正处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还是厚着脸皮给她写了祝贺信。她回信没多说自己，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更多的是谈我。她责备我不给她写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再给她写信。后来见到丁峤，她说茹志鹃出国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我的下落。有的说在十三陵挖

河,有的说在延庆开荒种地,没人知道准消息。六十年代我摘掉帽子调往东北。郭卓去东北组稿听说我在当地,找到了我,一见面就说茹志鹃一直挂念我,要我给她写信。这时我才知道王啸平也被错划,只因是归侨,没离开上海就是了。不久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九死一生,我终于熬到了邓小平同志出来扭转乾坤!1978年5月,我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上的号码一拨电话,听到个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声音:“喂,你是小邓吗?”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时,我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和该说什么。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鹃》一文中写到那次见面说:“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志鹃要到我家里看看。当我领她走进我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她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不等坐下就打听我的境况。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

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我发现她有些女人气了。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我写的文字:“你坐下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别人看,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小说吧!”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四十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找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说,叫她带回上海。但二十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没写过,已不会写小说,改得不成

总是难忘 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八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不久又写来第二封信——

“小邓弟:你可以慢慢地、精心地修改了,看样子你和王昊这一组纪念陈老总的稿子要放在七月份了,五月要纪念毛主席的讲话,主要发现代题材的东西。另外,我把你给我写的工厂(劳改时所在)名称交给了管政审的同志,可能去函调。我不知这个单位会不会跟你过不去。由此一想,越感到你有个工作需要,非常迫切。原作协秘书长孔罗荪同志可能去北京工作,我请他帮助你。此人十分热情。他认为你需要工作,就是为创作也需要有个工作单位,户口问题也是有了单位才好解决。”

上次我去徐州,是为了我女儿的事,经过努力,她可能调回上海工作。特告。”

这个“女儿”就是安忆。大概没人知道在同一时间里志鹃伸手拉扯起两个作家。

我重新改写了小说,把稿寄给了她。她回信说——

“接到你第一次改的稿子,我苦恼了三天,也动手整理了,但是想想还是不行,接到第二次改的稿子,看后才放下心来——邓弟,从这篇稿子看,你的水平比‘有的人’高得多,高得多,为什么你总要把自己贬得这么低?气人!”

我写信告诉她,我正在构思一篇写女兵的小说,但尚未成型,待有了眉目时再向她报告。

我劳动过的工厂对我不错,很快给调查信回了话:“此人在改造中没有发现新的罪行。”稿子决定七月份发出。茹志鹃寄来清样给我看。她认为我原来起的名字不好,她也起不出好名字来,她请编辑部同志全体动脑筋,一气起了七八个题目,最后从中选定的题目是《我们的军长》!

信上说:

“大作深得我们上下一致的赞扬,我很得意。只是觉得你下面一篇还没写出,你又没有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偷懒如此?该打!我要你放排枪,意思就是一篇连着一篇。为什么不赶一赶?我希望九月号的《人民文学》上见到你的《女兵》。再不能掉队掉下去了。”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刊物止不住

总是难忘 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这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四人帮’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

“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很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辑。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九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在为我文学上的复出绞尽脑汁的同时,她还为我的家庭生活操心。到我家来时,临走对我说:“写作有点头绪后,婚姻问题也要考虑一下,总不能就这样一个人过下去。”

恰好在我改第二遍稿时,婚姻问题也要列上了日程。我在信中向她做了报告。没有明说,只说有个人愿意陪我远离都市,过乡间生活。我如今最高的愿望就是远离城市的嘈乱,平静的乡村中有几间房,种上十几棵果树,自由活动于黄土蓝

天之间,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可能她已听到什么风声,信寄出不久,就来了回信——

小邓弟:

本来我想等我把你的稿子整理完,拿出插图以后再给你写信,现在实在耐不下去了。

小弟,我对你的下半辈子是关心的。现在你在政治上已熬到一个转机,那么我希望你不要把另一只脚陷进生活的烦恼中,几间房、十多棵果树之类的田园诗是符合了你目前的遁世思想,我看了稿子后觉得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又对生活看得较深,总以为你是相当成熟了。但是看来一个人是复杂的,你有成熟的一面,也有极幼稚、极小资的一面。

我多么想有一种防护屏障,把你保护起来,不受侵害,但是我能把你藏到哪儿去呢?

……

以上有些话,我也许将得罪某个人,但是为了保护我的弟弟,也就顾不得了。

经过一番颇费周折的思想斗争,我改变了生活计划。她听说后长吁口气才放下心来,严肃地对我说:“你老老实实,需要一个普通的、忠实的、后勤的、安适的后方。把生活稳定下来,腾出手写作吧,偌大年纪了,谈恋爱也不能占太多时间。”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地默默在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辑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辑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小说。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协领导工作上去了。所以老战友郭卓写的《哭志鹃》文章一开头就说:

不该放松你的笔,
不该宦海去浮沉,
海啊海,那是弄潮儿的圣地,
那是可以没顶的汪洋。

其实,志鹃自己何尝不知道这对她是极大的损失和磨难呢?我曾问过她:“你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

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头。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

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九

写到这里已是第九章 ,事勿十全 ,到九应该收场了。

写这篇文章 ,我心中出现的不只是一个茹志鹃。写这篇文章 ,也不只呈献给茹志鹃 ,有一长串名字和久违了的面容从我心底升起 ,都是关怀过我、培育过我、爱护过我的人。我们曾手拉手从战火硝烟中冲出昨天 ,创造今天 ,也期盼明天。岁月无情 ,光阴似箭 ,我们有幸参加演出的“二十世纪”悲壮喜剧已近尾声 ,虽有次序先后之别 ,作为总体 ,我们已到谢幕退场的时刻了。藉此机会我向已退场和正在退场的同台伙伴 ,向大哥大姐们说一声感谢。我为至今仍未达到志鹃和你们对我的期望而自疚。晚了 ,没有我弥补的时间了。但我们没有理由感伤。就像安忆笔下的世界一定会比妈妈的更辉煌一样 ,接替的一代将会比我们活得更有声有色有滋有味。

文章写完已是 1998 年年底了。为写此文找出的旧日记放在电脑屏幕旁 ,我翻到 50 年前 12 月份的日记 ,想看看那时我们在哪里 ,在做什么 ?

1948年12月××日 淮海前线

上级来了命令,叫我们所有部队紧紧包围住杜、丘、李三个兵团。各部战士们在敌人周围筑起工事,这叫军事包围;在战士们后边是各部文艺工作者,这叫“锣鼓包围”。自从战士进入工事后,我们的工作方式由各村巡回变成地堡访问,我们要用枪炮声和锣鼓声的合奏来迎接新的一年。

正是晚上炮击的时候,我们开始出发,一面在交通壕走路一面背词。一遍词背完正好到一营指挥所。二排与敌人火拼尚未撤下来,我们分散在避弹壕里对词和练唱,战士们蹲到避弹壕里听我们练唱,他们说:“女同志跑到前线上来表演,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打完仗评功的时候,一定给她们立上一功!”

抚卷沉思,恍如昨日,算来已过半个世纪,不由得胸中有沉重之感。我站起身想换一口清新而冰冷的空气。来到窗前,立即被室外景象打乱了思路——

汽车前灯和尾灯组成红白两条光链,朝南北两面无限远处延伸开去,穿着皮衣棉衣的人们像结成队聚成团的甲虫,提着大包小包,穿梭在麦当劳、保龄球场、奥之光连锁店、芭提亚泰国餐厅、三利百货商场的夹缝之间。公司灯光广告,玻璃橱

窗 把夜晚的空间填满 照亮 拼装成一个繁华而忙乱的世界。
快过年了 现在人过年已经完全是另一种过法了。

总
是
难
忘

漫忆汪曾祺

曾祺西归 报刊约我写悼念文章我婉拒了。心中乱糟糟的 几句悼文能表达多少哀思？安定下来后 再冷静记述回忆更好些。曾祺人缘好 朋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各报刊都能见到。并不缺我这一份儿。

汪曾祺和林斤澜是建国后我结识得最早的朋友。说这个没有自吹之意。他二位成仙得道 我望尘莫及 是后来的事。四十七年前还处在大哥二哥相差不多的阶段。曾祺虽已出过小说集 是沈从文先生入室弟子 但这没给他戴上光环 倒还挂点阴影 被认为曾是另一条道上跑的车 斤澜在台湾是地下党员 蹲过国民党军事监狱 九死一生跑回来后只着迷写剧本 写的不少却一部都没上演过（至今也没听说有人上演），相比之下当时处境最顺的倒是我。小八路出身 写工农兵 在“批判武训传”等“战斗”中表现得既“左”又“粗”。文章虽写得平平却被认为“党性较强”。我与曾祺、斤澜感情密切 好心的同志还提醒“交朋友要慎重 不要受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

他俩没嫌我“左”得讨厌,我也没觉得他们“右”得可怕,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我对这二人细品起来还有区别。跟斤澜是北京人艺的同事,又是我把他拉进北京文联。完全平起平坐。我喝他的酒,他抽我的烟,谁也不等对方招呼。只是我喝酒有啥喝啥,不挑不捡。他要烟却目标分明。给次的他不要,指着我的口袋喊:“凤凰,凤凰,你有好烟在兜里揣着呢!”我只好把藏着的好烟拿出来共享。对曾祺我当兄长对待。写文章虚心听他批评,读书诚恳地请他指导,连喝酒都照搬他的喝法。曾祺家住东单三条,文联在霞公府,上下班经过王府井。路边有个小酒铺卖羊尾巴油炒麻豆腐。他下班路上常拐进去“吃一盘麻豆腐”,他约我去,由他付钱,麻豆腐之外每人还要二两酒。他并不劝酒,只是指着麻豆腐对我说:“光吃麻豆腐太腻,要润润喉。”说完就抿口酒。我亦步亦趋,吃一口麻豆腐润一下喉,没多久酒量就上了新台阶!

讣告上说曾祺“终年七十七岁”,可我怎么也不相信,那时他才交“而立之年”。中国人提倡“老要张狂,少要稳当”,汪曾祺算个典型。若只见过他古稀之后的“张狂”相,绝想不出他年轻时稳当样儿!他三十岁时的扮相是,清瘦脸上常带稀疏络腮胡碴,背微驼腰略弯胸脯内含,穿一件蓝春绸面出风滩羊皮长袍,纽绊从未扣齐,脚上是港造上等皮鞋,好久未曾擦油,左手夹着根香烟,右手里端着一杯热茶,说话总是商量的语气,没见他大喊大叫过。有次文联内部开会,某领导人观察了他一会,发言时增加了点新内容。他说:“现在新中国了

么,我们文化干部也讲究点扮相么。要整洁,要充满朝气,别弄得暮气沉沉好不好……”他担当的角色,也没法不暮气。他是老舍、赵树理手下的大管事,在《说说唱唱》编辑部负责日常工作。《说说唱唱》本是“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的机关刊物。专门团结、联系北京城的闲散文人卖稿为生的作者(跟现在的专业作家不是一个意思),如社会言情小说作家张恨水、陈慎言,武侠技击作者还珠楼主,原《红玫瑰画报》主编陶君起,大清国九王多尔衮的王位继承人,专栏作者金寄水,参加这里工作的还有来自解放区的革命艺人王尊三、大学教授吴晓铃,既会演话剧还会写单弦的新文艺工作者杜彭等。各有各的绝活,哪位也不是省油的灯。汪曾祺却应付自如,开展工作结交朋友两不误。这些人之间有时还闹别扭,却没听过谁跟曾祺有过节儿。这就靠了他的“稳当”作风。汪曾祺办事处人,不靠作派,不使技巧,不玩花活,就凭一副真面孔,一个真性情,对谁都谦虚有礼,朴素实在。真谈起问题来,你才发现此人学问有真知卓见,写作有独到之功,使你敬而不生畏,爱而不生烦。

汪曾祺最令我服气并为之不平的,是他为公忘私,个人利益服从工作需要的作风。他是上过旧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曾有过小名气的作家,按理(政治课上学来的革命道理)他得满脑袋个人主义,缺乏革命精神。因此他申请入党时支部曾责成我与他保持联系,进行“帮助”。结果我发现他的政治觉悟比我还强,个人主义不说比我少也要比我隐蔽点。我正在写

作上冲刺,为了保护写作时间,凡对我创作有影响的事我一律推开。汪曾祺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1948年出版,曾引起文坛轰动。轰动声中来到北平,转过年就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50年奉命再回到北京,从此当起了编辑。大家查查他的作品集就明白。从参加革命起到他定为右派止,没有再写过一篇小说。他全部精力都奉献给编辑工作了。那时期《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的原稿上,每一篇都能看到他的劳动痕迹。他从不为自己失去写作时间叫苦,更不肯把编辑工作付出的辛劳外传。有的作者出名多年,仍不知自己出道与汪曾祺有关。

《说说唱唱》设在一幢日本式小楼里。房子里有大壁橱,专放废稿。来稿每天以百件计,可用量不到十分之一,壁橱里废稿如一座小山。想从这里发现可用之稿,也就如深山探宝。新收到的来稿还处理不完,也没谁花功夫钻到那里探宝。可汪曾祺竟沙里淘金般淘出篇名著来,他为什么和怎么去那里开矿的,我已忘记。只记得那篇稿子涂抹很乱,满纸错别字外加自造怪字如天书一般。任何编辑初读此稿,都会望而生畏,读不完三两页就照理扔进退稿堆。可汪曾祺以超常的毅力读完了后,认为思想,艺术都大有新意!是篇不可多得的佳作!花工夫改了些勉强能辨认的错别字,把它呈到了主编赵树理面前。树理看后拍案叫绝,索性亲手又改写了几段,润色了几处,这才拿到《说说唱唱》发表,结果一鸣惊人,中国从此有了篇小说名著“活人塘”,升起颗写作明星陈登科,却不知汪曾

祺于此有功。登科是我老同学,我对他的创作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但对他“欲与仓颉试比高”的雄心壮志却不敢恭维。举例来说,他那原稿中写了好几个“马”字,下边都少四个点(即简化字那一横),前言后语的情节也都跟“马”不相干,汪曾祺面对这字抽了半合烟,最后也没认出来。幸遇高人康濯,猜着念“趴”,理由是“马看不见四条腿,那不是趴下了吗?”为慎重特别去信问陈登科,他回信证明就是念“趴”,并为编辑能认出他创造的字而欣慰!整篇中汪曾祺碰上的这类难题有多少?他从来没跟人谈过。

当然汪曾祺办的事,也不都令人服气。部队里出了个能人祁建华,发明“速成识字法”,为扫盲工作创造极大成绩。汪曾祺要找人写“通讯”(那时还不兴叫“报告文学”)供“说说唱唱”发表。他不便指挥别人,就叫我随他和姚锦一块去采访。我问由谁执笔写?他说采访完再商量。采访完他和姚锦像商量好似地说:“三人你最小,当然由你干,你交个初稿,我们俩修改。”等刊物出版后我一看,文章一字未改不说,却署了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锦直”。我问汪曾祺:“这名谁起的?锦直是什么意思?”汪曾祺说:“姚锦起的,锦直就是姚锦的侄子!”我说:“她这么写你也不改改?”姚锦又抢着说:“他改了,原来我写的是汪锦侄,是汪曾祺、姚锦两人侄子之意。他把汪字删去了……”我这才知道上了个大当。

那时没人认为汪曾祺懂京戏,连他自己也不这样认为。北京文联有人专管戏曲改革。副主席中有一位叫梅兰芳。而

且文化局与文联合署办公,戏改科就在编辑部楼下,那个团要演新戏,都要请他们去指导、审查。文化局和文联的业务干部,差不多都有一个“审查证”,什么时候要看戏,进剧场通行无阻。我们那个办公室楼里几乎人人会唱戏,连通讯员都能扎上大靠上台唱《界牌关》,可就没人听说汪曾祺也懂京剧。

曾祺看戏倒是有水平的,有些见解不是那些里手们所能提出。我和他看《伐子都》,他看完议论:“很有点儿希腊悲剧的韵味!子都人格分裂,被良心自责和内心恐惧折磨得发疯。白日见鬼,好,想象力丰富,编得有深度,演得有魅力,这种大写意的表演法是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优势!”看裘盛戎的姚期,前半部对剧本的编排结构,对裘的唱功作功,他赞不绝口。演到姚期父子绑上法场,他击节叫好说:“真是大手笔,好一出大悲剧。”但演到马五回朝搬兵,砸了金殿,逼着皇上赦免姚氏父子,并带姚刚到前线杀敌立功,他像气球泄了气,连连摇头。全场观众都出口长气露出笑容时,曾祺却遗憾地再三叹口气说:“完了,完了,挺好一出大悲剧,叫这么个轻佻的结尾毁了!”

比起看戏来,曾祺更爱读书。有一阵曾祺读《儒林外史》挺入迷,看稿累了就跟我们聊几句《儒林外史》令他佩服的篇章。他认为最精彩的部分是对范进老丈人的描写。平时他对范进举手就打,张口就骂,范进中举后高兴得发了疯。要靠他打范进嘴巴来治病了,他手举起来却哆嗦得打不下去了!这看起来滑稽可笑,细一思忖却让人心跳。中国人有这种心态

的岂止只有屠夫？

可谁也没想到在这阵闲谈之后，有天他拿来部钉成本的稿件，带点恶作剧的神情对大家说：“闲着没事我写着玩，弄了个这个。你们谁想看看解闷？”看到题目是《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屋里人都嗯了一声，好像说：“就凭你这洋派、沈派、现代派的小说作者，也会写京剧？”

几个朋友先后都看了，得出的意见几乎一致。人人钦佩，没有谁说写得不好。有的说：“寓意深刻，很有文采！”有的说：“遣词用语玲珑剔透！可算得高雅游戏之作。”可也没有一个人说适合上演，在舞台上会红！

这剧本就搁在那儿了。剧本是1952年，或1953年春天写的，那时他和我都还在北京文联工作。此后我进“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他调到“民间文艺研究会”，都离开了北京市文联。

1956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响应伟大领袖“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号召，到建筑公司作了基层干部。有天忽然接到曾祺电话：“喂，范进中举由奚啸伯排出来了，星期天在庆乐彩排，你瞧瞧去好不好？”

老实讲连这剧本的事我都忘了。能看看彩排当然好，不光我去了，还带了公司一位曾在剧团拉过胡琴的朋友和一位宣传部同事，一清早就去了大栅栏。

看彩排的人不多，主要是文化局戏改科同志和文联同事。大多数是内行。

奚啸伯先生是票友出身,颇有文人气质,是梨园界少数几个懂书法会写字的人之一,演范进中举怕是再难找到比他合适的人了。不过奚先生嗓子有个特点,音色好音量较弱。他又是票友出身,虽然身上不错,但纤巧而欠夸张,因此这出戏听起来有味而不叫远,看起来有趣欠火爆。这一来就突出了这剧本适宜读而未必适于演的特点。所以戏看完,朋友们都觉得词雅意深,但未必会得到普通观众接受,但戏改科的同志对此还是十分支持的。他们跟我说:“曾祺头一次写戏,能达到这水平就不错了。他以后要能接着再写,准会越写越好。”

我深知他是一时高兴,不会拿写剧本当正业。

果然,不久就来了个文艺早春。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报刊的架子放下了,面目亲切平和了,文章的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起来,真有点轻松灵活的味道了。汪曾祺没再弄剧本,倒是写起拿手的散文来了。《公共汽车》、《下水道和孩子》在《人民文学》上,在《诗刊》上一篇接一篇发了出来。发一篇招来了一阵掌声。这是他进入新中国后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刊物上发表纯文学作品。也是我们相识后我见他最意气风发,得意而不忘形的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刚进入1957年5月,报纸上就发现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反右派斗争!

汪曾祺这样的人,命里注定是脱不了反右这一关的。尽管他从来不锋芒毕露,也没写冒尖带刺的文章,我和他被请回北京文联参加座谈会,我说了话他没说话,可还是和我一样被

错划成了右派。但当上右派后我俩运气却来了个剪刀差。我一头跌进深坑,再没缓过气来。他却因祸得福,先是碰到个比较讲道理通人情的改造单位,使他在劳动中仍保持了作人的尊严和闲心。碰到1962年与1963年暖流回潮,竟然续写出了《羊舍一宿》等小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他发表的首批小说,接着安排工作时,靠了北京有关单位和热心老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以他写过《范进中举》为理由,把他调进了北京京剧团,当起了专业编剧。当时我在边远的改造地点,获得回京探亲机会,立刻约林斤澜一起找到曾祺为其祝贺。我们避而不谈文学,只讲吃喝。曾祺特意弄了瓶“莲花白”,做了一个冰糖肘子,一个炒鸡蛋,他颇为得意地说:“你们知道吗?以前饭馆招厨师,考他做菜手艺炒鸡蛋。鸡蛋炒得好,别的菜不在话下……”

没想到这一调动还救了他一命。

我恨透了江青和她培植的“样板戏”,但我还得承认“样板戏”救汪曾祺有功。汪曾祺除了是右派,还曾背着历史问题黑锅,所以他在北京文联积极申请入党而难以如愿。幸亏他搞“样板戏”得到旗手赏识,有关方面认真调查其历史,才发现所谓历史问题是个荒唐的笑话,掀去了扣在他头上二十多年的尿盆子。不然就凭这一件,能否挺立过文革十年,很难猜测。

汪曾祺靠“样板戏”保住命,出了名,甚至上了天安门,但始终保持清醒,从没有烧得晕头转向。这时我正被打翻在地,

又踏上了不止一只脚。这时他已搬到城里住了,我回北京探亲,事先没打招呼就去看他,他表示意外的惊喜。谈话中我表示为他的境遇高兴,相信他在顺境中更能把握自己。他说:“我还有这点自知之明,人家只是要用我的文字能力,我也没有过非分之想。知进知退,保住脑袋喝汤吧……”在那种形势下,他头脑不热,神智不昏,因之“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说不清楚的事。既没与人结下仇,也没给人下过绊,顺顺当当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代,当然经过这场大的风波,他感到有点疲劳,尝过一轮大起落对世事有点冷漠。他很想休息一阵。这时就看出朋友的作用了。斤澜知道曾祺的心态,跟我说过多次:“咱们得拉着他一块干,不能叫他消沉!”恰好北京出版社要重印五十年代几个人的旧作,编为一套丛书。王蒙、斤澜、刘绍棠和我都在册,但没有曾祺。林斤澜就建议一定加上汪曾祺。出版社接受了意见,曾祺自己却表示婉拒。理由是解放前的作品有些不愿收,解放后的不够数。斤澜知道后找到他家与其争论,连批评与劝说,要他尽快再赶写出一批小说或散文集,凑够一集出版。他被诤友赤诚感动,这才又拿起笔来写小说和散文,由此激发了汪曾祺写作生涯的第三次浪潮!

写过“样板戏”的汪曾祺在新时期文学界仍然闪光,但他并不因此而美化 and 粉饰臭名昭著的“样板戏”。这很显示他的人格和魄力。当有人怀念、留恋、美化曾使自己受益的“样板戏”,甚至辩解说:“江青跟样板戏并没多大关系”时,汪曾祺却不怕丢人,敢于露丑,现身说法,以自己经历的事实证明

江青是怎样奴役艺术界,使其为“四人帮”反动政治服务的。汪曾祺并不因为自己受益于“样板戏”就颠倒黑白,误人保己。我曾在一个会上说过,就敢于否定样板戏这一点来说,汪曾祺是位英雄!

曾祺和斤澜年纪比我大,学问比我大,成就更比我大。朋友交了几十年,我们在文学上却谈得不多。缺乏主动求教精神,很可能是我无能并无成的原因之一。跟曾祺谈文学尤其少。算起来总共不超过十次。平均五年谈一回。

五十年代中,与我同辈的几位青年作家,如绍棠、谷峪都出了书,我还没一本集子,看着挺眼热,想把自己发表的作品编在一块出本书。可又觉得分量不够。找曾祺要主意,他沉吟片刻说:“出也行,不出也罢。”便不再多说。这话我反复咀嚼,才明白是持否定态度,又找到他说:“接受你的建议,不算出了。”他笑道:“急着出书干什么?要急就急在创作路子上。你现在的题材,观点,文风都不错,跟时兴的路子一致,容易发表也容易被看好,这点你比我强。最大不足是作品中找不到你自己。”

这是我头次听说作品还要找到作家自己。从此自觉不自觉的总想找找自己。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斤澜在北京日报发了篇小文章,谈文艺观点,一千来字。字斟句酌,行文严谨,不少人看了叫好。曾祺却对我说:“你见到斤澜跟他提一声,讲究语言是他的长处,但过分考究难免有些娴巧之虞。这么篇小文章,何苦啊……”我跟斤澜转达了,斤澜听了满服气,

不断笑着点头自语：“娴巧 哈哈 娴巧 哈哈哈哈哈……”

1955年曾祺已调到《民间文学》杂志任编辑部主任。他来说电话：“我记得你到大凉山的时候，收集过彝族民歌。有整理好的吗？”

我说：“有，整理了几首，上百行，一直没拿出去。”

他说：“我给你发了吧，写几句序言一块寄来。越快越好。”

重读那些民歌引起我对大凉山多少回忆，感情冲动之下，序言写得就如脱缰之马，又臭又长。曾祺看后说：“民歌很好，只是您这篇序言怕要动动刀剪吧？个人感慨的部分你另外单写散虽然文好了，就别搁在这儿了。这儿就介绍彝族民歌。”我说：“好。不过要由你来删，我自己有点手软。”他说：“行！”接着又建议把关于一位土司的记述也删掉。他说那位土司既当过“国大代表”，又兼军阀部队的武职，是有出卖自己民族利益的劣绩的。虽然起义了既往不咎，我们写文章大可不必再替他宣传。当时我听了，真觉得曾祺在政治上也比我老练。于是我又为他因历史问题总是不能入党而暗表同情。

《彝族民歌选》不久在《民间文学》上发表出来了。这是彝族民歌首次与全国读者见面，凉山月色泸沽风情令人耳目一新。也许是有意嘉奖，曾祺寄来稿酬超过百元！是我五十年代拿得最多的一次稿费。

他写文章谈论我的作品，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烟壶》

发表后,《文艺报》要发篇评论文章。想找位既熟悉我又熟悉北京的作家,问我找谁好?我说汪曾祺。果然找他一谈他就写了。文章发表后我向他致谢,他说:“先别高兴,我还有话没写上呢。你那个库兵不行,是个多余的人物,这篇小说没他什么事也碍不着,只因为你对这种人物有兴趣就写上了。这不行!破坏了结构的严谨。我只在文章中说你九爷写得好,没提这写得不好的库兵,给你留点面子,当面这意见还得告诉你!”

他对《烟壶》这条意见,我没跟别人说过,不想泄这个底。为了纪念曾祺,今天我公之于众。他完全说对了,我心服口服,不过我不想改。

他对《战友朱彤心》持否定看法。这篇东西是他女儿王朝先看的。王朝看小说很有眼力,开始边看边说:“邓叔叔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写得不错。”可越看越泄气,看到后来把杂志往桌上一扔说:“挺好的开头,结尾砸了,全完了!”听女儿这样说,他才拿来看,他说:“开头真不错,以喜剧手法写人物的悲剧性格,多好,而且已经完成大半,怎么突然弄出个正面结尾?真没劲,真糟蹋材料!”我有点懊悔地说:“原来我是写成此人一事无成的,刊物主编看后说,这样有趣是有趣,但主人公一生只闹笑话,毫无作为,是不是太没意思了?不过改不改随你,这只是我个人看法。我听了这意见后才改成这样……”曾祺说:“不在人家提意见,而怪你自己没主见,没主见说明你对生活理解、判断得还不成熟,怪不得人家。”我说:

总是难忘 “不错,我也确实感到主编意见有道理。”他听了连连摇头:“可惜了,可惜了!挺好素材糟蹋了!还是我这女儿有点眼光!”

汪曾祺近年来被人们称为“美食家”,我很高兴,也为斤澜抱不平。五十年代斤澜的烹调不在曾祺之下,他做的温州菜“敲鱼”在北京文化界独此一家。他家吃菜品种也多样。曾祺桌上经常只有一荤一素。喝酒再外加一盘花生米。

我倒是常看到曾祺做菜。那时他一家三、四口只住一间屋。有个煤球炉子,冬天放屋里,夏天放门外。赶上做饭时间到他家串门,汪曾祺准在围着炉子忙活。五十年代曾祺做菜还不出名,作的品种也不多。除去夏天拌黄瓜,冬天拌白菜,拿手菜常做的就是“煮干丝”和“酱豆腐肉”。前者是扬州作法。但北京的豆腐干与南方香乾有别,不是那个味,汪先生有时就用豆腐丝代替,味道也过得去;后者是他耳闻加独创的吃法,听别人说了自己又揣摩着作的。质量不大稳定。1951年冬天一个星期日,我逛完王府井到东单三条曾祺家喝茶歇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酱豆腐味。炉子封着,炉盖上坐着小砂锅,隔几秒钟小砂锅“朴”地一响。我问他:“大冷的天怎么还封炉子?”他说:“做酱豆腐肉。按说晚上封了火坐上砂锅好,可我怕煤气中毒,改为白天。午饭吃不上了,得晚饭才能炖烂。”我歇够脚告辞,走到院里碰上九王多尔袞的后裔金寄水。闲聊中我说到曾祺怎样炖酱豆腐肉。寄水摇头说:“他没请教我,这道菜怎能在炉子上炖呢?”我问:“哪儿炖?”他

说：“当年在王府井里我见过厨子做这个菜。厨房地下支个铁架子，铁架子底下放盏王八灯。砂锅的锅盖四边要毛头纸糊严，放在铁架上，这菜要二更天开炖，点着王八灯，厨子就睡觉了，灯里油添满，第二天中午时启锅……”他说王八灯是铁铸的油灯，黑色，扁圆型，有五根芯管，看着像王八。

第二天上班，我问曾祺酱豆腐肉味道如何？他没说好坏，只说“还得试”！

后来我在他家吃过两次“酱豆腐肉”。两次味道、颜色都不尽相同，看来整个五十年代都还没定稿。

1957年后我俩各奔东西。斤澜也下乡长期劳动，只在每年春节回到北京探亲时三人相会一次。见面都在曾祺家，一是他年长，本应我们去看他，二来跟他烹调手艺长进也有关系。斤澜厨艺落在他后头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提前退休，斤澜被分配在电影院领座，长期休病假。我俩有了闲空，曾祺却忙得邪乎，打电话总找不着人。有天终于在电话中听到他的声音，就约好时间去看他。他非常高兴，认真作了准备，把这些年练的绝活都亮了一下，嫂夫人和孩子不在家，我们三人冷热荤竟摆满了一桌子。鸡粽、鳗鱼、酿豆腐、涨蛋……虽说不上山珍海味，却也都非平常口味。我在底下改造得太艰苦了，酒又喝多了一点，一时大意把好大一个肘子吃下去四分之三。从此每逢我到他家吃饭，他都预备肘子，而且一定放在我面前。

早年没见过曾祺画画儿，也没听说过他会画。知道他有

画家朋友,如黄永玉弟兄,都是画水彩,刻木刻的洋画派。还有个篆刻家朋友,是嘉兴寺的和尚,一块参加土改结下的交情。我见过他给曾祺刻的印章,也见过大和尚本人。称得上法相庄严,刻艺古朴。但没见过曾祺跟国画家交往。解放初期北京国画家一度生活困难,碰上中央整修天安门,老舍先生特意给中央写信,把城楼上画宫灯、屏风的活儿替国画家们揽下来,实行按件付酬,暗含着“以工代赈”,如此以陈半丁、于非厂(此处读庵)等为首的北京国画家都跟文联常来常往。来时我见到只有两人跟他们应酬。一是美术编辑,一个就是金寄水。没见曾祺参与应酬。我想他的画大概跟烹调一样也自学成材。中国书画同源,他有书法底子,看过芥子园画谱之类的书,又有传统文人气质,练起画来顺理成章,而且还确有独创之处。十几年前,我有天收到个大信封,一看地址是他寄来的。赶紧打开看。里边是一幅画,画的铁干梅花。树干树枝都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是所谓“腊梅”。画中夹着个字条,上边说:“你结婚大喜我没送礼,送别的难免俗,乱涂一画权作为贺礼。画虽不好,用料却奇特。你猜猜这梅花是用什么颜料点的?猜对了,我请吃冰糖肘子……”我跟舞燕猜了两个月硬没猜出来。有天开会见到曾祺。我说:“我们猜到今天也没猜出来。肘子不吃了。告诉我那梅花用的什么颜料吧!”

他冲我呲牙一笑,说:“牙膏!”

我早知道他毛笔字写得不错。当年《说说唱唱》印信封

信纸,刊名和地址用手写作写体,都是汪曾祺起稿。他挺爱干这件事。颜体、欧体、柳体,三种各写一张。楷书,行书各写一行,请全编辑部民主挑选。人们评头论足,叫好的人不少,但没人因此称他书法家。更没人求他的字。不是那时写得不如后来好,而是那年头写好字不稀奇。我们不到一百人的小机关,能写好字的够半打:老舍写魏碑,端木写小篆、王亚军、柳倩写行书,都有两下子。有次政治学习,上边交待讨论时要作详细记录,以备检查。组里选人作记录。主持人端木蕨良问:“选寄水行不行?”大家都说好,一向“逆来顺受”的金寄水却把手举得高高的喊道:“不行不行!”有人问他:“你向来不是宁当记录也不愿发言吗,这回怎么不干了?”他说:“干也行,我有个要求。”端木问:“什么要求?”寄水说:“允许我用毛笔记。别强迫我用钢笔。”端木一笑说:“就这要求呀?批准啦。”寄水松口气说:“这就没说的了。有同志提过意见。说我爱用毛笔不用钢笔是甘于落后,不求进步的表现,其实是我用钢笔跟不上趟……”

我现在手中还保存着寄水自己写的名片,放在书法展览会上决无逊色。但他连书法家协会大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曾祺书法出名,首先是他写得好,其次也得承认他有福气,赶上了好机遇。

人们对曾祺与酒的关系说法颇多,认为连他的飞升也是凭借酒力,怀疑他不久前参加五粮液酒厂的笔会有不利作用。

对此我持否定态度。曾祺嗜酒,但不酗酒。四十余年共饮,没见过他喝醉过。斤澜顶多舌头硬点,从没有失过态。他喜欢边饮边聊,但反对闹酒。如果有人强行敬酒、闹酒,他宁可不喝。我跟他一块参加宴会,总要悄声嘱咐东道主,只把一瓶好酒放在他面前就行,不要敬也不必劝,更不必替他斟酒。大家假装看不见他,他喝得最舒服、最尽兴。

从八十年代起,家人对他喝酒有了限制。他早上出门买菜就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这种喝法非他独创。当年赵树理就是这个喝法。北京文联在霞公府,拐个弯就是王府井,从南口到北口,沿途有两家酒店,到八面槽往西则是山西大酒缸。树理拉我们去吃山西刀削面,从南口开始,见酒店就进,进去多了不要,只打一两,站在柜台前一扬脖喝完,继续前进。这样到大酒缸时已有酒打底,再要二两酒四两削面一盘香椿豆,连饭带菜就算全齐。曾祺继承这个喝法稍有变化。三年前他小病进了医院。我去看他时,他说大夫讲他现在的病没什么,要紧的倒是要马上戒烟停酒。不然后果堪忧。他打算执行。这以后我就有好长时间没见过他。隔了半年多在一个会上再见面把我吓了一跳。只见他脸黑发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变傻了!吃饭时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说:“就这一杯,我不敢多喝。”他三口两口把那杯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我回家后就给斤澜打电话,我说:“老头不喝酒有点变傻了。你最好跟他家里人说说,是否

叫他少量喝一点 ,要不老头就傻了。他儿子王朗还是开通的。只是他那脸色太暗 ,缺乏光彩 ,这怕不是好兆头……”

也许我这话起了极坏的作用 ,此后吃饭他又喝点酒了。绝没有放开量喝。这次去宜宾 ,虽是在酒厂开会 ,备得好酒 ,他也喝得很有控制 ,我的朋友们一边暗地监视 ,并没见他失控过。倒是他应酬太多 ,令人担心。不断有人要他写字画画 ,常常忙到深夜。我曾劝他 :“别太客气。累了就不要写。这么大年纪了 ,不是小孩。”他说 :“没事 ,写累了倒下就睡着 ,倒也好。”

从感情上说 ,我倒觉得他临离开这个世界前 ,兴致极好地喝两杯未必是坏事。若在告别人生之前 ,连回味一下酒趣也没办到 ,反倒大小是个遗憾。

曾祺曾给我和朋友们讲过一件趣事 :京剧团有个老演员参加体检。医生看了他的各项化验后说 :“你的身体不错。可是不能再抽烟喝酒了 ,只要你下决心马上戒烟断酒 ,再活二十年没问题 !”

老演员说 :“不抽烟不喝酒了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

在潜意识里 ,曾祺可能是欣赏这位演员的烟酒观的。

我和斤澜都刚恢复工作 ,《北京文学》一位编辑陪同我们三人去一趟丝绸之路。到了吐鲁番、伊犁、酒泉、敦煌、兰州。因为只靠文化界朋友“友情帮忙” ,没有官方的“公事接待” ,这一路走得很艰苦。有时因为借不到车 ,关在旅馆中几天无所事事。有时车借到了司机大老爷却架子很大 ,拿我们当盲

流对付。从乌鲁木齐去伊犁时,那位司机带的私货太多,把汪曾祺塞在大箱小包的缝中,还对他说:“老头,你给好好看着点!”到了伊犁,《伊犁文艺》一位资深编辑陪我们去察布查尔山中访问哈萨克牡牧去,那编辑批评了司机几句,第二天早晨回伊犁时司机竟把编辑扔在草原上……尽管受了许多气,吃了许多苦,但因作梦也没敢想今生今世还有机会享受这般自由,仍感到幸福天降,乐在其中!特别是曾祺,再艰苦他也没叫过苦,再受气他也不生气。我有时管不住情绪想发脾气,一见曾祺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超然冷静,马上气散火消。从新疆回来之后,我特地把藏了多年的《坛经》找出来从头读了一遍。

我跟曾祺相识近五十年,没见他人前发过火,没听他人后贬过人。几十年里我只听他流露过两次“不以为然”的情绪。一次是对当年把他定为右派的某位领导人,一次是对个别新潮派。他有次与二位文学新星一道外出参加活动,这二位嫌酒店档次低要搬家,嫌介绍时把他们排在后边要退席,说起话来气冲斗牛,一举一动都透着小人得志。有人谈起孙犁同志的文学成就,说他是少数几个真懂得什么是文学的人,他的语言只能体会,不能摹仿的。他们把嘴一撇说道:“可是孙犁也缺乏自知之明之处,对我们这批人也想指手画脚,他写文章惹我们,我们就联合起来轰他,怎么着,他还不是叫我们轰的在读者眼里掉了价?!”

曾祺摇头,跟我小声说:“我不信未来的世界就是这些人

的！他们要掌了权，一点不比‘四人帮’时期日子好过，他们当了政我绝不再干。咱不吃这碗饭啦行不行？”这是见他最激动的一次谈话。

从六十年代初算起，汪曾祺在京剧界干了三十多年，使他对京剧由爱好变成里手。多年在梨园行浸泡，使他性格上起了微妙的变化。以前他也说笑话，但比较文雅而含蓄，从不手舞足蹈。近年开朗了许多，说话增加了梨园界机智、幽默和俏皮。举手抬足摹仿舞台动作还满像样儿。有次他给我学一位武生念定场诗的舞姿。念到“鱼书不至雁无凭”时，作了个舞姿。一手高举，一手托底，抬腿仰头，颇为英武。我叫了声“好！”。他说：“好？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原来他也不知道。他看排戏，排到这儿就问那位角儿，“这手势表示什么？”那武生说：“汪先生你不知道？烟雾瓶！大花瓶呀，这两手是抱着花瓶的姿势啊！”说着他也笑了。并说：“过去京戏是口传心授，演员演了一辈子的戏，不知道台词是什么意思。”他对京剧创作确实也有了感情。新时期以后他继续写过几个剧本，但再没有样板戏那样健的锋头。他很下功夫写的《裘盛戎》，也只演一两场。我怕他伤心，主动拿到香港，在《大成》杂志发表，却在海外引起反响。

经过斤澜一片爱心的动员与劝告，他又拿起小说之笔。刚发表第一篇《大淖记事》，反应不错。第二篇还没寄出，又引出一段趣闻：北京市文联研究创作工作，一位京剧团老朋友

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上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当然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有什么教育意义呢？……”大家听了只是笑，却被有心人记在了心里。此人就是《北京文学》老主编李清泉。会一散他就叫人找曾祺要稿子来看。一边看一边拍案叫绝，看完决定发表。这样推了他的第二篇名作《受戒》。从此一篇接一篇发表个没完，小说比他的样板戏更成气候。

有了《受戒》这件趣闻提醒，朋友们认为他既然以写小说为主，就不必再占剧团的编制，建议把他调到文联当专业作家。领导也表示同意了。没想到他却拒绝。他说跟京剧院有感情。力所能及还愿为京剧服务。这样直到去世，他再也没离开京剧团。

曾祺对剧团有感情，剧团对他也够意思，对他十分照顾。写什么，到哪儿去，从不干涉，能帮忙的还一定帮忙，不过有些事剧团想帮却力不从心。比如住房比较拥挤，剧团就难以解决。曾祺住房本来是太太单位新华社分的。当年孩子小，两室加半间也够住了。多少年过来，不光儿子女儿大了，还有了孙子外孙。老头只能连写带睡都挤在那半间里。好在作协领导和中宣部都很关心此事，新华社也给与支持，经过研究新华社慷慨地答应在八角村新盖的楼里再分一套大房子给他，面积几乎比原房大了近一倍。这消息传来，作家心中都感到很

温暖。

不过直到去世,曾祺也执意不肯搬进那新居。王朗不忍看老爹老妈再挤,把自己分的房子让给了他们,儿子儿媳仍守在拥挤的旧居里。去年春节我陪翟泰丰等领导给曾祺拜年,就去的王朗献出来的这个虎坊桥新家。比原来宽敞多了,但仍然摆设很乱。给他们放下了年礼,说完拜年话,告别时悄悄问他:“老翟多次奔走,好不容易给你弄来一套房子,你怎么不去住?要占王朗的房子?孩子们不容易呀!”

他小声跟我说:“那地离八宝山太近,一看见那边的大烟囱,我就心里格恙……”

我理解他的情绪。我们都老了!

总
是
难
忘

柳 萌

柳萌简历

柳萌,男,1935年10月出生,天津市宁河县人。50年代起从事报刊出版社编辑工作,1954年“反胡风运动”中遭批判受审查,失去到大学读书的机会;1957年又被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内蒙古劳改,一生中最好年华失落在荒唐年代。重新走上编辑岗位后,先后任《乌兰察布日报》文艺编辑,《工人日报》编辑组长,《新观察》杂志编辑组长、副编审,《散文世界》杂志编委,作家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编审,中外文化出版公司总经理、编审,《小说选刊》杂志社社长、编审。在长达几十年的编辑岗位上,主编过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作品,主持过多种文化图书的编辑出版。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写作,出版的主要著作有散文随笔作品集:《生活,这样告诉我》(获首届中国优秀青年读物一等奖)、《心灵的星光》、《岁月忧欢》、《寻找失落的梦》(获第三届中国纪实文学优秀作品奖)、《消融的雪》、《穿裤子的云》、《当代散文作家精品文库——柳萌散文》、《散文名家精品文库——柳萌卷》、《珍藏向往》、《真情依旧》、《生命潮汐》、《半生无宁日》等。

轻舟能载几多忧

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的青春，是生命的绚丽朝霞，纵然没有耀眼光芒，起码也要闪烁清亮光点。然而我的青春时期还未来得及闪光，就被命运的乌云紧紧地遮住了，从此也就开始了艰难的生活之旅。当着我学会从思索中认识人生时，这时青春早已经从我身边消失，横在我眼前的人生道路，犹如一条湍急不驯的大河，任凭怎样努力都扬不起风帆。

“右派”流放生活即将结束的1978年，披着内蒙草原的凛冽风尘，我回到离开20年的北京，到《工人日报》社报到。我此时的欢快心情，绝不亚于初来乍到，兴奋得不知如何是好。昨天夜里火车上不眠的劳顿，完全被兴奋和遐想驱赶殆尽，压抑得近乎板结了的心田，重新又长出了希望的绿色。盘旋在脑海里的那些往事，就像蚕丝似的一缕缕地抽出，缠绕在我尚好的记忆之树上。而这只吐丝的蚕就是北京。

尽管过去在北京工作过，后来因为“右派”问题离开，从此无缘与北京朝夕相伴，但是每年休假回天津老家探亲，

总还要路过一两次在北京换车，这座帝气和民风交融的城市，对于我来说并不是十分陌生。只是这一次来到北京，觉得有种归宿感，因而也就格外激动。走在一些熟悉的大街小巷，看着灰砖青瓦的宅院，闻着芬芳四溢的槐花，听着委婉圆润的京腔，一种难以名状的感情，顿时悄悄地袭上心头，我不禁自言自语起来：“回来啦，真的回来啦”。

这时我已经人到中年。1958年离开北京之前的那几年，我是个人走家搬的小光棍，就像一朵来无牵去无挂的云，飘到哪里都照样悠闲自得。可是时过20年的现在，我已经为人夫为人父，自有一番感慨在心头。我的“右派”帽子说是早摘了，其实政治身份根本没有改变，在一些熟悉我的革命者眼中，我依然是个摘帽的“右派”，在罪恶的“文革”当中，连摘帽子的事实也不承认了，一些人干脆直呼“右派分子”。每当听到这些呼叫，我都是敢怒不敢言，像个做错事的小媳妇，忍气吞声听人家数落。20几年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

可是现在情况大有改变，即使知道我的“右派”身份，就是不当面表示同情，起码不再有过去的鄙夷。不然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在《工人日报》即将复刊时，把我这样一个人借调来工作。这个几乎是从天而降的幸运，竟使我一时忘记了有过的苦难，眼前的惬意，未来的憧憬，如同秋千载着我悠悠地飘荡。

人说，得意忘形；其实，得意也会忘事。此刻的我，既

忘记了眼前的“右派”身份，又忘记了过去挨整时的痛苦，头脑里想的竟是些美好的事情。可见人是多么容易满足。有了一时的安逸和平顺，就觉得上了理想天堂，苦啦罪啦都不再思谋了。这也正是人的可爱与可怜之处。

北京是我青春的港湾，生活之舟本可以从这里启航，驶向广阔美好的未来大海，然而还未容我把风帆扯起来，就被猛烈的政治风暴掀翻了。它让我第一次尝到了政治的苦果，它让我第一次感觉到人情的险恶。当想到这些不愉快的往事，我才从迷惑中清醒过来，重新回到生活的现实中。这时冥冥中仿佛有种声音，在呼唤我赶快去接近它。哦，我知道了，这是那些与过去生活相关的地方，在等待着我去相会，在盼望着我去叙旧，不管它们是给我喜也好忧也好，我都得真诚地去走近去拜访它们。因为那里毕竟有我一段重要的人生经历。

—

在北京东直门里北小街，有条叫羊管的小胡同。据说，羊管是羊肠子的意思。它为什么会叫这个名字，我始终没有弄清楚，在写北京胡同的书中，我也没有找到关于它的来历。反正估计会跟羊有关系。

北京的大小胡同很多，有的因豪门林立而显富贵，有的因院墙高耸而显幽深，有的因附会故事而显神秘，有的因形状别致而显奇特，总之，这些胡同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条羊管胡同却都不在此列，它属于那种极平常的胡同，平常得在地图上都找不到。那么，为什么我会对这条胡同情有独钟呢？主要是这条胡同在我的生活中，有着极不寻常的意义和影响。如果说生活里有喜有忧的话，最初让我同时领教喜忧的，就是这条平常的羊管胡同。

它如同人生这本厚重大书的缩写本，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让我读懂了人生真谛的全部——理想与破灭，恋爱与失恋，得意与落寂，正直与卑鄙，生存与死亡，光明与黑暗，等等。对于这样一个地方，我怎么能够不看重呢？我怎么能够轻易忘记呢？

话还得从头说起。

(A) 1950年朝鲜半岛战争暴发时，我正在天津市立一中读书，家庭经济不算优越，学习成绩不算很好，但是日子过得还算安逸平和。旧社会的艰难和新社会的顺畅，在我这个十几岁孩子的眼里，似乎并没有什么更大的区别。只是从父母的神情上，我隐约地感觉到，他们对新社会抱有希望。由此我猜想自己的前程，同样应该是非常美好的，只要好好地读书学习，将来准会比长辈们强。年龄又正是在花季，天真而单纯，幻想而浪漫，确是少年不知愁滋味。

有天放学乘有轨电车回家，车过西北城角阅报栏时，见

有老老少少的许多人，围着阅报栏指指点点议论什么。每个人表情都很严肃紧张，还不时有人愤怒地嚷嚷，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情。出于孩子的好奇心，我立即就近下了电车，凑过去想看看热闹。到了跟前才知道，原来朝鲜发生了战争，中国决定出兵援助。那时一般人家没有收音机，报纸也不是早晨送到，读报人就下午到街头来看。读报人都是时评家，有的论是议非，有的猜胜测负，阅报栏前成了会场。刚刚摆脱灾难的国人，非常珍惜安定生活，此时又要为战争担心。

没过几天，国家就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动员青年和学生们参军参干，阻挡美军打过鸭绿江进犯我国。我是建国后第一批共青团员，当时在班上担任团干部，又有着一颗真诚的爱国心，觉得自己应该带头参军，就背着家人走进了绿色军营。至于别的什么觉悟根本没有。

在军校开始是跟苏联专家学习，结业后到中央军委某军种后勤部，先后担任工作员、文化教员、编辑，过着不拿枪的军人生活。那时只有大学生参军，部队才给排级干部待遇，我这个高中在校学生，部队也让享受排级待遇，穿着四个口袋的军装，应该说还是比较知足的。尤其是团结、友爱、单纯的氛围，挺适合我这个性情直率的人，很快喜欢上了部队这个环境。起初真想在部队干一辈子，丝毫没有离开军营的念头，就如同刚刚到部队时一样，既没有当大官的打算，更没有当英雄的想法，只是想把工作认真地做好。怀着这样的心态工作，反而给我带来了荣誉，曾多次获奖一次立

三等功，这在平凡的机关工作岗位上，自认为并不那么容易。

我当时所在部队机关单位，就在北京西苑一带，跟北京大学只有百尺之遥。由于当时编辑工作的需要，部队曾派我到北大旁听部分课程，这使我有机会接触这座名牌大学。此时在北大读书的学生中，有的是我少年时的朋友，有的是我中学时的同学，我们也就断不了来来往往，这就让我羡慕起他们来。那会儿的年轻人，有理想，心气高，彼此谈论的事情，大都是对未来的向往。我在部队机关穿军装不摸枪，跟在地方单位没大区别。心想，这些读大学的同学，毕业后都有一技之长，将来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只图眼前的高兴，将来脱下军装什么本领也没有，想得再好还不是瞎白搭，还不如乘着年轻做打算。从此就把到大学读书，当成了自己争取达到的目标。

不过我得真实客观地说，倘若我真的单纯想读书，部队曾给我提供过机会，保送到张家口军事外语专科学校读书，毕业之后回到部队做翻译工作，然而却被我一口回绝了。表面上的理由好像是，一位同事的话刺激了我，他说：“干点什么不好呵，千万可别当翻译官，你未见电影上的日本翻译官，像条狗似的让人家‘牵’着走，那活儿绝不能干。”其实我真正的想法是，要到北京大学读书，而并不是别的学校，只是怕自己考不上，不便如实说出来。到北京大学读书也没理由，就是被一种虚荣心驱使着，认为要上学就上名牌

大学。

在我正式提出退役转业不久，跟我同住室的一位年轻人，终日咳嗽吐痰胸觉郁闷，他自己怀疑会不会是肺结核，我就陪着他去部队医院检查。这位同事检查的结果，只是一般慢性气管炎，并无别的大毛病。他劝我也顺便检查一下，不曾想他怀疑的结核，却在在我的肺部潜伏着。医生建议我马上住院治疗。肺结核在 50 年代算是大病，我一听就立刻像丢了魂，总有好多天在闷闷不乐。首先想的就是报考大学的事，这下可要完全地泡汤了，弄不好还要长期成为病号，那前途就更难说会怎样。我把诊断书交给直接领导，经过有关部门研究同意，送我到部队所属疗养院治疗。

这座部队疗养院位于北京西郊，医疗条件和设施说不上怎样好，地理位置和环境却着实不错，远望是秀丽清幽的玉泉山，近处有条玉泉山下来的河，顺着宽阔的公路款款流过，路两旁是高大擎天的白杨树，有清风徐徐吹来时沙沙作响，给人一种说不出的欢愉感。我们这些慢性病病号，早上医生查过房吃过药，傍晚护士打过针吃过饭，就在这条傍河公路上散步。过去原本不认识的病友，就是在这里散步时结识的，有的住院相处一段时间后，由于说得来还渐渐成了朋友。我在这里住院四个多月时间，说得来并成了朋友的有两位，一位是画家老赵，一位是演员吴军，他们俩在同一个部队文工团。我跟老赵住同一间病房，自然而然就会认识了，并从此形影不离成了朋友。认识吴军则很偶然。

(B) 住院前几天，看过一次部队文工团演出，还未从艺术感染中解脱，我就因病住进了疗养院。这年我 18 岁。正处于青春萌发的幻想时期，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抱负，无时无刻不在诱惑着我。可是现在病了，而且是肺结核，转业考学都已不成，我一下子就蒙了。心绪像乌云笼罩的天空，再没有了往日的晴朗，此时满脑子装着的，都是对疾病的无端恐惧。心想，年纪轻轻的，得了这种病，这下可完了，谁知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

在疗养院里住过几天，情绪才渐渐好起来。

那是一个早晨，我第一次出来，跟男病友散步。我们正在道路上走着，迎面来了几位女病号，穿着同样蓝白相间的病号服，远处很难看清脸面模样。渐渐地走得近了，开始看清了面孔，突然我的眼睛一亮，其中的一位年轻女士，立刻引起我的注意。她，白里透红鸭蛋型脸盘上，闪着乌黑的大眼睛，直鼻梁下镶一张挂笑的嘴，说话间露出一颗虎牙，显得人更俏皮可爱。尽管病号服宽宽大大，很难看出女人的身段轮廓，但是她那时时扭动的身姿，依然让人感觉到她的妩媚。尤其是那垂在背后的长辫，把她的身材衬得更为修长，在同行的几个女人中间，她比谁都更富有勃勃朝气。当然也就更抢眼。

出于一个年轻男人的本能，我看了她好久好久，觉得她很面熟，却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这天早晨就这样地过去了。

跟我住同一病室的画家老赵，知道我比较喜欢文学，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一起聊天儿。共同的爱好使得我们俩，成了病号中要好的朋友。有天我们俩正在餐厅里吃饭，唧唧喳喳进来几个女病号，其中就有那天早晨遇到的那位。老赵比我先进疗养院多日，谅他会知道那位女士的情况，我就问他：“那个梳长辫子的女同志，我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呵，她是哪个单位的？”老赵抬起头看了看，说：“你说她呀，跟我一个单位，在我们团里，主要是跳舞，有时也报幕。”说着，老赵就冲那位女士喊：“吴军，吃完饭过来。”那位女士会意地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不一会儿，吴军端着饭碗过来，坐到我们这张桌子。老赵说：“吴军，我先给你介绍一位病友，是后勤部的，几天前刚入院。”我俩彼此点了点头，就算是认识了，三个人就边吃饭边说话。我说：“吴军，我看你挺面熟，你是不是跳红绸舞的，在前些时的晚会上，我好像看见你跳过。”吴军听我这样说，马上兴奋起来，像任何一位演员一样，总是希望有欣赏者，她那两只大眼睛，蓦然透出光芒。不一会儿却又沉郁起来，说：“对，就是那次晚会之后，团里检查身体，才发现我有病，跟老赵一起住院来了。”我一听这才云开雾散，刚见面时的似曾相识，原来是缘于那次晚会。令我感动令我欣喜的《红绸舞》，还没有完全在记忆中淡漠，其中的一位舞者，此刻就坐在我的身边，这真是天意。

那会儿的疗养院里，供病号玩耍的物品，除了乒乓球、

扑克牌、象棋、跳棋、麻将，再有就是一部交流收音机，放在饭厅或活动室里，供大家听京剧、革命歌曲，长此以往就觉得腻烦了。这些玩耍的东西，除了打打乒乓球，别的我都不会，不玩球的时候，就找些文学书来读。我那时很迷恋普希金，就背诵他的诗歌，一本翻译的《普希金诗选》，总是放在我的床头。一天上午医生查过病房，吴军来我们房间串门儿，她坐在我的床上，跟老赵我们俩个聊天儿。她无意间发现这本诗集，随手翻看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要借去看，这时才知道她也喜欢诗歌。在这百无聊赖的病院里，能够遇到一位志趣相投的病友，我自然非常高兴，立刻便爽快地答应借给她。

这是一个雨后初晴的傍晚，天格外高远蔚蓝，地越发开阔清新，正是户外活动的好时候。吴军急匆匆地跑来，找我和老赵去散步，老赵正收拾东西，我和吴军就先走一步。出了疗养院大门，吴军高兴得蹦蹦跳跳，像一只活泼的燕子，连我都被感染得活跃起来。我赶忙快步跟上她。出了疗养院的大门，刚走到路旁白杨树树下，吴军就兴冲冲地朗诵：“假如生活欺骗了你……”，我一听正是普希金的诗，就说：“嗨，好快呵，都背下来了。”她马上非常得意地说：“怎么样，还可以吧。”“那当然，到底是个大演员。比我们悟性高。”她听后半嗔怪半娇羞地，用手捅了我一下胸脯，说：“去你的吧，竟损我们。”不过依然掩饰不住得意的神情。于是我们俩边走边背诵，你一句我一句交替地念着，着实过

了一把普希金诗歌瘾。

我在疗养院住了四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到了快出院的时候。

那天我做完出院前检查，回来正要洗泡着的衣服，发现连盆带衣服都不见了，同室的老赵告诉我说：“吴军拿走了，她说你忙着办出院，怕没有时间洗。”老赵说着，脸上露出诡秘的笑容，有话想说又不说。这种相互帮助的事情，在部队里很平常，我也就没有往心里去。只是对这位跳红绸舞的演员，怀着非常感激的心情，觉得她很通情达理善解人意，不像军旅中别的女兵们。我想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既然她那么喜欢外国诗歌，干脆就把那本《普希金诗选》，留给她作为疗养生活纪念。

老赵和吴军的病情，可能比我要重一些，他们得继续治疗休养。我出院的那天早晨，许多病友都来送我，有的还留下通讯处。这时却惟独不见吴军，我心里很纳闷儿，但是又不好开口问谁。还是老赵心细，他说：“你要不要跟吴军打个招呼？”他这么一说我反倒不好意思了，就说：“算了，她可能有事，到时你替我说声。”我在几位病友的陪同下，正要走出疗养院大门，忽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以为是护士有什么事情，就赶紧停住脚步。扭头一看，原来是吴军，正连颠带跑地过来，我们就站住等她。她走到我跟前，把一个报纸包递给我，说：“这是我借你的书，还给你。”我正想说：“这本书就送给你了。”却见她说声：“我还有事，不

送你了。”就又连跑带颠地回了病房。这一切，都被老赵看在眼里，他只是嘿嘿地笑，却什么话也不说，别的人完全没有在意。

回到我所在单位整理东西时，打开那个放书的报纸包，发现《普希金诗选》里，夹着一张纸条儿，还有一张红绸舞的剧照。纸条上写着：“你喜欢红绸舞，送你一张剧照，留作纪念。我何时出院会告诉你，届时到（文工）团里或家中来玩。”拿着这张剧照，看着吴军的舞姿，四个月的疗养院生活，又都重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不禁暗自责怪起医生来，怎么不让我再多住几天医院呢，干嘛让我的病好得这么快？

从疗养院出院后没有多久，我所在的部队开始整编，我一看正是个好时候，就再次向领导提出来转业。领导上考虑反正整编得减员，很快就批准了我的转业申请。这时是1954年。

由军人变成了普通百姓，行动就完全自由多了，起码在接触什么人上，没有在部队时的限制。吴军出院后立刻告诉了我，不仅去过文工团，我还去过她们家，两个人渐渐更熟悉了。我知道她是个工人后代，父亲和哥哥都在邮电局工作，她自幼就喜欢跳舞唱歌，那年部队文工团招演员，她被录取也就参了军。经过部队几年的业务训练，成了很不错的舞蹈演员，我看的《红绸舞》就是由她领跳。因为她是地道的北京人，普通话说得不错，有时还让她报幕，在文工团

里算个名角。

我转业地方以后，在中央交通部工作，她曾多次找我玩。后来在“反胡风运动”中，我几次被批判审查，她听说后非常关心，两次到公寓探望，文工团不准外出时，她还打过电话来，此事一直让我很感激。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命运再没有了好转的可能，我就悄悄地离开北京，从此我们再没有联系过。然而，对于吴军的记忆，对于吴军的感激，却并未随时光流逝消失，它成了我情感相册中，一幅鲜亮的青春之照。

(C) 我在部队服役三年，穿着军装时并不觉得怎样，这会儿真的离开了，心里还挺不是滋味儿。尤其是一参加工作就在部队，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庭比较单纯团结，没有任何不适合我的地方。转业到地方是个新的环境，那将会是个怎样的所在，我心里没有一点底儿，想到这些开始不安起来。

那会儿的工作都是由组织分配，很少尊重个人的志趣和要求，正像歌曲中唱的那样：“革命军人是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革命军人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安家”，一个个就像牌桌上的麻将牌，单摆浮搁时只是竹骨一颗，谁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价值。开始想分配我到轻工业部，做部机关的团委工作，后来考虑我跟苏联专家学过统计，在部队干部中算专业人员，就又重新分配我到交通部，在劳动工资司做统计工作。从部队机关到地方机关，只是摘掉了领

章和帽徽，工作性质并没有多少改变，由于无钱买百姓衣服穿，我那身军装好久未脱下。出入在中央机关的大门，一看就是个转业兵干部，领导上有些过意不去，特意为我申请补助金，这才换调这身旧军装。

若干年后跟朋友们聊天儿，说起我的这段职业经历，有的朋友开玩笑说：“当时你要是做团委工作，从那时候步入政坛，说不定会混上个一官半职哩。”这只是一句玩笑戏言罢了，说明朋友们还不很了解我，依我这个人的天生秉性，别说是当不上官了，就是当上个什么官，很可能比1957年跌得更惨哪，因为我实在不会当官的那一套。何况当时年代命运不由己，不是你会不会当官，而是让不让你当官，这才是事情的真正的症结。不过我倒是很庆幸没有从政，如果我只学会当官的单一本领，最多再学点“厚黑学”和听话，恐怕我这辈子也就不会消停。每天都会受着良心谴责，还得虚伪地应付各种人，那样的日子还有什么好过呢？

当时交通部的单身公寓，就在这条羊管胡同里，这条胡同就成了我的家。羊管胡同距北管公园、交道口都不远，早晨和黄昏到公园散步，节假日到交道口看电影，或者到北新桥逛书店，就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日子过得倒也算平和自在。尤其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在羊管胡同单身公寓里，有几位喜欢文艺的翻译、工程师，由于爱好相同使我们成了朋友。只要有时间大家就凑到一起，谈论诗歌、小说、电影、绘画，有时还用留声机放音乐唱片，什么贝多芬，施特劳

斯，柴可夫斯基，莫扎特，等等，这些世界级音乐大师的作品，我就是在这时候知道和接触的，从此也就喜欢上了西洋音乐。

那个时代的工程技术人员，各方面的文化底蕴都很深厚，有的人业余爱好也很广泛。一些嗓音不错的人，兴致来了嗓子痒了，就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西洋歌曲、国粹京戏，经常在小院里回荡。还有的人会拉小提琴、手风琴，就把美妙的琴音献给大家。久而久之也就成了个“沙龙”。到了周末单身汉们就更忙，有女朋友的忙着去赴约，没有女朋友的忙着去跳舞，整个公寓里只留下管理员，看守着这个空荡荡的院落。星期天是睡懒觉的时候，不到十点钟没有人起床，一起床立刻又会热闹起来，喊的，唱的，打闹的，逗乐的，乱哄哄地如同旧时的戏园。然后就是用煤油炉子做饭，仨一群俩一伙地“拼锅”，南北不同的味儿，来往关系的远近，都可能成为这种组合的因素。因此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有的人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根据就是在一起玩乐吃饭。

在我住进羊管胡同的头一个年头，就发生了那场“反胡风运动”，开始是文化界后来又波及全国，到处查找与胡风有牵连的人，好像生怕“胡风集团”的声势不大，凡是能沾上点边儿的人，都没商量地往胡风集团推。我喜欢文学又有沾边儿的朋友，于是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审查，第一次成了“政治运动会”的运动员。其后相隔三年多的时间，又人为地制造了“反右派运动”，我又没有逃脱挨整的命运。

这两个毁我青春生命的运动，都发生在我居住羊管胡同的时候，这样，这条弯弯曲曲的羊管胡同，正好预示着我此后的前途，同样也是漫长、曲折而坎坷的。

在这条羊管胡同里，我只居住了三年多，它给与我的欢乐是那么短暂，可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光彩，却从这里开始暗淡了22年。22年后从外地回到北京，多少次想走近它又怕走近它。在这样矛盾心情的折磨下，度过了许多年以后的一天，开会到交道口的东城区文化馆，距羊管胡同不过几百米远，实在忍不住这冥冥中的诱惑，我终于忐忑不安地走进羊管胡同。在记忆中的方位找了好久，还向几位居民打听，可是胡同没有了当年模样，那个25号院早不复存在。时光的流水冲垮了往日景物，却没有洗刷掉我记忆的忧欢。此刻回首往事，对于羊管胡同，我真不知怎么好，欲说无言，欲哭无泪，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

二

交通部当年的办公地点在交道口。这是一座古典式的大屋顶建筑，在50年代楼房稀少的北京，这栋楼在交道口一带非常扎眼。现在这栋楼划归航天公司所有，它的样子和风彩依然不减当年，只是显得有些老迈陈旧了。而对于我来说

它却永远年轻。

“右派”问题改正以后，我又重新定居在北京。

开始工作的《工人日报》，就在东城区的六铺炕，后来任职的中国作家协会，就在东城区的沙滩，跟当年交通部所在地交道口，都不过是咫尺之遥。我经常有机会路过交道口，每次走过那座大屋顶建筑，心中的百味便会翻腾。晚上走过看见闪烁的灯光，我会想起当年欢乐的舞会；白天走过看见紧闭的门窗，我会想起当年挨批判的情景，这座青砖绿瓦的庙式大楼，如同人生海洋中的礁峰；我这叶小舟刚与它相遇，就被撞得粉身碎骨。

时光相隔 22 年之后，我再一次走过这座大楼，情不自禁地在楼前驻足，倘若没有门卫在那里把守，我想我一定会进去看看。可是现在我只能隔门相望。记忆中那原本敞亮的门洞，此时成了一张漆黑的大口，狠狠地吞食了我的青春，好像想把我这仅存的躯体，再一次地吞咽下去，于是我赶紧掉头仓皇而逃，生怕再让它抓住毁灭我。走出老远忽然想到，这毕竟不是那个年月了，还有什么可怕可畏的呢？

(A) 我在交通部任职的几年里，由于对机关工作没兴趣，当然也就无心踏实干，平时想的更多就是写作。希望借此创造条件，以便将来吃文字饭，所以那时下了班就回宿舍，躲在小屋里偷偷写诗。一个朦朦胧胧的作家梦，这时就在我的心中形成，为了这个梦的早日实现，几乎到了废寝忘食地步。那会儿的单身公寓里，设备都很简陋陈旧，冬天是

炉火取暖，夏天是蒲扇纳凉，我写作的兴头一上来，常常忘记加煤摇扇，却毫不觉其中的辛苦。写作带来的欢乐，在我当时的感觉上，并是拿稿费下小馆时，而是印成铅字在报刊发表，苦恼自然也是出在这上面，每次见到稿件退回来，我的心顿时如同掉进冰窟，浑身上下都是冷嗖嗖的，许多天情绪都转不过来。便乘这时候去逛大街看电影，直到情绪恢复了平静，再重新趴在桌子上继续写。文学梦就这样折磨着我。

有次《文艺学习》杂志召开会议，参加的人都是各界业余作者，因为都是年轻人又爱好相同，在半天的会议上很快就熟悉了。这其中有两位还成了我的朋友，一位是诗人山青，一位是个女大学生，我们的交往直到“反胡风运动”，才在政治压力下不得不中断下来。并且从那时开始以后若干年，我们三个人都在逆境中挣扎，后来我又在反“右”时出了事，当然也就比他们遭受的罪多时间长。可能是因为我跟那位女大学的友谊，匆匆地从美好开始由苦难结束的缘故，对于这段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我一直认认真真地珍藏在我心中。

从部队转业下来到了交通部，枯燥的机关工实在让我厌烦，就希望到大学读书或者当编辑。可是我的性格又不像有的人那样，善于把自己的真实思想伪装起来，或者采取委婉的方式表达，而是毫无遮拦地统统地暴露在外，这在50年代那种“听话”的环境里，就必然会被人视为异端。譬如，

我把份内工作一般的完成之后，就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习写作，这在一些人的眼里就不得了啦，不时会有些领导或同事找我，名义上说是帮助我进步，实际是批判所谓的名利思想，好像非得把我改造得“听话”不可。其结果是，无论是他们还是我，似乎谁也未能说服谁，就这样死硬地僵持着。我这个当时的共青团员，在一些人看来显然是不合格的，甚至是非常落后的，可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改变我，只好任凭我自己走下去。

我知道人生的道路不能假设，不过有时我还是这样设想：如果不是如此迷恋文学写作，老实地囿于别人划定的生存空间，我后来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想，美丽的文学梦自然不会实现；那么，政治命运的惨烈打击就能避免吗？恐怕也很难说。这么一想我也就不后悔了，因为我毕竟为理想奋斗过，而且寻找到了自我发展的空间，尽管付出的代价是如此地昂贵。这不怨我，是时代造成的。

(B) 我年轻时有个习惯，在睡觉前要看书；为了翻阅的方便，书都堆放在床头。这些书中，有的是经常想看的，如《唐诗三百首》《唐宋名家诗词》等，有的则是刚买来的新书。一个光棍汉的床，别说是堆着书了，连脏衣服都堆放，没有一点遮拦。来我屋里串门的人，坐在床上随手翻书，这是很正常的事，我从来也不介意。何况这种习性并非我一人有，许多单身汉都是这么邋遢。

距“反胡风运动”开始前不久，我去逛王府井新华书

店，碰巧诗人鲁藜的诗集《云之歌》上市，我就顺便买了一本回来。放在枕头旁还未顾上看。一天，一位同公寓的人来串门儿，他顺手拿着这本诗集看，我以为他对诗有兴趣，就主动地给他介绍说：“这位诗人是天津的，挺有名气，我上中学时，就读他的诗。”不曾想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他记住了，在“反胡风运动”中，他检举了我，竟成为我的“罪证”，非让我交代跟鲁藜的关系。

那是“反胡风运动”刚刚开始，报纸上公布了那个“编者按”（后来知道，这个《文艺报》发的编者按，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在当时起着导向作用），以及胡风与友人间的通信。信中几处提到鲁藜的名字，告密的人想起了这本诗集，就在学习时跟领导汇报了。此人是别的司局的干部，跟我本不在同一个司，劳动工资司想整我的人，正愁没籍口不便下手，一见转来的材料是我的，政治神经立刻兴奋起来，马上派人来找我谈话，问我为什么要买这本《云之歌》。我觉得这算不得什么问题，就如实地告诉他们：“鲁藜是我喜欢的诗人，中学时就读他的诗，见有他的诗集出版，我就买了。”完全出于负责的态度，我用平静的口吻，向她说明真实情况。

来人是位年轻的女将，团支部书记，平时她给我的印象，是个有风度的女孩子，尤其是她那张圆润的脸，白净，清朗，让人觉得她心地的善良。即使说话很政治化，只要看一看她的脸，你都不会十分在意，仍然觉得她的可爱。可是

此时她的脸，好像被颜色染了，同时被钢针扎了，变得横七竖八又暗淡，立刻让我想起庙里金刚。我的话音刚落，她就尖利地高声说：“你这是为胡风集团喊冤，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正经的好人，那中央干嘛还要搞运动。你必须如实说清与他们的关系。”政治运动可以让人变脸，这我早就知道，可以让女孩子变丑，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我还感觉到，更可以让一些人变态，以至于失去人性和人味儿。

对于这种牵强的说法，我当然不会服气，就不客气地质问她：“是这本书先出版的，还是运动先搞的，如果知道这些人是坏人，别说我不会买这本书，恐怕出版社也不会出。”她一看我不服软，再说也没有结果，扔下一句：“这样对你没有好处”，就气冲冲地走出办公室。这第一次对我试探性的交锋，在我们俩个人之间就这样结束，彼此好像都明白无误地表示：一个要整人，一个不服气。这样一来更激怒了一些人，紧接着就是让我交代朋友关系，深挖自己不安心工作的思想。尽管我那会儿算不得是个听话的人，个性也比较有棱角的，但是思想上仍然没有摆脱愚忠，觉得自己未做亏心事就不怕什么，就把平时跟我来往的人，向组织一一老实地作了交代。我觉得我的朋友们，都是非常正直正派的人，说出来也没有什么，再说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应该坦诚地让组织了解自己。

(C)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天津的文化生活非常

活跃，特别是在各大中学校里，学生中都有文艺社团，如歌咏团、话剧团、新闻社、文学社等。每到暑期团市委都要组织活动，如歌咏比赛、体育运动会、各种知识讲座等，很能陶冶学生的思想感情。我当时就读的天津市立一中，是个比较重视文体活动的学校，后来出了不少的文艺名人，像歌唱家李光羲，话剧演员金乃千、郑邦玉，运动员白金申、穆祥豪、穆样雄、王志良，他们都是天津一中的校友。我那会儿喜欢文学，就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文学社的成员都是文学爱好者，负责人是高年级的翟胜健（原北京大学分校副校长），只要市里有讲座活动，翟胜健就领着我们去听。像天津的作家孙犁、方纪、阿垅、鲁藜、肖也牧、何苦、王琳，像北京的作家周立波、赵树理，当时都给我们讲过课。

一个正做着文学梦的少年人，对著名作家有点崇拜，这本来是件很平常的事情，何况又没有过直接交往。可是，当我把这些情况如实说了，整我的人一听更来了劲儿，偏偏从这几位讲课的作家中，选中鲁藜、阿垅、王琳三位，让我交代同他们的关系。人家连认都不认得我，我只是听过几次课，又有什么“关系”好交代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这便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我被审查的最初原因。

随着“反胡风运动”的不断深入，我的两位朋友也被审查，一位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孔庆珊（山青），一位是唐山林西学校的侯红鹅（林希）。他们的情况转到我所在单位后，我的“问题”也就开始升温，整我的人误以为有鱼

可捞。暗地里加紧了对我的审查，而我自己却仍然一无所知，当时我正跟交通部几位青年干部吴重阳（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一起加紧备课报考北大中文系，光顾忙着复习功课，根本不会想这些运动中的事。再说我觉得自己已经说清楚了，就再没有必要理会这件事。直到组织上找我谈话，提出林希和山青的“问题”，这才意识到对我的审查并未了结。

但是凭着我对这两位朋友的了解，以及我当时只考虑上大学，对于这种整人的做法，实在不满意，说话时自然不会冷静。我说：“从天津到北京，能证明我的人，都超不过30岁，一个也死不了，你们调查去好了。”这下更惹恼了某些人，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只有他们胡乱整人的资格，没有挨整者说真话的份儿，据此便说我对抗组织审查。这样就给自己埋下了苦难的种子。

林希是我天津一中的同学，跟另一位叫谢文良的同学，其实并不在同一个班里，由于我们都比较喜欢文学，都是天津一中文学社成员，在学校时也就来往多些。后来我参加了军干校，林希到了唐山开滦煤矿，谢文良到了《天津工人报》社，我们仍然不时有书信来往。我要报考北大中文系时，记得那年林希也要报考大学，他给我来信说，想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林希在年轻时就显露出文学才华，不然他也不会被阿垅等前辈看重，所以在“反胡风运动”时被定为“胡风份子”。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比较了解

他的，他绝不是当时说的那种政治恶人，因此，《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侯红鹅被拖进了反革命的泥坑》的文章后，单位的领导拿报纸给我看时，我才说了一些同情侯红鹅（林希）的话。

山青（孔庆珊）是在《文艺学习》开会时认识的，由于有共同的文学爱好，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他是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生，是文学评论家李希凡、蓝翎的同学，当时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当教师。他写的歌颂宪法的诗《赞歌》，受到了老作家丁玲的好评，丁玲在人代会上发言时，曾引用过山青这首诗。“反胡风运动”开始以后不久，山青因系山东大学教授吕荧先生弟子，在审查吕荧先生时他也受到株连。过了不久整山青的材料也到了我们单位，我同样凭着对山青几年交往的印象，说了些实实在在的公道话，结果反而认为我是同情他。

我跟上边俩位朋友的关系，大概就是整我的又一个根据。另一个整我的理由是，我终日思谋着写作不安心工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这在当时这顶大帽子是相当吓人的，就是不把你压死也压得难以喘气。可是总不好跟胡风小集团挂钩呵，挂不上钩就整得不理直气壮。这时就有人出来揭发说，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寻春》，表现幼儿园的孩子们，有着春天般的天真活泼，思想倾向上有问题。

那会儿也真有些政治高人，他们寻找整人的根据，很有一套恶毒的办法，这就是“生拉硬扯”法。在一次批判我

的团员大会上，一位发言者指着我的脸说：“有这么多建设工地，有这么多工农兵生活，你不去写，你偏要写幼儿园的孩子，这是宣传‘处处有生活’，是典型的胡风提倡的那一套。不管你跟胡风分子有无联系，思想是一脉相通的，同样是反动的。”

这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面对着这样的发问，我又能说什么呢？在那个不讲理的年代，你有千百个正当理由也白搭，只要人家想整你这个人，那怕只说“你有反党情绪”，或者说跟你来往的人不进步，你就会不容分说的成为“分子”。而有了诸如“落后分子”、“小集团分子”、“反党分子”的帽子，那你也就再难在政治上翻身，时时都要受人歧视和监视，稍有不慎就会有人打小报告，开团小组会就要受批判。更何况这会儿正逢运动中，我只好忍受着莫虚有的罪名，自己主动地向人家“根据”靠拢。

那会儿的人大都是这样，只要人家以组织的名义，说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也就乱了方寸，像小学生作文填空白似的，主动把自己的思想往里填，生怕自己跟组织不保持一致。不过现在想想也只能如此，那会儿搞的所谓政治运动，其实说穿了就是照方子抓药，上边说要抓个什么分子，下边就依照条件来找，谁赶上谁就自己认倒霉。这会儿让我赶上了，我就是个倒霉蛋儿，只能认了。

(D) 在解放军部队机关的时候，我就想到北大中文系读书，转业以后工作不合心意，报考大学的愿望越发强烈。

为了能圆上北大中文系的梦，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我都用来复习功课了。当时考虑自己的古典文学不行，特意请一位老师给我辅导，认认真真地准备了一年，自认为完全有把握了才报考。

那会儿正在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家希望有条件的青年干部，以调干生的资格报考大学，我觉得自己是不应该有问题的。因为，一是我已经准备了一年，二是我已经发表过作品，三是我做过编辑工作，比之有的调干生条件优越。经过一番努力和争取，领导上终于同意我上学时，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我的北京大学的师友们，我的正在大学读书的女友，大家也都热心地帮助我，有的给我找辅导材料，有的帮助我分析情况，这就更坚定了我的信心。

经过多日的忙碌，总算拿到准考证了，情绪再也无法安宁，我的心立刻飞到了北大。仿佛拿到这张准考证，就如同拿到入学通知书，觉得自己成了最幸福的人。恰好同住室的人，这时出差去了上海，宿舍里只有我一人。为了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临考的前一天下午，我有意识地放松自己，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不去干，泡一杯浓茶，打开收音机听音乐，有滋有味儿地消闲，以便考试时有个好心态。直到天渐黑的时候，我到附近经常去的一家小馆，吃了一碗馄饨两个烧饼，回来依然静坐在屋里。

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什么叫惬意，什么叫价值，这些向往已久的东西，今天我全享受到了，明了啦。这时只

想着明天的考试，别的什么连想都未去想。许多天以来的疲倦和紧张，忧虑和期待，此刻统统被幸福所代替，惟一的企盼就是时间快点过，好让我早点走进考场……

正在我独自享受这美好时光时，突然有人来敲门，以为是朋友来看望，我急忙走过去拉门，一看是交通部保卫处的两个人。我开始预感到有什么情况，不然他们是不会傍晚来登门的，但是无论如何不曾想到，竟会跟我的考试有联系。更不会想到，我命运的绳子，从此由别人牵着，开始在苦难中跋涉。

(E) 他们坐定以后，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点的人，先是煞有介事的询问我，考试准备的怎么样，有没有困难，准考证拿到没有，等等，我都一一做了回答。然后让我拿准考证看看，我以为他们在关心我，赶紧从抽屉里拿出来，爽快地递给他们看，我想他们准会说些鼓励话。不料那位年长者接过准考证，连看都未看上一眼，立刻板起像个篮球似的圆脸，说：“部里运动办公室决定，不让你去报考大学了，先把你的问题说清楚了。”

天哪，这对于我不啻是个从天而降的大祸，多少年的梦想，多少年的准备，就这样被轻蔑地毁掉了，我的脑袋立刻膨胀起来，眼前顿时成了一片漆黑，方才独享的快乐荡然无存。

当我清醒过来以后，完全出于本能的反映，就是保护自己的权益，绝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我腾地从椅子上站起

来，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情理了。明天就要考试了，好歹总得让我考完吧。我又跑不了。再说，我又有什么好说清楚的。”

这二位见我来了火儿，怕闹不好出什么事，说了句：“这是部里决定的，我们无权改变。”说完了，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独自在屋里，越想越生气，气他们不讲理，气自己太窝囊，拿起那些书来，啪啪啪，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可能是声音过于大了，惊动了同公寓里的一些人，立刻走进来安慰我。有的说：“别着急，不行等明年再考，反正你还年轻呢”；有的说：“说不定过一会儿还你准考证哪”。还有人表示去为我求求情。总之，在当时那个年代里，没有一个人敢主持公道，更不敢怀疑组织上会有错，因此，只能说这些空泛的人情话。这在当时就已经相当不容易，我一直感激着这几位同事。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既感到委屈，又感到害怕，只能在忍耐中期待组织上开恩。我天真地想，像我这样一个青年人，从学校到部队，从部队到地方，进入社会不过三四年，如果组织上都无起码的信任，那还会相信谁呢？说不定真像大家说的那样，过一会儿给我送来准考证，先让我去考试，回来再接受审查。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直到夜里十二点还无动静，我知道再也没有指望了，就钻进被窝准备睡觉。

钻进被窝里好久了，怎么也睡不着，来来回回地在床上

折饼。想想多年的大学梦，想想多年备课的辛苦，想想这整人的政治运动，想想这难测的审查结果，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这一夜都是在泪水浸泡中过活。我开始对自己的过去后悔起来，当初不该背着家里带头参军，自己觉得是爱国的进步行动，到了这时候照样不被信任，干嘛非得赶上赶着找苦恼呢。真是活该。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实在睡不着觉。平日里总是起的比较晚，起来以后吃完早点再上班，匆忙时有时边走边吃。这一天连早点也未吃，就跑到部里去，等候副司长张清华和处长温士一。这二位都是这场运动的负责人。希望这二位领导能帮我说说话，别让我失去这次读书的机会。

张司长原是清华大学学生，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她前些年逝世以后，作家韦君宜写过一篇悼念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我才知道这位老领导这段历史。温处长早年也是地下党，同样也参加过学生运动，只是比张司长时间晚些。她们二位都是学生出身的老革命。这二位领导毕竟都是女性，有一颗慈母般的心肠，对我的事情一直很关心。她们简单地商量了一下，就由温处长出面去部里，找运动办公室请示，看可否先让我去考试，回来再说清怀疑的问题。结果并不尽人意，部里仍然坚持先审查，弄清楚所谓的问题，考学校的事先不要提。

这二位宽厚长者的努力未能奏效，她们无不遗憾地用好话安慰我，却没有丝毫能力能使我摆脱困境。政治运动的残

酷，阶级斗争的无情，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领教的，从此对这种毫无人性的整人手段，我打内心里讨厌和诅咒。所以有人说，50年代的人际关系如何好，我从来不敢苟同，这样说的人八成是整人者，或者是习惯假情假意的人，真正坦诚的人，有自己见解的人，就很难生存。

大学上不成且不说，还要交代所谓的问题，这是成心往死路上逼我。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索性来个破罐子破摔，看你会把我怎么样。我立即向司里请了假，怀着郁闷的心情，回到宿舍等待审查。心想，有没有问题，我自己最清楚，只要不胡扣帽子乱栽赃，我就不怕。先休息几天再说。其实这只是我天真的想法，人家才不怕你破罐子破摔哪，胳膊总拧不过大腿，没过几天我又被传唤去，在司里召开的批判会上挨批。

(F) 这是一天下午，劳动工资司的团员和青年，大约有30多人，聚集在一间大办公室里，在我进来前就都就坐了，只有一把空椅子留给我。会议由团支部书记主持，这位平时显得文静的女人，这会儿却表现得非常凶悍，她说：“咱们今天开会，请大家帮助小刘（我的本姓），他身为共青团员，却不听党的话，跟胡风小集团混在一起，现在已经滑到了反党边缘，如果再不悬崖勒马，势必会越来越远，最后成为人民的敌人。我们大家要好好帮助他。”话说得很得体又很堂皇，别人听来也许会称赞她的水平，送到我的耳朵里却不舒服。知道她是为了政治需要，在大庭广众之下说

谎，只是不便当众揭发罢了。

接着就是一些人的发言：有的没有事情，猜想加推测的思想，像一个个屎盆子，胡乱地向我头上扣来。这些人表演得非常充分，好像只要政治上对头，就是睁眼说瞎话都行。起初我还耐着性子听，强忍着满腔的火气，后来越听越不像话，实在觉得无法忍受，站起来就愤然离开会场。任凭他们怎么叫，我就是不回去，告诉他们说：“你们连道理都不讲了，这也叫帮助吗？这是诚心要整人。要杀要砍，随你们便，我就是不参加会。”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向司里领导做了汇报，由温处长出面找我谈话，批评了我的“恶劣态度”，也批评了他们的不当做法，最后勉强地开了两次会，再没有人敢胡说八道啦。

通过这一次较量，使我开始认识到，人心是险恶的，政治是虚假的。同时也意识到，面对邪恶行径，只有勇敢地抗争，才会保护自己的尊严。否则就认为你软弱可欺，拿你不当人地肆意污辱。从这之后的几十年里，无论在怎样的境遇里，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他欺辱我，我总是直面抗争。当然，最后总是以自己的失败告终，却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少会争取些做人的尊严。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会儿搞的政治运动，可不是体育运动，不管什么项目都有个规则，这政治运动如同荒滩上的水，谁也不清楚会漫到哪里。只要你摊上了，你就

甬想挣脱，再喊冤叫屈也没用，不然，积极分子靠什么当官发财哩。这次的“反胡风运动”，让我摊上了，我也只能认了，再怎么表白自己，想整你的人也不会听。原先还想顾全考北大的事，这会儿美梦彻底破灭了，就再也没有任何想头，身心反而真正地放松了。只是一想到即将到来的审查，思想上又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实在想不出还让我说清啥。尤其担心会不会给我欲加“问题”。自打我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别的见识没有长多少，政治运动中如何整人，我还是比较了解的。这会儿自己摊上了，就不能不害怕不提防。

(G)“反胡风运动”还未完全停止，就转入了“肃清反革命运动”。我的所谓问题再也找不出什么了，但是又不好公开承认是错整，就不了了之地放在一边儿，任我随便怎样地自在了几天。那会儿的运动都是这样，整错了宁让个人受冤屈，也不能让组织丢面子，组织的面子远比个人的命运重要。在我身上也不能例外。

偏偏我这个人人生性比较倔犟，什么事情都想较真，非要跟组织讨个说法，结果又是自讨苦吃。我所在的劳动工资司见我非要讨个说法，就再次召开全体团员和青年大会，对我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帮助”。这次与过去所不同的是，考虑找不出我的“罪恶事实”，就在我的所谓态度上作文章，譬如有的人提出，这次没让我考大学，我非常不满意，就拒绝思想检查，采取消极对抗的办法，发泄对组织的不满。他们列举的事实就是，我每天晚上去看电影，而不是认真地准备

检查。我每天晚上看电影不假，但绝不是要对抗谁，而是我的心里别扭，就在电影院里消愁。还有的人说，在上次会上拒绝帮助，大家发言不想听就走，这是明显的对抗运动。而闭口不谈他们如何强词夺理。那会儿的人真不知怎么想的，一个个都像吃了政治药，只要政治运动一来，几乎人人都想表示进步。连平时跟我算是哥们儿的人，都不甘落后，有的没有的瞎说一通，以此表白自己的“正直”。不过这样也好，使我这个走向社会不久的人，对人有了认识。

从这次运动以后，我真正地意识到，世上最不值钱的是人，世上最不要脸的是人，人活着最本质的事情，就是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各式各样的交道。会打交道的就是强者，不会打交道的就是弱者。人在动物中是最高级的，因此，连卑鄙也是最高级的。

对我胡乱地批判了一通，虽然找不出什么理由，但是保住了组织的面子，谁也不可能再说什么。可是对我总得有个说法儿，便以“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的结论，给我的“问题”做了空洞的结论。那时在政治运动中，有句常用的话“戴大帽子开小差儿”，是用来讽刺个人检查的，现在用到对我的结论上，似乎更为贴切恰当。

代表组织跟我正式谈话的，是我一向尊重的温士一处长。那天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像母亲对待受委屈的孩子似的，她让我坐在她办公桌对面，先把一杯早泡好的茶推给我，然后询问我近来的情况。过了片刻她才说到正题。她首

先跟我说，革命青年应该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参加革命就要经受各种考验，并列举了延安整风时的例子，说某某人被当成国民党特务审查，险些被处决，最后证明没事照样为革命奋斗，现在就在某部任副部长。然后把组织结论拿出来，一句一句地念给我听。看着她那张慈祥的脸，我不禁想起自己的母亲，真想扑进她的怀抱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以解心头的郁闷和委屈。

温处长谈话的用意我是理解的，她的好心和真诚更令我感动，却不能从思想上真正接受。在我看来，人都是有尊严的，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只要你整错了人家，就应该公开地赔礼道歉。现在你们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说得实在太轻松太不负责任了，可是我却失掉了一次到北大读书的机会，女朋友也因我的所谓问题而分手，这未免过于不讲道理了罢。难道政治就是这样没有起码信义的东西？难道人的政治生命就是这样不值钱？我实在有些想不通，却又不便更多地说什么。

考虑到我跟温处长的关系还不错，她又在许多事情上给我帮助，相信这样的事情也并非她情愿，我再有气也不能撒给她，就自认倒霉地给了她面子。这次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但是，留在我心上的阴影，积在我胸中的愤怨，却没有丝毫的消释。这就是我的1954年。

(H) 由于无端挨整、上大学被阻、失恋，这三重灾难同时降临在我的头上，我的精神和身体都有点吃不消了，事

情过后，就病倒了，每天下午都发低烧，后经医生检查是肺结核病复发。一个刚刚 20 几岁的年轻人，曾经满怀热情地投身革命，却反过来被革命无情地折磨，再能宽容的人恐怕也有想法。越想越窝囊，越想越痛苦，我的病情又加重起来，医生不得不让我全休，从此过起了病号生活。

到我能够勉强上半班的时候，“肃反运动”已经接近尾声了，到底抓了几个“反革命分子”，我连问都不想去问，从我自己被整的情况，相信同样会有冤屈鬼。只听说同处工作的一个人，因在辅仁大学读书时“破坏学运”，被保卫部门带走审查去了。这位身材瘦高说话和气的同事，是个地道的北京人，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给我的印象是个厚道人。这样一个人会干出坏事来吗？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说不定又是一个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就是退一万步讲，有点所谓的历史问题，那也是年轻时的事，对共产党缺乏认识，人家现在表现不错，总不能死揪着不放吧。何况还可以改造嘛。

我是 1954 年从部队转业的，旧军装还没有彻底脱掉，地方机关是怎么回事儿，更没有完全闹得一清二楚，当年就被狠狠地整了一通。别提心里有多么别扭了。这时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部队来。在我当时看来，比之地方某些人，部队机关里的人，似乎更好相处。只有在这时我才真正理解，部队的战友情意的可贵，可惜这已经不再属于我。现在更现实的是，病愈后下一步怎么办，是继续报考大学，还是调到新单位，反正我得离开交通部。我绝不想跟那些整我的人同在

一个楼里。

三

我记忆中的北京市，50年代的市区面积，好像没有这么大。那会儿的和平里，就类似现在的新区了，只是没有这么叫。离开交通部机关，被调去做编辑工作，我供职的报社，就在和平里办公。和平里这个地名不错，有种祥和平安的意思，只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这个有着好名字的地方，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和平。相反在1957年发生的“反右派运动”，我遭遇到了更大的灭顶之灾，几天之内就沦为最底层的贱民。

当时我所在的报社，就在现在民族出版社的楼里，前几年因事到民族出版社，刚进入大门心头就开始发紧，40年前的痛苦往事像一把把刀子，狠狠地刮着我的神经。看来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是无法真正忘记的，所谓的原谅和宽恕，那也只是虚伪的承诺。记住，不见得报复；记住，只为了认识。人没有鲜明的爱憎那还叫什么人。

如今的和平里已经是个繁华地区，高楼林立，车来人往，大都市的喧哗完全掩饰了历史。就是我有时走到那里，如果不被什么景物触动，常常地也是不会再记起。然而它又

毕竟是我的罹难之地，每逢想到 1957 年就会想到和平里，想到和平里就会想到“反右运动”，以及在此之前的“反胡风运动”。

(A)“反胡风运动”结束以后，不，正确地说，是对我的审查停止后，我就开始因病休养了。这一晃就过去了三个月，稍有好转就让半休半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上班。这时真不想走进那座大楼。上班如何跟整我的人相处，在养病时就一直地想，这会儿真地面对了，我打心眼里发憷。可是总不能不上班呵，只好无精打采地去应付。

大概领导也考虑到了这点，或者考虑到了我的志趣，对我的工作早有了新安排。我病休之后刚一上班，劳资司的秘书就来通知，说领导上要找我谈话。起初我心里直犯嘀咕，不知又出了什么大事，尤其见到谈话的人是，张清华副司长和温士一处长，这两位女领导一起跟我谈，这架势让我着实出了身冷汗，怕又要生出什么差池来。经历了这次运动，被莫名其妙地整了一顿，对于组织对于什么人，我都没有了信任感，更感觉不出有什么神圣。她们谈话以后才明白，在她们二位的建议下，经过部政治部批准，决定调我去报社工作。

张司长很动感情地说：“按你的情况，上大学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心里明白，不巧碰上了这场运动，把你给耽误了。我们共事一场，觉得很对不起你。”温处长也说：“考虑你做过编辑工作，又喜欢文学，经张司长提出，大家同

意，想让你去报社工作。”我听了以后立刻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倒不是为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机，而是为这两位老大姐的理解和体贴，使我这个刚刚挨过整的人感到温暖。在那种境况下，能有人理解、关怀，如同夏风冬阳，实在太不容易啦。今天想起来，依然感到欣慰。可惜这俩位大好人，她们自己的命运，后来也并不很好。再次见到温处长时，她已经被下放到中学当校长；后来听说张司长爱人、监察部副部长王瀚，也被划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当然，在政治比较清明以后，这位老革命干部，同样被平反恢复名义，只是不知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B) 当时交通部有两张机关报，一张是《人民航运报》，一张是《人民公路报》，都是学习苏联办的产业报。前者是给海员读的报纸，后者的读者是公路系统职工，都是对开大张四版的周三报。出于对江河湖海的钟情与热爱，我到了《人民航运报》，在文化生活部编“浪花”副刊。从此我的“生活画册”，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只是那画页越来越暗淡，“出版”不久就被无情地践踏。

我们这个副刊部，只有四个人，负责人叫房仲甫，很有点旧学根底儿，新派作家中他喜欢蒋光慈，我们一见面他就给我背诵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若干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作家林斤澜、高晓声先生的同学。另一位叫谢德忠，一位文工团演员出身的小说家。还有一位是西北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苏铭。这三位年纪都比我大，我也就成了小弟弟，他们

各方面都很照顾我。在报社还有俩位写诗的朋友，一位是四川人胡荣谦（胡牧），他是诗人沙鸥的同学，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写诗；另一位是跟我年龄相仿的赵惠民（赵越），他在报社撤销后调到山西省歌舞团，现在是位著名的歌词作家，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歌词。

应该说，这个小环境还是不错的，工作时心情也比较舒畅，“反胡风运动”中那些不愉快的事，我也就渐渐地不在意啦。而且这份工作又是我喜欢的，在工作上也就格外地卖力气。因为我比较喜欢诗歌，那时又学习写诗，副刊的诗歌作品，老房就让我来编，我就想办法约稿组稿，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许多著名作家、诗人、编辑，像蔡其矫、邵燕祥、公刘、沙鸥、巴波、海默、雷加、考诚、马丁等，我都是那个时候认识的，有的还给我寄来诗文发表。这时是我真正进入文学圈儿的开始，既然没有能到北大中文系读书，就想在这个岗位上认真干点事。

这张报纸的副刊跟其它报纸副刊一样，每天都有大量的自由来稿，其中最多的就是诗歌稿件。这些诗歌稿件大都出自海员之手，他们的文化程度比较高，又有远洋航行的浪漫生活，许多人愿意写诗抒发感情。有一天开会研究业务工作时，我提出是不是请一位著名诗人，给这些稿件写一篇指导性的文章，编辑部表示同意后，我就决定请诗人邵燕祥来写。我之所以想到邵燕祥，一是我比较喜欢他的诗，二是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管工业报道，当然是位合适的人选。

20年后我与燕祥成了朋友，有次曾跟他开玩笑说：“燕祥，我上过你的当。”他当时听一愣，不解其意。后来我告诉他说，在抗美援朝时他写过一首诗，题目是《你们的战歌就是凯歌》，当时在天津的中学生中，很有鼓动作用，几乎大小会都有人朗诵，我们学校还编成了集体朗诵诗。我就是在他的这首诗，以及那支《走进军干校》的歌鼓动下，离开温暖的家投笔从戎的。这算是后话了。

我找邵燕祥约稿时，记不得是通电话，还是写的信，反正当时很快，我就跟邵燕祥联系上了。我拿着这些作者诗稿，如约到中央台大楼，当面交给了邵燕祥。见面之后我才知道，这位我敬仰的诗人，原来只比我大两岁，属于同一时代的人，说起话来当然也就投机。他文静的举止，诚恳的待人，没有一点年轻得志的架子，是当时的诗人邵燕祥，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那时他好像正准备出国访问，希望我能宽容他几天，等他从国外回来就写这篇文章。

可是没有过多久，“反右派运动”就开始了，我接到邵燕祥的来信，以及退回的全部诗稿。他在信上说，事情比较多，挤不出时间，实在写不成这篇文章，向我表示歉意。后来才知道他正在受审查，再后来知道他被划成了“右派”。他做为一个诗人的才华和智慧，他做为一位同代人的正直和善良，我始终都在深深地记忆着。所以在后来政治环境允许之后，我们的友谊又重新接续。我从内蒙到北京时曾看望过他。他在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前，以及回到北京以后

的工作安排上，都曾给予过不少的关怀和帮助。这会儿同在全国作协工作，彼此有了进一步了解，来往也就比过去更多些。

(C) 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那会儿，我的肺结核病并未痊愈，医生常开假条让我半休。报社领导让我参加整风运动，说是帮助党改进工作作风，我想自己作为一个共青团员，还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何况我的确也有些意见想提。听了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之后，我错误地以为政治环境有所宽松，提点意见总不至于怎么样。但是“反胡风运动”对我的伤害，使我对这类事有点心灰意懒，本不想再管这些弄不懂的事，后来看见许多人都在诚心提意见，我也就真的相信是要改进作风。认真地准备了几条意见。

报社开第一次鸣放会时，我去医院看病没有参加。从医院回来的路上，经过中央戏剧学院，顺便看望一位同学，见这所大学的校园里，贴有批评田汉先生的大字报，说田汉先生是个官僚主义者，等等。我当时非常惊愕。田汉先生是位老革命，大戏剧家，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大人物，居然连他也敢批评，我感到既疑惑又兴奋，觉得党是真心要听意见了，不然谁敢在他的头上动土。因此在第二次鸣放会上，我毫不客气地提了意见。

我的意见主要是这样几点：一、共产党应该勇于承认错误，像在“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中都整错了一些人，

就应该向当事人公开赔礼道歉，这样做不仅不会破坏党的威信，反而会增加受害人对党的信任；二、报社有的党员负责干部，例如，编辑部主任姜××，党的生活组组长周××，他们的作风实在不够正派，搞拉拉扯扯小圈子，特别是周××不学无术，只会溜溜拍拍，根本不像个正经文化人；三、报社的年轻人不少，应该大胆启用青年人，青年人有锐气、敢于提出不同的意见，不要等着他们把棱角都磨圆了，觉得顺手了再使用，那样无益于工作和个人成长，等等。

当然，由于我在“反胡风运动”中挨过整，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情绪，在发言中有些言语也就激烈些，这就让人难以听得悦耳，但是绝对没有任何恶意。可是就是这样几句话，总共不过10分钟的发言，就成了我当“右派”的最初资格，后来宣布这是一场“阳谋”时，我就成了被“引出洞”的“蛇”。这之后的许多年，凡是以组织名义征求意见，我都格外地小心，揣摩是不是又在搞“阳谋”，“引蛇出洞”。

报社驻上海记者赵琪，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算是一位懂得新闻业务的人。这次他回到报社参加鸣放，为了改进报纸提了个办报方案，他拿给我看，说：“你年轻，能接受新事物，对这个方案，提点意见。要是同意，你就签个字。”我看了以后，觉得这个方案不错，体现了内行办报，就在上边签字表示赞成。这个方案后来被定性为同仁办报，目的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我签字表示赞成，也就理所当然地

是反党。就这样一点区区小事，也不管其有无合理成分，就轻易地被定性处理，在中外古今怕是少见，而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再平常不过了。

赵琪当时被划为“极右份子”，先于我们遣送到农村监督劳动，其“罪过”我以为就是这个办报方案，最近读了朱正写的《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一书，其中引用了赵琪在全国记协会上的发言，赵琪在列举了机关报的六大特点之后说“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说话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可能是他被加重处理的主要原因。有了对他这样的处理，我又赞同他的方案，当然也就不会放过我。从戴煌写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一书里，我才知道赵琪也在北大荒农场劳改，并在饥饿和郁闷中在那里丧生。不知为什么在北大荒时我未见到他。前不久听一位老同志讲，赵琪还健在，并未死在北大荒。他劳改回来，被安排到上海一所学校教书，几年前离休。不知到底谁说得对。但愿他能健康地生活着。

按照我当时的年龄、经历，说实在的，要是说点软话、顺耳话，求饶的话，当权者放我一把也有可能，但是我的性格不允许我这样做，更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想整我的人见我不给台阶，那就更有理由打我于地狱之中，此时被我提过意见的姜××等人，正在领导着“反右派”运动，他们口口声声说我的态度不好。主要是在一个问题上，我跟这些人顶了牛：当权者说，“共产党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

个党员组成的，你说党员溜溜拍拍、拉拉扯扯，这就是攻击共产党组织”。我说，“如果说给党员提意见，就是攻击共产党，那这个党员的不正之风算谁的，要是说算共产党的，我就承认是攻击共产党”。他们在逻辑上讲不通，完全是强词夺理，但是又怕丢面子，就以污蔑共产党为由，又给我加了一条“罪状”。

《人民航运报》社属于交通部政治部，当时的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是章（章伯钧）罗（罗隆基）联盟的头号人物，交通部也就成了反“右”重点单位。凡是部里召开的反“右”大会，不管是批判章伯钧的，还是批判别的“右派”的，都要通知我去参加；因为我在报社工作，首都新闻界的反“右”批判会，也得让我去陪听陪批，说是从中受些教育，光在《北京日报》社召开的会，我就去了两三次，那时终日都在提心吊胆的过活。有次在团中央大礼堂开会，批判青年作家刘绍棠，还特意指定俩个人陪我去听，理由是我也写东西，这样受些教育更直接，回来还要谈体会谈教训，一时价弄得我精神负担很重。我当时又没有成家，每次开完会回到宿舍，同室的人也不敢搭讪，自己确实感到是被孤立了，就干脆在外边到处走动，直到深夜再回宿舍睡觉。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不是去电影院看电影，就是独自到公园里坐着，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

有一次我正往北管公园的方向走，不经意地发现有人跟着我，想甩也甩不掉，就干脆来个猛回头，然后迎着他走过

去，他想躲又一时躲不开，只好愣愣地站在那里。我到了跟前一看，原来是保卫处的干部，尽管说不出他的名字，却还熟悉他的模样。我很不客气地质问他：“是谁指派你的，我又不是特务，怎么还来盯梢呵？”被我突如其来的这么一弄，这位年轻人感到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只得讷讷地解释说：“这是领导布置的任务，又不是我自己愿意来。”看这个人比较老实，那副为难的模样，也着实可怜、可笑，我也就不好再说什么啦。

次日保卫处的一位副处长，特意找到我解释说：“有人汇报说，你每天都是三更半夜回来，领导上怕你想不开，万一出点事不好交代。我们就派了个人‘保护’你。”是真是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反正他这么一说，我反而不好说话了。

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我的生命刚刚开始，我才不会不明不白的死哩。既然我已经被拖进苦难中，再大的苦难我也准备去接受，再说，不管别人怎么看待我，我自己更了解我自己。如果连我这样的意见都难容，所谓的鸣放、提意见、整风，统统都是假的胡弄人的，今后再有这样的事谁还相信呢？正是抱着这样天真的想法，我才没有完全失去信心，相信党会实事求是的对待，最多不过像“反胡风运动”那样，把我批判一番了事。这么一想，心路也就宽了，别人说什么，怎样对待我，我根本不去过多地理会。随着运动渐渐接近尾声，我就更不去多想它了。

恰好这时我祖母病重，我就请假回天津探望，借此机会正好可以休息一下。

(C) 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里，统治者的意志是至高无尚的，他的好恶都会决定百姓命运。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从理论上讲是有民主的，其实根本没有真正民主，从文字上看是有法律的，其实很少真正地按法律办事，就连体现民主的宪法，都被有的人嘲弄说“宪法也是人定的”，言外之意是说，领导人想怎么定，就怎么定，想怎么执行，就怎么执行，平民百姓无权过问。因此人们也就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到了罪恶的“文革”时期，宪法、国家主席都被一脚踢开，连民主的幌子都不打了，何谈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

在我就要请假回天津时，报社接到中宣部的通知，中央各部委的报纸要撤销，人员由中宣部统一分配。整风、鸣放、反“右”，这些不断翻新的花样，本来已经把人搞得心乱如麻了，突然又传来报纸停办的消息，人们自然越发不安起来。比之关心政治运动，人们更关心自己的去向，人人都在想办法探听消息。不久就听说，交通部政治部与中宣部初步决定，我们报社的王文祥（原《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和我，《人民公路报》的王舜华（原《体育报》总编辑）和许岱（原中国青年出版社编委）等去《中国青年报》，李牧生去《光明日报》，这两家报社的其他人，除少数人留在交通部机关，大都分配到各省市新闻单位。听了这

样一个小道消息，我自然比谁都高兴，自以为这场灾难躲过去了，不然是不会这么优待我的。

鸣放的事没有人过问了，分配方案已经确定了，我想总不至于再有变化，一天下午，我踏踏实实地离开北京，回天津探望病中的祖母。在我们家我是长孙，自幼祖母就很疼爱我，这会儿祖母病了，我想应该多陪伴她几天，再说报社正处于动荡时期，大家都无心思干别的事，索性在家里多呆了两天。

谁知等我从天津探亲回来，情况完全变成另一个样子，一顶可怕的“右派”帽子，正虎视眈眈地等待着我。

交通部政治部运动领导小组的人，见我回来立刻找我谈话，传达这样两点决定：一、根据我在运动当中的表现，决定补划我为“右派分子”，给予行政上降级团内开除团籍的处理；二、原定去《中国青年报》的方案撤销，考虑我正患肺病可以不下放劳动，分配到《青海日报》社工作。我当时一听就愣住了，僵持好久说不出话来，直到谈话的人让我签字时，我才清醒过来。幸亏经历过“反胡风运动”，对于这一套早有领教，不然说不定会晕过去。这时我就问了问，去《青海日报》的还有谁。对方说，还有编辑部主任姜××和编辑邓宾雄，我想，在运动中我给姜××提了意见，他肯定记恨着我，到了青海还在他手下，他能放过我吗？他能给我说好话吗？说不定处境会更糟。跟他一起去《青海日报》工作，这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可是，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说别的什么也不会有用，我当即表示了两层意思：一、我不认为自己是“右派”，你们怎么定是你们的事，我不想签字；二、非常感谢关照，让我去青海，但是我不需要照顾，我愿意去农村劳动。

谈话的人看了看我，不知是同情，抑或是无奈，同意研究后答复我。我的后半生的命运，在这次轻率的谈话中，就不由分说的决定了，简直连回旋余地都没有。后来有人告诉我说，本来考虑我年轻，言论又不系统，而且话出有因，是想放过我去的，因为划“右派”的比例数未完成，又有人提到我，我也就成了后补的“右派”。

22年后给“右派”改正时，我拿到那个打印的改正决定，真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简直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22年前的一张纸，让我成了“罪人”；22年后的一张纸，让我成了“好人”，好像每个人的好与坏，并不是由他的天性决定，而是要由某些人的口封，这种事恐怕只会发生在当时的中国

然而不管怎么说，荒唐年代总算结束了，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但愿今后能够警示后人，对待宝贵的人的生命，不要再这么轻率、无理。更不要为了权力、名誉，随便地践踏、污辱人，即使别人不疼爱我们，我们的父母还爱着我们。我们是父亲身上的肉呵，假如整人者的子女也遭遇此恶运，难道你们就真的不疼爱吗？我不相信。

四

北京前门火车站的建筑，几年前就已经改成俱乐部，供今天的人们消闲玩耍。由于这座建筑并不美观且名气不大，早被一批又一批的新建筑淹没，真正知道它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对于我们这些当年的“右派”，它永远是个标志型的建筑，许多人被发配到外地劳改，都是从这里乘火车远行的。现在有时去前门一带办事，看见这座建筑物的时候，哪怕只是不经意地瞟上一眼，我的心海立刻就会怒浪翻腾。当年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的情景，依然是那么清晰地呈现出来，仿佛40年的岁月没有前行，还停留在当时的时光指针上。

(A) 我的“右派”资格被确定，离开北京也就必然成定局。《中国青年报》是去不成了，《青海日报》我又不愿意去，至于最后确定去哪里，还得等待上级领导的通知。我就边等待边收拾东西，顺便向在北京的亲友告别，好在我是个光棍汉，两条腿一抬说走就走，没有一星半点儿拖累。惟一让我感到有点为难的是，如何跟我的父母说，他们一听说我离开北京，一定会朝坏处胡思乱想。那年我参加军干校，就是背着母亲走的，全家人为此担心多时。这会儿她知道了离开北京，尽管不懂得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相信自己

儿子是坏人，但是她也一定会犯嘀咕。

万幸的是“反右运动”以后，全国都有干部下放，左派与“右派”，正常下放与下放劳改，局外人谁也分不清楚。何况那会儿的人，有头脑不敢思考，上边说什么都相信，根本没有人去分，我就说是正常下放，家里人绝不会在意，更不会找我来追问。但是必须得“提防组织”，由不正派的人掌权的组织，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例如，有的人被划成“右派”后，他们就通知了所在派出所，家属也就成了被监督的对象。还有的动员“右派”妻子离婚。干这种丧天害理的坏事，还不都是以组织名义干的。所以我惟一的要求，就是不让他们下暗绊儿，最后经过研究得到同意，我的“右派”问题，暂不通知我家里人。一年以后家人才知道我是“右派”。

等待了一些时候，正式通知下来了，同意我随大拨儿“右派”，去北大荒农场劳改。我生活、工作了将近十年的北京，我得意、落难没多久的北京，就要渐渐地离我远去，从此，在这里发生过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留在记忆中。今生今世还会不会回来，我没有一点儿把握，也不想过多地想这些，倒是未来的前途，让我有点惴惴不安。

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只是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就要付出高昂的人生代价，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但是我并不后悔。我觉得人活着，就应该光明磊落，如果为了一时的利益，就要出卖自己的灵魂，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价值。我不认

为自己有什么错误，就应该坚守自己的信念，如果连点自信心都没有，那活得还有什么滋味呢？在后来漫长的逆境中，以至到迈入老年的现在，我之所以会不改性情，恪守自己做人的准则，就是希望仍然活得像个人。

(B) 1958年的4月，一个凄风苦雨的春日，我们这批“右派”，从北京城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前门火车站。准备乘坐当日的火车，到流放地北大荒去。这也是我头次听说北大荒，假如没有这次发配，谁会知道这个地方呢？就是此时知道了，对于它的真实情况，谁又能说了解多少呢？单从它的名字上看，就令人感到很畏惧。一些喝过洋墨水的人，会想起当年俄罗斯人流放地西伯利亚，一些听过中国评书的人，会想起古时那些罪官贬至的边塞，总之大家的心情都很复杂。

那会儿的前门火车站，来往的车辆不多，出行的旅客也很少，我们走的那天，又是个淅淅沥沥的雨天，我们这批特殊的远行者，立刻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少数猜测出我们身份的人，都投来同情的眼光，无可奈何的摇头唏嘘几声，然后就匆匆地走开。沉闷的空气，痛苦的惜别，使这四月的雨天，显得格外忧伤。

在当时那种政治情况下，“右派分子”的帽子一戴，就等于脸上烙了钤印，有的连家人都划清界线了，朋友和同事就更退避三舍，因此来送行的人都是至亲。从他们互相的称谓上看，最远的关系也都是姨姑血缘，更多则是夫妻、父

子、兄弟，别的人很少冒风险来送行。

我当时是光棍一人，家在外地，无牵无挂，自然没有送行人。不过这样也好，感情上没有折磨，心灵上没有负担，再大的罪也是自己承受。这正是光棍儿的优势。

这天从早晨起就下起了雨，飘飘洒洒，湿湿漉漉，整个都城笼罩在阴郁之中。好像是心里明白的老天爷，有意怜惜这些无辜者，却又无力帮助他们，只好用泪水表示同情。那时候还没有出租车，到车站乘火车，上机场坐飞机，不是家里人用自行车载，就是搭公共电车汽车，或者是找辆三轮车，绝没有现在这么方便。这一天也不例外。在我的印象中，用公家小汽车送的，是极个别的一些人，大都是划“右”之前，就享受高干待遇的，这次机关仍是出车送站。那天的前门火车站，显得非常热闹，却没有喧嚣声，气氛异常沉闷压抑。连我这个无牵无挂的光棍儿，心里都像塞了麻团乱糟糟的。

在细雨霏霏的车站前，有的打着雨伞在交谈；在人声鼎沸的候车室，有的在一旁轻声呜咽，他们说些什么，他们为啥哭泣，尽管没有谁真的能知道，但是谁都会猜测得出来。本来是朝夕恩爱相处的夫妻，却因为一方罹罪发配而分离，从此天各一方两牵挂；本来是父慈子孝和美的一家人，却因儿子一句话招祸去远方，从此老父不得不孤苦盼子归，这种从天而降的人为灾祸，谁能想得通谁敢说得出呢？只能用泪水冲淡心头重负，只能用虚语安慰破碎的心。人说世间最大

的痛苦，莫过于生离死别，倘若是天灾尚有情可缘，我们的分离却是人为造成的，因此，这次的离别就越发痛苦。至于何时再相见，这一去可否归来，就更是难卜的未来事情。

在这些一起被发配的罪人中，有我认识的一个俄文翻译，因为一句瞧不起苏联专家的话，被说成是恶毒的反苏言论，就轻易地成了“右派分子”。所幸的是她的未婚妻，并未因他的遭遇离开他，决定让他去北大荒劳改后，她毅然决然地跟他成婚，今天也特意来为他送行。这对新婚的年轻夫妇，手拉着手相对而视，既想亲热又不便亲热，既想劝慰又不好劝慰，那种皱皱巴巴的神态，连旁观者心里都不是滋味儿。大家谁都清楚，假如没有这场灾难临头，这新婚不久的小两口儿，应该正在一起度着蜜月，享受人间的美好情爱。可是现在却不得被分开，一个留下，一个远行，生死茫茫的岁月揪着两颗心。这是何等可怕的人间悲剧。

时间在沉闷的气氛里，一秒一秒地过去；离情在依恋的人群中，一点一点地流逝。

最后，开车的铃声终于响起来了，车站上立刻引出一阵骚动，远行的人在说：“照顾好孩子，别惦记我”，送行的人说：“别惦记着家，照顾好自己”；年长者说：“说话做事稳当点，别再出事”，年轻人说：“您注意身体，我到了来信”，如此等等。这些听起来极其平常的话，在此刻此地说出来，每一句都如同闷雷，击在乌云密布的心头，顿时催落积蓄多时的泪雨，顺着许多人的眼角流出。有的赶紧扭过头

去，有的止不住地抽泣，是为不幸的命运悲伤，还是为未卜的前途担忧，谁也无法分得十分清楚。

开车的时间到了。在《社会主义好》的乐曲声中，一列长长的墨绿色火车，喘着粗气徐徐地启动。就要离开北京，向北大荒驶去。一些跟“右”字沾边的旅客，以及送他们远行的人，都没有丝毫的轻松神情，每一张脸都像板结的土地。这时车上车下都可以看见，有的在哭泣着不停地招手，有的在长嘘短叹地注目，仿佛是哪个不怀好心的人，故意把这么多的痛苦告别，都集中在今天一起展示，让善良的人经受沉重折磨。此时的雨下得更密了，此时的风刮得更欢了。就在这凄风苦雨的春天，我们走上了漫长的驿路……

(C)为运送这些中央机关的“右派”，开往牡丹江的特快列车，加挂了好几节硬卧车厢，这也算是对我们的照顾了。当列车渐渐离开前门火车站，把亲人送别的身影甩在右边，把思念和惦记留在不安的心中，一个个美满团圆的家庭，就这样从此远隔两地，过着梦牵魂绕的日子，谁知会是怎样的滋味儿呢？我这个当时的光棍汉，实在想像不出更不理解，后来我成家与妻儿两地分居，这时才对其思念和惦记，有着刻骨铭心的真实体会。即使在当时，就是我们这些单身汉，虽然没有更多的家累，比有家室的人要简单，但是心中仍然有说不出的苦涩。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这种感情表现在恋群上，就是依靠群体快乐生存，一旦被孤立群体之外，也就完全没有了活跃

的生机。那个年代的政治运动制造者，很懂得人的这一心理状态，所以在运动中最惯用的手法，就是以“划清界线”为由，把挨整的人孤立起来，让你有嘴不敢说话，有腿不敢串门儿，活活地闷死在忧郁的氛围中。

我们这些被定为“右派”的人，经过一段很少有人理睬的时间，许多人的精神都险些崩溃，这会儿以同样的身份相聚在列车上，大家反而轻松起来活跃起来，又多少恢复了人的应有的常态。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光棍汉，还不像在北京有家室的人，在运动中一天挨批挨整下来，回到家里总还有个亲人安慰，我则是在单位在公寓都一样，没有人敢搭理，没有人肯安慰，只能在艰难中独吞这份孤苦。因此上了这北去的列车，同伴都是一水儿的“右派”，再没有人冷落和歧视，反而显得比别人更兴奋更快乐，来来回回地在车厢里走动，以便感受失去多时的欢乐。

列车行驶了两个小时，车到天津东站时，正好是在下午，我急匆匆地走下车厢，站在车站的出站口，两眼直直地往市区张望。

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中学时代的最后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我走进军干校的绿色军营，就是从这里起步的，现在我竟然成了“罪人”，在发配途中驻足在这里，真是百感交集却又难以言表。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我的父母，想起了我的家人，想起了我读书的学校，也想起了那年离开天津的情景，可是此时，我不仅回不了家，甚至于连让家人来

看上一眼，都不可能，不由得泪水湿润了眼睛。痴痴地望了许久许久，直到开车的铃声响起，车上的人呼喊时，我才依依惜别地走进车厢。

跟我邻座的一位年长者，是个心细的人，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事，待我坐定以后，若无其事地问我：“你是哪里的人呵？”我说：“老家是河北，父母这会儿，都在天津住。”他听后“呵”了一声，似有所悟，就再未说什么。过了片刻他又问我：“北京的家，还有什么人？”我说：“我还未结婚，我出来，就人走家搬了。”他笑笑说：“那倒也好，利索，不像我们，两边互相惦记着。”接着我们就聊起天儿。

说到刚才在北京前门火车站，“右派”一家一家送行的情景，他告诉我说，他全家的人都来送了，这使他还多少感到点温暖。他问我有没有人来车站送行，我告诉他没有，他说：“除了家里人，别人想来也不敢来呵，你不必在意。”我立刻告诉他说：“单位有俩位同事，请我去家里吃过饭，就算是对我的送别了。”他说：“非亲非故的人，这会儿能做到这样，那就很不容易啦。”

其实他哪里知道后来，比这更不容易的是，这俩位同事王文祥、孙惠青（原《中国煤炭报》社副总编辑），在《人民航运报》一起工作时，跟我并无太多过密的来往，可是在我被划为“右派”之后，从北京到北大荒，从北大荒到内蒙古，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在这长长的四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始终在关怀着我。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年代，

有的家里人都无情无义了，他们二位都不曾慢怠我。我每次到北京，他们都热接热待，没有半点歧视。这也是我一直引为自豪的真诚友谊。

跟我同一节车厢的人，有的来自中央各部委，有的来自各群众团体，经过两天一夜的行程，大家很快就渐渐熟悉了。为解除这漫长旅途中的寂寞，人们就用聊天儿来消磨时光。开始的时候彼此有些戒备，谁也不敢往深里聊什么，只能说些诸如，“谁送你上的火车呵”，“你知道北大荒这地方吗”，如此而已。人们的思想本来就是封闭的，经过这场“反右运动”之后，个个惊魂未定，就更要把自己的心扉紧闭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是那个可怕的年代里，正直正派人能够选择的，正确的也是惟一的处世方法。能做到这样独善其身的人，在我看来就相当可敬了，要是跟那些卑鄙小人比较，在当时可以说是圣人啦。

经过短暂的火车上的接触，后来彼此稍微有些了解了，说话时也就不再那么谨慎，连自己的“罪过”也敢讲了。这时人们仿佛一下子意识到，我们这些人有着共同命运，从此再也无法彼此分开，只有互相地帮助和照应，才好一起度过未来的艰难岁月。

“右派”改正后我们回到北京，这些当年北大荒的难友，跟外人介绍时，总是愿意说：“这位是我的老同学，北大（荒）农垦系，57届的学生。”言语间有着说不尽的苦涩，同时又满含无限的患难情谊。这是后话了。

原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时，我们许多人出差来过东北，这条北京至哈尔滨铁路线，对于我们应该说并不陌生。但是，在列车隆隆北上的此时，人人都好像是头次踏上这条路，列车一过山海关，就有不少人倚在窗前，凝望这茫茫的松辽平原。神情是那么严肃。谁在想些什么，无法准确判断。

坐在我对铺的一位难友，约有40左右岁的年纪，白净的脸上架着宽边眼镜，显得非常文静和沉稳，给人的初步印象是，属于那种很难接近的人。他在窗前凝望的时间最久，谁也不好破坏他的情致，大家就从侧面看着他的神情。不料他忽然扭过头来，像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我们说：“听我爷爷说，他当年闯关东，就是走的这条路。”啊，原来他想的是这样久远的往事。那时的穷苦人闯关东，是为了活命讨生活；我们这会儿闯关东，是为了什么呢？谁的心中都有答案，只是谁也不便说出，任凭滚滚车轮无情地把它碾碎，扬弃在这漫漫的铁路上。

(D) 从离开父母热情投身革命，到因“胡风事件”遭难，再到“反右派”戴帽子，这前后不过六、七年光景。我一个20几岁的年轻人，却饱尝了人间最大的不幸——用无限信任换取无端怀疑，用无限热情换取无情伤害。这就是革命给与我的最高“犒赏”。

人世间也许有各式各样的痛苦，但是还有什么比思想矛盾，给人的撞击更难以承受呢？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进步，

此时在我的心目中，都成了难以判断的是非，过去许多视为崇高的东西，再也不看得那么神圣了。我甚至于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如果不随潮流参军，如果不轻信那鸣放，我的命运也许不会如此，起码不会刚进入社会就落难。

以上种种真实想法，如同车轮的滚动声，不停地响在我的耳畔。

当列车运行到冀东平原，经过生我养我的宁河县，立刻勾起对童年的回忆。那时是多么天真呵，凭着一个孩子的渴望，总想快一点儿长大成人，走出落后封闭的县城，看看这世界到底怎样。后来终于离开家乡，跟随父母到了天津；再后来终于长大成人，眼界渐渐开阔起来，正踌躇满志想干点事情，青春的翅膀被活活折断，老天爷对我竟会如此不公。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去庙里还愿的情形：那年我四岁，得了一场大病。由于我是长孙，祖母格外地疼爱，她特意找人给我算命。算命的先生说，这孩子命不好，得给老天当会儿牛马，不然一生都有灾病。于是，花钱买了一个纸马鞍，背在我的身上，象征做牛做马，在我生日那天，祖母带着我，来到村里的娘娘庙，跟娘娘奶奶烧香求饶。长辈们自以为从此我就平安了。

可是不曾想这不吉的命运，并没有从我的身上走开，先是患结核病，后是“反胡风运动”挨整，这最后又是“右派”流放边疆。生活刚刚开始，就这么不幸，难道一生都要这样吗？我不禁感叹起生存的艰难。

想到这里，我真心佩服起那位先生，他给我算的命还真准，只是他给我支的招，看来并不真的灵验，或者说是老天不肯饶恕。我暗暗地为自己的未来，担心起来，害怕起来，不，确切地说，是怀有一种莫测的恐惧。谁知前边还有什么等待着我呢。

列车继续向东北方向行驶，人们时而平静时而兴奋，但是不管情绪怎样变化，永远摆脱不掉的是忧伤。我想许多人可能跟我一样，说不定也想起了久远的往事，或者想起了进入社会的历程，乘在这无事可做的旅途上，捋一捋自己的生活丝绪，不仅可以消除难耐的寂寞，而且也会给未来定个坐标，岂不是更为实际更为有用。生活在这样一个年代里，人们实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是成了“罪人”的我们，今后更要格外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不然再出现什么差错，那就要遭受更大的苦难。无论是对自己对家人，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从哈尔滨下车后，停留几个小时，等候换乘去牡丹江的火车。那时坐火车的人不太多，为了多装载些旅客，换乘车相隔的时间，常常是拉得很长，旅客便可抽空走走。跟我一起到北大荒的人，有的是第一次来哈尔滨，立刻被它的异样的情调吸引住了。暂时忘记了从北京带来的那些烦恼。

哈尔滨素有东方小巴黎的美称，在此之前，我曾来过一次这座北方名城。只是那时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接待单位自然也就非常热情；这回以“右派”的身份来到这座城

市，我觉得处处都是冷冰冰的气氛。这期间仅仅相隔不过两三年，心灵的反差竟如此之大，我不禁想起孟浩然的诗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不过我还是抓紧等候换车的时间，急匆匆地去了一趟松花江，想再一次领略这条大江的风姿。站在美丽的松花江畔，望着那滔滔不息的江水，我的思绪随水流渐渐远去。我在想，这条大江是这么从容、平静，不管世事怎样变化无常，它都会不舍昼夜地前行，大概是因为前方对它有什么诱惑。可是我们的前方，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形成诱惑呢？我实在想不出来。

我想，我只能学做一名水手，不仅要有在风浪中游泳的本领，而且还得有掌握天气变化的知识，不然在这莫测的政治河流里，很难驾驭这叶生命之舟。今后万一不小心政治上再出事，那恐怕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在当时那种极“左”的政治环境里，讲真话说实话是吃不到甜果子的，隐瞒、虚伪有时反而会得大便宜。这是我工作以后的几年里，特别是经过两次磨难以后，自己从中悟出的一点道理。经过“文革”运动，又经过改革开放时期，我越发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试想在过去极左路线横行时，有多少隐瞒出身、历史的人，尤其是隐瞒海外关系的人，不是都生活得很自在吗，有的人还心安理得地当大官；相反那些老实交代的人，反倒被无休止地审查批斗，一来政治运动就得提心吊胆。到了改革开放年代这类事不成问题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反倒吃香了，

这些人这时道出真实情况，又成了时代的心肝宝贝，这简直是天大的历史嘲弄。当然这有其政治原因，说说还是有必要的，起码能引起人们反思。

载着我们这些“右派”的列车，离开繁华美丽的哈尔滨，向牡丹江、密山一带进发，渐渐进入荒凉的亘古莽原。这种天高野阔的气氛，立刻引人陷入无限沉思。跟这悠远的大自然相比，人也实在太微不足道了，想整人的人如果真有本事，来这里一展身手才是英雄，只会跟人斗即使“其乐无穷”，那也不过是在罐里逞能，没多大出息。

想到这个带点哲学意味的问题，我的思想仿佛顿时成熟了许多。尽管这时我只20岁出头，属于“右派”中的少壮派，一个本该无忧无虑生活的青年人，这会儿却过早地负载着沉重——一个人造成的苦难的政治包袱。

这个沉重的苦难的政治包袱，原以为经过北大荒的劳改，会从我们的肩上卸下来，却不料一压竟然是长长的22年。直到成为中年人老年人，我们可以认真做点事了，却早没有了当年的激情和能力。唉！人的一生中能有几个22年呵，何况正是青春焕发着的22年，这就如同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被一只无情的手揉搓完了，又毫无顾忌地丢弃在一旁。罪孽呵，真是罪孽。

林 希

林希简历

林希,1935年生于天津。

1952年师范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曾经作过教师,后来调天津作家协会工作。

1955年受“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株连,被定为“胡风分子”,1957年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从此被送到农场、工厂、农村参加体力劳动。文化革命期间,更被打成牛鬼蛇神,历经种种磨难。

1980年平反,重新回到文学工作岗位。

出版有诗集4部,其中《无名河》获全国新诗奖。

1989年后改写小说,已经出版有长篇小说5部,其中近著为《天津百年》之第一部《买办之家》、长篇小说《桃儿杏儿》、《天津卫的金枝玉叶》等,发表中篇小说约40余篇,其中《丑末寅初》、《高买》先后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小的儿”》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

近期出版有《林希小说精品选》、《天津闲人》及英、法文版的《林希小说选》。

负面人生

一、写作缘起

读过许多回忆苦难的文章和专著，蒙冤者都习惯地写什么“19××年，我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被送到什么地方，从此开始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生涯……”读到这里，我就想，这些朋友如果不是蒙受不白之冤，他们可能都不具有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而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一种惩罚的象征，一旦他们得到公正对待，他们也就再不是普通劳动者了。

而我却没有这种幸运，我从1957年1月，就作为一个连普通劳动者身份都不具备的改造对象，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去了；后来罪加一等，又被送进农场，随后又在农村、工厂劳动多年，直到平反，我才有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而普

通劳动者的身份，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高的尊严。

根本就不具备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生活底层被改造了25年的时间，我接触到的，只是普通劳动者对我的歧视和惩罚。对我的惩罚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权力对我的惩罚，说明白了，就是国家机器对我的惩罚，譬如农场场长，他就代表国家政权，干部们对我的申斥，从日常的辱骂到每年年终对我的审查，几乎使我过不上一天安静的日子，而且每年还要整上我几天，惟恐我忘记了自己右派加反革命的双重身份；另一方面，则是普通劳动者们对我的羞辱，在羞辱我的同时，普通劳动者得到了一种心理满足，他们在对我施行专政的同时，享受到作为工人阶级一名成员的优越感，除了可以任意羞辱专政对象之外，他们几乎感知不到任何先进阶级的实际内容。于是许多自认为是工人阶级成员的人，就尽其全部智慧，在我的身上实现他们的阶级价值，在他们羞辱我最感得意的时候，说来也是一种奇怪的感情，我却发现他们最是可怜。

于是，我就成了一个在普通劳动者中间生活了25年、而又不具备普通劳动者身份的不可接近者，对于普通劳动者，我有一个仰视的视角，而且在精神上，我还有一个俯视的视角，小半生时间，我对于当权者，对于成功人士的心态不甚了了，但我对于普通劳动者，也就是对于生活底层的穷苦人，了解得最为深刻，我看到过高尚，我更看到过卑劣，我看到过美丽，我更看到过丑恶，我看到过正直，我更看到

过卑鄙，我看到过光明，我更看到过黑暗。

最最重要，我在社会底层经历了这 25 年间的政治运动，如果说反胡风运动时我还接触过一些文化界的名流，那么从 1958 年之后，我就沦入社会底层，而只和底层的民众生活在一起了。在底层，虽然没有权力斗争，虽然没有什幺阳谋阴谋，但底层社会有更残忍的斗争，也使用着更无情的手段。在高层的政治风险中能够平安度过来的人自然值得庆幸，但是在社会底层的苦难中能够活过来的人，就更是万幸了。

所以，我的反思历史，不仅仅是只透过个人遭遇去审视曾经发生过的一切，我更在和我一起共同度过这 25 年岁月的底层社会民众的经历中，认识历史所给予我们每一个人的伤害，就像野蛮的砍伐破坏了自然生态一样，野蛮的岁月更摧残了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的心灵。我们渴望光明，但我们没有看到过光明，我们祈求善良，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善良。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过的，都是一部负面人生，无论你自己以为曾经是一个胜利者，或者从一开始你就是一个时代的罪人。

不幸不仅仅只属于我自己，那些曾经加害于我的人，甚至就是因加害于我而曾经得到过晋升的人们，他们就是胜利者吗？在被扭曲的时代，首先被扭曲的是他们的心灵，而一旦生活拨去雾霭，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是羞辱。

负面人生，是我们共同的经历，给我们每一个人留下了

负面人生 心灵的创伤。

在生活底层，我结识过成千上万的人，说这些人是普通劳动者，其实倒不如说这种人是穷苦百姓，这些穷苦百姓，解放之后，有了基本的生活保证，他们对于共产党政权怀着极深的感激，他们形容自己旧日的生活是吃不饱、穿不暖，有一支歌唱着：“旧社会好比是，黑格隆冬的苦井万丈深，井底下压着咱们老百姓，妇女在最底层。”尽管这是一支歌唱妇女解放的歌曲，但这个“解放”却包括着所有的老百姓，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中国人，都因解放而得到幸福，这种翻身幸福感，已经成为发动群众运动的巨大精神力量。

在中国，每一次群众运动都是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为最高目的的，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就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切身利益；没有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群众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甚至于就要人头落地。于是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被这种恐惧感所驱动，起来向可能使他们重新沦为奴隶的形形色色敌人进行战斗，并将他们的敌人置于死地，从而取得一次又一次巨大的胜利。

但是，胜利了的人民群众又得到了什么利益呢？当然最大的利益是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了巩固，敌人的猖狂进攻被一次又一次地击溃，那些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被人民群众粉碎，于是人民群众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过着幸福的生活。

当然，只有这样空泛的利益是远远不足以动员群众投身

政治运动的，还一定要有实际的利益，哪怕只是小恩小惠。1957年，反右斗争之后，全国范围内提高了一次工资，平均每个人长了几元钱，那时我已经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当广大的工人干部们看到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不但没有长工资、反而受到降职降薪处分的时候，他们很为自己每个月长了4元钱工资而兴奋异常。1958年大跃进，年底一个通知下来，每人增发半个月的工资，只有右派分子除外。增发半月工资的那天，就像是盛大节日一样，高音喇叭里放着激昂的歌曲，人们的脸上闪着兴奋的光芒，在打退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生活得幸福的现实面前，那些右派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

而且最最重要，是每次运动之后，那些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们得到了提升，这对最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就是在我所在的这家工厂，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得到提升的，从工厂党委主要负责干部，到班组长，都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尤其令人为之垂涎的，是提干，在工厂，就是脱产，坐办公室，参加各种会议，享受干部待遇。虽然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没有什么特殊，而且干部还要吃苦在先，但是当上干部就不参加劳动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也是每周只有一天，这和每天8小时的劳动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年青人当了干部连搞对象的条件都提高了，亲戚之中说起来更是光荣非凡。工厂在每次运动过后都要向外输送一批干部，我所在的工厂，就真有

负面人生 一个原来的工人，一步就被输送到区卫生局做干部去了。正好这个区的一家产科医院缺少一个院长，这个工人摇身一变，真地就成了产科医院的院长了。如今说起来荒唐，但那个时代，这却是非常正常的事。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尽管一直生活在贫穷线上，但中国的老百姓很为自己的生活水平得意，就是每个月 45 元的工资，也被认为是一种莫大的恩情。中国老百姓多年流行过一句话：“旧社会我们吃不饱，穿不暖。”于是，新社会吃得饱、穿得暖，全都是恩赐，以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命运，这一切一切都是不可能得到的。

为了保护已经得到的一切，为了再得到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得到的一切，中国老百姓一次又一次地积极投入到新的政治运动中去，他们要以自己在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换取到物质的恩赐，甚至于还有“直升飞机”式的提拔。一个工人，一夜之间就当上了厂长、书记，甚至于更有人一夜之间就当上了副总理，就是没有实际的位置，也得到“亲切接见”和“热烈握手”，还可以合影留念，这一切一切对于一个没有文化的老百姓来说，实在是太富有诱惑力了；被这样五彩缤纷的憧憬所驱使，中国老百姓们投身政治运动的热情是一点也不难理解的。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一切一切的诱惑，都被最后化为泡影了，中国老百姓抱着最大的热情投身于其中的这场运动，以使每一个人都沦入灾难而宣告结束，中国老百姓以切

肤之痛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对普通民众的欺骗，就是在运动还没有宣告结束的运动中期，许多人已经感觉到自己这次是上了当了。

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是以老百姓的觉悟为最大基础的，普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是运动反动性的最大暴露，而普通百姓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首先在于这场革命对于人民群众的欺骗，它许诺给人民的一切，最后都被证明只是灾难，那个人头落地的恐怖原来并不存在，倒是生产大破坏，上山下乡，贫穷愚昧，才是这场运动的辉煌“成果”，政治运动遭到了人民群众的厌恶，无论发动了这一场运动的人如何声嘶力竭地喊叫要把这场运动进行到底，但这场运动也只能是等着以彻底的失败而宣布结束了。

正是百姓认识到了自身的可悲，才会使政治运动失去它的根本基础。1980年，当我最后于得到彻底平反离开工厂的时候，那些以整人起家的英雄们纷纷找到我，对我宣誓说：“今后再有运动，我若是再给他们当枪使，我就不是人。”后面的话说得很粗野，如今也就没有必要复述了。

中国每一次政治运动，受害最深的，永远是人民群众，多年来，为了对付我一个死硬敌人，工厂里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作班子，这里面还都是一些有点文化的干部，也有工人中的积极分子，这些人多年来就是注意我的动向，分析我的言行，一遇运动便揭发我的罪行，批判我的言行。许多年的时间，这些人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日子过得也很轻

负面人生 闲，在工厂里，这些人是有一种优越感的，人们也羡慕他们的受重用，有许多人想钻进这个班子，还不够条件。但是，突然工人下岗，那些只能老老实实参加劳动的工人们，这些年好歹也有了一点养家活命的技能，有人去开出租车，有人做了别的什么事情，据说只有那儿位骨干，身无一技之长，如今就靠每月的那一点点最低生活费维持生活。工厂里的人什么时候见到我，总是告诉我说，什么什么人如今可是惨了，床上病了好多年，连医药费都没有地方报销，可怜了。

历次政治运动最直接的受害者，永远是老百姓，荒唐的岁月，我挨了长达 25 年的整，但挨整使我的孩子知道只有好好读书才能给自己创造一点希望，这样，拨乱反正之后，我的小孩一直是优等生，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国外学校录取，至今已经成了小有名气的科学家了。再看那些注定我永世不得翻身的英雄们的后辈，悲惨了，他们的父亲没有告诉他们要好好读书，他们的父辈以他们的行为影响了他们的儿女，他们因自己的投机，而毁掉了他们子女的前程。

在工厂、农场、农村，我经历过长达 25 年的劳动生活，这期间我连做一名普通老百姓的权利都没有，我仰视着领导阶级的每一个成员，我看到了他们由热衷政治运动，到厌恶政治运动的全过程，我也看到了普通百姓被愚弄、被欺骗的现实。如果说我对于上层集团内部的磨擦不甚了解的话，但我对于底层民众的政治经历却所知甚多。正如对于战争的剖析已经由对于决策者内幕的关注、转而成为对于一个士兵命

运的关怀；那么对于中国的政治运动，如今人们也已经由对于决策层的神秘感，转而成为对于普通百姓命运的关注。也许如此更能够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多一些理解，也会对中国的政治多一些认识。

如今，老百姓已经明白，无论知识分子之间怎样人整人，也无论政治家之间进行怎样的路线斗争，至少老百姓再不会被动员起来参加运动了，而且只要老百姓不抄家，不揪斗，不打人，或者说只要不发动义和团运动，任何分歧都可以最后得到妥善的解决。这正如当我离开工厂时，一些工人对我说的话：“今后我们再不犯傻了。”

也许，这就是觉悟；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回顾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负面人生吧。

二、双重冤案

1955年，我19岁，一场反胡风运动，使我受到株连，并被打成胡风分子，因此被从文学队伍中清除出来，于1957年的1月1日“下放”到天津市机床厂劳动锻炼、改造思想。在我离开作家协会的时候，作家协会秘书长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向我传达了天津市委对我的处理决定：第一，严重受胡风思想影响，被定为胡风分子；第二，年轻，有才

华；第三，只要在劳动人民中好好改造，将来还大有希望。对于这个决定，我自然知道第一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确定了我“参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性质，还属于思想问题，虽然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但不以反革命罪行论处。于此，我当然万分感激。这倒不是因为我真有什么“罪行”，如今得到了宽大处理，而就是我没有一点罪行，只一条我受到阿垅的器重，要把我抓进监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事过多年，贾植芳先生在一篇怀念公木先生、题为《背影》的文章中写道：“他（公木先生）河北人，参加革命时间较长。50年代中期反胡风运动时，他负责天津作协和文联领导工作，当时中央主持胡风专案的同志（刘白羽）通知他说，天津有个叫林希（侯红鹅）的青年作家，也是个‘胡风分子’，应该批判审查。他（公木先生）拒绝执行，并说林希是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至多认识天津作协的方纪、鲁藜、阿垅，找不出他与胡风有什么直接关系，不应该无证无据地随便抓人，随便地划成什么分子，就这样他被调离了职务，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

读过贾植芳先生的文章，并听他亲自对我述说过这件事情，我心里真是诚惶诚恐，我万万没有想到，1955年的反胡风运动，我因和阿垅有些交往而受到株连，而就在我受到株连的同时，还有人因我再受到株连。受我的株连，也可能，譬如我少年时代的好朋友柳萌，他和我同龄，又和我是同学，1957年他为我申冤，说我不是胡风分子，结果被打

成右派。而公木先生是我的长辈学者，又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就因为他不肯抓我，还说我不过就是一个小青年，结果因我而蒙受了长达 20 多年的冤枉，说起来，我也真是应该感到羞愧了。公木先生 20 年的时间不能从事写作，真不知道到底是我应该愧对公木先生、还有别的哪位大人物应该愧对公木先生了。

反胡风运动结束后，我在天津作协等候处理，一年之后，我被定性为“胡风分子”并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但这场劫难远没有就此结束，我才到工厂不久，社会上的反右运动就开始了。报上每天都在揭发右派分子们的罪行和他们的种种反动言论，直到看见那些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不俗表现的英雄们一个个地也现出了右派丑恶面目的时候，这场运动还没有触及到我的头上。因为在工厂里，我没有参加任何“大鸣大放”的机会，自然也就没有机会向党发动恶毒攻击，原以为这场运动我就要逃过去了，但是突然工厂通知我去一个地方开会，在会上我被公开点名，说我犯下了向党进攻的罪行。

参加大会回来，工厂里已经成立了战斗组，那时候还没有专案组的说法，因为那时人们对于三反五反运动记忆犹新，工人们都称战斗组是打虎队。把我当作老虎打的“打虎队”有十几个人，队长是教育科的一个干部，还有几个工人。不要以为一个只有上千人的工厂居然也有足可以打退右派分子猖獗进攻的先进分子，在中国，不光是学术、文艺

单位有政治精英，随便一个什么地方都有理论水平超群、斗争艺术成熟的政治精英。过去在作协机关，那些政治精英们不俗的表现，我是领教过的，如今到了工厂，这里的政治精英一点也不比文学界的政治精英逊色，一开始向我摆好阵式，我就对此有所了解了。

打老虎，自然要有打老虎的打法，参加打老虎的人，第一要打破情面，第二要对敌人怀有强烈的仇恨，第三要勇敢、还要机智。

老实说，经历过反胡风运动，我虽然对于政治斗争有了一点了解，但那到底还有一个作家圈子，整我的人，也还斯文，就是后来公安局介入，也还是表面上客客气气，绝对没有人格上的侮辱。到了工厂，斗争的残酷性，就表现在对敌人的无情了，第一次斗争会，就喊出了“打倒林希”的口号。初听“打倒林希”，我几乎要笑出来，我有什么好打倒的呢？打倒我，又能给各位带来什么实际利益呢？但听过几位精英的揭发，我才慢慢地明白，原来不把我打倒，中国就要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就要失败，人民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帝国主义就要卷土重来……

谢谢各位精英对我的器重，老实讲，我还真没有那么大的能耐。

无论我有没有这么大的本领，但我的右派言论已经是无法抵赖了。打虎队的领导对我说：“右派是客观存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无论你承认还是不承认，你也休想狡猾地

逃过这一场运动。”打虎队的结论绝对正确，果然我的右派言论就被揭发出来了。我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反动言论，共有三条。第一：我曾经散布不学马列主义也可以写出好作品。第二，我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第三：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

够了，只要有其中的一条，就足够定一个右派了，何况我还有三条“罪行”，定我是右派分子，果然就是客观存在了。

只是，这三顶大帽子，怎么就扣到我头上了呢？

一连多少次斗争会，革命群众都要我回答为什么如此恶毒地向党进攻？当然，革命群众也知道我不会老老实实承认这些罪行，所以开始的几次斗争会，先端正我的态度，你愿意不愿意接受党对你的教育和挽救？你愿意不愿意选择坦白从宽的道路？你愿意不愿意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罪行？

斗争会，自然不会温文尔雅，百多人围着我坐成一个大圈，在人圈中央，自然也有我的座位，但这样的座位明明就是被审判的座位，坐在上百人的中间，听他们一个一个挥着拳头向我指出光明的方向，那真是一种人身侮辱。但中国人似是不懂得向围着自己坐成一个大圈的人们询问：“你们有什么权利向我吼叫？”当然人群中也有人似是觉得不应该随意向一个人吼叫，斗争会中间，有一个人向我吼叫着说：“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对你怀着仇恨吗？我们恨的是你脑袋瓜子里面的反动思想，我们恨的是你的右派言论。现在，你必

负面人生 须端正态度，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否则摆在你面前的，就是死路一条。”

无论我的态度是否已经端正，打虎队很快就进入了实质性斗争，一天晚上，我被带进一个会场，与其说是一个会场，这里更像一个刑堂，我也看不清会场里到底有多少人，就是觉得黑压压的一片，连刺眼的水银灯都显得暗淡了。就在人群为我闪开一条路的时候，震耳的口号声向我扑了过来，我更看见有人向我挥着拳头，明明，今天革命群众一定要把我置于死地了。

过程已经毫无意义，我只是不能理解，中国的老百姓，就说工厂里的这些工人干部，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最低的只有37元，只够一个人吃最粗的饭菜，常常听见工人们报怨，这个月的日子又过不去了。工人说的“过不去”，就是没有钱用了。怎么办？只能是借。向谁借呢？在那个低工资的时代，所有的中国人都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没有办法，只能向这个人借1元，再向那个人借1元，好歹也不能饿肚子。但就是这样，这些贫苦的中国人却对政治表现出了极大的狂热。他们把贫穷当做是一种光荣，甚至为贫穷而感到骄傲。他们被告知，穿体面衣服、吃富有营养饭菜的人是可耻的，自然，领袖除外。

我绝对不相信事过多年之后、当年那些政治精英们说的那些话，什么他们本来对我没有仇恨，他们向我挥拳头，喊口号，甚至一连斗争我16个小时，直到我因过度紧张而昏

倒在斗争大会的会场里，原来那时他们都只是听由领导的摆布。“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不是的，我不相信这些话。

因为，我从人们的眼光中看到了仇恨，看到了那些毒恶的面孔，听到过嘶裂喉咙的喊叫，甚至斗争过后，在我从禁闭室出来和什么人遇见的时候，我看到那些人目光中的幸灾乐祸，和对于他人落难的欣喜。

当一个人发现世界不是天堂的时候，他最大的快乐就是他知道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地狱；而且倘若他再看到那些他不可企及的人在他的面前落难的时候，他会因此而感谢这个世界。

中国的治世者，自然很明白这些浅显的道理，而反面教员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剂安定剂，一场反右运动果然收到了意料中的效果，整个中国一片鸦雀无声。

终于，我在定案材料上签了字，这也就是说，我“老老实实”地承认了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

我何以就承认了这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呢？

反动言论的第一条，有检举材料，是我在作家协会时一个和我住同屋的人写来的，这个人说，一天晚上他从外面回来，正看见我在屋里读小说，这个人对我说，你应该多读马列著作。当时我回答说，不学马列主义一样可以写出好作品。

有没有这件事情？当然有。但事情不像检举人说的那

负面人生 样。这位检举人，本来是一个小无赖，他靠讨好天津作家协会一个负责干部，从学校调到了作协，调他来作协的理由，就是加强政治力量，直接的使命就是监视我。他一到作协报到，秘书长就把他分配到我的住房，和我同住一间房。然后，第二天，他就向秘书长报告了我前一天晚上的反动思想活动，由此，这个人就更受到了秘书长的重用。确实，一天晚上，他从外面玩够了回来，正看见我在读书。他也确实对我说过，你应该多读马列著作，但我当时回答他说的话却和他检举的材料不一样。我当时回答他说，学习写作，也应该多读些文学作品。

然而，对于打虎队来说，告密者的材料是可信的，既然有这样一件事，我的一切申辩都只是狡猾，而告密者的材料，才是事实。就这样，我的第一条罪行成立了。

第二条. 我恶毒攻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我不记得我说过这样的话，也是有人告密，说我在一次选举人民代表的时候，说过这几位代表我都不认识。难道这不正是恶毒攻击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吗？

第三条，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那就更是客观存在了，我是胡风分子，我心里肯定不服，更肯定想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不需要任何证据，我的第三条罪行成立了。

何以我就承认了这些无端的诬陷呢？没有别的理由，很简单，我也再经受不住那种可怕的折磨了，那一次一次连续

16个小时的斗争会，还有没完没了的个别“谈话”，一连一个多月，打虎队不让我睡觉，更使用最恶毒的手段逼供，把我关在一间小黑屋里，没有起码自由，最后，我和所有经历过劫难的人一样，只想着结束这一场磨难，无论是怎样的结局，都比每天每天的折磨要好得多。我们也知道，承认这一切，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就会被送到劳改农场，就会永远受到人们的歧视，但无论怎样也比现在好，只求一死，不也是一种解脱吗？

对于后辈人来说实在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了，何以1957年之后相继被送到劳改农场去的时候，我们这些人的心情反而非常轻松。自然，一些有家室之忧的人，被送去农场，就意味着妻离子散，他们的心情远不似我们这些未婚青年这般轻松，我自己坐着大卡车，颠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农场，从卡车上把行李扔下来，然后纵身跳到地上。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可到地方了。

农场的日子自然是不好过的，不光是超重的体力劳动，更有种种人身监禁，队长们对学员们的辱骂，还有右派之间的相互告密。这一切一切我已经写过一本小书，书名叫做《拜谒人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于此，也就不再赘述了。只有农场场长对于我的一句话，倒足以证明我的双重“罪行”是何等的严重，那位场长于接受我的时候，对我说，你应该枪毙，别人枪毙时挨一枪，你应该挨两枪。

于此，我倒没有什么反感，当时，我只是在心里想，一

负面人生
枪是死，两枪也是死，而且在挨第二枪的时候，我早就什感觉也没有了，再多挨几枪，也无所谓了。

三、出庭出“证”

1964年，农场没有向我们作任何说明，就通知说整理好行李，带好我们带来的所有东西，农场将有专车送我们这些人回城。

在农场，我已经劳动了将近4年的时间了，因为类如我这样的右派，一不是劳动教养，二不是服刑罪犯，送我们到农场来的时候，也没有说期限，我们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把我们送回天津，因为几年来农场一直告知我们要在农场劳动一辈子，而我们这些人原来的城市户口早就被注销了，商品粮，也早就没有我们的“定量”了。

但突然通知说将送我们回天津，也不向我们说明任何理由，就是送我们回去，无论是摘了帽子的右派，也就是摘帽右派：还有没有摘掉帽子的右派，就是如我这样的戴帽右派，一律送回天津。

从农场送回城市，生活上固然是好了一些，可以每天回家，再也不吃农场的窝头煮白菜了。但是，回城，也仍然是一个阳谋，把右派放在众目睽睽之下，那滋味不是好受的。

但到底还是被送回天津来了，还是回到了天津市机床厂，人事部门分配我去一个车间，当了一名生产计划员。虽然我还是一个戴帽右派吧，但我不是还有点文化吗？1964年还没到“天天讲”的时代，对我也就控制使用了。

回到工厂之后，生活倒也平静下来了，除了一些会议不允许我参加之外，其它的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歧视。我自己也努力把工作做好，更努力和工人们处好关系，不多说一句话，再按时向领导汇报思想情况，日子倒也过得安静。

1965年，工厂为我摘掉了右派帽子，从此我的处境也就更好一些了，虽然也是一个摘帽右派吧，可到底表面上不把我当作敌人了。

突然，历史进入了1966年，1966年，中国发疯了。

疯狂的1966年，对于我来说，是从出庭作“证”开始的。

1966年2月的一天，工厂保卫科的干部通知我到保卫科去一趟，走进保卫科的办公室，一眼我就看见了反胡风运动时公安局负责审查我的一个干部，大家都叫他是胖刘，胖刘身边还坐着一个人，我不认识，但我估计今天他们到工厂来找我，一定和胡风案件有关。

“回到工厂来了？”胖刘到农场去过，自然知道我这几年的情况，他还是那副样子，不带什么威严地和我说话。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他就是这副神态，尽管有的人“态度”不好，但他从来没有骂过人，也没有亮出过铐子、手

负面人生
枪。

我坐在他们的对面，和胖刘说起了这几年的情况，他听说我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倒是也表示高兴地对我说着：“以后好好工作吧。”

说过几句话之后，胖刘指着和他一起来的那位干部向我介绍着说：“这位是检察院的王处长。开门见山吧，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胡风案来的，也就是为了阿垅的事找你来的。”检察院的王处长自然是一副专政机关代表的神态，他自然知道我和胡风事件的关系，但他今天还是要亲自向我询问种种经过，他像是审问案件一样地向我问着我和胡风、阿垅的关系，又问了我本人“参与”胡风事件的情况。我自然要一一地回答，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的询问，我等着他们说明他们为什么又来问我这些事。

“胡风案已经拖了十年。”王处长待我叙述完过程之后，对我说着，“现在检察院准备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这也就是说要给“胡风分子”判刑了。按照治病救人的政策，最后向法院提起公诉的只有胡风和阿垅两个人，其它的人全都释放了……”一桩震惊全世界的重大案件居然一拖十年而不能提起公诉，这也是极为罕见了。我在农场的时候，听说过一条规定，说是公安局拘留嫌疑人不得超过6个月，6个月之内如不能向法院提起公诉，就必须放人。所以，才有了送我们到那里去的农场，那个农场就是收容拘留半年的小刑事犯的。这些人做了一些恶事，还不到判刑的地步，可是又

必须给他们一点惩罚，于是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农场，把他们关在里面，关上半年，再放他们出去。再做坏事，那就要送法院判刑了。而胡风案蒙冤人居然被公安局拘留长达10年之久，“最后还以宽大的名义释放出来，这到底是“宽大”呢？还是政治迫害。

中国的事情是不能深究的，深究之后常常会得出非常可怕的结论。胡风案蒙冤人的遭遇，就是强权破坏法律的铁证，是20世纪发生在人类社会最野蛮的一起恶性事件，它使一个国家蒙受耻辱，这是一起永远也无法向后人解释的历史过错。

然而，居然要堂堂正正地提起公诉了，一桩将当事人拘禁长达10年之久的“案件”，还有什么法律的尊严呢？

经历10年的时间，又经历过反右运动，还经历过几年的农场生活，我已经不再是10年前的那个小青年了，多多少少，我也成熟一些了，我也有了一点思考，对于美丑善恶，多少有了一点自己的看法。听到王处长说要对胡风、阿垅提起“公诉”，我既不感到吃惊，也不感到恐惧。

“今天找你，是要你出庭做证。”王处长最后向我说明了他们的来意。

这倒真是让我大吃一惊了。“出庭做证？”我向王处长反问着说，“我能证明什么呢？阿垅在重庆、上海的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是解放后因为学习写作才认识阿垅的。”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处长就沉下了脸，他以一种极是威严的声音向我说着：“阿城案涉及到许多人，这些人都要出庭做证。涉及你的事不多，就是拉拢你参加“胡风集团”的事，指使你写文章攻击党的文艺政策，其余的问题，我们不会问你。”说到这里，王处长停了一会儿，似是让我做一下选择，随后他又向我说道，“自然啦，出庭做证是自愿的，我们不强迫，不动员。我们想，既然你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断绝了一切关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公民，你就有义务和人民站在一起对颠覆国家的反革命罪行提供证明。当然，你也可以拒绝，但你拒绝出庭做证，并不等于事实不存在，国家对于应该出庭做证、而拒绝出庭做证的人，也有权利采取相应的措施……”

王处长说话，态度倒也不算是多少恶劣，但每一个字都向我暗示着可怕的后果，我当时想到的是，到了这样的时刻，一个微不足道的我，是不可能有任何做为的，我的一点点对抗，对于胡风案也无济于事，我只能就范，让我做什么我就只能做什么。

如果说，在反胡风运动的当时，我出于一种愚忠和真诚，还没有想到这是一起冤案的话，但经过长达十几年的思考，我早就不再认为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有什么过错了，我是从自己被定为右派分子的亲身经历中醒悟到胡风、阿拢“反革命活动”的“本质”的，这样我也就估计到这将是一场怎样的公诉了。但是从我固有的观念说，出庭做伪证，无

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强迫，都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尽管现在我可以向人们解释当时我的可怕处境，但对于出庭做证，我总是有一种深深的内疚，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可怕的政治运动吓破了胆，他们总是希望能够保住一己的平安，于是我们就这样一步步地退让，一步步地忍受，而最后的那一场“大革命”，才使我们认识到正是我们自己的甘于被愚弄，才最后一起走向毁灭。

一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就只有听从安排了。

“我证明什么呢？”我向王处长问着。

“对了，这就好谈了。”王处长满意地说着。

这时，王处长和胖刘一起打开了卷宗，王处长对我说，阿垅的思想问题和文艺思想是不能判刑的，当年无论批判得多么严重，现在也不能提起公诉，阿垅的罪行就是颠覆国家、进行反革命宣传，而要我出庭，就是证明阿垅对我进行反革命拉拢，要我和他一起颠覆国家。

现在说起来，就是连一个几岁的孩子也会觉得可笑，阿垅，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作家，再加上一个没有写出过任何文章的小青年，居然梦想颠覆拥有几百万军队的国家，这到底是谁在说疯话呢？然而在那个时候，这却是现实，而且是披着法律外衣的现实。

“好吧，我出庭。”终于，我答应了。

王处长对我说，需要出庭做证的事情不多，时间也不长，规定给我的证词只需要1千字，出庭做证，只给我5分

负面人生 钟的时间，内容也极简单，只证明说我原来是一个中学生，认识阿垅之后，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步受到胡风思想影响，开始写文章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路线，对党的文艺政策抱有敌对情绪。对此阿垅夸奖我有才华、有前途，想把我当做胡风集团的接班人。根据这个要求，王处长要我尽快写成证词，他们很快再来找我。

果然未出半个月，胖刘和王处长又到工厂找我来了，他们带走了我写的证词，说是带回去研究。我想一定是给他们的领导审查吧。又过了一些日子，胖刘和王处长又找我来了，对我写的证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前前后后十几次，最后证词才算确定下来，说是就这个样子吧。

但王处长对我说，出庭做证不能带文字稿，为避免做伪证，必须只能是口述，这样就要把1千多字的证词背下来、熟记在心里。而且出庭时不能紧张，以免一时心慌忘了证词，法庭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那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万一出了什么意外，一切后果只能由自己负责。

每次王处长来，都是以一种严肃的口气提醒我，要我一定认真准备好证词。从此我白天劳动，晚上就准备证词，反复地把这篇证词背得滚瓜烂熟，这期间胖刘和王处长还来过许多次，演习出庭的种种过程，他们先听证词，然后再向我提出几个问题，说是出庭的时候，就是提这几个问题的。而且他们更嘱咐我，到了法庭，万一阿垅向我提什么问题，万万不可回答，要我不能和阿垅直接对话。

对于我的证词和表演表示满意之后，王处长告诉我说，阿拢“认罪”的态度很不好，三番五次地推翻对于他的种种揭发，现在是最后的判刑，有可能他把一切都认下来，这对他有好处，也可能他把一切都推翻，但是已经对阿拢做过交代，告诉他那样做只能对他自己不利。

对于我的出庭做证，我久久地不能释然，这明明是对我最大的侮辱，而且更使我在阿拢面前丧失人格。阿拢能不能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无奈，或者他能不能谅解我的“处境”，就像是一块巨石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想也许阿拢出狱之后，还有机会容我向他做出解释，因为当时如果我拒绝出庭，王处长说国家也会对我有相应的办法，言外之意，我将再一次从社会消失。

本来认识阿拢，开始是我主动地给他写信，说阿拢对我进行“特务拉拢”，是歪曲事实。阿拢后来给我写信，谈的只是写作上的问题，与政治丝毫无关，而且我们两个人从来也没有商量过颠覆国家的事，阿拢没有向我攻击过共产党，更没有对我做过反动宣传。写文章是我自己的事，文章写好之后向阿拢征求意见，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向前辈学者求教的正常现象，把这一切说成是反革命罪行，而且还要我出庭做证，受戏弄的不止是我一个人，受戏弄的是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民族。

终于，我接到了法院的传票，要我出庭做证。开庭的那一天，我早早地来到了天津中级法院，王处长和胖刘在法院

负
面
人
生

门口等我，他们两个人显得有些紧张，王处长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接到起诉书后态度极坏，他们到狱中做了一夜的“工作”，阿垅才答应今天到法庭上认罪的，王处长并告诉我说，不必紧张，估计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院里早就停下了十几辆小汽车，几位气宇轩昂的大人物从车上走下来，跟着随员，披着大衣，走进了审判大厅，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年反胡风运动的领导人，自然也有市里的要人，今天他们要来出席审判，亲自看看他们的敌人“应得”的下场。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隔窗望去，正看见那些要人们不可一世的神态，只是我倒也觉得这些人的可怜，他们今天居然要由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小青年，而且又是一个挖过河，馔过粪、挨过饿的证人来证明他们的正确和胜利，说起来也实在是太可悲了。

坐在证人休息室里，我心里乱糟糟地不知想了一些什么，从北京来的几个证人，我没有见过面，天津的李篱过去见过，如今也是老得不行了，相互见了面，也就是彼此看看，更不敢多说话。

正是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一个陌生人向我走了过来，这个陌生人个子很高，很瘦很瘦，我看了半天，也没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陌生人。这位陌生人走到我身边之后，看了看我，然后向我问道：“是侯红鹅吧？”

侯红鹅是我以前的名字，这位陌生人也一定是我过去的

朋友，但我看了好长时间，实在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朋友了。

“我是芦甸。”陌生人见我认不出他来了，便主动向我做自我介绍。

芦甸，一下子我惊呆了，这怎么会是芦甸呢？我认识的那位芦甸是一位英俊、而又极富风采的人，现在告诉我说他就是芦甸的这个人却完全成了一个老人了，目光中再没了一点光彩，神色呆滞，弓着腰，穿着一件破棉大衣，看上去就和一个老工人一样，那个睿智潇洒的芦甸已经不再存在了。

听说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就是芦甸，立即我迎上去伸出了双手，我知道这里是法院，而且我们又全都是证人，我们的一行一动全要受到监视，所以我只好控制自己的感情，不敢表现得过于激动。紧紧地握着芦甸的双手，一时之间，竟然忘记了向他问一声好。

在我的记忆里，此时的芦甸不会超过 50 岁，但长达 10 年的监狱生活摧残了他的青春，早在王处长到工厂找我时候，他就告诉我说芦甸已经被“释放”了，算是不予起诉，很是够宽大的了。他们还告诉我说，芦甸在狱中得了一点点病，现在已经好多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芦甸在狱中精神失常，他无法理解这一桩冤案，在长达 10 多年的监狱生活中，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自己到底是不是反革命？他更在思考胡风是不是反革命？他得不出结论，渐渐地就得了精神分裂症。芦甸的夫人——李嘉陵到狱中去看芦甸，芦甸

见到妻子竟然不问一句家里的情况，而是呆呆地给他的妻子背诵《实践论》，李嘉陵看着芦甸背诵《实践论》的样子痛哭失声，而芦甸还是毫无表情地在背诵着毛主席著作。

芦甸夫人李嘉陵是一位伟大的女性，芦甸被捕入狱之后，她一个人带着孩子依靠 60 几元的工资养活着全家，还赡养芦甸的老母亲，因为受胡风案的株连，李嘉陵蒙受着冤屈，但她一直相信芦甸的无辜和清白。

“你还好吧？”终于我想起要向芦甸问一声好了。拉着芦甸的双手，我万般激动地说着。

“过去的一切让它过去吧。”芦甸坐在我的身边和我说着，“在里面这么多年，我心中最大的负疚就是觉得对不起你，我们的事牵涉到你的头上，那时你才只有 19 岁呀。”

“你怎么会想到这些呢？”我向芦甸问着，“我没有怪罪过任何人。”

因为法警提醒证人们要考虑出庭作证的事，我们不可能多说话，匆匆忙忙地我只能向芦甸说了说这些年我的情况，芦甸也告诉我说，可能安排他去一个农场。我劝慰他说，暂时先有个地方安身，情况总会一天天地好起来的。我和芦甸约定，等他有了准确的去处，一定要告诉我，我去农场看他，我们还要好好地说说这些年的经历。芦甸又嘱咐了我一些话，我们就分开坐下了。

在休息室里，我还见到了几位师友，但不允许我们多说话，大家只好告知一下现在的处境，然后就想着自己出庭的

“证词”了。

“各位证人。”一位法警极有礼貌地出现在休息室门口，到底是一种法律的表演，一切都显得和善，法警恭恭敬敬地向大家敬了一个礼，然后又向大家说道，“现在已经开庭了，法院委任我向各位证人发出邀请，大家有什么要求，可以向我提出。”

证人之间，再不能相互说话了，大家拿着自己的小本本，最后再熟悉一下证词。

法庭里面的情况，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法警出现在门口说：“请证人侯红鹅出庭。”我应声站起身来，心情紧张得几乎无法控制。

跟随在法警的身后，我走进了法庭，法庭里坐满了人，我几乎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前面来的，迎面的高台上，一字排开坐着约莫 20 几个人，自然是法官，还有陪审员，我太紧张，没有向上面看，自然也不知道上面坐着的都是一些什么人，我只是想看看阿垅，看看我敬重的老师。

和电影里的法庭一样，证人站在旁边，面对法庭坐着阿垅，和我只有几步的距离。阿垅的头发全白了，脸上那种永远和善的笑容不见了，脸上的皱纹已经僵硬了，目光变得凝重。他坐在一只小木板凳上，前面有一张小课桌，课桌上放着对阿垅的起诉书，我看到那起诉书上有阿垅画的红道，起诉书旁边放着一副眼镜。阿垅坐在被告席上，神情显得倒不紧张，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愤怒了，甚至于给人一种平静的

印象，比我还要平静。

“证人侯红鹅，现在请你回答法庭的提问，你是怎样和阿垅认识的。”法官向我开始提问了。

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这是第一个问题，我把背下来的证词向法官做了回答，然后又等着下一个问题。

就是在法官向我提问的时候，阿垅侧过脸来向我看了一眼，这时他的目光和我的目光相遇到一起，我心里颤抖了一下，他的目光也颤动了一下，这一瞬间，我想我们已经说出了许许多多的话。我看到阿垅微微地闭了一下眼睛，他好像是为能看到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感到安慰。

“请面向法庭！”法官冷冷地向我和阿垅提出了警告，我想法官可能意识到这种目光的相遇会在双方的心里产生怎样的震动，他们绝对不允许这种不需要语言的沟通。

立即，法官又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按照事先准备的证词，我一一地做了回答，这时，我突然想起芦甸刚才对我说的话，芦甸说他的狱中最大的负疚就是想到自己的事情牵涉到了我，于是我在回答法官提问的时候，就多加了一句原来证词中没有的话。我向法官说道，我个人的“罪过”已经得到了人民的宽恕，现在我正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走自己的人生道路。阿垅似是听明白了我的暗示，我看到他平静了下来，不再似刚才看我时那样激动了。

法庭展现了证物，就是阿垅写给我的信，和我写的文章，和那上面阿垅的几处修改，把这样的几张信纸当做颠覆

国家的罪证，当然有些滑稽，就连法官似是都有点不理直气壮，但此外法庭还能拿出什么证物来呢？武器？或者是后来的“571计划”，我想如果能拿出那样的证物来，法庭该是何等的骄傲呀！

法律在戏弄人民的时候，其实是法律在戏弄自己。

“阿垅，对于侯红鹅的证词，你有什么质问吗？”法官向阿垅问着。

这时，我显得有些紧张了，我想阿垅一定会向法庭争辩的，因为事先王处长就对我说过，阿垅有申辩的可能，而且他们还告诉过，如果阿垅申辩，你不必直接回答，法庭会有办法让你出来的。

“没有。”阿垅只说了两个字，就再也不说话了。

前前后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我完成了自己作为证人的表演，法官宣布我可以退出法庭，这时法警又带着我从法庭走了出来。

回到休息室里，我心中总想着刚才阿垅凝望我的目光，我知道那目光中有千言百语，如果允许我们相互说话，我想阿垅一定会对我说许多话。想着阿垅的目光，我更想自己刚才的证词会不会在阿垅的心里留下什么疑惑，但想着阿垅最后简短的回答，我相信阿垅理解了一切。

我是最先出庭的一个，而且只做一次证，回到休息室之后，就再也没有我的事了，其它的证人要出庭四、五次，法庭规定，开庭之后，休息室里不允许交谈，看着别的证人出

负面人生 | 来之后，我也不能询问法庭里面的情形，我就只是呆呆地在休息室里坐了两个多小时。

大院里许多人从法庭出来休息，看得出来法庭的审问结束了，这时，一位看着像是大人物的干部披着大衣走进了证人休息室，那位在我面前威严无比的王处长走在这位大人物的身边毕恭毕敬，王处长也没有向证人们介绍这是一位什么要人，这位干部举目向证人们看了看，然后拉着长声说道：“今天很顺利，几位证人很好，阿垅的态度也好，这对大家有好处，对阿垅更有好处。”说罢，他笑了笑，也没有再和任何人说话，就被众人簇拥着走出去了。

休息之后，重新宣布开庭。这时王处长来了，他对我们几个证人说：“本来证人是不能够出席宣判的，但是大家一定想知道宣判的情况，请大家随着我到法庭去，一定不能让阿垅看出来。”说着，我们几个就随着他走到法庭里面来了，王处长让我们坐到最后一排，这时阿垅又被引了进来，法官开始宣判。

阿垅再次走进法庭之后，没有让他坐下，只让他面对法官站着，法官和陪审员们也站了起来，站在中间的首席法官一字一字地读着判决书，判决书自然是概述了阿垅的“罪行”，然后又做了根据法律条文的种种说明，最后，宣判对于阿垅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此时的阿垅已经被关押了 11 年半。

人们自然能够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判决，一个被关

押 11 年半的“犯人”，被宣布判刑 12 年，那就是说，再有半年时间，阿拢就可以恢复自由了，因为总不能让刑期少于关押期吧？再长于 12 年，又有什么理由呢？

宣布判决书之后，人们坐下，这时法官向阿拢说道：“被告如有不服，三日内可以提出上诉。”

这时，法庭里一片死寂，人们在等着阿拢最后的申述，当即，阿拢就回答法官说：“我放弃上诉。”阿拢的声音很镇定，却又让人感到压抑着巨大的愤怒，他选择了自我牺牲的道路。最后他对法官说：“一切事情都由我负责，与任何人无关。”说罢，他站起了身来。

四名法警“押”着阿拢走出法庭时，他从法庭两廊座位中间走过，他的身子挺得笔直笔直，头微微地昂着，目光平视，步子迈得极是镇定。就像我第一次见到阿拢老师时那样，他在众人的目光中走上讲台，走得那样镇定，带着几分严肃。

我几乎站起身来，我们几个证人，几个他旧日的朋友都微微地站了起来，希望他走过我们身边的时候，大家再相互注视一下。但他没有看任何人，他更不知道刚才的几个证人现在坐在什么地方，他就那样镇定地走出法庭去了，从容地走出去了，默默地走出了人们的视线，再也没有回来。

四、黑色的八月

1966年8月，中国大地失去了光明。

虽然，开展文化大革命是从传达《516通知》开始的，而毛泽东“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更是在8月13日发出的，但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早在春天就燃烧起来了，每一个中国人都预感到，一场更激烈的政治运动就要开展起来了。

本来，早从1965年开始，对于毒草电影的批判，就已经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后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连没有什么文化的底层人民，也预感到中国要出事了。出什么“事”呢？用老百姓的话说，那就是又要“运动”了。“运动”，就是要整倒一批人，把一批人打入地狱，再使另外的一些人飞黄腾达，然后老百姓还是过穷日子，只是心里感到距离进入天堂已经是又近了一步。

而这次的运动却比以往任何一场运动都来势凶猛，这次运动是朝着高层人士来的，更是冲着所有知识分子来的，所以，运动还没有开始，全社会就笼罩在了一片恐怖之中，谁也不知道这场运动将会触及到谁，谁也无法预料自己会不会

在这次运动中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只是屏住呼吸静观事态的发展，或者就是听天由命地等着灾难的降临。

516 通知下达之后不久，学生们就停课闹革命了，学生们闹革命，就是斗老师。在天津第一个闹起革命来的是耀华中学，耀华中学是天津的名牌中学，教育质量高，学校的设施更好，解放前是天津的一所贵族中学。这样的一所学校，肯定就是封资修的大本营，学校的教师自然也就是革命的对象了。我的一个弟弟，当时正在中学读书，一天晚上他没有按时回家。全家人紧张地一直等到夜半，最后当他回来时，人们发现他面色苍白，吓得几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全家人向他询问，他只是哆哆嗦嗦地乱比划，好不容易说出了几个字，家里人还以为他是说胡话。

“老师，老师，跪在地上，打打，拿木棍打……”

全家人顾不得再向这个弟弟询问，只得先安抚他不要害怕，第二天，不必再询问什么，各个学校都把老师拉到大街上，给每一个老师戴上一顶高高的纸帽子，让他们排成长队，还自己敲着破锣，学生们则扮作战士，穿着军装，用大木棍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了。

社会上，人们还不能理解文化大革命何以把老师当成了敌人，但学生们的革命激情却燃烧起来了，整个一个天津市，每条马路上，每时每刻都有学生们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被革命焕发起来的智慧是可爱的，学生们想出了一切办法丑化他们的老师，我看见过学生们在他们老师的身上糊满

旧报纸，旧报纸上写着他们老师的名字，再用红墨水在老师的名字上画个大大的十叉。我还看见有的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游街，让他们的老师每人拿一只破铜盆，老师们一面走着，一面敲着破铜盆，敲一下，自己喊一声：“我是修正主义分子谁谁谁，我是王八蛋！”学生们自然非常得意，但在在一旁观望的市民，却都是一副冷漠的面孔。

革命开始了。

看着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我最担心的就是哥哥的境况，哥哥在一所中学教书，多年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为培养学生也真是鞠躬尽瘁了，哥哥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谨小慎微，从来不多说少道，更不像我这样对什么事情总是要问个为什么。哥哥相信马列主义，更相信他的领导告知他的一切，从来没有怀疑过任何一家报纸的社论，而且他更是想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无论上面号召什么，他都是积极投入。1958年大炼钢铁，他在学校里自己筑起了一座土“高炉”，日日夜夜守在他的土“高炉”旁边，吃在炉边，睡在炉边，“钢”没有炼出来，人倒先病倒了，得了病他还不肯离开前线，后来发展为严重的心脏病，最后不到60岁，他就去世了。

忠心耿耿的哥哥当然不会犯任何错误，但在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肯定不会幸免于难。匆匆跑到哥哥家里，果然哥哥早就被打成牛鬼蛇神了。

也真是对于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了，怎么就发明了一个

牛鬼蛇神的词儿了呢？曾经有过地主、富农、还有反革命分子，胡风分子，好歹也有个指向。地主有土地，富农的日子过得比一般农民好，反革命分子要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或者杀人放火，右派说过反党的话，胡风分子，认识一个名字叫胡风的人，等等等等。那么，牛鬼蛇神又是一些什么人呢？说不清楚，也不需要说清楚，说牛鬼蛇神通要打倒，就把一切划为是牛鬼蛇神的人打倒在地，然后再踩上千万只臭脚。

何谓“牛鬼蛇神”？翻译成民间话语，就是过去常听人说的那句“这帮乌龟王八蛋”，对于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来说，一切反对自己的人，一切可能反对自己的人，一切看着就像是反对自己的人，统统都是“这帮乌龟王八蛋”，说得政治些，就是牛鬼蛇神了。

谨小慎微的哥哥何以被打成牛鬼蛇神了呢？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是一个教师。跑到哥哥家里，已经是入夜时分了，哥哥还没有回来。祖父和哥哥住在一起，疼爱大孙子的祖父告诉我说，哥哥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晚上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吓得就整夜不能入睡，祖父怕他出意外，只要他一回家，就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祖父担心哥哥经受不住学生对他的侮辱，更经受不住精神和肉体的折磨。

很晚很晚，才听见有人上楼的声音，脚步声是那样的沉重，祖父立即迎了过去，几乎是祖父搀扶着哥哥走上了楼来。

哥哥看见我向他迎过去，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用力地咬紧嘴唇，他怕哭出声音。

我怎么安慰哥哥呢？只能是扶他坐下，再给他送过一杯水，看他似是平静下来了，我才对他说：“坚强起来，你什么问题也没有，不要怕。”

哥哥还是咬着嘴唇向我点了点头，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又微微地闭上了眼睛。

哥哥内心的痛苦我是能够理解的，他忠心耿耿地在学校工作了几十年，而且全心全意地相信共产党，从来没有过一丝离心离德的念头；今天，突然他也成了革命的敌人，他于感情上实在是无法接受。我也能够想到，这样的人都非常脆弱，他们很可能选择极端的道路，他们只能在阳光下生活，他们没有能力经历劫难。

无论祖父和我怎样劝解，哥哥仍然不能平静，我就对哥哥说：“你不是没做什么坏事吗？你没做过坏事，而且你还好好地教了这许多年的书，光明磊落，他们把你当作牛鬼蛇神，这是他们的耻辱，越是这样越是要活得理直气壮。”心胸狭窄的哥不会接受我的劝解，他只是叹息着，疲惫不堪地坐在椅子上，微微地闭着眼睛。

直到很晚很晚，我们才劝着哥哥吃了一点东西，最后我又陪他回到他的房里，回到房里，突然哥哥放声地痛哭了起来，一面哭着，还一面对我说：“如果我有了一点意外，你一定要把你的侄子侄女抚养成人，教育他们热爱毛主席，教

育他们听党的话……”

是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无端地受到如此野蛮的凌辱，如此无端地受到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他怕自己没有能力活下去，但他还在想着教育自己的儿女热爱领袖，还教育自己的儿女听话。

一直到入夜，哥哥才似是安静了一些，他看着天时已经不早，就劝我也应该回家去了。我是下班之后直接到哥哥这里来的，家里一定担心我会出什么事情，因为妻子早就预感到我是逃不过这一场劫难的了，当然，妻子也知道我不会有任何意外。

从哥哥家里出来，大街上还挤着成千上万的人，电车已经不能行驶，每一条大街都是灯火辉煌，中国就像是过重大节日一般，每一个人、每一条马路、每一个窗口，都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激情。不知道多少高音喇叭在放送着歌唱领袖的歌曲，一队一队的游行队伍，在高声地喊着“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也就在一队队的游行人群中间，还走着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这些人被涂着黑脸，穿着纸糊的衣服，扛着中国传统祭祀死人的纸幡，游行的人们把一切可以敲击的响器拿了出来，大鼓，铜锣，而牛鬼蛇神们又每人一只脸盆，大家一起敲着、喊着、跳着，缓慢地走着。

一直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才走了不到一半的路程，一直走到天津最热闹的劝业场地带，那里正在开斗争会。就在马路的中间，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就和戏楼一般，上面

负面人生

还挂着横幅，台上高压水银灯亮如白昼。抬头向高台上看过去，一下子，我几乎吓呆了，满满地在台上跪着几十个人，听下面的人说，是斗争原来的一家财主，“劝业场就是他们家的”，老天津卫有名的高姓人家，跪在最前面的自然是这户人家的家长了，后面是他的儿女，男人们穿着西装，自然是被丑化了的，女人们则穿着那个时代早就绝迹的旗袍，最最让人不忍心看的，就是跪在成年人身后，还有几个孩子，看着最小的一个孩子，也就是三几岁的样子，他会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乖乖地跪在台上，听他身边的人喊口号，更有一个红卫兵抬起一条腿，把穿着军靴的脚，踩在孩子的头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台上台下，几万人同声地一齐高喊口号，那声音让人听着真是毛骨悚然。

台上的红卫兵小将们自然人人气宇轩昂，人人都是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抓着牛鬼蛇神的头发，抬起一只脚，踏在牛鬼蛇神的背上，大有革命成功的气概。而最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却是，围在台下看热闹的人们，许多人的眼里闪烁着兴奋的目光。看那神色，就像革命许诺给他们的美丽人生，今天已经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他们终于看到了敌人的可耻下场。

绕开热闹地区，我只能选择静些的小胡同走，小胡同里灯光很暗，人们都跑到热闹地方看革命去了，但走着走着，

就看见在黑暗处有两个黑影，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像是什么生命，可又看不清是什么物件，胆怯地向前走着，啊，我几乎吓得喊出了声来，原来那两个黑影是两个人，跪在那里，再走近些看，是两位老人，一男一女，明明是一对老夫妻，他们已经跪了很久很久，两个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几乎是瘫在了地上，让人不敢相信他们还有呼吸。

再向四周看看，这两位老人的身后，并没有任何人看守，红卫兵显然跑去看热闹去了，可怜的是这两位老人就在红卫兵离开他们的时候，也不敢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们还是跪在小黑胡同里，连一点声音也不敢出。

走过热闹的劝业场，再走进黑暗的小胡同，台上跪着的孩子，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一只大脚，更有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我似觉得自己正在地狱中穿行，中国，已经变得完全陌生了。

这一切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思考，我读的书不多，经历也不丰富，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很容易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只是一个平民，我只知道以自己的直觉感受世界，我不懂得什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也不需要站得高些、或者是看得远些，更不知道要去看什么深远意义，我就是看见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那只脚，我还看见了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

革命会使一些人吓得精神崩溃，但看见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反而变得镇定。革命总是要消灭一些人，如果说我曾

负面人生 经逃过了1955和1957两次劫难，那么1966年，对于我来说，将是太厉害了。一个孩子尚且被踏上一只脚，谨小慎微的哥哥尚且被打成牛鬼蛇神，一贯被认为立场反动的我，能逃过这一场革命吗？作好思想准备，我预感到一场大劫，正在等着我。

回到家里，妻子看我没有什么变化，舒了一口长气，然后才向我询问工厂里的革命情况，据妻子说，他们工厂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许多工程师被拉出来跪在大院里，造反派的英雄们，在工程师们的身后狠狠地踢他们。

没有说什么话，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去工厂的路上匆匆赶到哥哥家里，祖父告诉我说，后半夜大约3点，哥哥被红卫兵从家里拉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

五、革命初始

工厂里贴出了大字报：《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是死水一潭》看着社会上的革命热潮，富有革命热情的激进入士们已经坐不住了。革命自然要有对象，随之就有向我发难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本来，从农场回来之后，我在工厂里最是小谨慎，不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发表评论，让我做什么我就

低头去做什么，要想拿我开刀，我自认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的年代里，想从我这样的人身上找点什么罪名，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社会上闹起了革命，学生们斗争了老师，地富反坏右、反动资本家都受到了“冲击”，工厂里，“群众”的情绪一时时地高涨，工厂党委没有接到通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只好一旁看着，听天由命地等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1966年的8月26日，工厂里的革命终于暴发了，才一到工厂，就觉得情形不对，一些工人手持木棍站在工厂门口，就像是警卫一般，活像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当我走过工厂大门的时候，我看到持棒站岗的工人向我投射过来凶恶的目光。不光是我有了某种预感，工厂里每一个人都预感到今天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平日我走进工厂，人们还很随便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今天走进工厂，迎面走过来的人就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着我走路，人们连头也不敢抬，似是不敢看将死的人一样，人们害怕留下可怕的记忆。

难道今天真地要活活把我打死吗？

我做好了精神准备。

上班铃才响过，就像是刮起了狂风暴雨一般，安装在大院子里，安装在车间里的每一只大喇叭都放出了赞美领袖的革命歌曲，真地革命就要开始了。还没容我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人们呼喇喇地全往大院里跑，最先高举革

命大旗的英雄们正在工厂大院集合呢。

领头的的是一个工人，我认识，肤色极黑，没有文化，可能是因为出身好吧，就自觉地担任了领袖，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木棒，就是镐头的大木柄，一米多长，胳膊一般粗，一棒子就能打死一个人。可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战士们站成一列长队，胳膊上也佩着红臂章，每个人手里也都拿着大木棒，看着少说也有五六十人。这一些人站成一列长队，正听那个领袖喊话，远远的我听见领袖向他的战士们喊着说道：“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站起来的日子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去抄那些反革命的家，把他们的老窝砸碎，回来我们再收拾那些王八蛋们，牛鬼蛇神们听着，你们的末日到了。”

然后，这些人跳上一辆大卡车，一阵风，就开走了。

他们去砸谁的老窝呢？想都不去想他，即使他们去砸我的“老窝”，我也没有办法，因为抄家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刮起来了，每天都看见红卫兵们耀武扬威地抄牛鬼蛇神的家，一大车一大车的家具，衣物被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也有的当从焚烧，一团一团熊熊的大火就在街头上燃烧着，满街砸碎的器皿，据说都是封建时代的遗物，而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些东西的人，其实是梦想着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大约到中午时间，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了，同时还拉回来几汽车的旧家具，据说还有贵重的衣服，都是工厂里那些富

裕人家出身的人的东西，这些人虽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家庭比一般工人家庭要富裕，所以就成了这次革命的对象，再有的人过去是私方人员，还有的人家有历史“污点”，革命一来，就无一能够得以幸免了。

听看热闹的人回来说，好像没去抄我的家，因为我是思想反动，立场反动，这些反动的货色是带在身上的，是藏在脑袋瓜子里面的，去家里，很可能倒抄出著作来了，我不会把反动思想写在纸上、再贴在墙上的。

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之后，倒也没有别的任何行动，但工厂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人都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就要降临了。这场暴风骤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也不过就是社会上的那些做法吧，游街，当众罚跪，任由人们辱骂，逆来顺受吧，人人都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做好了精神准备，我不想反抗，也不敢反抗这场暴风骤雨。

我正在车间扫地，到这时候，我已经成为车间辅助工了，因为早从社会上一开始革命，就有人提出不能把生产指挥权交给一个右派，那时候有一部电影，说农村一个地主破坏生产，公社让他赶大车，他就狠命地打牲口，于是贫下中农说，要把赶车的鞭子从地主的手里夺过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也就不能再做什么生产管理员了，工厂的人事部门通知我当辅助工，我立即拿起大扫帚，打扫卫生了。

在车间里扫地，就看见许多人在外面贴大字报，把车间

外面的墙壁都贴满了，偷偷抬头向墙上看过去，许多大字报上都歪七竖八地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还打着红叉，名字下面写着“一定砸烂狗林希的狗头”之类的字，除了我之外，大字报还说要砸烂其它几个人的狗头，都是五类分子之类的人物，也点了工厂党委书记的名，问他为什么压制工人的革命热情。

我自然知道，这些大字报意味着革命风暴就要向我扑过来了，还是那句话，等着吧，如今已经是插翅难逃了。

午饭过后，工厂大院里就闹起来了，只听见人们在喊革命口号，也看见人们往大院里跑，我不敢出去看热闹，就蹲在车间角落里等着有人来抓我，果然，就在大院里的一片口号声中，几个工人闯到车间来，在角落里找到我，恶凶凶地向我吼道：“狗林希，出来！”

不敢违抗，连让我出去做什么都不敢问，我就跟着这几个人从车间里出来了，那几个人带我走到工厂大院，我心里突然烧起一种火焰，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像是一只被激怒的野兽，我几乎要发疯了。

黑压压，工厂大院里跪满了人，我看见跪在最前面的是总工程师，后面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技术人员，跪在院里也无所谓，外面革命的情况我也不是没看见过，最最无法接受的是，工人们想出最下流的作法，让每一个跪在院里的人，嘴里叼着一只臭鞋。

车间里，总是堆着一大堆臭鞋，也不知道是谁的鞋，干

脏活的时候，找来一双就穿上，穿过之后，就丢在车间里，日久天长，车间里总有一股臭味。如今揪牛鬼蛇神，真不知道是谁想出了这样一个下流的作法，把最脏最臭的鞋，给牛鬼蛇神们叨在嘴里，真也是恶毒到极点了。

还没容我想好在这种局面下应该如何办，早有人把一顶纸糊的帽子扣在了我的头上，我还没有挣扎，立即又有一个人过来，把一只臭鞋向我举了过来：“叼上！”

“叼上！叼上！”疯狂的人们一起喊叫着，不知道是多少只拳头向我挥着。

立即，那只臭鞋已经塞到了我的嘴边，一股恶臭呛得人不敢呼吸，紧紧地咬着牙关，我就是不肯张开嘴巴，似是我的举动激怒了革命群众，那个拿臭鞋的人，突然一使劲，把那只臭鞋压在了我的嘴巴上。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时我是从哪里来的一股邪劲，在众人的揪扯下，我用力地挣扎出来，向着围着我的人群，我大声地说道：“无论我有什么罪，国家有法律，我接受国家法律的制裁。”

人们没有想到会有人不服从他们的侮辱，我的反抗使人们变得疯狂了，立即就出来一个人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右派分子？”

“曾经是过！”我冷静地回答说。

“你是不是反革命？”那个人又向我问着。

“我不是。”我还是冷静地回答着。

“让他叼上！”人们自然不会和我多费唇舌，又有人向我喊了起来。

我当然还是不肯叼那只臭鞋，就在我躲闪的时候，人群中有人喊了起来：“打死他！”突然，就像是天黑下来一样，我只感觉到有人在我的头上狠狠地砸了一拳，呼喇喇不知道多少人就向我涌了过来，我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一下就被打倒的，也不记得头上挨了多少拳，身上又挨了多少脚。我只听见人们喊叫着，只觉得似是有一股狂风滚动在我的身下，我被人们踢过来，又被人们踢过去，世界变成一团黑暗，我听不清人们在喊着什么，也感觉不到人们在怎样打我，又是怎样踢我。

不知道是多少只脚踩在我的头上，也不知道是多少只脚在踢我，又是多少只拳头在狠狠地打我，我似是也感觉到有人抡起木棍向我的后背打了下来。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也没有时间想我会不会就这样被他们打死，更没有去想这场野蛮的拳打脚踢要到什么时候结束。

据说，工人们兴奋了，多少年之后，一位好朋友告诉我说，在我被打的时候，从工厂各处不知道有多少人疯狂地往大院里跑，人们一面跑还一面喊叫：“打便宜人去呀！”那位朋友看到这一切，他说至少有上千人围着打我，外面的人打不着我，就使劲往里面挤，从里面打够了我的人被挤出来，我的朋友告诉我说，那些人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的光芒。

打人，可以让人的血液沸腾，而把一个人活活地打死，更会让人变得疯狂。工厂里的人们，也就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平时看着如我这样的人斯斯文文，心里就老大的不舒服，今天我被人们踩在脚下，可以活活地打死，他们心中的兴奋是可以想象的。这场革命所以能够在几天的时间里把群众“发动”起来，就是先激起人们的疯狂，那些在老师们面前规规矩矩的孩子，那些不堪承受功课之苦的学生，那些对老师每天的训斥早就怀恨在心的少年，一旦有了可以任意辱骂和折磨老师的权利，立即他们就会卷起一股狂潮，一场空前野蛮的革命，就一日之间开始了。

被踩在众人的脚下，更被愤怒的人们踢得滚过来、滚过去，我几乎已经失去了知觉，这时，我真地有一种死的预感，如果不出现奇迹，人们不会停手，而此时此际，在中国打死一个人，或者说是打死一个知识分子，那就和随便打死一只苍蝇一样，不会有人追究任何责任的。不光是没有责任，还要受到赞赏，因为他打死了一个敌人，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那就是：“要铲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就在我躺在地上等着被人活活打死的时候，突然人们停住了手，我身上也觉得再没有人踢我了，停了一会儿，就听见有一个人向我大声地喊着：“狗林希，你怎么敢和革命群众对抗，把他揪起来！革命的同志们，我们一定不要上狗林希的当，他想打乱我们革命前进的步伐，我们坚决不答应。革命的同志们，你们把狗林希交给我们，我们一定把他治得

服服帖帖！”

就在这位工人向大家说话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人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了。遭到人们的毒打之后，当时我几乎没有疼痛的感觉，就是觉得全身的皮肤发胀，头也重得抬不起来，努力睁开眼睛，又什么也看不清楚，我想象一定是被打得全身是伤了。凭直觉，我听出向人们说话的人是一位车间的老工人，他因为出身好，在车间里一直是政治骨干，在刚刚结束的四清运动中，他是车间的领导成员，也是车间党支部的委员。这位老工人一直是车间的政治核心骨干，但他对我一直很好，虽然也不说什么同情的话，但他从来不和我为难。可能是他看见我已经被人们毒打得几乎就要失去知觉了，不能出面搭救我，就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出来解救我，但他不能为我开脱，就说是带我回车间去“狠狠地收拾”我，而且还一定要把我治得服报帖帖。

众人只顾着打我，把满院的牛鬼蛇神丢在一边了，不把我交代一个地方，革命已经无法进行了，这位老工人来的正是时候，大院里的革命群众就让老工人把我带走了，他们还有革命使命要完成呢。

跟在老工人的后面，拖着重重的脚步，我走回了车间，这时，老工人把我带到车间后面的一间小黑房里，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然后自然是恶凶凶地对我说：“林希，你听着，你和革命群众对抗，绝对没有好下场，只有低头认罪，才是你惟一的出路。”

说过，老工人就把我扔在小黑房里，又把房门从外面锁上，还留了一个青年人在房外看守，然后他就离开了小黑房。

是这位老工人救了我一条命，如果不是他出来解救，就是人们不把我打死，也会把我打成残废。被关在小黑房里，我依着墙，这时才有了疼痛的感觉，腰部被他们狠狠地踢过，从后背到尾骨，疼得难以忍受，肩膀也疼，腿也疼，头发被他们揪得更疼。看看胳膊、看看腿，胳膊、腿上好几处地方已经踢得又红又紫，至于看不到的地方，那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样了。

这时，我的脑袋空荡荡的，什么想法也没有，我只想喝水。

六、祸从天降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不到半年的时间，我才结婚，有了一个家庭，妻子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甘心和我过苦日子，而且绝不嫌弃我的右派身份和胡风分子的可怕政治背景。在我建立小家庭的时候，我也只是以为大的政治风暴可能已经过去了，从今之后，只要自己老老实实地出卖劳动力，养家活命总还是可以的吧？但谁也没有想到，紧跟在一切政治运

负面人生 动后面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场浩劫，它把整个的一个中国推开了灾难的深渊，除了“四人帮”那几个败类之外，几乎无一人得以幸免。

早在工厂还没有开展运动之前，妻子就嘱咐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也一定要逆来顺受，万不可犯“混”脾气，要知道你已经是有家的人了，而且这时妻子已经怀孕四个月，进入8月以来，妊娠反应越来越厉害，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妻子已经就要支持不住了。

但，政治无情，文化大革命一定要进行到底，早在我被打成牛鬼蛇神之前，她在工厂里就已经被视为是反革命家属，每天下班之后，除了参加大家都得参加的政治学习之外，妻子还要再集中到一个地方去参加反革命家属的学习。这样，每天她从工厂回来，总要到很晚很晚，有时候，马路上开批斗会，电车不能行驶，她还要步行15公里，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妻子为我受的劫难，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8月26日夜晚，妻子又很晚很晚才回到家来，一直等到入夜12点，还不见我的踪影，她估计我在外面“出事”了，虽然一点东西也吃不下，但想到第二天还要上班，更想到才怀孕4个月的孩子，强迫着吃了一点点东西，然后和衣倒下，更是强迫自己睡一小会儿。第二天，她又去工厂上班，心里乱乱糟糟地挨过一天，晚上参加过各种各样的学习，再回到家来，还是没有我一点消息。这时妻子真是坐不住了，想去打听打听我的下落，可是找谁去打听呢？向工厂里打个电话？那就更不

可能了,谁会在电话里告诉她我的情况呢?在疯狂的年代里,一切正常的想法都是疯狂的,强迫自己安静下来,她勉强休息一会儿,第二天早晨,早早地还要往工厂跑。

在万分的焦虑中度过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期间,有两天的时间下着滂沱大雨,晚上从工厂回来,又没有电车,妻子是淌着满街的水,顶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回家来的,就是在大雨中,还不时地有游街的队列走过来,妻子说,看着那些被大雨淋得全身湿透了的牛鬼蛇神,再听那些革命群众的喊叫声,真和穿行在阴间一样,本来就胆小的妻子,一路走着,已经就怕得魂不付体,回到家来,又得不到我消息,一个怀着身孕的女人,活在那样的时代,才真是最大的不幸了。

终于到了公休日,妻子来到工厂,想打听我的消息,她走到工厂大院门外,往里看,工厂院子很深,什么也看不到,再往里面望望,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我的名字,还画着红叉叉,妻子当然能够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妻子不是来打听我是不是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妻子只是想知道我是不是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等了好长时间,也从大院走过来几个人,妻子想走上前去问一声,但人们看见工厂门外形迹可疑的人,便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谁也不敢多说一句话,还没容妻子向他们询问,人们便匆匆地跑开了。

据妻子后来对我说,去工厂的路上,她的心情还万分紧张,她害怕看见什么可怕景象,到了工厂大门外,看里面

负面人生 倒还平静，也听不见斗人、打人的声音，渐渐地她才平静下来，再远远地看看大字报，她料定我还活着。按照她的经验，她们工厂里有人经受不住折磨，自杀了，但革命群众不但没有被一个反革命分子的自杀吓着，反而就在尸体旁边开批判大会，还满工厂贴大字报，“什么什么人死有余辜”。妻子在工厂门外看看，大字报上写着：“狗林希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如此，她才感到万分欣慰，我还活着，而且还没有“投降”。

在工厂门外看了好半天时间，妻子绕路到一位姑妈家去看看，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一直没有到姑妈家去过，姑妈家只有两位老人，惟一的儿子——我的表哥，也是右派，在北京郊外一家金矿劳动改造，估计他可能和我一样，又“出事”了。妻子说，听听表哥的情况，也可以猜测我的情况了。

走了好长的路，妻子已经很累很累，好不容易来到姑妈家，一进门，还没容妻子向姑妈询问表哥的情况，姑妈倒先向妻子问道：“你也知道了？”

妻子自然非常诧异，便向姑妈问道：“我知道什么了？”

妻子后来对我说，也许是姑妈当时已经精神失常了，也没有向妻子多说任何话，当即姑妈就对妻子说：“你表哥没有了。”

一时之间，妻子没有听明白姑妈这句话的含意，便还向姑妈问道：“怎么就没有了？”

姑妈冷冷地对妻子说：“死了！”

一下子，妻子几乎昏了过去，后来她对我说，那时候就像是天塌下来了一样，她的眼前一片漆黑。

“你到后面院子里看看去吧，你表哥的尸体就‘停’在那里了。”独生子的突然死亡，使姑妈失去了理智，永远也无法解释，她为什么要让我的妻子去看她儿子的尸体。

妻子后来对我说，当时她也似是变得麻木了，也不想看了表哥的尸体会给她怎样的刺激，麻木地她就向后院走了过去，及至走进姑妈家的小后院，就看见院里的木板床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一条白被单，想来那一定是表哥的尸体了。

妻子说，她一下就懵了。

没敢再往前走，妻子回到姑妈房里，妻子后来对我说，她也没有说一句安慰姑妈的话，反倒告诉姑妈说：“林希也多少日子没有消息了。”

姑妈没有回答任何话，突然双手捂往脸，姑妈放声地大哭了起来。

突发的事件，使人们的神经完全错位了，人们几乎不知道应该说什么话，更不知道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悲痛。

很晚很晚，妻子才从姑妈家回来，那一夜妻子一点也没有睡着，而且一连多少天，妻子也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姑妈家小后院里躺着的表哥的尸体，一闭上眼睛，她就几乎吓得失去了知觉。直到多少年过去，就是到了现在，妻子还常常从梦中大叫一声醒来，而且从此妻子变得胆小，看

见什么都怕，有时候会怕得大声惊叫。

我们自幼生活在大家庭中，不仅是亲兄弟姐妹间感情极深，就是表兄弟、表姐妹之间，也非常要好。就是我的这位表哥，他比我长一岁，我们两个人小时候形影不离，从早到晚在一起，直到后来我去唐山，我们分开，就是这样，每次我从外地回来，在天津住多少日子，我们就在一起呆多少时间。

表哥家姓郭，自幼努力读书，不似我这样心猿意马地总想着早早地出人头地，表哥就知道安心读书，从小学、到中学，在小弟兄间，他的学习成绩最好，我们这一茬小弟兄，无论谁在学习上有了难题，都去找他，只要一找到他，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明白的难题，表哥几句话，就使我们豁然开朗了，表哥在我们这茬小弟兄之间，威信极高，长辈们也说，将来表哥一定是最有出息的一个。

高中毕业之后，表哥以优异的成绩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北京工业学院是一所重点大学，造就军事工业人才，表哥又是优等学生，在学校里进步很快，成了学校团的干部，应该说，光明的前途已经向表哥展开了。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1957年的一场反右运动，把表哥打成了右派，表哥和姑妈都是爱面子的人，他被打成右派的事，一直到他被学校开除出来，放到矿上去劳动改造，我们才知道他出了“事”，也就在这同时，我被送进了农场，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几次面。

1964年，我从农场顶着右派帽子回来，春节的时候，在姑妈家见到了表哥，这时他已经摘掉右派帽子了，正在金矿上做技术工作，我看到他的笔记本，那上面记载着的内容，我一点也看不懂，我只是看出他的工作很有成效，更看出他工作的努力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表哥和我虽然同是右派，但我们从来没有表露过对于反右运动的不满，表哥更是非常严肃地向我说，这些年的劳动改造，使他在各方面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他更是对我说，过去我们都是吃了骄傲的亏，其实我们个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只有到劳动人民中改造自己，才知道个人的力量原来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经历过劳动改造，表哥从心里认识到了自己曾经犯过的严重错误，从感情上他有一种重新做人的动力，他绝对不似我这样，从感情上就不接受反右运动对我的“批判”，反右运动给我定的罪行，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反胡风运动中我受到株连，又因为那时候我年龄太小，无法给我定太重的“罪”，更不能逮捕我，正好有一场反右运动，顺理成章，就把我打成右派了。

表哥的被打成右派，只是因为他的学习成绩太好，更是因为他对革命和领袖的无限忠诚，其实在大鸣大放时，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也没有任何右派言论，或者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向党进攻，一个学理工的学生能够懂得多少政治呢？但到底他没能逃出那一场劫难，由此，也就毁了他的一生。

据姑妈后来对我说，就是在我被关押在工厂的第二天，8月27日晚上，姑妈正在家里做什么，就听见外面有人问：“郭家是住在这里吗？”姑妈闻声迎了出来，只看见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姑妈说，谁也没有料到是她的儿子出了“事儿”，明明就看见门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大汽车，可是谁会想到就在那辆大卡车上“停”着她独生儿子的尸体呢？

姑妈把陌生人迎到房里，这时陌生人向姑妈介绍自己说是北京金矿上的人。姑妈想，可能是儿子最近不能回家，有事情让人给家里送个信儿来，就还客气地给陌生人送茶，还问陌生人吃过饭没有。

坐了一会儿，姑妈向陌生人问是不是儿子有什么事情要告诉家里，或者是向家里要什么东西？这时，陌生人停了一会儿，慢慢地对姑妈说：“你的儿子在矿上出了一点事，矿上派我来给家里送信。”

“哦。”姑妈答应了一声，心想儿子会出什么事呢？他的右派帽子早就摘掉了，文化大革命么，不是人人都要受教育吗？

“矿上的领导嘱咐我说，见到您之后，一定要先安慰您冷静。”矿上来的人还对姑妈说。

“璿，在外面工作，有什么好冷静的？”姑妈对矿上来的人说。

“这件事情很严重，您一定要冷静。”矿上来的人还是对姑妈说着。

这时，姑妈已经感到情况有点不对了，但无论怎样，姑妈也不会想到她的儿子“没有”了。

“有什么事情你们说吧，他不就是五七年那点事吗？再严重还能严重到哪儿去？”姑妈也是严肃地对矿上来的人说。

“事情比您想的还要严重，你的儿子自杀了。”

后来姑妈对我说，当时，她似是什么也没有听见，看了看矿上来的人，姑妈什么话也没说，就是呆呆地坐了好长好长的时间，似是从梦里醒过来之后，姑妈才向矿上来的人问道：“你说什么？”

但是，没有等矿上来的人回答姑妈的询问，眼前一片漆黑，姑妈已经昏倒过去了。

等姑妈醒过来之后，表哥的尸体已经从大汽车上抬到了后院，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院里放好一对床板，就把表哥的尸体“停”放在床板上了。

见到我，姑妈放声痛哭，一面哭着还一面泣诉着：“这是谁做的孽呀，我就这么一个儿子，他惹了你们谁了呀，你们就不让他活下去了呀。”

看着姑妈哭得几乎要昏过去，我只好在一旁劝解，表哥和我一起长大，又一起蒙冤，我心间的悲痛绝不比姑妈轻多少，只是，这时我哭不出来，我只是觉得心上压着一块重石，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了。

劝说了好长时间，姑妈才终于有了平静说话的能力，这

负面人生

时候姑妈告诉我说，据矿上来的人说，表哥本来没受什么“冲击”，也没有他的大字报，他在化验室工作，每天晚上就在化验室“学习”著作，表现上也没有什么问题。他自杀的那天晚上，才开过一个批斗会，是批斗一个领导干部，在揭发到这个领导干部重用资产阶级技术权威的时候，愤怒的群众再也捺不住愤怒的感情，一些人为触及这位领导干部的灵魂，就动手打了他，偏偏不巧就把胳膊扭伤了，也不是多重的伤，送到医院打了石膏。很晚很晚，这位骨折的领导干部从医院回来，正遇见我的这位表哥，平时他两人的关系很好，这位领导干部也没和我的这位表哥说任何话，我的表哥回到化验室，不多时人们就听见从化验室里传出来一声喊叫，一声很怕人很怕人的喊叫，人们闻声跑过去，推开化验室的门，就看见我的这位表哥倒在地上，嘴角上有一丝血渍，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就这样，表哥在绝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表哥的死，不仅对于姑妈家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就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亲戚朋友，也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多少年的时间，人们总是回避提到表哥的事，就像是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人似地，只有在后来姑妈去世的时候，人们才说起姑妈的可怜，她惟一的儿子早在她去世之前，就离开她了，只留下一个孤单的姑妈，还给她留下那样可怕的记忆。

祸从天降，一个家庭就这样被毁掉了。表哥的死使妻子受到可怕刺激，多少年过去，妻子都无法从那次可怕的记忆

中清醒过来，妻子说就连我们的孩子从生下来看见什么都怕，也是妻子受了那次刺激的原因，到底我们三口人都还没有留下太重的影响，为此我感到万幸。

七、过“热堂”

“正确对待群众”，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视为是一个最重要的态度问题，而且惟有正确对待群众的人，才有可能在运动中受到应有的教育，从而也才能经受运动的考验，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向前；再至于牛鬼蛇神，那就更要正确对待群众了，不能正确对待群众，牛鬼蛇神就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还被告知，群众是通情达理的，而且群众一定能够自己教育自己，任何人都不要说三道四，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首先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能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文化大革命能不能取得胜利，关键在于群众是否发动了起来，因为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非常幼稚可笑的。

果然，通情达理的群众就在运动中发明了许多革命创举，最先是喷气式，在批斗牛鬼蛇神时，由四个壮汉从背后扭住牛鬼蛇神的胳膊，再把牛鬼蛇神狠狠地往下压，看着就

负面人生 和喷气式飞机一样，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群众誓死保卫的决心，也才能表现出群众对于牛鬼蛇神的仇恨。

坐喷气式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在工厂里看到过群众给机械局的一位老干部坐喷气式，四个壮汉揪着他从工厂大院走过，还没有走进会场，这位老干部就几乎失去知觉了。当然斗争大会还要召开，就看着四个壮汉似拉一只麻袋一样把这位老干部拉进了会场，然后就是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走资派。”

社会上斗走资派，再毒恶也还是没有打死过人，喷气式之外，还要挂牌子，是一块大木牌，用绳子吊在脖子上，更野蛮的作法，在大木牌下面坠上一块砖头，我看见过有坠三块砖头的，以作为群众对他们不走革命路线的惩罚，但到底走资派是内部矛盾，对于敌我矛盾的牛鬼蛇神，就更不客气了。

在工厂里，革命群众把批斗我，叫做是过热堂。封建社会，对于公堂上动用刑具拷打罪犯，叫做是过热堂，此中还不包括打板子，打板子是必须的审案程序，不打板子，岂不就“请客吃饭”了吗？更何况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的行动，如今对牛鬼蛇神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不能“温良恭俭让”了。

在工厂里，我可能是第一个过热堂的阶级敌人，因为在揪牛鬼蛇神的第一天，我和革命群众对抗，最后是车间老工人把我救了出来，我才没有被愤怒的革命群众活活打死。在

小黑房里关了好几天，除了白天在大院里扫地之外，革命群众也没有对我采取行动，但我知道革命群众是不会轻放过我的，在这期间，将我救出来的那位老工人还以车间领导的身份和我谈过话，那位老工人说，我们把你救出来，只是出于革命的人道主义，一点也不是我们对你的同情。你的反革命罪行，你自己应该负责，只有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你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宽大处理，否则一切后果只能由你自己负责了。

老工人的谈话，我自然能够理解，他暗示我再也不能和革命群众对立了。我当然也知道此时此刻的形势，拿鸡蛋往石头上撞，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别人可以忍受的一切我也可以忍受，不就是“低头认罪”吗？别人怎么低头认罪，我就如何低头认罪好了，以我的反革命“罪行”，总不至于判处死刑吧。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说，革命群众开始要给阶级敌人过热堂了。我当然预料到这一场劫难，我是逃不脱的了，再不想和什么人对抗，我做好了思想准备，只等着给我过热堂了。也就在这时候，以老工人为首的车间领导也被革命群众打倒了，因为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造反派起来夺得了革命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朝着更革命的方向发展了。

一天下午，我被几个小青年从车间叫出去，他们通知我说，过一会儿要对我进行批判斗争。远远地站在我被看管的

负面人生 地方，就看见车间里已经挤满了人，还拉上了大标语，远远看过去，气氛非常紧张，看得出来，今天是要给我过热堂了。

在车间外面等了一会儿，显然里面在向人们做什么布置。没有过多少时间，突然从车间里传出一声大喊：“把狗林希押上来！”声音未落，冷不防有人从背后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毫无准备，一下子我就被踢倒了。没容我站起来，背后的四个壮汉两个人扭着我的胳膊，两个人揪着我的头发，他们大步地向前跑，我弓着身子跑不动，活像是拉一只死猪，身子倒在地上，四个人就把我拽到车间里来了。

“打倒狗林希！”一片口号声中，我被扔在地上，没容我从地上爬起来，就觉得黑压压地一群人扑了过来，不知道多少只脚，就从四面八方踢了过来，更有人狠狠地用脚踩着我的心，踩得我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不知道被踢、被打了多长时间，似是终于人们散开了，这时又上来几个人把我拉起来，向下按着我的脑袋，又有人扭着我的胳膊，喷气式，革命群众开始对我进行揭发批判。

我根本就听不见人们向我喊了些什么，也不外就是辱骂呗，有人问我是不是反革命？还有人问我是不是混蛋？我只有点头，还有人要我重复革命群众骂我的话，我就只能自己骂自己说：“我是混蛋。我是反革命。”

也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原以为众人把我毒打一通之后，下面就是揭发批判了。我们自己往往真是幼稚可笑的，就在

几个人揭发批判之后，又走上来几个人，领头的一个向我问了一句：“狗林希，革命群众对你的揭发批判你听见了没有？”当然，我只能回答说“听见了。”但是，我的话音未落，这几个壮汉就向我喊叫着说：“你听见个屁！”忽一下，几个人同时举起了拳头，狠狠地向我打了过来，我来不及躲闪，也没有地方躲闪，几拳落下来，我就流出了鼻血，眼前只是一片黑暗。

过“热堂”的记忆，我终生不会忘记。今天许多人早已经忘记了那一场“革命”，更有一些年青人对于那一场革命毫无兴趣，我也常常听到有的年青人说：“总提那档子事儿干什么呀？”是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一场革命并不可悲，而忘掉那一场革命才真是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

打过我的那些人，我永远不会忘掉。你会忘记打过你一记耳光的人吗？而且，他打你耳光，并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过错，他打你耳光，就是因为他有打你的权力，打得好玩，打得解气。打过你之后，他们凑到一起还在论说谁打得狠，更会有人炫耀自己那一脚踢得多么重，又踢得多么是地方，然后他们再一起策划，下一次踢什么地方，下一次把他打到何等的程度，善良的人们，你会忘记这一切吗？如果你忘记了这一切，那就是你已经不再善良了。

过热堂，我不是最厉害的一个。

牛鬼蛇神白天劳动，晚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揭发批判之后，再回到牛棚来睡觉。有的牛鬼蛇神被拉出去之

负面人生 后，整夜不放回来，夜静之后，就听见远远传来群众喊口号的声音，也能听到牛鬼蛇神过“热堂”的惨叫声。

我虽然罪大恶极，但在工厂里我没有“民愤”，我是胡风分子，还是右派，我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关老百姓的什么事？打我的人，有两层原因，一种原因是打人好玩，天津人说的那种打便宜人，的确机会不会总有，第二种原因，就是可怕的嫉妒心理，他们出身贫穷，没有上过学，平时看着我斯斯文文，成了反面教员还一副学生模样，读过好多书，还会外语，他们心理上承受不了，今天我终于落到革命群众手里，他们怎么会轻放过我呢？但这些人打我，总还不敢下狠手，打我不得民心，给我过热堂的时候，我注意看到，许多善良的工人，更有许多女工，都远远地躲开，没有人上来帮着打，打过我之后，他们虽然很得意，但回到家里，他们的妻子会骂他们臭王八蛋，下次他们也就不敢下手了。

牛鬼蛇神之中，确实有些人民愤大。什么人有人民愤？技术强，得领导赏识，手中还有一点小小的权力，譬如给人们长工资呀，调动工作呀，他都说了算。偏偏他还有点什么问题，譬如参加过反动组织呀，开过小工厂呀，都是革命对象，如今落到革命群众手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真有过热堂时被打得遍体鳞伤的。

一位姓陈的车间主任，平时对工人要求得十分苛刻，长工资、定工级、评模范都有名额限制，不可能皆大欢喜，自然就得罪了許多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有人揭发他原来在

东北的时候参加过什么组织，立即，他被打成特务，也被哄进了牛棚。

革命群众给这位陈主任过热堂，可真是下了毒手了，每次陈主任过热堂回来，都似死了一般，倒在地上好长时间苏醒不过来。牛鬼蛇神自然不敢过去询问，因为牛棚都开着观察洞，有人在外面随时观察里面的动静。过好长时间陈主任醒过来，头一件事，就是找人给他点上一支烟，他连划火柴的力量都没有了。

据说，给陈主任过热堂，工人们还不敢亲自下手，因为人们还顾虑万一日后陈主任官复原职，他们就更休想长工资了。给陈主任过热堂，工人们只揭发陈主任的罪行，而动手打人的，却是从附近学校请来的革命小将，小将们打人打痒了手，还有种种足以制报敌人的手段，他们更要在陈主任的身上试验种种酷刑，如此，没过几次热堂，陈主任就支持不住了。有一次他请我代他写交代材料，交代材料中他承认自己是国民党特务，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蒋介石找他谈话，布置他潜伏下来，找机会把天安门炸掉，还要他刺杀人民领袖。他要求革命群众对他严惩，请求公安局给他定罪，他自己认为，他的罪行应该枪毙。

陈主任过热堂时所受的磨难，是令人发止的，学生们用橡皮鞭子蘸了水打他，让他长时间地跪在地上，用上千瓦的灯泡烤他，一切一切都是学生们从革命小说里学来的手段。学生们打过陈主任之后，工人们请他们去食堂吃一餐夜班

负面人生 饭，两只馒头，一碗夜班的营养菜，不收钱，只收4两粮票。

过热堂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野蛮手段，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机关使用这种手段折磨过共产党人，解放之后，废除肉刑，就是对待刑事犯罪，也不许动用刑具，再也没有过热堂的一说了。许多青年教育读物，在写共产党党员英勇不屈的时候，描写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动用私刑的细节，青年学生于接受正面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负面教育，如今要他们制服阶级敌人，顺理成章，他们也动用刑具，给阶级敌人过热堂了。

过热堂的背后，是咬牙切齿的仇恨，进入1966年，新中国建立已经超过25年，旧的仇恨应该说已经消除了，而新的仇恨又是自何而来的呢？就说给我过热堂的那些人，他们对我的仇恨是煽动起来的，这许多年的教育一直在告诉人们有一些人对于亡国共产极不甘心，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出来兴风作浪，而他们兴风作浪的目的，就是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想重新骑在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又有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恐怖神话，于是一种要严惩敌人的欲望就萌生在许多人的心间，如今革命把惩罚敌人的权力交给了革命的基本群众，动用私刑，给敌人过热堂就成了一种享乐。这就和猫儿捉到老鼠一样，先要尽享胜利者的欢乐，最后再把它吃掉。

惩罚阶级敌人使许多人血液沸腾，给阶级敌人过热堂，

更使许多平日萎靡不振的人精神焕发，许多人在贫穷的日子里终于看到了希望，他们幻想革命胜利之后，他们就要过上幸福生活了。只要在运动中有好表现，他们就可以升任科长，就可以长一级工资，尽管一级工资的级差是8元钱，但就是这8元钱，也要等好几年的时间。如今总算有了希望，只要你对阶级敌人有仇恨，在批斗阶级敌人时有好表现，说不定，你就可以得到那盼望多年、而又一直没有得到手的8元钱。革命就在长一级工资，批准入党的诱惑下，把群众“动员”起来了。

也许过热堂的记忆过于残酷，但，善良的人珍留下历史的创伤，为了告诫后人不要重演历史的悲剧：历史不会留下空白，更不会留下无法解读的谜团，也许历史缺少光明，但越过历史的黑暗，便有永远的光明。

八、恩 怨

如果不是1966年的这一场浩劫，天津作协大院里的恩恩怨怨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坏事变好事，虽然于道理上未必就讲得通，但是有时候，譬如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还说不定就会出现奇迹，本来无法变成好事的坏事，还真就鬼使神差地会变一次好事，而且一变还就变得出乎人

负面人生 的意料之外，就是你想变得这样好，你都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从1956年到1966年，正好是十年的时间，天津文学界在反胡风运动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又进行了好几次大的斗争，一位当年在反胡风运动中有过不俗表现的青年理论家，没过多少日子就被定为是右派分子了，他最要好的朋友，就象他当年在反胡风时的表现那样，在报上发表文章，题目就叫《某某的灵魂已死》，读得我全身发冷。人和人之间，何以就如此冷酷？明明他们两个人是最要好的朋友，就连两个人的家庭，也是最要好的家庭，忽然一夜之间，其中的一个就灵魂死了，而另一个的灵魂却还活着。反右斗争过去不久，又来了一个反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天津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出了两个，一个是电影《白毛女》的改编者，杨润身，另一个是王昌定，到这时，天津再加上一个丁、陈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柳溪，那已经就是洪洞县里没好人了。

也是贼心不死吧，我于在工厂惨遭“革命”之时，竟然还对社会上的革命有着颇为浓厚的兴趣，因为我总是想看看，到底还有谁和我一样，也一起被革命了。自己落入地狱，就想在地狱里认出一个熟人来，也算是寻找一点心理平衡吧。

当然，这时候地狱里的人已经是太多了，可是看着看着总还是觉得少了一个人，少的这个人是谁？也说不清；但

是，有一天，我整天高兴地发现，这个人找到了，原来就是方纪。

方纪在天津，每次运动都把他列为是重点人物，反胡风的时候，他首当其冲，是他把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拿到他当时负责的《天津日报》来发表的，后来他虽然逃脱了出来，但也还是受到了警告处分。反右斗争，他又是重点人物，他写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早就被列为是右派作品了，但也是他又一次地“滑”了过来，他把他的好友鲍昌定为右派分子之后，他也就平安地被保护下来了。只是斗争过去之后不久，他又写了一篇《来访者》，这一次他惹下的祸，那已经是任何人也爱莫能助了。报纸上发表了批评文章之后，当时他正在南方，天津市委的一封电报把他召回来，立即就把他关在了家里，让他反省。好不容易他又逃过了反击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后来又来了四清运动，这时，方纪似乎开始成熟了，他下到农村，从此就只写些莺歌燕舞的文章了。

而此时到了文化大革命，方纪，你还想往哪里逃呢？这不是我的话，这是我在街头看到的大字报，那上面就写着这样的话。但是，革命群众没有找到方纪，方纪躲到北京去了。

然而，就是在周扬被定为是文艺黑线头子之后，方纪也被革命群众从北京揪回来了，在街上，我看到了方纪被斗的大字报，那上面揭发着方纪的种种罪行，一桩桩，也算是罄

负面人生 竹难书了。大家都要挨革命么，方纪也不能例外，触及灵魂也罢、触及皮肉也罢，大字报上揭发，方纪自己有自知之明，他说他这次不死也是要脱层皮的。

中国文艺界同归于尽的结局，使我在经历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生活磨难之后，得到了一点心理满足；幸灾乐祸，中国的知识人已经习惯于看着他人蒙难，而自己无动于衷了。最先自然是方纪看着胡风蒙难无动于衷的，甚至是以胜利者的感觉很是有了些表现；后来到了反右斗争，又是一些人以胜利者的身份斗争倒了另一些人。每次运动都是清除了一些人，而使另一些人由此而青云直上。最成功的范例，当推文痞姚文元；他就是由打倒一个，再打倒一个而自己一步一步地得到赏识的；如果不是四人帮最后的全军覆没，姚文元不正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吗？

那么，命中注定一辈子也做不成姚文元的人，他们最大的生活乐趣，就是看着想做姚文元而没有做成姚文元的人，最后落到和自己一样下场的结局了。说老实话，当吴晗先生最初被点名批判的时候，谁又对这位老左派有过一点同情之心呢？不要总革别人的命了，自己也尝尝挨革命的滋味吧。哀莫大于心死，中国的知识分子早已经对于同类没有一点同情之心了。

回忆起来，这种心态十分可耻，但确实确实，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理活动，让整人的人也尝尝挨整的滋味，也许日后，他们就不整人了。总是有人希望自己能够幸运地逃过

一切灾难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哲学，使他们在迫害面前，失去了自卫的能力。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高尔基，高尔基于革命之后，看到大批知识分子蒙受不白之冤的时候，还敢于上书列宁，申诉自己的意见，由此才引出了列宁“走出象牙之塔”的名言；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人敢于说一句真话，大家都隔岸观火，到后来竟然是到了此岸观火的地步，再不同归于尽，也实在是没有天理了。

但到底我们是有一些文化修养的人，而同情心又是文化最起码的起点，人类不仅会同情同类所蒙受的灾难，人类还会同情动物所蒙受的灾难；我的对于方纪的同情，是在电视上看到他戴着手铐脚镣，而被“押”上台来，惨遭毒打的镜头之后才产生出来的。从当时我那一点可怜的觉悟来说，我也认为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错误，更何况掌握“思想”又是这样难，谁会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呢？但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就要戴上手铐脚镣，就要惨遭毒打，我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纯洁性了。

那时候刚刚有了电视台，每星期试播一次电视节目，电视机还远没有为民间所拥有；看批斗方纪的现场直播，我所在的那个工厂也不知从哪里借来了十几台电视机，放在大食堂的各个地方，全工厂的人都一起收看。本来，牛鬼蛇神们是没有参加会议的权利的，但这次为了让阶级敌人们看看可耻下场，就把全体牛鬼蛇神们都拉来了，只是革命群众是坐在座位上看，而牛鬼蛇神们则要席地坐在地上看，一反平日

只许低头的待遇，今天破例地让牛鬼蛇神们抬起了头来了。

批斗方纪的现场设在天津最大的体育场——民园体育场里，看那气势，最少也有十几万人，口号声和歌声，早已是震天动地了，那气氛也真够让人发一阵抖的了。为了突出会场的气氛，电视镜头故意多照了一会儿会场外面的情景，那才是一股火药味呢，全副武装的军人们持枪站满了运动场的四周，明明是如临大敌，就是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也没见过这样的场面，看着真让人毛骨悚然。随着一声宣布开会的声音，立即警车鸣叫着就开进了会场，台上主持会议的人一声“把反革命分子方纪押上来！”，立时我的心就揪了一下，再看台上，八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拉着戴着手铐脚镣的方纪，走上了台来。当然又是一片打倒的口号声，不光是电视里喊，连电视外面的我所在的这个工厂，也跟着一起喊，好像我也喊了，但我知道我的喊声里充满着对于这场革命的反抗。

批斗揭发，就是在方纪被人们从背后揪着胳膊，按着头，做飞机式姿态站好之后开始了；走上台来揭发批判的，当然全都是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了。而到了这时，什么作协、文联之类的组织，早已经被当做是裴多菲俱乐部而惨遭砸烂了，代之而起的是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是以对文艺黑线有深仇大恨而著称于世的。他们中的代表人物走上台来，先读一段语录，然后再开始揭发方纪的罪行：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位革命组织的代表，走过来在方纪的

身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就连看电视的人，都听到了一声重重的声音，可以想象这一脚里是怀着怎样的仇恨了。批斗整整进行了三个小时，当大会宣布结束的时候，我看见方纪是被人拉下台去的，当然还发出了一阵铁链的哗铃声。

口号声、打人声，一起伴随着革命样板戏的唱腔，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一听到那几出样板戏的唱腔就全身发冷？就是因为这种唱腔在我印象里总是和打人、以及被打连在一起的、在我惨遭毒打的时候，工厂大院里在放着革命样板戏的唱段，在我看着别人惨遭毒打的时候，那个打人的会场里也放着革命样板戏，直到现在，我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那种野蛮的嚎叫，把那样的声响和那样的场面连在一起，那才真是人类的一大创造，但那只是人类的耻辱，是兽性的最大发作。然而不幸，就是到了今天还是有人要听那样的演唱，但愿这不意味着人们已经忘掉了历史。

看过这样的场面，任何一个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没有一点想法，这怎么可以说是什么革命呢？就算是群众运动好得很，但是为什么这种好得很就只能对待别人呢？对你们来一次好得很，你们答应吗？而最令人无法理解的是，那几个上来揭发方纪的人，有的还是我过去认识的人，若说这些人恨方纪，我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几个人全都是过去想巴结方纪，而又被方纪最看不上眼的人；今天大言不惭地把自己说成是文艺黑线的受害者，也许不无一点道理。其实这些人才是可怜得很，他们总以为如果自己早一天出道，也许自己

负面人生 早就是姚文元了，但他们并不了解，姚文元只要一个也就够了，再有一个姚文元，其中的一个也是要和我们一起改姓为狗的，那就是说，两个姚文元当中，也要出一个狗姚文元的，一山不留二虎么，历来就是这个道理的。

就是在方纪被批斗的第二天，我又一次地惨遭毒打，也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材料，说方纪手下最得宠的神童，就是我。于是，就和昨天革命群众痛打方纪一样，这次在一个小小的工厂里，革命群众也要对我下一次狠手了。

毒打我，就在工厂的院子里，全厂的工人都出来了，这次不是大家一起下手，而是有组织、有步骤地下手，先宣布我是方纪的神童，然后就出来几个人，问也不问，上来就从我身后打了过来，先是打头，从后面打脖子，后来就打我的背，把我打倒之后，就一起踢我的身子。打过一道之后，再把我拉起来，这时候再上来一批人，如法炮制，又和刚才一样，把我毒打一顿，我好像记着是至少打了一个小时，才算胜利收兵，这些没有打着方纪的人，终于在打我的时候，享受到了毒打方纪的乐趣。

从第一次惨遭毒打到第二次惨遭毒打，大约间隔有三年时间，经过这三年的革命，广大革命群众确实是提高了，第一次革命群众毒打我的时候，我倒确实实在一些人的目光中看到了仇恨，而在他们打我的时候，也就有人真是下狠手；而到了第二次打我的时候，革命群众目光中的仇恨已经

没有了，人们打得十分冷静，打过之后，我的眼镜、帽子、金笔和其它的一些小东西，已经全在被打的时候不翼而飞了：而落在我身上的拳头虽然不像过去那样重了，但是有几拳又确实是过于狠毒了，他们不再乱打，而是一拳一拳打得很是地方，打我的肋骨，打我最疼的地方，如今，果然是打出水平来了。

就是在前不久，一位当年和我在同一个工厂里改造过来的朋友，还对我说起我的那样惨遭毒打，他说在我惨遭毒打的时候，他就看见一些人急匆匆地往打我的地方跑，这些人一面跑着还一面喊着“打便宜人去呀”，这就是革命群众，这也就是领导阶级。天津人说的“打便宜人”，就是打那些只许挨打、而不许反抗的人，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仇恨，但是打人毕竟是一种快乐，“打便宜人”就成了一种革命游戏了：如果再在打便宜人当中顺手拿一些东西，哪怕只是一支金笔呢，不也是又多得一些便宜吗？

而且，惨遭毒打之后，随之就有人找到关我的小房里来，向我要这要那了，这个小工厂，大约有一千多人，向我要过东西的人，至少不下一百人。当然全都是偷偷摸摸地来的，晚上，或者早晨，看得出来，有些人是故意下班之后不回家，就等着在我挨过斗之后，悄悄地找上门来，看看门外没有旁人，推开门就闯进来，然后小声地对我说：“借我十元钱。”你说我是借给他不借给他？借给他吧，这十元钱就算是白扔了，我怎么敢再要他还？而且谁又能够证明他向我

负面人生 借过钱？不借给他吧，只要一句话，他就可以让我明天再挨一顿毒打，没有办法，我只能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给他掏出来，当然不够十元，这时有多少是多少，他也就拿走了。

除了这种下流的敲诈之外，再有就是无尽无休地要我随份子：本来我已经是敌人了，可是工厂里无论谁结婚，依然要我随一个份子，因为牛鬼蛇神已经不是少数了，放弃了这些人，就要少收上百元钱，而那时一百元可以买一张桌子，还能买一张床，在这时候拉这些人一把，把他们当做内部人看待，牛鬼蛇神们谁还敢不识抬举？何况收这种人的份子，又可以只要钱，不请饭，不要白不要，工厂里的领导阶级，就是这样的一种水平。

惨遭痛打也罢，惨遭洗劫好罢，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无所谓的事了；而最最刺激我的事情，却是工厂里的人们把我全部的藏书“抄”得没有踪影了。说是扫四旧，他们就抄了我的家，就连生活用品都被人们抄走了，当然许多物品就被抄家的人拿到自己家里去了。而在抄我家的同时，他们还把我的全部藏书也一起抄来了，抄来之后，就放在了一间空房里，还煞有介事地在门上贴了封条，但到了第二天，那间放书的空房子，就被人们砸开了，里面的书也就不知去向。那里面有家传的明版古籍，只其中的一部《公羊传》，若在现在，也值个几万元的，那已经是绝版古籍了，还有许多家传的珍本书，我向革命群众说过，你们抄我的书，是革命行动，但这些书还有一定价值，千万不要毁掉；想起来，

我也是自作多情了，连自己的小命都快要顾不过来了呢，你还管那些书做什么呢？只是，只要有一口气，谁也不忍心看着这些珍贵的古籍被人们烧掉。所幸，倒没见工厂的人烧书；但是，他们却是在一个早晨，就把我全部的藏书抢没了，那些古籍书，他们就你一本，我一本地“拿”走了，当时的革命造反派组织也下过什么命令：“今限于在24小时内，把右派分子林希的黑书交回”，那才叫见鬼，拿走那些书的人，就是那几个造反英雄。因为我明明看见他们在看守我的时候，手里拿着的书，就是从我家抄来的书。后来，在我平反，并要离开工厂的时候，我曾经在工厂里贴过一张《启事》，愿意出高价收回那几部明版古籍，我开出了书名，还写明了这几部书的特征，但是没有一点消息，想来这几部书，早已经被他们撕掉做手纸用了。

直到多少年过去，至今我还常常从梦里惊醒过来，我不是又梦见了在那场浩劫中所受的磨难，而是多少次我在梦中又看到了我的那些藏书，它们都完好无缺地被保存在一个地方，而且还通知我，从此这些书真的永远属于我了。

对于我来说，经过一场浩劫，我并没有失去什么，反而使我看清楚了許多自己一直没有看清楚的事；但是，这场浩劫，却把我的生活之光熄灭了，每当我想起那些被人们抢得没了踪影的珍本古籍，我几乎就要失去理智变成一个疯子，这一场浩劫，就是这样在人们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又一次惨遭毒打之后，我又失去了自由，工厂把我关进

负面人生 | 了一间小屋，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无所谓了，但对于我的家人来说，他们却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他们到处打听我的下落，但都没有消息，他们到工厂来找我，工厂不让他们进门，我的家人只向工厂的人说：我们不是要来见他，只求你们告诉我们，这个人还有没有？就是这样，工厂的人也还是不说话，也许他们也是闹不明白，这个人到底还让他活几天？

事过多年之后，人们说我能够熬过那一场浩劫真是坚强，其实我才不坚强呢，但我当时就是不想死，他们不是不想看着我自己死掉的，“想不开”的人很有人白白地死了，死了之后，还把尸体立起来，开什么现场批斗会，吓得女工们全身发抖，我所在那个工厂里的一个女工，为此吓得得了精神病。我不死，不是怕把好心人吓着，我只是要看一看这场闹剧的下场。我没有什么政治头脑，我也看不出什么规律，但我总是相信人类不会如此永远失去理智的，中国人也会有明白过来的一天，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这是一场灾难，而他们也绝对不会愿意在这场灾难中葬身。

就是为了要看一看这场灾难的结局，我得到了一种活下来的力量，这样就是再重的磨难，我也是要自己挺过来，活着就有希望。说得辉煌一点，我总是相信我们的人民，我总是相信我们这个民族，我总是相信人类的良知；历史不会这个样子的，这只是一次疯狂，而且世界上不少的民族也都有过疯狂的时候，疯狂过去，人类还是要前进的。

一点一点地，生活似是安定一点下来了，因为人们总是要吃饭的，当人们每个月只有二两油，每个月只吃二两肉的时候，他们对于革命也就失望了，这时再鼓动他们仇恨什么人，也就很难达到目的了。人们总会思考，贫穷终究不是这些牛鬼蛇神们的罪过，就是把他们全消灭掉，大家也未必就能过上好日子。张春桥可以大言不地说他宁肯吃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肯吃资本主义的粮，而人们却是不愿意吃草的，至于粮姓什么，那与人民无关。到了运动后期，人们对于“敌人”，已经没有什么仇恨了。偏又在这时发生了九一三事件，人们开始思考，何以接班人竟然会机毁人亡？到这时，这一场浩劫，已经是再没有一点号召力了。当然想投机的人总还是有的，他们在这一场浩劫中下的赌注太大了，他们极怕这一场浩劫就如此结束，于是他们也就还是揪住被他们定为是“敌人”的人不放。只是，到这时，就是他们再狠毒，要想打人，也是没有多少人肯下手了。

终于到了四人帮倒台的日子，全中国人一起表现出来的那种欣喜，为世界所罕见；但无庸讳言，我也同时看到，在四人帮倒台的时候，正就是一些过去紧跟的人，却比我们这些蒙难者，还要表现得兴高采烈。为什么呢？最先我不理解，但是后来我还是看明白了，原来有一些人把四人帮的倒台，又看做是一场新的运动开始了，他们急于在这场新的运动中立新功，于是就连参加游行也当做是一种政治表现了。明明，那时候就有人对我说过，你不要认为四人帮倒台了，

负面人生 你就有了出头之日了，四人帮倒台是革命人民的胜利，你永远也休想翻天的。

事过多年之后，一次和流沙河兄说起当时的情景，我们说，四人帮倒台的当时，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感到从今之后，我们可以靠出卖劳动力糊口谋生了，至于别的，那真是与我们无关了。

1979年，平反右派，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又在生活中出现了，这时朋友们就找到我，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作了；这时我的右派分子问题虽然得到了平反，但是胡风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个尾巴比右派厉害多了。所以，虽然别人可以开始写作了，而惟有我，却依然没有写作的权利。感谢邵燕祥同志，当我把自己写的诗作寄给他的时候，他毅然做出决定，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就是我于1979年发表的诗作：《夫妻》。

这时，一批新作家以他们充满朝气的作品，为中国的文学事业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应该说，我们这些人是要永远感谢这些新朋友的。以我们当时的精神状态，我们是没有力量开创这种新局面的，至多，我们也就是能够做到重新集合队伍，继续前进，重新拿起笔来写作罢了；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要想开创一个新时期，只靠我们这些人，是不可能了。因为我们毕竟也就是一个重新开始的问题，我们不可能达到那样高的境界，从根本上审视我们的过去，从根本上反思我们的时代，就是我们能够做到，那也需要一个很

长的时间，但是新一代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却一步就达到了那样的境界，这是中国文学的一大幸事，这些朋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劳，是我们应该永远记住的。

中国文学史上的新时期开始了，我们有了信心，有了力量，这样也才开始有了活力：但这时，我得到消息说，我们天津文学界的五名胡风分子，只剩下了三名，阿垅死在了监狱里，芦甸死在了农场，当余晓告诉我鲁黎已经回到市里来了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立即到他的住处去看他，这样，天津的胡风分子们才又算是见了面。

见了面说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些年人们的变化吧，说是鲍昌已经到师范学院去了，方纪得了脑意外，如今已经失语，走路都要拄手杖了，还有一位我们的朋友冯大海，后来到了河北省的一个小剧团去做导演，因为在那一场浩劫中不堪忍受毒打，夜里一个人跳到井里死了。别的人呢，得意的和失意的，也都到了应该互相宽容的时候了，还有什么个人恩怨呢，经历过这一场浩劫，大家应该多少明白一些道理了。也许过去有人寄希望于政治运动，但后来大家在政治运动中几乎同归于尽，也就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

就是在1979年的冬天，一位在剧院工作的朋友给我送来了一张票，拉着我去看他们演出的话剧《报童》，晚上我就自己到剧院去了。就在我才走进剧院的时候，我正看见方纪拄着一根手杖，十分艰难地站在大厅里和人们打招呼：当然他已经是一个失语的人了，一只手不停地抖着，完全看不

负面人生

出当年的风采了。本来我是不想过去和他打招呼的，有什么话好说呢？无论过去有什么恩怨吧，一场浩劫，大家一起落到这个下场，实在也就没有什么话再需要说了。但是，就在我向剧院里面走的时候，我发现方纪正在盯着我，我想他一定是在想这个人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方纪惊人的记忆力，我是知道的，我想也许他认出了我，因为我也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到这时，我已经不能不过去和他打招呼了，于是我就在人群后面，向他致意，无论他还记得我或者是不记得我吧，至少我是在对他说，历史终于做出结论，我们都是无辜者。

果然方纪认出了我，他向我伸过手来，用那种已经不具有表达能力的语言，对我只说了两个字：“就是。”

我的眼眶湿润了，方纪的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年轻的方纪，那是何等的风流倜傥，博学、机敏，丰富的情感和严密的思考，一次在他从国外出访回来和大家见面的时候，和众人的蓝布中山服比起来，他又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那才真是让人忌妒呢。然而二十年的时光过去，方纪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可怕的摧残，就这样把一个才子毁掉了。

自然，比起我们这些人来，方纪还是幸运多了，他到底没尝过进劳改农场的滋味，论才气和学识来说，阿垅未必就不如方纪，只是方纪想起阿垅来的时候，是否也像我看到方纪的时候这样，由衷地生发出一种真挚的同情呢？话是可以这样说的：过去就让它过去吧，但是过去了的一切又该是多

么不好过去呀？活过来的人，是可以说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至于那些没有活过来的人，又如何说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呢？

这时候，北京传来消息说，胡风已经回到北京了，但他已经得了重病，我们天津的几个胡风案蒙难者，曾经想去看看胡风的，但芦甸同志的夫人李嘉陵对我说，还是先不要去吧。大家去看他，对他来说只能是一种刺激，还是等他的病情好转些再去的好。还有路翎，他已经神志不清了，当街道通知他说，胡风案已经平反了的时候，他得到通知之后，竟然还扛起他那把打扫街道的扫帚，又走出去了，人们问他去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去扫街道呀。我们天津的几个人听过之后，人人都忍不住地涌出了泪水。

1980年10月，我得到最后的平反通知，这时我才被调回到天津作家协会，宣传部为我们开了一个平反会，一位副部长于念过市委的平反决定之后，对我们说：“这许多年来，委屈了大家，实在对不起。”为此，我们中的一位得到平反的同志竟然感动得哭出了声来，这一声“对不起”实在是来得太不容易了。

活过来的人，可以说一句俱往矣，而对于亲人死在蒙难之中的人来说，这个“俱往矣”的事实，实在是太难接受了。这时我们最惦念的事，就是如何安抚死者的亲属，李嘉陵同志的悲痛，让人为之心碎，她和芦甸追随革命出生入死，芦甸蒙冤之后，她一个人以她只有60几元的工资，抚养女儿，就是等了芦甸多少年，而最后芦甸还是死在了农场

里，她的悲痛又有谁能抚慰呢？

终于，一场浩劫就这样过去了，恩恩怨怨，谁又说得清楚？既然是一场浩劫，那就一定是每一个人都是蒙难者，除了那几个民族败类，除了那几个历史罪人。

让活过来和没有活过来的人得到安慰，就是在我们蒙难的当时，善良也仍然是存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存活在蒙难者的心里，也存活在似是无关的人的心里。到这时，我才想起来，这些年无论我在哪里，都似是还有一种力量告诉我，要相信生活，要相信未来。

今天，重温这一切，我的心里是疼痛的，我不说一句刻薄话，但我知道在一些人的心中是有着愧疚的，我回到社会生活中来之后，一位当年的领导曾经给我写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当时我们把你送走，实在没有想到你后来会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如今，就是在我们后来也受到惩罚之后，想起当年对你的做法，我们的心里也是感到愧疚的。

有人说，恶梦醒来是早晨，这已经是十分美好了；但愿从今之后，我们之间不要再结下新的恩怨；也希望再到了什么时刻，人们会变得善良一些吧。

九、解读文革

十八岁的时候读《资本论》，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有些荒唐；的的确确，《资本论》的王亚南译本，解放后的第一版，是1953年出版的，那一年我只有18岁，当我拿着15元钱到新华书店预订这部书的时候，连书店的服务员都大吃一惊，他们见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居然拿出15元钱来订这样的一部书，真是有些不可理解了：因为早在延安整风的时候，领袖就批判过十七、八岁的娃娃读《资本论》的事，而我当时就是只有十八岁，恰又值《资本论》出版发行，你说，我能不买来一读吗？

到现在，我还记得自己当年读《资本论》的情景，也没觉出有什么读不懂的地方，还正儿八经地在书上划红杠杠，还记读书笔记，那种认真劲，后来是再也没有了。记得那时候几位领导看着我读《资本论》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他们不读，也读不懂，所以他们看着我读，就认为是犯了天条，早说过的么，十七、八岁的娃娃读《资本论》是荒唐的么，怎么你还读呢？

但是，我还是一口气把三大卷《资本论》读完了，读过之后，有什么收获呢？说不清楚，但是至少也总是懂了一

负面人生 些皮毛吧。懂了一些皮毛就好，就有用得上的时候，而且这点皮毛还影响了我的大半生，多少年来，每到我对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不理解的时候，我总是把那些不正常的生活现象去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种种说教对号：当然有的时候一对号就明白了，然而也有的时候，越是对号就越是不明白。

早有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我就对以人的思想意识来划分阶级的做法不甚赞同，马克思好像从来也没有说过一个人的思想意识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按照马克思的学说，阶级就是一个大的社会集团，因为这个集团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他们占有的生产资料不同，他们的生产分配也就不同，于是这样就分出了不同的阶级，也就有了不同的阶级利益。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说过一个人尽管他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但是，只要他对某些现象有自己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又和领导的看法不同，就可以把这个人划到敌对阶级的一方去。多少年来，我就是以这点信仰为基点，而对于人们的把我划为是资产阶级而持对立态度的。

最后到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知识分子全都被划为是资产阶级了，当然我还是不理解：但是革命群众的一顿毒打，还是把我打明白了，我在几乎被活活打死、而又没有被打死之后，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革命”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好办法。

革命群众为什么打我呢？什么也不为，就是他们认为我

是“三反”分子。三反分子，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至于我是如何反的？这无关重要，大家说我“反”，我就一定在“反”，既然是“反”，就应该狠狠地打，于是就把革命成功之后早就摈弃的种种手段全都用上了。为什么还要调用那些非法的手段呢？因为越是急风暴雨才越是革命。

如果说革命的最高目的就是夺取政权的话，那么1966年的中国应该说是早已经有了巩固的政权了：那么这时候再来爆发一场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想来想去，还是为了政权。当然，已经不再是为了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以这个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为一种“高”于阶级利益的目的夺取政权。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话说得极有道理。请客，要有主人，有客人，而且主人和客人还是一种“请”的关系，这其中是有行为规范在内的：而吃饭，也还有吃饭的规矩，上什么菜，用什么酒，使用什么餐具，那是一点也不能越矩的。而革命就顾不得这一切了，革命可以废除一切的行为规范，也无须深究什么关系，就是一个造反有理，一切就全都不存在了，所以，革命是一种解决问题最轻松的办法。

据说，“好得很”和“糟得很”历来是检验一个人对待革命态度的最高标准，的确，并不是一切的革命都好得很，也不是革命的一切全都好得很。世界上有过好得很的革命，也有过糟得很的革命：革命有好得很的一面，有时也有糟得很的一面。本来这并不是什么艰深的哲学命题，对于任何一

个没有偏见的人来说，这只是一点常识而已怎么能够说只一个“好得很”和“糟得很”，就分辨出一个人对待革命的态度来了呢？

我这个人本来没有什么政治觉悟可谈的，但是在听了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于红卫兵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高喊“好得很”的时候，我终于悟彻到了这一场“革命”的欺骗性。这场革命的欺骗性，就是要把人间的道理翻倒过来，把法律抛到一边，把社会公德抛到一边，煽动起群众的疯狂，在一场大动乱中，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去做一切多年来不能做、也不敢做的事情。

愚昧和狂热，是这场浩劫的两种原始社会动力；愚昧到不理解贫穷的原因，愚昧到仇恨文化；而狂热，又狂热到造神运动，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一切都可以破坏，一切都可以打倒，只打倒中国固有的文化还不是最后的目的，还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重新飘扬在莫斯科的上空”，还要“让毛泽东思想的红太阳照亮纽约”，不仅仅是狂热，必须还是愚昧，否则不可能产生这样荒唐的念头。

当年读《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什么是阶级；而到了1966年，我却有幸解读了一次“革命”。如果说我们曾经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革命的话，那么我们就希望以这次革命为终点，人类就再也不需要革命了，而继续革命和不断革命，都只能是对上一次革命的反动。革命的不能停滞不前，是不能同样用革命的手段来达到的，发展革命成果，就更不能再进行同样的革命

了。任何一次革命都只能是对前一次革命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所以是一场浩劫,究其原因,就是这场革命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人民为推翻旧世界所进行的那一场成功的革命。它使历史发生了一次大倒退,几乎把我们几十年来所创造的一切断送殆尽,使那个被革命推翻了的封建王朝重新复辟。

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最大的愿望,就是使革命成为永远的过去。如果人类不需要革命,就可以实现自己梦想的话,那又该是一个多么辉煌的时代呀!生活在前进途中先进代替落后,应该说是最美好的事,一定要用革命的手段才能埋葬落后,那只能是人类的可悲:何况更多的时候被革命葬送的还常常是美好的东西,因为腐朽的东西不能容忍美好,于是也就常常要使用革命的手段来葬送美好。

有时候,善良是会被罪恶葬送的,解读一场“文化大革命”,人们应该对革命有新的认识:解读这一场浩劫,才能使我们走出负面人生,也才能使我们更加珍惜光明。

负
面
人
生

梁 南

梁南简历

梁南，原名李启纲，1925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峨眉县。北平解放时入伍。1956年4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8年夏被评为国家一级作家。50年代任军委空军记者，以发表长诗《危地马拉兄弟，我望见你》及《最近北阿非利加洲发生了什么事情》而知名于诗坛。随后，被政治暴风雪将其卷入北国边境线一带，带着“一生以儒雅为业，不与小人为伍”的精神品位，吃铁吐火，出监入狱，在风雪泥途中承受着繁重的劳动二十余年。1979年初“右派”问题昭雪后，相继出版了引起广泛瞩目的《野百合》、《爱的火焰花》、《诱惑与热恋》、《梁南自选集》、《风雪归来》、《在缪斯伞下》（诗学随笔），以及《寸人豆马随笔》、《笼押随笔》等著作，其作品被选入140多个中外选本，并连续十四年（1979 - 1992年）被选入国家级新诗“年选本”。

寄人篱下

饥饿窥人

1959年9月，流放我到北方边境的第二年，我又与二十来个互不相识的人，脚尖踩脚跟，相继钻进大森林边缘的一间地窨子居住。最先伐木，而后，沿山麓一圈，打了十三座坟墓形状的炭窑，剃山们的光头，烧枫炭，替公家开拓挣钱的门路。

这群被叩上荆冠，食粟茹菜亦颇艰窘的人，到底逃离（被逐出）假面社会，在林木秀茂的腹地栖息停当了。渐次间且与耸天而语的枫柳榆杨推引融解，谐慕相处，直至成为投缘的人。但没有一片叶子晓得，我们是来砍它们头颅的刽子手。栖息既久，厮磨日深，我才突破陈旧的知解畛域体认到，我们逃离的通都大邑，其实是葬送大自然的墓地，是毁

掘一方大大自然后，种植屋宇，蕃衍人类，拓开昼夜“谰语”连天的市街，栽上失掉自然风情的街树对之守望，让难以窃逃人生苦乐的子民，让思想梯度悬殊的官商黎庶人等，颠倒在这些市街上。于是，自然万象相继死亡。尽管上智人物们象征性地把“大自然”的花草林木装饰在公园里，并将大自然的灵物熊狮虎豹囚于笼柙向人们展览“大自然”的风貌。然假造的伪色，与“可餐”的“秀色”毕竟相去十万八千里。

这次迁居于地窖子，命遭丁酉（反右派的1957年的甲子）的人中，穿过橄榄绿的人居多。有的如周素新现已物故，有的如潘荣光不知去向，有的如被人背后呼为“国际盲流”的陈尔真，新羽丰肌，八十年代据说在厦门大学任教（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制作动画片，七十年代曾在虎林一中教英语）；还有位四川老乡小罗，中央教育部来的，北大出身，我们一盘锯伐木，一见如故，有倾盖之欢，不久浮肿，下山投医，再没归来，生死未卜。由于一见如故，来不及探名问姓，至今思之，憾不能平。

而在当时，我们从无敷衍无涯的大旷野，突然被推入这种大自然的石榴裙下栖于一枝一巢，也就恍如旧雨新知了。林间无路，随便走走脚都熟悉了。我们提着打炭窑的木榔头每天横越森林腹地时，每每风惊叶落，芬苾入怀，每个人由此都听见林风用无言的语言媒介道破的大自然的清香品位。从此我们悟透，通都大邑确实是对立于大自然，以毁弃大自然

为代价而崛起的世俗复杂社会这个哲思。

住在这个五千年来都没有地名的林荫交迭里，谢绝故旧，远疏市俗，方才感到一切都在红尘之外，恍如落脚精神净土。每天推开地窖子的门，看到的每一株树的形式感都很清晰如画，这株的形式感与那株及东西南北各株形式感的比肩，并存，勾勒出谐和安详，流泻着艺术话语般的自然美。我们两年前刚从政治暴风雪的漩涡中蒙羞而来，在交谈中便有一种共识，认为以人际关系的龃龉为其性格特征的世俗社会，没有人和大自然默契相处的那种亲切，温存，纯洁而无利害冲突，即使那美丽绝伦的境域里，忽然跳出一只野兽把你吓跑，而你，却依然思念着她，渴望回到她的美丽绝伦里，去提取一些人际间缺乏的补偿因素。

在这种自然背景下，我们忽略了拂之不去的饥饿，而饥饿确实实向我们袭击来了。

在我们的一怀洁思化为淋漓的汗水中收获季节告终，收成还算差强人意。但这一丁点儿没有左右到我们的生活水准。我们都感到，原先全国各地无代价支援垦区的供应线都在压缩或已剪断；我们已三月不知肉味，分场商店每月一次开来开去的流动售货车绝迹了；偶尔难得吃一次大米，里面尽是米粒状的碎石。饥荒之象，已由无情的人与被蔑视被虐待的大自然这两个不协调的因素酝酿成熟，向我们这群躲不开的人探头探脑窥视了。

群山与森林形成的笼柙关闭着我们，变我们为聋子瞎

子。天然环境的封囿，消息渠道的闭塞，使我们不可能了然全局，考察不到社会流变的脉络、细节，领会不透普通子民精神底蕴的实质，只能凭借供应尺寸的短缺及副食阙如，来判断身外世外之事。

我们看不见社会是什么样子，然而，社会看见了我们是什样子。原先我们管够吃，不限量。1959年1月开始黄牌警告：定量供应；定多少量，并无明文。有些人不免枵腹从公。难以果腹的话题，被人们在背后或长或短议论，长吁短叹不已。非“右派一族”的家属尤为敏感，公家地里的土豆刚刚收获尚未运走，就手提三齿钩涌到地里复收，顺手牵羊的事自然难说。我8月仍在放牧，呆头呆脑的猪们亦萌发自我保护的小智小慧，圈门一开，立即走火入魔，拚命向土豆地奔突，唔唔交谈，不断拱出又圆又大的土豆，嚼得津津有味，令我羡慕不已。总之，五花八门的变异，使人预感到巨大的困难可能横亘面前，可万万想不到，种皇粮吃皇粮的人，会在太平年月饿瘪肚子。

芳草无涯，不能解饥，然引出人钻牛角尖的思维。1959年7月，上边派交通部打下来的胖上海人老黄帮我熬饲料。有天午间收牧，却见大锅贴满香喷喷的玉米面大饼子。老黄说，劳改犯在附近修路，借我们的大锅贴一锅饼子。老黄问劳改犯的定量，说每月48斤。而我们，是30斤。一锅饼子，物品亮眼，发人思索，让人不能不向事实折腰，问题如庖丁角牛般立刻就得出答案：我们这些被人痛击的“诽神

谤圣”之徒，果然被人判为“罪”在桀纣之上，以致我们的生存价值生存标准远在劳改犯之下。我楞怔半天，欲哭无泪。事隔四十余年，我依然不敢疏忘此事于万一。这是五十年代的事实。

大约秋8月末，我奉旨将养猪事宜交给铁道兵来的山西人章云英夫妇。这阵子，打麻雀战的大兵团作战方式，改为化整为零的散兵作业。我又成了散兵游勇，忽而修桥补路，忽而到大田码垛。伙食也由按质论价付款的方式，变为沾了全国刮共产风余沥的“共产主义大食堂”，有时让人白吃，有时每月六元包干。我们的口袋好歹每月至少能剩22元。

人处于窘困时期，就像风浪里坐一只船过河，人际关系会相对趋向平衡。交通部来的，替我们主灶的小金，有感于此，也很卖力。他拨开压花的荆棘，独出一招：为饱我们的口欲，又不犯超支下粮之病，他熬起了土豆泥，按一斤面粉掺五斤土豆泥的比例，蒸出的馍鲜甜可口，人人胃口大开，我和空军来的大肚汉唐持甚至还展开较量，三两一个的馒头，我们都吃掉八个，接着我又加码半个，唐持只好甘拜下风。这种饕餮之争，正是饥饿扰人的反映，人的肚子已空空如也。人们相处，注意力都牵扯到这些方面去了，意气之争就大为减少。

但是，饥饿越来越不可漠视。我们不止堂而皇之乃至肆无忌惮地在大庭广众訾议，而且深切感受到饥饿的侵扰。9月底住进地窖子后，劳动形式出现作坊作风，每天开两顿

饭，上午八点半，下午三点半，膳食之糟糕，又回到 1958 年初到边地时的老样子，过之无不及。主食顿顿是土褐色的两个拳头般大高粱米面窝窝头，菜肴是冻萝卜缨子。虽说不见可欲，其心不乱，但肚子反感，愤忿依旧切齿上脸，主灶的小金难为无米之炊，多次提出辞呈均被焦勇夫驳回。我于心不忍，乃开箱将 58 年 59 年夏秋放猪时捡的几斤干木耳蘑菇交给他做汤。

地窖子的生活，只有我们这些阳禄未终的人才感觉“香留舌本”而品不出死亡气味。地窖子多设于阜冈地势之处，水源相对短缺，周遭如无积雪化水，主灶的人便只能拎着水桶，像化缘僧那样，到远远近近的泥沟小汲几勺，以解燃眉之急。蒸馍的水一经反复使用，类如阴沟泥汤，其味刺鼻，蒸出的窝窝头色恶味败。此外，盥洗供水自然免除，我们没人携带盥洗器具。我们这种咀嚼艰难的内化力，与适应厄运而不乱的内控力，都是前无古人的。以故，人人如鬼，相安无事。

饥饿扰人的日子，一饥未解，一饱难求的人们，从走路的姿态都看得出来，像川剧庄子戏妻戏《南华堂》里的二百五，扇子都能摇动，都是一副“不似之似”的抽象样儿，纵然空气具有世界第一流的鲜美，纵然风景具有世界第一流的亮丽，令人洗眼见爽，骨力怡泰。然而，这类精神满足抵消不了肚子的饥饿。

何况我们除生理上的饥饿难以缓解外，更有一层心理上

的精神压力无法缓解。十三座坟墓般的炭窑打完了，接着，我们将扮演屠杀美丽的刽子手了。纵然百馐罗列，五味杂陈，宴请我们做这种脚色，我们都会拂袖拒之。如今，站在低檐下，饿着肚子叫你也要杀去……

地窖子之夜

像一匹弩马，多年服役于政治驭手驱驰的铁甲车，也没尥蹶子，只偶尔开口舒舒气，不料屁股上沉重一鞭，就被赶到这个“圣土秀壤”来了。一前一后聚集到这个车成马就的地窖子里的，都是缺心少肺，跌倒在地的人，亦即因唇齿之罪成堆儿被赶到边北的流徒。先在风雪长大长高的旷野拓荒，播种，收割，开河，伐木，放牧，疲于奔命，幸而不死。如今瘪着肚子，出入于秀茂流脂的大自然之中，被诱惑，被感染，被点化，渐渐在饥饿与大自然的双重启迪下，感悟到了，人间需要和缓与稳定的桥梁，乃是一种生存的必要。

那时我们的生存天地，几乎艰窘到了生而不存的苦况。

现在住到地平线以下来了。这个茅草梳着刘海头饰的地窖子，层次最为陋鄙，没有窗户，没有椽子，室内没有通气孔道，火塘里投放的是炭头。炭头是，炭窑装足木头点火

后，火焰便从上往下，也就是从顶着窑盖的头向立地的脚跟燃烧，不是凡俗理解的，从脚往头燃烧。没有烧成木炭的木头部分，称为炭头，这是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出售的废品。炭头刚投入火塘时，青烟缭绕，呛人，在其透红透底前，门须敞开一条缝隙跑烟。门虽半敞，每寸空间仍极暖和，数九寒天，子夜时分，我们也没有感到过寒意，可见地窖子倒是适宜于羁绊我们这些性行刚正，世所难容者的笼子了。

地窖子多设于浅阜矮丘腹内，掘地而入，深达三四米。走下荒草稀疏的七、八级泥土台阶，即走到为开门之便而空出来的，东西五米多长，南北六十公分宽的一条空旷的廊道（北大荒住宅大门俱往外开，许与防范野兽破门而入有关），入门则是东西相对的两铺木头支搭的草炕。东炕横抵南北两壁，西炕南端留有一方闲地堆放杂物，火塘亦设于此。

拉门而入，白昼如夜，夜似白昼，这是缺少窗户设备的地窖子的原貌，开初，住的人都很不习惯，久了才自然了些。

深山老林，昼短夜长，冬季尤甚。上午七、八点天才拂晓，午后二、三点，暮色便渲染在林子上了。我们每天在地窖子逗留的时间，长达十七、八个钟头。入夜，两铺炕前，两根绷直的铁丝上就坠着十几盏煤油瓶灯。有的两人分享一灯，有的一灯一人。因为无桌无椅无凳，迁客们都下半身伸入被子，支起上半身书写浏览缝补（山间无路，出入灌木丛时，衣服时被撕破）。黄烟炭烟灯烟混杂散发着朦胧之

雾，既模糊又淡然。恍惚一瞥，洵如腮边怒放十余朵石榴，馨染视线。这儿是冤案窝子，欢愉沉沦，然灯粲炭红，人随心远，都可放任思想于千山万水之外，缘续千里，以弥补旷途绝险之隔。不过，精神优美，语言优美，物态优美，以致家长里短，琐碎闲言，地窖子统统没有。我们仿佛在世界地盘外活着，但我们也不是没有自己的世界，如脚底这方“圣土秀壤”。这里如果还有一丁点儿“人情味”的话，总也是瘦削的畸形的，这就很不错了。住地窖子没有完整性可言。

地屋内糊涂，出门就不会糊涂了。

一湾又一湾秀林，迂曲环绕地窖子，宛如崇拜它的溪流湖泊流泻而至。闷在地窖子里发呆发傻的人，不时出入，也就沾着些许灵气，甚至于忽然萌发一些抽象思维的美，空灵通神；而纯洁无瑕的树与雪的结构，还可做人的“文学模特”，给身上扫除一下思想忧伤。

虽说身外没有收容我们的世界，没有足以庇荫自己生命的屋檐与篱笆，我们毕竟比同样“穿鞋戴帽”的同类，比饥饿在暴风雪中的人好受些。优美的风景虽不是俭岁梁稷，我总感觉，静止如水的自然，可以半饮，虽不解饥，仍可止一时渴。人与自然，被地窖子开门关门互为吞吐消化，沾丐一庐的炭火，也使我们饥而不寒。精神比躯体更需要休憩，地窖子便是我们日后远涉岁月的过渡驿站了。我们在这儿的生存方式，是搁浅，不是停泊。我们这些被人出卖的坦坦君

子，决不会被引流到草鲜花冶的众香国里去的，住一天就坦然一天好了。这些话虽没人敢说，却装在肚子里早发酵了。

我想到这儿前两年的艰窘生涯。

被政治暴风雪击倒在地的我们这些人，是属于政治破产者之流亚，渴求皈依人的位子也都很困难。我们不敢承认，也不敢注视自己的存在。当我身披一袭无形的罪衣，头顶荆冠，一无所有地抱住“所欠惟死”的心态，以拓荒者的坚毅形体，以生命为许诺，以血肉为代价，卓然兀立在无边的处女地上，让无边的胡貉之地，逐渐熄灭荒芜以接纳我们的血肉之躯，听命我们的安排。这时，我们忽然回头一瞥，才寻找到我们的另一种存在，发现我们这些流放来的“罪人”，也是一尊有精神力量的实体，是困难的死敌，是大自然之子。这形成了黏合群体的一种观念，那种彼此怀抱戒心独来独往的个体，开始探索性的交往了。我们是在这种饥饿的时候聚集来的，饥饿使人失掉斗性而和善。

自我的贗品、贗品的自我开始收敛了。

自然，地窖子不是闲聊的茶馆，而我们又远不具备闲聊的品质。石榴灯下，沉默依然是地窖子每夜的主题意象，这是一种精神现象，因为，我们都没有步入正等正觉的境界。对谈是磨合时间，沉默也是磨合时间，一个有声，一个无声，个中三昧，谁能化脓解瘀言之？谁能诠释：千言万语沦入沉默消解，是什么颜色的悲哀？是否不说就是说了？我们高举的手制偶像也是沉默。沉默是我们追索热闹的另一张表

述方式。你该相信，有些时候，无言的表层感情往往容涵着坚实的热闹，人人的内在感应都表现在如深水港湾里的船只入眠的状态。这是那种年代我们的一种生命状态。“右派”脸皮上的微笑合乎政治逻辑吗？肯定是受用不起的。

我们品味逃离了玄天乎地境界的沉默，是品其穆然而非木然，它让你在封闭中感受种种丰富：白昼是古井，沉默到底，没人说话；入夜，各想各的，异趣异途，凌跨时空，不计主题。有的屈膝做桌，有的兀然端坐，有的细声款语讥弹世态，但从没人指切时弊。静的婆娑世界，图案清晰入目，一人一态，一人一相：拨弄炭火，压雪化水，东张西看，望灯沉思，飞针走线，手不释卷，缓步过道，推门远眺。无时无事不静，而心思活着，如灯而燃。尽管人人都像有些变态，加上火塘燃烧时的絮语，灯花炸响时的火星，遂构成夜的独特魅力，囚地人文气氛。我们的思维活动，在地窖子是拐弯的，因为，活在这里的人，政治灵魂被抽掉了。

两排垂悬的灯点燃这些形象形态动感静姿，夜夜仿佛一样，却夜夜并不一样。或许由于沉默，由于静穆，有些事物，在密不透风的地窖子里，甚至包括时间、空间，都焐成熟了，我就品尝过时间熟透了而非不生不熟的那种果实。人人也知道，周素新与李春田两位，是遭遇了妻散子离之痛的人，当他们如达摩老祖，面壁不语时，那就是说，他们已走入这个痛苦的思考。于是，好像谁下了死命令，一起无语，一起沉默，没有人说一个字去挑破地窖子的宁和与寂寞，也

就如在他们的伤口上种植鲜花而不是涂抹盐粉。这时，静穆就比语言表述的内涵深刻得多，空气熟透了，时间也不生涩了。

可惜天意弄人，这种囚居，一住半年。

横贯这半年时间隧道的主题意象是沉默，主题思想则是糊涂。想想也是，当流刑犯，瘪着肚子，还对地窖子津津乐道，非糊涂而何？

“货郎”归来

带着透身暖意，我走到地窖子外，往瓷盆里压雪，打算端回火塘化水，冲点艰难到手的代乳粉解饥。我的饥饿感，始于1959年8月。有天放牧，见一野物窜入茅草丛中，草高，厚实，蹦不出来，被我举棒击昏，收牧时拎着一只麻灰野兔回去，也没开膛，在沸水里滚烫几下，就剥皮吃了个一干二净。年轻时在成都盐市口，拌上麻辣酱汁卖兔肉的小贩，满街都是，跟踪吆喝，诱你问津，我一口不尝。这次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尝野物野味，吃得心安意得。吃得自己都吃惊起来，我实在饥饿了。

今夜买到正宗的代乳粉，反而使我想起几个月前，品尝非正宗的野兔子肉而不恶心的事来。这种代乳粉，人们都叫

豆面，掺入不少白绵糖（当时四角五分一斤），每斤买一元四角五分，用水泥袋纸包装，一袋40斤，一斤的价格相当于七斤杂鱼的时价，是农场的土特产。吃的时候，用温水调匀，加热后小半盆能膨胀为冒尖的一盆。在饥荒早已抛头露脸的农场，十分畅销，也只能买到这种高价物品，没有其他食货供应。

林边浅沟里的雪，如羊脂玉，细腻粹白，在月色浸润之下，纯洁洗眼，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美感。每次在火塘上化雪，清澈明洁，一尘不染，每每使人感到红尘已远，客子无归之叹。

压满瓷盆支起腰来，那夜，我惊呆了。年来，饥饿之风，将人们脸孔上的红润，纷纷吹落，吹上苍白。我一支腰一抬头，怎么对这种压抑我们的环境天地，居然产生认同感呢？

我支起身子时，偶然向地窖子敞开缝隙通气的门一瞥，骤然看到绯红嫩暖的灯光炭火，若一丛红玫瑰怒放到门外。近两年左右，从我1958年4月23日流放到边境开始，实际上过的是半劳改的生涯，每天的劳动时间，都在十七个钟头以上，破晓前三点出窝，傍晚八点收脚；此外，半夜三更，时不时还有突击任务派到头上，伸眉肆时的休沐日一天没有过。1958年严冬打冻层，睡冰大坂，开掘坚硬如花岗岩的河道，尤为艰苦，几乎死在那里。这天夜晚，才见到一丝芬馨，甚至，不禁使我想到宋祁“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

接着我自己就骂开了自己：狗屁，什么春意！历涉苦难人生悲剧的不幸者，即使一丁点儿与已不相称的恬和，从脚边滚过，他也会那样少见多怪，惊怔无已。

其实，这是不属于我们的镜花水月的一种逆向媚气，与扑到身上来属于我们的寒流，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存在。这种逆向表现的媚气，是饥饿陶冶出来的副产品，它媚你片刻的代价，是对残忍的饥饿现实的容忍。1959年，我们将一怀洁思化作淋漓的汗水，灌溉出金字塔般堆砌的粮垛，而我们分享到的，却是：饥饿。

我们的供应，每天勉强维持在8两左右。而烧炭的活计中，伐木，截木，装窑与出窑等等，都是重体力劳役。敞开肚子吃，8两不够一顿，再要瓜而分之，只能开两顿饭，劳动时间也就不能不定为夹在两顿饭之间的六、七个钟头。这就像把压断骆驼脊梁的那根稻草，暂时取掉那样，与原先比每天少十小时的活，而且，劬劳委地后，突如其来楔入突击任务的事，也取消了。余闲既多，芒忽相望，看面孔看熟透了，心也悄悄相印了，我们这些糊涂虫，也瞥见媚气，有芬馨之感了。

这种异样的一时感受，使我停步在雪地上，思味不已，眼睛只顾直勾勾望着怒放到门缝的红玫瑰，以及那典雅的雪压的的屋脊，那几根以矜持的线条勾勒出来的一幅不俗的肖像画，有一种肌理状态的效果，我们仿佛自拥了一方小小天地了，这是不是纷至沓来的饥饿把我们饿昏了产生的错觉？

我这种不合时宜的一时心境，与“货郎”刚刚驮货归来营造的氛围，也许息息相连。周素新是烧炭队头头（也是“右”字号人物）指派的“货郎”，每月外出一次，替我们和山外世界打交道。他刚归窝。当几句声响洒落门外，我才回过神来，匆匆赶回地窖子去。

这个坐落在大森林大山腹地的地窖子，与外部世界处在隔绝状态。然而，我们既然还活在世界上，也就不得不每月派人出山，采购生活必需品，收发邮件，领取大家微不足道的生活费。这个相当于“货郎”的角色，派给了原北京警卫部队的军官周素新，外号红鼻子，身体结实，脾气好。他外出两三天后，于抵暮返回地窖子，累得支不起身子，我们这些苦行头陀劝他先睡一觉，他就和衣躺下了。

晚九点后老周倦意消解，看到迁客们期待的眼神，一骨碌跳下炕，先取出些信交给收信人。地窖子寒灯粲然，火塘炭红。陈尔真开始夜课：锉锯了。他是专职锉锯手。锉锯声柔润怡人，有时还起到催人入眠的效应。

老周挑回来的物什，放在两炕间的过道上，百十斤不止。由于都是一个品牌的人，又处在山高皇帝远，无人问津的苦闷角落，随着分散物品的物质活动，也便天南海北，七嘴八舌，不由经论，放谈自有一番，把“货郎”围在中间考问。老周有时也言不由衷，问东答西。这是破两年来噤若寒蝉的先例的夜谈。

一个月中，也就是这么几个小时，“货郎”归来，分发

实物邮件的时候，过得还像个人的日子。人对人的防线，如果平素还有那么一点的话，这时也撤除了。这些人下人，都伸出耳朵，想聆听山外的世态变化呵。

老周的线路图清晰如画。他先到统管我们的云山畜牧场领生活费，扣除每人每月六元伙食，每人实得 22 元；该发该领的邮件，一一领发。而后根据出发前登记，逐一采购，记下价格；有些物品，例如烟叶（香烟没有，即使买到，一盒“蝶花”一角卖到一元）、棉胶礞咕等紧俏货品，需远走虎林自由市场去碰运气。出门费事，费力，费钱，老周朴实，随身带着糍粮水壶，去得寒伧。回来则负重如牛，走得掉魂掉肉，一脸倦态。而地窖子内，却弥漫着超越时空的那种气氛：我们这些打尖的过客，足不出户，居然也独沽一壶，各有所得。

进入这种各沽一壶的情感空间，人们从嘴里吐露出来的是语言，是疑问或是解答，不是腹剑。离弦走板的话，也有人敢问两句，也因此，才使恒河沙数般的忧苦消解了一些。

时序迁流，斗转星移，每月深入心灵空间的常态画面，那几乎是濡沫相存的，怡人一夜的世界，“货郎”归来的夜晚又到了。这天顷刻过去，需苦等一月，才能轮到。老周这次归来，负荷最重。除针头线脑，邮花纸张（缺货得厉害），少量烟酒，每月固定的二十斤煤烟（一角二分一斤，没法分斤掂量，放在炕下公用，费用平摊）。这次我记得千真万确的是，买回不少酱油膏，一袋代乳粉。这袋代乳粉，

分出十余斤后，没人再要，被我买断。分完货品，老周开始谈些见闻，许多广为人知的事，我们却闻所未闻，叹为新鲜。总之，山外千姿百态，依然可用两字概括：饥饿。据老周说，虎林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不少体面的人，拿着高档衣物、手表兜售，换钱充饥度荒，成为一怪现象。听起来中国好像在饥饿了。

往地窖子走时，方圆二十里邈无人烟的宁静，使门缝里漏出来的只言片语，即使听不清楚是什么话，也使人能心领神会其意，在感觉上，地窖子似乎独具一种引人入乎其内的应变力，它宛如一座恬和的教堂，而且还是，让你进去解饥，不必去膜拜偶像忏悔的教堂。我一拉门，走到枫炭透红的火塘那里……

货品分到的人，正挑灯与老周夜话。在我们的生命抑或命运尚未定位的时期，这个地址，就是精神上也饥饿的人们的避风港了。

禄象续篇

折翅于完达山麓十里森林里的我们这支伐木队，就其文化素质而言，在煌煌中国版图上，恐怕是独一无二，无出其右的。虽说时运不济，一林之中，尽是早已“收名定价”

的失路之客，然除开读书种子外，还是读书种子。这种优势在严酷的劳动场合就变成劣势了。起码我们是没有回家路标指示的人，这种没有归宿感的人，往往也很愚蠢。处在那种封闭的、精神奴役的圈子里，环境与负罪心态，使我们放不长思维跑道，故小彻小悟都谈不上，甚至还失掉对任何事物的洞察力，纷纷降格为未流星象师不如的狐言鬼语的制造者散布者。

刘森之猝死，造成一场不小的精神地震。

人死了才感到这人的可爱。面对死亡才使我们发现生的尊严。为人冲和，貌如其心的刘森，仿佛以其姓名谐音“附”讳而留（刘）在古老的“森”林了。天高不闻，地远不应，我们这些不擅琼思玉想的人，忽然涉入这种讷讷栖象语言境域，倒也不是良知渐灭，而是过度忧生伤死，计无所出，这才抓起枫炭当红薯，急欲解惑，以安人心，信口说一说的。我们是最知道是非的人，这时，好像又不懂是非了。刘森的铺位始终空着，没人挤过去。连续几个夜晚地窖子的灯都是哑巴的样子，空气也死了。大伙匆匆啃完一个三两的高粱面窝窝头，喝半浅碗汤水（积雪化的水）；全都蒙头大睡，这大约就是我们最沉痛的悼念了。

“右派”之死，比之墨子提出的朴素最原始的“桐棺三寸”（《墨子·节葬下》）的设想，还要朴素原始。象征性的粗糙的三寸“桐棺”也一概从免，以大地为载体，赤裸而入，所以，到何处去涕零我们都不知其所往了。然而，人们

眼里有泪水，我就在林深叶阔的一个地方，看到了最年轻的伐木人李廉青的泪水，那是刘森归道后好些日子的事了。音容虽逝，心迹长存。

处在“伐毛洗髓”改造中的人，那种常人无涯之戚，情不可终的情绪，决不可能拖泥带水地老纠缠着我们这些人。我们连自己的身子骨都不拥有，自然也就既不拥有欢乐，亦不拥有悲哀（这不，哭的地方都找不到了）。我们有过剩的眼泪，也不吝啬挥洒。但在沉重的劳动与饥饿中，我们总是感到岁月阑珊，筋疲力尽，对前后左右逼视我们的问题也都难以尽言，难以言尽。刘森辞世的次日午间，上边大约怕触动我们的哀思苦想，不知从什么地方派来了几个人，秘密地草草将他埋葬了。谁也不清楚埋在什么地方。这是当年北大荒处理“右派”死事的枕膝独传方式。我们连问都是不敢问的。

我们对这种处理方式反感，愤慨，“人奴而养”，“乌豢养之”，无过于此。但愤慨闷在肚子里，不敢说。朝夕相处的人毕竟有感情，何况刘森人缘好，我们都想凭吊他，以寄托我们一些哀思。然寄托无地。以故每天来去，老是感觉林木间浮动惊愕气氛，老是感觉断桥分成此岸与彼岸，谁也未见不着谁了。我们故意避开走熟的老路，故意躲开被死亡猝然击倒的那个罪孽的场所。我们因此两次迷路，在老林里推磨，走不到昨天开锯的场地。开口便俗的周冶秋，说了句极俚俗的话：真是拐子的屁股：斜门儿。话虽滑稽，没人笑。

笑不起来。我们这群人中，最苦的，是与刘森一盘锯的老魏头，他亲眼看见杨森当胸一击，击得刘森口吐鲜血而亡的惨状。意夺神骇，心折骨惊的老魏头垮了，他老觉着自己时不时也在口喷鲜血，步刘森的后尘。

事过不久，没有斗斛之禄，每月只领启动生活的28元而默然用命的苦役人，遇到了一场“大雪满弓刀”之雪。临近薄暮时分，林子内外，飞飞扬扬，狂风肆虐，掷地而起，树木折腰，路径失迹，形如黄河长江弥天泛滥。小头头一看扎眼，立刻向远近传告命令：收工！

那雪之大，风力之强劲，使往回走的人竟挪不动步子，个个素衣缟服，若举幡而前。大伙遵照命令，捏成一团闯路，怕再闪失丢人。大雪围着人的前后左右浑浩流转，刮起移天易地的大烟儿泡，甚大甚急甚凶，将我们卷入急流的漩涡，脖颈袖口裤角全塞满雪粉，给人增加了一份沉重。最精明的几个人，包括主演《小兵张嘎》的主角小张，走在前头探路。遇着这种变脸天气，幸亏当机立断，及时撤退，离四个地窖子的聚集地又不很远，虽说几次走错了道，但纠正也快，七点左右到底还是摸回老窝子了。万一失落野外，找不到暖脚暖身的“驿站”，死在半路，亦不稀奇。我们肤浅行事，遇灾罹祸不能观其堂奥。这天没有迷途而知返，带点侥幸。

我们这支伐木队，有人专司铎锯，捎带管烧两个地窖子的火塘。

我们走下土台阶，拉开地窖子的门，温馨之气扑面而来，我们的精神巢穴到了。火塘里炭头透红。人们都在门外扑打尽满身的霜雪才进门去的。那个多嘴多舌的人又谈起老生常谈的话题来了，他劝告锉据手，勤到外边铲铲积雪，说这门（北大荒的门全是往外开的）若被积雪封死，金钢力士也推不开，火塘里的二氧化碳排泄不出去，会捅出大漏子。我们认定，这场大雪，一夜指定下不够。我们倒可由此歇几口气，养养精神头儿，刚辞世的刘森，也会得到一片安宁的净土了。

沉闷了好几天的话匣子今晚上打开了。

话题自然离不开上工、收工走岔了道的事，今天要不是走错了道，早就梦见周公了，何至于连饭都没有打到手。有人插话说，在父天母地的北大荒，走岔了道算什么？小菜一碟！有人不这么看，认为天天见面的轻车熟路，闭着眼都能摸回来，偏偏一再出错，这还不值得思索？东拉西扯，言人人殊，谈不出所以然。

这群高文化低水平的人，谈着谈着，走了邪道，抱着老皇历不放的人多了，终于又沿着讷纬栖象的小道走了起来，叹着气，沉默着。

我们被驱赶到这里来改造世界观，却被悲剧的余绪改造了。我也不例外。

疲乏的劳力汉子们，在柔曼的锉锯声与敲击屋顶、大门的暴风雪吼声中睡去，三、五声狼嚎挤入门缝，雪花挤入门

缝，落入火塘发出滋滋微响。那雪真大，如激流狂涛在屋顶滚来滚去，门被咚咚袭击，就像不速之客叩关。

北大荒的蛮野风貌，使五湖四海流放来的劳力汉子愕然。地窖子门前的空档被大雪一夜之间夯得死实死实。其实，锉锯的人，一夜都在出出进进，进进出出，天色拂晓他才上的炕。不过半个时辰，门就被封死了。几条汉子拼出死力往外推搡，费去一个时辰，才挤开一条容人出入的空隙。积雪与门前两米深的大坑平齐了。外边只能活动两个大汉，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泼水似地抡动板锹，掏了一个小时，积雪才被清除。可那雪仍从天上汹汹涌涌往坑里扎堆儿。大伙出门一望，积雪过膝，哪里还有路径？我们从未见过这么纯洁的世界，童话境界，一尘不染，我们手持饭盆不忍心迈出一脚……

不远处一声裂帛马嘶，使人全都目瞪口呆，怎么回事？队里的车把式小吴，足蹬长统毡靴（东北人叫毡疙瘩），从运送粮食枫炭的马爬犁下来，满脸满身敷着霜雪，那马成了雪塑的马，嘶嘶鸣叫不止。小吴一头冲进我们的地窖子，抓下皮帽扑打起来，抖落的雪在火塘里响叫。有人问他：这种天气，干吗还出车？小吴唉声叹气说，出发时部队那边只星星点点落着清雪，靠近你们这儿，才有烟儿泡；要不！也不敢冒这个险。真是北大荒，一里一种气候。

雪大风紧，伐木只得待命。我们那时开两顿饭，上午八点半，下午三点半。头头让我们座谈得失。长期郁结于心的

情感一下子冲开了决口。有人开门见山议论说，这场特大风雪，这里不见天不见地，相隔咫尺的队部那儿却风雪淡然，我看是刘森的阴魂不散；有人补充，说没错儿，我看也是。置身这种场合，记忆之弦脆弱得一个字都能把它碰响。但我守口如瓶，一言不发，闷在炕上，听人说“古”。人们都陷入玄而又玄的面向死亡的恹象怪圈转着磨子，据李廉青（现在东方红林业局，已退休）说，开锯之初，就有不祥之兆，有人伐一株黄榆，竟淌血糊糊的水，两人没敢声张，怕当报丧的乌鸦，不久刘森出事，更不敢说了……

晚餐前后，风雪出现收敛迹象。临睡前我们将门口外的残雪统统清除。次日拂晓，推门而望，才感受到东北的静态尊严之美，那封山蔽野的浩淼之雪，一统天下，皑皑而白，如配上那行走生风的难得一见的动态尊严美的东北虎，便是动静璧合的东北了。

我们不能不以猎人出击的全副装束出发，从棉胶襦咕到膝盖，用裹腿布捆实，双手套上手屁子。八个虎头健汉手持八盘板锹当开路先驱，我们随后用脚踩实。路的两边，顷刻堆起雪墙，低洼地带的雪墙高达六十公分，行步之难，于此可见。大约两个半小时（平时不过十分钟），才走到前天的采伐点，膝盖以下全部湿透后又冻成硬板。“雪后寒”的凌厉，使人上下牙齿碰得发响。

今天没有大干，也大干不起来，无非只是小试牛刀而已。锯声不温不火的响着，拂不落忧思，也没添欢意。举止

都很木然。我们与伐木有感情隔阂，与环境有感情隔阂，加上我们自己的懦弱，心不在焉，使我们吃够一个个苦果，并在历经磨洗历经摧残中感受到现实的沉重，至于历史那份沉重就无暇去思索了。到采伐点后，惟一的收获是，人和人的距离消失了，饥饿以及大自然对我们的不宽容使我们产生了互相体谅的愿望，且有一种共识：这么蛮干下去，不伤骨也要伤皮，不出人命就是上上大吉了。伐木人的锯声是我们的一种语言，谁能听出它在絮絮叨叨说些什么？

人和人的距离消失后，夜晚的一盏油灯，就散发着温馨，也轻轻启开了感情交流的闸门。我原以为，这支高素质的伐木队，都因信奉“刘森”乃“留在森林”这种讷讷栖象之言而堕落了。可是，安徽望江人刘鑫、海军杂志社的范德一和我交谈，都持决不认同的态度，但又都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得体的解释吗？最后我亦认为：这虽是最蹩脚的解释，却也是最好的解释。往后大约再不需要这种解释了。

不！又被人“栖象”一次，在结束伐木那天。

上演悲剧的日子并非都是阴暗的。林间旷地的阳光，在四月初头的北国边境显得温乎乎如一泓止水。我们身边的树，每一株都是一名巨人。如今巨人日渐其少，到外都是敞亮的空旷。看得出来，人们宽容的面部表情表述的不是遗忘而是另一种沉重。尽管如是，处变不惊的伐木人，感到又将走完一段人生之旅，在敢效一命的冲动中，就有不在乎的样儿。独当一面的头头则忧心忡忡，盖所谓编筐编篓，全在收

口。队部的苏医生平素不来这里，今天也背着药箱上山了。

“鱼在水中，深浅自知。”没有人想到会发生不测，以故都有些忘乎所以。史宗仁那利盘锯伐的是榆木，树的正反两面锯口都已到位，茬口也锯到了尽头，树却岿然不倒。史宗仁自然而然走到树前随手一推，哪知这棵桀骜不驯的榆树，倒地时往后一击，击中史宗仁的腹部，击倒在地。苏医生奔了过去，立刻采取救急措施，连连剔灯救蛾，用尽抢救手段。眼看逢凶化吉无望了，他才下令撕碎衣服绑担架。鲜血从史宗仁的嘴唇流了出来，前襟尽湿。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忙对身边的知己说：“我死而无怨，我对不起党，对不起妻子儿女……”抬担架的人一听，泪水长淌。走到半路，老史停止了呼吸。江淹说：别虽一绪，事乃万类。这种生者死者之别是最伤心最落泪的一类。喋血相视的人不抬了，不走了。没人走动，没人说话，人人苦泪横流，坐地不起。停放担架的阳坡上，冬雪初融，数花偶发，依草而出，像对踽踽独去的史宗仁发出哀思……

这是住地窖子的最后一个夜晚。我们的乡土是天涯，随处都是驿站。我们该走了，我们分享了清丽古朴的大森林的尊严，糟蹋了它，它也糟蹋了我们，讨了我们两条人命；我们无所求而来，又无所求而去。当两条生命倒地时，那个神会造化的磬磬一老，那个叫周冶秋的人又慧黠谐谑而悲哀地说了：

“开锯时刻（留）森去了，收锯时又走了一个“失踪

人”（史宗仁），命也夫命也夫！”

听着听着我们心里淌着血。人们却认可了。

林 如 人

我被驱赶到边北胡貉蛮荒之地后，依然昼夜苦于政治帽子勒着头皮，勒得惊寒发怵发慌，到处受人蔑视，抬不起头。不料一入大自然，走到深邃的茂林秀木盘桓之处，这顶被人横加的“帽子”好像就飞掉了，不存在了。走着走着，身子清越，脑子灵发。何故这样呢？没遇见人？未必尽然；我在草甸子放牧，也没遇见谁，仍感那“帽子”压得紧。我推论再三，怀疑人类许多好的品质，原先仿佛都由我们的先祖提炼、汲取自大自然大森林之生存状态。如今，能亲近我们这些落难者的，只有坦坦的大自然了。由是，一入林子即如见故人。在这种佛国净土，空气恬鲜，叶子碧玉如流，时花吻手，芳草暖足，好鸟弄晴，林溪涤尘。我在这里才发现自己仿佛站在一种哲学高度上，“帽子”于我何有哉，有没有一样。

这就是1959年冬，我带着饥饿的困扰，第一次走进完达山余脉树与树构成的大自然时的最初感受。我几乎流出了眼泪，这种感动是纯自然的，没有政治动因掺杂其中。

过去，我们只在草甸子旷野劳役，垦荒，播种，脱坯，筑屋，与这个林荫洗面的大自然比较，那种大自然显得呆板粗犷，矮拙拙的像个塌鼻子女人，没有林木交臂的立体感与静态美的气势。草甸子人迷不了路，大森林里迷路是常事，故而更加迷人。我的老家峨眉林荫遮蔽，名木流芬，可那时我到大自然的森林里，是去休闲取乐，一无日后出身之累，二无今日“帽子”落顶之苦；如今到森林里，荷“罪”在身，顶着政治帽子，来是消灾补过，服劳役，伐木，烧炭。

伐木是与大自然为敌，而非与大自然为伍的行径，是项羽扛鼎拔山的重力气活，将茂林秀木毁容杀绝。处在愚昧于生态均衡的那个无知年月，我们亦知是白羽入泥，干的是不干不净的缺德的活。树被纷纷伐倒，便觉人头纷纷落地，木屑一如树木的血液，流淌一地。这时我们就感到人如林（我们也是被伐倒的林子），林亦如人，我们有着感同身受的痛苦。而久已窥视我们的饥饿，随着劳动量的骤然加剧，一下子在肚子里揭竿而起，闹得你五佛出世，忍耐不着。别的分队，头头也是“右”字品牌的人物，可人家却挑选精悍卒子，四出掏老鼠洞，受益不菲。望着携带掏洞工具，扛着沉甸甸麻袋，来而复去“打野食”的人，我们除投以羡慕的眼光外，对焦勇夫的过于拘谨持重，产生了一种失望，幸亏优雅的大森林，每天用“若可餐”的“秀色”给我们洗胃，仿佛也替我们分散些许苦难。

当我们从人情淡薄如纸的都邑被逐出，左流右徙，终于

接近妩媚默视我们的大森林，承受他恢宏纯洁的品格陶冶，挖山野菜，挖野百合的块根充饥，从此，久久凝视，亲切交往，采他的肌体烧炭，温暖我们的巢穴，这时才发现树们独特的“人格”品位。树如人，林如人，人如林。他们的生存方式，无疑曾是我们活动在大森林中的先祖汲取的生存范本。他们盘根错节，有限的生存距离是这样亲近，远望如拥抢而生，永恒地，彼此厮守着，一步不移，像一个誓死与大地共存亡的家族，活得蓬蓬勃勃，活得骨力非凡，除非盗伐者如我们闯入（连砍伐他们的贼子，他们也没有学会断然拒绝，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愤怒时刻，才撞死过两个腰斩他们的人），他们不失掉或赶走任何一株，因为，他们不争地盘。即使特大暴风雨暴风雪雷殛袭来，偶有浅薄的巨人树被连根推倒，他亦不会叛变大森林，而是长跪不起，如在忏悔他们没有充分汲纳大地的感情之过。

望着这些倒下的林木，每每使我默念着“忍看朋辈成新鬼”的句子，思念因饥饿而染病死去的、被树愤怒撞死的几个人，戴着一顶政治帽子半途饮恨离去，到阴曹地府也是痛苦的。

讨伐从古至今荫庇着人类风光着人类的森林，居然出以时髦的新招，以“放卫星”的突击方式相吆喝。我们那时缺乏生态平衡的观念，亦不敢罢工怠工，只能藉助饥饿的口实，慢条斯理悠着干着。我和海军杂志打下来的范德一，拉过一盘锯，后来就和教育部栽下来的小罗，忘形尔汝的固定

在一盘锯上，直至他撒手人寰。那柄锯被人称为德国快马子，锯齿一吃进木头，木屑就如血花喷溅，一抱的树，十几分钟就能撂倒。我们在扼杀美丽，与如人之树为敌，林荫深处流响着“顺风倒”“顺山倒”的口号，为森林被毁灭唱着挽歌。这是万物之灵，五行之秀的人制造的悲剧节奏，剃山丘的光头，不问良莠，一律腰斩。

到处有骚扰的锯声，在锯断时间与空间，如人的林子倒地了，树桩如古战场上死难者的头颅。许多原木码在人迹难至的谷底，除上报一笔功绩外，转过两个年就会腐烂如泥，而长大成材却需要几十年。我们在背叛大自然的恩泽时，也受到大自然的严重警告，先后有三人沉痛的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们是无罪的。

尝一脔而知全鼎，处在那个楚痛的饥荒年代，人人如树瘦，而有的树却又为人瘦而死。原先，从虎林到西岗的六里公路两侧，碧流成一条溪水的枝茂叶亮的老榆树，少说也有三、四十年的树龄。“自然灾害”三年，树皮全被剥光，百里之内也是这样，无叶无花，一起裸然而死。当人的生命受到枯萎之灾的时候，都忘了树的好处，拿树开刀了。

我们在森林中栖息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春暖雪融，土地等待我们回去播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怀揣难以解释的矛盾，依依告别森林。我们不再与他刀刃相见，伤害他了，他也再不能提供美丽以缓解我们的饥饿于万一了。

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1961年，农场个个内

外拮据，捉襟见肘，连我们这些人每月 28 元的生活费也支付不出来。我所在的农场分场，为摆脱困境，乃于 1961 年 9 月 18 日，离家百余里，派人深入完达山大森林，为公家捡酿酒的橡子。

1961 年 9 月 21 日，为独辟蹊径，不和于众，我块然独行，在林木如人的大自然中，忘乎所以，竟迷失于茫无涯敷的原始森林，找不到归路。险惶恐外，还不无担心，我是顶着政治帽子的“分子”，夜不归巢，少不了被人怀疑越境叛逃。然而，惟其在这种时候，在万千林木的簇拥下，我才公然抱住豁出去的态度，边找归路边也感染点儿大自然的风貌，自悲自贱的囚徒感忽然离我们而去，“帽子”没了。大自然的森林又将我归属在他的名下了。

我流放到边地后，感情积蓄得最丰富最亲昵的领域，就是装潢大自然揩洗大自然的森林。一入林木腹地，就宛如身临香泽之国，即使躲在几片叶子下荫蔽片刻，也会觉得物我一体。一阵林风淡荡之余，就感到人体融入自然，自然化入肌体，多年的内在疮痍，也被款款化解，如年少时淡坐杜甫草堂雅逸之处，搁下万世是非，品茗赏花，移神动性，无过此时。尽管迷失后走得匆忙，无意鉴赏风景，风景仍如一池荷花化于心地随人进退。脚底倏窣发响的枯枝碎叶，是我和森林的寂寞对话，特别刻画出揽人入怀的神圣雅静。甚至，身后两百米处，一声石破天惊，响起野兽般的粗嚎，我骇然一惊之外，意识到我被土著野物当成非法入侵者受到驱逐

了。可见我们和大自然，睽违得太久，不受欢迎了。我被等距离地追索几小时后，一棵槭树让我爬上去过夜，搭救了我。

原始森林犹如未失洁的处子，一泓碧叶，无涯可寻，没有任何砍伐过的形迹，刚直坚挺的树木，枝桠牵手，叶叶交荫，林林总总，带着尊严的古典美参天而立。在冷峻封闭，拒绝一切探索者妄入的原始森林里，毫无路迹，你走一步，路就给你一步，不走，路就消失。希望在于走入走出。爬上槭树过夜，也是走的一种特殊方式，是次日黎明走出原始林的起步。

9月的原始林，雨丝缠绵，被洗净的月亮，从严峻的树丛后窥伺地探出身子。反正今夜精神巢穴回不去，就让雨与月构思的朦胧画幅，诱惑视觉到颠倒衣裳吧。我点燃最后一支蹩脚牌号的香烟，细细品味着心仪已久而又难得一夕如此相会的大自然。这是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一次哲学品味。槭树底下静出了一种进入宗教境界的禅味佛意，人到此时，乃感到自己是这林子中的一木一枝，感到原始林浑然具有人间的宫殿气势，远处高树如壁，近干如柱，茂密的叶子铺就屋顶，层次错落的灌木丛，如台阶参差，四处装饰的时花异草，虽看不见，但芬馨依旧。雨声淅沥，似人来人往的脚步声；围着我在树底50米外低嚎的，是一帮青皮痞子窜入市邑的骚扰。这是北国夜雨洗冷日的奇观，坐在东交民巷的办公室是看不到的。

我这一生厄运频仍，不可开交，坎坷，跌撞，倒楣，袭击，侮辱，这些年惟一补偿过我的就是大自然大森林，刻入骨，铭于心，没齿难忘。当1979年宣布我戴的“政治帽子”为莫须有，复出后我第一首发表的诗，就是赞叹森林在精神上荫蔽我的《森林两题》（1979年8月《诗刊》）。赘述一笔：1980年8月东北三省诗人在丹东聚会，座谈会上，一位“先锋诗人”认为我表述的，是像我这样的小花小草受到老一代庇荫之事，甚不以为然）；1985年秋末，国际笔会中心约请各国知名诗人献诗，并于1987年春季编选出版的《国际诗歌选集·诗人支援非洲》，我入选的作品《我们，我们》（中国另一入选诗人是杨牧）陈述的，又是具有人的情貌的大森林对大地的种种承诺，那深不可测的情感，使我对大森林大自然的爱恋入了魔。

那平视王侯，超逸卿相的大森林，渐次成为我思想深处的文学模特及经典意象，这类作品的比重，大大超过了我的其他作品，林如人，人如林。而我，也无愧于一株刚直的树木，狠狠抓住大地深入，昂起头颅，直薄云天……

衣 灰 · 炭 灰

年年9月，都是边境纯正的成熟季节，空气像刚流泻出

来的乳汁和一清见底的溪流，路上走动的人，个个透明如水，非常新鲜。我们这些被捆绑在土地上每天劳动十六、七个小时的人，倦顿不堪后，此时也稍可活泛活泛手脚筋骨了。

1959年9月某天，昧昧将暮的时分，我在“右派”一族聚栖的七间房草坡上闲步，一架马车缓缓在背后滚动，车老板霍地炸出一鞭，那车就一阵风从身边赶了过去。车上如阜如丘的橄榄绿衣物，余香扑襟，比通都大邑罗绮照眼的服饰动人心弦，一下子点燃视线，一直烧到我的心之深处。而且，我漠然站着了。如同想起百年前身，我想起，我在边境行迈不止，道梗且长的这段坎坷，溯流而上考之，起源就在军旅生涯的一泓止水中。如今，山荒水野，日月其除，恶衣恶食又是一年有半。人活在感情透支里，才深感境况塞人之苦。

自从龙颜大怒，戴帽充军以来，命运始终类如转蓬，落脚到转业官兵经管的农场后，这种不堪忍受之苦，使我多次下了狠心，想把部队牵着来的藕丝掐断却掐不断。半个月前，部队派人下来，说部队首长考虑到你们“下放”时，衣装单薄，准备每人发一件御寒的军大衣，不收布票，只象征性的收个成本费，他专门下来统计各人的号码。想不到赶到木落霜飞之前，这一车橄榄绿就拉回来了。

我们这些被天饲地养的部队打下来的“右派一族”，大约两百人上下，都是被划为“二类右派的“极右”分子

寄
人
篱
下

（“一类右派”当然更是“极右”，归属劳动教养，已厕身犯人之数了），七间房不少，紧邻这儿的另一个队五间房，可能是大本营。离开军营后，心寒意冷，牵愁惹恨一年有半，早就两无关涉，今天干吗又伸出施舍之手，让人去领“嗟来衣”？

1958年4月20日离开东交民巷美国兵营时，每人发过12尺全国通用的军用布票，说是带上，以备不时之需。三弟的妻子刘惠芳，怕我过不了冰天雪地之厄，让我寄布票到成都去，给我做棉衣寄来。布票我寄去了，但没写我的通讯地址及衣服尺码，实际上以此婉谢了对方的好意。1958年严冬在旷野打冻层，挖排涝河道，摸爬滚打，和衣露宿，棉军装被糟塌得如鹑衣百结，穿上装个样子都不伦不类，遑论御寒？这次发“嗟来衣”，倒是送来一枝绿荫，让秃头生发了。

掌灯时刻，把我们这些人吆喝到部队门外排队，按登记号码，唱名领衣，不收布票，只收成本费8元。我一米六七的个头，领了件小号。这是件两年来头次领物品。我像初做母亲的人抱住婴儿走回住处，紧紧搂住，缓缓走着，暖热扑在脸上，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感受。回屋，连忙拨大油灯灯捻儿，弹掉灯花，深深将瞳孔浸沉在这件橄榄绿的军大衣里。穿了一年多的布衣草裳，这件鲜亮其色，落落其形，朴素大方，絮棉厚实，如银针玉线缜密缝织的大衣，会使依草附木的人，生活上也如在火塘边有一些暖和么？

10月初头，收割打场结束，我们这一族就被切了西瓜，三下五除二，部队所在地只剩老弱病残，也就是长期抓药的老病号与十余个女“右派”。我的猪倌一职，让我移交给铁道兵复员来的章云英夫妇。交接不久，猪就断粮，熬人粪喂，个个瘦骨伶仃，状如饿狗。我不忍看，低头走开。我忍痛把两柳条箱书丢下，挑着行具随人走20里，翻山越岭，来到地窖子，先打炭窑，之后伐木。

1959年冬最难厮混，既是歉年俭岁，又是祁寒年头。这件大衣我分到后，如贴身长的肉，随我进退。本该早就派上用场的，但我舍不得穿。穿着它走在寒山野岭，那不是项羽嗤之以鼻的“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吗？衣固然是穿了人要看的，而一暖其事，尤为现实。在烧炭队，我干的是轻活；看火，看枫炭烧成与否的火候，不穿大衣熬不着，我穿上了。

住在林深寒谷，出入林藪，最伤衣服。山林没路，全靠身子横冲直撞。一到冬季，叶子落尽，枝枝桠桠，既粗且硬，犹如利爪，旧薄衣服，穿上几天就被撕破，补缀衣服因而成为我们的必修课。好在走的是人迹罕至之地，我出门就将大衣翻起来穿。我身无长物，唯暖身之一衣而已，故惜之如万金裘，一路心专志粹，躲着张牙舞爪的灌木走，那份仔细，一生不曾有过。穿了一、二个月，还像刚下缝纫机那样崭新新。

大衣与人，人与大衣，就这么亲切依存。

当今被人视为愚蠢之极的傻事，我们那时却奉为神圣，干得纯正而又诚实。有次查窑，约在午后两点钟前后，我刚转过山弯走下坡，老远就发现已封火成炭的六号窑，窑顶塌出个洞。窑顶塌陷，就是江河开口，必然化炭，一窑成品，将成灰烬。那座窑像张开嘴巴在呼唤我。我一脸错愕，手足无措。奔向洞口一瞥，热气拍人，说明火未熄透；再看竖着的枫炭，根根犹如墨玉。我感怆之余，胸中立即打完挽救的“粉本”。揖让救火之法是行不通了，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封闭塌口。

我飞速在塌口横上几根木杆，将军大衣脱下盖严塌口，飞锹掘土压上，而后飞身回家报信求援。情势云蒸龙变，谁知会发生什么意外？只怕死灰复燃，窜出火焰，殃及山林。盖军大衣自是抱佛脚，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一袭大衣，算不得什么了，回家告急要紧。

我像戏剧里的探子：打听军情事，报与诸公知……

我一溜烟跑回家找焦勇夫，大口喘着气说：六号窑，塌方！快去灭火！十几个人马上放下手头活计，一人拎一把锹跟我往六号窑跑。我们打了十三眼窑，这是头次塌顶。俗语云：编筐编篓，难在收口。打炭窑从基础往上打，用木榔头层层夯实，层层往小收缩，最后剩下一个瓷盆大小的口子。等窑内装足木头，口子下铺实条子茅草，再盖实泥土，用榔头夯实。然分寸难掌握，用力过猛，土落窑中；用力不猛，则夯不实。窑一旦塌顶，若没冷透，余火复燃，就会化炭，

化为乌有。倘若没有大衣化灰的挽救，抢不出时间，便是一窑炭灰。

劳力汉子们一边跟着我跑，一边诘难我脱掉大衣去盖塌口，说必然无济于事。果不其然，赶到出事地点，军大衣已烤成碎片，窑内蠢蠢欲动之火，犹然闪烁可见。大家这才认识，不盖严大衣闷住，后果将不堪设想。十几个人马上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绕窑一圈，一起开弓放箭，扬土扬沙，埋实枫炭，将奄奄欲燃之火，除根塞源，将其闷死，救出一窑上等好炭。人们擦汗议论时，发现我冻得索索发抖的窘相，当场就有人脱掉毛衣棉衣，催我穿在身上。这种人的温暖与感情的交流，使我在通过饥饿的永巷时，头上的北斗星，方位从来没有倒置过，这一次好像更明显些。

烧掉棉军大衣，是理所固然，势所难免，不是一时犯傻。

但烧掉棉大衣后，我却真的犯了“傻”了：为了避寒，我不得不从帆布箱子里，取出1956年冬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做的呢大衣，披在身上。万一再遇到窑顶塌落（这种可能性不但有，而且不小），这件呢大衣，我也会脱下来盖上去吗？有人推论说，照梁南这个秉性，难说他不脱下来盖上去。

百 里 扑 空

命遭丁酉，套牢了荆冠，发落来边境一线的，前后约有四、五百人，落脚于被“右派一族”们形象称为五间房、七间房的两个队（因无地名可考，姑妄以房屋多少言之，类似地图上为数众多的六人班、七人班之属）。两队相距约一里左右。这些人物虽则百人百衣，百相百态，但与穿上囚衣，剃光头发，做犯人一个样子，故平素两队人员绝少交往，从不交谈。

俗话说“裁缝要少，郎中要老”。这些落难的人物里，恰恰没有一个裁缝一个郎中。绝大多数不老不少，岁数中不溜秋，感情牵扯不如老年人执著，虽说都是一个品牌的人士，其实视同路人，互不搭界。把他们的命运握在手心里的人，也希望他们陌生一世，老死不相往来，以免不明究竟之时“乱”从中起。

不过，从事农业上的浩大群体活动，例如1958年严冬，在十里旷野攻坚打冻层，开辟次年排涝的河道，任务艰巨，又不许染指雷管、炸药，全凭人力与原始工具，便不能不混合编队，联手管理了。事隔一年，到了1959年年末，诸多浩大工程，如基建，筑路，水利，农田建设，俱已安排就

绪；对我们这种人，本来就用不着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故立刻将这些斗筲之器，分而割之，三十人编为一队，派出去打短工，过着像欧洲吉普赛人一样浪迹天涯的生活。

大篷车是吉普赛民族无远弗届的双脚，车到哪里，人到哪里；人到哪里，车亦随之，不用我们那样肩挑背驮。只需坐在摇摇晃晃的在大篷车上，唱着忧伤的民谣，走乡访镇，专向人烟稠密之处流动。我们的双脚就是路。不是我们走路，是路走我们，无止无休，自负沉重的行具，专走穷乡僻壤，去进行生命枯萎的探索而不是命运前奏的演绎与述说。一个社会处在饥饿状态时，一切都无不表现出一种疲惫颓丧，人的命运也都大体相似，而生命的欲生欲死的方式却大不相同了。

有人等待死亡，有人走出死亡。

从1959年的年终岁尾走向1960年，不亚于闯荡枪林弹雨摆脱死神那样艰苦。1960年的每张日历，记录的只有几个字：我们饥饿。

渐渐荏弱不堪的我们这些人，仍然抱住云水襟怀在天涯流徙，自然不免老脸起皱，苦泪湿脸。万方多难，归止无所。我们这些蠢然一物，依旧蹈迹承响，到处去出卖诚实的劳力。在那种无生命之欢愉，不得一饱的清苦世界中，生命糜烂者倒是没有几个人，以故，人们即使蒿目而死，亦没有干过背前面后为非作歹的事。世界在饥饿，外表还算安宁。

我们越是在饥饿线上挣扎，越被派到被饿得一塌糊涂的

寄 人 篱 下
地方去。

1960年7月，我们被派到一个穷得像没裤子穿的队去打短工。那阵子，虎林垦区各队，忽然刮起一股开小饭铺的时风，公家获利，泽被万家，一时令人叹为异数。我们这些没有以家做遮掩，闭门闭户大吃公粮，特别饥饿的一族，一见饭铺，都不敢不倾其所有，但求一饱。我们去的这个穷队，是个极少的例外，连卖咸菜疙瘩的么店子都找不到，每天干巴巴喝六两份量不足的稀糊糊，没汤没菜，饿得我们腰肝都支不起来了。纵使我们能吞刀刮肠，饮灰洗胃，都清除不掉肚子里的饥饿种子，这种百药不治的之病，透衣入骨折磨人，没法子，我们就成群结队，像流民一样四处去挖野菜。野菜被土著的人挖光了。这是行子断肠的角落呵！

8月1日开镰割麦，也就是说收获期到了。

三点钟人们都起床了。夜色悄悄逃离，远远近近露出了人。领导人守口如瓶，不透口风，三点过开饭时才善门洞开，居然大开恩典宣布：今后从早三点半干到晚八点半，让大伙敞开肚子吃，管够，但不许往外夹带。门外有人站岗搜身，这是针对我们的损招。这无疑是动人听闻，事美一时的头条消息。历经磨难的人，对什么灾厄都已不在乎，在不敢有任何绯思绮想的年代公然破例至此，令我等喜动于色之余，不免还有半分怀疑。十余个饿急了眼而不知好歹的人，拉直了肠子往下囫囵吞枣，一下子吃得大腹便便，割麦时弯不下腰，又不敢不割，只得跪地挥刀，膝行而前，半天下

来，膝盖都磨出了血。我们背后，戴着大草帽，反背着手督战的总场组织部长柏祥伦，竟忍俊不禁，笑得大不亦乐乎。此所谓饱汉不解饿汉之饥也。我们脸上那种愧疚，心想得到，口说不出，我们毕竟不是“知味者”呀。

这个队穷，闭塞，缺少康拜因收割机这些设备，全用人工收割。突击半月，吃了半个月饱饭。麦收告终，供应尺寸又恢复旧例。鼓腹半月后，饿上一天，比从前饿几个月难以忍受。

麦收后没有立即脱谷，得码垛风干几天，加上脱谷机没有借到手，我们闲手了几天。闲饿尤其难耐，在行迈不止，道梗且长的年灾岁厄中，我们不可能进入解脱自我的悟境，反而一门心思想些摆脱瘦死冤地的实际招数……

一股软风蓦然香入耳朵，说农场某队在公路边支锅搭灶，专卖炸豆腐渣丸子，不收粮票。这是那时最耸人听闻的消息。可某队离公路十余里，怎么能上公路支锅搭灶？可是，说的人不止一个，一脸信誓旦旦的样儿，不由人不信，更怕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我和潘荣光交换了些看法，就冒着丧己于物，失性于欲的议论，决意自己当自己心灵的执法人，向二十里外闯荡一趟。

那会儿，临时开张的小饭铺顾客极多，成为既抓了钱又度了人的中介场所。斯时丹东造纸厂在铁路沿线收购草包，一吨25元，劳力汉子们割刀一挥，一天能挣百十元，下饭铺绰绰有余。我和老潘拖着疲塌骨散的身子，走了二十里赶

到那里。时运不济，变易无迹，赶到时人家正在倒油卸锅收摊。灶上只剩半斤丸子；对方不卖。好说歹说，感动了掌勺的大汉，花了一元买到手，当下就分享了。

对这类“马路饭铺”，我们倒是兴趣浓郁，一路问东问西，也不怕人反感。原来，这个队最近也抢收小麦，做豆腐调剂生活。伙房趁机派人到路边支锅搭灶，炸豆腐渣丸子卖，替部队抓几文闲钱做办公开支。我们与这里相距二十里，上午九点开饭后再来，就赶不上趟了。掌勺的人说，离这儿二十多里的湖北村镇那疙瘩也卖炸丸子，比他们火，不收粮票，一天炸好几十斤卖。你们要是不吃早饭就上路，准能买到。

我和老潘品着饥荒年月的极品豆腐渣丸子，反刍其味，感慨良深，难以释怀。饥饿世界是静态的，一路到家，绝无鸟鸣牛噪之声，只有我们雨中的沙沙步声发响，世界仿佛饿倒在地上死去了，与1958年势如九川涤原的豪气比较，至少是个零度世界。人说人间亦有地狱，周观天下，我持宁信其有的态度。

我们两个边走边商议，明天放弃早餐，一泻而去，直抵湖北村镇。关山无极，湖北镇不远，五十里左右，“望梅”而行，不算太远，决不会起了个早，赶了个晚集。

次日破晓，天公戏人，又下着小雨。哪怕前边发生交火事件，我们的脚尖亦绝不会偏离湖北镇的。赴五十里外的湖北镇（在密（山）东（方红）铁路线上的凯北车站左近），

依旧是我和老潘两个死党。我们除一顶遮颜的破草帽外，别无长物。头天晚上，我们反复商议，一致认为，吃完早饭再走，那指定是吕蒙正赶斋，必扑一个空。湖北小镇靠近车站，辐射八方，小看不得。五十里路，照我们那时的身板，需赶五、六个小时。我们四点起床，向排长告了假，每人写了个便条，托人在伙房代打饭，然后冒雨起程。为慰藉枵腹之苦，只能枵腹从“私”上路了。

开初雨势不大，然时间一长，一顶破草帽能顶个什么天地？走不几里，雨水就顺着帽沿而下，湿透背脊前胸，我们不得不走几步，就像“拨浪鼓”似地转动脑袋，把草帽上的积水甩掉，但一身还是湿漉漉的难受。幸亏肚子饱过半个月，余绪未尽，还能勉强走下去。

小镇的炊烟在望，活在我们眼里来了。

我们一身雨水汗水，半身泥泞，不到十点就赶到了。上街一问，便见远远的大街上有人排队，队列不小。走到门面前，正是卖炸丸子的所在。我们两人循规蹈矩立刻排在最后。排队的人说，这是湖北公社办的小铺。如今是农忙季节，向内部的人卖炸豆腐泡，对外卖炸豆腐渣丸子，二元一斤。八点开的门，买的人从十里八里赶来的不少，全是菜园肚皮的人物。我仔仔细细扫视了一番站队的人，没一个不是弱不禁风的苦命样儿，唇腐面皱，手脚枯瘪，出的气犹如游丝。我们用眼睛直勾勾望着往下垮堆的丸子，耽心这趟又白跑了。果不其然！卖到我们前面四、五个人，没货卖了。

我简直想大哭一场，这比被人痛击一顿难受，来去百里之遥，驿站的快马都不易轻松对付下来的，况且是两个的饿汉。

我想到商业上支预订金的招数，人家说农忙季节已结束，小铺明天歇业，何时开门没准。这是生命的皈依自我的时刻，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我们像艾青在《乞丐》一诗里刻画的乞丐：“乞丐用固执的眼/凝视着你/看你在吃任何东西/和你用指甲剔牙齿的样子”。然而，在小镇上，见不到吃任何东西的人，而用嫉妒的眼光，看着用报纸捧住炸丸子走过的人，为数倒不少。

我们在袖珍小镇上来而复去，总想把口袋里的几文钱化为填肚子的东西而不可得，连稻草上的一个谷粒，我们也没有找到。往回走时，心里流着泪……

尖 刀 排

人生如寄，风雨虐人。

当我们像陶犬瓦鸡样被人摆弄于股掌之上，戴着荆冠，背着挑着行具，品着如荼的世味，在经纬百端的人生路上，双脚插入泥泞，东歪西倒，冒着雨向老远扫地以待（不是扫榻以待）的一个队赶路的时候，乃深切体味到革出教门

后的堵般况味，难怪污脸百皱，苦泪横流之不暇了。人生太难了。

我们这柄东“突”西“击”的“尖刀”刀把，不知操于何人之手？挪窝迁徙，节奏紧凑，舒眉肆时的一隙之闲也都阙如。东方打柴，西方造饭，北边起床，南边上炕。风雨其途，昼夜兼程。这不，我们刚在一个矮立如栅，围之在内的队一天雨水，一天火焰，受尽雨浴火浴苦刑，刚过芒种，偏歇一方这才几天？一个电话，又让我们这些凡胎俗体，擂鼓登场，投入另一场大会战之中，又要让我们刺刀见红了。

北大荒土著人的农事俗谚说：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天吃饱饭。北大荒本来就水丰壤沃，五月积雪化尽，开犁下种后，土壤含水量充沛，墒情甚好，足够种子萌芽根植之用。等到六月，庄稼茂发，土壤里的水分已被植物汲尽，此时“连天”落雨，解饥解渴，定然丰收在望。1960年，天候却颠而倒之，雨水泛滥，大部分农田泡汤，灾祸显象了。

这次路远，上路前破例施舍给每人二两糊糊。上次赶路，水深路烂，柔肠寸断；这次赶路，路面经过两个暴热天的蒸发，狂晒，满地泥泞类若鹅卵石，碍脚戳脚，况味别具，三言两语难尽其态。总之，雨又回光返照了。雨中咱们这一族的形象颇不雅观，所有的破衣烂衫，都张扬在行李上身上，好在路上也没人看。精神上和实际上路途的坎坷，使人步步走得意兴阑珊，没一点儿“尖刀”样子。幸而这雨下得适中，赶路过半，泥土疙瘩瓦解，起脚落脚好受了些。

可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沉重得累赘不堪。草帽与衣服下摆始终渐渐沥沥得不亦乐乎。走这种路，干这类活，每次我们都是孤注一掷，不剩半分力气，不计后果。

欢乐的生涯，一生只如俯仰之间；苦难日子，则一步恍若一生之长，芒种都从日历上撕掉了，怎么还拉着弓，箭在弦上？还能播大豆吗？然农事何时有个尽头，何况我们只是干活的料，没份闲手坐地。从1958年4月23日投边以还，两三年间，包括元旦春节，没分享过一天假期，除非大雨滂沱，怕大田被踩板结了，不得不歇工外，在今天这样的淫雨下边，我们不是还像水人一样低头赶路吗？

如同走了半生。从七点半起步，走到十二点半，把三十里泥泞路赶完，远远就望见前方路旁的茅屋，炊烟，外加鸡犬之声。

走到岔路口，从袅袅炊烟舒卷自如的茅屋背后走出一人，他在那里看来已等候多时，他撑着油纸伞，一路无话，领我们到两间门破窗毁的老屋，脏兮兮的，蛛网张布，泥地相当潮湿。不错的是，屋角放着些茅草。我们薄薄垫上一层，摊开雨水半透的行具，一头雾水的坐在铺上，到底走到了，觉得沅可闲手片刻了。排长老高见大伙衣衫淌着水，汗流满面，也没吱声，两步跨出门外，脱掉衣服，拧干水分，扑腾几下，便在屋角绷直的绳子上晾起来。我们亦步趋檐下，拧干水分，晾在绳上。

我们这些人，要农场管辖区内，前后到过三、四十个这

样的弹丸小国，没有一个小国之君前来和我们说过话，看望自然从免。打交道的人员，多系复员士兵，态度虽然严肃，不苟言笑，蔑视之色见之于眼角，但马路政客式的人物却没有遇见过。这天接待我们的，之后才听说是炊事班长。他走后不久又来招呼我们去大食堂用膳。那天吃的，是年来最好的一顿饭，每人二个窝窝头，半碗小豆腐。所谓小豆腐，就是豆浆豆渣一锅煮一锅点。至今令人思之。这种前所未有的礼遇，使我们这些受尽侮辱的人，立即表示出铅刀一割的激越。

好像鼓掌欢迎“右派”光临，雨下大了。

我们被深切的感化了，我们的思想非常脆弱，滴水之赐，涌泉相报。走出食堂，高排长立刻去部队领任务领工具。不久，保管员拎着一草袋豆铲放在门外，接着统计支着伞领我们到地头。这坪大田，地阔天宽，目尽天涯。刚到地头，队里派人抬了两麻袋豆种来。统计对老高说：过了芒种，不可抢种；种了肯定减产，但这块地撂荒太可惜了。高排长多少天来第一次开口说话：行，咱们干！

随着老高话音落地，我们一行人，就由东向西，一人四垅（来回各种两垅），扇形散开，尚有余垅不少，可见地块之大，大而低洼。最近两天的曝晒，并未减弱多少水势，垅沟仍像烂泥塘子，水淹脚背，垅上杂草丛生，怎么点种？这是个草莱初辟，土薄水浅的队，这片地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转嫁给我们来种名正言顺。倘若任务拖沓，收成

欠丰，都得拿我们是问，我们是替罪羊；甚至鹿马调换，诱过于我们的事，也发生过。我们自然不知其详，因为，我们是过客，错是人家背后定的。

雨水袭击身子发出异响，雨大了。草帽沉重，背脊沉重，脚底浑水流淌，好像三千弱水尽汇于此，人、山与远树均被收入雨中。我们深深弯下腰去拥抱遍体鳞伤，瘦骨支离的土地，不是和它告别。只要不死，我们就离不开经营一枝之栖的这片土地，生死以之。

我们是老于此道的种田把式，卷起袖口，脖颈上每人都坠着一个装豆种的口袋，考虑往返到地头装豆种麻烦，都宁肯多装些，一般装七、八斤或十斤左右。脚在垅沟里一步一坑，往外拔费力。而老天依然在弄姿作态，零雨潇潇。我弯腰点种时，就感到后脑勺及脖颈被雨水打得生疼，点完左垅，支身点右垅时，雨水就一泻如注，顺着脖着梗子流向后背，老寒浸肤，冷涩逼人，那种不能言说的况味刺痛了人。人在被呆板固执的姿势所苦，不能忍受之时，总想变之动之，缓冲体能的承受力。我略为支了支腰，向左右前边一望，我们三十个人，全在雨中伏地，无一例外。我们都被织入粗犷的雨水之中了。进度大体均衡，除我稍拉后外，都在一条横向线上弯着腰艰难行进。这个野溪乱流的低洼地，水深处如烂泥塘子，豆子点下去随即漂出水面，坐不着，还得再次挖坑，重新掩埋。我们下地不久，雨就连天接地大了起来，背脊成了过水的孔道，渐次往下湿透裤子，裤管里就像

灌满稀粥，万分难受。

这幅“雨播图”，既写尽我等生的艰难困苦，也写尽我等与厄运搏斗始终的顽强。

从早至晚，越阡度陌，行迈迟迟，道梗且长。抵暮回屋，筋断骨散，赶忙脱掉全身水淋的衣服拧干，抹两把身子，摊开发潮的被子，立即裸然而入，只祈一枕黑甜足矣。眼尚未闭，蝇言蚊语便由远而近飞来。苍蝇附鼻，蚊子绕耳，这就是边地的梵贝之声了。

七 进 七 出

许多饱汉的议论，对走入饥饿永巷中的忍言禁声者，总显得不那么得体，例如《孟子·尽心》里说的“知命者（善于掌握自己命运的人）不立乎岩墙之下”的话。那些年，想吃一口饱饭，何处不能去？何处不敢去？岂在乎“岩墙之下”乎？特别是，李渔在《调饮啜·太饥勿饱》中说的：“大约饥至七分而得食，斯为酌中之度，先时则早，过时则迟。”李渔是富家子，一生没饿过肚皮，怪不得毫无一丁点儿饥汉的感同身受，对我们自是一副隔世面孔了。

尽管人心深处，百态万象，感受殊异，却又不无雷同之处。然处在饥饱两条生死线上的人，决不相类。纵然每天食

苦如饴，我们仍感到陋身难保，久而久之，从前百模千样的新颖形态，龙枯虎瘠，都变成了一个饿相模子，年岁差别几乎都分不出来了。因此，在穷山沟打短工的日子，饿得头焦额烂时，也干起了熬“代食品”的勾当。对我等而言，这就有点“立于岩墙之下”的境地了。除锅之外，均取自公家，是不折不扣的假公济私。我们没法睁开第三只眼思考世界，只能圆睁两只驴眼考虑肚子。大约阳禄未终之故，我们还苟延残喘活着，活得像死一样莫知莫觉。不过，熬“代食品”的资源，旧苞米棒子有限，土著农工扛大麻袋回家熬煮，不多几天，资源告罄。即使资源充足，我也打算另谋出路，不再干“立于岩墙之下”的事了。

往返百里买豆腐渣丸子扑了个空，一身水气回到暂栖的客地，就像笼鸟入笼，槛猿收槛，斗方之地的蜗居内，冷默得如断了气。未死之身，似木偶衣绣，等着活动后卸装再放入戏箱就一了百了了。

也没沮丧几天，我们这些农忙季节的香饽饽，忙完农事，一时闲手，被人又视为粮囤里只吃不干的老鼠，请我们来的小国之君，双手一拱，立刻又送我们回到睽违了几个月的七间房的精神巢穴。

回老窝前，我们绕道咫尺之隔的分场，到收发室逡巡了一阵。我们外出打工，归止无定，邮件都压在分场，尤其是京津沪地区寄来的食物包裹，络绎而至，多是尚未破裂的家庭的妻室儿女，或难得的亲朋好友寄来的一种精神慰问。我

见之心动，竟异想天开的给诗坛一位权威人物汇去六十元，求他买些充饥的食物寄来。这位我在徐迟家聆听过他畅谈与某上智伟人谈诗的前辈，给了我一个闭门羹，在我的汇款单上批了一句话：“不认识此人”璧回原地，让邮局的人奚落挖苦我好半天。我万分难堪的踱入收发室，却见桌上躺着一封我的信，肯定是被人从大堆信件里抽出来刚放在桌上的。

信是成都寄来的，三弟的笔迹，很厚，拿在手里亦感到它的份量。我猜不透里面藏着什么异物，这么厚重，周围人多，我立刻掖入口袋里。半路上没人，我忙抽出信纸一看，发现几层纸里裹住一张伍斤全国粮票！这像人生秘境里邂逅一位善解人意的美人。这是在成都体育学院任教的三弟寄来的。我像马失前蹄后又被钉上赶路的铁掌那样欢然一笑，一时高兴得忘乎了所以。

世无陶朱公。而那时的粮票，不输陶朱公，尤其是全国粮票，全国通行无阻，人见人爱，犹如金票，生命券，甚至是从死亡线通向活命之路的通行证。我生怕它飞了似的，立刻放入有扣子的上衣口袋里，扣好。满足感使我觉得生命毕竟得到了一种充实。

三弟与妻子刘惠芳薪资菲薄（比我月收入 28 元自然高些），膝下有一儿一女，但三弟仁厚，将年迈多病的母亲，从故乡峨眉接到成都闲住，生活由是又添了一份沉重，然而，竟寄来以金子论价都难弄到手的全国粮票，使人顿感衣轻席暖之美。

粮票掖入带扣子的口袋后，胜过刨地刨出了狗头金，深更半夜，便在兰芷芑泽的梦里滚过来滚过去，反复定着尺寸：如何最得体最合算的将这个金娃娃消而化之。我决定远走虎林盘桓几下再说。我在饥饿中才感悟到，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将生命延续到“难关”以外。

那阵子请假，不问有没有理由，口头一说就准，假条都不用写。队领导人心里有数，我们这些头上有“金箝帽”的人，惹是生非，作奸犯科的事，不会有我们在内；而况，人一外出，队里就省下一份口粮，何乐而不为呢？然发布独门消息的灵通人士告诉我，去虎林饭店或工农饭店就餐的人，光有粮票钱票还不中，还需出示盖上公章的出差证明，即使这么严格，排到一里开外的队伍，从朝至暮还是人流不断。

虎林饭店成了方圆百里的施舍驿站。

当时饶河县合并了虎林，简称虎饶县，是十万转业官兵仰慕的圣地，手下十余个大农场，两个林业局，流动人口可观，盲流亦多。所以，要带出差证。晃过证明，腰包里只要有三两粮票三角钱，就能领到一份饭食：一个窝窝头，一碗菜汤。

我九点钟匆忙吃罢早餐，就掖着证明上了路。滚热的三两玉米面糊糊，只能解渴，不能解饥，走出不到十里地，一身大汗，供不应求的身子，就如病入膏肓的样儿，东边一歪，西边一斜，艰难备尝的跋涉四十里，才赶到辉崔火车

站，刚买上票，从密山折返东方红的火车就鸣笛进站了。到虎林，还有凉水泉、宝东及西岗三站，下午两点半到。我外出的理由是看牙病，牙龈红肿已非一日，不敢使劲咀嚼。

出虎林火车站是广场，空荡荡的广场对过就是虎林名气最大的虎林饭店。饭店门外的盛况，一眼便能望见，熙熙攘攘，拥拥挤挤，排了一里三、四百人的长龙，吓我一身冷汗，今儿个会不会又扑个空？看牙病的事，早就忘诸脑后。我火速跑过去站在老末。片刻工夫，背后又续上二、三十人。像我这样饿得迈不动步子的人，应该设法自己为自己解除饥饿，哪怕“精神会餐”那种方式，也不是一无是处；不应该饥饿之外，再添一笔饥饿的烦恼。实际上，我们这些年，就是这么自己唬弄自己混过来的。现在有了条件，要实际解决问题了，再“混”下去，命都得搭进去了。

缺乏“动力”的饥饿年代，为消解饥饿而天南海北来排队的“动力”却方兴未艾。三、四百人，手持出差证，粮票，顷刻消化一部分，又后续一部分，蠕蠕动动，永远那么多人，直到灯火阑珊的夜晚，饭店打烊，外边还有人排队。千百张脸，形象不殊，而气质相似。绝大部分，无非是为免于野死沟壑，方从寒荒僻远之地赶来的。斯时斯世，天下已没有梁园器客，排上队的，多是以卜度日的常鳞凡介，布衣寒素之人。我始终忧心缘分不及，空跑几十里。然蠕动之快，大出意外。饭店门口专门有人验证，无证走人，免开尊口；进门是四组八人接待，一个收款付窝窝头，一人盛

汤。我排的时间二十分钟左右，以此推算，一天流动在万人以上。

授餐与受餐的人，都忙如衔泥筑巢的燕子。在这种时候，我才深切体会到：人要活下去，何其艰难乃尔！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生命才显得尤其可爱而尊严。钱款交清后，我得到一个窝窝头，一碗菜汤。左右一望，十余桌人，没人交谈，手、嘴都在桴鼓相应，相互配合。

菜汤的热气，泅湿人的形象。如今在僧多粥少的世上，千圣万贤，隶卒仆奴，一概都沦入了饥荒，尊卑秩序乱套了。我曾见过菜色脸孔的人攘臂夺食的场面，被抢的人一声骂也没有，一脸洗然。他可能认为，换一个位置，换一个时间，他可能也会去抢去夺，甚至被抢的人，就是今天抢他的人。

所以，坐入八人一桌的位子后，就一手扶着汤碗，一手捏紧窝窝头，以防不测。半碗浮沉着几羽菜叶子的清汤，就是我们昼夜寻之的兰芷芡泽了，那末，能带着一应俱全的物什进入饭店之门，就是步入莲花佛国了。

望望门外就食的队伍，使我想到当年齐国的黔敖施舍饥者时，却有“蒙袂辑履，贸贸然来”，不愿吃“嗟来食”而饿死的君子。山川不改旧时，二千几百年后，人们又饿得只剩一双眼珠子在动时，不吃“嗟来食”的人没有了。

来虎林前，就听说店内设有豪华的“贵宾单间”。所谓“贵宾”自然不是洋鬼子，而是打鱼摸虾或种烟叶致富的暴

发户，多为乡间俗人。内设三百元或五百元一席，十碗八碗，大鱼大肉。我站在门外，向里观望，这些人特别喜欢你向他们东张西望，这也是他们摆谱的时候，乃至不失关东人的豪气，向你敬一杯酒，邀你入桌叙谈。里面老少咸集，朋辈满桌，座中有酒肉面孔，有游口器市荡子，有的双脚蹲在凳上，有的耳轮夹着纸烟，大杯小杯，仰脖就灌，好几个成了关公……

窝窝头在饥饿者嘴里，倒是甘之若饴，可惜吃到草木贱躯肚子里，就像没吃。走出门外，我见刚才一桌就餐的人，又迂迴着去排队，我也邯郸学步排在后边。如是者四。我怕守门的鬼脸判官认出我，将我拒之门外，那就人格扫地以尽矣。于是，拐了一个弯，气壮如牛的到农工饭店门外去排队。粮票如金，本不敢移用，可是，上一趟虎林，肚子都不让吃饱，那就太冤了。农工饭店门外，少说亦有三百人。饭食大同小异，唯汤里多了十几枚珍珠似的黄豆，有点咬头。我又反复三进门三出门。从下午三点到六点，七进七出于两个饭店之门，肚子吃了二斤一两，七碗汤，饱是饱了，可七间房是回不去了。

我揣着出差证急走六里，赶到西岗住进了两角一宿农场招待所大统铺，整整一夜，肚子都没瘪下去。

一死而未死

蜀汉大将魏延，莽莽撞撞，闯灭了五丈原军帐里诸葛亮祈求活命的“七星灯”，孔明终至死于战事未竟之时；也因此，被孔明判定他后脑勺长着“反骨”，暗中定计，在他死后让人除之。我怀疑自己生不逢辰，命寄蜉蝣春秋，也时时沐手熏香，燃着心上的“七星灯”祈祷。然而，却又时时不知多少次几乎闯灭了心上的“七星灯”。我这条久经沧海横流波涛拷打的小鱼，蓦然回首惊讶一望，才发现自己竟然闯过千层网罟而不死，是我没长反骨吗？

我的这条命，风尘劳瘁，屡经迁易，光是破厄灭灾，死而未死（说白点就是该死而居然没有死去）的事件，莘莘大者，就有七起。仅仅1961年，就有两次而未死的记录，不能不被人叹为异数。

这年8月，我在离虎林镇约二十里，位于红岗车站附近某农场二分场的一个队落脚。因为人已如“行尸走肉”那样没有活气，故未让参与劳役，反而给挂了个“文化教员”的虚拟头衔。不参加劳役不说，亦不传授什么文化。那时处于天下无作品问世而“洛阳纸贵”的古怪时代，饥饿把纸头纸脑都吓跑了，你走遍虎林镇，捡不到一寸纸。不仅

“三纸无驴”的文件绝迹，非正规报纸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干脆关门大吉。我帆布箱内锦衣包裹的旧作等等，全部权作烟纸焚化。人们思索的是脑子不是肚子。我既无文化传授之责，又分派我独居一间草屋，意思就是让我将息似死未死之身了。

分场最具活气的场所，是专做红烧鲫鱼卖的饭铺。这个分场号称鱼米之乡，沼泽湖泡，星罗棋布，盛产鲫鱼。而鲫鱼之养身奇效，我不仅久有风闻，还亲见其立竿见影拯人之效。我们刚来分场不久，分场派出去伐木的人也正从山上回来。个个黄皮寡瘦，以行将入木的形象回了家，使人见而惧之。分场党委乃决定送给每人十斤鲫鱼，由饭铺做好分发。我的四川朋友周兴华亦在十余个受惠人之中。数天后这些人缓过气来了，脸色也受看了。我们学着也买鲫鱼调养。分场工人，家家都有几麻袋鱼，可按分场规定价格（5角一斤；市场上卖三元一斤）调剂有无。

饥饿给农场在精神乃至经济上的打击都是致命的，个个一文不名，如同乞丐。我们每月28元的生活费，分场也支付不起，后由高人施计，油印五角，一元的“代金券”，准许在商店、饭铺当现金通用。我成为持券到饭铺买鱼的老顾客。饱更事变之苦的身板，渐次有些起色；我既然眼见鲫鱼大补的神效，便托北京来的戚龄从中搭桥，买一口袋，夜夜炖汤喝，脸色慢慢也中看起来。

苦人清闲，有点儿精神，死神便来敲门了。

8月是北大荒风爽气鲜，色泽绮丽的季候，我却不明底细地猝然被推入腹泻不止的苦境，每天八、九次之多，有刚刚提上裤子，又立即要往下撻，疲于奔命，苦不堪言，肠子都拉断了。用过所有的止泻药剂均未奏效，卫生所的大夫不断摇头，摊开双手，表示计穷，爱莫能助，仿佛把我从医疗上判处了“死刑”，只有“等死”这一条路可走了。

就这样等“死”吗？答在问中，问在答中。我劳生扰扰历经千难万险风风雨雨才活到今天，就这么自行了断？我一口否定：不能哲人其萎，梁木其朽！不能呵……

如今落相到皮骨仅存，寸步难行这个地步，与其随吃随拉，当造粪机器，求医无望，无异死而求医，这么下去，何不如中断饮食，绝水绝食几天，以观动静，看它肚里还有什么泻的？处在那种饥荒年代，已经泻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拿着这副底气耗尽的脆弱身板，还要绝食绝水几天，这是极其可怕的冒险，但又别无选择，别无道路可走。

1956年我去拉萨，就听宗教界的人士说，按藏传佛教的法规，各世达赖成年后，都必须封闭于暗室，七天七夜不许喝饮进食，以验证其是否活佛金身。有的就熬不过七天而一命归天。我的体质，哪能与牛肉羊肉酥油供养出来的健壮藏人比较？

我关门闭户，门外贴了纸条。躺在炕上，对开饭钟声的诱惑听而不闻，对不速之客挥手请之。我在炕上想起这些年风雪泥途扑倒爬起的细节，忍不住泪流满面。绝食到第四

天，只泻一次，拉出的秽物状如口水。我估计一天半天死神拉我不去，决定再绝食一天；到第五天，肚腹坦然，泻止。第六天上午，从死神手中逃离出来的我，步履维艰的蹒跚到医生们跟前。他们见我落相到那个份儿上，都万分惊愕；听我说腹泻终止了，又不免愧然相对。望着从棺材里走出来的我，他们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们认为这个险冒得太可怕了，但又说，死而未死，也值。

二死而未死

许多事实，由于年穷岁尽，代远年湮，品嚼到嘴边时仍不免于镜花水月，雾里望山，只能得其仿佛，甚至不甚了然，不甚了了；而想到人生旅途几死几不死这些刻画在骨头上的事例，想到斯时斯地犯风当雪，草木皆兵，惊魂四绕的况味，则逼肖在前，恍如昨天。

饥饿的六十年代初期，在经济上，农场尤其饥饿不堪，穷得一丝不挂。我所在的某分场，虽被称为鱼米之乡，也不例外。领导人千思百虑之余，决意做一场无本生意，组建五、六十人的庞大副业队，率队打入百里之外的深山老林，以楝橡子（柞树果实，是饥荒年间酿酒的原料，据说喝多头痛）为主，旁及捡猴头蘑，晒干出口苏联还债，80元一

斤；再其次，木耳，做果酒的山葡萄，亦在收罗之列。

为使这次边缘劳动有点成效，供应标准从即日起，由每天六两提到一斤。蚕老烛尽上山来的老弱病残，听到这个数字，立即欢声飞动，喜形于色。9月20日开头活动那天，除我一人没完成棟橡子60斤的指标外，其余的人，都被早餐那野性的诱惑燃烧得发疯发狂，个个满头插花，嘴角流香，大破特破记录。这都是打在我身上的当头棒。

我深感老脸丢尽，抬不起头，见不得人。我决心振衣而起，一雪此辱。

次日，1961年9月21日，我囫囵个儿嚼碎两个大饼子一碗热汤。就像蝌蚪甩掉尾巴，我毅然摆脱鱼贯而出的群体，自择一路，独辟蹊径而去。百步林美，千步草香，都没心思一品一嚼，只顾往矮拙拙的柞树直奔，奔到就埋头拾宝，其他皆视而不见，农工们的呼叫对答，则听而不闻。约莫午后三点，橡子在麻袋里冒了尖，80斤不少。虽肚腹枵然，也一时热肠如沸，扶到背上就往家赶起路来。心里踏实得笑了起来，肯定是破记录了。

橡子轻，不压称，80斤多点，装了满满墩墩一麻袋，高耸过头顶之后，驮在我这个80斤左右的劳力汉子身上（在部队，每年体检都是48公斤；1956年4月随机试航拉萨，5月返西安去人民商场过磅45公斤；如今40公斤左右），自然是一份沉重，尤其沉重的是，我已经没有任何关于“路”的印象了，我像驮着食物找不到蚁穴归去的蚂蚁

一样，显然在盲目乱窜。两种沉重交错临头，压着背，累着腿，只能驮着橡子，独立苍茫，徒唤奈何。看看身上，布衣草裳，尽被灌木枝条撕烂。我的衣衫形象，纯粹是一个乞丐，看着寒心。我想拔个尖，结果成了彻底的失败者。

哪怕驮着万两珍珠，没有路，那和驮着草芥有啥区别？何况驮的是橡子。

胡走半天，林藪渐次深不可测，如千丈止水望着人。我断定我已贸然闯入令人朝惊暮惧的，连老猎人都不敢正眼窥其玄奥的原始森林。我必然迷路了。迷入原始森林比走在薄冰上可怕；更可怕的是，一帮绿林豪客（我反复多次推敲，认为是野猪，黑瞎子是天涯荡子，决无群体粉墨登场之理）汹汹嚷嚷，追在背后。我正胡涂莽撞间，鱼龙曼衍，形势丕变：风吹异响入耳，是土著野物向我发逐客令来了。

这些畜生在背后两百米处的一声恶嚎，击痛我的膏肓，可我反而因之走得那么稳而重之，一步不慌。我不能见短于这些异类，若让其品出我是个弱者，必然汹汹而上，我对之能使出什么招数？我自然是孱头，弱者，但不能不装出强者的架势。高耸过头的麻袋帮了我的大忙，使对手见而不敢小觑看我一眼。让畜生们在脚后嚎叫去，我走我的，别惹恼它就行。我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手头用木棒重重杵地，脚上长统水靴重重着地，给畜生们嚎叫一个回答。

然而，我完全明白，我已然走在死亡线上，我那种虚张声势的样子，能坚持多久？每一秒钟，青皮们都可能扑上来咬断

脚跟。我是“入侵者”，且又孤身一人，没有地形地貌优势，我是祭台上的羊羔，不是力的斗士，不是搏击者。因之，我必须逃，必须躲，然又不能让追击的土著畜生看出虚实。

在茫茫原始老林中，追与逃，已持续三、四个小时，生命如挂在悬丝上。问题的严重还在于：我能不能摆脱对手，以及，如何摆脱。我敏察到：追索者与我的距离，已由开始时的两百米，慢慢缩短，如今只有一百米左右，死神不远，对手跃跃欲试，想较量一番了。为寻找一个安全的港湾，唯一的办法，就是上树避其锋芒，再徐图解脱。

在北国木落霜飞的1961年9月21日，我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又步入深夜，落着细雨，为保着一条命回到“人的队伍”，我爬上一株高大的槭树，坐于横枝，背依树干，躲过与野兽们一决生死的可怕下场：我每一秒钟都可能被对方扑倒，死于非命，但我没死。

上树坐定后，我自然而然地想到，深山篝火之夜，对我的走失，夜不归营，人们会怎么议论？指定会有人疑惑（包括领导人）：是否越过边界，跑到苏联去了？这次上山搞副业的人员中，只有我是“在劫难逃者”。人家偷摸卡拿，都沾不上“政治”的边，我走歪一个步子，都是“政治”。我不能背这个黑锅。我得溜下树？赶紧回去“验明正身”。然而，树下左边右边后边，三面被围，嚎叫犹在，我下去，不是兽口投食么？……

千万别死，死不得；走回去死怎么都行，死在原始林

子，说都说不清了。

这是我一生中七次死而未死中第二次的险境险况，幸而天公地道，该得不死。

寄
人
篱
下

陈喜儒

陈喜儒简介

作家、翻译家。1946年农历7月30日生于吉林省乾安县。1968年毕业于大连外语学院日语专业。长期从事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业余创作，并研究译介日本当代文学作品。创作有散文集《异国家书》、《心灵的桥梁》等，翻译日本长篇小说《泥石流地带》、《花葬》、《皇后泪》、《流浪王妃》、《雪娘》等二十余部，中短篇小说二百余篇，主编《世界侦探推理小说名著精选》五卷，《立松和平文集》三卷。1984年参加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1985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

巴 金 先 生

初 见 巴 金

1980年春天，中国作家协会组团访日，团长是巴金，副团长是冰心、林林、还有艾芜、公木、杜鹏程、敖德斯尔、邓友梅等作家。冰心老人当年80岁，巴老76岁，考虑到两位老人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巴老女儿李小林，冰心女儿吴青随行，照料二老生活。全团12人，翻译只有我一个，临行前忙得天昏地暗。

巴老是3月20日来到北京的，我去国务院第一招待所看他。我到作协工作不久，过去虽读过许多巴老的书，但还没见过巴老，这一次给巴老当翻译，心里很紧张。一路上我就想，见到巴老，我应该说些什么呢？他是大作家，我是小翻译，干脆给巴老鞠个躬吧。

走进 213 房间，一位戴着眼镜，身着蓝色中山服，满头白发的老人站起来，伸出了手。我忘了鞠躬，赶忙迎上去，握着他的手说：“巴老，我是小陈。”巴老说：“你是和我们一起去的翻译吧？”我说是的，我的日语不好，请巴老多指教。巴老笑了，说：“我可不懂日语呀！我是四川人，说话口音很重，不太好懂，会给你翻译带来困难，请你多帮忙了。”

我说您刚才讲的话，我都听懂了，四川话独有一种音乐美，我很喜欢。

213 房间很小，两张床，再放两张沙发，就已经很拥挤了。我说巴老客人多，房间太小了，来两三个人，连身都转不开。巴老说：“很好，很好。开人大，开文代会，我都住在这里，没关系的。”

我汇报了出访的准备情况，并说日方强烈要求巴老在日本举行一次讲演会，如果能写出讲稿，就可以译好带到日本去，免得到时候来不及。巴老说：“讲稿已经写好了。”说着拿出了《文学生活五十年》，大约有 7000 字，抄写得清清楚楚。

这时，服务员进来说，这个房间太小了，还是换一间大一点的吧。我也帮腔说，换一间吧，这间房子我进来都觉得憋得慌。巴老没有继续坚持，随和地说：“也好，也好。”

第二天下午，我下班回家时，顺便给巴老送去一些有关日本的资料。巴老昨天说好久没去日本了，得熟悉一下情

况，还有日本诗人松尾芭蕉写鉴真和尚的俳句，他忘记了，叫我帮他查一查。

我敲了几下门，里面没有动静，又敲了一下，听里面说：“请进来”，便推门进去，看见巴老手里拿着一本《当代》。他刚才在专心看书，没有听到敲门声。我把材料交给巴老说，咱们这个团很大，又都是名作家，我很紧张，正忙着看有关资料，熟悉作品。我感到当文学翻译很难，无边无际。这句话说的是屈原、李白、杜甫，下句话可能就是雪莱、拜伦，甚至是萨特、海明威，临阵磨枪都不知怎么磨，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巴老说：“你不要担心，去几次多谈谈就有经验了。小高（高行健，原作协法文翻译）去年到法国不搞得很好吗？我前几次去日本，有位女翻译叫安淑渠，还有一位叫刘德有，他们日文都很好，工作也认真负责，代表团和日本朋友对他们评价很高。”

我说安淑渠同志还在《人民中国》杂志社，刘德有同志当了局长了。

巴老说：“当局长可以，但最好别丢了专业。培养一个人很不容易，要花许多时间，很多钱。”

我说，昨天我陪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先生去见阳翰笙同志，也谈起过这些事。清水先生对一位敦煌学专家去当文化厅副厅长大惑不解。他说这是个宝贵人材，应该为他创造条件搞研究，而不是叫他去当官。

巴老说：“是这样，我赞成。有些作家写了几篇东西就去做官了。做什么官呢？作家就是要写东西，不然还算什么作家呢？当了官，心里还想着写作，不安心，工作做不好，创作也没搞好，我看还是应该叫他们写东西……”

从巴老那里出来，骑着自行车回家，心里踏实多了。巴老是个和气的人，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给他当翻译，我不会紧张的。

巴金与日本读者

在东京的朝日讲堂，巴金发表了《文学生活五十年》的讲演。偌大的讲堂，座无虚席，一些后来者，只好坐在台阶上、走道上。一位日本朋友说，日本的生活节奏快，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如果在星期日讲演，人可能会来得多些，但能坐满讲堂的2/3，也就到顶了。今天是星期四，居然来了这么多人，实在出乎意料。很多人是从外地来的，请假来的，我们事先估计不足，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否则可以找一个更大的礼堂。

巴老讲完话，人们一时还未意识到，过了一会儿才响起稀疏的、继而热烈的、海潮般的掌声。人们迟迟不愿离去，好像还期待着什么，纷纷站起来，尽情地鼓掌。一些人离开

座位向前台涌来。

清水正夫先生领着巴老从台上直接回到了后面的休息室，但还没等巴老坐稳，读者们就蜂拥而至，把休息室前面的走廊堵得水泄不通。从崎玉县赶来的若生爱子，在会场上写了一封信，要亲自交给巴金。她在信中说，“我在中国工作时，就读过巴金先生的《家》，深受感动。今天能听到先生的声音，非常高兴。我现在每周和朋友们搞一次读书会，下一次我们将读先生的《家》。”

一位研究巴金的大学生因为有事不能来听巴金的讲演，感到非常遗憾，就委托他的母亲向巴金转达他的问候和敬意。请假来听讲演的平田百合子说：“巴金先生用笔来探索人生，他的真诚和执着令人尊敬。”有几位青年一直跟在巴老的身后，但没有说话的机会，恳切地跟我说，能否要一张巴老的名片。

人越来越多，有请巴老签名的，有想和巴老照相的，有来表示敬意问候的，有来采访的……急得接待事务局的清水正夫和西园寺一晃先生团团转。他们的确很难办，阻止吧，这些人都是巴老的读者，不能伤了感情；不阻止吧，巴老刚讲完话，还没喘口气，又怕累坏了老人。清水和西园寺两位先生是见过世面有丰富经验的人，一时也想不出好主意，只好并排站在门口，委婉地向热情的读者们解释，说巴老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请大家谅解。然而，还是不断有人“闯过封锁线”，走到巴老身边，握手问好。

当我们乘新干线由广岛前往京都时，途经一个小站，停车一分钟，这时站台上出现一条横幅标语，上面用斗大的汉字写着“欢迎中国作家巴金先生”，几个手拉标语的人挥手向车内致意。他们笔挺的西服上，隐约可见雨水打湿的痕迹。车窗是密封的，彼此无法说话，但从他们的手势、表情、眼神可以看出他们内心的激动。不知他们的姓名，不知他们从哪里来，更不知道他们怎样得悉巴金经过这里，但他们来了，冒着大雨来了，向巴老表示他们的敬意。

巴老看到那条标语，心情也不平静，走到车窗前，向这几位不知姓名的朋友招手。车徐徐开了，那几个人深深鞠躬送行。巴老也站在车窗前，恭恭敬敬地向他的读者深深鞠躬，之后缓缓坐下，默默地沉思什么。

京都到了。巴金刚刚走出车门，一位戴眼镜的女士从欢迎人群中迎着巴金走来。她紧紧拉着巴老的手，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亲切地谈起来。原来这位是巴老第一次见面的“老朋友”岛田恭子女士。岛田毕业于大阪外语大学中文系，大学时代读过巴老的《家》。她结婚后，生了孩子，成了家庭主妇，整天围着丈夫孩子转，听着锅碗瓢盆交响曲，内心极为苦闷，难道我的一生就这样度过吗？她不甘心，但日本已婚妇女大多如此，自己也不能免俗。痛苦中，她想到了《家》中的觉新、觉民、觉慧。她当然不是要离家出走，但要为自己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于是她开始学习研究丢弃已久的中国文学。当时，中国正在革文化的命，巴金正在

“牛棚”里，她无法买到巴老的书，后来托人从香港南国出版社买来了《巴金文集》，用两年时间读完了近400万字的作品。

正在这时，她从报纸上看到巴老还活着的消息，马上给上海作协写了一封信。1978年7月，她收到巴老的回信，信中说：“在我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你还买我的书，读我的书。你对我的信任和理解，我非常感谢。”

后来，岛田恭子开始编撰巴金年谱，每有疑问，就写信请教，巴老总是热情回信，解答疑难，不断的书信往来，使他们成为不曾见面的老朋友。这次岛田听说巴老到京都来，撇下家务和工作，主动来义务服务。岛田恭子激动地说：“见到您，我真高兴。”巴老说：“你对我的信任，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感谢你……”

在长崎举行的酒会上，中川和夫先生拿来了两本县立图书馆藏书。一本是由岛静子、冈崎俊夫翻译，1952年筑摩书房出版的《寒夜》一本是由冈崎俊夫翻译，1953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憩园》。纸张早已发黄，书页上有汗渍和手印，原来的书皮早已破碎，重新包上了牛皮纸。20多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借阅，借书卡片已更换多次。中川先生请巴老签字，巴老在扉页上写道：“来到长崎，我实现了四十几年前的心愿。”

我问巴老，四十几年前的心愿是指什么？巴老说，“1934年我第一次到日本时，就想到长崎看看，但一直没有

巴金先生 机会。”当时他在日本写的文章，后面的地址都落的是长崎，这样写是为了不暴露行踪，也流露出他对长崎的憧憬，以后又三次来日本，但也没有到长崎，今天他终天来到了这个与我国隔海相望的城市，实现了46年前的愿望。

中川和夫举起巴老签名的书，当场宣布：从此这两本不再外借，将作为长崎的一份财富永远珍藏起来。

在日本访问期间，几乎每天都有人拿来纸笔，请巴老题字留念。忙完白天的日程后，我就捧着纸笔到巴老的房间去。说句老实话，我有点心疼巴老，怕他累坏了。访问参观的项目排得满满的，完全是以日本速度在运转，连我都有点吃不消，更何况上了年纪的巴老？但巴老好说话，不管是地方行政长官，社会名流，还是一般读者，他都是有求必应。

日本有一种方块硬纸板，一尺见方，上面有一层宣纸，专用来题字写诗，日语叫“色纸”。我每天晚上都要送几张到巴老的房间，上面附着求字者的小纸条，第二天早晨取来交给接待委员会。有一次，我数了一下，竟有十几张。巴老又特别认真，不是写上名字就完，总要根据不同的人，写下一句有意义的话，为此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我希望巴老别答应那么多，少写几张，多休息一会儿，但巴老却说：“我们作家是靠读者养活的，要为读者服务。”

中国作家代表团将由长崎乘飞机飞往上海。候机室里，来送行的人很多，几位日本朋友依依不舍，流下了惜别的泪。巴金的眼圈也红红的，与送行的人一次次握手，一次次

告别。

这时，有一位日本老人走来，对我说，他是巴金的读者，从报纸上知道巴金先生今天回国。他坐了1个半小时的汽车，赶到机场来为巴老送行。他说：“我知道巴金先生很累，我不说话，只想和他握个手，表示我的敬意，可以吗？”

我走到巴老跟前，讲了这位读者的请求，巴老马上走过来，握住那个人的手说：“谢谢你特意赶到机场来。”

那个人，信守诺言，紧紧地握住了巴老的手，但一句话没说，之后深深鞠了躬，转身走出了候机大厅。他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我至今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巴老的读者。

巴老对读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把读者当做知心朋友，主张把心交给读者，因此他也得到了读者的心。

我不会写诗

日本京都的岚山，古称荒櫟山，是丹波高地一座不起眼的小山，但在镰仓时代，后嵯峨天皇在此大兴土木，建造离宫，移植樱树，使这里成为春赏樱花秋观红叶的名胜之地。

这里有渡月桥、法轮寺、小督冢等古迹，但对于中国人

巴 最有吸引力的，是坐落在大堰川北岸龟山公园内的周总理诗
金 碑。
先 碑。
生

诗碑是日本各界人士集资兴建的，上面镌刻着廖承志手书的周总理诗《雨中岚山——日本京都》，碑后日文是：为纪念1978年10月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为表达京都人世代友好的心愿，在这渊源深远之地建立伟大人物周恩来总理诗碑。

我们随巴老、冰心、林林，日本剧作家依田义贤等一起来到岚山。巴老走在最前面，手捧着一束鲜花，他低着头，好像在想什么，脚步格外迟缓。走到诗碑前，巴老献上鲜花，与大家一起向诗碑鞠躬。

摄影留念后，大家走进日本式茶室休息。对面是苍翠的岚山，一片片、一簇簇盛开的樱花，如飘渺的绯红色的云霞，山下，大堰川清澈碧透，蜿蜒东去。这时，冰心老人拿过笔记本，挥笔疾书，记下了当时的万千思绪：参谒总理诗碑，谨步总理“大江歌罢掉头东”原韵：

高歌直下大江东，
力挽狂澜济世穷。
仰首默吟低首拜，
岚山一石一英雄。

1890年4月10日冰心

巴老接过来，念了一遍，说写得好。依田义贤先生要求写给他做纪念，冰心老人拿出一本随身携带的周总理诗集，写在扉页上。

我说，巴老，您也写一首诗吧。巴老说：“我不会写诗，你们替我写吧。”我说：“我替您吃饭还行，别的可替不了。”巴老笑了。他坐在茶室里，眺望远山，喝着甜米酒，口里念念有词。我以为巴老在作诗，但仔细一听，是背诵冰心老人刚才写的那首诗，不由得一惊，一个76岁的老人，居然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

我说“巴老，您的记忆力可真了不得，看一遍就能背下来。”巴老说：“我年纪大了，记忆力不行了。年轻时，能记住，现在虽然当时能记下来，但过不了几天就忘了。这首诗写得不错，所以一下子就记住了。”

大家谈起了诗，巴老说：“艾青的诗，写的好，有形象，译成外文也很受欢迎；他的知识面广，视野开阔，诗的内容也丰富。”

在回来的汽车里，冰心老人说：“我们上次到日本来，听说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打弹子的游戏，日语叫‘扒金库’，与巴金的名字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封老巴为‘扒金库’老板。”巴老笑着说：“我还能当老板，那可要发财了。”

在巴金家做客

中国作家代表团从日本长崎回到上海已经两天了，明天大家就要离开上海各奔东西，十七天朝夕相处，相依为伴，过得充实而愉快，一想到即将分手，都有些恋恋不舍。

我们这个团有巴金、冰心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他们的人品和文品深受日本各界人士的敬重。代表团所到之处，都受到隆重接待。到达东京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在首相官邸接见全团，因为他年轻时读过巴金的书，是巴老的读者，到外地后，均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出面接见，作为作家代表团，享受如此高的外交礼仪，是过去没有过的。

有人说，咱们走之前再去看看巴老吧，大家一致赞成，巴老虽然住在家里，但也参加团里的总结会，天天见面，不过，离开上海前，我们还想再看看他。

巴老当年 76 岁，虽然头发全白了，但身体还好，走路慢一些，但脚步稳健，他不是我们团年纪最大者，冰心老人大他 4 岁，整整 80。在我们团里，对巴金有两种称呼，我们叫巴老，冰心称老巴，相同的两个字，位置一调换，意思大不一样，难怪老外搞不大明白，汉语实在太奥妙了。

坐在汽车里，远远就看见巴老站在门口，春风吹着他的

白发，象飘荡的芦花，我们跟在冰心老人后边，走进巴老的小院。

这是一栋花园洋房，房子前面是一片松软的草地，种着玉兰树、樱花、月季花。樱树不高，满枝绯红的花朵，只是时令已过，在即将凋谢的樱花下，已长出嫩绿的叶。

巴老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先去叫外孙女起来，一起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埋头书桌前，开始工作。

大家走进客厅，坐下来喝茶闲聊，有人问：“文革中没有把你赶出去？”

“当时楼上都封了，贴了我几千张大字报，说我是卖国贼，反革命。”

“书呢？”

“我写的书，各种版本都给抄走了，散失不少，别人的书，他们没有拿。”巴老说着，把签好名的书送给大家，一本是《爝火集》，一本是《往事与随想》。

我和杜鹏程想看看巴老的书房，上了二楼，巴老的书房，四壁都是书柜，外文书和辞典占据了很大的空间，有日、英、法、俄、世界语书刊，还有一些线装书，但不多，里面靠墙的地方，放着一张写字台，上面堆满书刊、文具、稿纸、显得很凌乱。这是巴老晚上写作的地方，外面的一间，光线很好，也放着一张写字台，是白天写作的地方。桌子上放着一张夫人肖珊的遗像。巴老每天与夫人相对而坐，在夫人的亲切目光下工作。

巴老陪冰心老人上楼来，巴老说：“小陈，你需要什么书自己随便拿吧。我这里买书方便。”

我在巴老的书柜里拿了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的《往事与哀思》，并在扉页上写“巴老家的书，可以随便偷，随手拿了一本，留作纪念，算是开头。”我读给巴老听，巴老笑了，连说：“好的，好的”。我说：“巴老如果同意，就请您签字画押，以后我可要在偷特偷了。”巴老拿起笔，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表示授予我随便偷书的特权。

我们告辞出来时，巴老一直把大家送上车，又特意走过来对我说：“您什么时候想偷书，什么时候来，我随时欢迎。”大家都笑了，说今天出了个小偷。

巴老是喜欢青年人多读书的，从1980年以后，巴老每出一本书，都忘不了我，有时是自己亲自打包写地址寄来。如今我的书房里有几十本巴老的书，都是巴老送给我的，这些书使我明白了许多为人为文的道理。

三份生鱼片和两杯酒

当翻译是个苦差事。

不知底细的人，以为这种工作很风光。其实，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在宾主谈笑风生中，翻译的大脑就像个

交换台，不断把 A 语变成 B 语，再把 B 语变成 A 语，而且必须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这种强脑力劳动，几个小时下来，精疲力尽。

这些姑且不论，单说吃饭，就是“吃说难以两全”的难题。主人热情，口若悬河。客人机敏，妙语珠联。宾主觥筹交错，欢声笑语，翻译两边传递，忙得不亦乐乎，口腔超负荷运转，也就没有了吃饭的时间和空间。

记得我刚当翻译时，一位有经验的老翻译看我顿顿吃不饱饭，面黄肌瘦，对我说：民以食为天，当翻译得学会吃饭，在宴会上，你千万别吃硬的、带刺的、不好嚼的东西。你要挑那些软的，没刺的，一嚼就烂的，甚至急眼时不嚼也能吞下去的东西吃。

我虽然得此秘传，但生来愚钝，每有宴会，还是十有八九食不果腹。我总以为这是工作，嘴里含着东西讲话，终究不雅。

从事外事工作二十余年，在异国他乡留下许多斑驳杂乱的记忆，但对于一九八〇年春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那个团很大，有十二个人，而且都是海内外有影响的大作家。当时我来作家协会不久，对团长巴金、副团长冰心、林林，还有艾芜、公木、杜鹃程等作家不熟悉，心里很紧张，忙着阅读他们的作品，了解他们的创作风格。全团就我一个翻译，行前我也充分做好了饿肚子的准备，带了一些牛

肉干、饼干等，以备不时之需。

但出乎我的意料，这次出访，我居然没有掉肉，以同等体重出入国门。

我是翻译，所以常常坐在巴老、冰心老人身边。他们总是说，年轻人，多吃点，别剩下，为我夹菜添饭。有一次吃生鱼片，巴老看我吃得香，说：“我这一份，你也吃了吧。”冰心老人说，“还有我这一份，也请你代劳。这是生东西，喝几口酒有助于消化。”我本来滴酒不入，但老人家这样讲，我就喝了一杯日本酒。那清纯微甘略苦的酒喝到肚里，我的脸红了，眼睛也红了……

巴老是团长，经常要讲话。他总是看我吃得差不多了说，我要讲几句话。我跟在老人家身后，走到话筒前。巴老讲话时，眼镜总是滑到鼻尖上，微闭着眼，讲两、三句停一下，叫我翻译。他那从心里流出的真诚话语，常常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我说，巴老讲得真好。巴老说，你译的好。我说，我译的并不好，但给您当翻译，我不紧张不害怕倒是真的。

代表团回到上海后，巴老在静安饭店为大家饯行。巴老颤颤悠悠地举着一杯葡萄酒，慢慢走到我身边说：“小陈，全团你最辛苦，我谢谢你。”

我一仰脖，把这杯葡萄酒全灌了下去。当了这么多年翻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滋味没尝过，一时间，酸甜苦辣，百感交集，怎么能不感动？

十二年过去了，那三份生鱼片和两杯酒至今其味无穷，这是一种理解、尊重、温暖。

巴金与山崎的谈话

1980年秋天，日本报告文学家山崎朋子来中国采访，为她写亚洲妇女史收集素材。在北京采访后，我陪她到上海。

山崎到北京之后就提出，到上海时希望能拜会巴老。我与上海作协联系，徐铃同志说，巴老最近身体不太好，总感冒咳嗽，届时如果巴老身体情况允许，是愿意见的。

山崎是日本文坛非常活跃的女作家，作品多，影响大，人也漂亮，可谓才貌双全、风姿绰约的女强人。1979年在中国放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就是根据她的长篇报告文学《山达根八号妓院》改编的，其中的女作家三谷圭子就是她的化身。电影放映后，在中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巴老《随想录》的第一篇和第二篇，即《说“望乡”》、《再谈“望乡”》，就是为这部电影辩护的文章。巴老不仅肯定了这是一部好电影，而且对于其中的女作家三谷圭子给予很高评价，说“她真正做到了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

巴老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

山崎知道巴老为《望乡》辩护后极为感动，所以非常希望拜访巴老，当面表示她的感谢和敬意。

见面那天，巴老身体确实不太好，脸色苍白，声音嘶哑，还不时咳嗽。

本来说好这次是礼节性拜会，但山崎朋子是报告文学作家，谈着谈着，就变成了采访，谈了妇女解放问题，巴老对青年作家的希望，写作计划，文革中的经历等等，整整谈了两个小时。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原子弹问题。

山崎说：“我生在长山崎，长在广岛，对这两个地方很有感情。听说先生今春天访问日本时，特意到了这两个城市，归国后写了一篇文章《访问广岛》，开头第一句话是：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多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巴老说：“我还写了一篇，叫《长崎的梦》，还没有发表。”

山崎说：“长崎和广岛毁于原子弹。中国也有原子弹，不知先生怎么看？”

巴老说：“只一个国家有原子弹，原子弹就会爆炸。多几个国家有原子弹，相互制约，原子弹就可能不会爆炸。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只美国有原子弹，就爆炸了，炸在长崎、广岛。如果人类把钱花在和平事业上，不去制造原子弹，当然更好，但世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没有办法。虽然遗憾，但为了原子弹不爆炸，不能只有一个国家有原子弹。”

“到广岛，实现了我二十多年的愿望，感到很高兴。广岛已经从废墟中站立起来，成为一个美丽的现代化的城市。我看见了和平力量和建设力量的巨大胜利。我感觉到任何原子武器、核武器都摧毁不了的人民的力量。我也看了和平公园和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留言簿上写下了自己的感想：‘全世界人民绝不容许再发生 1945 年 8 月 6 日的悲剧。世界和平万岁！’我看到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亲身体会到了人民对于和平的强烈愿望，因此，我对人类的未来是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山崎说：“原子弹毕竟是杀人的武器。先生说多几个国家有原子弹，相互制约，才能制止核战争，我还是不能理解。”

巴老说：“这是我自己的看法，你可以不理解，也可以不赞成，这没有关系，但事实是，35 年来，天天叫核战争，谁也没敢用，这一点就很能说明问题。”

以后我多次在巴老会见日本作家、记者时当翻译，但没有再谈及过核武器问题，不过，我发现巴老在回答各种问题时，总是实事求是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就直言相告我不懂，能回答多少就回答多少，从不说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话。他的真诚和坦率，能使很刁钻的记者变得心平气和。

作家要争光不要争官

一九八一的四月十一日，巴老到北京来，住在国务院第九招待所，离作协不远，我去看他。

小林外出办事，还没有回来，巴老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书。他让我坐在他身边，起身要给我泡茶。我说，巴老您别动，还是我自己招待自己吧。我不知道巴老是来开会还是办事，但下午巴老没有事，于是就聊起天来。巴老平时话不多，但喜欢和熟人摆龙门阵，他说聊天不紧张，也不累。到巴老家里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又说又笑，山南地北，海阔天空，巴老从二楼书房下来，坐在我们旁边，听我们吵吵嚷嚷，饶有兴趣的样子，偶尔也插一两句话。

巴老说，我最近看了一些小说，中篇评奖的小说也都看了，觉得近几年的文学上的收获很大，比三十年代的作品多，质量高，题材广泛，超过了三十年代，令人高兴。比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写得很好。

我说，今年《十月》第二期，有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我看了，很喜欢。

巴老说，我回去也找来看一看。

巴老对近几年文学事业的发展，由衷地高兴。一谈起

来，有说不完的话，记得去年秋天，日本著名报告文学家山崎朋子拜访他时，问及中国青年作家的情况，巴老了谈了许多。

巴老说：现在，中国文坛上新作家，年轻作家很多，很活跃，各省都有，因此也比较普遍。他们有生活，有感受，有话要讲，所以拿起笔来写作。他们写的，全是新的东西，没有旧的痕迹。来势猛，人数多，产量高，这是大好事，我心里感到高兴。我们这些老人，应该帮助他们，爱护他们，尊重他们。年轻人把我们抛在后面，跑到前面去了，值得庆贺。也可以说，本来就应该这样，文学事业才能发展，繁荣。

我说，一些很有才华的作家，在创作势头很好的时候，却走上了领导岗位，繁杂的行政事务缠住了他们的手脚，以后恐怕很难静下心来写东西了。

巴老说：有人认为作家的地位低，想去做官，我不太赞成。我并不认为作家比官的地位低，也不想争官。作家要写作品，要为国家、民族争光，而不要争官。要在文学上下功夫，在艺术上不断探索，写出好作品来，这才是作家的正业。作家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要有风吹草动就跟着转。中国人民在十年浩劫中吃了苦头，应该吸取教训。我觉得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没有不希望中国繁荣昌盛的，在这个基础上，大家齐心协力，事情就好办。

巴老又说：《随想录》第二集已经编好，香港很快就要

巴金先生出来了，但国内还没有出。这一集中有两篇关于赵丹的文章。赵丹在临去世前，讲了一些话，我以为他讲得好，因为他怎么想就怎么说。我们这个民族，要讲实话，事情才能办好。把缺点问题都讲出来，目的是走正确的路，这对于国家民族有好处，不要一听到缺点就觉得刺耳才好。

最好的礼物是友谊

1982年9月，日本北海道新闻、亚非作家日本员会联合访华团，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访问了一个月，最后到达上海。回国前，全团去拜访巴老。

这个代表团由获芥川文学奖的作家高桥揆一郎、巴金的老朋友女作家丰田正子、画家赤穴宏、摄家座光寺昭曲、文化记者稻叶吉正等5人组成。这个文化代表团，也是个完整的工作班子，准备回国，在北海道新闻上出一期纪念中日建交10周年大型特刊。他们读过巴老的书，对巴老很敬重，在来访之前，就提出希望有机会拜会巴老。

在兰州时，有一次我去高桥先生的房间，看见全团都在那里，听丰田先生在读着什么，以为在开会，转身要走，但高桥先生示意我坐下。丰田先生继续念道：“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世，我要写，我绝不

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我突然想起这是1980年巴老访日时，在京都会馆发表的讲演《我和文学》的结束语。巴老那次访日，发表了两次讲演。一次是由朝日新闻社主办，在朝日讲堂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稿子是在国内写好译成日文带去的，由丰田正子先生代读日文稿。一次是由一家新闻社主办，在京都会馆发表的《我和文学》。我记得原计划中似乎没有这项日程，是后来增加的。巴老本来可以把《文学生活五十年》再读一遍，但他不同意，说人家来听讲演，不能炒冷饭，于是在旅途中赶写讲稿，直到清晨一点钟，才在广岛把讲稿写完。丰田先生刚才读的，正是这一篇。

在苏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全团要求我译一下巴老发在9月20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答井上靖先生》。这篇文章是为了纪念中日建交10周年与老朋友井上靖先生的通信，同时在日本与中国发表。巴老在文章中回顾他与井上靖先生的友谊，也谈了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他说：“把侵略改为‘进入’，可能还有人想再次‘进入’中国。”“这些年我同日本友人欢聚，常常感觉到：保卫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责任重大。”巴老还说：“人民的力量是无敌的，也是无穷的。问题在于让他们看见真相。先生，作为文学家，我们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他们，免得他们再受骗上当。”

汽车停在巴老家门口，巴老身穿浅灰色中山装，站在院

巴金先生 子里迎接客人。他走路很慢，而且脚下不太稳当。

巴老说：“我最近身体不好，手和脚都肿了，写字手也抖得厉害，但头脑还清楚。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总要留下一些痕迹。20多年前，我访问过丰田正子先生的家。你和你丈夫也到饭店看过我。我记得你家很远很远，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在你家只待了一小会儿。那时我说，我家院子里埋了一坛子绍兴酒，等你们来我们一起喝。但那坛子酒在粉碎“四人帮”时大家喝光了。我送给你们两瓶我家乡的五粮液，这种酒很好喝，但我身体不好，不能陪大家喝，你们一定要尝一尝。”

丰田正子先生说：“旅途中，我们读了先生的《我和文学》和《答井上靖先生》，深为您无情解剖自己的真诚而感动。先生为人生、为社会而写作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这次来中国访问之前，我心情很矛盾。教科书问题，明明是侵略，非改成进入。这不是欺世惑众、文过饰非吗？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我感到没脸见中国人。我们一路上，都在唱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表达我们的心情。”

高桥先生说：“我不会讲话，见到先生很紧张。您是大文豪，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赞成先生说的，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中日友好，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否则不会有真正的友好。刚才在路上为先生买鲜花，店员听说是献给您的，热情地帮我们挑选，可见先生深受读者的尊敬。”

巴老说：“我不是什么大文豪，是个普遍的中国作家，只是年龄比你们大。我也不会讲话，所以才用笔写。日本《读卖新闻》发表我给井上先生那封信，加了编者按语，大意说个人间的友谊，是国家民族间友好的基础。我认为讲得有道理。我1980年访日回来，写了长崎和广岛，也写了友谊。”

高桥先生说：“这次到中国来，接触了许多作家，虽是初次见面，但心是相通的。回国后，我要多写介绍中国的文章，我想这是献给先生的最好的礼物。”

巴老说：“对，最好的礼物就是友谊，就是美好的感情。”

日本作家要求与巴老合影。高桥先生说：“请先生坐在中间，我们站在后面。”巴老说：“你们是客人，我不能坐着。”高桥先生说：“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大作家，影响了几代人，我们是晚辈，理应站着。如果先生也站着，我们连站的资格也没有了。”随行的记者刚拍了一张，巴老说“我坐着不好”，还是站了起来，到门口与大家并排留影。

这次见面，大家和巴老一起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巴老坐在沙发上，大家站在他身后，一张是巴老和大家站成一排。坐着的那张，巴老显得严肃，站着的那一张，巴老表情自然和畅。

我根本没有那么想

1983年10月31日，我去华东医院向巴老辞行。这次到上海，我是陪日本作家山崎丰子（《华丽家族》的作者）来的。巴老29日在病房里会见了山崎，并与她畅谈了一个小时，我当翻译，又有记者在场，根本没有时间与巴老聊天。山崎昨天已飞回日本，我明天就回北京，所以临行前再去看巴老。

病房很安静，也很简单，一张床，两把椅子，一张小桌，桌上放一把香蕉。巴老穿着白色蓝条的病号服，拄着拐杖，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握手。巴老的手很柔软，也很温暖。就是这双手，写了半个世纪。他的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与语言的障碍，在不同的国度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曾握着巴老的手说，这是一只写出了《家》、《春》、《秋》的伟大的手。但巴老自己说：“这是一只普通的手，用来吃饭穿衣的。”

闲聊时，李小林拿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长佐藤纯子的来信，说井上靖、白土吾夫等人12月20日到上海，希望拜访巴老，请巴老出席明年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

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去了给人家添麻

烦，还是不去为好。”我说：“看您现在的身体情况，完全可以去。井上靖先生多次亲自来请，倘若不去，日本朋友们会失望的。”巴老说：“谁知道明年我身体的情况会怎么样呢？到时候再说吧。”

巴老去年不慎跌伤腿，在病床上躺了许久，现在虽然能下地活动，但得拄拐杖，行动极为不便。

日本著名作家、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先生是巴老 20 多年的老朋友，去年曾两次到医院看望巴老，恳切邀请巴老去东京参加笔会大会。井上先生说：“这次我们是东道主，巴金先生一定要赏光，到东京后，在大会上露一下面，之后可以到箱根去休息，我们保证不叫你累着。”日本著名作家水上勉先生去年率日本作家代表团来访时，也多次说到此事。他对巴老说：“只要您到了日本，我们 5 个人去机场接您。您走不动，我们轮流背您，而且绝对保证安全。您到笔会一坐，不用讲话，这个大会就等于成功了一半。”

我知道巴老在犹豫。他不愿使日本朋友失望，又对自己的身体缺乏信心，怕到时候给朋友们添麻烦……

上海作协的徐钤对我说：“你送给巴老的柿子，巴老的外孙女端端吃了，涩得不行。”巴老说：“不是端端，是小棠。他到病房来，看见柿子很漂亮，拿起来就大咬一口，结果涩得直叫，马上又吃了一根香蕉才算好些。”巴老说完，嘿嘿笑起来，露出了牙，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象孩子一样天真开心。

我陪山崎丰子去西安时，在始皇陵那里看到农民卖柿子，黄黄的，亮晶晶的，又大又好看，就买了几个送给了巴老，没想到还不能吃。巴老说：“是不是要放到米缸里？”我说：“农民讲不用，马上就可以吃，也许放一放能好一些。”

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先生听说巴老住院了，特意发来了一封电报，说巴金不仅是中国作家，也是世界人民的作家，期望早日恢复健康。巴老对我说：“请你代我起草一份电报，谢谢人家。晚几天不要紧，回北京再发也行。”我说：“回到北京，我马上办。”

巴老把《巴金论创作》一书送给我说：“这里面收了你译的那篇我与木下顺二先生的谈话。”

我说：“巴老，咱们照张相吧。”巴老说：“屋里光线不好，咱们到凉台上去。”

已经是深秋，巴老还穿着一双凉鞋。上海作协的徐钤说：“天凉了，得做双新鞋了。”巴老说：“好，好。”巴老摔伤后，两腿不一样长，鞋子必须订做才行。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问巴老说：“前天您送给山崎丰子一件礼物，她回去打开一看，是漆器蚌。她不知道有什么含意，就问黄宗英。黄宗英说，这也许象征着作家从生活中汲取养料，提炼加工成为艺术品，就好像一粒砂子落入蚌壳中，经过若干岁月，变成一粒珍珠。山崎一听，激动得哭了。”

巴老嘿嘿地笑起来。他说：“黄宗英真聪明，会讲话。其实我根本没那么想。礼品是小林买的，已经包装好了，里面是什么，我根本没看见，哪里有什么深意。”

向你们致敬

1984年5月9日，巴老作为国际笔会第47届大会的特别荣誉客人到达东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理事白土吾夫先生亲自到机舱口迎接。巴老坐在轮椅上，白土先生推着，井上先生走在后面，几十名新闻记者蜂拥而至，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睛，一直到贵宾室，才算安静下来。

晚上在京王广场饭店谈日程时，巴老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到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看一看，一是为老朋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前会长中岛健藏扫墓。

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佐藤纯子女士与我说，明天上午，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事务局是否可以不去，一是因为设在一座大楼里，上下虽有电梯，但要走一段路，二是事务局的主要干部都在这里协助日本笔会工作，可以天天见面。巴老的健康第一，万万不可有什么闪失。但巴老说，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为中日文化交流默默地工作，才有今天的局面。我年纪

巴 大了，身体又不好，以后不太容易来了，应该去看望一下。

金 5月10日上午10时，巴老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全体工作人员列队欢迎。这个协会创建于1956年，在中日建交前，就克服重重困难，为开展两国民间文化交流艰苦奋斗，做出了世人瞩目的贡献，在中日文化界无人不晓。

先 巴老打量一下办公室说：“曹禺从日本回来对我说，你们人很少，办公条件差，但工作做得很多，实在了不起，叫我也要看看。记得1963年访日时，我和你们一起吃饭，谈起协会遇到的重重困难，你们都哭了。冰心大姐、严文井和我也哭了。我本来想讲几句鼓励的话，但忍不住眼泪，话也没讲出来。那时候，白土是个小伙子，佐藤是个大姑娘。如今你们都是中年人了，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你们把中日友好作为毕生的事业，不为名不为利，这种精神我是很钦佩的。不论在什么时候，一想起你们，想起中岛先生，想起千千万万日本朋友，我就有勇气，有力量。今天我是特意来向你们致敬的。”

11点钟，由白土吾夫和佐藤纯子陪同，巴老乘车来到世田谷区的豪德寺，为中岛健藏先生扫墓，中岛先生的夫人京子女士也由故乡福井赶来，在门口等候。

中岛先生是著名文艺评论家、法国文学研究家，前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巴老1961年访日时与中岛先生相识，以后年年见面，成为无所不谈的至交。当年中岛先生为搞日中友好，受到歧视恐吓，文章无处发表，著作无法出版，生

活困苦，但他卖掉汽车，添补家用，不畏强暴，不屈服不动摇，为日中世代友好下去，献出了晚年的全部精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岛先生四处打听巴老的消息，询问巴老的情况，直至病故前，还念叨着巴老的名字。听到中岛先生病故的噩耗，巴老十分悲痛，写了《中岛健藏先生》一文悼念亡友。

豪德寺入口有几座木结构建筑，后面是一大片墓地。巴老沿着沙石小路，吃力地移动左腿，默默地向前走，脚步缓慢而沉重。中岛先生的墓碑，用灰青石雕成，约有一米高，正面刻着中岛和夫人的名字，因为夫人还健在，所以用红色标出。白士先生指着墓碑说：“这是我们的习惯。”巴老说：“我们过去也这样。”

巴老走上前，把鲜花插在石瓶里，向中岛碑三鞠躬，并按日本习俗，用清水洒在碑顶。巴老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77年。以后再也见不着他了，但他永远活在我心里。”说着流下了眼泪。京子夫人说：“以前你多次劝他少喝酒。”巴老说：“他喜欢喝酒，又有海量。我虽然常常劝他少喝些，但我也知道不会有什么用。那时形势不好，他心情郁闷，借酒浇愁。1965年元旦，我和田汉陪他去苏州，过得很愉快，但现在他们两个都不在人世了。”

离开墓地时，巴老又为中岛先生鞠了一躬，向老友告别。他含着泪对京子夫人说：“看到中岛先生的墓，我安心了。他是多好的人啊，没有私心，为人民的友谊，献出了一

巴
金
先
生

切。”

巴金与井上靖

巴老拄着手杖走进井上靖先生清静幽雅的小院，身着宽大黑色和服、脚穿白袜木屐的井上靖先生和夫人从门廊迎出来，把巴老让进客厅。

客厅很大，三面是顶天立地的书柜，摆满装帧精美厚重的大书，南面玻璃拉门处摆着沙发和茶几，两侧的柜子上陈列着文物古玩。茶几的中间，有一个精美的大花瓶，插着一束盛开的蝴蝶兰。

巴老与井上先生是老朋友，最初相识是1957年，此后经常见面，用他们的行动，用他们的笔，共同为中日友好事业铺路搭桥，遂成至交。即使在十几年不能相见的痛苦岁月中，他们也是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23年前，在中日两国关系还没有正常化的时代，巴老曾来到这个庭院。他们在二楼的书房里把酒论文，畅谈中日两国民间的文化交流。此刻，巴老望着草木葱葱的庭院，回忆当年的情景说，那时是早春三月，积雪未化，白花花一片。

井上先生也曾多次到巴老家作客，到医院去探望巴老。他回忆1961年与龟井胜一郎先生到巴老家，受到巴

老夫人热情款待的情景说，巴老家的冰淇淋好吃极了，只可惜巴老夫人和龟井先生早已不在人世。

巴老对井上先生重友情、讲义气、为中日友好忘我奔波、仗义执言的侠肠义胆怀着深深的敬意。1970年，辞世的老舍先生还在受批判的时候，井上先生就写了散文《壶》，痛惜中国文学的巨大损失，为老舍鸣冤叫屈。巴老读到篇文章时，极为感动，同时也深深自责：“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我做过什么事情，写过什么文章来洗刷涂在这个光辉的（是的，真正是光辉的）名字上的浊水污泥呢？”

井上先生很敬重巴老的人品和文品，认为巴老的《随想录》充满对人类深厚的爱。他说对巴金先生的尊敬，是日本，也是世界各国读者共同的感情。记得前年我随严文井先生到他家拜记时，曾风闻井上先生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文井说：“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希望先生也早日获此殊荣。”但井上先生马上说：“在亚洲作家中，我应该排在巴金先生之后。”看得出，他对巴老的文学业绩和人格的高洁是钦佩之至的。

井上先生说：“您能来开会，我作为东道主，感到很光彩。为了欢迎您光临寒舍，我特意挂上了梅原龙三郎的画《北京的天空》。”

巴老说：“您三次到医院盛情邀请，我不能不来。为了适应这次访问，我出院准备了半个月，天天活动一下，现在

巴金先生 已经习惯了。国际笔会在日本开，我们也感到高兴，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把这个会开好。今天我到中岛先生的墓地去看了看，现在安心了，不然总觉得有事。”

井上先生说：“5月的日本最好，风清气爽，阳光柔和。看到您面色很好，我很高兴。先生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我们共同努力，保护您的健康。”

巴老回答说：“谢谢您的关心，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又病又老的中国作家。”

井上先生说：“今天下午，我要去祝贺老作家野上弥生子百岁大寿和文学生涯80年。野上先生耳聪目明，笔耕不辍。70岁时到中国访问，坐汽车由西安到延安参观。几年前，我夫人见到她时，她问我夫人多大？我夫人说72岁。她说真年轻啊！我夫人高兴了好几天，因为她这个老太婆已经好几十年没听到这样的话了。”井上先生说到这里，爽朗地哈哈大笑说：“我祝愿巴金先生长寿，进入21世纪。”

巴老说：“这对我是个很大的鼓励；使我也有了信心，我也要活到21世纪。”

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访日之前，几位领导同志叮嘱我们，巴老刚从医院出

来，身体虚弱，日程不能太紧，要保证巴老有充分的休息时间。到了日本以后，我看日方安排的日程表基本上能够保证巴老半天休息，感到满意。但是，在日程表后面附了一张表，列着要求采访巴老的电视台、新闻社、杂志社的名单，总共有十几起，并没有列入日程中。

我和李小林、同行的上海作协徐铃同志商量，觉得见几家大报记者就行了，特别是与老朋友井上靖、水上勉、木下顺二、池田大作等人的对话，应该优先安排，其余的新闻单位可以不见。但即使这样，每天也有两项日程，不能保证巴老下午休息。

但是，实际情况远比日程表上的内容多得多。几乎每天都要增加新的项目。以5月17日为例：上午十点，松本清张、讲谈社来访；下午三点，时事通讯社采访；下午四点三十分，清水正夫、丰田正子来访；晚七点，西园寺公一来访。

这不能责怪日本朋友，因为他们非常尊重巴老，每项日程都来征求巴老意见。巴老总是点头说：“好，好，就是这个样子。”左一个“这个样子”，右一个“这个样子”，日程就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巴老活动太多，心里着急，怕他累坏了。因为他毕竟年事已高，又刚刚出院不久，因此决定向他提点“意见”，并且由小林出马。

巴老大概察觉出来我们几个对他已经有了“意见”，听完了小林的话，笑得很开心，说：“好，好，就是这个样

巴金先生子。”我们以为他接受了我们的意见，同意压缩日程，但他又接着说：“既然来了，就要多做工作，我是个爱国主义者，累一点不要紧。”我们一听傻了眼。只有这一次，他行使了团长的权利，否决了我们的意见。

两个小妖怪

巴老近年来身体不好，常常住院，所以日方请巴老及随行人员小林、上海作协的徐钤和我早三天到达东京，目的是叫巴老休息一下，准备在大会上发表题为《核时代的文学——我们为什么写作》的讲演。

日本新闻界知道巴老到达东京后纷纷要求采访，巴老先后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朝日新闻、京都新闻、《昂》杂志、《图书》杂志以及一些新闻机构的联合采访。这种采访多以与日本著名作家对话的方式进行，没有主题，兴之所至，海阔天空，谈古论今，各抒己见，倒也轻松愉快。电视台记者在旁录像，摄影记者抢拍镜头，文字记者录音并整理文稿，之后在电视台播出或在报纸上发表。

不过，这种采访与中国不同，是“有料”采访，新闻机构要付给被采访者采访费，因为被采访者付出了时间和劳动。这一点与中国不大相同。现在国内的一些新闻报道，不

但不付给被采访者采访费，反而要给记者红包，叫做“有偿新闻”，实在是怪事。

日本的采访费似乎与谈话内容无大关系，主要取决于被采访者的知名度和采访机构的经济实力。大报、大电视台似乎相当高，而小报及文学杂志，特别是纯文学杂志就相对低得多。

巴老与井上靖对谈了一个小时，经剪裁编辑，电视台播放45分钟，巴老实际谈话也就15分钟左右，因为翻译也要占去15分钟，付给巴老的采访费是62万日元，当场扣除所得税12万日元，实际收到50万日元，按现在的汇率折合人民币约4万元。我没想到采访费会这么高，巴老似乎也不知道有什么采访费。我拿着厚厚的一个信封兴冲冲地交给巴老说：“巴老，您老人家每月讲两次话就可以养活我们三个小的了。”巴老笑笑说：“老讲就没人听了。”

巴老在日本访问期间，大约收到了100万日元的采访费，扣除上缴所得税外，约剩余80万日元。

巴老身体不好，从上海出发时带了许多药。一个笨重的水银血压计，他的箱子装不下，放在我的箱子里。到了东京，我打开箱子拿东西，发现箱子底下滚动着无数个闪亮晶莹的银球，不知怎么回事，后来一检查，发现血压计被摔坏了，水银都流了出来。我想巴老这次是日本笔会的荣誉客人，他和李小林的往返机票，在日的住宿费用均由日方负担，而且巴老本人自解放后从未拿过国家的工资，靠自己的

巴金先生 稿费生活，这笔钱完全可以自己支配。应该先给巴老买一个操作简便的血压计，再买一些药品带回去……，还没等我的“如意算盘”打完，巴老就说：“你和小林把这笔钱马上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送去吧。他们二十多年来，为中日友好事业苦苦工作，经济上靠会费和募捐维持，很困难，这笔钱送给他们，可以帮助他们多少解决一点问题。”

巴老既然这样说了，我只好照办，和小林一起到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临时设在饭店里的接待办公室，把钱交给了佐藤纯子女士，并转达了巴老的意思。

佐藤女士说什么也不要，她说：“这是巴金先生的劳动报酬，心意我们领了，但钱无论如何不能收。”这样推来推去，不可开交，最后我们把钱放在桌上就急忙溜走了。过了一会，佐藤女士又叫人把钱送了回来。巴老叫我们对佐藤女士说：“都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要客气。我知道这点钱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这是我的心意，不收就见外了。”巴老心诚意切，佐藤不好再推辞，最后由事务局长白土吾夫先生出面，正式接受了巴老的捐赠。

去银座散步时，大街上有摆摊卖玩具的，出售一种塑料做的小妖怪，下面安着轮子，往前一推，小妖怪就跑起来，嘴里吐火，每个售价400日元，是玩具中最便宜的。巴老停下来，叫小林买了两个，准备送给他的外孙女和刚刚出世的小孙女。

巴老的口袋里没有大把的外汇，和我们一样，只有公家

发的 6400 日元零用费。他看见那两个小妖怪嘴里吐火，怪模怪样的，很喜欢。

这两上小妖怪，大概是他最喜欢最得意的礼物了。

这些，我们也应该有

新宿，是现代日本的象征，素有副都心之称。

三百年前，新宿一带是人口不过千余人的平原。当时由甲州到江户（现东京）中途落脚处是高井户，距江户尚有 16 公里，极为不便。1698 年，一个姓内藤的藩主为政府献出一块地皮，建立新的落脚处，名为内藤新宿。现在新宿已成为东京最繁华热闹的地区，每天流动人口达三百万之多，是寸土寸金的商业贸易餐饮游览娱乐之地。日本人说食在新宿，是有道理的。在这里可以吃到日本、中国、朝鲜、印度、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的名菜，且价格低廉。

新宿西口高楼林立，有 52 层的住友大厦、55 层的三井大厦、国际电信大厦、安田保险大厦等摩天高楼 15 座，如顶天立地的巨人，巍然屹立，耸入云霄，所以这一带被称为“日本的纽约”。

我们与巴老住在京王子饭店第 39 楼。这座豪华的大酒店耸立在“日本的纽约”的超高层建筑群中，共 49 层，高

巴老腿脚不便，一般足不出户，晚上无日程时，就坐在窗边看风景。

所谓窗户，实际是一面玻璃墙，房间多宽，窗就多大。站在窗边往下看，人像蚂蚁，车如闪光的甲虫。明明知道掉不下去，但心打战，腿哆嗦，手出汗，头发晕。实在是太高了。高得人胆战心惊。

我和巴老一般坐在离窗口一米多远的地方，往远处看。东京是座不夜城，五光十色，扑朔迷离，似乎比白天更加辉煌、壮观、富于色彩和活力。

巴老常常是默默地看着，默默地想着，有时也说几句话，但说话的时候不多，看和想的时间长。

有一次，他看了好半天，轻轻地说：战后，东京是一片废墟，但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我1961年来的时候，没有这些高楼大厦。这次来，简直认不出来了。东京这个地方地震多，房子不好盖，过去都是些木头房子，很小，现在他们敢盖这么多高楼，说明他们的科学技术发达，可以适应地震。他们的经济搞得好，速度快，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我们好好搞经济，现在也可能与日本差不了多远。这些高楼大厦，我们也应该有。现在有了一些变化，搞特区，这就好。总之，要把经济搞活，再也不能吃大锅饭了。

巴老停了一下又说：前几天我坐车出去看了看，觉得东京的一些新建筑很漂亮，各有特色。我们的房子也应该盖得好些，要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好。不要刚刚盖好，就坏

了，或者拆掉，这样反而浪费更大。

一天晚上，不知怎么说到了社会上的不正之风，巴老说：中国人的事，总要中国人自己办，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自己要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并且有责任帮助别人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大家如果都做好事，不为个人的私利干坏事，那么中国就会兴旺发达的。

坐在窗边，巴老常常陷入无边无际的沉思之中。他不说话，我也默不作声，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有时会坐一、两个小时。巴老心里在想些什么，我并不知道，只能从他那类似自言自语的谈话中，知道一点儿。

但我觉得，这个从寻求救人救世也救自己而开始漫长的文学创作道路的老人，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命运，人类的未来，热切企盼着祖国的繁荣和昌盛。

我不会讲话

我早就听说巴老不善于讲话，甚至听说巴老讲话口吃，说不清楚。巴老自己也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惟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来，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巴老还说：“我不善于讲话，也不习惯发表演说，我一生就没有做过教师。”

这无疑是在巴老的心里话，并非谦虚。

在我与巴老接触的过程中，也从未见过巴老有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时候。他沉思默想的时候多，开口讲话的时候少。但讲话口吃却是讹传，并非事实。

巴老似乎特别爱听年轻人聊天。在日本。巴老住的房间大，有客厅，是我们几个随行人员扎在一起海阔天空神侃的理想场所。即使吵得天翻地覆，巴老也不烦，有时还插几句话。同行的一位记者兄，嗓门高亮，讲话南腔北调，地动山摇，但巴老最爱听他侃。

巴老讲话最多的时候，是见老朋友。他常常张着嘴，眯着眼，嘿嘿地笑，声音不大，但充满天真，极富感染力。

我两次随巴老到日本访问，除正式的讲演会有稿子外，大多数场合都是即席讲话。讲话时，巴老手中片纸不拿，缓缓走到麦克风前，眼镜挂在鼻尖上，微闭着眼睛，不看听众（我估计是怕看到台下黑鸦鸦的人群，心里发慌，讲不出话来，所以干脆不看）。巴老使用翻译很有经验，从不讲那些有无数个定语、状语的长句子，而且讲一句，停一下，等待翻译。他的讲话，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没有任何机智幽默，更没有任何包袱或噱头，朴素得就像拉家常一样，但总是赢得“满堂彩”。那热烈的掌声，不是虚以委蛇的礼貌，而是听众发自内心的激动。

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有1984年5月11日晚，巴老在东京会馆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即席讲话记录。那个宴会很大，有600多人参加，可以说囊括了日本文化艺术界的精英名流，当然也有政界、新闻界、经济界的著名人士。

巴老慢慢走到话筒前，开始讲话。起初声音很小，但越讲声音越大。

尊敬的井上靖先生，尊敬的宫川寅雄先生：

今天参加这个欢迎宴会，我很高兴，几乎忘记自己是一个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不到两个星期的病人。23年前，我参加了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那时候，中日两国之间还没有建交，但我却感到日本的四面八方都伸出了友谊的手，使我满载着日本人民的友情而归。那次访问，我发现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念基础上的。这个信念就是子孙万代友好下去。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今天，中日关系终于从羊肠小道走上了光明大道，并且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对于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两国人民都做出了贡献，在此，我对在座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在文革中，在寒冷的夜晚，想起你们，我心理就感到温暖。

文革结束后，我到日本来访问，本来是想还友谊的债。

巴金先生 访问结束在长崎分手时，我看日本朋友流了眼泪，那泪水象春雨，湿润了我的心，我也含着泪上了飞机。但我把心留在了朋友们中间。同时，我发现友谊的债是还不清的，而且越还越多。友谊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的紧紧联接在一起。有这样的朋友，我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我认为，友情是一种最美丽的感情。为了世世代代的友好，为了友谊而团结奋斗，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和朋友们一起为友谊献出一切。

谢谢大家。

在海涛般的掌声中，日本著名女作家有吉佑和子走上讲台，献给巴老一束鲜花。著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大画家东册魁夷先生，著名剧作家千田是也先生，舞蹈家松山树子女士……纷纷过来与巴老握手致意。

这样热烈感人的场面，在访问中多次出现。至今想起来，我这个翻译还是犯糊涂，不知道巴会不会讲话。你说他会讲话吧，这位满头白发的小老头平时少言寡语，你说他不会讲话吧，他的即席讲话又极有感染力，能使听众激动不已。对于这种极矛盾的现象不知做何解释。

想来想去，想起了一位哲人说的话：真诚是打开人们心灵的钥匙。我想这可能就是巴老讲话成功的秘诀。任何人，都希望得到真诚，甚至虚伪的人也不例外。巴老不讲假话、大话、空话，而讲真话实话心里话，用巴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把心交给读者。

一 张 照 片

1984年5月20日，我们乘浪漫号快车去箱根，住在小涌园饭店。箱根是日本著名的风景区，疗养胜地。这里安静、凉爽、空气清新。打开窗子，满目青山，层峦叠翠，使人心旷神怡。

在小涌园旅馆，我们和巴老都换上了和服，并和日本朋友一起合影留念。巴老身穿一件黑色和服，白发如银，面色红润，神色安详，显得比平时胖一些，日本朋友开玩笑说像日本前首相岸信介。

巴老年轻时不喜欢照相，在照相机前紧张，不知道手脚放在哪里。但这张照片确实很神气，巴老自己似乎也很满意。他对小林说：“把这张照片给冰心寄去，免得她惦念。”

冰心比巴老大四岁，巴老称冰心为大姐。1980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时，巴老是团长，冰心是副团长。大家都称巴金为巴老，独独冰心称巴老为老巴。

记得那次去日时巴老和冰心坐一等舱，我们坐普通舱。一等舱里有香槟酒，冰心招呼我们几个年轻人过去喝酒。她像一个慈祥的老人，每逢有了好吃的东西，身边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份儿似的。那天我扎了一条银灰色的领带，冰心看了

巴老看我的领带，笑着对巴老说：“人老了，更爱美，你看你的领带，比小陈的还漂亮。”那天巴老扎了一条红色带花的领带，的确很漂亮。巴老笑着看了看冰心的女儿吴青，慢悠悠地说：“是啊，你瞧你的毛衣，比吴青的还好看。”大家都笑了。

冰心老人访日回来不久，跌伤了腿，住在医院里，我去看过一次，到上海时跟巴老讲了，他很是担忧。我每年都要陪外国作家团到上海几次，去看巴老时，他常常打听冰心老人的情况。

这次访日之前，我到冰心老人家里去了一次，请她为国际笔会东京大会写一篇文章，冰心老人说：“你告诉老巴，年纪大了，日程不能太紧，要注意休息，不要逞能。”

我说巴老很喜欢杭州，从日本回来，也许会到杭州住几天。冰心老人说：“杭州太热，也太潮湿，还是别去，要去秋天去。到日本，最好叫他到箱根住几天，离开东京，好好休息一下，那里安静。你把我这儿的情况告诉他，叫他放心。”我说，您放心吧，保证不让巴老累着，否则，惟我是问。

我想，当冰心老人收到这张照片时，肯定会高兴地说：“老巴又胖了。”

我这个团长讲民主

国际笔会在东京结束后，各国作家分两路到日本各地游览，我们一行随巴老到神奈川县的箱根休息。

巴老访日时，多次来这里小住，很喜欢箱根的秀丽幽静。巴老说他有一位叔父，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后来在成都当律师。他叔父就特别喜欢箱根，笔名就叫箱根室主人。

我们下榻的小涌园，是个温泉旅馆，每个房间里都可以洗温泉。旅馆的经理知道巴老腿脚不便，特意吩咐每天早饭送到房间里来，免得巴老下楼去餐厅。

早餐有三种，中餐、西餐、日本餐。日方人员问巴老想吃什么？巴老没回答，转头问我们：“你们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日本餐，简单，清洁。”其实，我也就是随便说说，想都没想。巴老说：“想吃日本餐的举手。”没想到李小林、徐钤、上海电视台的祁鸣都想吃日本餐，举起了手。巴老最后也举起了手说：“好，好，就吃日本餐。我这个团长讲民主，服从大家。”以后每天早晨，服务员都把日本餐送到巴老房间的客厅里。客厅很大，足足能坐20个人。我们5个人一起吃饭，很开心，也很热闹。

巴金先生 我们都知道巴老早晨喜欢吃西餐，就和巴老开玩笑说：“您还是不讲民主好，一民主把西餐搞没有了，只好和我们一起吃日本饭。”

巴老只是嘿嘿地笑。

你要戒烟

去日本前，忙于准备工作，累一些，到上海后又着一点凉，结果一走出国门就开始咳嗽。尤其是晚上，咳声不断，睡不着觉。那时年轻，身体也好，出差时什么药也不带。上海作协的徐钤同志带了一点感冒药，全叫我吃了，也毫无用处。

早晨到巴老的房间去，巴老问：“你的脸色不好，是不是不舒服？”我说不要紧，就是有点咳嗽。巴老叫小林给我找点止咳的药，小林给我一盒参贝陈皮。这种药不难吃，是甜的，含在嘴里慢慢化。

第二天，巴老问我还咳不咳，我说还咳。巴老问吃的是什么药？我说是参贝陈皮。巴老说：“那不行，治标不治本，含在嘴里不咳，但治不了根本。你气管有炎症，要用点消炎药，不然好不了。”巴老又叫小林给我找药，小林找出一瓶，这种药，我没见过，上面是外文。巴老说：“你还年

轻，要爱惜身体，烟抽得太凶，最好戒掉。不然年纪一大，气管就不好治了。我过去也吸烟，后来戒了。我看你也戒了吧。”

记得1980年访日回国时，我请巴老签名，巴老用毛笔在我的小本子上写：“感谢你的帮助。但我向你提出个要求，少吸烟。”我决心不大，在巴老面前一直不敢夸海口说戒烟，只是含含糊糊似是而非地点头。

小林说：“这几天小陈没吸烟。”巴老听了很高兴，连说好好好。其实，我并没有戒烟，只因一吸烟就咳得天昏地暗，所以没抽。

巴老给我的药很好用，吃了两天就不咳了，但随之嘴边又开始烟雾缭绕。小林说：“看，给他药治好了，又抽起来了。”巴老为我解围说：“慢慢来，慢慢来。”但又有点失望地说：“看来，没有多大希望。”

我这个人，没有毅力，至今还没有戒烟，但巴老对我的关心却时时记在心里，终生难忘。

我小时候最怕考试

一次闲谈，不知怎么说起了巴老《真话集》中的《小端端》一文。端端是巴老的外孙女，与巴老一起生活，当

巴金先生 时正在上小学。端端说她是家里最忙的人，最辛苦的人，“比外公还辛苦”。她每天早早上学，晚上还要做作业，搞到很晚。巴老同情心疼端端，觉得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该这样重。

我说，我的小孩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情况与端端差不多。孩子没有耐性，坐一会儿就想玩，没有办法，只好由家长坐阵督战。我的邻居有个孩子，父母都是外交官，写作业时，祖母在旁边看着，作业太多，他写着写着就不耐烦了，问祖母 $8 + 8 = ?$ 祖母看他可怜，就告诉他 16，祖孙两人一起做作业。现在孩子学习负担太重，家里有一个小学生，大家都变成了小学生，因为你要辅导他，就得跟他同步学，用一个课本，不然你就没法检查他，掌握他的真实情况。长此下去，如何得了？

巴老说：“教育，主要是启发孩子动脑筋，思考问题，灌输和责骂不是好办法，也是没有多大用的。我小时候，最怕考试。本来还会一些，但一紧张全忘光了。记得高中考化学，我只得 30 分，全班最后一名。另外，老师与学生的感情也很重要。学生对老师有感情，就会努力学，把这个科目学好。老师对学生有感情，就会有耐心，想办法叫学生会。知识总是不断更新的，老师不能跟学生一辈子。学生如果不学会动脑筋思考，就难有出息。”

露脚趾的布鞋

巴老是国示笔会第 47 届东京大会的特别荣誉客人，享受特别待遇。所谓特别待遇，就是由东道主负担国际旅费及在日期内的食宿交通费用。除特别荣誉客人外，其它各国与会作家，一切均由自己负担。日本物价昂贵，堪称世界第一，所以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我和上海作协的老徐，是巴老的随行人员，也跟着沾光，住的房间虽无客厅，但面积也要比一般的标准间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费。

大会发给巴老和小林的餐券，面额很高，两个人一天的伙食费为 2 万 5 千日元，约合人民币 2000 元，即便在日本，也相当于一般市民半个月的伙食费。巴老和小林邀我和老徐一起吃饭，这样可以为代表团节省外汇开支，又可以少浪费，而且可以聊天，免得寂寞。

我们一般都吃中餐。菜很多，水平也很高，如炸虾球，油焖大虾，红烧鲍鱼，燕窝鱼翅汤等，手艺不亚于国内名厨。我那几天上火，食欲不佳，虽然面对山珍海味，但兴味索然。巴老看两个人的饭四个人还吃不完，有些惋惜，每次都叫我多吃些。他说：“我年轻时，剩下的饭菜，都由我吃

巴金先生 掉，不然浪费了太可惜。这里面你最年轻，应该多吃些。”但这样还是剩，以后就干脆点几个清淡的菜，可以吃光，不再浪费。虽然用的钱比餐券面额少得多，让饭店老板占了便宜，但总比暴殄天物要好得多。

巴老住在我们隔壁，是个带客厅的套间，房子大，灯也多。每有活动需要外出时，我们提前10分钟到巴老房间，与巴老一起出来，这时巴老早已准备好了，领带打得板板正正，手杖放在身边，坐在沙发上或斜躺在床上等我们。

离开房间时，他总是把所有的灯都关掉。有一次已走到门口，又慢慢走回去，我以为他忘了什么东西，原来是去关客厅里的灯。

记得3年前，日本著名报告文学家山崎朋子去拜访巴老时，巴老穿了一身蓝色中山装，黑色皮鞋。衣服虽然是新的，但也不是什么好料子，可能是棉布或化纤之类的东西。

山崎朋子由上海回国后，我也准备回北京，行前去巴老家告别，看见巴老已经脱下“礼服”，穿着一身早已褪色的蓝布中山装，脚上是一双旧懒汉布鞋。布鞋不知穿了几年了，上面有几个破洞，大脚趾那个地方洞最大，可以隐约看到脚尖。

我想，他不会没有钱去买双布鞋，大概是觉得还能穿，舍不得扔，还穿在脚上，但只对“内”而不对“外”，怕影响不好。

记得巴老说过：“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

出名，虽然我也要吃饭，但是我到四十岁才结婚，一个人花不了多少钱。我写作是为了战斗。”

我随巴老先后两次到日本访问，在一起生活了一个月，我发现巴老的生活很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也没有什么不吃的东西，以前抽过烟，后来戒了。能喝几口酒，但也跟喝药差不多，极少。他完全靠稿费生活，但却为建立现代文学馆捐款 15 万人民币，而且宣布以后所有旧作重版的稿费也捐给文学馆。这位朴实的老人，使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话：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和血。

巴金与石上韶

在成田机场欢迎巴金的人群中，有一位身材高大、两鬓如霜的人，亲切地望着巴金微笑。他与巴老握手后，过来对我说：“我是石上韶，巴金先生的读者，也是《随想录》的译者，请多关照。”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份谈话提纲交给我，说“还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巴金先生。届时请帮忙。”他深深向巴老鞠了一躬，消失在人群中。

我早就听说巴老的《随想录》在日本出版了，但没见过译本，不知道译文如何。我是学日语的，平素也译一些日本文学作品，深知译《随想录》这样的书，比译一般的小

巴金先生说：说要困难得多。因为他要求译者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别是“十年动乱”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全面的了解，否则会谬误百出，使读者不知所云。但我很快发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来看望巴老的日本文化界著名人士都谈到了这本书。井上靖先生说：“你的《随想录》中充满了对人类深厚的爱。”木下顺二先生说：“你尖锐地自我批评，自我解剖，这是很痛苦的，但也说明你对未来和现实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清水正夫先生说：“把你的经验教训思考写出来，对于全人类都有重要意义，因为我们不敢保证自己的国家不会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

听到日本作家这些感人肺腑的话，深为巴老的文章被日本朋友理解而高兴，同时也对石上韶的辛勤的创造性的劳动怀着敬意。

石上韶先生 1913 年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后长期从事新闻工作，1967 年退休后，开始学习中文。他年轻时对中国文学极有兴趣，学习过中文，但后来因为忙于工作而中断。

1980 年 4 月 4 日，巴金在朝日讲堂发表《文学生活五十年》讲演时，他去听了，但当时他还不知道巴老在写《随想录》，只是想练练听力。

巴老的真诚打动了他的心，使他情不自禁地叫出声来：“这是一个多么正直的人啊！别人都在控诉，而他却在解剖自己，割自己的心。”

有一天，他偶然走进一家书店，发现了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随想录》，买了一本回来，很快就看完了。他知道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灵魂所经受的苦难，感动得彻夜难眠。他想：“这样好的书，我一个读完就完了，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日本人懂中文的不多，我有责任把它译介给大家，一起分享这本书带给自己的激动、眼泪和思索。”但是，他只是个普通读者，不是翻译家，想出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他想，哪怕是给周围的朋友们看看也好，于是开始了翻译。

我问他，翻译过程中最困难的是什么？他说：“文革中的特殊名词，如牛棚、工宣队、勒令、牛鬼蛇神.... 等等，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花费很大精力去查证、注释，否则日本读者根本不懂。在《随想录》《怀念肖珊》一文中，为搞清‘黑老K’，我翻遍了所有的工具书，也没有弄清楚。后来找到一本香港出的《当代中国作家风貌》，知道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出现过这个词，又几经查证，才弄明白了，写在注释中。又如《探索集》中有‘林彪的第一号命令’，我花费了很大精力，才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讲义》中查到.....总之，为了弄清一个词，一句话，我要跑图书馆，请教专家，实在弄不懂了，再给巴金先生写信求教。但我并不觉得苦。因为我是在做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

我看他送我的日文版《随想录》，其中用小号字排的注

巴金先生 释，约占全书篇幅的十分之一还多。这里面不知凝聚了他多少心血和汗水。

1981年，他与筑摩书房联系，商定可以出版后，给巴老写信，请巴老写《随想录》日译本序。巴老说：“只有把想说的话全说出来，只有把堆积在心上的污泥完全挖掉，只有把那十几年走的道路看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我才会得到心的平静。”

日文版《随想录》于1982年出版后，石上开始了同步翻译阶段，巴老发表一篇，他译一篇，《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也相继出版。

这些书在日本引起了巨大反响，读者信雪片般飞来。读者井上清说，他曾买了一本中文版《随想录》，每天阅读，书上留下了许多汗渍污垢，于是又买了一本。他的中文水平低，有许多地方看不懂，后来买到了石上韶的日译本，欣喜若狂。他殷切希望石上先生继续译下去。琦玉县的读者山下和惠来信说：“巴金先生独特敏锐的洞察力，朴实、纯洁、高尚的心灵，对历史的强烈责任感令人感动。”府中市的读者木元贺辅来信说：“这是经历了十年动乱的文学家写下的真实纪录，不仅是巴金个人的经历，也是同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真实写照。”日野市的读者伊泽巨万夫说：“毫不留情地解剖自己是痛苦的，但也证明作者的良知和爱心。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经历和体验。当中国人在思考‘十年不幸’的时候，难道日本人不应该深刻反省自己历史上的错误

吗？”……

石上韶先生对我说：“从听巴金先生的讲演，到翻译他的作品，这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但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我愿意把心中的一切秘密告诉他。在我的晚年遇到巴金先生，读他的书，译他的书，是我莫大的幸福。”

两个电话

1988年春天，上海作家协会徐钤同志受巴老委托，给我来了两个电话，我已记不清具体打电话的时间，但那两件事，我却牢记在心，至今不曾忘记。

第一个电话是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来的。老徐在电话中说，巴老有两件事，叫我抽空帮他办一下。一是听说冰心老人病了，住在医院里，叫我去看一看情况怎么样。巴老听到冰心住院的消息，不知病情如何，很担心。二是叫我到阜外大街北四巷找一个名为林小安的人，说林的父亲汤逊安病逝了，巴老已打唁电，叫我去看一看，代巴老送个花圈，并特意嘱咐，花圈钱由巴老个人出。

我马上给冰心老人家里打了个电话，问病房的号码。陈恕告诉我说，住在首都医院，已经退烧，看样子不要紧，医院今天不能探视，明天可以。这样我心里有了底，明天去看

巴金先生 看再给巴老回话。

放下电话，我骑着自行车直奔阜外大街，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汤家。客厅里设着灵堂，挂着汤先生的遗像，两侧摆着花篮。

我自报家门说明了来意，汤先生的夫人极为感动。她说：汤先生生前，极敬重巴金，有一次有事去见楚图南老，不知怎么提到了巴金，结果把要讲的事忘了，从头到尾谈的是巴金的书。他很喜欢巴老的《随想录》，买了几本，但没有买全，出差到武汉时，还叫他的女儿到书店去搜寻。他敬重巴金的坦率、真诚、严以律己，说老实话的精神。

汤逊安先生是1938年入党的老同志，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与文学界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也没有见过巴老，但是巴老的热心读者。病故后，他的子女给巴老写了封信，转达了他对巴老的敬意。巴老收到了这封信，很感动，不仅发来了唁电，还要送个花圈，表达他对逝去的读者的哀思。

第二个电话是一天上午打来的。记得那天作协机关里没有几个人，大部分同志去天津春游了。老徐在电话中说：巴老叫我马上替他给葛洛同志打个电话，问问他写的信收到没有？

我问老徐，什么事这么急？老徐说：中国作协创联部正在评选优秀编辑，准备授予巴老名誉优秀编辑的称号。巴老说，这许多年来，我只是个挂名编辑，没干什么，事情都是别人干的，授予我这个称号名实不符，所以坚决不能接受，

否则心里不安。这一称号，应该授予那些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同志，表彰他们为文学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已经给葛洛同志写信，讲了自己的看法，但怕葛洛同志没有收到，心里有点着急，所以叫我马上给主持评选工作的葛洛同志打个电话，再到创作联络部去说一声。

我给葛洛同志打了电话，得知巴老的信还没有收到，于是转达了巴老的意思，之后，又到具体承办评选工作的创作联络部办公室，当时只有刚来不久的大学生程绍武在，我讲了巴老的想法，这个热情坦诚的青年说：“巴老真高尚。一些人拼命争这个称号，而巴老给都不要，实在没法比。”

钱捐了没有

一九九〇年九月，日本授予巴金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同时获奖的还有日本著名电影导演黑泽明，英国中国科学史权威李约瑟博士，泰国著名作家、前总理克立·巴莫，日本东南亚政治文化学者矢野畅博士，均为世界一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

福冈是日本南部濒临博多湾的一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两千年前，就是日本与国际交流的窗口。在中国《汉书地理志》中就有关于乐浪郡的记载。在《后汉书东夷传》中，

巴金先生说公元57年，博多小国向后汉光霸占帝进贡得金印。1784年，一家夫在耕地时发现了《汉委奴国王》金印，验证了史书的记载。

在日本的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的留学生就是由博多出发到中国学习的，所以从古代开始，福冈就在日中文化交流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福冈市政府为了振光福冈文化，把福冈建成现代的国际文化城市，利用在举办亚洲太平洋地区博览会时所获巨额利润，设立了亚洲太平洋地区博览会财团，奖励了亚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为人类相互理解和世界和平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艺术家、学者。

评选委员会为巴金授奖的理由是：代表作《家》、《寒夜》等作品，充满了深厚的对人类的爱和人道主义精神，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一贯主张中国现代化；文革后，在批判社会的同时，诚实的批判自己，其文学活动在社会产生了巨大深远影响。

在授奖证书上有以下文字：您长期的文学活动，为亚洲的智慧、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授奖仪式之前，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派出四人专程到上海，邀请巴老出席授奖仪式。他们知道巴老身体不好，说福冈各界人士盼望巴金先生光临，为保证您的身体健康，生活方便，家属、医生、护士、秘书，来多少人都行。巴老说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虽然也想去见见老朋友，但恐怕力不从心了。

巴老最后决定，由他的儿子李小棠代他去领奖。小棠没去过日本，巴老叫我以他外事秘书的名义与小棠一起去。临行前，问巴老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去办，巴老叫我们到东京代他去看看老朋友井上靖先生，遇到老朋友代他问好。还对我说：“这次你是团长。”我开玩笑说：“既然巴老任命我为团长，我当仁不让，就不推辞了。现在讲究官衔，小棠也应该有一个，就叫他弄个秘书长或副团长干干吧。”小林说：“你们两个都是官了，就是没兵。”大家笑了起来。

福冈的接待极为隆重，房间大得能打乒乓球，先进的高级音响电视设备，都不知道怎么用。吃饭也是随心所欲，接待人员，花钱如流水，我出国访问二十余次，还从来没有这么“阔气”过。我知道，是沾了巴老的光。

授奖仪式在福冈桑巴来斯礼堂举行，一千五百人出席，不仅有日本文化界、政界、社会贤达，还有各国驻日本的大使、公使等外交官。奏古典皇家音乐，极为隆重、盛大、肃穆、豪华。

小棠代巴老接受奖章，并代表巴老宣读题为《我与日本》的讲稿。巴老说：“我首先对福冈市授予我一九九〇年度福冈亚洲文化奖创立特别奖表示衷心感谢。我对亚洲文化的发展没有做出什么贡献，得此殊荣，我认为这是福冈市和福冈市人民，对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尊重，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表示，所以我以愉快的心情接受这一荣誉。”

巴老还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作家。六十年前，我写第一篇小说时，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作家。”他回顾了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受日本文学的影响，六次访日与日本作家结下的深厚友谊，最后说：“我今年八十七岁，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愿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事业献出余生，即使我的生命化成了灰烬，我燃烧的心也会在朋友们中间燃烧。”

在授奖仪式上，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老人，他就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台上的获奖者、司仪、以及乐队均身着黑色燕尾服或黑色晚礼服，而李约瑟博士与众不同。他坐在轮椅里，上身是黑色缎子马褂，下身是黑色绣花缎子长袍，手里还拿着一顶瓜皮小帽。我差点笑出声来，悄悄问李先生的随行人员，她告诉我说，这身衣服是一九三八年在重庆时做的，他认为这是中国的礼服，有重要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他本以为这次能见到巴金先生，所以才特意从英国带来的。

福冈亚洲文化奖委员会，为获奖者颁发了奖章、证书，奖金五百万日元（约合人民币四十万元），还有一件博多泥人纪念品。但奖金不是现钞，而是一张巨大的支票。

我和小棠到东京见过井上靖先生后，回到了上海，由机场直奔巴老寓所，当面汇报。巴老听完后说：“你辛苦了，谢谢你。”接着又问：“钱捐了没有？”

我一愣，一时不知怎么回事？我不记得临行前巴老吩咐把钱捐给谁？所以莫明其妙。我说：“巴老，这只是支票，

必须用您的签名或图章才能取出现金，现在没法捐。”

巴老不再说捐钱的事，送我《巴金全集》1 - 12 卷，书放在桌子上，高高的一大摞。

俗话说，知子莫如父，但反过来讲知父莫如子也似乎有道理。在日本访问时，小棠就跟我说过：“这笔钱，我爸肯定不会留，要捐献的。”我问捐给哪儿？小棠说：“我不知道，但肯定一分钱也不会留。”

我回到北京不久就听说，这五百万日元，巴老捐给现代文学馆三百万，上海文学基金会二百万，自己分文没留。我没看见有关报道，估计是巴老不愿声张，悄悄捐的。

友好精神要传给年轻人

日本《朝日新闻》1998年5月16日刊发了记者清水胜彦由上海发回的电讯：巴金在5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怀念曹禺》，93岁的巴金患帕金森病长期住院，但创作激情不衰……日中友协全国本部副理事长古川万太郎先生看到这条消息，知道巴老身体健康，仍在写作，十分高兴，寄来了剪报并写信表示祝贺。

古川先生是巴老1980年访日结识的朋友。他是位研究日中关系史的学者，也是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的社会活动

巴家。

我在将剪报和古川先生的信译成中文寄给巴老和小林时，附信说：“古川先生9月底将率东京都社会文化团到杭州访问，他很关心巴老的健康，想念巴老，届时若巴老身体情况好，建议见见老朋友”但对此，我没抱什么希望，因为巴老因身体原因已多年不见外国朋友了。

9月28日，我陪代表团一行由郑州到杭州，住在西子宾馆，正好巴老在那里休养。我去看巴老时，小林和老徐说，巴老到杭州来以后，身体比在上海时好得多，可以见古川先生，时间定在明天下午4时，那时巴老的精神最好。

9月29日下午，我陪古川先生去见巴老。我们走进巴老住的二号楼时，巴老已经坐在轮椅上等待，因为天气比较凉，腿上盖了毯子。古川先生握着巴老的手说：“在这里见到您，感到很高兴。我是在您的精神感召下，投入日中友好行列的。我们现在与中国作家协会的交流，就是您1980年访日的继续。”巴老说：“我也很高兴。1980年那次访日，大家过得很愉快，也结交了不少朋友。我感谢你为中国作协、上海作协、《收获》杂志与日本的交流所作的贡献。中日友好，有今天的局面，不容易，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为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我们要把我们的体验告诉年轻人，把友好的精神传给年轻人，使友好事业继续下去。”古川先生说：“请先生放心，我们要向先生学习，做好友好工作。同时请先生保重，您的健康对中国对日

本都很重要，因为您是和平友好精神的象征。”巴老说：“我有许多话要说，但没有力气，说不出来。字也写不了，手不好用，所以心里着急。请你回去向那些老朋友代我问好。”

那天巴老精神很好，说了许多话也不显得疲劳，临别时，送给古川先生一本亲笔签名的大画册《巴金对你说》。巴老说：“古川先生的先生两个字写错了，是擦掉重写的，实在抱歉，但这样真实。”

我也想念日本朋友

1999年10月17日，我陪缅甸作家团到上海，一进饭店，我就给李小林打电话，问巴老的情况。小林说，爸爸最近还好，比较稳定，明天上午我在医院，你来吧。

我住的延安饭店离华东医院很近，步行10分钟就到了。走进病房，李小林迎上来，领我到巴老的房间。巴老躺在床上，头朝上，没戴眼镜，假牙也摘了，微张着嘴，显得清瘦，但脸色和精神都好。房间不大，床头放着一些医疗器械。小林说：“爸爸，你看谁来了，能认出来吗？”巴老插着鼻饲和氧气管，头部移动困难，小林叫我走近些，叫巴老看清楚。我往前走了一步说：“巴老，您好。”小林又问：

巴金先生 “爸爸，这是谁，认出来了吗？巴老还是不作声，只是专注地看着我。小林说：“爸爸，小陈，陈喜儒来看你了。”这时护士给巴老戴上了眼镜，巴老嘴在动，要说话，但痰马上涌上来，咳了一下，护士拿管吸痰。巴老说话了，但声音细微，我听不清也听不懂。小林说：“爸爸说你发型变了，认不出来了。”其实我的发型没变，只是为了见巴老，新理了发。以前见巴老，我很随便，头发比较长乱，弄得整齐些，巴老反倒认不出来了。我开玩笑说：“巴老，我是为来见您，才特意理的发，想弄得漂亮点儿，不好看吗？”巴老说：“不好看。”我说：“好，下次来看您，一定弄得好看点儿。”

每次见巴老，总要聊一聊有关日本文学、日本朋友的情况，这似乎是个传统节目，我不说，巴老也要问的，但他现在身体弱，一想说话就有痰，不便多说，于是我和小林走到外间。

外间放了一张床，两张沙发，窗台上放着几盆鲜花。小林说，现在巴老不能离人，家里人轮流值班。与小林闲谈时，我把日本评论家尾崎秀树先生病故的前后（巴老已发唁电）、水上勉先生、白土吾夫先生、佐藤纯子女士、横川健先生等人的情况说了说。中午时，我向巴老告辞，回到了饭店。

回到房间不久，小林来电话说：“我把你讲的有关日本朋友的情况跟爸爸讲了，爸爸说，我也很想念水上勉先生，请小

陈方便时代我向白士吾夫先生、佐藤纯子女士、横川先生等日本朋友问好。”

当天下午,中缅两国作家在上海作协座谈,我写了张传真,发给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横川健先生,转达巴老的问候。

10月19日,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专务理事白士先生复电说:“得知巴金先生没有忘记我们,关心着我们,使我们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水上勉先生虽然不时生病,但在文坛仍很活跃。佐藤纯子现在是我会常务理事,主持日常工作。井上靖先生的夫人芙美女士虽已90岁,但身体很好,在写回忆井上靖的文章,在庭院里种植蔬菜。中岛健藏先生的夫人京子女士也已87岁,在她的故乡福岛安度晚年,身体很好。”

“认识先生,已经几十年了,您一贯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人民,为亚洲的安定和世界和平而奔波。我们对您表示衷心地崇敬,并祝您健康长寿。”

我想,巴老得知这些老朋友的近况会感到欣慰和高兴的。

作者附记

这一组短文,大部分是一九八四年五月,陪巴老访日归来后,应某报之邀而写的,当时该报已决定编发在第七期。

但我想,既然是写巴老,应该告诉他一声,于是给巴老

巴金先生 写了一封信，列了我写的几个题目。后来我的好朋友陈丹晨去上海参加《上海文学》颁奖大会，李小林对他说：“我爸说最好不要宣传他，能否跟小陈商量一下，把稿子撤下来，不知小陈是否会不高兴？”

丹晨从上海回来，马上跟我讲了。我想既然巴老有这个意思，当然应该尊重，于是把稿子抽了下来。

但有一位编辑舍不得撤，过了几个月后，在内部刊物《文艺情况》上发了几篇。一些人写文章引用时，也注明某内部刊物，实际上就是一九八四年《文艺情况》第十期。

转眼间，十年过去了，这组短文一直沉睡在我的书桌里。前几天偶然与柳萌兄谈及此事，他说还是拿出来发表吧，这不是宣传，是实话实说。他也很敬重巴老的人品文品，觉得这些短文不应该再睡在抽屉里。

我因工作关系，一九八〇年、一九八四年两次随巴老访日，一九九〇年，以巴老外事秘书的名义与李小棠去日本为巴老接受福冈亚洲文化大奖。每年陪外国作家代表团到上海，总有机会见到巴老。

我只是把我在巴老身边工作时的亲眼所见，老老实实地记录下来，不加修饰，不发议论，就像随手拍下来的生活照片，既不讲究取景，也没有什么艺术构思。

翻出旧稿，又补写了几篇，就是现在这一束《巴金先生》，献给读者。

我知道，这不过是一株参天老树下的几片落叶，但我珍

爱它，把它深深藏在心里。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安定门

巴
金
先
生

巴
金
先
生

汪 洪

汪洪简历

汪洪，本名王增如，女，1950年生于北京市。1968年7月下乡到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北大荒生活14年。1982年调入中国作家协会。现在《作家文摘》报工作。副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撰写过《丁玲在最后的日子里》、《丁玲与叶圣陶的交往》、《剪柳春风—丁玲的故事》、《丁玲带我看望关露》、《丁玲与“诬告信”事件》、《中国1968—上山下乡》、《哭邵云环》等作品。编有《丁玲自叙》、《我在爱情中生长》、《西行阿里》、《心的属托》等著作。

融合在一起的生命

——记丁玲与陈明的生活片段

1. 弥留之际，她梦见一条美丽的金鱼被拦腰截成两段

.....

1986年春节。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家家店铺张灯结彩，购物的人流熙熙攘攘，每个人都沉浸在节日的喜庆之中。离此百米之遥的协和医院ICU抢救病室里，却是一片紧张一片沉寂，只有医疗器械发出轻微的有节奏的声响。病危的丁玲陷入深度昏迷之中，闭着眼睛平躺在病床上，双眉紧蹙，嘴唇蠕动。此时，她正沉浸在一个奇妙的梦境之中：一条金鱼，晃动着尾鳍，在一片清澈的绿水中自由自在地游动。那是一条非常美丽的金鱼，全身的鳞片发出金黄色的耀眼的光彩，丁玲从没见过这样的金鱼，她被这金鱼的美丽惊呆了。正在她赞叹不已之时，忽然不知有一种什么力量，一下子把那金鱼拦腰截成两段，金鱼头痛苦地扭动着，金鱼尾失去了方向，翻滚着向黑古隆冬的深渊沉去……丁玲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她大声呼喊起来：“不能这样！不能这样！”

随着她的呼喊，又一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那金鱼头和金鱼尾重新连接在一起，重合复原了，又变成一条完整的金鱼，怡然自得地遨游于水中。定睛仔细地看去，那条金鱼原来是丁玲和陈明幻化而成，他俩紧紧地拥抱着在一起，变成了这条金鱼。

“老丁，老丁！”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丁玲从梦境中醒来，她睁开双眼，看到陈明，立即紧紧拉住他的手，不肯松开。她用微弱的声音，叙述了刚才那个梦。陈明笑着说：“咱们俩就是一条鱼，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你安心养病，什么也不要想，等你好了，我们还要继续携手奋斗呢。”丁玲点点头，轻轻地说：“你再亲亲我。”陈明俯下身子，轻轻地亲吻了丁玲宽阔的额头。丁玲微笑了，她满足地合上眼睛，重又陷入昏睡之中，陷入无休止的梦境之中。在这弥留之际，她的八十二个春秋，她和陈明一起携手走过的四十四载曲折历程，那些个刻骨铭心的片段，重又浮现于她的脑际，他们的结合，似乎真地应验了丁玲梦中的那条金鱼。

2. 西战团：她和他相识相知相恋的开端

1937年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毛泽东主席在抗大操场上做了一个动员报告，他说：“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延安军民的抗战热情一下子点燃了，人人都要上前线去。战士上前线能打仗，文人去能干什么呢？丁玲和吴奚如等七个人商量了整整一个晚

上，决定组成一个精干的“战地记者团”，徒步到前线去采访，写抗战通讯。这个消息呼地一下子传开，抗大的青年人都觉得这是个上前线的好机会，都来报名，要求参加，他们把窑洞挤得满满的，进不来的人急得在外边喊。丁玲实在为难：她本人只想自己写文章，不愿意领导许多人，但她又真是喜欢这些热血沸腾的青年人。这时，中央军委和中宣传部发话了，要求丁玲他们把“记者团”改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吸引文艺宣传骨干，作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半军事化组织，到前线去宣传抗日，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的主任。

就在紧锣密鼓准备出发的日子里，西战团来了一个年轻的宣传股长。他叫陈明，只有20岁，却已经有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和一年半的党龄。就这样，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在西战团的队伍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开始共事了。

丁玲和陈明握手的时候笑了一下说：“我见过你。”陈明有些意外：“我们过去不认识呀。”“我看过你演的伯夏。”陈明心有灵犀地也笑了。

一个多月前，延安举行了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的活动，在晚会上，抗大学员把高尔基的代表作《母亲》改编成戏剧上演。那是六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夏夜的微风中已经可以闻到庄稼的清香。《母亲》是那一晚演出的高潮，主人公巴威尔出场了，伴随着悠扬的琴声，他唱出激愤的心声：

“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火酒浇焦了心窝。”这抑扬顿挫的歌声立刻赢来一片热烈的掌声，也令观众席中的丁玲激动不已，小伙子良好的台风和出众的表演，引起她强烈的好感，这样的人才，在延安是不多见的，她禁不住在内心里轻轻地呼唤：“伯夏！伯夏！（巴威尔的爱称）”现在，一身戎装的伯夏就站在她眼前了。

“你的演出水平不低嘛，以前演过戏吗？”丁玲像是面对着一个熟识的老朋友，很随便地笑着问道。“我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就演过，前后算起来，差不多演了二十多出戏。”“噢，你是从上海来的？”丁玲在上海生活多年，两人便又多了一个话题，他们的谈话很自然地进行下去。末了，丁玲看着陈明那瘦弱的身体，有些担心地问：“你的身体怎么样？咱们西战团可是要靠两条腿走路哪！”“身体很好，一点毛病也没有，在上海上中学的时候，我就是体育活跃分子，尤其喜欢踢足球，同学都叫我小李惠堂。”李惠堂是30年代上海有名的足球运动员。初次见面，这位精明干练的年轻人给丁玲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这次谈话同样给陈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丁玲既是他的上级领导，又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阅历丰富，谈吐不凡，陈明久闻她的大名，内心怀有深深的敬意。尽管他在上海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组织，而且是“一二·九”时上海中学联的核心分子，但是他觉得自己是要仰起脸来看丁玲的，她的资历、名气、水平，实在要比自己高出许多。在见面之

前，他很有几分忐忑和拘谨。但是丁玲一点高傲都没有，那么平和随便，话语又是那么风趣幽默。他很愿意听她的谈话。他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好领导。晚上临睡之前，他在内心里把白天的那场谈话又仔仔细细地回味了一遍，想象着丁玲说话时的语调和神态。“好在，今后同在一起工作了，谈话的机会多的是，我要好好向她学习。”

九月底，西战团出发了，徒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每天行军几十里，一到驻地，队员们放好背包就搞宣传，有的搭台准备演出，有的往墙上刷大标语、画漫画，有的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伙食呢，每人只有定量的小米饭和飘着几片菜叶的清汤。生活紧张而清苦，但大家热情高涨。陈明人长得瘦小，浑身却充满了活力，他能编能导能演能讲，还写得一手好字。每次演出之前，他都忙着扛杉篙搭台子，爬上爬下，一条新棉裤很快磨得露出了棉花。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作思想工作，看到谁闹情绪不高兴了，他讲一段笑话，立刻云开雾散，响起一片笑声。这一切丁玲都看在眼里，虽然她是团长，但是论做群众工作，论搞宣传鼓动，论出主意想点子，她都不如陈明。她有她的长处，也有她的短处，而那些她所不擅长的工作，却都是陈明施展才能的好地方。她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离不了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陈明成了她不可缺少的左膀右臂。

陈明对丁玲呢？最初，他只把她看作一位领导，内心里充满着敬意；慢慢的，在多日的相处中，他愿意和她接近，

愿意把自己对工作的意见、对同志的看法讲给她听，他喜欢她说话直爽、办事痛快、待人真诚热情的性格，他感觉她像是一个姐姐，在尊重之外，又多了一层亲近感。别的，他没有想过。

1938年春天，八路军取得了火烧阳明堡和平型关大捷的胜利。为了让国统区老百姓早一点知道胜利的消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正在潼关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尽快开赴西安。

西战团忙起来了，他们要编排一些新节目，去西安演出。宣传股长陈明当然是个重要角色，那几天忙得顾不上吃饭睡觉，熬红了眼睛。出发上火车的时候，他忽然感到胃部一阵阵剧烈疼痛，疼得脸色灰白，直不起腰来，头上一阵阵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着他，却一时找不到。丁玲又心疼又着急，她把挎包塞给身旁一个同志，走过去，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蹬蹬蹬几步踏上火车，直奔软席车厢。车厢内人已坐满，丁玲把陈明放下来，让两个同志搀扶着，就去找乘务长，乘务长来了，他见眼前这位女长官气概不凡，身穿缴获的日本军大衣，头戴十八集团军帽，腰中还有枪，连忙说：抗日将士理当优待，赶快张罗着给陈明腾出了一个空位。丁玲又找来止疼的胃药给陈明吃了，直到他的病情稍稍稳定，才回到硬席车厢去。

火车在夜色中行进，车厢里的旅客和西战团的团员们都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她在心里怨

恨着自己：明明知道他有胃病，怎么不督促他按时吃饭，任他没时没晌地干工作，老是吃凉透了的小米饭？明明知道他的棉裤已经破了好几个大窟窿，怎么不想个办法帮他更换一条，任他受寒受冻？陈明的病紧紧地牵扯着丁玲的心。自从七年前胡也频被国民党残酷杀害，四年前冯达被捕背离了革命之后，还从没有哪一个异性如此深切地占据过她的心呢。到达西安后，丁玲安排陈明住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买来布料和棉花。她在一天的演出任务结束之后，在夜深人静之时，就着一盏煤油灯微弱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写文章丁玲是一把好手，针线活却不是她的特长。在戎马倥偬的日子里缝制一条棉裤，这对丁玲来说，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陈明完全懂得这一点，他抚摸着柔软的厚厚的棉裤，领悟出了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爱情的种子就在这不知不觉中，悄悄地萌生了。

在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

3. 在延安，他们的感情经受住了考验

1938年夏天，西战团奉命凯旋延安。丁玲去马列学院

学习，后到文协做副主任，陈明则到烽火剧团当团长。丁玲在延安搞创作，陈明经常带领剧团到边区各地演出。不在同一个单位里，也不能经常见面，但他们的感情不曾衰减，依然彼此深深地思念着。连接他们感情的，是一封封情真意切的书信，忠厚的诗人李又然，常常成为替他们传书递简的鸿雁。

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在这个革命的圣地，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有些人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他们搞不懂：那么有名望的大作家，为什么不去找一个有地位的高级干部，偏偏看中一个毛头小伙子？一些关心陈明的朋友更是直言不讳：“你就不怕让人笑话当‘小丈夫’？”丁玲在年轻时就是一个不重门第只重感情的人，她不在乎这些，相比之下，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就连老朋友、大胡子诗人柯仲平也气喘吁吁地跑了来，很认真地对他说：“如果你们真的结婚，我怀疑你们能不能白头偕老？”

越是了解了丁玲，陈明就越是爱丁玲，在丁玲的身上，具有许多女性身上所没有的长处：真诚，热情，直率，才华，她把这些聚于一身，因而具有了强大的魅力，这魅力深深吸引着他，使他无法抵抗，不能自拔，使他一步一步地走近丁玲，走进她的感情世界，走进她的心灵深处。他决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毛头小伙子”，他曾经接触过许多优秀青年，但无论是在上海的学生运动领袖中间，还是在解放区的

活跃女性当中，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深深地占据了陈明的心。可是，作朋友是一回事，作恋人就是另外一事情了，种种议论也不能不去考虑，年龄、地位、经历等等，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今后的生活和感情？许多人都来规劝他，有亲密的好友，有共事的同志，他们都是好意，苦口婆心，情真意切，这些，搞得陈明心里好烦。他想，爱情本来是一件喜悦的事情，为什么要弄来这么多烦恼？有几分躲避，有几分赌气，有几分就俗，当然也有真实的爱情，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恋爱了，并且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结婚是为了摆脱烦恼，但陈明却感觉到更多的烦恼。他深深思念的是丁玲，他不能忘却的是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笑着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他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感情这东西是绝对欺骗不了的。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理解这一切，她也尊重陈明的感情和选择。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但最后促使陈明下决心与丁玲结合的，却是这样一件事。

有一天，一位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老朋友来找陈明，很神秘地告诉他一件事情。前一天，康生给他们讲了一次话，康生说：“同志们能到中央党校来学习，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你们都是经过挑选的，有些人想来，我们也不要，

比如丁玲，我们就不收她，因为她曾经向国民党自首过……”陈明听了，非常气愤。他听丁玲亲口讲过她的历史，她怎样被国民党软禁，又怎样逃离虎口来到延安。党中央是信任她的，专门为她开了欢迎会，毛泽东、周恩来都出席了。毛泽东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临江仙》词，其中的“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等词语，既是对丁玲的肯定，更是对丁玲的赞赏。“康生在大庭广众面前讲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话，无非是因为丁玲来延安后没有去买他的帐！”陈明愤愤地说。

朋友走后，陈明忽然为丁玲担心起来。他想丁玲是一个心胸坦荡口无遮拦的人，对斗争的复杂性、一些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常常估计不足，对任何人都不设防，不知道怎样保护自己。他一下子感到，丁玲身边很需要有一人，有一个关心她提醒她保护她的人，而自己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忽然间，一切顾虑都没有了，种种障碍都消散了，他离不开她，她也离不开他，他要毅然地、勇敢地去同她结合了！

他兴冲冲地跑去告诉丁玲。丁玲听完了，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真是这样，我要先办好一件事情，我要请党组织把我的历史问题审查清楚，做出一个结论，证明我的清白。我不能背着一个糊里糊涂的包袱同你结婚，我不能连累你。”在丁玲的要求下，中央组织部对丁玲南京被囚的一段历史进行了仔细审查。1941年的元旦，延安军民喜气洋洋

地庆贺新年，就在那一天，丁玲去了一趟中央组织部，拿到了她的历史结论。结论中说，丁玲“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结论的末尾，有陈云和李富春同志的亲笔签名。丁玲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去找陈明，她急于把这个喜讯告诉他：笼罩在她头上的乌云驱散了，笼罩在她和陈明婚事上的乌云也驱散了。当时他们决不会想到，这片乌云并没有散净，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它始终若即若离，一次次地考验着她的意志，也考验着他们之间的感情。

1942年2月，春节放假的日子里，在延安兰家坪一间窑洞里，苦恋了五年的丁玲和陈明终于结合了。这一年丁玲38岁，陈明25岁。

这一对新婚夫妇的蜜月还没有度完，便迎来了他们共同生活后的第一场风雨。在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丁玲《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在延安引起了争论。很快，国民党的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这更使问题复杂化了，有人开始用异样的眼光注视丁玲。此时，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了，丁玲接到通知：明天去杨家岭参加高级干部整风学习会。

她对自己的文章也一下子没了底，有些忐忑不安。陈明就着窑洞里那盏微弱的煤油灯，已经不知是第几遍看《三八节有感》了，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推敲，最后揉揉酸痛的双眼，十分肯定地对丁玲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健康，完

全是党内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完全站得住脚。要说有缺点，就是有的地方言辞过激了一些。你要沉得住气，不要听别人瞎说。”听了陈明的话，丁玲心里踏实多了，三月七日的文章刚写完这篇文章拿给陈明看时，他就提出有些说法不够妥当，建议再改一改。但约稿的人催得急，已无暇再改。丁玲感到，陈明在一些方面比她想得细，考虑得周全，有陈明帮她拿主意，她心里踏实多了。陈明又说：“明天到了杨家岭，要是能见到毛主席，你把心里话给他说说。”丁玲点点头。

第二天的高干整风学习会，果然是毛主席主持，他讲了几句关于整风学习的开场白后，康生的老婆曹秋欧第一个发言，上来就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也是批评这两篇文章：“……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的总司令……”丁玲平时与贺龙很熟，此时她望着贺龙微笑，心想：“你误会到哪里去了，我什么时候骂过我们的总司令？”接着又有四五个人发言，重点都是批评这两篇文章。丁玲心里有点紧张，也有点委屈，她满腔热情来到延安，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人这样严厉的批评，忽然，陈明的忠告响在耳边：“要沉得住气，”“和毛主席说说心里话”。她把目光转向毛主席。毛主席开始总结发言了：“《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是同志。”这是最高一级的仲裁。

这次风波之后，陈明决意听从原来的组织分配方案，到

一个县里去当县长，把丁玲的组织关系也转到那个县去。他天真地以为，他们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下乡去开展群众工作，有了他的保护，丁玲就再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伤害了。消息传出后，有一天，胡乔木同志找陈明去谈了一次话。他十分恳切地对陈明说：在共产党内，培养一名县长团长可能不困难，但培养一名作家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目前延安最缺少的是人才。丁玲不仅是你的妻子，更是我们党内不可多得的有才华的作家，所以，组织上不同意你们这个想法。乔木同志还说，你不仅不能带走丁玲，你陈明也不要当那个县长了，你也调到文协来，帮助丁玲，做好文协的工作，这个工作，要比你去当县长有意义得多。

陈明懂得，胡乔木同志是代表组织同他谈话，他说的，是党组织的意见。那还有什么可商量的呢，愉快地服从好了。但是这件事情，在陈明和丁玲的一生中却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也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陈明的道路。去做县长，是进入了政界，他在那里，可以充分施展他的组织才能行政才能，丁玲呢，是作为他的夫人跟随他去的；到文协，就进入了文化界，他是以协助丁玲的角色出现。文艺界非他所愿，搞创作也非他所长。但是他和丁玲两人，谁帮助谁谁协助谁都是一样的，既是革命分工不同，也是家庭里的角色不同，总有主角和配角嘛，只要于丁玲有益，只要丁玲高兴，他心甘情愿作一辈子“配角”。从此，陈明一心一意协助着丁玲，在中国文学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

4. 抬头湾：凝聚着两人心血的一部巨著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乡下厂，深入生活。有了陈明的陪伴，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不再寂寞，夜行于山谷中不再恐慌。她和陈明一起到老乡家里访贫问苦，一起到难民工厂体验生活，回来后一起交流情况，商谈写作计划。这期间丁玲写出了许多反映工农兵的文章：《田保霖》、《袁广发》、《二十把板斧》、《万队长》等。毛主席从《解放日报》上读到了，他很高兴，1944年7月1日亲笔给丁玲和欧阳山写信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作风庆祝。”并约他们两人当晚到枣园叙谈，留他们在枣园吃饭。后来丁玲深情地回忆说：“延安枣园里的黄昏，一钩新月，夏夜的风送来枣花的余香，那样的散步，那样的笑语，那样雍容大方，那样温和典雅的仪态，给我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毛主席的鼓励，使丁玲萌生出一个念头：不能光写小文章，要写一部长篇大作，报答毛主席的关怀。题材么，当然还是要来自生活，反映工农兵。正好土改开始了，这将是一场彻底改变农民命运的伟大运动，一定会有许多很好的素材。丁玲立刻请缨，与陈明一起参加了晋察冀中央局组织的工作队，1946年夏天，在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参加土改。一个多月后，工作全部结束，战火也日益逼近。在一路向南撤离的途中，丁玲脑子里整天转动的，都是这一个月里发生

的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场面，和刚刚熟悉的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他们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阜平县的红土山村时，丁玲兴奋地对陈明说：“我已经构思好了一部长篇小说，现在需要的只是一张桌子、一叠纸，一支笔了。”在晋察冀中央局的安排下，丁玲和陈明带着勤务员张来福，住进了阜平县抬头湾村，开始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

这里是太行山的一个小山村，只有几十户人家，老百姓生活很苦。丁玲他们住在山坡上一间土坯房里，往下可以俯瞰全村，往上只有一片密密的柞树林。这里环境安静，卫生却很差，几户老乡的七八个厕所都盖在附近，臭味难闻。老乡家的猪也在厕所里进进出出的找食吃。陈明和来福把小屋周围的杂草除净，用石头垒起半截院墙。陈明又找来石灰洒到几个厕所里，臭味减轻了不少，苍蝇蚊子也少多了。丁玲跟陈明开玩笑说：“真看不出来，修房子过日子你也是一把好手。”陈明说：“修房子比找稿纸可容易多了。”

没有稿纸怎么写作？陈明搬出了他的“百宝箱”，拿出一大摞账簿纸。那还是在张家口时，祖慧从逃跑的日本鬼子扔掉的垃圾里拣来的。陈明把账簿纸一张张展平，擦干净，用粗线装订整齐，给丁玲写草稿用。屋内惟一的“奢侈品”，是一张小炕桌，白木茬散发出杨木的清香。这是给丁玲用的，陈明誊抄稿子只能趴在炕沿上，屁股下面有时坐一个树疙瘩，有时垫两块土坯。陈明开玩笑地央求小来福：“你看我们干得这么卖劲，是不是晚上给加一个菜？”所谓

加菜，不过是在窝头咸菜之外，加一点新鲜蔬菜。十五岁的小来福却一脸认真：“那可不行，这个月的菜金都快超支了。”陈明和丁玲哈哈大笑。第二天，来福就跑几十里路，去买便宜的干菜蘑菇来改善伙食。

夜幕降临后，小屋里充满了温馨：丁玲和陈明一边喝着热乎乎的玉米面糊糊，一边探讨着作品中的人物故事。他们不仅把参加土改的体验用上了，还把这几年来两个人的生活积累全都翻腾出来了，主人公张裕民、程仁和顾涌、钱文贵等人的原型，都是他们十分熟悉的。陈明不仅成了丁玲作品的第一位读者，还是她的一位好高参。

草稿纸一页页加高增厚，丁玲的眉头却越皱越紧。那年冬天很冷，加上连日紧张写作，丁玲的腰痛病犯了，有时痛得额头上沁出了汗珠。看到丁玲痛苦的样子，陈明真是心痛。他找来一个暖水袋，灌上热水，给丁玲焐在腰间。屋子冷，暖水袋凉得快，一两个小时就得换一次热水，一天要换五六次。陈明又要抄稿子，又要烧水、换水，忙得团团转。他想了个法子，找来一些土坯，又和了一些泥。小来福帮着他，两人干得很欢。丁玲焐着水袋坐在炕上奇怪地问：“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两个人只是笑，也不答话。他们把炉子拆开，重新改造，把炉壁加高，这样，丁玲就可以把腰贴在炉壁上写作，暖烘烘的，比热水袋要舒服多了，疼痛也减轻了不少。

这时，解放战争已经打响，前方不断传来捷报吸引着陈

明，丁玲也支持他到野战军去体验生活。而她自己，也要再赴农村参加土改，为她的小说搜集新鲜的素材。在分别两个月的日子里，强烈的思念袭扰着丁玲，她给陈明写信叙说自己的感情：“……我很想你，我觉得除了你以外再没有别人可以更谈得来的了。离开你生活，并非生活的幸福，只是生活的奋斗，我需要奋斗，可是更需要幸福！”“……我需要你，需要你和我一起，一同下乡，一同写作。这几年，我有些成绩，实际是你给我的！”

1948年6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反映土改题材的长篇小说，终于定稿，全书20多万字。9月，东北光华书店出版了初版本。丁玲在哈尔滨拿到第一本书时，自然想到了陈明。此时陈明正走在石家庄到东北的路上，无法同丁玲一起分享这巨大的喜悦。而她也正要出访东欧，不能在这里等待陈明。丁玲把这本书翻开，在扉页上深情地写下一段文字：“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致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丁玲 1948年，10月底去欧州以前数日于哈尔滨市。”

在建国前后那段时间里，丁玲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几次去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访问。而陈明呢，他也要做出属于自己的一份成绩。他一头扎到工厂去搜集素材体验生活，合写了话剧《窑工》、《生死仇》，独立完成了电影剧本《六号门》。丁玲在出访的火车上给陈明写信说：“我在车上想：

我对伯夏有什么要求呢？好像不要求什么，我萦回在心中的只是他如何工作得有成绩。”“我希望你的剧本成功！好好地写！多住在工厂几天也行。不要求急，不要以为不能加工了。而且不必挂念我，你总要把成绩搞出来作为我回来的见面礼！”

5. 多福巷：幸福与灾难双降

1952年春天，丁玲陈明住在北京的多福巷，他们的16号真的成了“多福”的小院：《太阳照常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六号门》也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上映后获得好评。多福巷的小院里迎来了亲朋好友的赞美和祝福。当时丁玲参加完纪念果戈里逝世一百周年大会，正在苏联参观访问，她一下子成了令人瞩目的新闻人物，每天被鲜花、掌声和笑脸所包围。但是晚上回到宾馆，她忽然非常想家，想念陈明，她觉得这个荣誉应当和陈明一起分享，因为这部书里也渗透着他的许多汗水，他是幕后英雄！她从心底向陈明发出真情的呼唤：“这两年我之所以能创作，实在是因为有你，有你给我的幸福所造成的呵！”

建国初期住在多福巷的那段日子，是他们事业有成，比翼双飞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日子，是他们一生中过得最舒心的日子。那段日子，对于他们是最珍贵的，也实在太短暂了。

1955年是中国文学界的多事之秋。继“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挖出了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时正值盛夏，丁玲坐在家里，挥汗如雨地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听到揭发她的那些材料，她的心一下子掉到冰窖里：昔日同进同出的老同志、老朋友、怎么几天之间就变颜变色，声色俱厉地指责她反党呢？最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南京那段经历再次被翻腾出来，硬说成是自首叛变。丁玲有口难辩，充满了委屈，在批斗大会上，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出了声。

回到家里，陈明安慰她说：你不能感情用事，要冷静下来。我们党最讲实事求是，你应当根据事实，向上级写一份申诉材料。丁玲丢下她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开始为自己辩护。她真地身处“严寒的日子里”了。材料写好，拿给陈明看，陈明看完那一大沓材料严肃地说：“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连为自己辩护都不会？”丁玲摘下花镜，疑惑地望着陈明。陈明翻开其中的一页：“在南京这段，你只是写你一年搬了五六次家，为什么这么频繁地搬家？从城里搬到城外，越搬越远的原因是什么？还不是为了麻痹敌人，为以后逃离南京作准备？如果真想投敌叛变，还用得着费这个劲吗？”陈明说得兴起，干脆拿起一支笔，在材料上面密密麻麻地改写起来。他一边写一边在心里感慨：“丁玲呀丁玲，你不但不会自防，而且也不会自卫，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你怎么还是这样天真哪！”

丁玲的申诉得到了回应，1956年中宣部组成以张际春副部长为首的调查小组，对“丁玲反党集团案”进行复查。1957年6月，复查结果表明此案为错案，作协党组准备在扩大会上作检查，同时要丁玲在大会上作个发言。丁玲的发言稿写好，陈明不放心，照例要看一下。其中有一处谈到，作协党组说1955年召开批判丁玲陈企霞大会是中宣部部长会议决定的。陈明认为，这是有人在说假话，忍不住在旁边添写了一行小字：“请把中宣部的会议记录拿来看看。”可是谁料风云突变，会议记录还没看到，势头更猛的反右派斗争便开始了。非但错案没能纠正，丁玲又被扣上一顶“右派”的大帽子，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供全国人民口诛笔伐。更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陈明在丁玲申诉材料上添写的那一行小字，竟成为他替丁玲翻案的证据。当时的中宣部长颇为不满地说：“太猖狂了！居然要查中宣部的会议记录！”陈明因此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取消级别，发配北大荒。北京电影制片厂剧本创作所的同志在讨论时都说：“陈明从来没说过什么反党言论。他的右派问题只有一条：就是替丁玲辩护。”

为了丁玲，陈明无怨无悔，可是把年过半百的丁玲一个人留在家里，又是在这样的非常时刻，陈明很不放心。多福巷16号小院，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欢乐热闹，变得冷落寂寞，现在这里已经离“福”太远太远。在昏黄的灯光下，丁玲陈明相对无语，沉默良久。陈明想了又想，说：“这种时候

我不应该离开你，你不能没有我，我要找作家协会……”

丁玲向来不愿向人屈服：“不必了，我们不去向谁乞求怜悯。你尽管去黑龙江吧！你先行一步，安顿下来，我就去北大荒找你。那里天高地阔，我们从头干起！”丁玲的决心感染了陈明，他们相约：“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为了纪念这次离别，为了不久的重聚，他们郑重其事地在家中拍了一张合影。

在与陈明分别的日子里，丁玲不只一次在心中对陈明说：“你有何辜呢？只不过由于我害了你……”她觉得对不起陈明，她盼着能早一天飞到陈明身旁。

6. 北大荒：“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都是心灵上的莫大享受和慰藉。”

在北京时，丁玲有秘书有保姆有司机，生活优裕；到了北大荒，这一切便如同童话里灰姑娘的马车一样，过了午夜十二点就消逝得无影无踪。丁玲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灰姑娘”，脸上还贴着“右派”的“金印”，她是人民的敌人，必须在劳动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早上四点钟，冬天的北大荒还是黑沉沉的夜，她就要到农场畜牧队的鸡舍去剁鸡食，拌饲料，喂小鸡了。

大棵的圆白菜冻得梆硬，一刀剁下去，只有一道浅浅的白印。丁玲要先把炉子生好，把菜化开，然后再一刀一刀地剁。菜的表面化了，里边的心依然冻着，剁起来很费劲，这

种工作，要从凌晨四点干到上午九点。几个小时干下来，手掌心是疼的，手腕是酸的，两条胳膊几乎抬不起来了，十几天之后，右手腕肿得老高，连一起干活的转业兵家属看了都心疼，捧着她的手说：“瞧瞧，这是犯了啥罪呢，吃这么大的苦！快别干了，歇些日子吧！”丁玲却笑着说：“解放军不是有句话叫‘轻伤不下火线’嘛，右手脖子肿了还有左手哩！”

九点钟，该吃早饭了，丁玲放下菜刀，解下围裙，系好头巾回家去。陈明上班前已经把熬好的小米粥煨在锅里。馒头又白又松软，咸菜切成细细的丝，用香油拌过，吃着很香甜。中午，两人回家一起把饭做好，然后在炕桌边相对而坐，饭菜虽简单，心里好舒坦。丁玲风趣地对陈明说：“这里才是我的‘多福巷’呢，干了一上午活，回来坐在炕上吃热乎乎的饭菜，多有福啊！”看到了丁玲高兴，陈明心里就高兴，“是啊，北大荒的空气好，干点劳动身体好，我们就在这里养老吧！”丁玲又接了一句：“还有一好呢，这里的人好！”

陈明干活也是处处抢在前边，甚至敢和年轻的小伙子比赛挑双筐。他们劳动态度好，又懂得关心人体贴人，帮队里买机器办事情，教大家学唱歌学文化。上边来人了解情况，职工们都给他俩说好话。1961年，东北农垦总局通知农场党委，给陈明摘去了“右派”帽子。但是丁玲不同，她是全国知名的“钦定”大“右派”，农场无权给她摘帽。队里

的职工们对此都有些愤愤不平，畜牧队队长、原上甘岭部队转业的营级干部气愤地说：“哪个庙里没有屈死鬼！”

王震同志很关心他们，每一次到垦区视察工作都要接见他们，他决定让丁玲和陈明作文化教员，开展群众扫盲工作。农场又让陈明和丁玲一起辅导职工业余文艺宣传队，演出了《刘三姐》、《三世仇》等剧目。1965年，东北农垦总局又把他们调到机械化程度较高、条件较好的宝泉岭农场。和这些淳朴的北大荒人在一起，丁玲陈明感到十分快活。他们甚至打算一辈子沉在北大荒，过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了。

然而，这个小小的梦想也无法实现，一场“文化大革命”打碎了他们的宁静。“大右派”丁玲和“摘帽右派”陈明，理所当然地被归入“牛鬼蛇神”之列，关入“牛棚”。陈明罪名较轻，被关入大“牛棚”，丁玲是重点人物，被关入单间，有专人看守。一天下午，房门被砰地撞开，闯进一群女青年，她们把丁玲从炕上拽到地下，嚷嚷着：“跪下！跪下！”接着一阵拳脚落在丁玲头上、身上、腰上。其中一个女高音尖声斥骂：“大右派！大特务！反革命！打死她！”听见这熟悉的北京口音，丁玲才知道她们是刚下乡不久的知识青年。“可怜的孩子，你们怎么下得了这样的毒手啊！公理在哪里呀！”这种日子太难熬了，她多想看到陈明，向他诉说，向他寻求一点支持的力量。但是她见不到陈明，也得不到他的消息。就在这殷切的思念中，秋天去了，冬天来了。

早上天刚亮，刺耳的哨声便响起来，有人大声喊着大“牛棚”里的“牛鬼蛇神”去打扫操场。丁玲好像听到了陈明的咳嗽声，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她出不了屋，女看守把门反锁了。窗棂上挂着一件制服，她用制服遮挡着脸，辨认着操场上扫地的每一个人。有个人抡着大扫帚，冲着她这边扫过来，啊！正是陈明，毛皮帽子下的那双眼睛似乎在说：“你要挺住。”丁玲真希望就这样望下去，可是门响了，看守回来了。

丁玲赶快到过道里去捅火墙的炉子。这时扫街的“牛鬼蛇神”们也回来了，杂沓的脚步声从她身边走过。忽然，她感到有一个东西轻轻落在脚边，她赶紧拣起来，是一个小纸团。捅完炉子，回到屋里，她偷偷展开纸团细看，那是一片皱巴巴的烟盒纸，背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小字：“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的。”

1969年春节到了，许多人被恩准回家过年去了，大“牛棚”里只剩下陈明一个人。除夕夜，街上响起了噼里叭啦的鞭炮声，陈明孤零零躺在一铺大炕上，只有那盏光线昏暗的灯泡陪伴他。陈明决心要去看望丁玲。他悄声央求看守。看守看看四下无人，低声说：“不是我不让你去，前些日子北京来人审丁玲，吩咐绝对不准你们见面。”陈明说：“我给她买了一点辣子酱，都一个多月了，让我给她送过

去，去去就回。”看守说：“老陈，其实我挺同情你的。你才52岁，问题也不严重，日子还长呢。丁玲是定了性的大叛徒、大右派，你何必非要死守着她呢？”陈明有些激动：“你不懂，你不了解她。”看守听了，又不解又无奈地说：“快去快回，别交谈。”

陈明喜出望外，赶快收拾了一个小饭盒，装上早已备好的咸菜、辣酱，来到丁玲的“单间”。“你们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但不能说话。”陈明刚迈进屋，便听到了女看守的命令。他看到了丁玲惊喜的目光，他也朝丁玲眨眨眼，不能用语言说话，那就用眼睛来交谈。

陈明把饭盒放在炕上，给丁玲盛了一小碗中午省下的大米饭，又在上面浇了一勺辣酱，这是丁玲平时最喜欢吃的。丁玲好像也有准备，不知从什么地方拿出一包炸黄豆，用报纸垫着摊在炕上，她用小勺撮了一勺，放到陈明的碗里。他们四目相对，默默地注视，默默地咀嚼。他们在两位看守的监视下，两年半以来头一次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这是一顿年夜饭，一顿团圆饭，虽然只有辣酱、咸菜和黄豆，但是他们觉得胜过了一切美味佳肴。“只要两个人能在一起，几秒钟都是宝贵的，都是心灵上的莫大享受和慰藉。”

正是这种相濡以沫的真挚感情，支撑着丁玲和陈明度过了那段黑暗的岁月。

7. 从嶂头村到北京：他为除掉她的紧箍咒而奔忙

1978年中秋节。清澄的月色洒在山西长治市嶂头村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74岁的丁玲坐在院中的条凳上，静静地想着心事。

八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她和陈明分别被押上了火车，关进北京秦城监狱。三年前，他们又先后被遣送到这个小山村。一个月前，按照中央11号文件精神，长治市老顶山公社党委给她摘掉了右派帽子。今晚，热情的老乡邀请她和陈明去喝酒，这是村里过中秋的风俗。丁玲实在不想去，但又拗不过再三再四来邀请的乡亲们，只好由陈明一人代表了。此时，风摇树影，月色溶溶，收音机里传来郭兰英的歌声：“八月十五啊，月儿明——”想想眼前，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丁陈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右派集团和南京自首叛变三顶大帽子依然重重地压在头上，她的问题远没有真正解决。俗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自己已经是七十四岁的人啦，来日无多，有生之年里，这些问题还能不能解决呢？丁玲不觉喟然长叹，翻开日记本写到：“……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惟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陈明踏着皎洁的月色回来，他喝了老乡家里的醇酒，他还听到乡亲们许多温暖的话语。有几位技术人员经常出差在外，消息灵通，他们告诉陈明，现在党中央最讲实事求是，

连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都出来工作了，还有谁的冤案不能平反？还听说叶帅讲过：功是功，过是过，是是是，非是非，无论什么时期哪个朝代的问题，都要实事求是解决。老丁的冤枉，这回有希望昭雪了。

陈明高兴地把这些个消息告诉丁玲，他说：“咱们不能就这么等着，我得去一趟北京，找找熟人，了解一下情况。你赶紧写一份申诉材料，我要带上！”11月底，陈明动身了。他怕到太原转车火车票不好买，耽误了时间，就坐上“长治——邯郸——北京”的长途汽车。汽车昼夜兼程，夜晚冷风钻进车厢，吹透了棉衣服。路又不好，颠簸得厉害，陈明根本无法入眠。漳头村的丁玲也是一夜未睡。听着狂风夹着沙土拍打窗户的声音，她心里直后悔：应该坚持让陈明坐火车，火车上暖和些。第二天一大早她就迫不及待地起来给陈明写信：“昨天夜晚我担心了一整夜。昨夜的雪虽小，可是风可不小呵！”

陈明在北京住了一个月，这是十分紧张的一个月。他每天都要坐上公共汽车去找人，去申诉，去反映丁玲的处境。他把丁玲的申诉材料抄写了四份，分别送到中组部和胡耀邦、胡乔木、王震同志家中。几位领导同志都很热情，安慰他不要着急。王震同志说：“丁玲从南京逃出来，是投奔到延安嘛，她并没跑到国民党那里去嘛，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在一些部门和一些领导那里，丁玲的问题仍然有阻力。经过陈明不懈的努力，在胡耀邦同志的直接关怀下，中组部

安排丁玲和陈明先回北京治病，由文化部负责接待。

他们终于回到了北京，以两个自由的普通平民的身份回到了北京，一边治病，一边等候组织上的处理意见。他们商定，在组织未做出平反结论前，自己先给自己平反，先写文章亮相。可是，腰椎的剧烈疼痛，使丁玲无法坐在椅子上写作。陈明找来一块课桌面大小的三合板，两边拴上宽带子，吊在丁玲脖子上，这样丁玲就可以倚着墙站着写作了。天气好时，她就站在院子里，边晒太阳边写作。她跟陈明开玩笑说：“你看，这像不像开批斗会时给我戴的那块牌子？”陈明用手点点丁玲：“你啊，算和牌子有缘了。”

在生命的最后七年里，身患多种疾病的丁玲一边顽强的写作，一边为讨回自己的清白申辩着。她用一年出版一本新书的速度证明着自己的写作实力，七年出版了八本著作，其中新作近 100 万字。她的《访美散记》、《魑魅世界》和《风雪人间》成为人间绝唱。1984 年 8 月 1 日，经中央书记处批准，中央组织部为丁玲彻底平反，终于推翻了压在她头上的“三座大山”。她接到这份文件时，激动地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8. 她临终遗嘱：再给他找一个老伴

躺在协和医院 ICU 病室里的丁玲，再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望着四十四年甘苦与共的伴侣陈明，她轻轻说道：“你太苦了。”这句话里的丰富含义，只有陈明一个人能体味得

出。

“我扶你起来坐一会儿好吗？”陈明问。丁玲点点头。医护人员摇起床头，陈明扶丁玲坐好，又给她垫了一个靠枕。“我喂你喝点水吧。”陈明把泡好的西洋参水，用小匙一点点喂到丁玲口中。丁玲似乎有了一些精神，她拉过陈明的手：“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跟着我吃了多少苦，你太可怜了！我死后，你要再找一个老伴……”“我谁也不找，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丁玲有些急了，对在场的亲友和工作人员说：“我死后，你们要帮助陈明再找一个老伴……”丁玲的嘱托，表达了她对陈明刻骨铭心的爱。她不放心陈明一个人过孤独、寂寞的生活，她希望能有一个人代替她，来照顾陈明，陪伴陈明。

丁玲去世五年之后，在老朋友们的帮助动员下，陈明与老报人张友鸾的女儿张钰结为百年之好。他们的黄昏恋情十分美满，这样也就圆了丁玲临终的一桩心愿。